

革命造反年代

上海文革運動史稿 II

李 遜



OXFORD

大众图书馆 <http://dztsq.info>

李 遜
革命造反年代

上海文革運動史稿

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1 3 5 7 9 10 8 6 4 2

革命造反年代
上海文革運動史稿

II

李遜

978-0-19-944168-6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目 錄

第二十一章

解散「兵團」

——王洪文整合工人造反派

- 813 迅速發展的二兵團
- 817 二兵團、一兵團、工三司和野戰兵團
- 820 王洪文嘗試合併未成功
- 824 《第五號通令》風波
- 828 兵團被各個擊破
- 835 范佐棟被關
- 838 潘國平被審查
- 841 雙造司和新工總司
- 846 王洪文一統工總司
- 850 小結

第二十二章

砸聯司

——鞏固文革新秩序

- 853 1967年上海的武鬥
- 856 上柴廠兩大派群眾組織
- 861 聯司和東方紅爭奪造反名份
- 866 上柴廠第一次大規模武鬥
- 867 市革會支持東方紅
- 869 支聯站：聯司走向社會
- 874 「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
- 877 解福喜事件
- 880 「G號行動」
- 884 市革會的態度
- 886 事態繼續擴大
- 888 市革會送《公開信》
- 891 偶然事件引發必然武鬥

- 897 8.4砸聯司大武鬥
903 武鬥的嚴重後果
906 毛澤東讚揚砸聯司行動
909 小結

第二十三章

4.12炮打 ——來自軍隊的警告

- 913 張春橋未出席大會引猜測
916 二軍大「紅旗」發端
920 北京傳來的消息
924 文匯報社成立炮打戰鬥隊
927 4.12炮打
930 工總司再保張春橋
932 江青解救張春橋
939 秋後算賬
943 小結

第二十四章

從大聯合到上山下鄉 ——紅衛兵運動的終結

- 945 中央要求學生回學校軍訓
947 外地紅衛兵撤離上海
949 毛澤東稱讚市六女中大聯合
953 市中學紅代會成立
956 中串會：上海紅衛兵運動的異端
964 《紅衛戰報》被三次接管
970 三派紅衛兵三台戲
976 大學紅衛兵組織的大聯合
981 大學紅代會成立
986 上山下鄉結束紅衛兵運動
990 小結

第二十五章

從工總司到總工會 ——工人造反派組織的體制化

- 993 1967年初的上海職工造反派組織狀況
995 貴陽經驗和歸口聯合
999 「倒旗」聯合的困惑
1003 整頓區、縣、局聯絡站
1009 「脫鉤」和「歸口」
1014 工總司成立半周年紀念大會
1022 毛澤東提出以工人造反組織改造工會
1029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
1032 工總司總部組室設置
1035 「兩塊牌子一套班子」
1038 《工人造反報》停刊
1041 工總司改名工代會
1043 工代會改名上海市總工會
1048 小結

第二十六章

從幹校到「戰高溫」 ——科層的「革命化」

- 1053 從「公社」到市革會的建制
1059 三軍座談會事件
1063 上海解放幹部的模式
1069 市革會人員構成
1072 小班子和大班子
1077 五·七幹校、戰高溫和四個面向
1081 陳丕顯、曹荻秋專案
1085 被「三結合」的新幹部們
1088 市革會與軍隊的關係
1096 小結

第二十七章

從專題寫作組到市委寫作組 ——秘書化的知識分子

- 1099 專題寫作組與大批判寫作組
- 1101 郭仁傑自殺
- 1106 王承龍與「11.10事件」
- 1108 炮轟南京路事件
- 1112 《紅旗》上海組稿小組
- 1114 「小鋼炮」陳冀德
- 1118 工人作家蕭木
- 1124 王承龍出局市革會
- 1127 小結

第二十八章

砸爛公檢法 ——群眾專政的實踐

- 1131 公安和司法系統的奪權
- 1135 從文保會到政法指揮部
- 1139 任意抓人的開端
- 1141 造反組織代行公檢法職責引出混亂
- 1144 上海公檢法系統被軍管
- 1147 上體司治安組「打擊流氓阿飛」
- 1151 文攻武衛指揮部颶「紅色颱風」
- 1154 游雪濤的第二情報機構
- 1161 小結

第二十九章

十萬工宣隊員進駐「上層建築」 ——工人階級領導一切

- 1163 128名「工代表」
- 1167 上海最早的工宣隊
- 1171 市革會派出十萬工宣隊員
- 1174 工宣隊與市革會部門合署辦公

- 1176 從師院開始的高校大搜查
 1180 「三工」的矛盾
 1182 工宣隊的困境
 1188 小結

第三十章

清隊、一打三反和清5.16 ——回歸自上而下

- 1191 從文藝界開始的清隊
 1199 胡守庸小集團案與一打三反運動
 1206 清查「5.16分子」
 1208 三場運動的嚴重後果
 1212 造反派被整肅
 1216 小結

第三十一章

市總工會 ——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特殊領地

- 1219 市總工會的碰頭會和兼任制度
 1224 「工會領導權要掌握在造反派手裏」
 1228 「在鬥爭中培養和使用新幹部」
 1232 「工會要抓大事」
 1234 會費、會籍和工會財產
 1237 恢復工會傳統活動
 1241 工人理論隊伍
 1247 小結

第三十二章

市委寫作組 ——張、姚在上海的輿論總管(上)

- 1251 市委寫作組的成立
 1255 因事設組的構架
 1258 張春橋、姚文元的忠實追隨者

- 1260 奉命寫作是寫作組的基本任務
- 1263 編寫大事記，匯編資料集
- 1266 為毛澤東的文革提供依據
- 1274 標注「大字本」
- 1276 市委常委的政治學習輔導員
- 1278 群眾歌詠大會以及知青函授教育

第三十三章

市委寫作組

——張、姚的上海輿論總管(下)

- 1283 寫作組編輯出版的書籍
- 1290 寫作組的刊物
- 1291 《摘譯》與《教育實踐》
- 1293 《自然辯證法》
- 1296 《學習與批判》
- 1301 《朝霞》及其叢刊
- 1307 小結

第三十四章

批林批孔

——身份轉換的焦慮

- 1311 文革始終遭抵制
- 1316 市總工會帶頭批判「兩個否定」
- 1320 徐景賢解釋一月革命遭批判
- 1324 造反派「重振軍威」
- 1333 上海「批林批孔」運動急剎車
- 1337 小結

第三十五章

新幹部

——轉換了身份的造反派們(上)

- 1339 新幹部進入各級領導機構
- 1341 工人造反派領袖王洪文

- 1347 毛澤東關注王洪文
- 1350 奉調北京學習
- 1353 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 1355 受命王維國專案
- 1357 毛澤東拋棄王洪文
- 1364 新幹部們：王秀珍
- 1372 新幹部們：金祖敏
- 1376 新幹部們：黃金海
- 1381 新幹部們：葉昌明
- 1385 新幹部們：陳阿大
- 1395 新幹部們：戴立清

第三十六章

新幹部

——轉換了身份的造反派們(下)

- 1403 擋不住的誘惑
- 1409 186個老頭頭調查
- 1415 重新被起用的謝鵬飛
- 1421 幾上幾下的潘國平
- 1424 其他老造反的文革經歷
- 1428 小結

第三十七章

朝霞事件

——話語平台的紛爭

- 1433 市總工會與寫作組互相看不起
- 1435 朝霞事件
- 1441 張春橋和王洪文出面干預
- 1448 張春橋要陳冀德寫信
- 1452 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接見陳冀德
- 1454 市總工會辦刊物受阻
- 1462 小結

第三十八章

另類思潮

——來自邊緣的思索

- 1465 「共向東」呼喚共產黨員的執政意識
- 1470 「東方論壇」反對否定一切的批判
- 1474 《一切為了九大》以「階級關係變動論」解讀文革
- 1482 桑偉川挑戰「丁學雷」對文藝評論的話語壟斷
- 1486 許紹吉的《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質疑唯階級論
- 1491 王申酉全面否定文革，批判毛澤東
- 1497 小結

第三十九章

上海市民兵指揮部

——工人武裝的嘗試

- 1501 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的建立
- 1507 從文攻武衛指揮部到民兵指揮部
- 1514 改造民兵之一：「參加社會階級鬥爭」
- 1526 改造民兵之二：「三位一體」
- 1530 改造民兵之三：「二部合一」
- 1538 警備區與民兵指揮部的關係
- 1542 王洪文的「改造民兵」思想
- 1545 小結

第四十章

毛澤東逝世

——最後的捍衛

- 1549 周恩來逝世，鄧小平再次被打倒
- 1552 毛澤東逝世引發上海對局勢的擔憂
- 1560 馬天水被叫去北京
- 1565 「中央出了修正主義」
- 1568 民兵指揮部、總工會和寫作組分頭行動
- 1574 徐景賢和王秀珍被召去北京
- 1578 總工會和寫作組主張起義

- 1587 工會系統層層吹風
1592 上海慶祝文革結束
1594 尾聲
1596 小結

附 錄

- 一
1599 本書提及的部分幹部文革前夕的任職情況
- 二
1601 本書提及的部分文革人物的情況簡介
- 三
1610 本書中提及的文革中上海全市性群眾組織的情況
1610 學生紅衛兵組織
1619 職工群眾組織
- 四
1633 文革時期上海市革委會、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總工會、
共青團上海市委、上海市婦聯名錄
- 1639 後 記

第二十一章

解散「兵團」

王洪文整合工人造反派

迅速發展的二兵團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一波三折，幾次差點分裂，幸虧張春橋及時化解危機，公社終於成立。但是，各造反派組織之間的矛盾還是越來越尖銳。上海全市性紅衛兵組織中，由於三個最有影響的紅衛兵組織在1.28炮打中失利，矛盾暫時有所緩解，但工人造反派各組織之間的矛盾卻沒有緩解。公社成立後，原來自稱屬於工總司的一、二、三兵團，全都打出獨立旗幟；此外，工三司也蠢蠢欲動，準備脫離工總司。這些「兵團」中，發展最快的是耿金章的二兵團。在三個兵團中，二兵團人數最多，影響最大。

還是1966年安亭事件時，張春橋在蘇州與耿金章等簽訂了第二個「五條」，11月18日，絕大多數人都乘大客車返回上海，駐紮紅都劇院，此時他們的組織名稱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總司令部蘇州大隊」。黃金海和他們同車回來。他是工總司派去勸說蘇州人員回上海的，他建議大家回廠。但耿金章不同意，要大家留下通訊地址和聯絡方式，說是方便以後聯繫。黃金海覺得耿金章是想自己拉組織，於是馬上將自己工廠的同事都拉回國棉三十一廠，並立即向王洪文匯報，說耿金章有拉山頭搞分裂的野心。果然，耿金章他們在紅都劇院門口貼出一大張紙，上面寫着「工總司第一聯絡站，歡迎大家前來掛鉤」。

三天後的11月21日，戴祖祥那批北上去南京的工人，與前往勸說的王洪文、潘國平等一起回到上海。他們的隊伍到江蘇六合時，打出了「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第一路軍」的旗號。回滬後也在紅都劇場安營扎寨，將那面徐美英做的大旗插在劇場門口。幾天後，從蘇州回來的人和南京回來的人合在一起，成立了「聯合兵團」。又過了幾天，耿金章佔領了徐匯區五原路上一幢房子，將那裏作為聯合兵團的辦公處。但一星期後，戴祖祥搬出了五原路，組織南京回來的那批人成立了「工總司北上返滬第一兵團」，即一兵團。於是耿金章乾脆也成立了二兵團。自任負責人，副手孫玉喜；三名常委：陸家賓、方劍華和張虎根。從蘇州回上海後，上海市委曾派幹部勸他們回廠生產，但他們不肯解散，要自立門戶。理由一是工總司總部剛成立不久，很混亂，他們怕併入總部會遭工總司的反對派衝砸；二是工總司總部對他們不重視，去領物品有時領不到，如果解散以後地位就更沒有保障；三是怕解甲歸田，回到單位去生產，會被打成反革命。¹

王洪文等一直擔心二兵團日益坐大，多次向張春橋反映，希望他能出面解決，但張春橋始終不置可否。1967年1月3日，王洪文帶着陳阿大和廖祖康去北京見張春橋和姚文元。王洪文除了告陳丕顯和赤衛隊的狀，就是匯報耿金章的問題。王洪文說，耿金章成立二兵團拉山頭，野心很大，要砸工總司總部，還幾次揚言要抓潘國平。張春橋聽了只說：「我是不大贊成分。這個問題有時不能隨人意志而轉移，能夠不分最好，實在要分，你也沒辦法強迫。」² 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回上海後的1月30日，張春橋與姚文元在興國賓館接見工總司部分負責人，又有人向張春橋告耿金章的狀，說耿金章到處拉隊伍，大力發

1 孫玉喜 1967年4月7日交代，原收藏於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公安分局。

2 以上會話均見於張春橋 1967年1月3日接見工總司王洪文等人時的談話記錄整理稿，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展二兵團勢力，連名字都改為「北上返滬第二兵團」，把前面的「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去掉了。張春橋沒有評論，只說：上海工人內部不要分裂；造反派不要自己內部打來打去。³

黃金海認為二兵團勢力壯大，完全是張春橋縱容的結果；張春橋實際上對耿金章私下支持，目的是為了制約王洪文，這是張春橋的手腕。⁴張春橋確實沒有在公開場合規勸過耿金章。所以耿金章始終認為張春橋是支持自己的。他說，張春橋幾次要他和王洪文團結起來。安亭事件結束後，張春橋臨回北京時，還特地將他和王洪文叫到住處，說：工總司裏就你們兩人是黨員，擔子很重；「你們分分工，王洪文抓重點和工交口，你抓抓面上的工作。」⁵

安亭事件後，耿金章的隊伍迅速發展。北上告狀時，到達蘇州那批人有一千餘名，但從蘇州回上海時，只剩下480人。⁶耿金章回滬後馬上發展人馬，到11月下旬正式打出二兵團旗號時，已經有2000多人。以後來掛鉤者越來越多。耿金章自己說：「至1967年2月，已有號稱80萬，實際60多萬人的一支隊伍。」⁷不過黃金海認為，耿金章說二兵團有60萬人，其實只是號稱，最多不到10萬人，真正積極分子能夠上萬就算不錯了。耿金章自己對二兵團的實力有過介紹：

市區十個市區，閔行、吳淞都有區分部，安亭有個兵團，
昆山總部是我們派三個同志去幫助他們搞的，吳涇、彭浦
都有區分部，市內還有造紙總部、儀錶兵團、物資兵團、

3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年3月21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4 筆者 2008年3月29日對黃金海的訪談。

5 耿金章 1967年3月6日的交待，原件收藏於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公安分局。

6 這個數字應該比較準確，因為是耿金章 1967年3月被王洪文關押後在3月5日審訊時說的，時間離事情很近。

7 1979年3月7日審訊耿金章記錄。

外貿分部、煤炭公司、建築公司這些是較大的。整個二兵團有50多萬靠60萬人。

幾個飯店也是我們的。南京飯店、浦江飯店、上海大廈、衡山賓館、國際飯店、和平飯店、新亞飯店、上海展覽館等都是屬於我們的；工交公司有公交二場、三場是我們的。一場不是的。⁸

二兵團最初是在公交三場發展人員的。當時一個女工因為受到場裏領導的壓制，去耿金章那裏控告。耿金章第二天就帶人去公交三場找領導談判，迫使領導當場做了檢討。二兵團就這樣有了名氣。通過公交三場的介紹，許多工廠和公交車隊前來掛鉤，所以二兵團在公共交通公司頗有勢力。此外，耿金章工作的上海紙漿廠歸市輕工業局領導。市輕工業局屬下的禽蛋公司的造反組織也掛鉤二兵團。禽蛋公司貨物運輸量大，卡車和其他機動車多。於是耿金章手中能調動的卡車多，發生衝突時能迅速拉出隊伍。在康平路事件尤其是昆山事件中，他們就是這樣調動大卡車集結隊伍的。耿金章還和輕工業局的食品公司所屬工廠的造反派掛上關係。食品公司下面生產餅乾、麵包的工廠，都成為二兵團勢力範圍；加之上海主要大飯店的造反派也和二兵團關係不錯，使得二兵團後勤供給不成問題，麵包、餅乾不斷。黃金海有一次去二兵團設在五原路的總部，打開廚房間，只見滿滿一房間麵包餅乾。黃金海向耿金章要了很多麵包，運去去工總司總部，這些壓扁的麵包他們吃了好幾天。⁹ 在那個物質匱乏、食物憑票供應的年代，麵包和餅乾都是普通百姓平時難得吃得到的好東西。耿金章出行也很氣派，二

8 耿金章 1967 年 3 月 5 日審訊筆錄，原件收藏於楊浦公安分局。文中的「公交」，原文為「工交」，疑似筆誤或白字。因為「公交公司」是公共交通運輸公司，耿金章當時的勢力是在公共交通系統。另一個有卡車的公司是「交通運輸公司」簡稱「交運公司」。所以筆者改為「公交」。

9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 年對黃金海的訪談。

兵團有個「尖刀班」，專門保護耿金章；還不知從哪裏弄來一輛兩邊車門外都帶踏腳板的汽車。踏腳板上可以站人，每次乘車外出，車上一邊各站一個保鏢，有時一邊各站兩個，呼嘯而來，呼嘯而去，威風得很。¹⁰

二兵團勢力發展很快，到1967年1月已經自成系統，雖然前面還冠着工總司名字：工總司北上返滬第二兵團，但幾乎已經是一個獨立組織了。耿金章與王洪文表面上還算客氣，沒有翻過臉，有時候還有來往。王洪文也到二兵團總部去過，王洪文知道張春橋對耿金章的態度。而耿金章最初也承認工總司的老大地位。所以他在《緊急通告》上代簽名時，把工總司名字放在第一位，自己的二兵團放在工總司之後。他知道張春橋對王洪文比較稱讚，但心裏並不服氣，常在背後說：王洪文所以拉二兵團，是因為他手裏沒有兵；我們二兵團有實力，幾次硬仗都是我們打的。耿金章有過自立門戶的打算。1966年12月底，在一次二兵團主要負責人會議上，他提出將二兵團從工總司中獨立出來，有人說乾脆改名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委員會」，並馬上去印了幾百個袖章。後來，因為下面有人反對，而且這個名字已經被別的組織用了，只得作罷。¹¹

二兵團、一兵團、工三司和野戰兵團

一兵團負責人是戴祖祥，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安亭事件後，南京回來的那批人第一個打出「兵團」旗子，給自己的組織起名「一兵團」。最初的組織者是張景泰，但許多人還是推戴祖祥為頭。後來一兵團參加過解放日報事件、康平路事件，人員發展到號稱十萬人。儘管一兵團名字前面仍冠着工總司的

10 戴立清 2008 年對筆者的回憶。

11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宣傳組 1967 年 3 月 13 日《傳單匯編》第 6 期：《奮起千鈞棒，砸爛耿金章》。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名號：「工總司北上返滬第一兵團」，但工總司總部不承認它，總部活動從不通知他們。至於三兵團，是安亭事件中步行去安亭那批人中的一部分人拉起來的。人數不多，沒什麼活動能量，幾乎是個空架子。它出名只是靠着二兵團和一兵團，因為它排在這兩個兵團之後。負責人楊光恆、童菊龍。

一兵團與二兵團關係比較好。二兵團的人反對潘國平，認為他是花花公子，只知道到處白相；一兵團的人反對王洪文，認為他沒魄力，遇事不敢負責任，有事也找不到他。確實，工總司成立初期的一段時間，至少到1967年1月初左右，王洪文很少在工總司總部露面，就連工總司總部常委們也不知他的蹤跡。要找王洪文，必須通過他的秘書廖祖康，只有廖祖康才知道王洪文的確切去向。

此外，像一、二、三兵團那樣，名義上掛在工總司名下的還有「鋼鐵兵團」。鋼鐵兵團前身自稱「工總司直屬總隊」，負責人是上海第十五無線電廠工人陳鴻康和上海第一鋼鐵廠工人沈阿友。不過據說工總司總部從來沒有承認過它。鋼鐵兵團參加過解放日報事件和康平路事件，隨着人員擴張，不再滿足於做工總司附庸。據他們自己在一份材料中說，作為一個下屬組織，申請活動經費等都要先由工總司簽字，才能去向市委領取，「幾乎所有的經濟命脈都被卡住了。」¹²這樣的理由一兵團也說過。有一次為了要經費，戴祖祥等甚至將工總司總部的黃金海挾持到一個倉庫，一定要黃代表工總司在一張向市委要經費的申請單上簽字，但黃金海還是以簽字必須經王洪文同意為由而拒絕。經費上受制於工總司，是這些兵團想自立門戶的又一原因。鋼鐵兵團原想在1967年1月2日獨立，後來因為昆山事件推遲。1967年1月7日，鋼鐵兵團改名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簡稱「工三司」），海報貼滿全市。工三司

12 傳單：《關於工三司的調查材料》，塑七東方紅造反兵團、塑七四敢造反兵團、塑七工人革命造反大隊 1967年2月20日。

這個名字是學紅衛兵的紅三司，上海其實並沒有「工二司」。工三司張貼海報，就算正式成立，連成立大會都沒有開。就這樣，工三司從此獨立，不再掛在工總司名下。¹³ 他們號稱有80萬人，其實成員不會比一兵團多，真正的積極分子大概也只要一二百。¹⁴

野戰兵團的成立又是一種情況。據說成立初期，成員不發袖章，只發卡片，自稱他們的成立得到王洪文點頭同意，是「不帶袖章的工總司，是幫工總司講話的」。野戰兵團的負責人是上海標準件材料一廠人事幹部陶國正，與戴立清一個工廠；還有上海絹紡廠工人姜延良。成立目的，據說是因為1966年底至1967年初，上海各派組織林立，造反派組織開聯席會，經常為許多問題爭吵不休達不成共識。工總司雖然是大組織，但也只有一票的表決權。戴立清提出，多成立幾個和工總司觀點相同的組織，在表決時可增加票數，王洪文同意。野戰兵團於是成立。¹⁵ 有人因此指責說王洪文這是給自己留後路。對此，王洪文曾對王腓利說：人家說我拉其他組織，我已經是上海最大組織工總司的司令了，有必要再拉其他組織嗎？¹⁶

野戰兵團是個空架子，下面沒有什麼造反隊，有事時拉上一些工廠的臨時工。所以野戰兵團是掛在工總司名下最沒有實力的兵團，被譏稱為「野雞兵團」。由於野戰兵團是在戴立清支持下成立的，負責人姜延良是臨時工，參加者也多為臨時工，戴立清自己又是臨時工，所以戴立清被指「拉臨時工組織」，大概源出於此。工總司總部的頭頭范佐棟、黃文海、徐美英等，對戴立清拉野戰兵團很有意見，說這是另立山頭。到1967

13 工總司1967年編《工總司傳單集》：《「工三司」不等於鋼鐵兵團》。

14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宣傳組1967年2月28日《傳單匯編》第三期：《工三司總部大方向就是錯了》。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15 戴立清2008年對筆者的回憶。而在黃金海等人對筆者的回憶中，也說「野戰兵團」是戴立清拉起來的。

16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2009年3月21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年初，野戰兵團也發表宣言，稱自己和工總司是「兄弟關係」。

至於那個在解放日報事件後拉起隊伍的「戰到底」，負責人是上海自行車廠工人孫福祥¹⁷，後來還有孔繁胤。孔是有色金屬壓延廠工人，參加過1966年11月6日工總司的籌備會議，屬於元老級造反派。這個組織成立後，常常與工總司唱反調，工總司總部根本不知它在幹什麼。

到1967年1月底，反對派與工總司衝突激化。1月29日南市斜橋武鬥便是一次爆發。武鬥的起因，是耿金章聽說自己的常委方劍華被工總司南市區指揮部抓起來了。耿金章說工總司欺人太甚，像對待赤衛隊那樣對待我們。他與幾個兵團聯合，先是派出五六百人去砸工總司南市區指揮部，結果被反包圍；接着再派出五六千人，野戰兵團調來一批娘子軍——都是拉勞動車的婦女，堵住路口，最後抓住了潘國平、陳阿大，還有包炮，都關在附近肇家浜路上的利群旅館。這場武鬥因1.28炮打暫時中止，放人、撤包圍，人員全部拉到興國路張春橋住處附近「保衛春橋同志」。耿金章被張春橋叫去他在興國賓館的住處，但戴祖祥沒被叫去。¹⁸武鬥結束後，才發現方劍華根本沒被抓。不過，下面的人還是在2月1日凌晨，襲擊了工總司南市區指揮部，抓走負責人袁根林。直到晚上耿金章從張春橋處回來後，下令一定要釋放袁，這場衝突才中止。不過，武鬥雖然平息，反對派組織卻在這次武鬥中聯合起來了。

王洪文嘗試合併未成功

黃金海是工總司內主張取消兵團態度最堅決的，他認為，工總司當初成立時，原來取名「工人造反司令部」，後來又加

17 孫福祥，男，1938年生，文革前是上海自行車廠電鍍車間工人。文革初期造反，是工人造反派組織「戰到底」負責人，1967年因「另立山頭」被關押一年多。文革結束後獲平反。

18 筆者、金光耀和金大陸2010年5月15日對戴祖祥訪談。

上個「總」字，就是為了希望上海只有一個工人造反組織，不要像紅衛兵那樣派系林立。現在那麼多雜牌軍各自為政，一定要及時解決，再不能讓他們坐大。范佐棟和徐美英也都堅決反對兵團，認為兵團掛着工總司牌子，借工總司的威信發展自己勢力，卻又處處與工總司作對，不能姑息。但王洪文一直猶豫。范佐棟他們都說「老王對一、二、三兵團處理手軟」。¹⁹ 1966年12月22日晚上，工總司總部在潘國平工作的上海玻璃機械廠的會議室，又一次開會討論兵團問題，王洪文表示：

下令解散兵團是容易的，但要對革命事業負責。輕易解散，會造成很大的矛盾和衝突。……

我同意馬上解散第一兵團，其他暫時保留。²⁰

會上，黃金海與王洪文發生爭執，黃金海見王洪文不聽自己意見，氣得拂袖而去。回了自己工作的工廠。還是戴立清去勸了好幾次，兩個多星期後的1966年12月下旬，才把他勸回來。

王洪文不是一直對二兵團不斷發展實力不安嗎？為什麼又不同意下令解散兵團？對此，戴立清文革後回憶，王洪文曾對他說過，康平路事件前，赤衛隊人數佔絕對優勢，工總司力量還小，人數也不多，那時取締兵團，豈不是削弱自己的勢力。而且最初幾個兵團都掛在工總司名下，名義上還是承認工總司。所以王洪文最初不贊成對各兵團採取強制手段。²¹ 從王洪文後來的做法看，他原先是希望以合併辦法解決兵團問題。野戰兵團因為原來與戴立清關係比較好，接受了建議，於1967年2月15日宣佈與工總司合併。

19 范佐棟 1967 年 4 月審訊筆錄，原件收藏於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公安分局。

20 轉引自華東紡織工學院學生陳斌文革中的筆記本：1966 年 12 月 22 日，原件收藏於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公安分局。

21 這是戴立清 2009 年 3 月 29 日對筆者說的。

工總司與二兵團的合併卻沒有成功。還是在安亭事件剛結束後的1966年11月21日，工總司總部開會，將耿金章增補為工總司總部常委，²² 加上原來的王洪文、潘國平、范佐棟、葉昌明、陳阿大、蔣周法六個常委，工總司就有了七個常委。所以，早期提起工總司常委，都說是「七常委」。這樣做，顯然是希望將人數眾多的二兵團留在工總司內。王洪文還多次找耿金章談判。1967年1月下旬，王洪文提出撤銷兵團，二兵團搬到工總司總部一起辦公，說：「既然總部決定你們解散，你們不同意，那麼索性就合併吧。」王洪文還提出具體方案：二兵團作為工總司總部的直屬兵團，將來主要擔任全市糾察事宜，讓二兵團常委孫玉喜擔任糾察大隊長，還為耿金章在已經被工總司搬入的原總工會大樓裏留了間辦公室。²³ 在一次工總司總部會議上，潘國平甚至提出，將自己「副司令」位置讓出，讓耿金章當工總司的第二負責人。²⁴

但是二兵團的常委們不領情。他們說工總司是坐享其成，康平路事件、《告上海人民書》和《緊急通告》，全是二兵團的功勞，老耿為了顧全大局才把工總司放在前面。孫玉喜甚至指着王洪文的鼻子質問：「康平路事件時你們在哪裏？」於是，談了幾次都沒結果。耿金章後來說，其實當時他心裏已經基本同意了，他還和孫等幾個手下隨戴立清去了外灘總工會大樓，看了為他準備的那間辦公室。但手下們說：「要搬你耿金章搬去，我們寧願住板草房。」耿金章說自己與他們爭辯了半天，他們不同意，他就沒再堅持，「其實我和王洪文兩人談起來還是很對頭的。」²⁵

22 黃金海筆記本 1966 年 11 月 21 日。

23 二兵團常委孫玉喜 1967 年 4 月 7 日陳述筆錄，原件收藏於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公安分局。

24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25 耿金章 1967 年 3 月 6 日交待，原件收藏於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公安分局。

還有一次，王洪文找各兵團負責人開會討論合併事宜，會開到一半，耿金章接到電話，被告知說工總司下面的區級組織砸了二兵團的閘北區和長寧區分部，談判就此中斷。此外，耿金章等二兵團的頭頭一再說：「我們看不慣工總司的一幫傢伙」，他們點了潘國平、陳阿大、黃金海等人的名字。耿金章後來承認，他生怕與工總司合併後自己的勢力被吃掉。而且，公社成立時，張春橋答應他，以後讓二兵團加入公社，他覺得手中有組織才有參加的實力。²⁶

王洪對耿金章「太軟」，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張春橋的態度。張春橋起初一直不贊成以對付赤衛隊的方式對付二兵團，反對工總司分裂。他曾對王洪文說過：和二兵團不要分裂，分裂只有陳、曹高興。²⁷ 還說：

聽說工總司要分裂，我反對。我不贊成分裂，但也不怕。工人造反總司令部這面旗幟要舉起來，我總希望不要把這面總部的旗幟扔掉。這個組織是在反對市委的反動路線中成長的，這個番號在全國全世界都有威信，我擔心再換一面旗幟就不響了。我還有點私心，因為這個字是我簽的，我支持你們，希望你們也支持我。²⁸

還有潘國平，也堅決主張取締兵團，為此張春橋曾幾次對他談起兵團之事。在一次談話中張春橋說：現在你們的鬥爭目標是上海市委，要把力量放在這個大目標上。如果你們去取締

26 耿金章 1967 年 3 月 6 日交待，原件收藏於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公安分局。

27 這是王洪文對王腓利說的。王腓利告訴筆者的。

28 張春橋 1967 年 1 月 13 日下午在「公革會」邀請部分造反組織參加的座談會上的講話紀要，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四》。

兵團，就會分散自己的力量。²⁹ 此時奪權剛開始，造反派內部的矛盾還沒有被充分引發，大敵當前，張春橋顯然希望造反派能團結起來共同對付上海市委。1967年1月，黃金海曾經要調兩卡車工總司閘北區的造反派，去砸二兵團在五原路上的總部，但王洪文派人對黃金海說張春橋不同意，黃金海只好把人撤了。³⁰

不過，張春橋雖然不贊成用硬壓的辦法強迫對方解散，但也不贊成工人造反組織中派系林立。他曾在一次講話中說：

一、二兵團的劃分是沒有基礎的。因為它既不是生產中組成的，又不是戰鬥中組成的，而是鐵道部給你們搞的。我認為這樣的組織形成不利於戰鬥，我認為按照地區和產業是比較好的。但是，這件事也得民主，總不得強迫你們解散。³¹

《第五號通令》風波

耿金章自認康平路事件有功，而且覺得張春橋支持自己，不把工總司放在眼裏。工總司總部不斷有人向張春橋告耿金章的狀。范佐棟、黃金海、徐美英等人反對兵團最激烈。1967年2月5日左右，張春橋接見工總司總部成員，范佐棟以及黃金海等人又向張春橋反映，說耿金章擁兵自重，反對工總司；說耿金章到處吹噓講春橋同志如何看重他。會議快結束時，張春橋說，我以後再不接見耿金章了。聽張春橋這樣表態，范佐棟等很高興：「我們都非常興奮，開始準備要敲耿金章了。」³²

29 這是潘國平在一次電話中對筆者說的。

30 黃金海 2008 年 4 月 6 日對筆者的回憶。

31 張春橋 1967 年 12 月 23 日接見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及工人代表時的談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2 同上。

范佐棟馬上讓人以工總司總部名義，起草了一份傳單《第五號通令》，內容大意如下：一、二、三兵團，以及工總司的盧灣區總聯絡站，主要負責人一貫不服從總部決定，違反組織發展原則，招兵買馬，跨區發展，並以此為資本對抗總部。所以總部決定從即日起解散這四個組織。至於工三司，因其早已宣佈獨立，所以和工總司沒有任何關係。今後，絕不允許以上五個組織以工總司名義在外招搖撞騙，否則一切後果自己負責。³³ 范佐棟怕王洪文變卦，要總部常委開會討論，還要每個常委在通令的草稿後簽名，才送去文匯報社付印。類似這種逼着王洪文簽名的事，范佐棟有過好多次。他覺得王洪文耳朵軟，主意多變，今天商定或答應的事，明天被人一說又會改變，所以非要王洪文簽名立此存照。³⁴

這份通令本打算刊登在2月10日的《工人造反報》上。但是，還沒等這期《工人造反報》大樣拼版，通令的小樣就被二兵團得到了。耿金章聽秘書念了這份通令後很生氣：「工總司是大國沙文主義，逼我們投降！」第二天下午，在人民廣場開大會時，耿金章碰到王洪文。他拿出通令小樣，質問王洪文是怎麼回事。《第五號通令》小樣被二兵團的人偷走後不久，工總司總部的范佐棟發現五份小樣少了兩份，但不知是誰拿走的，馬上報告王洪文。現在通令小樣出現在耿金章手裏，王洪文回答說：「不知道，恐怕沒有出過這樣的通令吧！」³⁵

耿金章見工總司要出傳單不承認他們二兵團，便馬上佈置在全市貼大標語，開展批判《五號通令》的攻勢。范佐棟知道耿金章拿到小樣後，就主張暫時不出這個通令。建議再起草一份其他內容的五號通令登在《工人造反報》上。於是，2月10

33 傳單《第五號通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1967 年 2 月 8 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北上返滬第二兵團翻印。

34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 年 4 月 25 日對范佐棟的訪談。

35 耿金章 1967 年 3 月 3 日，3 月 6 日。

日，《工人造反報》頭版刊登了《五號通令》，不過內容卻是號召造反派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個偷梁換柱的手法一下把耿金章們弄懵了。³⁶ 2月11日，工總司又發出《關於「第五號通令」的嚴正聲明》，說「除本報本期所發的第五號通令之外，從沒有發過其他的五號通令，其他所謂第五號通令都是非法的。」³⁷ 同日，工總司又出《通告》，宣佈：

原我部所屬上海工人北上返滬第一兵團，第二兵團，第三兵團，因某些領導人鬧分裂，搞宗派，長期與總部相對抗，已不適合組織原則。今後以上三個兵團和本部沒有任何組織關係。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系分裂出去的獨立組織與我部無任何關係。³⁸

當天晚上，二兵團常委們開會商量對策。耿金章說，《第五號通令》他們不出，我們替他們出。耿金章要人寫文章對原《第五號通令》逐條駁斥，將原《第五號通令》附在後面，用傳單形式發了出去。二兵團和工總司雙方開足宣傳機器，展開口水戰。二兵團發傳單指責工總司以勢壓人，聲稱自己「在烈火中誕生」，得到張春橋支持。工總司則在《工人造反報》上發文說張春橋根本沒有支持過二兵團；說二兵團所散發的那張《五號通令》是偽造的，還發文《剖視耿金章再看「北上返滬二兵團」》的傳單，說耿金章是「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是一個「擴張主義者、分裂主義者、山頭主義野心家」。這篇文章又印成傳單散發。

耿金章召開二兵團常委會，有人提出先下手為強，砸了工

36 耿金章 1967 年 3 月 3 日，3 月 6 日。

37 工總司 1967 年編《工總司傳單集》：工總司 1967 年 2 月 11 日《關於「第五號通令」的嚴正聲明》。

38 工總司 1967 年編《工總司傳單集》：工總司 1967 年 2 月 11 日《通告》。

總司，但最後沒有達成一致。2月中旬，耿金章在上海制藥二廠，召開二兵團各區聯絡站和各縱隊負責人共三百人的會議，決定「和王洪文血戰到底」。2月11日，二兵團又和一兵團、三兵團、工三司在永嘉路600號開會商量對策，當場派出孫玉喜等去北京告狀。

2月12日，由一兵團發起，組織反工總司汽車遊行，工三司、戰到底、工革會、紅衛軍等參加。原計劃有350輛卡車參加。遊行前一天，他們打電話問耿金章，耿金章回答說不參加，不出車。耿金章事後說自己是不屑參加：「我不願意與他們靠攏」。³⁹ 二兵團不參加，結果那天出動的車只有一百多輛，聲勢大減。這個遊行對外宣稱是「熱烈歡慶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但遊行的車身上都貼着大標語：「打倒王洪文！」「打倒潘國平！」「打倒黃金海！」車隊在鬧市區遊行，先在外灘上海人民公社大樓門口停留，喊了幾句上海人民公社萬歲、熱烈慶祝公社成立的口號之後，便高呼：打倒流氓無產者作風！打倒山頭主義！王洪文、潘國平、黃金海是上海工人大聯合的分裂主義者！王洪文、潘國平從工總司滾出去！隨後，遊行沿途高呼打倒王洪文等口號，車隊開到旁邊工總司所在的總工會大樓前，又是一陣口號；最後，長長的車隊又開到王洪文工作的國棉十七廠和黃金海工作的國棉三十一廠，找不到王洪文，只得呼了好一陣子口號，才離開。

耿金章打電話找張春橋，但是沒有找到。2月20日晚，耿金章召開二兵團常委擴大會議。二兵團常委方劍華說，工總司控制了所有的宣傳機器，利用公安機關隨便抓人，還切斷我們的經濟來源，停止紙張供應。耿金章最後發言：

工司的通令說「二兵團和工司沒有任何聯繫」，既然如此，那麼工司無權解散我們的二兵團。我們和工司的關係是密切的，

39 耿金章 1967 年 3 月 3 日。

從蘇州回來後，我們就在工總司領導下工作的。……

要注意要用文鬥，不用武鬥。我們要採取主動，不許砸任何組織，他們要砸我們，我們要和他講道理，要採取相互支援。今後不能再跟過去那樣了，但是我們不應該採取砸他們的行動，這樣做我們有道理，有理由，說明我們掌握了鬥爭大方向。這一點，希望我們同志回去把這工作做深，做透，做好。⁴⁰

耿金章記着張春橋的告誡，希望不以採取互砸辦法解決與工總司的矛盾。但是，王洪文此時終於下決心解決兵團問題。他與黃金海等商量，決定對耿金章採取措施。

兵團被各個擊破

2月24日，張春橋從北京回上海，召開第一次上海人民公社委員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這個講話裏，張春橋提到了前幾天一、二、三兵團的遊行，說他們在北京時，有人去國務院接待站告他和王洪文的狀——

我們在北京，突然國務院那個接待站打來電話，上海一、二、三兵團、工三司的代表來告狀，告上海的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告王洪文、潘國平和我。而且說上海有一天有五十萬工人大遊行。你們在上海的，你們知道有哪一天上

40 耿金章的這個講話轉引自工總司1967年編《工總司傳單集》：《如此「黑會」》。不過，耿金章自己在1973年3月13日的交代中，說他在2月19日開了個會，要所屬各單位通知各區分部，調動隊伍，先砸工總司的各區指揮部，再砸工總司總部，「我進一步大造『打倒王洪文』的輿論，並決定要抓王洪文，佈置與王洪文血戰到底，不承認上海人民公社等措施」。筆者認為，這兩個會是同一個會。

海有五十萬工人大遊行？不過是一百多輛汽車嘛。⁴¹

張春橋在講話中表露對兵團的不滿，當晚王洪文便找到黃金海，說：

春橋已同意解散兵團，現在是時候了，先把耿金章抓起來，弄到楊浦公安分局，我已經聯繫好了。工三司問題不大，基層是只承認工總司的。只要設法挑起他們基層內部造反就可以解決了。戰到底情況不透，沒公開亮出來……到時候也只要把負責人解決一下就行了。……

主要是二兵團的問題大一些。這個我想過了，你把耿金章騙到31棉去，說我在那兒等他辯論的事，把他扭送去。接着我叫造反報發幾篇揭他老底的文章，再對二兵團基層發個通告，使他們受壓力，做些工作還是可以的。⁴²

黃金海當即派人找到耿金章。耿金章曾在全市刷大標語，說要與王洪文電視辯論，黃金海就對耿金章說：王洪文在國棉三十一廠等他去辯論。第二天，2月25日，耿金章帶了人如約前往，他不知道和他一起去的兩個二兵團常委已經投向工總司。當他們的汽車剛開進國棉三十一廠，工廠的大門馬上關閉，早已埋伏的人群一擁而上，連推帶架將耿金章等塞上汽車，送進楊浦區公安分局。王洪文親筆給楊浦公安分局人革會的造反派寫了張紙條，要他們收審耿金章和二兵團的另一個常委孫玉喜：

41 張春橋姚文元1967年2月24日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開展三結合奪權鬥爭誓師大會」上的講話。講話中提到的名字原文記錄是「王煥文」、「譚得幹」。筆者認為，這是記錄者沒聽清楚。應該是王洪文和潘國平，或者是黃金海。工三司在原文中是「工商司」。這個張春橋講話是當時的紅衛兵整理的，而耿金章1979年3月13日的交代回憶，張春橋當時說：「現在有人去北京告我們狀，我坐在這兒不是很好呀！這些組織想幹什麼呀！」

42 黃金海1977年6月18日。

楊浦公安分局人革會：

李士貴同志：北上返滬二兵團的隊員為了維護造反派大聯合，回到工總司懷抱，故於今天早上造了負責人的反，二兵團負責人耿金章、孫玉喜系挑動群眾反張春橋同志，反工總司的罪魁禍首。因為種種原因，我建議暫關楊浦公安分局。沒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放出，材料來源，一方面見原來傳單，我們再繼續整理。

工總司 王洪文 67.2.25⁴³

耿金章和孫玉喜被抓，二兵團失去領袖，內部又有人造反，偌大的兵團一下瓦解了。黃金海又按照王洪文的吩咐，到工三司人員最多的上海第七紡織機械廠，找到造反隊負責人秦愛芝，勸說她造工三司的反，掛鉤工總司。當晚，秦帶人砸了工三司總部，聲明只承認工總司，不承認工三司。工總司總部馬上表示「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一下就把工三司搞垮了。工三司負責人陳鴻康見大勢已去，潛逃在外。幾個月後，被工總司的岑麒麟發現，也關進楊浦公安分局。

一兵團負責人戴祖祥只得東躲西藏。戰到底負責人孫福祥告訴他說，廣州有很多人偷越香港，兩人便打算一起南下廣州，尋找逃港機會。孫福祥還特地賣了手錶作路費。⁴⁴但是，他們倆的逃港計劃沒能實現。3月4日，戴祖祥躲到一兵團的一個造反隊員家裏，這人報告了工總司總部。3月15日，戴祖祥去廠裏拿工資，被幾個人架走，送去第一看守所，不過只關了一晚便被放了。孫福祥自知無法逃脫，懷着一線希望給王洪文和潘國平寫了一封信：

43 王洪文 1967 年 2 月 25 日給楊浦公安分局的紙條，原件收藏於上海楊浦區公安公安分局。

44 關於戴祖祥的一些材料(這不是標題，原件沒有標題)，原件收藏於上海楊浦區公安分局，編號 24-14-1682，1967 年 6 月 7 日，以及 1967 年 5 月 8 日。

根據春橋同志的指示，各革命組織按行業歸口，我們堅決響應。我部全體戰士應作如何歸口併入，望協商解決，今派我部王扣興同志前來你處聯繫，望予以接洽。 敬禮 孫福祥⁴⁵

王洪文沒有理睬孫福祥的白旗。他早已通過黃金海，派人打入戰到底內部，得知那天戰到底將召開負責人會議。於是，派丁德發等，將戰到底負責人除孫福祥外一網打盡，訓斥了一頓，勒令他們馬上解散，然後將他們都放了。⁴⁶不久，孫福祥被抓，送進楊浦公安分局，罪名是「企圖越境叛國」。

對各兵團下面的造反隊，王洪文表示歡迎他們參加工總司所屬造反隊。就像當初對待赤衛隊一樣，通過吸收對手，王洪文又一次消解了反對勢力。

王洪文抓耿金章，張春橋表示他不知道。後來他曾經對王秀珍說：「我要是當時知道，一定不同意抓的」。⁴⁷張春橋對抓耿金章不贊成。對王洪文不久後關押工總司另一個常委范佐棟也不贊成。他對王洪文等人說，你們工總司常委之間不要抓來抓去。他還舉了共產黨歷史上張國燾的例子，說張國燾在黨內搞肅反，結果使得共產黨喪失大批骨幹。3月10日，張春橋在與工總司負責人的一次談話中，說起工總司和其他組織的矛盾，講到耿金章：

二兵團的錯誤就是在那裏死抱兵團不放，但是你們在處理這個問題時也不是沒錯誤，只是抓、砸，不大會做思想工作。……

你們對耿金章，內部造反，把他送到楊浦分局，當時我認

45 孫福祥 1967 年給楊浦公安分局的紙條，原件收藏於上海楊浦區公安分局。

46 抓「戰到底」一事，是丁德發經手的，這個過程是他告訴筆者的。

47 王秀珍 1978 年 1 月 23 日。

為這樣做不妥當，可沒人聽，所以你們處理內部和外部都不妥當。如果你們一直這樣做下去，工總司一定要垮台。⁴⁸

耿金章被關了兩個多月。期間張春橋要王洪文放他，但王洪文說：「經過審查，耿金章問題不少，有男女關係，有貪污抄家物資等許多問題。」⁴⁹ 五一勞動節期間，在北京的張春橋又對赴京參加五一觀禮的王秀珍提起耿金章，再一次說「耿金章要放出來」。王秀珍馬上打電話回上海。⁵⁰ 王洪文立即辦理，親筆寫了張紙條：

楊浦公安分局：

根據市革命委員會決定：經我們找耿金章談話情況，我們認為耿金章尚能認識自己的錯誤，有一定悔改表現。我們意見擬以教育釋放回廠。請你們研究決定。

工總司 王洪文 67.5.2⁵¹

5月3日，黃金海拿着王洪文的字條去楊浦公安分局。⁵² 第二天，耿金章被釋放回家，王洪文讓他先在家休息。5月底，王洪連續四次去耿金章所在的工廠，將耿金章從家裏叫去談話，說安排他去工總司總部工作，還說這是張春橋的意見。6月1日，耿金章去工總司總部報到。那天正好張春橋從北京回來，

48 《張春橋 1967 年 3 月 10 日接見工總司委員記錄》，原文為手寫記錄；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49 何秀文 1978 年 6 月 15 日。

50 張春橋接見上海代表團講話，引自葉昌明 1967 年 3 月 30 日——1967 年 5 月 19 日工作筆記：《王秀珍來電》。原件收藏於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51 王洪文 1967 年 5 月 2 日給楊浦公安分局的紙條，原件收藏於上海楊浦區公安分局。

52 耿金章 1979 年 3 月 13 日，不過，耿金章回憶說這段話是王洪文對他說，而黃金海說，那天只有他一人去接耿金章，這段話是他對耿金章說的。

接見工總司負責人。張春橋對耿金章說：

你出來了，你受委屈了！我對你講過多少次，不要拉山頭，你那個山頭越拉越大，最後搞分裂。我講的話你都聽不進。這次把你保護起來，是形勢的需要，否則上海要大亂，不把你關起來，上海的新生政權有被摧毀的危險。你們各搞各的，成了一盤散沙，怎麼能管得住呀！這次允許你出來活動，是我的意見，你準備怎麼活動？⁵³

耿金章回答：「我什麼都不搞了，回工總司後，你叫我幹啥我就幹啥。」張春橋說：「那好，你不拉山頭了，上海就會更太平了，以後就看你們的了。你看，王洪文做事就比你穩。我希望你們要團結起來。」⁵⁴張春橋以後多次提到耿金章。他對耿金章的評價是：

你們不要看不起「耿司令」，「耿司令」的二兵團還是有實力的。安亭事件以後，我單獨找他談過多次，我了解他，他是很有造反精神的人。他能帶隊伍，能指揮打仗。安亭事件以後，工總司是靠二兵團撐市面，沒有二兵團，工總司存在也很危險。耿金章是很不錯的造反派負責人，耿司令還是很聽我的話。⁵⁵

耿金章還是做了好事的，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時，我們找他談話，他總算聽了。如果當時不聽，就以他為頭，幾十個小組的人一下鬧起來，你又有什麼辦法？那還不是一直打內戰，能有這樣的形勢？還不是和外地一樣？這總算是耿金章的一功嘛！⁵⁶

53 耿金章 1979 年 3 月 13 日陳述。

54 同上。

55 王秀珍 1978 年 1 月 23 日。

56 何秀文 1978 年 6 月 15 日。

耿金章當時沒有鬧起來，就是對上海工人運動的貢獻。⁵⁷

張春橋對耿金章始終沒有忘記。張春橋在接見工總司成員時，稱呼耿金章為「耿司令」，有時還特地熱烈握手，顯得特別親熱。1968年夏天，張春橋去上海染化八廠。這個廠原來參加二兵團的人很多，開座談會時，有人向張春橋反映說，耿金章被抓，讓他們覺得臉上無光。張春橋回來後專門強調，耿金章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涉及一大批人，要正確對待原來二兵團的人。1969年和1973年，幾次有人說耿金章的生活和經濟有問題。王洪文說：「沒有張春橋點頭，誰也不能動耿」，「張春橋一直保他，不要搞了，算了」。⁵⁸ 1972年，張春橋提名耿金章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耿金章最初被分配在工總司的工業組，組長是陳阿大。不久，又轉到市革會三辦戴立清手下，負責過工宣隊的培訓；後來又當過上海市輕工業局基建組的副組長。耿金章的生活也得到關照：所住房子原來15平方米，1974年由黃濤和陳阿大批准，搬進50平方米的房子；經濟上也不斷受到補助，每次發給的補助起碼相當於他月工資的三分之一；他妻子原在里弄生產組工作，小集體編制；耿金章寫信給王洪文，要求重新安排妻子的工作。1969年3月，妻子被分進全民所有制的上海輪胎一廠。⁵⁹

張春橋對耿金章評價：

耿金章這個人年紀大了，水平比較低，沒有培養前途，只能到此為止了，不可能再負什麼重大責任了，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影響的人物，只好讓他在實際生活中隨時間

57 這是胡永年回憶的。

58 王秀珍 1978年1月23日。

59 耿金章 1979年3月16日。

的消逝而逐漸消失。這一類人不是耿金章一個。⁶⁰

耿金章被釋放後，不再與王洪文作對。以後他始終很好地配合工總司總部的工作。王洪文也幾次向張春橋反映說：耿金章現在比較老實，沒有什麼活動，安排他做什麼，就老老實實地去完成。⁶¹

其他幾個「兵團」負責人的下場都不好。工三司負責人陳鴻康被關一個多月，一兵團負責人戴祖祥雖然只關一天就被釋放，但後來又被關進楊浦公安分局十個月；戰到底負責人孫福祥被關時間最長，從1967年3月9日關到1968年8月6日才釋放，而且王洪文還在楊浦公安分局負責人宋桂生詢問他如何處理的條子上批寫：「如果問題搞清楚，可狠狠教育一下，然後同本單位造反派聯繫，暫時監督勞動一個時期(這可以不正式宣佈)，今後看孫的行動再說。」⁶²不過，王洪文也沒將事情做絕，他提出要團結大多數，除了戴祖祥，其他人：二兵團的耿金章、卞強明，野戰兵團的姜延良，工三司的沈阿友，等等，都曾經被安排進工總司總部工作，擔任副組長。不過後來姜延良和沈阿友因其他事情，被清除出總部機關。1967年底，上海造反派召開代表大會，二兵團的耿金章和卞強明都被安排為工總司委員。

范佐棟被關

就在兵團們鬧獨立的同時，工總司內部也有不少反對派，有的打算另拉隊伍，有的打算改組工總司總部，清除王洪文。

60 張春橋對王洪文、徐景賢和王秀珍等人的談話，轉引自何秀文1978年6月15日陳述。

61 何秀文1978年6月15日。

62 《關於孫福祥案件重新處理的請示報告》，中共上海自行車廠委員會1977年4月28日。

當時王洪文經常在外，他身兼市革會負責人的工作，所以不常去工總司總部。總部日常工作由潘國平和范佐棟負責。但潘國平也整天在外，不常去總部，總部的事務由范佐棟掌管，是實際上的「第三把手」。

范佐棟原先負責工總司秘書組，《工人造反報》創刊後又負責報紙。1967年1月中旬始負責總部組織組。主管組織組後，他極力主張整頓工總司區級組織。他認為工總司組織體系太亂，有的區既有工總司聯絡站，又有工總司分部，還有工總司指揮部。哪個常委點頭承認，那個常委就把此組織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一個區幾派並存，都說唯自己才是工總司在這個區的正宗，互相攻擊，你砸我衝。總部經常為了解決這些糾紛疲於奔波。范佐棟主張：工總司在各區只能有一個組織；如有兩個以上，必須合併。范佐棟在常委會上提出自己的整頓方案，要工總司所屬各區縣局一級的組織，全部重新登記，由總部審查這些組織負責人的政治情況，確定合併後的負責人選。但是，范的主張遭到反對。一些區、縣、局的造反組織負責人不肯合併，而且不願意范佐棟調查他們。他們向總部告狀，說范佐棟在整他們的黑材料。

范佐棟對王洪文和潘國平老不來總部辦公有意見，認為他們身為總部負責人，就應該坐鎮總部，及時解決問題；還有其他各組負責人，也是猴子屁股坐不定，整天不知人在哪裏，有事找不到，卻又在外面以總部名義亂表態，不知真假，出了糾紛都要總部去擦屁股。范佐棟有取王洪文而代之的想法。他對總部其他人員說，這兩人老不來總部，再這樣下去，要把他們開除出總部。范佐棟還曾對陳阿大表示：「只要你們支持我，我願意撐大旗，出來幹一場。幹得好幹下去，幹不好，回廠勞動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陳阿大事後將范佐棟的話告訴了王洪文。

2月中旬，范佐棟和徐美英等商量後，在一次總部工作人員會議上宣佈：所有工總司常委和負責人都必須回總部機關坐

班，三天內不回來者除名。這個決定以總部全體工作人員名義作出，貼在辦公大樓三樓的走廊上。戴立清和葉昌明認為這個決定明顯針對王洪文和潘國平。他們連夜趕到警備區常德路大院支左辦公室，找到王洪文並向他匯報。王洪文很惱火，說范佐棟這是在搞宮廷政變。第二天，王洪文通知總部各組負責人開整風會議。2月25日整風會議在烏魯木齊北路456號靜安區文化館底樓舉行。以往整風會議都由范佐棟主持，這天還是范主持。會前，王洪文若無其事地給范佐棟遞了支煙。⁶³開會了，王洪文發言。他說范三天前的那個決定，是分裂工總司的宮廷政變。王洪文已經派人在外面包圍了會場。他說完話，一幫人一擁而上，將范佐棟抓起來，送進楊浦公安分局，就關在耿金章隔壁一間。

抓范佐棟的當天晚上，傳來張春橋的意見：工總司常委之間不要抓來抓去。張國燾當初曾經要抓毛主席，後來毛主席得勢後也沒有抓他，還給他安排了個中央委員。范佐棟被關24天後，王洪文讓人去楊浦分局將范佐棟領了出來。⁶⁴范佐棟出來後，王洪文通過黃金海請范到家吃飯。范佐棟問王洪文，你把我關起來審查，現在事情搞清楚沒有？王洪文回答說，事情已經過去了，不要再提了，你回總部來工作吧。⁶⁵1967年5月9日，工總司召開成立半周年紀念大會時，王洪文特地邀請范佐棟出席。王洪文對王腓利說，范佐棟畢竟是工總司的老人馬，考慮還是要發揮他的作用。但是沒過多久，全市支聯站興起，一些支聯站頭頭與范佐棟有聯繫，加上後來又發生「新工總司」事件，王洪文懷疑范佐棟與之有干係。范佐棟回工總司總部工作之事於是擱淺。他就這樣淡出工總司。

63 這個細節是范佐棟對筆者回憶的。

64 以上關於范佐棟的資料全部引自1989年4月20日對范佐棟的訪談；關於張春橋「常委之間不要抓來抓去」的說法，葉昌明對筆者金光耀、金大陸的回憶時也提到。

65 范佐棟對筆者的回憶。

潘國平被審查

潘國平文革初期被人稱為工總司的「潘司令」。這大概是因為工總司成立大會上，他是大會的執行主席；後來安亭事件中，與張春橋的兩次談判，他都是工總司方面代表。

工總司早期，潘國平名聲比較大，甚至許多人只知工總司頭頭是潘國平，不知還有王洪文。潘表達能力強，講起話來，不打草稿可以說上半個小時。他善於和人打交道，喜歡交際，而且也善於展現自己。所以他認識的人多，別人認識他的也多。但是，潘國平的名聲只是在外面，工總司總部的人大多對他有看法。認為他不耐煩做具體事情，黃牛肩胛靠勿牢，猴子屁股坐不定。整天人不知在哪裏，很少能看到他，有事也找不到。好幾次張春橋要找工總司總部的人談話，就是通知不到潘國平，經常到最後一刻才找到他。黃金海在一次工總司整風會議上對潘國平的批評，很形象地刻畫出潘國平的形象：

在復興中路他召開各區會議，結果不掌握會議，會開到一半跑到樓上，睡在床上。還有一次會議開了一半，見到人家區裏開來的兩用車，就開車跑了。小潘在遊行時，幾十萬人的隊伍，可以扔下不管，自己跑了，不知幹什麼去了。⁶⁶

工總司總部的許多人，文革結束多年後，回憶起潘國平，仍說他少不更事，好出風頭，自由散漫，責任心不強；說他很少去工總司總部，在外又經常以總部名義表態，造成許多矛盾；下面基層造反隊也經常向總部告狀，說不知聽誰的好。金祖敏對潘國平和王洪文曾有過比較：

王洪文與潘國平比要謹慎許多。1967年7、8月份，工總司

66 工總司1967年整風會議記錄，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開擴大會議，原來決定潘國平不上主席台，為了爭上主席台，潘與其他委員爭了整整兩個鐘頭。這次會上王洪文不在，我剛去工總司工作。第一次參加工總司的會議。我說潘國平實在不像樣，為了上主席台，兩張戲票的事情，吵兩個鐘頭，工作不研究。潘國平說我，你算老幾？這種事，王洪文少。而潘國平，弄毛主席像章，弄戲票，成天就忙這些事。⁶⁷

王腓利對潘國平的評論是：「潘國平這個人腦子非常好，跟他談話，你會覺得他說話很有邏輯，比王洪文會說話」。王腓利還認為，潘國平不是個喜歡抓實權的人，對權抓得並不緊。他畢竟年紀太年輕，加上沒結婚，花了比較多的時間談戀愛，不大來總部。但他也有虛榮心，喜歡人家叫他「潘司令」，喜歡出頭露面。相比之下，王洪文倒是不喜歡出頭露面。⁶⁸

工總司早期，潘國平在紅衛兵中知名度比王洪文高，到處表工總司出頭露面，講話表態。那時工總司也比較亂，王洪文一度有些灰心，有一段時間他甚至回廠去了。他對人說：「我不搞了，讓他潘國平去搞吧。」不過，王洪文認為潘國平這個人陰謀是不搞的。⁶⁹造反初期，王洪文與潘國平關係不錯，潘國平談戀愛，王洪文認為女方「出身不好」，曾自告奮勇要另外為潘國平介紹女朋友。⁷⁰

潘國平的知名度，主要在紅衛兵。紅衛兵們認為潘國平造反精神足，連張春橋都敢頂；認為王洪文太軟，右傾。但是，12.8炮打後，炮司和紅革會等紅衛兵組織都一蹶不振，潘國平

67 筆者 1989 年 8 月對金祖敏的訪談。

68 引自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69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70 女方父親曾經是國民政府時期的軍醫。葉昌明甚至組織了一次對女方家庭的「抄家」，不是為了抄東西，而是為了威嚇女方不要再和潘國平談戀愛。但雙方最終還是結婚了。

的影響去了大半。潘國平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優勢正在失去。他始終認為，在工人造反派中，自己比王洪文有號召力。他想重拉隊伍反王洪文，對人說：「各個局都有我的人」，「我一喊，他們都聽我的，拉三十萬人沒問題」，但終於也沒拉起來。據潘國平後來說，是張春橋打電話勸他不要這樣做的。張春橋說：「小潘，我希望你不要離我們越來越遠了。」⁷¹所以他沒行動。1968年8月，潘國平讓自己廠裏的一個工人幫忙整理了王洪文的材料，請北京地質學院的紅衛兵轉交給北京「五大紅衛兵領袖」之一王大賓。潘國平希望通過他將材料轉交中央文革小組。但事後沒有回音。

潘國平最被人詬病的是性關係隨便，讓很多人看不慣。當時他尚未成家，以談戀愛為名猥褻、姦污女性，工總司總部多次接到受害女性告狀信。被他猥褻的女性，包括工總司總部辦公大樓的工人，甚至還包括市文攻武衛指揮部關押在工總司辦公大樓的審查對象，潘國平不知怎的搭上，幾次在關押的小房間內苟合。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告到王洪文那裏，廖祖康找潘國平談話，潘國平都承認了。

1968年10月，市革會正式決定潘國平回廠勞動。接着，1968年12月11日，工總司總部正式審查潘國平利用工總司負責人身份玩弄女性問題。整個審查都是葉昌明經手，王洪文沒有過問。⁷² 審查結束後，沒有再讓潘國平回總部；但也沒有對外和對內宣佈讓潘國平回廠勞動的真正原因，只說潘國平年紀輕，需要鍛煉。葉昌明覺得這樣的事情講出去太難聽，家醜不可外揚。潘國平工總司常委的職務還保留着，工總司開全會時仍然通知他，張春橋接見也通知他參加。

除潘國平、范佐棟之外，1967至1968年間，因各種原因淡

71 金秀水等 1975 年 2 月 19《向中央王洪文反映的潘國平的問題》，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72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8 月 29 日對葉昌明的訪談。

出工總司總部者還有好幾位，都是籌備成立工總司的老造反：徐美英、岑麒麟、蔣周法、丁德發，等等。有的因為工作能力不強，有的因為自己長時間不去總部。

雙造司和新工總司

1967年年初，工總司還面臨過幾次內部分裂。一次是1月中旬，工總司秘書組的黃文海⁷³，成立了一個「雙造司」，被認為是要奪總部的權。還有一次是稍後的5月中旬，據說有人組織了一個「新工總司」，還發了宣言。不過這些內部造反後來都沒成功。

雙造司的全稱是「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造反司令部」，名字又長又拗口。因為名字中有兩個「造反司令部」，所以當時被稱為「雙造司」，是黃文海在1967年初拉起來的。黃文海是工總司籌備時期的元老，工總司成立後，曾經是秘書組負責人之一，秘書組的公章最初是他管的。後來據說因為他給一個紅衛兵開空白介紹信，王洪文不讓他再管公章，幾天後改由給戴立清管。黃文海因此和王洪文不開心，對戴立清也有意見。

黃文海對王洪文的另一個意見，認為王洪文縱容兵團發展是為了發展自己的實力。1966年12月21日左右，黃文海拉了工總司所屬普陀區、黃浦區以及手工業局、輕工業局等聯絡站的十幾個人，在復興路近長城電影院附近一個弄堂內裏開會，逼着戴立清交出公章。戴立清不肯，相持不下之際，輕工業局的馬振龍及工總司八一革命委員會(簡稱「八革會」)，成員都是上

73 黃文海，男，1938年生，文革前是上海滬光燈具廠工人。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1967年初發起成立「雙造司」，1969年被回廠勞動。1973年後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手工業管理局工會委員。文革結束後被回廠勞動。

海保密工廠的造反隊)出來解了圍，擁着戴立清離開會場。⁷⁴時值深夜，公交車停運。戴立清等人連夜步行去國棉十七廠，向王洪文匯報。當時，工總司總部設在復興中路的一個弄堂內。王洪文擔心黃文海帶人來砸總部，連夜將放在復興中路辦公處的工總司辦公文件，以及白報紙、油印機等設備和物件，全部搬去國棉十七廠。⁷⁵

逼宮事件之後，黃文海和工總司下面幾個區級組織的頭頭：張婉卿、張振學、曹德宏等，商量另立組織。1967年1月10日和1月14日，他們在永嘉路開了兩次會議，會上推出七名常委。討論組織名稱時，有人建議叫「工總司聯合司令部」，因為參加者都是工總司下面的組織。黃文海嫌這個名稱造反精神不足，他建議叫「工總司造反司令部」，大家都認為好。於是全名就成了「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造反司令部」，黃文海為司令。對為什麼要成立這個組織，黃文海的解釋很讓人費解，

宗旨是為了保護工總司大旗，開門整風(目的是搞戴立清)，堅決解散二兵團。這個組織本來還想叫王洪文當政委的，王洪文能接受我們的意見，就立即開門整風，保王洪文過關。⁷⁶

黃文海去國棉十七廠邀請王洪文當政委，⁷⁷遭到王洪文批評，要他立即解散。但黃文海沒有照辦，還發了成立宣言，說工總司成立以來：

主要負責同志對於階級敵人猖狂地掀起「經濟風」、「三

74 戴立清 2009 年對筆者的回憶。

75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76 黃文海 1968 年 3 月 15 日，原件藏楊浦公安分局。

77 黃文海邀請王洪文當「雙造司」政委之事，是「雙造司」傳單「至全市革命造反派的公開信」中自己說的。

停風」，對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揭發批判，對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子的鬥爭，對於最近發生的「接管」奪權，都是關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發展的重大問題，成天累月不但漠不關心，而且拒絕檢查改正，對兄弟造反派召開的對劉鄧反動路線和華東局魏文伯、韓哲一的批判鬥爭大會亦竟拒絕參加，以至「總司」搬家也是幾人一攤，各自專權，已經為工人造反鬥爭造成了不應有的嚴重傷害。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偉大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出現上述情況，我們是極為痛心的，但是合乎客觀發展規律的，對於我們也是一場嚴峻的考驗，為此我們決定首先聯合起來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造反司令部」，認真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同志，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大旗舉得更高，更加有力，鮮明！⁷⁸

宣言的署名，稱雙造司是由5個區、11個局，再加上2個事業單位的造反組織組成。這個宣言被工總司總部的王腓利拿到，王腓利立即交王洪文。王洪文說，這是分裂行為，必須立即制止。⁷⁹ 工總司的《工人造反報》載文，說雙造司是黃文海拉的分裂主義組織；名字起得這麼拗口，其實意思就是「造工總司反的造反司令部」。黃文海被抓，關了一陣子後，雖被放出，但從此離開工總司總部。

黃文海組織雙造司，范佐棟也知道，因為黃文海在邀請王洪文當政委的同時，也曾經邀請過他。黃文海對范佐棟解釋說，頭頭自己都在外面拉組織，所以他也要拉個組織。范佐棟當場拒絕了。幾天後，在一次工總司總部的會議上，范佐棟匯報了

78 傳單《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造反司令部聲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造反司令部所屬單位五區十一局二事業單位。原文無日期。但對照《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所記載，應該在1967年一月下旬左右。

79 這是王腓利2009年4月6日告訴筆者的。

此事。范佐棟認為，黃文海拉這個組織，不是為了反工總司，只是為了自己發展勢力，不過，「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造反司令部」這個名字起得不好，給人以造「工總司」反的感覺。⁸⁰

工總司內部鬥爭中，最撲朔迷離的是「新工總司」事件。那是1967年5月，工總司半周年大會開過沒幾天，上海街頭出現了一份「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宣言(草案)」，矛頭直接指向工總司負責人。還有署名「新工總司」的大標語，說要重新聚集一、二、三兵團和工三司的成員，在幾天裏拉出隊伍實現反工總司的宮廷政變。⁸¹ 署名新工總司的傳單同時出現在六個地方，工總司的辦公大樓裏也有張貼。傳單指責工總司「唯我獨革」、「唯我天下」，說工總司「破壞大聯合，大團結」，「大搞山頭主義，大搞宗派」，「挑起內戰，公開搞分裂」；傳單的矛頭直指王洪文和潘國平，說他們「凌駕於黨的領導之上」，「老虎屁股摸不得」。⁸² 於是有人懷疑，是否那些被邊緣化了的工總司老造反寫的。有人懷疑是耿金章，有人懷疑是戴祖祥，有人懷疑是范佐棟，凡是下台的都被懷疑到了，這些人只得趕緊發傳單或登報聲明自己與新工總司無關。王洪文讓丁德發去了解范佐棟，范佐棟堅決否認。⁸³

6月3日，張春橋在一個講話中，提到這個組織：「現在還有人又搞出一些新組織，搞了個什麼新工總司。有了一個工總司了，你再搞一個新的幹什麼呀？你以為新的就一定好，舊的就不好啊？那才不見得嘞！中國共產黨就比你這個新工總司老得多，但她是個最革命的黨！」張春橋並明確表示：「我們在

80 范佐棟 1967年2月28日審訊筆錄，原件藏楊浦公安分局。

81 這段話轉引自1967年5月26日文革小報《驅虎豹》，「工總司楊浦區聯絡總站文化革命經驗交流站」《驅虎豹》編輯組編輯。

82 以上內容均轉引自傳單《所謂「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宣言」是一份反革命宣言書，工總司徐匯區聯絡站1967年5月14日。

83 這是丁德發2008年告訴筆者的。

這裏明確地表示我們的態度：我們支持原來中央所批准過的、支持過的工總司，反對這個什麼新工總司！」⁸⁴

張春橋明確表態反對新工總司。一些造反組織馬上趁機打擊對立面。7月底，武漢7.20事件爆發，上海造反派組織紛紛集會，聲討武漢的百萬雄師。閔行工業地區一些小派組織也召開「批百匪大會」。這個大會不久被指為是「新工總司成立大會」。9月1日下午，在閔行工業區的上海汽輪機廠大操場上，工總司機電一局聯絡站與該廠造反隊聯合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砸爛新工總司誓師大會」，176個單位的三萬餘人參加了大會。陳阿大代表工總司到會並講話。會上，兩個顯然是被屈打成招者在台上當場交代自己，揭發別人。接着，閔行地區到處捉拿新工總司成員，許多工廠的生產受到嚴重影響。⁸⁵ 因此案被關者有好幾人，其中有人被關了半年多。

實際上，除了那六張傳單，新工總司始終沒有露過面。但是，受這個神秘組織牽連的人卻很多，所有被認為是成員的組織都被砸。范佐棟當時因不在上海，一時躲過。但後來還是被關在廠裏隔離兩年，罪名是「分裂工總司」。為了洗刷罪名，范佐棟曾多次自己找人調查，但沒有任何線索。范佐棟堅持說，他始終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就連閔行地區這些人他也根本不認識。⁸⁶ 而王洪文則對人表示，他本來想讓范佐棟回工總司總部工作，但新工總司事件既出，他不再安排范回總部了。

84 張春橋 1967年6月3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報告會上的講話，載於《學習文件》，上海報刊發行處 1967年6月發行。

85 筆者的師傅是閔行地區上海電機廠的工人，當時也被抓去打了一頓。

86 這是范佐棟一再對筆者說的。筆者 2009年對丁德發訪談時，丁德發也說，他從來沒參加過什麼「新工總司」籌備會。他們說，現在文革結束了，如果他們曾經這樣反過王洪文，沒必要否認，但他們確實與「新工總司」無關。而且那個「批百匪大會」曾經邀請王洪文參加，但王洪文沒有去。如果是「新工總司成立大會」，他們為什麼還要邀請王洪文參加？丁德發說他後來問過那些在工總司9月1日大會上交代揭發的所謂「新工總司」頭頭，他們都說自己的交代是被毒打後逼出來的，不是事實。

王洪文一統工總司

工總司剛成立時，辦公地點不固定，許多時候都在王洪文工作的國棉十七廠或黃金海工作的國棉三十一廠開會。當時局勢比較亂，總部幾個負責人甚至將公章隨身帶着。最初，總部暫借在巨鹿路691號炮司總部，工總司在外面的房間辦公，裏面是炮司的地方。不久搬到陝西南路25弄8號。幾天後，約在解放日報事件前，又搬到復興中路1350弄5號和6號兩幢連着的房子內。後因黃文海逼公章事件，王洪文怕被砸；加上張春橋曾經講過，「你們怕人家砸，搬到工廠集中的楊浦區去，那裏有工人保護」，⁸⁷ 於是在12月22日這天，⁸⁸ 搬到王洪文所工作的國棉十七廠。但大家覺得，總部設在工廠裏一不方便，二也不太妥當。二天後馬振龍安排，將總部搬去楊浦區杭州路690號的紡織技校。但工總司總部對這個搬遷事先沒有開會商量，結果，只有馬振龍等一部分人員搬去了那裏。幾天後，張春橋對總部負責人說，你們工總司要找個地方辦公，裝上電話，有事好找得到，也方便聯繫；不要夾個包袱到處流浪。張春橋建議兩個地方：一是位於外灘的上海市總工會辦公大樓，二是位於南京路上的市政协協商會議辦公樓。張春橋建議之後，工總司連夜派黃金海去市總工會大樓，但那裏早被形形色色的組織佔領，不肯讓出。陳阿大、徐美英等另一部分人員，將一部分打字機、油印機和紙張等，搬去了市政協禮堂的兩個大房間。這樣，工總司總部實際分兩處辦公。1967年1月初，工總司終於將佔據總工會大樓的人逐步清出，原總工會的機關幹部全部壓縮到四樓和五樓。到1967年1月3日左右，工總司總部搬往總工會大樓，以後再沒有遷移；與此同時，《工人造反報》的編輯部

87 戴立清 1977年12月5日。

88 這個日子是王腓利回憶的。

也應張春橋的建議，從暫借的解放日報社遷往新民晚報社。⁸⁹

還是在安亭事件結束不久，王洪文召集一些參加過工總司籌備會議的人員開會，宣佈以工總司籌建成立大會時的主席團人員為常委：王洪文、潘國平、范佐棟、葉昌明、陳阿大、蔣周法。⁹⁰不久又將耿金章也列為常委。總部後來沒再正式選舉過。這七個人被視作總部常委。但耿金章從未去總部開過會，後來被抓；以後范佐棟也被抓；再後來潘國平因生活問題被回廠勞動，常委位置儘管沒有被取消，但在總部失去地位；蔣周法因在總部不起實際作用，後來又因一起匿名信事件被審查。到1967年底，原來被視為常委者，實際只剩王洪文、陳阿大和葉昌明。葉昌明康平路事件前後不常在總部，因為他與范佐棟、黃文海合不來，所以更多時間在自己工作的合成纖維研究所，直到1967年2月才回到工總司總部。

1967年1月下旬，王洪文和范佐棟、陳阿大、王腓利等人商量，想擴大常委班子，擬了個11人常委名單。除了上述人員，還有黃金海、戴立清、王腓利、王明龍等人。但因事先沒和潘國平商量，被潘國平和炮司否決。於是1967年夏天，6月10日，總部又定了16委員，除了5個常委，王秀珍、金祖敏、黃金海、戴立清、王明龍、王成龍、張寶林、王腓利、岑麒麟等都在其中。⁹¹不過，這個委員會作用不大，因為總部討論決策，基本都是召集各組負責人參加，很少專門召開委員開會。以至於若干年後，許多人甚至不記得工總司總部曾經在1967年6月設立過委員會。

89 具體搬遷日子沒人回憶得起來，王腓利回憶是《告上海人民書》發表之前，到1967年1月6日的「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召開時，工總司總部已經在總工會大樓了。

90 徐美英常委，雖然在工總司成立階段曾經被作為女代表被增補進大會主席團，但安亭事件結束後，沒有成為常委。筆者訪談徐美英時，她也認為自己不是常委，因總部開會很少通知她。而且據葉昌明、戴立清、黃金海、王腓利等人對筆者的多次回憶，徐美英從來不是常委。

91 兩外兩人，有說是繆南生和倪叔英。

工總司總部剛搬進總工會大樓後，王洪文就着手調共產黨員充實總部。他要組織組負責人丁德法，去大廠調一些共產黨員中的造反派，充實工總司總部。丁德法印發了表格，發去一些大廠。王明龍就是他工作的工廠，根據總部發去的表格推薦上來的。⁹² 1967年1月底或2月初，王洪文親自將共產黨員王秀珍調來總部。⁹³ 王秀珍到總部後，王洪文又一次要求選調共產黨員，王洪文要王秀珍去一些大廠或重點廠，物色和抽調政治表現一貫可靠的造反派，尤其是黨員造反派。這是王秀珍到總部後做的第一件事。王秀珍特別注意被選調者的個人品質，而且文革前不能有被認為的劣迹。1967年初夏，王秀珍兩次去工廠，挑選了近十個造反派，這批人中一半是共產黨員。金祖敏就是這時被選上的，是王秀珍和王明龍6月初，一起去上海電機廠借調的。王洪文重視黨員，而且還重視黨員的「產業工人」身份，他幾次調人，都要求去大廠物色。因為那是被認為的產業工人基地。徐景賢文革後，對王洪文重視挑選共產黨員，評價說：

王洪文的班底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以王秀珍、金祖敏、唐文蘭等人為代表的黨員工人造反派，還有一類是以陳阿大、黃金海、戴立清等人為代表的非黨工人「老造反」。雖然兩類人都受到王洪文的重用，但比較起來王洪文更重用和信任第一類人。這是因為王洪文自己在文革前就是一名共產黨員。⁹⁴

1967年3月底，為貫徹貴陽大聯合經驗。總部多次開會決定，對總部機關進行精簡，決定了留用人員名單。工總司總部

92 這是丁德法告訴筆者的。

93 王秀珍由王洪文在「公社」成立前調入工總司總部，是王秀珍對筆者回憶的。

94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人員近三百人只留十幾個人：王洪文、潘國平、王秀珍、葉昌明、陳阿大、戴立清、黃金海、馬振龍、王明龍、王腓利、蔣周法等；再加上《工人造反報》編輯部人員。這次精簡，減少了90%的人員；辦公機構只剩辦公室。以後再往總部調人，必須先經總部審查；王洪文從自己原來工作的國棉十七廠，調來原在廠黨委組織科工作的黨員王春曉等人，負責審查調入人員。⁹⁵ 經過這一系列重新整合，到1968年底，工總司總部形成實際領導核心：王洪文、王秀珍、葉昌明、黃金海、陳阿大、戴立清、張寶林、王明龍、金祖敏。而作為「副司令」的潘國平，因為自身的問題，於1968年12月被第一次審查，審查結束後回廠勞動，很長一段時間不再回總部。

戴立清和黃金海都是王洪文的忠實助手，他們對王洪文很佩服甚至崇拜⁹⁶，在工總司每一次面臨分裂時，都堅決站在王洪文一邊。陳阿大在幾次反王洪文風波時，也都堅決維護王洪文。王秀珍調到工總司總部工作後，即進入領導核心，成為王洪文最忠實的助手，後來在工總司中地位僅次於王洪文。王明龍在二兵團等與工總司分庭抗禮時，始終堅決站在王洪文一邊，還分別去做黃文海、耿金章以及三兵團負責人的工作，受到王洪文信任。此外，還有馬振龍，也是老造反，工總司最初幾大事件他都參加過。他原來是工總司閘北區聯絡站人員。1966年12月底黃文海逼戴立清交出公章的會上，馬振龍站出來堅決反對，受到戴立清信任。不久他被調進工總司總部；總部精簡時，馬振龍是被留者之一。⁹⁷

1967初至1968年，是工總司總部整頓機構，逐步走向正軌的時期。工總司總部的骨幹隊伍，正是這一時期形成，王洪文的威信也得到進一步提高。

95 葉昌明 1977 年 4 月 5 日，以及工總司《簡報》1968 年 9 月 19 日。

96 「崇拜」這個詞，是文革後戴立清、葉昌明和黃金海等，都對筆者說過的。

97 馬振龍 1979 年 10 月 18 日。

小結

自從1966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後，反對文革勢力在上海不復以組織形式存在。上海造反派組織面對的，不再是保守派勢力，而是造反派自己內部的反對勢力。這是上海文革的又一特點。

但是，如果說這些被取締了的兵團，之前都是些與工總司觀點不同的勢力，似乎又有點勉強。因為縱觀這些組織的活動軌跡，實在找不出它們與工總司有什麼觀點上的不同：既沒有為「保」誰或「打倒」誰而產生的分歧，也沒有對某個政策的理解執行產生的爭論。他們提出的唯一理由是「看不慣」有些人例如潘國平等。不過耿金章後來還是承認，他覺得手中有組織才有參加文革新機構的實力。而其他幾個兵團，從工總司獨立出去，其實也都是怕自己的勢力被工總司「吃掉」。這種佔山為王以提高談判資本的心態，是許多組織頭頭內心的真正寫照。也顯示許多時候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並不一定是意見或政策分歧，並沒有那麼多他們自己標榜的正義性。更多的是名份和名次之爭。

清除內部反對力量，是王洪文繼擊敗赤衛隊之後，整合造反派力量的又一件大事。在解決了來自外部的保守派反對勢力之後，王洪文面臨解決造反派內部的糾紛與爭鬥。工總司本身比較強大，唯一能與之較量的只有二兵團。王洪文在這些組織的對抗能量還沒有發展到足以挑戰和抗衡工總司之前，便不失時機地抓了這些組織的負責人，使這些組織群龍無首，只能解散，大大降低了造反派組織之間的內耗成本。在這方面張春橋起着非常重要的調節和平衡作用。一方面他不贊成王洪文以對待赤衛隊的方式強行解散二兵團，另一方面他也不贊成耿金章另樹旗幟。當王洪文將耿金章送進看守所後，張春橋一次又一次地催促王洪文釋放耿金章；耿金章被放出來後，張春橋又要王洪文安排耿金章的工作，打一打再拉一拉，耿金章從此不再

作對。就這樣，王洪文重新整合了工人造反派的力量，他在工人造反派中的權威形成，也正是在這個時期。

如果說，擊垮赤衛隊，使造反派一統了上海的文革；那麼，擊垮二兵團這些造反派內部的山頭，則使工總司一統了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而清除潘國平和范佐棟等人，更使王洪文一統了工總司。從此，工總司在上海造反派組織中的地位，沒有其他組織可以抗衡；王洪文在上海職工造反派組織中的領袖地位，沒有其他人可以抗衡。

不過，這樣以剝奪對立派組織存在權利，來穩定自己組織存在基礎的做法，完全背離了工總司當初引用憲法要求市委承認自己的初衷。從康平路事件開始，他們也如市委當初不准他們成立組織一樣，只要給對方加一個負面政治名份，就可以剝奪對方組織的存在權利，甚至可以隨意關押對方的人員；幾個月後，更是將調動十數萬人以暴力打垮對手「聯司」。工總司就這樣成為上海文革中群眾組織的龍頭老大，也這樣走向自己最初要求結社自由的反面。

第二十二章

砸聯司 鞏固文革新秩序

1967年上海的武鬥

從一月奪權以後，全國文革趨勢已經不再是「走資派」與造反派的較量，而是群眾組織之間的爭鬥，而且由於支左軍隊的介入，許多矛盾升級，1967年7月的武漢事件達到高潮。許多地方的兩派矛盾發展成為武鬥。但這沒有引起毛澤東的擔憂。1967年7月18日晚，毛澤東在與周恩來、王力、謝富治、陳再道、鍾漢華等人談話時說：「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¹毛澤東這話是針對一些部隊支持保守派，明裏暗裏給保守派發武器的現狀。毛澤東7月18日的講話精神，幾天後在武漢7.20事件後的7月22日，江青在接見河南造反派代表團時以「文攻武衛」口號提出，並馬上被各造反派組織競相印成傳單廣為散發。那些本已勢不兩立的群眾組織，對立情緒進一步升級，許多省市都發生大規模武鬥，一些武鬥更是使用各種武器，傷亡極大。

這一時期，上海也發生許多起武鬥事件。據當時市革會辦公室和市革會政法指揮部等編寫的材料記載，僅1967年4月下半個月，全市就有95個單位發生武鬥156起。5月1日至8日，八天之內全市武鬥140多起。而8月的上半個月，全市共發生武鬥150

1 轉引自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68年分卷(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卜偉華著。

起，受傷者4500餘人，其中死亡12人，重傷173人。² 又據當時工總司葉昌明的工作筆記：1967年4月間，87個單位發生武鬥；1967年5月間，174個單位發生武鬥，894人受傷；1967年6月1日至6日，36個單位發生武鬥，542人受傷。³

1967年上海較有規模及影響的武鬥有：

1月27日至28日，工總司南市區聯絡站與二兵團的南市區斜橋武鬥；

5月8日和5月12日，上海出版系統革命造反司令部(版司)和工總司上海出版系統總聯絡站(版聯)武鬥，死亡4人；

5月30日，上海體育戰線革命造反司令部(上體司)與工總司直屬工人體育系統聯絡總站(工體司)武鬥，傷54人，重傷11人；

7月9日，工總司交通運輸局聯絡站與上體司武鬥；

7月26日至27日，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公革會)與上海市消防民警革命造反委員會(消革會)、上海市消防義務兵革命造反委員會(義革會)武鬥；

8月4日，工總司調集幾萬人員，在上海柴油機廠發動砸聯司武鬥；

6月3日及8月6日，101廠武鬥，死亡2人；重傷29人；

8月8日，工總司電業總部與電業戰士在南車站路糾集1800餘人武鬥；死亡3人，160餘人受傷

8月19日，國棉十四廠兩派武鬥，打死1人；

8月26日，鐵路南站兩派武鬥，死亡3人，重傷100人；

此外還有國棉九廠、國棉二十二廠、紡織專件廠、華豐鋼鐵廠、冶金局機修總廠，等等，都發生過武鬥。其中，國棉二十二廠的武鬥發生在1969年，死亡1人。

2 這些數字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304 頁。

3 這些數字引自葉昌明文革中的工作筆記 1967 年年 5 月 31 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而在大學和中學，也是武鬥不斷。全市大專院校有一半以上發生過武鬥；中學武鬥也不少，如楊浦區共有五十九所中學，其中三分之一的學校發生過武鬥。⁴

大學武鬥比較出名的有：

1967年2月3日和7月14至15日，鐵道學院紅三司和紅革會兩派連續武鬥，共受傷近70人，其中重傷6人；

1967年4月至8月，上海師範學院「井岡山」與紅革會兩派武鬥；

1967年8月6日，華東化工學院「紅旗」與「新化工」兩派武鬥，死1人；

1967年12月22日至23日，上海科技大學紅三司與紅革會兩派武鬥；

1968年1月10日，華東紡織工學院「紅師籌」與「東方紅」武鬥；

1968年5月15日，第二軍醫大學「紅旗」與「紅縱」武鬥，「紅旗」一方動用手槍和半自動步槍。這是上海地區少有的使用武器的武鬥，死亡3人，重傷10人。⁵另一起動用武器的武鬥也發生在軍隊院校，即位於大八寺的原南京軍區衛校，也死了人。除了這兩起武鬥事件外，上海地區其他使用武器的武鬥，就只有1967年8月25日的鐵路南站武鬥。但只是一方的領頭人周國庭拔出手槍，朝天開了三槍以壯聲勢，沒有向人開槍。

發生武鬥的中學、技術學校和中等專科學校有：上海中學、第五十四中學、青浦中學、寶山行知中學、江灣中學、行知中學、航空工業學校、輕工業學校，等等；以及上體司與紅衛兵汽車學校的武鬥。

在上海郊縣，青浦、南匯、松江都曾發生大規模武鬥。最

4 同上，《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304頁。

5 《二軍大「紅旗」槍殺紅縱戰士的「5.15」流血慘案真相》，載於1968年5月19日《紅色造反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編輯。

嚴重的是青浦縣，自1967年1月開始，延續至1968年7月，持續時間長達一年半，死亡23人，受傷近千人，其中重傷近百人。⁶

上柴廠兩大派群眾組織

上海文革中最大規模武鬥，首推1967年8月4日的砸聯司武鬥。這是以工總司為首的群眾組織，取締上海柴油機廠群眾組織「革命造反聯司司令部」（簡稱「聯司」）的行動。

上海柴油機廠地處上海東北角工業區軍工路，是當時全國最大的柴油機生產工廠，也是上海市第一機電工業局的直屬大廠，有六千多名職工。1967春天，它成為上海關注的焦點。原因是這家工廠兩大派群眾組織的矛盾尖銳，不但鬧得全市皆知，而且由一個工廠兩派群眾組織的分歧，引發出全市性的兩大派分歧。

上柴廠兩派形成，最初源於對原上柴廠廠長朱文斌的評價，而此時，他已經調往貴州柴油機廠任廠長。朱文斌早年參加共產黨，但後來曾兩次與共產黨組織失去聯繫。在脫黨期間，經宋子文駐滬辦公室的機要譯員介紹，朱曾在國民政府軍用倉庫工作過。文革前夕的四清時，上柴廠的上級管理部門第八機械工業部（八機部），以及中共上海市委曾專門對此調查，結論認為朱沒有叛變行為。但文革開始後，廠黨委書記中有人說朱是被包庇下來的，應該批判。

朱文斌管生產，平時住在廠裏，成天泡在車間。他平易近人，以身作則，不但工人，幹部也多對他好感。所以，許多人不同意批判朱，認為朱的歷史四清時已有結論，沒有新材料不應推翻。上柴廠就這樣形成「反朱」和「保朱」兩派，這是上柴廠兩大派別最初的形成起因。反朱派大多是政治工作系統的幹部，即「政工幹部」，多為車間黨支部書記或委員；保朱派

6 同上，《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322頁。

大多是生產和行政系統的幹部，即「業務幹部」。

上柴廠生產軍需船用柴油機，和海軍關係密切。1964年上柴廠為擴大規模，向八機部要幹部，部裏給他們分去六七十人，大多是從駐東北的海軍部隊轉業的營、團級幹部，原來在軍隊裏都是幹部編制。這麼多轉業軍人一起進廠，沒有專業技能；卻又因是幹部編制，不能將他們分配去當工人。廠裏只能按他們原來的部隊級別，相應地將他們安排為幹部編制的政工幹部，大多擔任車間黨支部書記或副書記，也有在廠部當政工幹部的；廠裏甚至還將一些原來的車間黨支部書記們調去管生產，騰出政工幹部的位置安排這些轉業軍人。就這樣，上柴廠政治工作系統的政工幹部，從廠黨委到車間黨支部，相當一部分是外來的轉業軍人幹部；而生產和行政系統的業務幹部，則以上海地方幹部為多。

這些轉業軍人，大多資格老，許多人1949年前就參加共產黨的軍隊了，進上柴廠後，因自己在軍隊的級別擔任相應級別的車間幹部，幹部編制；而不是由廠級幹部培養提拔。加上進廠時間不長文革就開始，所以他們與廠級幹部的關係，就不會像一般從工人一步一步地被提拔上去的幹部那樣，多了層個人感情色彩，貼領導大字報也就少了感情和私人關係的干擾。而且又由於當初他們大都是從同一部隊集體轉業而來，有着共同經歷，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工廠，更容易抱團。多年的軍旅生活也使他們工作作風簡單，加上不懂業務，工廠和車間的業務幹部有問題不願找他們，因為找他們，他們既聽不懂也沒有能力處理。⁷

上柴廠黨政工作系統的政工幹部，與行政和生產系統的幹

7 兩派的資料引自文革傳單《關於上柴聯司的調查報告》，華東化工學院紅旗總部駐上柴聯絡站1967年6月中旬印；以及《從聯司的產生發展和所作所為看它到底是什麼貨色——上柴階級鬥爭調查報告之二》，載於文革小報《東方紅》1967年7月3日第44號，同濟大學革命委員會、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編輯。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部，就這樣在工作和感情上都溝通不暢。這兩個群體的隱形矛盾，到文革時終於顯現。

1949前國民政府時期，因為工廠的宋子文背景，部分職工曾經集體加入國民黨。這些職工在1949年後長期不被信任，反復受審查。文革前夕四清運動政治分層，一些職工被「清政治」。四清由政工系統的幹部們負責，那些部隊轉業幹部們工作作風簡單，在審查一些「有歷史問題」職工時，曾打人逼供。對那些沒有歷史問題的青年工人，那些部隊轉業幹部也有得罪，尤其因「KO反革命小集團」事件結怨。那是在1966年5月28日，上柴廠最後一批四清工作隊員剛離廠，在圖書館、閱覽室、理髮室同樓男廁所裏，發現有四張用藍墨水寫的傳單，內容說「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個成員，我不能不為目前的半個月工資只能買一雙鞋子，而感到羞恥！」還說「生活水平只能同落後的非洲相並列，國弱民窮！」高呼「女人萬歲！美國生活方式萬歲！」「立即開放舞會！」⁸ 這些傳單署名「KO直屬」，撰寫者都是青年工人。他們下班住在工廠集體宿舍，業餘生活十分枯燥。一些人聚在一起，喜歡談論女人和時尚；有幾個人還標新立異地在自己褲子的皮帶頭刻上英文字母「KO」。上柴廠黨委馬上立案，不久破案，說揪出了一個「KO反革命小集團」，核心成員4人，外圍3人。處理的結果：「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首惡分子1名，處分3人，免於處分3人」。接着再抓「KO集團發展對象」，被補充交待出來的「發展對象」有30名。⁹ 那些有「歷史問題」的老工人，以及「KO集團」的「發展對象」，不但在四清中受到批判或審查；並在緊接着而來的文革「批判牛鬼蛇神」高潮中繼續被批，不少挨打或被抄家。

8 1967年7月3日文革小報《東方紅》第44號載：《從聯司的產生發展和所作所為看它到底是什麼貨色——上柴階級鬥爭調查報告之二》。

9 「KO集團」人數及處理結果的資料引自文革小報《聯司戰報》1967年7月8日第3期所載：《政治陷害者的卑劣伎倆》，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聯司戰報編輯部》主辦，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文革開始後，廠部的轉業軍人幹部跟着廠黨委的反朱者貼朱文斌大字報，車間的轉業軍人幹部也大多跟着成為反朱派。就這樣，政工系統的相當一部分幹部成了反朱派。受他們影響，許多黨、團員和復員軍人也加入反朱派。此外，文革前夕，上柴廠還從無錫和東北佳木斯等地的中等專科學校，招來150多個畢業生，而且是整個班級地招來。他們也因此容易抱團並相互影響。負責招工的廠黨委幹部，自己是從東北調來上海的，也是反朱派。前已提及，那些轉業軍人也大都是從東北海軍轉業而來。受地域人際關係的影響，那些東北地區分來上海的工人，絕大多數也都成了反朱派。

如果再深入了解，可以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反朱派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是到上海不久，還沒有完全融入上海地域文化的新上海人，他們中許多人不習慣上海人的處事待人習俗；而保朱派則大多由長期生活在上海的工人和幹部組成，他們也不習慣這批外地人的作風。這種地域文化差別造成的人際關係親疏，也是文革中派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6年9月間，上海市委曾派馬天水前往上柴廠處理朱文斌問題。反朱派要求將朱文斌調回上海批鬥，馬天水等市委領導先是不同意，說朱的歷史在1956年的「審幹」和文革前的「四清」都已有結論；反朱派堅決要求朱回上海，市委實在頂不住，只好讓朱回來，但還是想方設法保護朱。反朱派於是認為上海市委包庇朱文斌，又加入了反對上海市委的行列。而且，因為分管農業機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機械工業部是上柴廠的業務主管上級，八機部以及中共中央華東局都曾經不同意將朱文斌調回上海批鬥，上柴的問題又被提高到「根子是四級黨委」，即機電一局黨委、上海市委、華東局、八機部，「階級關係特別複雜」。¹⁰

10 文革傳單《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大事記編輯組(包括上柴東方紅戰鬥總部、工總司上柴大隊、上柴紅色革命指揮部、

反朱派於1966年9月15日成立了「紅色革命指揮部」；10月31日，又與廠內相同觀點的其他組織聯合成立了「東方紅總部」（簡稱「東方紅」），成員一千人左右。另一派於1966年10月4日，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群眾串聯總站」；1967年1月10日，又與廠內觀點相同的其他組織聯合，成立「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簡稱「聯司」），成員三千人左右，負責人是廠裏的技術員楊仲池。1962年清華大學機械系畢業後被分配進上柴廠，任鑄工車間技術組長。

就這樣，以政工系統幹部為核心的東方紅，形成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車間級黨支部幹部居多的特點。因為反對上海市委，所以東方紅參加過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總司的一支重要力量。這樣的成員構成在當時應歸入老保行列，然而，東方紅偏偏是造反派組織。聯司的成員則以青年工人和普通群眾居多；還有那些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挨整對象和邊緣分子，也是聯司的成員或同情者。這些人在當時被稱為「十七年受壓制者」，通常都是造反派。然而，因為聯司中的一個組織曾經參加過赤衛隊，在安亭事件中還為赤衛隊印發過《非常大的安亭事件》等傳單。聯司於是被東方紅指為是「老保」。¹¹

黨團員多的組織持造反派觀點，底層群眾和被視為落後分子多的組織被指責為老保，完全顛覆1966年下半年文革剛開始時，上海造反派組織「落後分子多」和保守派組織「黨團員多」的特點。這是上柴廠兩大派陣營構成不同於同一時期上海其他廠的獨特之處。

上柴東方紅曙光兵團)1967年4月編印。

11 聯司參加過赤衛隊的資料引自1967年7月3日文革小報《從聯司的產生發展和所作所為看它到底是什麼貨色——上柴階級鬥爭調查報告之二》。

聯司和東方紅爭奪造反名份

1966年12月2日，工總司成立不久，東方紅參加工總司，正式宣佈成立工總司上柴大隊。¹² 而由幾個組織聯合成立的聯司，其中一個組織當初曾加入過赤衛隊，在1966年12月3日成立過「上柴工人赤衛隊」，還印發了《上海柴油機廠工人赤衛隊宣言》。¹³ 雖然這個組織在康平路事件前即已退出赤衛隊，但聯司還是被東方紅抓住把柄，說他們是老保組織。其實，1966年12月底，聯司也曾經加入過工總司。聯司與潘國平關係比較好，掛在與潘國平關係較密切的工總司楊浦區分部下，是其直屬大隊。但工總司楊浦區分部的負責人李貴發不久因軋進雙造司事件被抓，楊浦區分部實力大減。3月，工總司總部清理整頓各區既有「聯絡站」又有「區分部」的組織重疊狀況，楊浦區分部與楊浦區聯絡站準備合併，而此時潘國平也已失勢，楊浦區分部一派沒有了勢力。聯司與工總司楊浦區分部從此不再聯繫，由此也與工總司總部斷了關係。

東方紅指責聯司受市委操縱，因為聯司中有廠黨委書記的女兒陳憲珍，¹⁴ 她是技術員，與市委一些領導幹部熟悉。東方紅還指責聯司「搜羅了廠內大批地、富、反、壞、右分子，四清中的雙不清分子，反革命KO集團分子」，「而在四清中未徹底清算的KO反革命分子，現在也有80%在柴革會(即聯司一筆者注)中鬼混」，還指責說聯司參加過工三司。¹⁵

12 這個日子引自1967年4月文革傳單《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

13 同上。

14 陳憲珍，女，文革前是上柴廠大馬力車間的黨總支幹事。其父陳濤文革前曾任上柴廠黨委書記，文革前夕調離。陳憲珍因為自己身份敏感，所以在1966年底左右就已經退出聯司。但她後來還是被關押8年。

15 文革小報《東方紅》1967年3月22日第20號《「上柴革命委員會」是牛鬼蛇神反革命勾結的產物——上柴階級鬥爭調查報告之一》，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上海市東方紅總部、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編輯，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聯司則指責東方紅文革前「都是黨委的紅人」，而且：

- 一、幹部多：基層幹部多、總支委員多(名義上已退出)、廠黨委委員多(佔全部委員三分之二)，
- 二、黨員多、團員多，
- 三、五好工人多，四、積極分子多。¹⁶

據當時的統計，「東方紅戰鬥總部」由以下三部分人員組成：

- 一、黨團員(他們佔全部人數70-80%)，
- 二、工組長以上幹部，
- 三、幹部的家屬。¹⁷

聯司還說東方紅批判原廠長朱文斌是投機，因為朱已經調往外地，批判他沒有風險；還說東方紅批判市委是「炮口向上，大放空炮」；¹⁸ 是「只造市裏的反，不造家裏的反，就是造了反，也只是虛張聲勢，裝裝門面」。¹⁹ 還說東方紅中的許多人都是中層幹部，自己就是當權派，本身就應該是被革命和造反的對象。

關於聯司和東方紅兩派組織各自的成員狀況，聯司曾經做

16 傳單《究竟誰是真造反派！誰是假造反派！》，上海防修大學「從頭越」戰鬥隊1967年1月27日。載於傳單集《上柴「紅衛兵指揮部東方紅戰鬥總部」的保皇鐵證》，上海柴油機廠「揭老保」戰鬥組編，1967年2月。

17 傳單《上柴「東方紅戰鬥總部」是造反派嗎？原上柴「東方紅戰鬥總部」負責人之一——崔惠我談上柴「東方紅戰鬥總部」的內幕》，記錄整理者上海柴油機廠技術發展室，《大事記》訪談者尹柏森1967年1月29日，載於傳單集《上柴「紅衛兵指揮部東方紅戰鬥總部」的保皇鐵證》。

18 這句話是《群眾的眼睛全然沒有錯》中的，載於文革小報《東風》1967年2月16日第2期，「東風」編輯部編，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19 文革傳單《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保皇有罪，罪該萬死》，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聯司)1966年12月23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過統計。以下是當時的統計(表格中的「紅衛兵指揮部」即東方紅的前身之一，「串聯站」即聯司)：

表1 全廠各級領導幹部參與各群眾組織統計表²⁰

分類	合計		屬紅衛兵 指揮部一方		屬串聯站 一方		不參與 或不表態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領導幹部合計	260		182	70	59	23	19	7
1.廠黨委委員	17		13	76	2	12	2	12
2.十七級以上幹部(除黨委委員)	17		16	94	1	6	-	-
3.正副科級幹部(除上二項幹部)	94		50	53	32	34	12	13
4.工長級幹部(不包括組長)	44		31	71	10	22	3	7
5.政治工作幹部(除上四項幹部)	88		72	82	14	15	2	3

表2 領導幹部基本群眾百分比的對照

合計			屬紅衛兵指揮部			屬串聯站			不參與或不表態		
群眾	幹部	%	群眾	幹部	%	群眾	幹部	%	群眾	幹部	%
6000	260	4.3	1200	182	15.2	4000	59	1.5	800	19	2.4

聯司又公佈自己總部常委等人的情況：

19人中黨員7人、團員2人；家庭出身除1人系小業主外其餘均為工人和貧下中農」。所以「聯司是以基本群眾為主體的革命組織，聯司負責人是這個革命造反派組織中的積極分子，聯司及負責人是真正的革命左派。²¹

20 以下兩個表格引自1967年2月的文革傳單《上柴「紅衛兵指揮部、東方紅戰鬥總部」的保皇鐵證》，上海柴油機廠「揭老保」戰鬥組編。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21 文革小報《聯司戰報》1967年7月8日第3期所載：《政治陷害者的卑劣伎倆》，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派聯合司令部《聯司戰報編輯部》主辦。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而在另一份傳單中，聯司更是以《比一比上海柴油機廠到底誰是保皇派》為題目，列出自己組織和東方紅的黨團員、幹部等差別。說自己組織「基本群眾多，中層幹部及黨團員佔20%」，而且「被打成右派者1200名」。²² 聯司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造反派，一則他們反的是自己的直接領導，壓力大，風險也大；二則他們是「十七年受壓制者」，而這些長期受壓制者才是文革的真正主力。他們對東方紅把他們稱為「保朱派」不以為然，說「我們保這些當權派幹什麼，我們頭上又沒有烏紗帽！」²³

1966年12月22日，聯司以黨委將黑材料轉移至東方紅派的「紅衛兵指揮部」為由，砸了「紅衛兵指揮部」以及「東方紅戰鬥總部」，兩派衝突開始尖銳化。1967年1月10日，聯司接管上柴廠的黨政權力，不久又成立上海柴油機廠革命委員會。但是，東方紅不承認這個奪權，發表聲明說要「徹底粉碎這個反革命奪權」。上柴廠的兩派衝突於是又升級，今天這派有人被抓，明天那派有人被打，不過最初還只是一家大廠內的兩派摩擦。

在兩派的形成過程中，駐廠軍代表起着很大作用。1967年初，上柴廠最初的「支左」軍人，不是另外派來的，而是原來駐廠海軍的軍代表。上柴廠因為生產海軍用柴油機，所以文革前廠裏就駐有海軍的軍代表。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公佈後，駐上柴廠的軍代表成為支左軍人。他們文革前就與東方紅的政工幹部工作接觸較多，而政工幹部中又以海軍轉業軍人居多，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海軍部隊經歷。

22 文革傳單《比一比上海柴油機廠到底誰是保皇派？》，山東曲阜師範學院南征北戰兵團，上海柴油機廠「反動路線受害者」再版，1967年2月8日。

23 這句話是文革小報《東風》1967年2月16日第2期《群眾的眼睛全然沒有錯》中的。

他們成為支左代表後傾向東方紅。他們對東方紅的鮮明支持，引起聯司的強烈不滿。

上柴廠獨特的文革兩大派陣線曾引起許多人的興趣，還是在1966年11月，就有首都三司紅衛兵進駐上柴廠進行調查，交大反到底、同濟東方紅、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等，也都曾經組織調查組去上柴廠。以後，各路紅衛兵調查團進駐上柴廠不斷。紅衛兵大多支持東方紅，²⁴ 因為東方紅反對上海市委，而且成員中黨團員多。一個當年參加過調查團的紅衛兵文革後回憶：

我們進去調查後覺得，全國只有上柴廠文革的階級關係是清楚的，因為這個廠和別的廠不一樣，黨團員是造反派。我們認為造反派是文革的主力軍，就應該是黨團員組成。²⁵

紅衛兵的觀點直接影響工總司尤其王洪文。王洪文對紅衛兵的意見一向比較重視。²⁶ 這使聯司與東方紅的矛盾，又升級為與工總司的矛盾。

去上柴廠的學生紅衛兵大多支持東方紅，令聯司很惱火，聯司多次與學生發生衝突。1967年2月6日至20日，聯司與去上柴廠調查的紅衛兵以及上柴廠東方紅連續摩擦，雙方都有人被打。學生向社會呼籲要求支援，上柴廠的兩派鬥爭開始引起社會關注。

24 例如陳國康在「人民網」上的《陳老頭子的集藏博客》中，《上柴聯司資料1》中指出：「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支持「東方紅」，不過清華「井岡山」的幾個戰鬥隊支持聯司。

25 筆者1989年對宋永毅的訪談，宋1967年初曾參加過一個進駐上柴廠的紅衛兵調查團。

26 這是許多當年工總司的核心人物如葉昌明、戴立清、黃金海等都對筆者說過的。

上柴廠第一次大規模武鬥

1967年1月21日，上柴廠兩派發生衝突，東方紅稱自己一派先後有二百人被打，向文保會控告聯司。第二天，文保會派專人調查組去上柴廠調查，並與兩派代表協商，共同制定了不許私設公堂、不許扣人、打人等四項協定。但兩派的衝突並沒有停止。1月24日清晨5時半，聯司抓走東方紅的人。東方紅向工總司楊浦區聯絡站告急，聞訊趕去調停的二百名警察一進廠也遭包圍、扣留和毆打，帶去的步話機和手銬被搶走，還被撕下警察帽徽和領章。²⁷ 工總司派去調查的楊浦區聯絡站的沈克祥被關押在地下室，他從下水道爬出，趕回聯絡站匯報。楊浦區聯絡站的人非常氣憤，隨即調去幾千人，包圍上柴廠，要聯司「交出打人兇手」。聯司關緊工廠大門，一面召開全廠大會，控訴進廠抓人的警察；一面爬上房頂反擊。事發當晚，張春橋將王洪文叫去興國路招待所，要王洪文出面調停，讓兩派坐下來談判。王洪文和陳阿大開着摩托車趕去上柴廠。王洪文到了現場，說服了包圍者撤人。這場衝突造成上柴廠全廠停產一天，一些廠房設施被破壞。

對聯司扣押警察，工總司總部有人主張乾脆對聯司採取行動，敲掉「聯司」。王洪文告訴他們，張春橋說「再讓他們表演表演」，不同意。²⁸ 武鬥後來雖然暫時平息。但是上柴廠兩派從此結怨。聯司不服文保會對上柴廠武鬥的處理，說自己方面人被綁架；東方紅方面者說自己一派多人被打。東方紅說聯司扣押和毆打進廠執法的文保會警察；聯司則強調說這些警察都是公革會的，公革會是群眾組織，他們抓的是公革會人員。第二天，1500多名聯司成員及家屬，分乘二十幾輛大卡車，身掛「我是反革命前來自首」的牌子，往文保會所在的福州路遊

27 1967年4月文革傳單《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

28 這是黃金海2009年3月5日對筆者的回憶。

行示威和抗議，要求釋放被抓人員。²⁹ 這是聯司將廠內衝突推向社會的開端。這以後，上柴廠大小武鬥不斷，而且越來越頻繁。衝突中，聯司始終佔着上風。他們人數比東方紅多得多，廠裏的廣播台也為他們控制。每有摩擦，東方紅都不是對手，幾次被打得全體人員撤出工廠。對此，王洪文和葉昌明等多次說：「東方紅頭頭很無能，被聯司一打就跑出來了」，「東方紅太軟，被聯司一打就往外跑，把廠裏的陣地都讓給了聯司。東方紅的活動能力太差，不如聯司會造輿論」。³⁰

市革會和工總司總部最初想將聯司和東方紅兩派捏在一起，促進兩派聯合。葉昌明等人認為，兩派都是造反派，應該促進它們聯合。但聯合的努力沒成功。徐景賢說，「聯司是茅屎坑的石頭，又硬又臭」。

市革會支持東方紅

市革會多次向張春橋匯報上柴廠情況。1967年3月，張春橋建議派解放軍的宣傳隊進駐上柴廠。但派什麼部隊去，頗費心思：

張春橋決定在上柴廠派「三軍」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在上海是獨一無二的。張春橋講過，上柴廠海軍轉業幹部多，再派海軍不太好，武裝部是支持東方紅的，派警備區聯司不信任，不好工作，最後決定派陸海空三軍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上柴廠的問題在市革會碰頭會議上議論過很多次。³¹

29 1967年4月文革傳單《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

30 前一句話轉引自王秀珍1979年9月1日供詞，後一句話引自葉昌明1978年4月19日供詞，均刊於《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辦公室1981年2月編。

31 王承龍1978年8月28日。

原來的軍代表是海軍的，支持東方紅，再派海軍去會被聯司認為有傾向性；陸軍去也不容易展開工作，因為派陸軍是由上海警備區派出的，上柴廠所在的楊浦區武裝部支持東方紅，而區武裝部屬上海警備區領導，所以也不妥；於是乾脆陸、海、空三軍都派。這樣一支由三軍組成的宣傳隊，在上海絕無僅有。但是實際上，這支三軍宣傳隊成員，還是以原來駐廠的海軍軍代表為主，負責人就是原來的海軍駐廠軍代表。3月23日，軍宣隊進駐上柴廠。聯司和東方紅都希望軍宣隊表態支持自己。三軍宣傳隊進廠後，便組織成立上柴廠「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聯司認為其中沒有自己一方代表，指責說這是個親王洪文的「王家鋪子」。經過一個月調查，軍宣隊在4月1日宣佈「聯司大方向有問題，不對頭，錯了」。4月24日下午召開全廠廣播大會，明確表態支持東方紅，再一次宣佈「聯司大方向錯了，而且一錯再錯」。³² 這個表態是經市革會討論的，

三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上柴廠一段時間之後，對上柴廠運動表態是經過市革會碰頭討論過的。並且為了支持三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工總司表態支持，還安排上海的群眾組織聯合發表聲明支持。³³

聯司原本希望三軍宣傳隊為自己說話，不想三軍宣傳隊還是向着東方紅。一氣之下在4月22日砸了「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4月26日又組織赴京控告團，由聯司負責人楊仲池帶隊。³⁴

三軍宣傳隊還於4月6日，讓市革會政法指揮部抓走柏廣山

32 《駐滬三軍支左辦公室堅決支持上柴東方紅》，載於1967年5月1日《工人造反報》。

33 王承龍1978年8月28日。

34 楊仲池，文革中是上柴廠技術員，1967年8月被關押，判刑三年緩期執行三年。

和盧伯興兩人。市革會政法指揮部讓公革會執行抓人。理由是如此二人「目無法紀、私設公堂、非法拘留、一貫打人」。這個本來意在抑制聯司的行動，卻促使了聯司的進一步行動。5月20日，回上海的楊仲池帶隊，聯司二千餘人往福州路上的市公安局門前靜坐示威，要求釋放柏、盧；還成立接待站，爭取社會同情。聯司通過靜坐示威，將活動場所從上柴廠搬到了市中心：福州路的一頭是上海市公安局，另一頭是人民廣場。上柴廠內兩派矛盾於是又在人民廣場展開。

張春橋最初對上柴廠的兩派沒有表態，至少到5月初前，張春橋對聯司還沒有下定論。他在5月5日的一個講話中說：

上海有個大廠子，六千多工人，分兩派，一派四千，一派兩千，兩派都互相說對方是保皇派。又都說自己是左派，經常武鬥。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就分成兩派，到現在已經十個月了，還是兩派，還是武鬥，一打就可以去幾千人，從外面廠子調一些人，一方是兩萬人，一方是一萬人地幹。經常打。為了想識別一下究竟哪一個是左派，北京和外地在上海的三十幾個左派學生組織和上海的所有左派組織，工人的，學生的，機關的，都介入了。結果，別的問題左派組織都很一致，就在這個問題上一分為二，兩派弄得誰也做不了結論。我們收到關於這一工廠的材料就一大堆，我們現在也判斷不清楚。³⁵

支聯站：聯司走向社會

聯司從一個工廠內的兩派矛盾成為全市性的矛盾，從全向

35 張春橋 1967 年 5 月 5 日在濟南軍區機關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東和陳卜昌的加入始。³⁶全向東真名湯福坤，那年32歲，任上海交通大學140教研室助教。2月29日，他前往上柴廠與聯司負責人楊仲池見面。他和楊仲池都是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畢業生，兩人交談非常投合，全向東表示支持聯司。全向東擅長演講，講話很會抓住聽眾的情緒。他的加盟，理清了聯司的思路，放大了聯司的聲音，為聯司爭取到許多同情者。

陳卜昌³⁷是上海汽車配件廠的鉗工，時年24歲，老造反，參加過安亭事件，當時擔任廠革委會主任、虹口區革委會(籌)委員。³⁸他的加盟，將聯司與東方紅的矛盾，從上柴廠擴展到整個上海。那時，正是聯司在市公安局門前抗議示威整整十五天。6月4日，上海市革會出通告譴責聯司：「一些負責人，組織一批職工離開生產崗位，妨礙公安機關正常行使職權，這種做法是錯誤的，他們應該立即返回本廠的生產崗位上去。」而在前一天，張春橋在講話中說，「那些坐在公安局門口等着的人啊！你們要當心一點啊！你們要的人究竟是要對了還是要錯了？你們要動動腦筋哪！不要以為都是抓錯了，也不要以為都放對了。」³⁹

張春橋最後一句話「也不要以為都放對了」，是針對陳卜昌的。陳卜昌曾領着人在虹口區公安分局門口靜坐示威，要求釋放兩個因搶黑材料被關的工人。5月20日，這兩人被放，陳卜昌讓那兩個被釋放者戴着大紅花在虹口主要街道遊行以示

36 全向東，真名湯福坤，受教育程度大學，文革中是上海交通大學教師，1967年8月因支持「支聯站」被關押，被判處兩年徒刑緩期兩年執行，文革後平反，2007年在美國逝世。

37 陳卜昌，男，1944年生，文革前是上海汽車配件廠鉗工，文革中曾任虹口區區革會副主任，廠革會主任，文革中因為支持支聯站，被判刑20年，文革後平反。

38 《支聯站內幕種種——支聯站壞頭頭陳卜昌供詞摘錄》，載於1967年8月9日《工人造反報》。

39 張春橋的這段話引自1967年6月上海市報刊發行處發行的《學習文件》：《張春橋同志市革會報告會上的講話》。張講話的日子是6月4日。

慶祝。聯司在市公安局門口靜坐示威，就是學陳卜昌的。⁴⁰ 陳卜昌被張春橋不點名批評，心裏不服。6月4日那天的半夜，他去市公安局門口，只見楊仲池和全向東等人正在開會，討論要不要撤人。楊仲池覺得張春橋表態了，不撤會被動；全向東則主張堅決不撤。有人把陳卜昌介紹給楊仲池和全向東，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陳卜昌問他們：你們覺得自己錯了沒有？錯了，就縮回去；沒錯，就堅持下去。但是，這裏公安局門口不待了，把人統統拉到人民廣場去。我明天就動員我們廠的工人來支持你們。旁邊的一位人民無線電廠的工程師補充說，這叫「告天狀」，古時候，告官狀不得公正，就向老天告狀呼籲。我們去人民廣場呼籲，讓全上海的老百姓來評評理。這個工程師還說，我明天就讓廠裏來裝廣播喇叭。⁴¹

陳卜昌提出將全市的反對派勢力聯合起來。據當時一份對立派的小報記載，說他們提出：

要把2月5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建立以後受過「壓制」的組織，把至今還被「排斥」在市革會門外的那些行會組織、把凡是與「名牌」組織對立的組織作為發展、爭取對象等組織綱領。他們還提出了原×、×、×兵團(即一、二、三兵團——筆者注)作為反工總司的力量，××會(即紅革會——筆者注)作為反徐景賢、紅三司的力量，紅衛軍、戰到底……等組織統統都要。支聯站的頭頭陳卜昌提出了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聯司革命行動聯絡站」。於是，這個臭名昭著的支聯站就出籠了。⁴²

40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 年 4 月 4 日對陳卜昌的訪談，載於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編《史林》雜誌，2013 年口述歷史專輯。

41 同上。

42 文革小報《反逆流戰報》1967 年 9 月 6 日第 6 期中所載：《聯司和支聯站繫繫罪惡內幕目擊記》，紅衛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上海財貿系統革命造反委員會、華東化工學院紅衛兵師(籌)紅旗總部聯合主辦，上海復旦大學歷

就這樣，聯司與東方紅的衝突，從廠裏轉移到市公安局門口，又從市公安局門口轉移到人民廣場。聯司和東方紅的矛盾，因為市革會和工總司對東方紅的支持，擴展為聯司與市革會與工總司的矛盾。6月14日下午4時，支持聯司者在人民廣場召開聲援聯司的「誓師大會」。四輛大卡車搭起的臨時主席台上，陳卜昌首先發言，接着聯司的支持者們相繼上台發言。這些支持者成立了許多支持聯司的聯絡站，簡稱「支聯站」。雖然6月14日這天的大會，並不是支聯站成立大會，但大會後，全市許多支持聯司觀點的群眾組織，紛紛去人民廣場發言表態支持聯司，或者為聯司提供物質支援。全向東和陳卜昌串聯了一百多個支聯站，開展對聯司的聲援活動。到7月，全市支聯站發展到627個。⁴³ 支聯站的興起，使聯司力量大增。上柴廠兩派矛盾就這樣發展到社會上，在全市形成兩大派。所有對市革會、工總司或對張春橋、王洪文不滿的組織和個人，終於找到一個代言人。大大小小的支聯站紛紛成立。

支聯站是反對派力量的重新整合。那些被打擊的保守派，那些當初被沒擠進上海人民公社的造反派組織，那些被解散的一、二、三兵團等組織的成員，那些因炮打被批判的紅革會、炮司等組織的紅衛兵，那些挨整受排擠的造反派，那些對文化大革命感到失望的人們，還有許多對張春橋、徐景賢、王洪文不滿的人們，都集合到支聯站的麾下，結成了一個新的反對派陣營。

聯司被砸後，《工人造反報》上曾刊登一篇文章：《我為什麼要支聯，反工總司？》作者戴祖大是原一兵團負責人戴祖祥的弟弟。他曾隨戴祖祥參加過工總司的籌備會議和早期活動，後來又隨戴祖祥反對過工總司。雖然這篇交代是他關押期間被迫寫的，但反映出參加支聯站者的心態。戴祖大說，他哥

史系資料室收藏。

43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317 頁。

哥戴祖祥因為成立反工總司的「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在3月被關押，所以他很恨工總司，

把我哥哥戴祖祥的拘留歸罪於他們，因此，我就一直想乘機報復。就在這種思想根源下，我就和上柴聯司站在一起，開始了反工總司、市革會領導的罪惡的階級報復活動，於七月底正式組織了「壓勿煞戰鬥隊」，並散發了好幾種夥同聯司反王洪文等革命領導人的傳單……。⁴⁴

又如解放日報社的支聯站，後來被揭發說就是當初《解放日報》被奪權時，拒絕印刷「第一張新生的《解放日報》」的老保們。⁴⁵而在一些反對聯司的小報上，更不時可以看到文章揭露哪個支聯者過去曾經是老保、赤衛隊，或什麼兵團的分子。

聯司開來二十多輛大卡車，在福州路口人民廣場排開，又從廠裏運來了柴油發電機自行發電，每輛卡車都裝上大喇叭，只要車上的人一演講，全人民廣場都能聽見；晚上柴油發電機將廣場照得通亮。過了幾天，江南造船廠的支聯站又拉來了厚木板和三角鐵，以幾輛卡車為底座，焊接搭起了演講台。每天晚上人民廣場不是支聯會，就是辯論會，或者是聲討會。講演、辯論、撒傳單，看熱鬧的，起哄的，人民廣場成了反對派的天下，廣場集會每天到下半夜才散。聯司甚至拉起了個「小支聯站」，主要成員有三四十個，都是些七八歲至十幾歲的孩子，給他們些零花錢或給他們買些吃的東西，讓他們為聯司看管汽車，散發傳單，起哄會場，放掉對立派汽車輪胎的氣。人民廣場附近南京路上，上海最大百貨公司中百一店，自六樓樓

44 《工人造反報》1967年8月7日。

45 《支聯站必須解散》，載於文革中的小報《反到底通訊》1966年8月5日第46期，上海交大反到底紅衛兵、兵團總部第一動態組主辦，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頂向下，刷出每個字足有二平方米的兩條巨幅標語：「聯司必勝！東方紅必敗！」文化大革命開展一年，群眾中的種種不滿在這裏找到了宣洩之地。所有的不滿情緒在這裏受到鼓勵，並傳染放大擴散。

「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

聯司原來反對的只是自己廠裏的對立面組織東方紅；自從全向東等加入，支聯站興起，聯司的對立面擴展到市革會、工總司以及張春橋；還有公革會、財革會等，因為這些組織都堅決反對聯司，而且市革會政法指揮部抓聯司的警察都是由公革會成員；還有駐滬海軍，因為聯司認為駐上柴廠的三軍宣傳隊中，海軍最堅決支持東方紅。下面是全向東的部分言論，可以看其矛頭指向：

春橋同志文元同志對這些山大王估計太高，依靠太多，也是山大王為所欲為的促成條件之一。……

安亭事件應該有個恰如其份的歷史估價。既有初期推動運動好的一面，更有它帶來破壞性的一面。⁴⁶

上海市在1967年以來，群雄突起，山頭繁多，新式的行會借着造反的名義紛紛建立，山頭較大或較早的拉到虎皮者，就拉着虎皮作大旗去嚇唬別人，發號施令，為所欲為，成為新形式的工作組和新型反動路線的執行者，「四大」得不到發揚，運動冷冷清清。……

(安亭事件)絕不應該成為某些野心家用之不絕，取之不盡政治資本的聚寶盆，應該把這些山頭解散，把種種新型工作組解散。……

46 《全向東的黑話必須嚴加批判》，原載於交大反到底兵團的傳單，《工人造反報》1967年7月15日轉載，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我認為這些靠所謂安亭事件起家的人，不能代表上海市廣大革命造反派，從數月來運動的實踐，他們中的很大部分是一些投機家和野心家，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必須重新改組，把這些人清洗出去。⁴⁷

在三月份王洪文集團掌握工總司大權以來，就在其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把上海的工人運動引入歧途。……

上海工總司的司令部和基層組織、基層群眾是分離的，在廣大革命工人的心裏並不承認這個爛掉了的司令部是自己的領導。⁴⁸

全向東反對工總司獨霸造反派天下。他稱工總司為「某些大牌組織」。他尤其對王洪文不以為然，認為王洪文不是真正的工人，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他討論誰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奪權後究竟應該由誰來掌權。他認為市革會必須改組，把王洪文、徐景賢等清除出去。

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⁴⁹

全國六個革命委員會五個已經垮台了，上海你們等着看好了，歷史會證明，要把革委會中的著名人物一個個揪出來。……

上海某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篡奪了政權！……

徐景賢、王洪文就是新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⁵⁰

47 文革傳單《把聯司狗頭軍師全向東的黑話示眾》，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解放日報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支部生活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7 年 8 月 4 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48 《亡命之徒在嚎叫——把全向東潛逃武漢期間寫的黑文章「上海告急」、「紅色上海發刊詞」、「鮮血不會白流」揪出來示眾》，載於文革時期小報《反到底》1967 年 9 月 17 日第 22 期，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主辦，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49 轉引自 1967 年 7 月 28 日《工人造反報》，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50 以上《全向東罪惡活動醜事記》，載於文革時期小報《反到底》1967 年 9 月

幾乎就在全向東說這些話的同時，北京紅衛兵中有人寫出《論新思潮》，提出「權力再分配」論，立即遭到主流話語批判。上海的《文匯報》也馬上在7月24發表批判文章《評一種所謂「新思潮」》。後來聯司被砸之後，全向東的這些講話被與「權力財產再分配論」掛上鉤，也被批判。

全向東說「市革會裏除了張、姚，都不是好人」，將張、姚與上海市革會撇清，似乎他們並不反對張春橋。但其實，全向東們目標的最終指向就是張春橋。6月14日那天下午的支聯站成立大會上，全向東在發言中說：我已經派人去山東調查張春橋，看來他是個叛徒。此話一出，下面鴉雀無聲。旁邊的陳卜昌見狀，趕緊打圓場，淡化全向東的這幾句話。會後，幾個主要負責人討論，都認為沒必要這樣明顯地反對張春橋；陳卜昌也認為不能給自己樹立這樣一個勁敵，雖然他對張春橋一直非常反感，認為他是「政客」。於是，當大會的會刊印出來時，全向東的這個講話沒被刊登。⁵¹

聯司和支聯站還幾次在開會時提出要綁架王洪文等人：「時候已經到了，該行動了，時不可失，機不再來。他們先動手抓我們，我們怎麼不可動手抓他們呢？我們初步計劃先綁架以下幾個人：王少庸、徐景賢、王洪文、陳阿大、宋有福等。」⁵² 不過最終沒有付諸行動。聯司和支聯站還提出：「揪出陳曹黑秀才」，這是針對徐景賢；「打倒陳再道，揪出軍內走資派」，這是指東海艦隊海軍司令員高志榮；「徐景賢和王

17日第22期，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主辦，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51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年4月4日對陳卜昌的訪談。而且筆者查過那天的大會會刊，確實沒有全向東的發言。

52 《支聯站的作戰部署——揭開支聯站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命會》，載於文革小報《反逆流戰報》1967年8月12日第2期；紅衛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上海財貿系統革命造反委員會、華東化工學院紅衛兵師(籌)紅旗總部聯合主辦，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少庸挑動群眾鬥群眾，王洪文是為所欲為的山大王」。據後來有人披露，全向東甚至有過搶軍隊武器庫的打算，「像武漢造反派那樣武裝自己」，不過最終沒有付諸行動。⁵³

解福喜事件

在整個聯司與東方紅的衝突中，上海市革會及工總司都態度鮮明地站在東方紅一邊。王洪文多次召開工總司總部會議，商量如何對付聯司，要求以工總司的名義在《工人造反報》上發表聲明譴責聯司。王洪文還讓葉昌明去工總司所屬區、縣、局聯絡站聯繫，要他們也公開支持東方紅，譴責聯司。⁵⁴ 工總司的負責人都認為應當對聯司採取措施。武漢7.20事件的爆發，以及越來越亂的上海形勢，大家都認為再不對聯司採取行動不行了。但是，王洪文不同意，他認為如果硬打，後果會很嚴重，畢竟聯司是上柴廠的多數派。⁵⁵

上柴廠衝突持續升級，武鬥不斷。東方紅一派幾次被打出廠，聯司一派也無心生產。據當時一份小報報道統計，在這個六千名職工的工廠中，僅聯司方面：

5月20日至6月5日中，聯司成員曠工人數達6143人次。平均每天曠工人數達409人，而且還不包括每天報到後又外出

53 《全向東「秘書」的招供》，載於1967年8月31日第5期《反逆流戰報》，紅衛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上海財貿系統革命造反委員會、華東化工學院紅衛兵師(籌)紅旗總部聯合主辦，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陳國康文革資料。又據筆者和金大陸、金光耀對陳卜昌2009年4月4日訪談，陳卜昌回憶說，武漢事件後不幾天，聯司方面有人想去駐無錫的軍隊那里弄槍支，好幾輛車都已開出去，被他去勸回來的。

54 《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中葉昌明1978年4月19日供詞。

55 王洪文的這個態度引自筆者與金大陸、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對王腓利的訪談記錄。

的，和不作統計的非生產的科室人員。鑄工車間6月1日至5日的曠工人數也沒計算在內。⁵⁶

這個統計沒有將東方紅方面的曠工人數計算進去，否則人數還要多。

從6月22日起，至6月29日，上柴廠又連續發生武鬥事件，被打傷者二百多人，其中十多人重傷。⁵⁷ 6月30日下午，王洪文以市革會領導人身份，與駐滬三軍支左辦公室的軍代表劉政委等，聯合慰問東方紅被打傷者。以這個行動作為不是表態的表態。7月1日，市革會在人民廣場組織十萬人集會，「聲討聯司和支聯站挑起的武鬥」。

7月18日，上柴廠局勢進一步惡化，再一次發生武鬥，東方紅一派的解福喜被打死。解福喜是車間的工段政治指導員，共產黨員。武鬥的起因是7月18日上午，聯司認為東方紅提前覆蓋了他們刷的大標語。兩派發生爭執，4個東方紅工人被20多個聯司工人圍住。解福喜見狀，上前勸阻，被聯司的人拖走，第二天死亡。東方紅指責聯司打了解福喜，因為他身上傷痕纍纍。事件發生後，東方紅派認為在廠裏生命安全沒有保障，又一次全部撤出工廠。從1966年底至1967年7月，上柴廠先後發生幾十起武鬥，上柴廠的生產幾乎停頓。支聯站的興起，又將上柴廠的矛盾推向社會。聯司一次又一次地將自己置於上海市革會的對立面，本來有可能通過談判解決的分歧，被一次又一次的衝突激化；武鬥升級着仇恨，直至解福喜的死亡。

7月21日，以工總司為首的上海各造反派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聲討聯司追悼解福喜大會，王洪文在會上發言。會上宣讀

56 《上柴聯司頭頭在幹什麼》，載於文革小報1967年7月20日《解放日報傳單》。

57 《上柴「六·二九事件」真相》，載於1967年7月1日《工人造反報》，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市革會政法指揮部通令，通令要求「以楊仲池為首的上柴聯司負責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過程，交出殺人兇犯名單，聽候審判。」⁵⁸ 會後，與會者分乘上百輛卡車遊行。

解福喜被打死之際，正是武漢7.20事件發生之時，武漢的「百萬雄師」已遭到解散。7月23日，市革會召開大會，聲討百萬雄師及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會後遊行。工總司的造反派早已經摩拳擦掌，打算像武漢造反派砸百萬雄師那樣，也對聯司採取行動。如果不是張春橋反對，衝突早已發生。但聯司卻沒有察覺局勢變化，仍沒有降溫或改變策略，不但繼續反對以市革會及工總司為首的主流造反派，繼續在鬧市區和人民廣場製造反對輿論；而且還進一步籌劃更大的行動，準備成立全市性的支聯總站。

只有全向東，已經敏感地從武漢事件覺察出異樣，加上他聽有人放話說要抓他，7月18日，他將妻子和三個孩子託付給陳卜昌，讓陳卜昌為他們找個安全的地方藏起來；他自己於7月29日之後不再露面。⁵⁹ 陳卜昌也從武漢事件中覺察出不祥：

我覺得事情激化了，搞大了：你要是對的，就一直對到底；錯的就錯到底了。所以我們不能讓對方說我們是錯的，因為結果是要麼上天，要麼下地獄。

我還將自己這派與武漢比，我們到底像哪一派，但沒法比。因為百萬雄師是保軍區的，我們與他們不一樣，我們是反市革會的。所以比不出所以然。⁶⁰

58 文革小報《東方紅報》1967年7月27日第2期所載：《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法指揮部通令》，工總司上柴東方紅總部，東方紅工學革命造反兵團合編，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59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年4月4日對陳卜昌的訪談。

60 筆者、吳一慶 2009年7月31日對陳卜昌的訪談；以及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年4月4日對陳卜昌的訪談。

陳卜昌雖然感覺到危機，但他已經沒法停止了，在這種莫測時刻，他更加必須證明自己過去的行動是正確的，否則結果對自己將愈發不利。

「G 號行動」

就在聯司積極籌備全市性支聯總站的同時，工總司也在行動。王洪文派陶國正打入支聯站臥底。陶國正參加過工總司籌備會議，但從未在工總司總部工作過。他對聯司負責人說自己受王洪文排擠，要加入支聯站反對工總司。支聯站的人開始不相信，多次考驗他，有一次還突然將他抓起來，關在一個秘密點審問拷打，問他是不是工總司派來的探子，都被陶頂住了。陶終於取得支聯站的信任。王洪文讓陶國正與自己以及交大反到底的紅衛兵楊小兵單線聯繫。7月底的一天，陶國正送來消息：全市各支聯站正在聯合籌備成立「支聯總部」；7月31日晚上，7月31日晚上，各支聯站將在泰安路一棟房子裏開會，支聯總部以及支聯站所屬各區的頭頭包括全向東近25人將到會，討論成立大會的各項事宜；第二天8月1日將召開成立大會。得到消息，王洪文當即於7月30日下午在888召集工總司總部負責人會議，決定趁此機會將聯司和支聯站頭頭一網打盡。

「888」是工總司從6月中旬起，設在地處華山路的上海警備區支左辦公室的一個辦公地點。當時聯司與東方紅的矛盾已經發展到與工總司的矛盾，而且，臥底的陶國正曾送出消息，說支聯站幾次開會都有人提出要綁架三王一陳，即市革會的王承龍，工總司的王洪文、王明龍以及陳阿大，因為這幾個人都堅決反對聯司。王洪文擔心工總司辦公室被砸或人被綁架，所以經常在這裏碰頭開會。因為所借辦公室電話號碼是370888，大家就將這個辦公室簡稱為「888」。工總司總部負責人陳阿大、葉昌明、戴立清等就住在支左辦的對面，旁邊是部隊食

堂，生活很方便。此外，還準備了二線和三線辦公點，以作備用。⁶¹ 王洪文佈置陳阿大和戴立清兩人為現場指揮，由陳阿大向上海矽鋼片廠、上海耐火材料廠等冶金系統工廠的造反隊調一百人，負責包圍現場外圍；請上體司胡永年調50人，負責入室抓人；還要王明龍負責調兩輛冷藏車。因為冷藏車密封，外面看不到車裏的情況，保密性能好。為防止被抓者反抗引起衝突，王洪文要陶國正在開會前，將房間裏凡是能抵抗的工具全部清除；⁶² 為防止混戰，王洪文要行動人員都在左臂紮白布帶作為記號。⁶³ 王洪文還規定，上體司的人只負責抓屋裏的人，若有人從窗口或陽台跳下，則由外圍人員抓。王洪文稱這個行動為「G號行動」。葉昌明的工作筆記本上記下了會議內容：

王洪文：

最近社會上有幾件事

發現了一張反動的大字報：堅決打倒兩面派江青。主要是攻擊樣板戲問題，攻擊江青的生活。

攻擊市革會的大字報也不斷出現。支聯站不斷拉隊伍，好多已聯合的也被拉開，反說是工總司拉的。同時大反解放軍，要大肆抓人(據知在八月初幾天要對頭頭下手)。

這幾天敵人已經達到猖狂的地步，我們一些人的地址他們都摸熟了。

張寶林：專政機關決定在8月1日上午在南市第一看守所傳訊楊仲池。

-
- 61 有些寫上海文革的書中，包括筆者過去寫的《大崩潰》，都將「888」說成是秘密策劃攻打聯司的據點，但工總司的一些負責人出獄後，筆者對他們訪談時，他們都說設立「888」，最初只是因為聯司和支聯站勢力太強，怕被衝砸，所以在部隊的支左辦公室設立一個臨時辦公點。而且起名「888」也不是作為代號，只是簡單，說順嘴了，以後就成了簡稱。
- 62 這是王洪文對胡永年說的，引自胡永年1977年4月21日。
- 63 葉昌明1978年11月22日工作筆記。

G號行動計劃

今天支聯站(上海聯司)開會(經常開的)有三十多人，要抓幾個人。

昨天他們寫了一份宣言，矛頭直指市革會，裏面有一批亡命之徒的。

這幾天他們要動手捉我們幾個人了，所以我們也要動手捉(泰安路120弄31號)

進去的地點：華山路、泰安路，把弄堂堵塞就走不掉。

方案：1.埋伏捉人。

2.襲擊、圍攻捉人。

人員：1.體司抽五十人。

2.抽一百人襲擊。

時間：晚上七點。

記號：左手綁白布。

指揮部：戴立清、王洪文。⁶⁴

王洪文對大家解釋說，他這樣秘密行動是為了不引起衝突：

他們準備8月1日在人民廣場召開成立大會，如果在他們召開成立大會時，我派人去衝會場，這樣會造成流血事件的，所以趁他們頭頭在今天開會時把他們來個一網打盡。⁶⁵

7月31日下午，所有行動人員在泰安路附近的05單位集中，

64 《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中的葉昌明1967年7月31日筆記，括弧中的文字是《罪證之五》中原有的。

65 這是王洪文對胡永年說的，轉引自《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中的胡永年1977年11月7日供詞。

王洪文對人員、車輛、標志等逐一檢查，並配備了簡單的藥物。⁶⁶ 胡永年向王洪文報到，王洪文告訴他，這次行動陳阿大也參加。上體司因5月30日與工總司所屬工體司的武鬥積下怨，許多隊員不服陳阿大。胡永年擔心陳阿大指揮不動上體司的人，親自去現場指揮。

晚上，各方支聯頭頭果然如期而至，負責人基本到齊。7時，正準備開會，50個身強力壯的上體司運動員一擁而入。與會者中有人跳上陽台企圖跳樓，仍沒逃脫。26個與會者全被抓獲，開會者準備的「上海支聯總部」的牌子和旗子也被當場砸爛撕毀。原來打算裝被抓者的冷藏車來晚了，被抓者全被塞進一輛大客車。車子先在路上不斷兜圈子，確定無人跟蹤後，開往楊浦公安分局。葉昌明特地趕往楊浦分局，逐個清點，發現只漏了一個支聯總部的常委。王洪文吩咐絕對保密，決不能讓聯司知道；甚至也沒有報告市革會，說反正胡永年會告訴徐景賢的。被抓者中，除兩名過路人數天後被釋，9人被關押一個月，14人被移至第一看守所，關押七到八年。⁶⁷ 這次行動，全市支聯站的負責人幾乎被一網打盡；不過，沒有抓到聯司負責人楊仲池以及支聯站的全向東和陳卜昌。全向東前一天已經躲藏，陳卜昌不贊成建立全市性支聯組織，和這些人沒有來往。陳卜昌認為沒有必要搞得這麼正式，成立全市性支聯組織，還選出常委，等於給對手送上骨幹名單，一旦失敗將被一鍋端。事實證明了陳卜昌的預見。

砸了支聯總部，聯司的支持和同情者群龍失首，聯司失去支聯站的龐大社會支持力量。

儘管整個行動十分保密，但人員失蹤，還是使聯司和支聯

66 《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中，張寶林1979年1977年11月25日供詞。

67 數據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辦公室1981年7月編《上海柴油機廠武鬥事件簡況》。

站馬上察覺，決定以牙還牙。8月1日支聯站在江灣附近的大柏樹開會。陳卜昌說，根據各區匯報，我們的人已失蹤48人，其中確定被抓的有30多人。

市革會的態度

張春橋最初不同意黃金海等提出的敲掉聯司主張。王洪文最初也不主張硬行解決聯司問題。雖然工總司總部的其他人例如黃金海、戴立清、王腓利等人，一直主張乾脆砸了聯司，但王洪文不贊成，他認為如果武鬥就會有傷亡，他作為負責人要承擔責任：

王洪文不是很強硬的人，他耳朵根子軟，不同意打聯司。他認為打了聯司會造成嚴重後果，同時他作為我們的一把手要擔當責任。另外他認為矛盾還沒有激化，他也對市革會政法指揮部抱有希望，還想通過政法指揮部解決問題。⁶⁸

後來隨着支聯站勢力的擴大，王洪文的態度改變：

(1967年)5月以後，社會上有一部分勢力提出新的口號：「上海奪權不徹底，不徹底的原因是用老幹部比較多，不是造反派掌權，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市革會決定做工作，也沒做成。7月份聯司在社會上鬧得很厲害，把南市的一所中學燒了，燒了手工業局的一座樓房，在外灘把汽車給推翻燒了，把東方紅派打出廠去，住在市革會33號的地方。社會上少數壞人附和聯司當時提出的口號。聯司這一派實際上比林彪的更「左」，它提出的實際是打倒一切，反對用老幹部。我對這些做了調查，8月3日給他們寫了公

68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年3月21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開信，派三軍(海、陸、空)宣傳隊送去，聯司不接受，把宣傳隊趕出來，攝影機砸壞了，人也被打了。調查後，我認為如果不解決，當時社會秩序剛恢復些，上海就要亂下去，革命生產都搞不好。⁶⁹

但是，市革會始終下不了硬行解決的決心。6月29日，上柴廠又一次發生武鬥。晚上，主持市革會工作的王少庸在外灘的市革會大樓底層會議室召開碰頭會，專門討論聯司問題。到會者有馬天水、徐景賢、王洪文、王承龍等，以及軍隊的廖政國、李彬山、張宜愛等：

王洪文態度激烈，講早該砸聯司，主張立即動手不能再拖延，批評市革會一直沒有措施。三軍領導人都主張用武力取締。王少庸不同意用武力解決。我支持王少庸，也反對用武力。朱玉佩也是。徐景賢開始不同意用武力，後來看到會議上多數主張用武力，他又把原來的意見縮回去了，含糊起來了。並在中途要退會回康平路去，想回避尖銳矛盾。我不讓徐景賢走，我講你走我也走，這樣才留下。⁷⁰

見會上兩種意見無法統一，王少庸說，立即請示張春橋。他讓王承龍向在北京的張春橋打電話。電話接通後，王少庸徵詢張春橋意見，張春橋說：「不要急，亂透了，群眾會起來的。」於是，會議決定暫不採取武力行動，先展開輿論攻勢。⁷¹

69 王洪文 1980 年 6 月 12 日的交代。這個交代的內容是文革研究專家王年一 1992 年親自抄給筆者的。

70 王承龍 978 年 8 月 28 日《關於上柴問題》。王承龍在這裏說自己反對使用武力，但據戴立清、王腓利、黃金海等回憶，王承龍當時是最堅決主張「砸」者之一。

71 王承龍 978 年 8 月 28 日《關於上柴問題》。

張春橋對聯司問題始終不贊成以武力解決。7月13日，他又一次電話指示，希望大家冷靜：

春橋指示，文元來電：

關於聯司的問題，希望大家頭腦要冷靜，還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我們掌握鬥爭大方向，不要被干擾、轉移了大方向，革委會對兩方面都要聽他們的意見，對群眾還是要促進大聯合，頭腦要冷靜，要做細致思想工作，鬧一頓也不要怕，鬧不到哪裏去。還是依照過去電話意見，雙方意見都要聽，把情況緩和下來。⁷²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市革會努力化解聯司矛盾：在上海所有報紙上開展攻勢，試圖徹底孤立聯司；讓兩派代表都到市革會來談判。⁷³ 解福喜被打死之後，市革會王少庸、徐景賢、王承龍以及三軍代表，曾與聯司負責人坐下談判。但是，談判沒有成效，聯司不接受市革會要他們交出打人兇手的要求。

事態繼續擴大

聯司不服市革會的表態，兩派對立的局面沒有緩和；相反，事態還在繼續擴大。從6月底到7月底，僅人民廣場及周邊地區，就連續發生多起武鬥事件：

6月29日晚上12點，人民廣場旁邊西藏路上的市青年宮被衝砸，玻璃被打碎，一人重傷。起因是青年宮的人要在自己樓外懸反對聯司的標語，支聯站的人便以「有人從青年宮樓上往下灑殺蟲劑666粉」為由，衝砸青年宮，砸碎了青年宮的玻璃窗，

72 葉昌明文革中的工作筆記 1967年7月13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73 王承龍 1978年8月28日《關於上柴問題》

還將值班人員拉出來毆打。⁷⁴ 7月3、4、5日晚上，吳淞路海寧路上的市北區郵電局被連續衝砸，一人被打傷。起因是那裏有個廣播喇叭播放《工人造反報》上批判聯司的文章。⁷⁵ 7月8日晚上，西藏路福州路口的市飲食公司大樓被衝砸，所有廣播器材被砸毀，兩人重傷。起因是財革會在那裏設了一個廣播站，播放批判聯司的文章。⁷⁶ 7月9日和8月2日晚上，淮海路西藏路附近的光明中學被衝砸，校門被搗毀，門口所有的玻璃都被砸碎，學校的門房也被縱火燒毀。起因是該校紅上司的紅衛兵在校外散發反聯司傳單，在校門口懸掛反聯司大標語。⁷⁷ 聯司和支聯站的人還要衝進光明中學去抓人，後來工總司派人增援，才解了圍。

7月31日、8月1日和8月3日晚，南京路四川路口的上海市手工業管理局(手工業局)辦公大樓被連續衝砸。起因是一輛卡車上的紅衛兵對着另一輛卡車上的人員高呼「聯司必敗」口號。紅衛兵的卡車當即被對方攔下，卡車上的人員被毆打，其中一個女中學生被侮辱。事發附近的手工業局值班人員見狀出面制止，與打人者發生口角，也遭毆打，累及所在的手工業局大樓遭衝砸。大樓的大部分玻璃門窗計大小玻璃共147塊被砸碎，而當時一塊大玻璃就值500元；21間辦公室被砸，打字機、速印機等辦公用品被毀；底層產品陳列室被搶，手工業局機關的文件被燒；局機關內6人被打傷，其中兩人被打至重傷。還累及手工業局對門以及附近的和平飯店、春雷童裝店和益眾商店也遭毀

74 《戳穿聯司賊喊捉賊的卑鄙伎倆——關於上柴廠「6.29」嚴重政治事件的調查報告》，載於1967年7月7日《工人造反報》。

75 《又一出醜據——上柴聯司和支聯站一小撮混蛋衝砸市北區郵電局調查記實》，載於1967年7月11日《工人造反報》。

76 《聯司和支聯站一小撮人唆使暴徒砸毀「財革會」廣播站，財革會就此發表嚴正聲明》，載於1967年7月11日《工人造反報》。

77 《革命的組織是衝不跨的》，載於1967年7月15日《工人造反報》。

壞。⁷⁸ 那個被侮辱的女中學生，是工總司物資局聯絡站一個頭頭的女兒，下身被塞進碎玻璃片，就是打碎的窗子灑在地上的碎片。女孩被路人搶出送進醫院，陰道縫了近20針。做父親的在工總司總部說起女兒遭遇，忍不住失聲痛哭。⁷⁹

市手工業局門前這場騷亂連續三天，到8月3日半夜，更達到高潮：一輛卡車去人民廣場參加市革會召開的聲討聯司大會，行至手工業局門口被攔下，車上人員被拖下毆打，多人被打傷；一輛交大反到底的摩托車在手工業局旁邊的和平飯店門口被攔，騎車者被打成重傷，摩托車被燒毀。⁸⁰

鬧事和看熱鬧的人群整天擁堵在馬路上，途經人民廣場的49路公共汽車只得改道，光明中學附近西藏路上，17路公共無軌電車無法通行。與此同時，在上柴廠內，從6月1日到7月20日，不到一個月時間內武鬥就有30多起。解福喜就是在其中一起衝突中被打死的。⁸¹

市革會送《公開信》

面對聯司和支聯站的日益壯大，工總司以《工人造反報》開展猛烈宣傳攻勢，連續發表文章批判聯司。同時，總部多次開會討論如何在一個適當機會採取強行措施。王洪文說，聯司和支聯站企圖以第二工人組織取代工總司，上海將因此分成兩

78 《南京東路「7.31」·「8.1」事件真相》，載於1967年8月8日《工人造反報》。

79 這是王腓利告訴筆者的，那個父親痛哭時，王腓利在場。

80 《南京東路「7.31」·「8.1」事件真相》，載於1967年8月8日《工人造反報》。這篇文章說騎車者在送醫院途中就死了，但筆者查閱其他傳單，說是送醫院後重傷搶救，頭部縫了好多針。筆者覺得後一種說法更可信些。因為如果死了人，應該還會有後續傳單或文章，但沒有查到。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陳國康文革資料。

81 《同無產階級專政為敵者必將粉身碎骨——上柴聯司一小撮壞頭頭陰謀製造「上海第二次大亂」的可恥下場》，載於1967年8月7日《工人造反報》。

大派，形勢刻不容緩。但王洪文也只是說說而已，沒有專門開會討論佈置。因為市革會不贊成。

7月29日和7月31日，市革會政法指揮部為解福喜事件傳訊以楊仲池為首的聯司負責人，聯司拒絕聽命，還圍攻前往執行的政法指揮部人員。⁸²

8月1日晚，西藏路上的「大世界」門口，又發生流血衝突，起因是為一輛公交車。王洪文在888召集陳阿大、張寶林、戴立清等，說有一輛公共汽車被聯司搶去作宣傳車，要去將其奪回來。於是當即決定由戴立清、張寶林等人連夜調集隊伍，將西藏路上的大世界附近從雲南路到龍門路一段馬路封鎖，以搶回車子。為避免與支聯站發生衝突，定於早晨5點統一行動。但是，行動中還是出了亂子。本來，討論時決定，為避免混戰，工總司人員全部以左臂繫毛巾為記號。但前往的隊伍大多沒有這樣做，結果現場一片混亂，都以為對方是支聯隊伍，乃至自家人衝突。冶金局隊伍中的上海冶煉廠工人金乃林被打死；帶領冶金局隊伍去大世界的陳阿大，乘坐的小汽車窗玻璃被砸碎，司機在慌亂中當場壓死南昌中學的學生潘國蓋。

8月2日，市革會發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給上柴聯司革命群眾的一封公開信》，要聯司群眾「反戈一擊」，「起來檢舉揭發，抓出殺害解福喜同志的兇手及其幕後策劃者」。這封信是王承龍等人極力主張寫的，王承龍主張「先禮後兵」，先以市革會和政法指揮部名義發公開信；而王洪文則主張快刀斬亂麻，不贊成發什麼信。⁸³最後，市革會同意王承龍意見，向聯司送公開信。

82 1967年8月2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給上海柴油機廠聯司革命群眾的一封公開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印發，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83 王洪文和王承龍的主張引自《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中的張寶林1979年11月25日供詞《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

8月3日下午5時，三輛宣傳車載着市革會代表、駐滬陸海空三軍代表，以及《文匯報》、《解放日報》、《支部生活》記者，還有上海電視台記者和東方紅電影製片廠電影拍攝人員，上百人分乘三輛車前往上柴廠。當車輛駛至上柴廠大門口時，被聯司的人攔下。結果宣傳車上高音喇叭被砸，攝影記者的攝影機被搶，東方紅電影製片廠的吉普車被扣下，市革會公開信被燒毀，市革會和三軍代表以及記者共二十多人被毆打和扣留，並都被關進地下室。據聯司後來說，扣押他們是打算萬一發生情況，可以將這些人作為人質，提出交換條件。下午5時左右，送《公開信》代表被打被扣消息傳到市革會，引起憤怒。聯司連市革會代表都敢毆打甚至扣留，顯然是對上海最高權力機構權威的公然挑戰。市革會決定，立即於當夜在人民廣場召開聲討聯司大會，逼迫聯司釋放被扣押的人質。⁸⁴

晚上，王承龍和朱玉佩去888，商量當夜大會籌備事宜。為車輛調度問題，王承龍與工總司的人吵了起來。王承龍說車輛調度必須由市革會負責，他指責正忙着調度車輛的王明龍，說車輛怎麼都歸工總司統一調度，工總司的權力怎麼比市革會還大？王明龍很生氣，說，我不管了，你王承龍去管吧。在場的張寶林、戴立清、葉昌明、陳阿大和王腓利，本來就看不慣王承龍企圖獨攬市革會大權，也和王承龍吵起來。王明龍賭氣離開888，讓司機開他去西郊公園。工總司的其他人見王明龍氣走，也都驅車跟了去。他們在公園門口發了一通牢騷，被緊跟而來的市革會軍代表潘又安勸回。⁸⁵王明龍和王腓利從交運局和工交二場調了近五百輛卡車和公交車，接送半夜去人民廣場開會的群眾。

84 此段資料全部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1981年7月編《上海柴油機廠武鬥事件簡況》。

85 王秀珍1979年9月1日，引自《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中的張寶林1979年11月25日供詞。

偶然事件引發必然武鬥

8月4日凌晨1時左右，全市群眾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數萬人的「控訴聯司罪行大會」。大會是市革會召開的，放在半夜，是因為聯司在下午打了市革會派去的代表，所以連夜開會強烈抗議。還有，據說也是因為8月夏天的白天太熱，晚上涼快些。王少庸、王洪文、徐景賢、王承龍出席大會，徐景賢、王洪文、王承龍並講話。被打死的上柴廠工人解福喜的妻子、被搶了攝影器材的攝影記者，都上台控訴；同濟東方紅的陳啟峰代表紅衛兵發表講話說，對聯司是應該採取行動了。大會開得很短，半小時不到就結束。雖然在會前通知時，只說是控訴大會，沒有說要去砸聯司，會上也沒有動員大家去砸聯司，但大會放在半夜召開，甚至等不及第二天，事實上起了激化和煽動情緒的效果。⁸⁶ 大會結束，一些參加大會的工廠造反隊隨即遊行。在外白渡橋，工總司冶金系統聯絡站所屬造反隊三人，被突然衝來的卡車撞倒：

聯司兩輛開足馬力的大卡車發瘋般行駛着，朝正在外白渡橋下的我站造反隊員撲將過來，頓時，飛旋的車輪碾軋了造反隊員的身體，同我們並肩作戰的許多階級兄弟就這樣被這一小撮匪徒慘遭傷害了。新仇舊恨心中湧，萬丈怒火胸中燒，怒不可遏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當即組成了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向上海柴油機廠開去。⁸⁷

86 這是戴立清多次對筆者講過的話。

87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載於《冶金通訊》1967年8月22日「專刊」，工總司冶金系統聯絡站主編，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同樣提到這起卡車有意撞人事件的，還有同張小報上的另兩個單位的文章：《革命英雄譜》，作者是「上海耐火材料廠工人革命造反縱隊」；《戰地見聞》，作者是工總司上海耐火材料廠革命造反縱隊，本文關於外白渡橋撞人事件的資料都來源這三篇文章。

被撞倒的三人都是冶金局所屬耐火材料廠的工人造反隊員，其中一人頭破血流，被撞成重傷。⁸⁸肇事卡車撞人之後，馬上混入車群飛快逃逸。在場的工總司冶金系統聯絡站造反隊員們都認為卡車是聯司或支聯站的，這是具挑釁意味的故意撞人行為。三天前，在大世界武鬥衝突中，被打死的上海冶煉廠工人金乃林就是工總司冶金系統聯絡站的；冶金局造反隊負責人曹可祥早就恨死聯司，這下更是新仇舊恨。他當即決定，隊伍開往上柴廠，一定要聯司交出肇事者。他帶領冶金系統的造反隊立即開往軍工路，將上柴廠團團包圍。⁸⁹此時，是8月4日早上5點。

上柴廠被包圍的消息，很快傳到888。8月4日清晨5點左右，睡在888的戴立清、王腓利等人從夢中叫醒，說以冶金系統為主的造反派組織，已經包圍了上柴廠。戴立清和王腓利等立即趕往康平路，睡在那裏的王洪文已被人叫起。接着，市革會其他負責人王少庸等也都陸續趕到。大家商量了半天，討論在這種情況下，市革會該怎麼辦。王少庸堅持要王洪文等待張春橋的回音。但是，電話打了半天，沒有找到張春橋。張春橋其實就在上海，據張春橋的秘書回憶，8月4日那天：

主席此時在上海，我知道張春橋在主席那裏。但我不能隨便打電話去，我不能透露主席的行蹤。我只能說張春橋不在上海，我無法聯繫到張春橋。直到晚上張春橋回到興國路，我才向張春橋匯報了王少庸他們的擔憂。張春橋沒有說什麼。⁹⁰

88 據8.4砸聯司後的1967年9月，「上海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主辦的《上海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誓死捍衛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展覽會》印發的簡介中說，這被撞的三人中，有一人被撞成重傷後搶救無效死亡。

89 王明龍、王腓利和葉昌明都對筆者回憶說，他們事後都聽說，那天大會後舉行遊行，冶金局一些在上海東端的工廠的造反隊，回廠途中在外灘與支聯站或聯司的幾輛卡車發生衝突，於是直接開去上柴廠。

90 這是筆者2011年在一次與張春橋秘書何秀文的電話交談中，何秀文說的。據王承龍1978年8月28日回憶，王少庸在8月3日這天，堅持要王洪文等張春橋回音，「後來王少庸告訴我，張春橋有指示，群眾起來了

而張春橋自己在砸聯司行動不久後的一次講話中，也說那天他沒有和市革會聯繫過：

我今天可以在這裏講，8月4號那天我在上海。不過，我沒有和革命委員會聯繫，他們也不知道我在上海。⁹¹

王少庸擔心武鬥將造成大規模傷亡，着急地催促眾人趕快去現場，他要王洪文去說服冶金局聯絡站撤包圍。最後決定，所有人一起去上柴廠現場。據戴立清回憶：

8月4日一早，天還沒有完全亮，大約5點不到，我還在睡覺，工總司楊浦區聯絡站打來電話，說上柴廠門前人山人海。我立即和我的秘書交大的紅衛兵胡斌趕往康平路匯報，那裏好多人，王洪文、馬天水、王少庸、徐景賢、王承龍等都在，他們已經知道上柴廠被包圍了。說市革會的人這樣在康平路不行，要馬上去現場。於是，幾十輛汽車，好像是41輛，開往上柴廠。⁹²

40輛左右的轎車趕往上柴廠，長長的車隊見頭不見尾。王洪文和廖祖康乘一輛車，同車的還有王腓利。⁹³ 他們聽說工

要動，就讓他們動吧」。筆者估計張春橋這句話是砸聯司行動之後說的，因為王承龍沒有說清張春橋這句話是何時講的；而且根據以上何修文的回憶，顯示他們行動前沒有找到張春橋。

91 張春橋 1967 年 10 月 16 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報告會上的講話。王承龍在 1978 年 8 月 28 日的交代中說，8 月 4 日凌晨王少庸曾經得到張春橋的答覆：「群眾起來了要動，就讓他們動吧」，和張春橋這個講話對不上。而且張春橋秘書何修文說因為毛澤東此時在上海，張春橋一直陪着毛澤東，因為保密，不能讓上海方面知道張春橋在上海。筆者認為張春橋的講話應該距離史實更近些。王承龍所說的張春橋這句話，可能是更晚些時候、砸聯司行動過去了，才講的。

92 筆者 2009 年 3 月 22 日對戴立清的訪談。

93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王腓利說，那

總司冶金局聯絡站包圍了上柴廠後，擔心冶金局聯絡站人少吃虧，所以盡快趕去。剛進軍工路，車就無法再往裏開。從軍工路口到上柴廠，數不清的車輛將馬路堵得水洩不通，大都是冶金局所屬工廠的造反隊。王洪文只能下車，和王腓利、廖祖康一起，在車輛間穿來穿去，步行到上柴廠大門口。

聯司早已有準備。在整個廠區，幾天前就派人每日24小時輪流值班。雖然支聯站的陳卜昌對聯司死守大樓的準備不贊成，認為不可能頂住眾多人的進攻，但楊仲池沒有聽他的。聯司製造了長矛、盾牌、鋼盔等武鬥工具；將玻璃瓶灌滿汽油製成土燃燒彈，甚至還將鹽酸裝進小玻璃瓶做成「炸彈」。他們將這些東西搬上廠內各建築物的樓頂，在廠辦公大樓和一些車間的屋頂上堆滿石頭、鐵塊和鐵螺帽，築起防禦工事；為了應對被長期圍困的可能，還準備了半個月的糧食，並給每幢大樓都配備了小型發電機。8月4日凌晨，聯司不斷接到報告：大批人馬正在逼近。聯司立即緊急集合，人員上房頂準備應戰，還將工廠大門用裝箱機器堵塞；讓婦女們撤走，但一些女工還是選擇了留下。上柴廠內，辦公大樓和車間廠房的樓頂上，到處是聯司的人群。此時已經是早上8點左右。

王洪文和王腓利等人步行到上柴廠門口，看見這陣勢。王洪文像是對旁邊人、又像是對自己說：「看這個架勢，勸他們是勸不回去了。今天這次要死人啊，爭取不能夠死十個人啊。」⁹⁴ 王

天早晨，他在 888 被電話叫醒，得知上柴廠被包圍後，立即趕往康平路，見到也是剛從床上被叫起的王洪文。去上柴廠時，他和王洪文、廖祖康坐一輛車子。筆者認為：如果王洪文在 8 月 3 日下午開會佈置明天砸聯司，下半夜隊伍出發時，應該跟着隊伍，而不應該回康辦睡覺，還有戴立清和王腓利，都是 8 月 4 日砸聯司的現場指揮，卻在 8 月 3 日也都回 888 睡覺。所以，筆者認為王洪文 8 月 3 日如果開會調動過人，也是為了市革會 8 月 3 日晚上的大會做準備，而不是調人砸聯司。

94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王腓利說，他當時就在王洪文身邊，這句話是他親耳聽見的，給他印象很深。

腓利後來回憶說，他當時感覺，王洪文很擔心因武鬥死人。⁹⁵

在此之前，雖然工總司總部的一幫人主張敲掉聯司，而且在8月4日之前，工總司總部內部曾對上柴廠的情況議論過許多次，戴立清、黃金海、張寶林、葉昌明、王明龍等都說不能任由聯司這樣鬧，但王洪文一直沒有下決心，而且市革會王少庸、徐景賢等都始終不同意用武力解決。⁹⁶現在，冶金局聯絡站的人已經將上柴廠包圍，事態嚴重了。王洪文立即動身趕往現場。眾人從另外一條路，繞到上柴廠北面軍工路上的2856號一幢平房內，那裏是鐵路殷行洗罐站班道房，8點左右，眾人在道班平房內開會，商量如何解決處理這樣的局面。在那裏成立了一個班子，最初是為了解決兩派對壘的局面，不久實際成為砸聯司的指揮部。⁹⁷戴立清拿了張紙條，一一記下在場者名字，第一個是王承龍，第二個是王洪文，還有工總司的張寶林、王腓利、戴立清，以及工總司的一些區指揮部或聯絡站。指揮名單內中還有潘國平，不過他開完會就馬上找地方睡覺去了，以後再沒見他身影。⁹⁸聞訊趕來的還有耿金章。因為沒有上柴廠的平面圖，他們對上柴廠的建築物分佈不了解，後來還是趕來的消革會人員給他們一張上柴廠的消防地圖，王腓利照着這張圖，簡單臨摹了兩張，自己一張，另一張給了張寶林。⁹⁹消革

95 這是王腓利文革後，2009年至2012年，在筆者幾次對他的訪談時，多次對筆者提到的。

96 筆者在文革結束後的2005年曾經分別找戴立清、張寶林、黃金海、葉昌明、王明龍等工總司骨幹了解王洪文在8月3日這天是如何開會策劃打聯司的，因為文革結果後所有的批判材料都說王洪文8月3日曾公開策劃。但他們都說8月3日沒有參加過這樣的會。他們賭氣去西郊公園被叫回後，就各自回去了，沒有參加什麼會議。後來半夜戴立清等去出席了市革會在人民廣場召開的大會。他們說自己是「主戰派」，王洪文召開這樣的會不會不叫他們；而且如果8月3日王洪文開過這樣的會佈置，他們一定會當夜趕去現場，而不是在住處睡覺到早晨被人叫起。

97 筆者2009年3月22日對戴立清的訪談。

98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99 王腓利和戴立清都對筆者回憶說，王承龍說張寶林在「888」看地圖，而事

會的人還拿來對講機，這是工總司的人第一次看到對講機。

大家都認為，盡量不要強攻。先採取宣傳攻勢，勸聯司的人從房頂上下來，盡可能不激化矛盾。王洪文分析現場形勢，提出若強攻硬打，會造成大的傷亡。他建議圍而不打，以切斷廠區水源電源的辦法使聯司自己瓦解，這樣可以避免雙方衝突，避免傷亡。這個建議指揮部的人都同意。市革會的王少庸、徐景賢，以及駐滬三軍領導人，近中午時也都趕到現場。他們都擔心強攻造成傷亡，再三叮囑要注意安全，減少傷亡。於是，調來了宣傳車，還找來了手提喇叭，先向屋頂上的聯司作宣傳。¹⁰⁰

上午，開往上柴廠的車輛越來越多，都是聞訊趕來或被電話調來的工廠造反隊，事後估計有約十一萬人。整個上午，兩軍對壘，劍拔弩張。解放軍戰士拿着手提喇叭，對守候在房頂上的聯司人員喊話，聯司也以安在廠區大門口的高音喇叭反宣傳。一個解放軍戰士被聯司用強力彈弓發射的螺絲帽擊傷，王洪文當即佈置將廠門口的大喇叭拆下來。人群一擁而上，向緊閉着的工廠大門逼近；房頂上，聯司成員射下流星雨般的鐵螺帽。強力彈弓的皮筋以醫療橡膠管做成，¹⁰¹ 彈性十足，弓架是直接焊在樓頂牆沿的鐵條，用鐵螺帽作子彈，射程可達幾十米，殺傷力不小，不少人受傷：戴立清上衣口袋裏的兩支鋼筆被射斷，墨水染蘭了衣服前襟；王腓利左腹和耿金章鎖骨也被射傷。宣傳車更是只要一喊話，立即招來雨點般的螺帽，車上

實上，他們第一次看到上柴廠的平面圖，還是8月4日去上柴廠後，「消革會」拿來的。

100 王洪文最初不想採用強攻的方式，而想用包圍和喊話，讓聯司的人從大樓頂下來，這個策略，是許多文革後砸聯司的文章中都提及的。也是王腓利、戴立清、張寶林等當時現場指揮，文革後對筆者回憶的。他們還說，否則不會一大早包圍上柴廠，但直到中午後才開始強攻。因為之前就是希望聯司的人自己下來。

101 也有人回憶說是自行車內胎做成。

的喇叭被打癢。戴立清後來回憶說：「我們因為是倉促上陣，連『武器』和安全帽都沒有，還是上柴廠的人拿來了柳條編的安全帽。」後來聞訊趕去者，很多都被吩咐帶上鐵榔頭、鐵棍或木棍，還有安全帽。¹⁰²

8.4 砸聯司大武鬥

雙方對峙到中午。謝鵬飛回憶，當時王洪文對他們鐵路局造反派的交代是：

可以助威，但不要參與。所以後來我們鐵路局的100輛卡車的人在外面兜了一圈，但沒參與打。我們鐵路在殷行有個車隊和洗油罐車的殷行洗罐站，就挨着上柴廠。王洪文叫我們鐵路不要參與，因為周總理有指示：鐵路和地方運動必須脫鉤。我就通知這家廠不要參與砸聯司。這說明王洪文一開始不是想搞大的。¹⁰³

王腓利後來回憶說：

一開始我們確實是沒有狠下心要強打，王洪文也再三關照要盡量避免傷亡；後來，因為聯司的人不斷在房頂射螺帽，許多人被打傷，甚至把解放軍都彈傷了，激起大家憤怒。來上柴廠參加的都是下面的造反隊，那麼多人，我們

102 筆者 2009 年 3 月 22 日對戴立清的訪談。順便提一句，有書和文章說，前往砸聯司的造反派們都帶着長矛。而事實上，使用長矛的只是早有準備的聯司，其他造反組織都是臨時趕去的。最初趕去者，攜帶的都是臨時找到的鐵棒、木棒等。後來攻打大樓時，再調人去就要求戴上安全帽和鐵棍等。上海真正開始流行制作長矛，戴着柳條編安全帽武鬥，是在「8.4」砸聯司行動之後。

103 筆者 2007 年 12 月 28 日對謝鵬飛的訪談。

也控制不了。所以到中午11點左右，一些人開始強攻。王洪文也認為再不強攻，拖到晚上天黑會很麻煩。¹⁰⁴

這樣的兩軍對峙，僵持到中午，參加包圍上柴廠的造反隊有的已經開始採取行動。王洪文此時也認為，再這樣下去，拖到天黑，黑暗中如果發生衝突，可能造成大傷亡，還是在白天解決問題較妥。¹⁰⁵ 王洪文決定由工總司而不是市革會出面行動：

我產生這麼個想法，這派不解決不行，全市要亂，下決心要砸，從根本上解決。……決定後，市革會王少庸不同意砸聯司，認為上海警備區有一批幹部支持我們，王少庸批評了警備區的幾個幹部，實際上是對我的批評，他要我請示張春橋，我不同意，心想：張不好表態，對了，錯了，我自己負責。¹⁰⁶

104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105 同上，此外，另一個現場指揮戴立清文革後也曾對筆者這樣回憶過。

106 王洪文 1980 年 6 月 12 日的交代。這個交代的內容是王年一 1992 年提供給筆者的。省略號是抄件上原有的。在紀希晨的《史無前例的年代》(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二版)中曾引王洪文 1980 年 6 月 12 日交代，說「8 月 3 日下午，『總司』開了小會，決定調動四萬人參加，實際參加十萬人」。但筆者問了當時工總司最主張砸聯司的那些人：戴立清張寶林、王腓利、黃金海、葉昌明、王明龍，他們都說 8 月 3 日那天他們沒有參加過王洪文召開的這樣的會議。

但是，葉昌明在 1978 年 4 月 19 日的交待中曾說：「八月三日，王洪文和我們開會策劃決定動手打聯司……從八月三日半夜到四日兩天，在王洪文的直接指揮下，我們發動了打聯司的大規模武鬥事件」。2009 年 3 月 14 日，筆者以葉昌明自己寫的這段交代質疑葉昌明。葉昌明解釋說：「文革結束後我受審查，問到砸『聯司』的事，我那時覺得『聯司』確實是『工總司』砸的，總是我們的責任，所以沒有在具體時間上多解釋，不管是 8 月 3 日策劃也好，8 月 4 日策劃也好，反正 8 月 4 日砸聯司行動確實是『工總司』現場指揮的，早一天策劃，對我來說都一樣。再加上希望自己認罪態度好些能減刑，所以就都認下來了，沒有去想 8 月 3 日策劃和 8 月 4 日指揮有什麼差別。總之，文革剛結束時，我的時間概念很模糊。我想，其他人也是這樣。」

城市建築公司的造反隊調來一輛推土機，將大門旁的圍牆推倒；冶金系統的造反派從上鋼一廠調來25噸履帶式起重吊車，吊走堵在大門口的裝箱機器；另一些人則拆毀廠區南面的圍牆。眾人借着推土機的掩護衝進廠區，一個個車間大樓被包圍。人們用木板頂在頭上當盾牌，擋住射來的螺帽，衝上了屋頂。與此同時，耿金章帶人攻入廠區，首先佔領了食堂等處。聯司成員們眼見自己被分割在幾座孤立的樓頂上，無法相互聯繫，又被8月的烈日暴曬，一整天沒水沒食物，只得紛紛下樓投降。到下午2時左右，三分之二的廠區被攻下。

攻打的難點是原東方紅總部大樓和聯司總部大樓。王洪文要求在天黑之前務必攻下。聯司人員從屋頂上射出密集的螺帽；扔下石頭、鐵塊，還有土燃燒彈、鹽酸瓶。大樓外牆本有鐵扶梯可攀上屋頂，但聯司在武鬥前已將靠近地面的下半截切割，攻方無法攀登。下午2時，王洪文要消革會調消防車攻打聯司總部大樓。最初只開來兩輛，廖祖康忍不住發牢騷：你們消革會與公革會武鬥時，將全市的消防車都調去了，今天支援我們卻只來兩輛。¹⁰⁷ 後來又調來了八輛消防車。消防人員在高聳的雲梯上，居高臨下地用高壓水槍射向樓頂的聯司成員，但因水壓不高，作用不大。後來還是使用消防雲梯以及繩梯才攻上大樓。另一些人則在王腓利帶領下，爬上車間裏側高處的起重行車軌道，翻出天窗，與外面爬上樓頂的進攻者兩路匯合。雖然聯司用長矛猛戳攻上屋頂的人員，但頂不住人多勢眾，大樓終於被攻下。大樓旁邊的水塔頂上尚有七人，看到大樓被攻克，他們便自己下來了。至此，聯司的全部制高點都被攻克。

由於聯司有準備的拼命抵抗，在強攻大樓時期，受傷者大部是攻方人員，有些人受傷非常嚴重。¹⁰⁸ 王腓利親眼看到好幾

107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108 以上內容來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7 月編《上海柴油機廠武鬥事件簡況》，以及文革傳單《八·四凱歌——上柴聯司覆滅

個人血肉模糊地從他面前被抬過去，由聞訊趕來的上醫司的醫護人員和第二軍醫大學紅縱的學員包紮。

整個武鬥，工總司的王洪文、戴立清、王腓利、張寶林、耿金章、曹可祥等人，都在現場指揮；還有趕去的各路造反組織負責人，以及市革會的王承龍，也都實際參加武鬥指揮。陳阿大、葉昌明、王明龍、王秀珍，則在888值班接電話，以及組織向上柴廠運送麵包等食物。但他們沒有調派增援人員去現場。去上柴廠的大部分造反隊，都是在武鬥發生後，被已經在上柴廠現場的人員調去的，或是自己聞訊趕去的。

進上柴廠的道路早被封鎖，堵住了聯司的逃跑路線。黃浦江水面上，遊弋着巡邏的船隻，是王腓利佈置的。傍晚，他接到電話，說黃浦江面上好像不太平，聯司看樣子要從水路逃走。他於是打電話給江南造船廠的造反隊，要他們派一些船隻在黃浦江上巡邏。¹⁰⁹

阻擊增援的最激烈衝突，在上柴廠與幾百米外的上柴職工宿舍之間。那裏有一條一百多米長的鐵路專用線，直通上柴廠內。聯司方增援人員幾次試圖突破這個鐵路隘口進入上柴廠，但砸聯司指揮部已緊急調動上海金屬材料加工廠造反大隊封鎖道口。增援者一再發起進攻，阻擊者則將帶鐵釘的鐵板鋪在路

始末》，上海柴油機廠東方紅總部(上柴東方紅)、紅衛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紅三司)、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公革會)、上藝司上海圖書館紅色革命造反派(上圖紅革造)、上海體育戰線革命造反司令部(上體司)、上海革命中教聯造反兵團(中教聯)，1967年9月，此外還有戴立清及王腓利對筆者的回憶。

109 這是王腓利告訴筆者的。而在陳阿大在文革後的交代中說，中華造船廠派出了登陸艦和巡邏艦共3艘。有材料說黃浦江面上的船是部隊派出的軍艦，但當時始終在上柴現場的王腓利和戴立清，都對筆者回憶說，8月4日武鬥那天，肯定沒有軍隊的船隻游弋在黃浦江面，因為調動軍用船隻必須經中央軍委批准，東海艦隊是無權調動軍艦的。被認為是登陸艦的船隻可能是修理船隻或是軍隊退役船隻。而且這些船都是武鬥開始以後，在他們的要求下船廠才派出的。而不是如一些資料所說是8月3日事先開會策劃分工的，因為8月3日那天沒有開過會。

上，設置成長二十多米的障礙，阻止了據說是「滿裝硫酸、滅火器等化學毒劑」的車輛進廠增援。¹¹⁰

上柴廠剛被包圍，在廠內的楊仲池就給陳卜昌打電話，要求各支聯站急速調人增援。此時，王洪文的「G號行動」作用顯現：陳卜昌打了二十多個電話，根本找不到人，只好讓人開着宣傳車去人民廣場緊急呼籲。結果去的都是零星隊伍或人員，起不了大作用。¹¹¹

聯司一千多人被俘。為了辨別誰是聯司成員，男俘虜們一律被強迫脫光上衣，赤膊；女俘虜們則一律被撕下所穿衣服的一隻袖子，有些女俘虜衣服被撕裂得露出身體。他們都被強迫高舉雙手作投降狀，還被迫不斷念着：「聯司必敗，聯司必敗」；許多人被打得渾身是血。整個武鬥中，在強攻各個大樓時，被打傷者攻方佔多數。但到武鬥結束，聯司成員從佔據的各大樓下來後，受傷者就都是他們。一些人用棍子、長矛毆打這些已經投降的俘虜們，在場的同濟、交大的紅衛兵們，手挽手組成人牆，攔着不讓打，但還是攔不住，許多聯司成員都是這時候被打傷。¹¹² 據王承龍回憶：「聯司的許多人被打傷都是在投降之後，從屋裏出來的時候被打的，有的流血。我和朱玉佩去勸，不聽，照樣打。許多聯司的人不敢出來，女的在屋裏哭，怕被打。」¹¹³ 俘虜們被分別送往公安局，以及附近的上海體育學院和同濟大學；一些輕傷者被送往離得較近的第二軍醫大學。

110 《如磐石的鐵道防線擊退聯司支聯站四次反擊記實》，載於文革小報《冶金通訊》1967年8月22日「專刊」，工總司冶金系統聯絡站主編，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111 《支聯站內幕種種——支聯站壞頭頭陳卜昌供詞摘錄》，載於1967年8月9日《工人造反報》。

112 這是戴立清和王腓利對筆者回憶的，說他們極力勸止人們打俘虜，但是勸不住，還被威脅說「你再攔就打你」。打人者有些人是出於曾經挨過聯司打的憤怒，有些人則是出於起哄。

113 王承龍1978年8月28日《關於上柴問題》。

楊仲池躲藏在地下室，當場被抓，被打得鼻青臉腫。王腓利怕打出人命，只好將他藏在消防車後的儲物箱裏，衝出包圍人群。¹¹⁴

工廠對面就是工農新村，上柴廠職工的住宅區。道路兩旁和房頂上聚滿人群，除了看熱鬧的，許多是聯司成員的家屬，他們驚恐地目睹了這場大武鬥的全過程。而在工廠大門口，聚集着更多擔驚受怕的家屬們，眼見自己的親人被打，有人甚至跪下求情。

整個武鬥過程，被聞訊趕去的天馬電影製片廠與上海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拍攝人員拍下紀錄片。為歷史留下了記憶。¹¹⁵

下午5時，聯司被徹底擊垮；到下午6點3刻，武鬥全部結束。王洪文馬上要人檢查有沒有死人。王腓利在全廠仔仔細細搜索了一遍，沒有發現死人。他四十年多後還記得，當他通過對講機向王洪文匯報時，王洪文幾乎是歡呼般地叫起來：「沒死人，太好了！」¹¹⁶ 王洪文離開上柴廠之前，要戴立清和黃金海留下，和公安系統的人一起護廠。

第二天，8月5日，陳卜昌在自己所工作的上海汽車配件廠內被抓。全向東在砸聯司前已經不露面。聯司被砸之後，另外有六人找到他一起出逃。他們乘着東方紅電影製片廠的黑色吉普車，就是8月3日市革會派去上柴廠宣傳時扣下的那輛，一路向東開。8月6日，市公安局公革會組成十餘人小分隊，跟蹤追擊到九江，但沒有抓到他們。為了「在他們之前趕到武漢，不使他們與武漢的百萬雄師聯繫上」，上海警備區和市革會政法指揮部立即通過上海民航局，經在北京的民航總局批准，調去一架雙引擎飛機，最後在武漢抓到全向東；上海方面派出專門

114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115 許多敘述砸聯司武鬥的文章都說，武鬥現場有直升飛機在上空拍攝。對此，始終在現場指揮的王腓利和戴立清都說絕對沒有這種事。他們沒有看到飛機。攝影師是武鬥開始後趕來的，一直跟在王腓利身邊。

116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交通工具去武漢接應。8月18日，全向東被押回上海。¹¹⁷

武鬥的嚴重後果

比起康平路事件，砸聯司武鬥的雙方真正是殺紅了眼，守方和攻方受傷情況都十分慘重。文革中的宣傳，和當事人文革後的回憶，都沒有提到8.4砸聯司時曾打死人。¹¹⁸ 武鬥中被打受傷者一千多人，其中許多人是武鬥結束後，被作為聯司或支聯站各級頭頭關押，在關押期間遭到毒打的。不少人從此落下殘疾。

武鬥後，被綁架關押者八百多人。¹¹⁹ 楊仲池、全向東以及陳卜昌等11人被關押8年以上，直到1975年才宣佈對他們的判決：楊仲池被判刑3年緩刑3年，實際關押8年，刑滿後又被工廠「監督勞動」3年；全向東被判刑2年緩刑2年，實際關押多年；陳卜昌刑期最長，被判20年，據說是因為他主張成立全市性的

117 《千里追捕「全向東」》，載於文革小報《公安戰報特刊》，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公革會）編，1967年8月19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118 但是十年後，文革結束，清查文革武鬥，說那天死了1人，是上柴廠的工人任紅寶，死於廠部大樓樓下廁所門口，第二天才被發現。任紅寶被認為是「8.4」武鬥中的死者。任紅寶的死亡引自：《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中的1978年12月10日《上柴廠黨委「關於任紅寶同志的復查結論》：市公安局當時解剖記錄說任身受10處外傷。筆者就以上資料再三向8.4現場指揮王腓利和戴立清核實他們攻打方面是否死人，他們都回答說沒有，沒有聽說。而且說，如果「8.4」攻打過程中被守方聯司打死人，那他們工總司當時肯定會大做文章宣傳聯司打死人，以示「8.4」行動師出有名。他們並認為任應該不是武鬥中被打死的，可能是武鬥後自己摔下來死的，所以他們當時沒聽說。徐景賢文革後的有關回憶錄中也說「8.4」那天沒有死人。（在《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中）

119 這個數字引自《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中的1980年9月《上海柴油機廠黨委的三份證明材料（節錄）》。

支聯組織，將上柴廠內的兩派矛盾推向了全市。¹²⁰ 還有陳憲珍，儘管早在1966年底左右，她就已經退出聯司，但仍被關押8年以上。

上柴廠兩派長期武鬥不斷，給上柴廠造成極大損失。據中共上柴廠黨委文革結束後的資料顯示：整個文革中，上柴廠非正常死亡共18人。¹²¹ 8.4武鬥後，工人們一個多月都無法回廠，工廠二三個月無法生產，甚至半年也沒能恢復正常生產；8.4前後兩個月中，因停工停產，減少產值500萬元，減少利潤175萬元；武鬥後經全廠性盤點，損失350萬元。兩派的長期對立與武鬥，使工廠受到重大破壞，為修理被損壞的設備和廠房，用去修理費14.8萬元；由於武鬥中大批職工受傷，1967年和1968年兩年中，上柴廠醫藥費用開支11.86萬元；文革後，為復查和落實政策，用去14.31萬元。¹²² 無法統計的是人們精神上的創傷，以及人與人之間難以彌合的裂痕。這些後遺症在上柴廠多年都沒有能癒合。最初引起兩派分歧的原廠長朱文斌被反朱派打斷了一條腿，從此傷癩，落下殘疾；不過所幸活到文革之後。

8.4砸聯司之後，許多工廠的造反派組織也紛紛以砸支聯站的名義衝砸對立面。為制止這樣的狀況，工總司於8月7日和8月8日連續兩天發出通告：《關於處理支聯站的通告》，《關於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決制止武鬥的通告》，要求所屬組織「不得借解散支聯站為名，衝砸不同意見的革命群眾組織」，對聯司和支聯站的群眾「不要輕易扭送專政機關，不要拉出來遊街，也不要進行人身侮辱」。

120 刑期引自筆者、吳一慶 2009年7月31日對陳卜昌的訪談。

121 其中確認被打死的是2人，一人是解福喜，另一人是陸阿佛，其餘大部是自殺的。

122 以上這些數字引自《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中的1980年9月《上海柴油機廠黨委的三份證明材料(節錄)》。

但是，還是有不少組織借口砸支聯站攻打對立面，造成嚴重後果。上海8月4日以後一段時間內，許多武鬥或衝突，理由大都是「砸支聯站」：

8月6日，工總司普陀區分部以砸支聯站為名，幫助101廠的造反隊攻打另一派造反組織。101廠的兩派紛爭已有好幾個月。一派為聯合造反縱隊(簡稱「聯縱」)，成員一千多人，掛鉤於工總司普陀區分部；另一派「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總部」)成員七百左右，掛鉤於工總司普陀區聯絡總站。聯縱在3月份奪了廠黨委的權，成為掌權派。總部不服聯縱一派掌權，於6月3日，在工總司普陀區聯絡總站的支持下，集結外廠9個組織約1500人，衝砸聯縱，將其打出工廠。武鬥中，聯縱被打傷64人，總部也有20人受傷。聯縱誓言「殺回廠去」，「血債要用血來換」，宣佈總部是「支聯站」。8月6日，在工總司普陀區分部支持下，組織八十多個工廠近萬人，調來消防車、大卡車和大型公交車，使用長矛、鐵錘、鐵棒，甚至氨水、硫酸等，於凌晨2時向總部發起攻擊，5時攻入廠內，武鬥到上午10時方才結束。打死2人，打傷對方382人，自己這派也有160人受傷。101廠因此停產49天，經濟損失60多萬元。¹²³

8月8日，工總司電業總部以砸支聯站為名，攻打電力修造總廠另一派造反組織電業戰士。造成3人死亡，160餘人受傷，全廠停產20多天，經濟損失53萬元。¹²⁴ 電業總部攻打理由之一，是說中百公司大樓上那兩幅巨幅標語是電業戰士刷的。

123 《上海市普陀區志》，上海市普陀區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1994年出版，以及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未刊稿《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

124 《上海電力工業志》，上海市電力工業局史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1994年出版，以及上海市總工會1984年編《工總司大事記》說明材料之八：《有關五次武鬥事件》。

毛澤東讚揚砸聯司行動

砸聯司行動時，毛澤東就在上海。毛澤東7月21日因武漢7.20事件被迫離開武漢，乘飛機到上海，張春橋為此特地從北京趕回上海。毛澤東在上海住了近兩個月，直到國慶節前夕坐火車離開上海。¹²⁵ 但為毛澤東的安全保密起見，除了張春橋的秘書，上海方面的其他人包括徐景賢，都不知道張春橋這一時期在上海陪毛澤東，以為他在北京。

毛澤東在上海時，住在西郊花園代號為「414」的招待所。8.4當天深夜，毛澤東坐了裝甲保險轎車，由張春橋陪同，到外灘巡視。¹²⁶ 徐景賢文革後回憶說：毛澤東覺得上海的形勢和武漢大相徑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夠左右全局，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毛澤東感到很高興。電影製片廠人員拍攝的砸聯司記錄片，電視台隨即轉播。毛澤東在414看得津津有味。¹²⁷

9月8日，張春橋和馬天水等接見了工總司負責人王洪文、潘國平、陳阿大、戴立清、王秀珍等人。張春橋那天情緒非常好，稱讚打聯司的行動：

你們打聯司打得好，一天時間就把上柴聯司打掉了。你們工總司打聯司打得對，打得得人心，受到了上海人民群眾支持擁護。

聯司破壞上海文化大革命，破壞社會治安，反對上海

125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 2003 年出版的《毛澤東傳》中的 1504 頁說，毛澤東是 9 月 16 日乘火車離開上海的；但逢先知主編的《毛澤東年譜》第 6 卷 114 頁上說，8 月 29 日毛澤東在上海虹橋賓館聽取楊成武的匯報。而據謝鵬飛回憶，他當時負責毛澤東這次來上海的專列調度，日夜睡在車站，直到毛澤東離開。他記得毛澤東是 9 月 19 日離開上海的。當時上海到北京，以毛澤東的專列，直達只許十多個小時，正好能趕上十一國慶節。

126 徐景賢 2003 年《十年一夢》。

127 同上。

市革命委員會，再不能讓聯司他們這樣鬧下去了。¹²⁸

張春橋情緒好，是因為受到毛澤東的稱讚。毛澤東在上海期間，張春橋要徐景賢在電視台的頻道中多安排些節目。徐景賢遵囑，除了播放砸聯司現場紀錄片，還專門組織了幾場批鬥上海市委負責人電視實況轉播，批鬥現場設在上海雜技場和文化廣場，張春橋在招待所陪毛澤東觀看。在一個批鬥會上，王洪文作總結發言，張春橋在一邊向毛澤東介紹王洪文的情況。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見到王洪文，雖然是在電視屏幕上。這個指揮十幾萬人踏平上柴聯司的工人造反派領袖，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¹²⁹毛澤東對上海的形勢非常滿意，甚至因此想在上海過10月1日的國慶節。他問張春橋「國慶節我在上海過好不好？」但是當時正值上海附近的蘇南武鬥非常激烈，而且部分武器已經流入上海，中央考慮在這種情況下，保衛工作難度很大，毛澤東最後還是於國慶節前回了北京。¹³⁰

9月14日，《人民日報》社論《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進革命的大聯合》，公佈了毛澤東的一段講話：「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這是毛澤東在1967年的武漢7.20事件後多次講的，在上海時又幾次講起。毛澤東終於看到群眾兩派對立的惡果。

毛澤東離開上海後，一天晚上，市革會通知工總司總部的王洪文等開會，張春橋向他們傳達毛澤東的這段講話。張春橋告訴他們，毛主席原來打算接見工總司的部分負責人，但他

128 轉引自陳阿大 1978年12月22日。

129 徐景賢 2003年《十年一夢》。

130 毛澤東 1967年曾經有在上海度國慶的想法，引自張春橋 1967年9月28日在空軍慶功大會上的講話，以及張春橋 1967年10月6日《在工總司堅決響應毛主席偉大號召，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鬥私、批修」誓師大會》上的講話。

當時對毛主席說，他們工人造反派守不住這個秘密，接見他們的話，主席住在上海的消息很快就會傳出去，對主席的安全保衛工作不利。現在主席已經回北京去了。¹³¹張春橋還告訴他們，8月4日砸聯司的那天晚上，他陪毛澤東坐小轎車去人民廣場轉了一圈，陳阿大後來回憶張春橋的這段講話：¹³²

你們8月4日打聯司，我在上海，你們可不知道呀，這天晚上，我坐了車出來轉了一圈，在延安西路和淮海路上，看到載滿人的一輛輛卡車打好聯司勝利歸來，好多過路群眾在馬路上乘風涼，群眾和在樓上的居民，群眾大人和小孩都從窗口伸出頭來，拍手鼓掌表示歡迎擁護攻打聯司，說明聯司非打掉不可，我看到這個情況很高興。¹³³

1970年，毛澤東接見王洪文時，再一次談起砸聯司之事，毛澤東對當年這場勢不兩立的大武鬥是肯定的。毛澤東說：

看了你們的電影，實際是電視片，你們打了個勝仗，穩定了上海的形式(應為「局勢」—筆者注)。¹³⁴

在另一個場合談到武鬥時，毛澤東甚至對各地報上去的死亡人數不以為然，一次會議上：

附帶又講到武鬥問題，主席講：各地報上武鬥的情況，死傷多

131 這是王腓利告訴筆者的。筆者1989年8月12日對金祖敏訪談，金祖敏也說到張春橋告訴他們毛主席原來打算接見他們的。

132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2009年3月21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133 轉引自陳阿大1978年12月22日。

134 王洪文1980年6月26日審訊筆錄。這個筆錄是文革研究專家王年一1990年3月20日親筆抄寫寄給筆者的。括弧中的字是原來就有的，可能是王年一的加注。

少，講得都很嚴重。武鬥有，但查下來都沒有那樣嚴重，好像過去虛報災情，好多領糧食一樣，好得到支持。¹³⁵

毛澤東反對武鬥，但當他的文革主張和支持者受到威脅時，他也不反對衝擊一下對手。

小結

從聯司和東方紅的早期軌跡，可以看出文革前的人際關係，是怎樣被文革初期的政治動員梳理出派別意識。這是文革初期派別形成的又一模式，即派別意識不只由文革前與主流政治的親疏，而且也由人際關係的親疏決定。而以後，政治因素又不斷激化着派別的對立。在上柴廠，幹部問題是兩派群眾組織矛盾的開端。對幹部的爭奪，實際就是對政治資源和話語權的爭奪。幹部問題是奪權的關鍵，正是奪權和對於幹部的評價，激活造反派組織的欲望以及組織之間的分歧。誰都希望奪得這個能夠顯示自己組織正確的至關重要的政治資源。

除了對幹部的評價，聯司和東方紅爭論不休的，是誰才算真正的造反派；因為只有具有了這個革命名份，才能夠具有在文革新政權中參政的資格。這是中國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文化傳統，所以必須不斷進行誰是打天下者的鑑別。對文革來說，打天下的是「老造反」。不過，對於究竟如何區分造反派和老保，各方標準不一。在聯司和東方紅的爭執中，聯司一方認為東方紅是老保，理由是東方紅成員中黨團員和基層幹部居多，這是以與文革前主流政治的親疏劃分「保」與「造」。東方紅抨擊聯司是老保的理由，是因為聯司中有一個組織曾經參加過

135 《徐景賢同志傳達中央文革宣傳組會議精神》，這是葉昌明 1967 年 5 月 23 日至 7 月 24 日的工作筆記中 6 月 27 日的內容，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赤衛隊，這是以文革初期的政治表現劃分「保」與「造」。而全向東認為東方紅是老保的理由則又不同，他認為工總司和市革會已經成為「新的資產階級代表」，東方紅與他們關係密切，所以是老保。這是以與文革中主流政治的親疏劃分「保」與「造」。

整個反對聯司和支聯站的過程，反映出文革對上海造反派角色身份轉換的要求。1967年一月奪權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建立，是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等秩序和權威的恢復和重建。因奪權而成為或即將成為各級領導的造反派們，身份的轉換要求責任的轉換。此時文革對造反派的要求，已經從1966年文革動員時期的「炮打」、「火燒」走資派，轉為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員會」。於是，一月革命前，衡量革命派或者左派的標尺是「造反」還是「保皇」；造反派是文革的動力，必須大力支持；保守派是文革阻力，不被允許存在。但是一月革命以後，衡量革命派的標尺因文革新秩序的建立而改變，以是否維護文革新政權、新秩序為標尺。可是聯司和支聯站卻沒有悟出這個變化。他們爭奪誰是名份最正宗的革命派，但標尺還是「造反」與「保皇」，還在為「造反派」名份而糾纏不休，全然不顧他們所反的對象不再是「走資派」，而是文革中建立的新政權；全然沒有覺察文革話語已經改變，革命派的標準已經變化。聯司指責東方紅是老保，既然是名不正言不順的老保，就沒有存在權利；市革會支持老保東方紅，所以市革會也必須改組。他們挑戰文革新秩序，挑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權威，以為只要造反就必然革命，必然是文革原動力，必然應該掌權，根本沒有想到這種原教旨主義式的造反觀念，已經使自己成為文革發展的新阻力。

聯司和支聯站將一月革命前造反派「炮轟」上海市委的口號「上海必須大亂」，稍作修改，重又拿出來作為自己的口號：「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這是已經成為文革強勢集團的

工總司等最不能接受的。用《工人造反報》上的話來說：過去亂，是亂了走資派，現在再要亂，就會亂了自己。反映了已經躋身上海主流政治的工總司等造反派們，對不同階段的秩序的態度。

砸聯司是上海文革中規模最大的一場武鬥。和外地死傷無數的武鬥相比，上海的這場大規模武鬥要克制得多，武鬥當場沒有發現死人。而且，這場武鬥與外地同一時期發生的武鬥相比，還有一個顯著不同，就是沒有動用槍枝彈藥。上海幾次著名的兩派衝突，最初1966年12月底的康平路事件，只是拳腳相加；以後包括這一次上柴廠的大武鬥，最多只是以長矛、鐵棍、彈弓、燃燒瓶和高壓水龍為主要武器，殺傷力較小。這一方面是因為上海地域文化所特有的上海人謹慎小心的性格；另一方面，也與駐上海軍隊沒有太深介入上海地區文革有關。上海地區的矛盾都由張春橋表態定奪是非，軍隊對上海的是非沒有發言權。向上柴廠派軍宣隊，是上海市革會派出；軍宣隊進廠後的傾向，實際是市革會的傾向，代表的是市革會，而不是駐滬三軍。這使駐滬部隊領導部門，與上柴廠的兩派都拉開了感情距離，避免了直接介入，也避免了武器流入民間的可能。

在全國一片武鬥烽煙甚至真槍真炮戰爭之際，砸聯司武鬥，卻是上海文革中最後一次大規模衝突。上海的主流造反派在支聯派還沒有真正形成全市性統一派別時，便抓了主要頭頭，繼而砸了上柴聯司。砸聯司武鬥的兩個月之後，除了郊縣和極個別工廠、學校，上海的兩派衝突類型武鬥基本平息。這為上海文革局勢的穩定，起到決定性作用，上海就這樣以穩定的局面，成為全國文革的樣板。

但是，這樣的穩定卻是以巨大代價換得。這個代價，不僅是兩派群眾的大量傷亡，不僅是上柴廠廠房設備財物的嚴重損壞，而且更是對本已混亂的文革理念的徹底摧毀。造反派之所以成為造反派，從本質上說，就是反權威，自由言論，不盲

從當局的輿論導向，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而他們最初的造反，實際上就是爭取言論和結社自由。但是，現在他們自己也開始壓制別人的言論和結社自由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已經脫離了當初造反的本義。當時的體制不容對立派存在，造反派不可能擺脫那樣的環境；這些剛進入主流話語的造反派們，缺乏對制度的呼喚意識，當自己的權威遭到挑戰，他們也如當初整他們的幹部們那樣堅決反擊。在這方面，工總司的造反派們早有端倪。從對待赤衛隊、紅工司、二兵團，一直到對待聯司，都是道不同就相砸，動輒宣佈對方是「非法組織」；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粗暴激烈。他們對幹部，對反對文革者也是動輒批鬥。就這樣，他們重複「資反路線」曾經對待自己的方式，封死了從社會制度或社會關係層面進行哪怕是些許改變的可能，文革徹底進入死胡同。而他們直到最後被真正「秋後算賬」，也許還沒有對自己當初與「走資派」同樣專橫的行為有所反思和醒悟。

砸聯司事件也顯示造反派組織之間，沒有雙贏，只有你死我活。每一方都必須不斷證實自己的正確及對方的錯誤。因為一旦失敗，帶來的結果是全盤皆輸，不只是自己這派組織的潰滅，而且更是組織中每個個人，尤其是領導成員的徹底垮台。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文化傳統，又一次在這裏發揮影響。這也是文革前階級鬥爭理論長期教育的結果，只講如何「堅持真理、堅持原則」，不講如何妥協。在這種文化教育下，只知鬥爭，不知妥協，不知如何談判。沒有了上級權威的調停，雙方根本不知如何互相退讓一步。只要有分歧，一定都是真理之爭，都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聯司和支聯站拒絕任何談判和妥協，本來有可能用和平方式解決的矛盾，就這樣成為死結，除了武力相砸，再沒有別的出路。這也是文革武鬥不斷的又一原因。

第二十三章

4.12 炮打 來自軍隊的警告

張春橋未出席大會引猜測

1967年砸聯司後，到1968年初，上海的文革新秩序逐步恢復和鞏固。卻不料平地又起風雷，4月12日，上海發生第二次炮打張春橋的事件，以後被稱為4.12炮打事件。

1967年1月28日的「炮打張春橋事件」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特急電報壓下去。當時人們不知那份電報是毛澤東親自所為，還以為只是中央文革小組的自保措施。懾於中央文革小組的強大威信，這場炮打很快平息。但對張春橋的懷疑和反感始終在地下潛行。張春橋陰鬱的個性，讓許多人不喜歡。1.28炮打後，他一面說不予追究，一面卻是許多人被批鬥關押，郭仁傑自殺。這些都加深着人們對張春橋的反感。尤其紅革會、炮司和紅三司，總部雖然都被整得一蹶不振，但各校負責人的內心從來沒有真正服氣過，任何對張春橋不利的傳言都會令他們高興。炮司和師院紅革會都曾派人北上搜集張春橋的材料。此外，軍隊內部許多人也對張春橋和江青不滿，1967年的「二月逆流」，主要就是針對他們倆，後來雖被毛澤東壓下去，但反感情緒始終存在。

而此時，曾經是真理化身的中央文革小組出現了裂痕。1967年7月，王力赴武漢處理7.20事件後，英雄般地回北京，周恩來和江青等一大批決策層領導人親自赴機場迎接，接着又召開百萬人大會，聲討武漢的群眾組織百萬雄師，也是對王力的

支持。但僅僅四十天後，王力就被隔離審查，接着被關押。隨後不久，中央文革小組的另一個成員關鋒也被「請假檢討」。戚本禹關得晚些，然也在四個月之後，1968年1月，被中央宣佈「請假檢討」。此前儘管已經有陶鑄、王任重等好幾人出局中央文革，但那都是不被江青信任的老幹部；而王力、關鋒和戚本禹，都是堅定的文革派，是深受江青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組核心人物。短短幾個月，三人相繼被打倒，解構了人們對中央文革小組核心成員地位牢不可破的印象。1967年1.28炮打後始終潛伏不散的對張春橋的懷疑情緒，重又匯攏聚集。

種種不利於張春橋的傳言，又在悄悄蔓延。傳得最沸沸揚揚的，還是1.28炮打時的那兩個：「狄克」就是張春橋；霍士廉以黨籍擔保張春橋是叛徒。甚至還有其他：「中央兩報一刊的記者在復旦開座談會，說張春橋是叛徒，（張春橋）已經撤職了」，「張春橋找主席承認了自己有變節行為，主席聽了很生氣，已決定撤銷張春橋中央文革副組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職務」，等等。¹「叛徒」的傳聞也傳到張春橋耳裏。一天晚上康平路小禮堂開會時，張春橋問前來參加會議的同濟東方紅負責人陳敢峰，最近有什麼社會動向？陳敢峰直言：「有人散佈謠言，說張春橋是叛徒。」張春橋十分惱火，說：「我從來沒被捕過，怎麼會是叛徒啊？」他又說：「我過去太寬大了，今後要是再聽到誰講這種話，我就不客氣了。」²

無獨有偶，1968年3月間，張春橋連續缺席北京的兩個重要會議，又為懷疑增加了佐證。1968年3月24日，軍隊萬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幹部緊急大會。林彪在會上宣佈，經毛澤東和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小組討論決定：撤銷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三人的職務。會上周

1 這些傳說引自工總司1968年4月12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2 本章內容，除注明外，主要來自徐景賢2003年《十年一夢》、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

恩來以及江青、陳伯達、康生，包括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講了話。散會前，凌晨1時左右，毛澤東突然出現在主席台，接見全體與會者，彰顯會議的重要性。但張春橋沒有出席這個會議。此時他正在南方：3月23日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成立，3月24日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張春橋前去這兩個省祝賀並講話。但新華社的新聞統發稿上，只提張春橋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身份，卻不提他的南京軍區第一政委身份以及更高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身份。這是張春橋自己在新聞稿送樣時，將這兩個身份刪去的。張春橋後來對徐景賢解釋說，他這樣做是因為考慮到全國各省成立革委會，都沒有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去人參加，如果他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身份參加，以後其他省市也都會要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³張春橋還說：「中央沒有授權我以中央文革的身份去祝賀，我是以兄弟省市負責人身份去的。」

更讓人起疑的，是3月27日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大會，會上宣佈毛澤東對楊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的撤職決定。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小組，除張春橋外的全體成員，以及軍隊的葉群、黃永勝、吳法憲等全部出席。姚文元也參加了，張春橋卻沒有參加。⁴尤其讓人覺得蹊蹺的是，這個大會的內容，張春橋居然還是通過上海的徐景賢了解的。3月27日大會上，周恩來、江青、康生和陳伯達都作了關於批判楊、余、傅的講話。張春橋沒參加這個會議，上海無從得知中央動向，徐景賢非常着急，馬上通知《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負責人艾玲，無論如何要去會場記錄下大會講話，用飛機送回上海。第二天，徐景賢在上海展覽館召開市革會擴大會議，只等大會資料一到，就傳

3 這個解釋引自《1968年4月12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紀要》中的徐景賢講話，《長征通訊》，上海機床廠四車間革委會1968年5月23日編印，藏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4 徐景賢在《十年一夢》中說是因為中央沒有通知張春橋參加這個大會。

達大會精神。等在機場的秘書隨時與徐景賢通電話，但北京航班遲到。後來終於等到，秘書拿到艾玲手寫的大會記錄，直奔展覽館，徐景賢向大家傳達後，馬上將大會記錄送張春橋。這件事立即引起猜測：北京的大會信息，竟然要徐景賢通過《文匯報》北京辦事處去弄來，為什麼這麼重要的大會，身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張春橋卻不去？媒體的封閉，使老百姓只能以報紙的露臉率猜測政治變化，對張春橋的猜測傳言四起。

以往對張春橋的不滿，被種種猜測匯集、加強和放大。這股情緒，被游雪濤捕捉到，他寫了個簡報，題目是《條頓劍在行動》，借用一部曾經放映過的東德拍攝的反映德國法西斯復活的電影紀錄片名字，提請注意第二次炮打正在醞釀。

二軍大「紅旗」發端

第二次炮打，最初由第二軍醫大學發端；不久，上海的文匯報社也加入。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地處上海東端楊浦區的翔殷路，是軍隊院校，屬軍委的總後勤部管轄，不屬上海地方管轄。二軍大文革中形成兩派組織。一派是「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簡稱「紅縱」），是全國軍隊院校著名的八大造反組織之一。初期核心人物之一是陶鑄的女兒、二軍大學生陶斯亮，後來是錢信莎。他們可以直接與江青通電話，據邱會作回憶，錢信莎找江青的電話，甚至可以打到毛澤東的休息處。他們上揪軍隊總後勤及其他軍隊領導，將解放軍總後勤部鬧得天翻地覆。曾經連續四十天批鬥總後勤部長邱會作，將邱會作兩根肋骨打斷，兩臂的筋扭斷，頭部打得多處開裂。他們在上海也參與對上海市委的衝擊，是一月奪權時上海人民公社發起組織之一。1967年7月武漢事件之後，紅縱在上海刷出大標語「揪出上海的陳再道」，矛頭直指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

國。另一派是「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紅旗戰鬥兵團」（簡稱「紅旗」），在軍內屬於被視為老保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簡稱「三軍無革派」），在上海也與眾造反派組織的關係比較疏遠，而且對張春橋非常反感。紅縱貼出「揪出上海的陳再道」大標語，紅旗便在康平路大院門前一夜靜坐，要求張春橋回答：「揪軍內一小撮」是否算反革命，既對着紅縱，又對着張春橋。最後還是王洪文出面勸說，紅旗的人第二天才漸漸散去。紅縱和紅旗兩派矛盾很深，曾經有過武鬥。上海地區武鬥雖不少，但都沒有動武器，但二軍大的武鬥是上海地區僅有的兩個開槍武鬥的單位之一。

楊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被撤職後不幾天，1968年3月底，二軍大紅旗在市革會門前、康平路、南京西路成都路口的長征醫院門前，貼出大幅標語：「打倒楊、余、傅在上海的黑後台！」後面的署名是「三軍無革派」。大標語雖然沒有指明「黑後台」是誰，但弦外有音。明眼人都看得出，在上海貼這樣的口號，實際就是針對張春橋。而紅縱則在這些大標語的下面寫上小字：「凡是炮打中央文革的人絕沒有好下場——二軍大紅縱」。

4月3日，市革會召開全市群眾組織大會，馬天水、王承龍在會上點名批評二軍大紅旗。會後，文匯報社的邵傳烈根據市革會精神，連夜組織質疑這些口號的「群眾來信」《迎頭痛擊右傾翻案逆流》，並親自撰寫「編者按」，發表在4月5日的《文匯報》上，不點名地批判二軍大紅旗：「近日來，發現在某些陰暗的角落裏，又在積聚一股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他們在製造這個那個『為什麼』之類的政治謠言，刷標語，開黑會，以『揪黑後台』為名，瘋狂地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妄圖分裂中央文革」。

《文匯報》的「群眾來信」和「編者按」刊登之後，立即引起衝突，許多組織前往第二軍醫大學，要強行進入衝砸紅旗。事情驚動遠在北京的周恩來，4月6日晚上，他給在上海

的張春橋打電話，詢問衝擊二軍大是怎麼回事情。第二天，在康平路二樓會議室召開的市革會常委會議上，張春橋一進門就坐在廖政國對面，卻對着朱錫琪說：「文匯報不要保我，你們(指參加會議的常委)都不要保我，保我幹什麼，我又不是曹荻秋！」接着，他又說：《文匯報》寫了編者按，有些組織就去衝擊二軍大，要勸他們不要去。昨晚總理打電話給他詢問此事。張春橋要廖政國去做二軍大紅縱的工作，要二軍大兩派盡快實現無條件大聯合。張春橋說：紅縱到處衝衝殺殺，有衝對的，也有衝錯的；紅旗到處保，有保對的，也有保錯的，你們警備區要做做工作，促使兩派坐下來談。廖政國當場反問他：紅縱哪些是衝對的？問得張春橋不回答。⁵

就在紅旗刷出標語之際，另一股反張春橋的勢力也在悄悄行動。為首的是文匯報社的朱錫琪。朱錫琪原是《文匯報》的體育記者，1967年初的奪《文匯報》權行動時，他是關鍵人物。市革會成立後，他擔任市革會政宣組長，同時又是市革會領導成員。那時市革會領導成員除了張、姚，主要是王少庸、馬天水、徐景賢、王承龍、王洪文，他們可以說是上海市革會的核心人員。當時張春橋經常在興國路招待所召集他們開會，用張春橋的話說是「開小會」。⁶很多時候，朱錫琪也被通知參加，因此可以說，朱錫琪當時的地位排在他們之後，算是比較高的。這些「小會」，王承龍讓朱玉佩也參加，但她是做記錄的，不參與討論。朱錫琪幾十年後，回憶自己的這段經歷說，他原來對身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張春橋很信任，認為他是毛主席身邊的人。但正是參加了這些小會，和張春橋近距離接觸，「我慢慢地識得廬山真面目了」。

5 朱錫琪《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反革命罪行》，載於文匯報社調查組1977年3月15日《材料匯編》第6期。

6 《我與「四一二」炮打張春橋事件》，朱錫琪口述，金光耀、金大陸訪談，孫路遙整理，載於《炎黃春秋》2011年第9期。

朱錫琪對張春橋的看法，最初起於張春橋對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的態度。1967年初，全國衝擊軍隊之風盛起，尤其7月武漢事件之後，「揪軍內一小撮」席捲全國。但不久，因毛澤東反對而中止。廖政國要求對捲入揪軍內一小撮的二軍大紅縱人員拘留審查，遭到張春橋反對。⁷張春橋當時已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有否決權。在一次三軍領導都不在場的市革會會議上，朱錫琪曾親耳聽到張春橋說：廖政國打報告給我，說要給紅縱辦學習班，我沒有同意，因為他廖政國自己也有錯誤嘛。⁸朱錫琪認為，張春橋這是包庇紅縱衝擊軍隊的行為。

1968年春節，市革會在市革會禮堂舉行擁軍愛民活動，會議結束時，朱錫琪見張春橋握着身邊廖政國的手，一起舉起來高呼軍民團結的口號。第二天晚上，張春橋在興國招待所，宴請馬天水、徐景賢、王洪文、王少庸、朱錫琪等，喝茅台酒。張春橋在這個都是「自己人」的小會上，說的話不一樣了：「擁軍愛民大會是開了，我們的頭腦冷靜些，人家是不是支持我們?!」王洪文立即跟着揭發廖政國，說他曾經將陳丕顯藏在青浦縣的軍營裏，說他在公、檢、法系統支左時，支的都是老保。張春橋說：「相信黨中央，他(廖政國)的問題終將解決，但我們不能公開提『揪軍內一小撮』。王、關、戚的錯誤就在於此，只能以自下而上『端出來』的辦法解決」。朱錫琪當時覺得，張春橋昨天還和廖政國手拉手，今天卻在廖政國背後說要把他『端出來』，這不是兩面派嗎？他看不慣。⁹另外一次，是

7 朱錫琪《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反革命罪行》。

8 李遜2012年12月6日對朱錫琪的訪談。

9 朱錫琪2007年4月《重談「4.12」反張春橋事件經過——兼答徐景賢的不實之詞》。原件在朱錫琪處。但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看了朱錫琪的回憶錄，2013年對鄭重等人說，張春橋從來不請人吃飯，而且按照張春橋的性格，也不可能這樣明顯地議論廖政國這樣敏感的事情。這是鄭重向筆者轉述的。

紅旗那次在康平路靜坐後沒幾天，在一次康平路小禮堂召開的全市群眾組織負責人會議上，張春橋講話時突然站起來，鐵青着臉，用手敲着桌子說：「有人不承認我這個政委，但你得承認我這個！」他指指自己軍裝上的領章帽徽，「你不要以為你的後台硬，我還有毛主席吶！」朱錫琪當時在場，他覺得，張春橋顯然是指廖政國。¹⁰

朱錫琪原來對二軍大紅縱印象比較好，認為他們是造反派組織，所以多次讓《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他們的文章。1967年冬，二軍大紅縱在上海組織三軍演出，要《解放日報》報道演出消息。但事先朱錫琪已經得到上海警備區軍代表徐光輝的告知，說紅縱在北京到處衝擊部隊，抓「一小撮」，而且北京的三軍文藝會演，引發軍隊藝術團體兩大派武鬥，所以上海三軍不支持這樣的演出。朱錫琪於是佈置不報道這個演出，紅縱便在解放日報社門口接連幾天抗議，還批鬥報社負責人。雖然紅縱最後沒有遂願，但朱錫琪對他們的印象就此不好，覺得他們無理取鬧。這也是朱錫琪後來能夠接受二軍大紅旗觀點的原因。

北京傳來的消息

朱錫琪對張春橋的懷疑，還來自他認為上海和北京形勢的差距，這是他對照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當時稱「北辦」)送來信息得出的判斷。

北辦的負責人仍然是艾玲，她在批判《海瑞罷官》的文革準備時期領導北辦，為毛澤東等搜集了大量北京文化界動態，艾玲因此被認為對文革有功，得到江青和張春橋的讚賞。文革初期，艾玲也被揪鬥批判，張春橋保了她。1967年初，市革會

10 朱錫琪 2007年4月《重談「4.12」反張春橋事件經過——兼答徐景賢的不實之詞》。原件在朱錫琪處。

在展覽館咖啡廳，召開全體委員會議，張春橋在會上說：「我在上海只保兩個人：于會詠和艾玲，他們是對革命樣板戲和批判《海瑞罷官》作出過貢獻的」。艾玲於是馬上被「解放」，並作為老幹部代表，成為《文匯報》領導人之一。但因為全家在北京，所以她選擇繼續留在北京辦事處工作。

1967年下半年，正是各種思潮在全國泛起之時，到1968年初，全部被以「極左」名義遭到批判。上海各報包括群眾組織的報紙《工人造反報》、《紅衛戰報》等，也批判上海地區中學生串聯組織「中串會」的文章《一切為了九大》。但北辦對這樣的批判有意見，認為批極左是整了老造反，說當前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反右，上海的報紙卻老是在「反派性」，反「山頭主義」，是打擊老造反。¹¹ 1968年3月24日，北京軍隊的那個緊急大會當夜，邵傳烈根據北辦傳來的林彪講話精神，為《文匯報》寫了一篇反右傾的社論。但社論送張春橋審查後，張不同意刊登，邵傳烈很不滿，當晚在康平路的會議上提意見，說上海市革會太右，跟中央跟得不緊。¹²

之後的一個「小會」上，徐景賢批評說，文匯報社的一些人，最近怎麼與北辦打得火熱，張春橋接着說，《文匯報》有成績，但要當心摔跟頭。說得參加小會的朱錫琪覺得發生了什麼事情，隔手直接給北辦的周俊全打電話，但是向來心直口快被稱為「周大炮」的周俊全，電話中的語氣卻是欲言又止，除了反復強調要上海方面「反右傾」，「聽黨中央的話不會錯」，不肯再說什麼。朱錫琪很惱火，問他出了什麼事情，周俊全吞吞吐吐地回答說：「康生那裏有個專案組」，「老朱，我不能再說下去了，再說下去就要犯錯誤了」。朱錫琪不滿意周俊全的回答，就讓他叫艾玲聽電話。他沒有對艾玲說上海二

11 朱錫琪 1968 年 4 月 15 日的交代，《文匯報》社 1968 年 4 月印。原件藏《文匯報》社，以及《我與「四一二」炮打張春橋事件》。

12 同上。

軍大貼針對張春橋大標語的事情，只是直截了當地問她：張春橋究竟有什麼問題。艾玲的回答很策略：在中央沒有表態之前，張春橋現在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¹³ 艾玲還告訴說，康生在會上講「楊余傅有後台」，不知是指誰。

前文提及的3月27日北京撤銷楊、余、傅職務大會，大會結束後，艾玲又打電話去上海，對《文匯報》的周國榮說，現在要揪楊成武後台，各種傳說很多，有些事情涉及張春橋，有些學生正在整理張春橋的材料。¹⁴ 艾玲的這個電話更是使他們對張春橋，從原來的不滿，上升為懷疑。本來，張春橋沒有參加北京3月24日以及3月27日大會，就已經使朱錫琪心生疑竇，並認為張春橋在出席江蘇、浙江省革委會時，沒有使用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身份「不正常」；而且，「聽徐景賢同志說，對宣傳報道春橋同志要向姚文元同志請示，姚文元又兩天不接電話」。種種蛛絲馬跡，朱錫琪覺得張春橋的疑點越來越多。甚至上海召開二十萬人打倒楊余傅大會，他也有懷疑：為什麼大會人數比北京多一倍，這不正常。¹⁵

朱錫琪以試探性口氣，與邵傳烈談論對張春橋的看法，邵傳烈態度明確，說他保張春橋是保定了。朱錫琪於是擔心邵傳烈會去向徐景賢匯報。而不久後，在興國路招待所的一次「小會」上，聽徐景賢、王承龍口氣，邵傳烈似乎已經匯報了他對張春橋的懷疑態度，張春橋也說要當心不要栽跟斗。這令朱錫琪覺得張春橋是對自己施加壓力。

4月7日那次會上，張春橋說起周恩來給他打電話，詢問衝擊二軍大紅旗之事，朱錫琪聽了覺得，一定是有人向周反映了。他回報社就讓記者鄭重去調查二軍大紅旗的背景，鄭重回

13 朱錫琪 2007 年 4 月《重談「4.12」反張春橋事件經過——兼答徐景賢的不實之詞》。

14 朱錫琪 1968 年 4 月 15 日的交代。

15 同上。

來說，聽說周恩來有個養女是二軍大紅旗的。這個消息讓朱錫琪覺得，周恩來是站在紅旗一邊的。¹⁶

4月7日還有一條消息似乎證實朱錫琪的懷疑。他看到一份小報(據他後來回憶，好像是《新北大》)，刊登周恩來對群眾組織的一個講話：「北京有北京的長處，上海不是一一切都帶頭。前不久，上海提出『圍剿派性』，『圍剿』兩字不恰當」。這份小報同時還刊登了江青的一個講話：「上海不是一一切都帶頭，要有科學分析，不然會盲從。大聯合是上海提倡的，但強調無條件大聯合。而主席最近指示：『在革命原則上實現大聯合』」。小報上的江青講話還說：「王、關、戚是什麼東西？是『小爬蟲』，我看還是『變色龍』」。朱錫琪後來回憶說，他看了這個總理和江青講話，直覺就是：中央領導同志已經表態了，並且點出了上海的主要問題；尤其是江青的講話，「小爬蟲」、「變色龍」是誰？當然是張春橋了。¹⁷

朱錫琪的懷疑還有一條他認為很過硬的依據。1967年夏天毛澤東在上海時，曾經對上海的大學大聯合有段講話，文匯報9月25日，以《毛主席視察上海時作了極其重要指示》為題，刊登了這段講話：「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兩派是革命群眾組織，要無條件實現革命大聯合」。但是，10月8日《人民日報》又重新刊登毛的這段講話：「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只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重新刊登的講話與上海刊登的有所不同，最重要的，

16 朱錫琪《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反革命罪行》，載於文匯報社調查組1977年3月15日《材料匯編》第6期。朱錫琪所說的這個周恩來的養女是時任福州軍區後勤部長的龍飛虎的女兒龍書雅(霞?)，當時是二軍大「紅旗」負責人。龍飛虎曾任周恩來的警衛副官，他的這個女兒曾長期住在周恩來家，由周恩來撫養至上高中。

17 朱錫琪2007年4月《重談「4.12」反張春橋事件經過——兼答徐景賢的不實之詞》。

是去掉了「無條件」三個字。朱錫琪認為上海刊登的那段毛澤東講話，是在宣揚右傾的無條件大聯合，是「篡改毛主席最新指示，沒有經過毛主席審查就私自登出來，造成了原則性錯誤」。他後來回憶說，這是他們當時「反張春橋的一條重要依據」。¹⁸

4月10日，朱錫琪又接到艾玲打來的電話。艾玲這些天在北京的幾所大學，聽說了霍士廉以黨籍保證張春橋是叛徒那個傳說。晚上，她用上海專門為她申請安裝的紅色保密電話，告訴朱錫琪這條傳聞，而且說，自己的丈夫在北京看到一些中央的絕密文件，文件後的收件人，中央文革的其他人都有，唯獨缺張春橋。艾玲還告訴朱錫琪，駐北京辦事處的周俊全也認為張春橋有問題。這下朱錫琪的懷疑更堅定了：

我想艾玲是張春橋同志保出來的，又在北京，情況了解多，能夠掌握中央精神……而周俊全在一月革命中是鐵杆報張春橋同志的，現在對春橋同志提出懷疑，大概他們一定有什麼來頭的。……

不久北京又有關總理批評上海和大膽謹慎、大膽懷疑思想傳來，自以為找到了理論依據，就到處散佈懷疑一切的種種反動觀點，還以為是緊跟中央精神。¹⁹

文匯報社成立炮打戰鬥隊

4月10日晚上，朱錫琪和觀點相同的同事，成立了戰鬥隊，取名「為什麼」。這個名字是朱錫琪起的：「毛主席不是說過，凡事都要問個為什麼嗎？我們只是提出問題就可以了，答

18 據朱錫琪對筆者回憶，後來徐景賢告訴他說，第一次刊登毛澤東的那個講話，是他自己決定的，事先沒有向張春橋匯報。

19 朱錫琪 1968 年 4 月 15 日的交代。

案讓看傳單的人自己去找。²⁰ 戰鬥隊共九人，都是文匯報社的職工。邵傳烈本來不贊成反張，此時在種種信息和其他人的決心前，也改變了看法。

當晚，朱錫琪在報社召開緊急會議。朱錫琪在會上提出了一連串的「為什麼」：為什麼上海召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新華社不轉載？為什麼《人民日報》幾個月不轉載上海報刊的社論？為什麼張春橋沒參加北京3月27日的大會？為什麼張春橋參加江、浙兩省革委會成立大會時，新華社的報道中沒有提到他在中央文革和南京軍區的職務？張春橋原在石家莊報社當社長，楊、余、傅都是晉察冀那個山頭的；張春橋在市革會擴大會上呼叫打倒楊、余、傅時，為什麼緊張到把『傅崇碧』叫成『邱會作』？《解放日報》、《文匯報》都是毛主席支持的，為什麼張春橋提出要合併成一家？為什麼陝西省委書記霍士廉願以黨籍擔保張春橋是叛徒？等等。朱錫琪還提出，張春橋蓄意要打倒廖政國，就是「揪軍內一小撮」在上海的具體表現，是張春橋的首要罪行。

朱錫琪先擬了七個為什麼，周國榮修改後，增加為十個為什麼，以「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為什麼戰鬥隊」的名義，作為《宣言》散發。這是1967年初他們奪文匯報社權時所用名字，以示對自己以往造反精神的傳承。宣言最後以口號結束：「誓死保衛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此時的上海，這是個曖昧的口號。以往此類口號都是「誓死保衛以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這裏暗示性地去掉了張、姚。這些口號原來打算4月11日貼在報社內部，但朱錫琪覺得光靠傳單不夠，要在報紙上表態。第二天，4月11日，《文匯報》第一版發表社論：《堅決打擊右傾翻案的妖風》。社論提出：「現在，有人竟認為『上海的情況特殊』，認為『我們這裏的

20 朱錫琪 2007年4月《重談「4.12」反張春橋事件經過——兼答徐景賢的不實之詞》。

主要危險不是右傾翻案』，這完全是錯誤的」。這段話是朱錫琪特地加進去的，暗示張春橋在上海有問題。

4月11日晚，正在印傳單時，北辦的周俊全又來電話，推薦《北京日報》4月7日的一篇社論：《徹底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撲》，其中有這樣的話：「以極『左』的面貌出現，幹了許多壞事的中國赫魯曉夫的黑爪牙、『小爬蟲』垮下去了！現在，妄圖為『二月逆流』翻案，搞反革命復辟的幾個『變色龍』也統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朱錫琪認為，這段話和前幾天他看到的那份小報上周恩來、江青的講話一致，都是針對上海的。本來，朱錫琪就感到「僅僅散發一張傳單，份量不夠，既然要反張就得反到底，一定要以報紙擴大影響」。²¹於是，他決定將這篇社論轉載在第二天的《文匯報》上。朱錫琪通知了徐景賢，徐景賢沒有反對。但掛斷電話後，他立即打電話給朱永嘉、王知常和蕭木等，要他們馬上討論。朱永嘉等一致反對轉載。於是徐景賢又給朱錫琪打去電話表示反對。²²徐景賢後來說，這是因為他當時覺得，從中央幾個領導講話中看不出有揪楊、余、傅後台的動向。²³但如此反而更讓朱錫琪覺得：這是心虛的表現。

朱錫琪下決心炮打張春橋。他當即和報社的周國榮、邵傳烈，在辦公室最後一次商量炮打之事。邵傳烈有些擔心，因為1967年的1.28炮打結果很慘，紅革會、炮司和紅三司，三大紅衛兵組織全軍覆沒；郭仁傑後來也因為與紅革會剪不斷的關係而自殺。但朱錫琪和周國榮決心已定，表示：「毛主席身邊有這樣一個人，我們不放心」，「像這樣的叛徒在毛主席身邊行嗎？」邵傳烈也就不再反對。然後，由邵傳烈擬出五條口號，

21 同上，《重談「4.12」反張春橋事件經過——兼答徐景賢的不實之詞》。

22 吳瑞武 1977年3月18日《我在寫作班工作期間的揭發交待》，上海揭批「四人幫」辦公室編。

23 徐景賢 2003年《十年一夢》。

準備也刊登在第二天的《文匯報》上。為了怕走漏消息，報紙大樣出來後，他們讓印刷廠長楊瑞根將大樣鎖起來。²⁴ 在出報紙的同時，《十個為什麼？》也印成大張傳單。不過這一切，朱錫琪等都沒有告訴北辦的艾玲他們。

此時已經是4月12日凌晨。朱錫琪、周國榮、邵傳烈，還有記者鄭重等，帶着傳單，坐了兩輛車去二軍大。朱錫琪他們原來就和紅旗關係比較好，曾經為市革會冷淡紅旗抱不平，還幾次在市革會會議上提議吸收紅旗參加市革會會議和工作。但這次，二軍大紅旗的紅衛兵們沒讓他們進門。出來接待他們的一個女學生說：「部隊不參與地方的運動，對不起，我們也不收你們的傳單。」她對這些前來結盟者不表態，很冷淡。對於她的話朱錫琪等並不感到意外，因為前幾天《文匯報》上還有編者按批評二軍大紅旗，今天忽然來支持他們，人家不得不提高警惕。他們猜測，這個女學生可能就是總理的養女。²⁵

之前在去二軍大的路上，他們經過同濟大學，往同濟大學也散了些傳單，還貼到南京路。後來據說同濟東方紅的陳敢峰看到傳單後，馬上給徐景賢打電話報告，在這次炮打中又一次立功。

4.12炮打

4月12日一早，還沒到上班時間，許多人已經圍在外灘市革會大樓前。那裏貼着二軍大紅旗等刷出的大標語：

打倒彭、羅、陸、楊，揪出楊成武黑後台！

打倒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24 朱錫琪、金光耀、金大陸、孫路遙：《我與「四一二」炮打張春橋事件》。

25 朱錫琪 2007 年 4 月《重談「4.12」反張春橋事件經過——兼答徐景賢的不實之詞》。

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

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江青同志！

揪出四·六鎮壓二軍大紅旗黑後台！²⁶

大標語後的署名，都與軍隊有關：「二軍大紅旗」、「空軍二機校無產階級革命派」、「東海艦隊文工團無產階級革命派」、「海軍體工隊無產階級革命派」、「空軍政治學校無產階級革命派」、「海字166部隊無產階級革命派」，等等。還有好些個組織是國防科委在上海的研究所，例如708研究所、711研究所。²⁷ 外灘附近的《文匯報》門口，以及附近的南京路上，也是人頭濟濟，那裏貼着文匯報社「為什麼戰鬥隊」的《十個為什麼？》；還有大標語：「揪出楊、余、傅黑後台」，「狄克攻擊魯迅罪該萬死」，「打倒惡毒攻擊魯迅的狄克」，等等。

更讓人震驚的是，4月12日這天的《文匯報》，第三版以超過三分之一版面，在一個題為《無題》的標題下，只刊登了五條大號黑體字口號：

無題

誓死保衛毛主席！

誓死保衛林副主席！

誓死保衛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誓死保衛中央文革！

誓死保衛江青同志！

以口號作為幾乎半個版面的內容，是1949年後任何正規大報紙從未發生過的事。這五條口號沒有點明名字，不提張春

26 這些標語引自工總司4.12這天派人在南京路上等熱鬧地區抄寫標語後編的《情況匯編》，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27 同上。

橋，讓人們自己體會。在五條口號的下方，轉載了《北京日報》4月7日的那篇社論：《徹底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撲》。對張春橋的第二次炮打就這樣開始。文匯報社的「為什麼戰鬥隊」和二軍大的紅旗，成為這次炮打的兩個中心。不過，和一年前紅革會的1.28炮打不同，這次行動，兩個中心始終打啞謎，不指名道姓。許多人去文匯報社詢問所指何人，朱錫琪他們一概不答，只說你們自己去獨立思考。

與此同時，南京路、人民廣場，還有復旦大學校園內，出現許多化名大字報大標語，措辭激烈，指名道姓。特別是南京路，不但牆上，連商店櫥窗上都貼着被貼滿，張春橋的名字被倒寫，還打上紅色的叉叉：

打倒張春橋！

揪出鑽進市革會的反革命兩面派張春橋！

打倒上海最大的反革命兩面派！

打倒在上海大樹特樹個人權威的野心家！

打倒大叛徒、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偽君子張春橋！

在上海搞獨立王國的人決無好下場！

堅決支持二軍大紅旗揪楊成武黑後台的革命行動，毛主席揮手我前進！

誓與楊成武黑後台血戰到底！

全市革命人民緊急動員起來，堅決打倒張春橋，誓死保衛毛主席！²⁸

人民廣場上刷着大幅標語「霍士廉用腦袋擔保張春橋是叛徒！」而在南京路，一份披露張春橋妻子文靜是叛徒的大字報前，人群擠得水洩不通。這張大字報還揭發說，張春橋的父親

28 工總司在1968年4月12日這天派人去復旦搜集動向後編寫的《情況匯編》。原件為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是惡霸地主，曾經在汪偽時期的警察局任過職，以後又在國民政府任過職，是漢奸、反動官僚。所有大字報都只署戰鬥隊名字，不署屬於哪個群眾組織。但事實上，一些「戰鬥隊」，就是一年前掀起1.28炮打的紅革會或紅三司或炮司的。例如一篇題為《緊急動員，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陰謀家張春橋》的大字報，署名「復旦大學新聞系立新功」。「立新功」其實就是復旦大學紅革會的核心組織。

復旦大學去年的那些炮打活躍分子，這次大都沒有公開行動。全市各高校的紅革會頭頭們，1.28炮打後的挨整還沒結束，這次只作壁上觀，不敢貿然行動。紅三司的安文江事先已被告誡不要輕舉妄動，他自己也不願捲入；二軍大紅旗派人找過他，他避而不見。炮司的核心人物胡守庸等，因1.28炮打之事，或正在挨整，或正躲避在外，一時來不及做出反應。不過，炮司的周谷聲在4月2日已經感覺到正在醞釀的炮打，用暗語寫信給出逃在福州的胡守庸，要他盡快趕回上海。²⁹ 至於中學生反對派中串會的骨幹們，因為《一切為了九大》之事，此時基本都被集中在上海教師進修學院內辦封閉式的「學習班」，與外界隔離，根本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工總司再保張春橋

這股炮打之風來勢兇猛，而且是軍隊和報社衝在前面，讓許多人覺得肯定有來頭。甚至對張春橋一向跟得最緊的工總司總部，也有人覺得這次炮打事出有因。

工總司辦公處的外灘總工會大樓，大樓外牆正在維修，搭着腳手架。早上，一群穿着軍裝者來到大樓外，爬上腳手架，往上面掛大標語：「誓與工總司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

29 《胡守庸小集團有關材料》，復旦大學「胡守庸小集團」專案組1970年3月編。

利在一起！」署名是「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³⁰

上午，王洪文召開工總司總部組長以上負責人緊急會議。王洪文首先講話，說對這場突然發生的炮打事件，每個人都要明確表態。

王洪文自己先表了態，說張春橋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炮打張春橋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他是堅決反對炮打張春橋的。還講，要不是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支持了工總司，怎麼會有今天的工總司，我們也早被打成反革命了。我們對張春橋是有感情的。要堅決保張春橋的。³¹

王洪文表示他不相信張春橋是叛徒。陳阿大在一邊悄悄問王洪文：「這個情況到底怎麼樣？」王洪文馬上回答：「怎麼你對張春橋也不相信，有懷疑了？提出疑問本身就是動搖懷疑！」金祖敏和《工人造反報》的王成龍揭發說，潘國平一早到《工人造反報》社去，講文匯報轉載了《北京日報》的文章，造反報也要轉載，正好金祖敏也到了那裏，不同意轉載。金祖敏發言後，又質問到會的潘國平，是否想利用造反報支持炮打？葉昌明接着追問潘國平是否到《文匯報》串聯過？³² 潘國平堅決否認。此時的潘國平已經失勢，在總部會議上，他只好跟着大家反對炮打。但事實上，潘國平確實找過朱錫琪。他還對《文匯報》記者倪說，張春橋可以懷疑。³³ 王腓利晚到了。會前，他碰到黃金海和張寶林等，他們都表示「吃不準」。王腓利在會上表示：「張春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我們都清楚，但是對他在歷史上的表現，我們可能也不太了解，再看看吧。」王洪文馬上反駁：「照你這樣的說法，我

30 葉昌明 1978 年 2 月 21 日《交代我在「四·一二炮打」中的一些問題》。

31 同上。

32 同上。

33 潘國平 1979 年 9 月 10 日。

們還要成立一個調查組，去專門調查一下張春橋同志嘍?!」王洪文接着斬釘截鐵地說：「我的態度很明確——死保！」³⁴

葉昌明等主張工總司要公開表態。王洪文說，他會前已同馬天水商量過，先不急於表態，靜觀情況發展。但要向工總司下面各聯絡站打招呼，關照他們千萬不能捲進炮打。王洪文說：「現在其他各組織都在看工總司的態度，只要工總司能穩住不動就好辦了，他們搞得再厲害也不怕。」³⁵總部作出決定：「不支持(炮打)、不表態、不反擊。」³⁶王洪文還佈置以工總司名義，給毛澤東等打電報。電報匯報了上海炮打張春橋的形勢，表示「我們萬份焦急，特向您老人家報告，盼望您老人家指示」。³⁷有人說，二軍大那條「誓與工總司團結、戰鬥、勝利在一起」的大標語，用意很壞，讓人以為工總司是支持炮打的。總部會議一結束，葉昌明立即佈置人，把二軍大那條大標語取下，翻過來在反面寫上：「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再掛上去。葉昌明又佈置加強總工會大樓的警衛，防止有人來衝擊。整整一天，總工會大樓大門照樣洞開，但大樓裏面戒備森嚴。葉昌明還馬上召開工總司各區、縣、局聯絡站負責人緊急會議，貫徹落實王洪文的指示。同時又佈置派人去復旦大學、南京路、外灘等地，搜集炮打情況，抄寫炮打標語和大字報。³⁸整個工總司總部內緊外鬆，密切注視炮打動向。

江青解救張春橋

4月12日清晨，還在睡覺的徐景賢，被寫作組的朱維錚從

34 李遜、金光耀、金大陸 2009年3月21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35 葉昌明 1978年2月21日《交代我在「四·一二炮打」中的一些問題》。

36 這個「三不」方公是王腓利對筆者回憶的。

37 工總司 1968年4月12日給毛澤東的電報。

38 葉昌明 1978年2月21日《交代我在「四·一二炮打」中的一些問題》。

床上叫醒，朱交給他一張傳單，是剛從外面馬路的牆上揭下來的。徐景賢看後，立即打電話向住在興國路的張春橋匯報。張春橋還未起床，徐景賢要張的秘書趕快過來取傳單。接着王洪文來電話，說工總司大樓那裏，有不戴領章帽徽的軍人在貼標語，但是這些軍人不肯回答他們是哪個部隊來的。

早上，主持市革會日常工作的王少庸，在康平路緊急召集市革會領導成員開會。因為聽說文匯報社是這次炮打的主力，王少庸還要徐景賢馬上將朱錫琪找來。王少庸給張春橋打電話，張春橋剛起床，王少庸說有緊急事情要匯報，並立即與王承龍趕往張春橋處。徐景賢去找朱錫琪，讓他來自己的辦公室。朱錫琪進來後，徐景賢拿出「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為什麼戰鬥隊」的那份傳單，問怎麼回事。朱錫琪回答：「我們傳單上又沒有點名，你看，傳單上有什麼人的名字嗎？」³⁹

徐景賢與馬天水趕往興國路。王少庸和王承龍已經在那裏。張春橋給人印象是鎮定自若，談笑風生，心中有底。眾人向張春橋匯報炮打動向，王少庸說：「別的都好辦，就是有穿軍裝的刷炮打的大標語，很麻煩」。張春橋問是哪裏的，王答：「估計是二軍大的，還有國防科委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王少庸要王承龍給姚文元馬上打電話，並關照要強調這次炮打有軍隊背景。姚文元接到電話顯得吃驚，說「我還不知道這個情況，我馬上向江青同志匯報」。一刻鐘後，姚文元回電說：「江青同志非常重視上海發生的事情，特地向張春橋同志問好。關於軍隊裏有人參加炮打的問題，江青同志說，她馬上找中央軍委辦事組李作鵬談這件事」。江青還說對張春橋要

39 本節資料主要引自徐景賢 2003 年《十年一夢》，以及朱錫琪 1968 年 4 月 15 日的交代。徐景賢的這個回憶說長「鎮定自若」。但王腓利看了書底稿後對筆者回憶，王洪文那些天曾告訴他：4.12 炮打時我遇到張春橋，張看上去很萎焉，對我說：「他們要炮打我，就讓他們炮打下去好了。」

保。眾人聽說江青出面保張春橋，都定心了。但徐景賢覺得只是江青和姚文元出面，力度似乎還嫌不夠，他知道，此事由張春橋自己出面不太方便，於是建議，是否向毛澤東和中央正式報告上海情況。張春橋沒反對，徐景賢當即起草電報。王少庸再一次關照電報中也要突出這次炮打有軍隊背景。⁴⁰

張春橋明確關照大家：不要組織搞反擊，一反擊的話，馬上會變成兩大派打內戰。⁴¹ 王洪文匆匆趕來。徐景賢將張春橋關照不要組織反擊的話告訴了他。徐景賢向王洪文建議，趕快在總工會大樓懸掛大標語，寫上「誓死保衛毛主席親自支持的以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徐景賢說，這樣上海全市人民都可以看到工總司的態度，「我們搞標語戰，不搞反擊」。⁴²

北京方面的反饋很快就到了。駐滬空四軍副政委姬應伍打電話給張春橋說，空軍司令吳法憲從北京打電話給他，作三點表態：軍隊不上街；不貼大字報，不支持炮打。張春橋感嘆說：「空四軍行動真快」。江青也要姚文元打電話給張春橋：「不要怕，事情很快會平息的，但無論如何不要組織反擊。」⁴³ 下午，吳法憲打來電話，說已準備好專機，明天上午接張春橋去北京。事後知道，是毛澤東讓將張春橋接去北京。

傍晚近下班時間，駐上海的東海艦隊副司令員高志榮打來電話，說海軍第一政委、中央軍委辦事組李作鵬下達了三點電話指示：

一、上海有人炮打張春橋同志，我們軍隊不要捲入；

40 以上資料引自徐景賢 1978 年 7 月 6 日供詞，轉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五》，以及徐景賢《十年一夢》。

41 徐景賢 2003 年《十年一夢》。

42 同上。

43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話》(未刊稿)第 293 頁。

二、已經貼出的大字報要予以覆蓋；

三、不要搞反擊。

這三點指示與姬應伍所說內容相同。李作鵬的電話指示先傳到東海艦隊，東海艦隊再傳給上海市革會。緊接着，駐復旦大學空四軍軍宣隊也來電話，說接到空軍的通知，他們已向學生傳達。接着，警備區和駐滬空軍表態，佈置下面部隊不要參與炮打。王少庸說：這比我們自己表態還管用。⁴⁴ 中央軍委表態，徐景賢等心裏有了底。徐景賢當即佈置，晚上在外灘市革會大樓底樓，召開宣傳文化系統的辯論會，讓朱錫琪參加。

晚上的會場座無虛席，過道上也擠滿了人。朱錫琪帶着星火燎原的人坐在前面第一排。徐景賢主持會議。除了徐景賢等市革會領導成員外，眾人都還不知道中央已經表態。星火燎原的人首先發言，提出各種質疑。接着朱錫琪發言，他再次質疑張春橋沒有出席3.24大會等事情，並表示：「我們文匯報星火燎原造反總部為什麼戰鬥隊今天是宣了誓來的」，「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徐景賢駁斥朱錫琪的話，然後，讓高志榮宣讀李作鵬的三點電話指示。高志榮一字一句，連念兩遍，然後表態說：「我們上海部隊堅決執行中央軍委首長指示，我們決不參加炮打。」據徐景賢後來回憶，全場頓時鴉雀無聲，只有唸唸唸的鋼筆記錄聲音⁴⁵；朱錫琪不服氣，說要去北京上告，但隨即就被到場的工總司人員當場關進廁所，宣佈代表市革會，對他和周國榮進行隔離審查。不過，邵傳烈可以繼續工作。

4月13日，張春橋乘上專機去北京。⁴⁶

44 徐景賢 1978 年 7 月 6 日供詞，轉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五》。

45 徐景賢 2003 年《十年一夢》。

46 這個飛機接張春橋的時間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寫到的；而徐景賢的《十年一夢》中說是當天下午中央派專機將張春橋接去北京。但是

4月14日和4月15日，市革會在延安西路200號分別召開各群眾組織負責人以及市革會各組辦負責人會議。徐景賢在會上說：這一次是「4.12」事件，41年前的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也搞過一次「4.12」事件，兩次都是反革命事件。馬天水說，那些傢伙在南京路刷大標語說春橋是叛徒，別的情況我不知道，春橋的歷史我知道，他根本沒有被捕過，怎麼會是叛徒？王少庸說，市革會下達指示，要大家不要組織回擊，這樣做是為了維護上海的大好形勢，把矛頭始終對着劉少奇和陳丕顯、曹荻秋。4月18日，徐景賢、馬天水、王少庸、王洪文、王承龍等市革會領導人，以及在市革會擔任領導職務的駐滬三軍領導，在復旦大學召開大型座談會，各年級紅衛兵代表二百多人出席。徐景賢、王洪文等市革會領導人輪番講話，還讓這次炮打中表現堅定的同濟大學的陳敢峰和市六女中的高靜慧在會上發言，輿論導向，把復旦的不服情緒壓下去。王少庸說，復旦大學在1967年的「1.28」和1968年的「4.12」，兩次捲入炮打，是上海階級鬥爭的晴雨錶，總是有人要跳出來和我們較量的，沒什麼了不起。形勢急轉直下，炮打就此一下剎車。

整個4.12炮打過程，除了文匯報社的行動，其他似乎都與軍方有關。江青接到姚文元的匯報後，馬上就去找李作鵬，表明江青知道這次炮打的背景。江青這樣做也是逼軍隊表態，張春橋後來回憶：

4.12炮打是林彪集團的人搞的，當時(我)向中央文革小組匯報後，江青知道有部隊的背景，就立即找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等人來，逼他們表態。⁴⁷

徐景賢 1978年7月6日供詞中也說張春橋是4月13日去北京的，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1981年2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五》。

47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

而文革後披露的史實，也印證了4.12炮打由軍隊發起的猜測。據當時任林彪秘書的張雲生以後回憶：

1968年4月的一天下午，葉群從釣魚台回來，就佈置秘書郭連凱替她把半年前張春橋在南京軍區黨委擴大會議上的一篇講話找出來，看看裏面有什麼問題。

張雲生還回憶了葉群當時給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的電話：「有人反對你。你知道誰反對你嗎？就是你們東邊的那位。那個人，我不說名字，你也會知道他是誰。對，對，我對你講，你心裏有數就行了……」。

又過了一天，葉群在毛家灣接見了從上海來的江騰蛟。在長時間密談之後，又在一起吃了飯。江騰蛟後來派人送到毛家灣一份揭發張春橋問題的材料。葉群看過之後，親自作了一些修改，又退回江騰蛟重抄了一式兩份。這兩份揭發張春橋的材料，都由林彪署名批出，一份送給了毛澤東，另一份給了陳伯達、康生和江青。後邊的這一份，沒通過林辦保密員發出，而由葉群親自送到了釣魚台。

這以後，我從文件中看到，上海正在出現「炮打張春橋」的大字報浪潮。儘管葉群在掩掩蓋蓋，我看出這場鬧劇的真正導演在北京。⁴⁸

但是這個「真正導演」，究竟如何具體導演此次炮打，張雲生的回憶還是沒有說清楚。4.12炮打來無影，去無蹤，二軍大紅旗不和地方上的文匯報社發生關係，一點也不透露自己的底牌，事後也無人再提此事，更增加了這次炮打的神秘性。文革後，邱會作、李作鵬等的回憶錄中，根本不提這個事件，是忘

48 轉引自張雲生著《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出版。

記提及此事，還是這次炮打與他們根本無關？⁴⁹

4月14日，文匯報社開會批鬥朱錫琪和周國榮，不久，兩人被宣佈「靠邊」。邵傳烈被認為認識態度較好，受到留用。還有艾玲，也作了隨時回上海接受批判的準備。王洪文還打算清查4.12那天在街上貼出大標語的國防科委708研究所和711研究所。徐景賢每天都向張春橋匯報。游雪濤小組則收集了全市炮打中的大字報、大標語，編印了一本炮打情況匯集。

正當徐景賢等人在上海追查時，一天晚上，張春橋從北京打電話給徐景賢，問起朱錫琪的情況，徐景賢回答說，他正在做檢查。張春橋說，朱錫琪肯做檢查，也就可以了，群眾通不過，我們去做做工作。你到文匯報去，親自召開一個全體工作人員大會，市革會政宣組也派人去，包括朱錫琪手下的一幫人，都要參加，讓朱錫琪在會上做一次檢查，他檢查完了後，你就帶頭鼓掌表示歡迎。張春橋又說：要考慮到群眾嘛。這次炮打，捲進去的人很多，我們把朱錫琪解脫了，其他人心裏的這塊石頭就放下來了。徐景賢一下轉不過來，說，有些問題剛剛露了個頭，遠遠還沒有查清楚，比如部隊的問題，我們剛剛佈置下去。張春橋說：不要再查了，復旦大學、二軍大、國防科委這些單位的事情都不查了。可以宣佈朱錫琪留在報社參加一般的編輯工作。艾玲也不用讓她回上海檢查了。⁵⁰ 徐景賢雖然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但對張春橋的話，「我總是堅決執行的」。對朱錫琪的批判匆匆結束，徐景賢去文匯報社宣佈「只要改了，還是好同志」，恢復了他的記者職務。朱錫琪當場感動得掉淚。⁵¹

張春橋的態度，實際是毛澤東的態度。不久，張春橋回上

49 據游雪濤對筆者說，炮打之前，復旦大學軍宣隊負責人方耀華，曾讓紅革會把1.28炮打的資料交給他們。游說這是他當年聽譚啟泰講的。

50 徐景賢2003年《十年一夢》。

51 同上。

海，對徐景賢、王少庸、馬天水和王洪文等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我這次到北京，才知道是毛主席把我接去的。那天晚上，我按通知到中南海去看望毛主席，誰知道，我去的時候，老人家已經站在門口等我呢。我趕快上去和主席握手，問主席好，心裏非常不安。

我向主席匯報了上海的工作，我也談到這次炮打，主席說，我已經知道了，就是為這件事特意把你找來的。你可以對那些炮打你的人講「無事」。北京不是有個謝富治嘛，學生炮打他，他對學生講「無事」。那些學生就炮打不下去了。⁵²

說是「無事」，但從後來的情況看，4.12炮打始終被作為大案審查，參與者都受到不同程度迫害。

秋後算賬

4.12炮打的直接後果，是市革會組織組被改組。當時外面傳說張春橋是叛徒，市革會組織組的負責人朱俊以及組織組的幾個工作人員，便私下從檔案櫃裏拿出張春橋的檔案翻看。但張春橋、姚文元的檔案已被中央調走，留在上海的只是檔案的簡本。他們從張春橋的簡本檔案中看不出內容，就又去看張春橋妻子文靜的檔案，文靜的檔案全部由上海方面管理。他們看到檔案中文靜的歷史問題後，私下議論。本以為不會有人知道此事，沒想到形勢逆轉，有人將此事揭發。

組織組的幹部，在沒有得到許可的情況下，私看檔案尤其是上級領導人的檔案，屬於嚴重違反檔案管理規定事件。徐景賢等十分生氣。王洪文提出：「機關裏的人關鍵時刻就動搖，

52 徐景賢 2003 年《十年一夢》。

我不放心」。他提出派一個工人去負責市革會組織組，他推薦了金祖敏。⁵³ 市革會組織組是歸王承龍管轄的，徐景賢本來就對王承龍難以相處合作的作風不滿，便欣然同意。而王少庸在四清時，就是駐金祖敏工作的上海電機廠工作隊負責人，對金祖敏印象不錯；馬天水也同意。就這樣，金祖敏擔任了市革會組織組負責人。組織組是考察、推薦和委派幹部的重要部門。本來工人造反派在幹部的任免方面沒有多少話語權。金祖敏當了組織組負責人後，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更多一份上層資源，對市革會具有了更實質性影響。

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時，王洪文提出將1.28炮打和4.12炮打列為上海文革以來必須清查的十件大事中的重點大事，報張春橋，張春橋批准。⁵⁴ 於是，與1.28炮打有關的馬立新、勞元一、李功佐等紅革會負責人，雖然大學畢業分配去外地，而且已經工作了兩年，但都被揪回隔離審查，給他們定下「犯嚴重政治錯誤」的結論，刻上政治紅字，再發配回外地。

朱錫琪被恢復記者職務後，只工作了半年不到，到11月，被「下放勞動」。1970年2月一打三反運動中，因4.12炮打被重新審查，「隔離」了近十個月，查不出新問題，12月被解除隔離，下放五七幹校勞動。1971年3月又被隔離審查，還是查不出新問題，1972年辦案人員打算解除隔離；但張春橋說了句「朱錫琪倒有點像5.16，不要解除隔離」，於是繼續再關，直到1973年8月才被解除隔離。每次審查的內容，都是追查「黑後台」，朱錫琪心裏非常明白，其實要追查的核心，就是4.12炮打的軍隊背景。他前後被審查五次，共關押了三年零五個月。邵傳烈當時雖然繼續工作，但兩年後的清查5.16運動中，被作為5.16分子揪出。而文匯報整個報社的職工，有三分之一的人受到牽連。

艾玲當初的那個電話促使朱錫琪下定炮打決心，儘管她事

53 徐景賢 2003 年《十年一夢》。

54 同上。

先一點都不知道朱錫琪他們的行動打算。4.12後她知道自已躲不過，就主動給中央文革小組寫了檢查，陳伯達看後說很好。於是艾玲沒有挨整，繼續在北辦工作。後來艾玲被調回上海，還擔任過一個時期的文匯報社革命委員會主任。1969年中共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張春橋親自點名艾玲作為「革命知識分子代表」出席九大，艾玲感動得熱淚盈眶。但後來艾玲和空四軍王維國走得較近，1971年春，張春橋佈置說毛澤東指示要將她關起來；⁵⁵ 3月，艾玲被關押，直到1975年7月才被放出。在她被關押期間，1974年3月28日，她的丈夫也被關押。此外，《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的所有工作人員，包括打字員共十三人，1968年11月7日全部被召回上海。先是被關在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的地下室，辦學習班揭發艾玲，以後全被下放到上海柴油機廠勞動。

考證出狄克即張春橋的葛正慧，被關押五年多。和他共事的另一個上海圖書館工作人員袁嘉錫，因為在炮打時期講過「張春橋是叛徒」、「藏書樓有證據」，也被關押三年，以致精神失常，但仍不被放過，釋放時還被定了個「敵性內處」，即「敵我矛盾內部處理」。

參與炮打的國防科委708和711研究所，1968年8月7日被《工人造反報》點名：「這些積極炮手到目前為止，還逍遙法外，老實告訴你們，過去炮打這筆賬是要算的。」當晚，造反派們即查抄這兩個研究所，並抓走708所所長李志俠等12人。李志俠後來被宣佈為「現行反革命」、「黑炮手」，關押六年。這兩個所的其他許多職工和幹部，也被反復批判和審查。

不但參與炮打者被審查迫害，就連在炮打時流露過些許懷疑態度者，也被視為立場不堅定而不再被重用。例如王腓利，工總司早期重要成員，為工總司出過大力，與王洪文私人關係也一直很好。但他在4.12時曾表示對張春橋是否叛徒之事「吃不

55 徐景賢 2003 年《十年一夢》。

準」，工總司便開會要他檢查，批判他「吃不準實際是吃得準，是吃準了要炮打」。還有張寶林，在4.12那天曾經向建工局的一派頭頭打過招呼，準備去貼大字報，要不是炮打結束得快，也會捲進去，被認為立場動搖。對於這些老造反，王洪文、葉昌明等雖然欣賞他們的能力，但因為炮打之事，始終沒有真正信任他們。⁵⁶ 加上一些其他原因，他們後來都被下去「勞動」。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師朱維錚，文革前曾是市委寫作班歷史組成員，文革中隨機關聯絡站一起造反，1967年專題寫作組時期被派往北京搜集信息；回上海後，又為張春橋和徐景賢搜集提供了大量文革動態和情況，包括中申會的情況，是寫作組的中堅成員。但在4.12時，他對張春橋有過幾句議論，儘管當時就受到朱永嘉、吳瑞武、王知常等的反駁，他本人也在4月18日寫了一份數千字的檢討，但徐景賢不放過他。朱永嘉事後為他說情，但徐景賢不同意。朱維錚後來被清除出寫作組，放到文匯報社去；在審查艾玲時，他也被同時審查，後來被遣回復旦大學。徐景賢文革後對此回憶說：

我認為，寫作班人員是張、姚的嫡系部隊。在嫡系部隊內部是絕對不能容忍心懷異志背叛張、姚的人物的。

這是我搞的殺一儆百的實例，讓其他人看到對抗張、姚的下場！⁵⁷

張春橋對這次炮打的軍界背景看得很清楚，他和部隊幹部關係始終搞不好，深知軍中反自己勢力的強大。林彪出逃事件後，駐上海的空軍第四軍政委王維國，被認定是「林彪死黨」，遭關押審查。「王維國專案組」將4.12炮打也作為審查內容，試圖找出王維國與那次炮打的關係，但始終找不到相關材

56 葉昌明 1978年2月21日《交代我在「四·一二炮打中的一些問題」》。

57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650頁。

料。於是，他們強迫當時空四軍駐復旦大學的軍宣隊負責人方耀華交代，將4.12炮打說成是「林彪死黨葉群、吳法憲、邱會作為後台，由王維國組織策劃的」，編進《林彪死黨王維國的罪證材料》。⁵⁸

1970年至1971年，中共中央又連續發起一打三反和清查5.16分子運動；1971年4月，上海市革會成立第二辦公室，專管各種「防擴散案件」。1968年的4.12炮打與1967年的1.28炮打，被列為十大專案之一的「炮打聯合專案」，受牽連者上千。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兩次炮打事件後，僅在復旦、師院、師大、上音、一醫、上外、科大等七所大學，受迫害的幹部和群眾就有856人；其中關押拘禁368人，迫害致死12人，逼瘋12人。⁵⁹在兩次炮打的基地復旦大學，據文革結束後中共復旦大學委員會1977年9月3日統計：

復旦大學純屬反對「四人幫」案共293人，其中(據不完全統計)：隔離審查98人，逮捕1人，拘留4人，辦學習班95人，留校檢查95人，被迫害致死5人，逼瘋2人。⁶⁰

至於二軍大，1969年10月，因中央軍委安排，與四軍大、七軍大調防，有軍籍的人員全部遷往西安，躲過了上海方面的追殺。

小結

文革打倒幹部，最強有力的罪名就是「叛徒」。張春橋

58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650 頁。

59 同上，第 650 頁。

60 轉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五》。

蓄意要打倒上海市委的領導陳丕顯和曹荻秋，給他們製造的罪名就是「叛徒」。而兩次民間的炮打，都是首先質疑張春橋的「歷史問題」；也給張春橋按上叛徒的罪名，試圖以此首先剝奪張春橋的革命左派名份，再將他驅逐出中央決策中心。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從1967年的1.28炮打，到1968年的4.12炮打，兩次炮打都來勢兇猛，但兩次炮打最後都化險為夷。第一次是毛澤東的直接干預，第二次是軍隊出面。雖然到目前為止沒有資料顯示毛澤東對第二次炮打的直接干預，但4.12炮打剛一發生，江青就立即找林彪屬下，焉知不是毛澤東的意思？待查。而毛澤東特地將張春橋接去中南海，並守在門口等候張春橋，顯示毛澤東關心張春橋的急切心情，更顯示毛澤東對張春橋的愛護和重視。

看起來，4.12炮打未遂，是對張春橋地位的又一次提升，但在張春橋內心，應該能夠感覺到，這是來自軍隊的又一次襲擊和警告。4.12炮打對張春橋，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比1.28炮打更沉重的打擊。張春橋1966年對安亭事件的處理，使得他在中央文革以及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進一步鞏固，此時的張春橋蒸蒸日上。他這個時期的講話大多鋒芒畢露，咄咄逼人，顯示出他的志得意滿；尤其1967年「二月逆流」時，他對那些抵制文革的軍隊老師們，寸步不讓，針鋒相對。4.12炮打，讓張春橋領教了軍隊的厲害。這股炮打風，來無影去無蹤。如果不是江青出面，他很可能就會像中央文革小組的另幾個成員一樣，瞬間便被拋棄。據有心者觀察，張春橋後來變得非常謹慎，正是從4.12炮打開始的。⁶¹許多事情張春橋不再希望上海先出頭，包括他要徐景賢將辛辛苦苦寫出的六萬多字的《一月革命大事記》全部銷毀，包括後來1974年上海的批林批孔運動「急剎車」，都是張春橋的指示。

61 這是蕭木的感覺，筆者覺得很有道理。

第二十四章

從大聯合到上山下鄉 紅衛兵運動的終結

中央要求學生回學校軍訓

從1967年一月奪權文革政權建立後，文革的目標開始轉向秩序的恢復，整頓群眾組織的文件一個接一個地陸續出台。

首先被取消的文革舉措是大串聯。還是在一月奪權之前的1966年11月，正是大串聯方興未艾之時，所有的交通工具：火車、輪船、汽車，全都人滿為患；就連公路到鄉間小道，也到處可以看見舉着大旗步行串聯的紅衛兵。留在家裏不外出的學生少之又少。就在此時，11月1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突然發出通知，「決定在今年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節，全國各地大專院校、軍事院校和中等學校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戰士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到各地進行革命串聯。目前正在水陸交通沿線等候車、船外出串聯的各地革命師生，可勸說他們返回原地。」接着，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出補充通知，說11月25日和26日「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第八次接見了二百五十萬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小將，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後一次接見」，並再次規定「在今年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節，全國各地大中學校、軍事院校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戰士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到各地進行革命串聯，在12月20日以前，按免費乘火車次序，完全離開北京返回原地。」而且「從12月21日起，在北京革命師生和紅衛兵吃飯、乘火車和汽車，不再實行免費。」

這兩個文件將停止大串聯說成是暫時的，給人感覺似乎第二年春天還會再恢復。但第二年還未開春，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再一次發通知，停止步行串聯。大串聯實際被永久停止。¹「一月革命」後，中央進一步要求學生回學校。2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衛戍區的兩份報告上批示，並要求轉發全國。這兩份報告是關於在北京部分大學和中學進行軍訓的：「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每年訓練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課以後，在軍訓的二十天中軍訓時間不超過四小時，同時學校原課程相應減少四小時。」²中共中央立即於2月19日發通知要求中學生回校，規定：「從3月1日起，中學師生(包括1966年應畢業而尚未畢業的學生)停止外出串聯，一律回本校，下鄉下廠的也一律回校，一邊上課，一邊鬧革命。為了加強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對中學師生要分批分期地進行一次短期的軍政訓練。」³

紅衛兵運動從北京開始，現在毛又首先從北京開始，要求學生回學校接受軍訓。軍訓，就是要讓這些在社會上闖蕩了近十個月的學生，體驗一下軍隊的嚴明紀律，蘊含意義不言而喻。3月7日，中共中央又發文，要求「下廠下鄉和在外地串聯

- 1 這些文件分別是：中共中央、國務院1966年11月16日《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聯問題的通知》，中共中央、國務院1966年12月1日《關於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聯的補充通知》，中共中央、國務院1967年2月3日《關於革命師生和紅衛兵進行步行串聯問題的通知》。《中共中央轉發毛主席批轉的「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及附件》，《中共中央轉發毛主席批轉的「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及附件》，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 2 《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1967年9月至10月，引自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 3 中共中央1967年2月19日《關於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中共中央轉發毛主席批轉的「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及附件》，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包括參加外單位奪權的和設在外地的聯絡站)的革命師生，一律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參加本校文化大革命。」⁴ 接着，3月8日，毛澤東又要中共中央轉發天津延安中學經驗，要求學生「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毛澤東在這個文件上再一次批示，要求軍隊對大、中學校和小學的高年級學生，分期分批進行軍訓。⁵

要紅衛兵們回學校接受軍訓，其實就是希望學生回學校。這應該是毛澤東試圖結束文革的最初嘗試，將這股被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重新塞回潘多拉之盒。不過，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請神容易送神難。以後的1967年和1968年，整整兩年，中央和各地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嘗試，希望脫韁已久的學生們重新坐回課堂，但收效甚微。最後不得不將所有在校的大、中學生，統統「畢業」了事，將他們「上山下鄉」，徹底結束紅衛兵運動。

外地紅衛兵撤離上海

自1966年9月上海市委遭受衝擊始，外地許多紅衛兵組織紛紛先後在上海設立「駐滬聯絡站」。比較出名的有：成立於1966年10月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簡稱「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1966年10月25日掛牌的「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駐滬聯絡站」（簡稱「北航紅旗」），成立於1966年11月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駐滬聯絡站聯絡站」（簡稱「哈軍工紅色聯絡站」），成立於1966年12月的「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簡稱「新北大」）以及「清華大學井岡

4 中共中央1967年3月7日《關於大專院校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草案)》，引自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 《中共中央轉發毛主席批轉的「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及附件》，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山兵團駐滬聯絡站」(簡稱「清華井岡山」)，成立於1967年1月的「西安軍事電訊軍事工程學院文化革命臨時委員會駐滬聯絡站」(簡稱「西軍電」)，等等。其中，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和北航紅旗，催生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而在上海1966年11月至12月底的安亭、解放日報、康平路三大事件中，總能看到這些組織的紅衛兵身影。1967年初一月奪權，這幾個組織都是上海人民公社發起組織。此外，還有成立於1966年8月的中國科技大學「齊衛東」。

中央要求學生回校以後，從1967年2月中旬始，外地紅衛兵駐滬組織紛紛撤離。2月17日，北航紅旗駐滬聯絡站首先發表《通告》，宣佈自18日起撤銷聯絡站；接着，2月28日，清華井岡山駐滬聯絡站在《文匯報》發表文章，聲明「奉總部命令，即將全部離滬返校」；同日，哈軍工紅色造反團駐滬聯絡站發表《聲明》，宣佈自3月5日起撤銷聯絡站；3月6日，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發表《通告》，宣告《首都紅衛兵》(上海版)停刊，自3月8日起撤銷聯絡站；3月9日，新北大文革委、西軍電文革臨委會等13個駐滬聯絡站，在《文匯報》發表文章，集體「向英雄的上海人民告別」。⁶

但也有外地紅衛兵回去不久後又來上海。一些北京紅衛兵，直到1967年9月還在上海對局勢評頭論足，尤其非議上海8月4日的砸聯司行動，認為張春橋「執行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8月下旬，以北京的紅衛兵為主，一些在上海的外地紅衛兵組織了遊行，抗議8.4砸聯司行動，其中就有曾經在1966年9月炮轟上海市委中起過大作用的中科大齊衛東。⁷

9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再

6 以上聯絡組撤銷資料引自1967年2月28日、3月9日《文匯報》，以及金大陸著《正常與非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出版。

7 筆者2009年5月14日對原北京紅衛兵組織「齊衛東」的許小昆的訪談。

一次發出《關於在外地串聯學生和在京上訪人員立即返回原單位的緊急通知》，上海市革會也不再為外地紅衛兵提供和安排住處，釜底抽薪。至此，外地紅衛兵全部撤離上海，基本不再影響上海局勢。

毛澤東稱讚市六女中大聯合

1967年2月22日，北京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紅代會)召開，緊接着，3月25日，首都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成立。之後，天津、南寧、貴州等許多省市的紅代會紛紛成立。但是，以「一月革命」領文革之先的上海，紅衛兵代表大會的成立卻滯後整整十個月。中共中央1967年2月19日關於《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下達後，上海的中學生並沒有雷厲風行地執行。儘管報紙上一遍又遍地呼籲學生回校「復課鬧革命」，但這些久離課本和考試，在社會上隨心所欲地晃蕩了將近大半年的青少年，已經不太習慣重新收緊骨頭再捧課本。

市革會只能加強引導。約兩個星期後，3月2日，「堅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殺』回學校去，復課鬧革命誓師大會」，在人民廣場召開，一萬師生參加大會。3月3日，《文匯報》發表《上海回民中學實行大聯合復課鬧革命》，報道說「在鬥爭中，全校十多個革命組織，已經聯合成立了一個統一的組織」。3月13日《文匯報》發表《陸行中學各革命組織實現大聯合》，報道上海市陸行中學統一成立紅衛兵指揮部，「宣佈各學生革命派組織自3月1日起一律撤銷。全校學生根據需要，以班級或班級中的戰鬥組為單位進行活動。以後除了革命委員會所屬工作機構之外，不再成立其他任何組織」。3月17日《文匯報》發表《開展軍政訓練按班級實現大聯合》，報道控江中學「按原來班級，組成班、排、連，統一成一個嚴密的組織——軍政訓練團」。4月9日

《文匯報》又發表《市六女中紅衛兵在大批判中實現大聯合》，報道市六女中「全校紅衛兵實現了以教學班為基礎自下而上的大聯合，成立了上海市第六女中紅衛兵團」，並專門配了社論。所有這些報道，都是一種輿論導向，希圖將學生們喚回學校。

在這幾所中學的大聯合經驗中，毛澤東抓住了市六女中。1967年4月12日，毛澤東對市六女中大聯合的做法予以肯定，要求向全國廣播《文匯報》4月9日的報道。⁸ 翌日《人民日報》發佈消息，並配社論。4月14日，上海全市大中學校十萬師生，被組織在人民廣場集會，聽取市六女中介紹大聯合經驗。市六女中前身，是創辦於1871年的教會學校，原名曉明女子中學，1953年改名為上海市第六女子中學。學校地處黃浦區四川南路，離外灘不遠。這所本來並不出名的學校一下成名。

市六女中大聯合，最初是該校學生自己發起的，帶頭者高靜慧⁹。她是高一的學生，學校造反組織「海燕戰鬥隊」負責人。當時學校裏的學生有參加紅上司的，有參加中學紅三司的，有參加紅反會的，都是市裏的組織，都在社會上活動，在本校影響不大。海燕戰鬥隊人不多，只有二十多人，主要在學校及黃浦區「批判資反路線」，對上海社會上的事件也積極關注。後來在「海燕」基礎上，又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學校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學生都參加，高靜慧成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負責人。高靜慧文革前是班幹部，共青團員，屬於「聽黨的話」的學生。「聽黨的話」，也是高靜慧文革後回憶這段往事時，給當時自己的定位。她那時和一些同學覺得，黨中央號召「復課鬧革命」，既然要復課，就應該以班級為基礎

8 《中共上海歷史實錄》，中共上海黨史研究室編纂，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

9 高靜慧，女，1948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第六女子中學高中學生，共青團員，班級團支部委員。文革中任上海市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市中學紅代會)首屆負責人。1968年畢業上山下鄉去內蒙牧區，在內蒙加入共產黨。文革後被取消中共黨籍。

才能上課。她們於是建議紅衛兵組織以班級為基礎，建立班級的紅衛兵核心。在她們的推動下，各班級都建立了班級紅衛兵組織的領導核心或小組，年級也建立相應機構。

以班級為單位建立組織，而不是以學校為單位建立跨班級組織，回到文革前的以年級和教學班分班的狀況，紅衛兵組織回到共青團以班級為基礎的組織形態。這與中央一再催促的實行以班級為基礎聯合的導向是一致的。高靜慧她們的行動立即受到關注。4月12日下午1點左右，學校接到市革會打來的一個電話，說有重大事情要到學校宣佈，趕快將學生統統召集到學校。於是眾人馬上分頭通知同學們在大操場集中。會是下午開的，徐景賢、王承龍等都來了，這些女學生們第一次近距離見到市革會領導們。徐景賢一到就馬上開會。他宣佈：今天我來，是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毛主席對你們學校有個批示：革命大批判促進革命大聯合。¹⁰

毛主席肯定了自己學校的大聯合，而且還有批示，全校師生都非常興奮激動，會議一結束，大家立即上街遊行慶祝。4月14日，上海各大中學校師生十萬多人在人民廣場冒雨舉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革命大批判中推進革命的大聯合、三結合」大會，徐景賢講話，號召在全市掀起學習市六女中的熱潮。

5月，毛澤東在北京說：中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軌。5月24日，張春橋、姚文元來到市六女中，首先宣佈了毛的這句話。張、姚事先沒有通知學校方面，所以幾個紅衛兵負責人都不在。張、姚一進校門就被學生們認出，圍了上來。他倆乾脆在學校操場上席地而坐，打着拍子，和學生們共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還和學生們

10 以上資料來自金大陸、筆者、金光耀 2009 年 4 月 16 日對高靜慧的訪談；在 1967 年 4 月 17 日《中央文革對當前運動的九點意見》中，也提到「市六女中的方向和經驗是毛主席肯定的」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聊了近半個小時。談話中心是教育革命，張春橋主張學校還是要辦，學制要縮短；他問：哪些課不要，歷史還要不要？有同學說，不要。張說：不要歷史，你們怎麼進行批判，不學近代史怎麼批判《清宮秘史》？他還說：教學方面也要改，以前學生跟老師轉，教師叫學生幹啥學生就幹啥，不這樣就要扣分，不是像主席所說：教師跟學生轉。¹¹ 師生們簇擁着張、姚進學校禮堂，姚文元簡短講話後，張、姚又召集部分教師和學生交談。張春橋在回答關於「三結合」機構問題時說：

選舉文革要多協商幾次，要反復醞釀，醞釀得大家都滿意了。但也不是非要全校選舉不可，投票只是一種形式。巴黎公社的選舉不是表現在大家都投一票，巴黎公社好在可以撤換不稱職的代表。¹²

市六女中成為上海的中學文革運動樣板。張春橋和徐景賢都特別關注市六女中，但凡有什麼政治運動，媒體一定會讓市六女中表態。1967年7月，姚文元率領中國紅衛兵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出席阿勞動青年聯盟第五次代表大會，高靜慧被指名參加。和她一起出訪的另一個上海代表，是同濟東方紅的負責人陳敢峰。¹³ 除了市六女中，大聯合實行較早的還有楊浦區的控江中學等，後來也一直是上海中等學校文革中的樣板。

11 張春橋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2 市六通訊號外稿，轉引自《毛主席啊，毛主席……》，載於《教育革命》1967年5月30日，第8期，上海市中等學校教改革命造反委員會（教革會）編，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此外「紅上司」主辦的《紅衛戰報》1967年6月3日第40期上也有報道。

13 這個「中國紅衛兵代表團」，北京的紅衛兵代表是北京師範大學的紅衛兵造反派組織負責人譚厚蘭，北京清華附中的一名中學紅衛兵，還有工人、軍人各一名，加上姚文元，共7人。

市中學紅代會成立

自己的學校大聯合後，市六女中的學生又去聯絡所在黃浦區的其他中學，成立了「黃浦區中學生聯絡站」，辦公地點最初在江西路，原來是區教育局的房子。每個學校都派代表參加，最初的成立動機是加強聯繫，參加黃浦區的批判走資派運動。在各校派代表一事上，大多數學校比較順利，沒有什麼大的爭執。反倒是格致、光明這樣的重點中學，因為各派勢均力敵，擺不平，派不出代表。

整個黃浦區中學生聯絡站的成立全是中學生們自己籌建。黃浦區革命委員會當時還沒有成立，毛澤東將市六女中的大聯合作為樣板後，正在籌備中的黃浦區革會便通過區中學生聯絡站，加緊推動全區的紅衛兵大聯合，籌備成立全市第一個以教學班為基礎自下而上大聯合的統一紅衛兵組織。全區43所中學，有25所學校成立了以班級為基礎的紅衛兵團。8月18日，「黃浦區第一次紅衛兵代表大會」在黃浦劇場召開。高靜慧致開幕詞，徐景賢等市革會領導出席大會。21日閉幕式上，姚文元發來祝賀。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黃浦區紅衛兵的大聯合機構，大家給這個機構取名為「黃浦區紅衛兵軍區」，並制定了《紅衛兵條例》（試行草案初稿），其中關於《紅衛兵的組織編制》節，完全符合以教學班為紅衛兵的基本組織的原則，也成為以後上海地區中學紅衛兵大聯合的模式：

紅衛兵的基層組織是在每一個學校建立以教學班為基礎的自下而上的紅衛兵的統一組織——紅衛兵團。

各校紅衛兵團下面每個年級設立紅衛兵連（或紅衛兵縱隊），每個班級設立紅衛兵排（或紅衛兵支隊），每個班中十個紅衛兵左右設立紅衛兵班（或紅衛兵小隊）。¹⁴

14 紅衛兵黃浦軍區《紅衛兵條例》（試行草案初稿），1967年8月18日，上海

黃浦區紅衛兵軍區成立的整個過程，與黃浦區革命委員會的籌建同步進行。1967年3月20日黃浦區革命委員會成立，這是上海十個區、十個縣的第一個革命委員會，高靜慧成為區革會常委。區革會教衛組始終關心着紅衛兵軍區的整個成立過程，不過具體指導不是很多。1967年8月21日，「紅衛兵黃浦軍區」成立大會在文化廣場召開，張春橋、徐景賢、王洪文等出席大會，徐景賢在會上講話。這是上海第一個區級的紅衛兵大聯合機構，也是上海第一個跨學校的紅衛兵大聯合機構。《文匯報》為此特地發消息。軍區設常委和委員，高靜慧為負責人。

紅衛兵黃浦軍區的成立，為其他區、縣的中學大聯合樹立示範榜樣，以後各區、縣紅衛兵機構，都沿用「軍區」稱呼，中等專科學校和技術學校亦如此。上海當時有幾百所高中程度的中專和初中程度的技校，有工廠辦的，也有局或局所屬行業公司辦的，均按所屬局成立紅衛兵某某局軍區。

在籌建成立「黃浦軍區」的同時，市革會又推動成立全市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黃浦軍區的曹翻¹⁵和紅西南的童志芳為召集人。當時，上海除黃浦區，其他各區的中學紅衛兵還沒有成立「軍區」。而市級中學紅衛兵「司令部」較有影響的有：紅上司、紅西南、紅東北、紅反會、紅中技，當時稱「中學生紅衛兵五大司令部」，都是上海人民公社發起組織；此外還有紅革會、紅三司以及炮司的「中學部」。於是，為紅代會代表是直接由學校產生，還是由市級紅衛兵組織產生，爭執不休；此外還有位子的安排也是爭執焦點。爭執了一兩個月，開了幾次會，都沒有結果。最後不歡而散。幾個月後，市革會再一次提出籌備全市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事宜。市革會派出「南京路上好八連」的軍人協助籌備，以在幾方爭吵不休時有個勸解調停者。市革會指定高靜慧任召集人，副組長是紅上司負責人、

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15 原名曹利群，當時是市六女中的學生。

交大附中高中學生邵企敏。籌建地點最初在陝西路上的教育工會，後搬到文革前共青團團市委在陝西路上的辦公處。

此時，已有幾個區實現跨學校的中學紅衛兵大聯合，如徐匯、楊浦、南市、普陀、盧灣以及閘北，都以黃浦區為模式稱「軍區」。但如何協調「軍區」和「司令部」的位子比例，卻是棘手難題。「司令部」代表們認為，既然成立市紅代會，就應該以他們這些市級組織為主；因為他們是老造反，造市委反和一月革命有功，且大多數是上海人民公社發起組織。他們看不起從「軍區」上來的代表，說：你們這些人算什麼，上海文化大革命都是我們這些組織撐市面的，我們造反時你們在幹什麼？你們當時都在學校裏，只知道造老師的反。

「軍區」代表們對這些「司令部」也不以為然，說：你們這些組織雖然在社會上影響大，但真正回到學校，能轄幾個數得出的兵？你們不是實體性組織，鬆散得很。毛主席號召學校大聯合，是按教學班級實行大聯合，就是要解散市級組織，回到學校去。所以你們這些司令，都已經只是光杆司令。而且我們這些從軍區上來的代表，有些本身也是「司令部」的負責人，例如徐匯軍區的負責人、第五十一中學的屠伯森就是紅西南負責人之一。論實力，他們不但不比你們差，而且比你們更有群眾基礎；何況比市中學紅代會成立在先的市大學紅代會，也不是以市級組織的代表組成的，而是由各學校派代表組成。中學紅代會應該借鑑大學紅代會。

「司令部」和「軍區」，以紅上司為一方，黃浦區軍區為另一方，各不相讓。幾個司令部之間也吵得不可開交，有兩次還吵得打起來。上海的大學紅代會在1967年11月17日成立。但是，中學紅代會卻一再延期，遲遲成立不了。

經過一次又一次地協商，決定由「軍區」和「司令部」共同組成常委班子。原先想少設些名額，但實在擺不平，最終定為13人。「司令部」5個名額：五大司令部各1人；軍區4個名

額：黃浦、楊浦、徐匯以及閘北；此外，還有3個名額給中專技校的「軍區」：「輕工業局軍區」、「冶金工業局軍區」以及「儀錶局軍區」。高靜慧和紅西南的葉定海任市紅代會正、副負責人。沒有常委名額的「軍區」，安排1名委員名額。各縣以及技校中專，凡已經成立軍區的，都安排1名委員。五大司令部除1名常委，也再各安排1名委員；紅革會、紅三司和炮司以及「中申會」等，也各安排1名委員。¹⁶

張春橋在年初3月的一次講話中曾希望，上海的工代會最好在5月1日召開，紅代會最好在5月4日或5日召開。¹⁷結果都拖到年底，而且看起來似乎應該最沒有問題的中學紅代會，波折最多，一拖再拖，直拖到12月底，大專院校紅代會和工代會都已召開。市革會要求中等學校紅代會無論如何務必在1967年召開，不要再拖到1968年。1967年的最後第二天，12月30日，上海中等學校紅代會開幕大會在文化廣場召開。

中學紅代會最初設在陝西北路原團市委辦公處，不久搬往淮海路上的教育學院，最後搬往外灘的市總工會大樓內，與工總司共一個大樓。

中申會：上海紅衛兵運動的異端

「中申會」全稱「上海中學運動申聯會」，形成於1967年7月左右，但他們最早的活動，可以上溯到1967年的2月左右。

16 這一節關於成立市紅代會的資料，基本來自筆者2009年對當時的紅代會常委屠伯森的多次電話訪談，以及金大陸、筆者、金光耀2009年4月6日、8月4日對原上海中等學校紅代會負責人高靜慧的訪談，以及筆者2009年8月12日對當時參加紅代會籌備的軍代表苗生元的訪談。引號裏的話是高靜慧的原話。中學紅衛兵組織大聯合的症結主要在於「司令部」和「軍區」的矛盾這個觀點，就是高靜慧在被訪談時總結的。

17 《張春橋1967年3月20日在歡送革命委員會工作人員歸口鬧革命大會上講話幾點精神》，載於文革期間小報《通訊簡報》，上海戲劇學院「革命樓」編輯部1967年3月30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中申會作為一個交換意見的串聯會議，正式開始於2月」，¹⁸當時正是一月奪權不久，一些學校的紅衛兵組織經常互相串聯，開會碰頭討論局勢。

1967年3、4月左右，由市革會辦公室、教衛組和政法指揮部領導，市公安局「反逆小組」具體指導，紅西南、紅東北、紅中技、紅上司、紅三司、紅反會等中學紅衛兵組織聯合籌辦「聯動罪行展覽會」；這個展覽7月12日在上海師範學院附屬中學開幕，展出時的正式名稱是《上海市揭發批判劉、鄧毒害青少年罪行展覽會》。展覽會的主要內容是批判聯動。7月19日，市西中學、復興中學、第五十四中學等學校，又在勞動劇場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揭發批判劉鄧毒害青少年大會」，批判「聯動」。¹⁹

「聯動」，即「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本是1967年初北京幹部子女紅衛兵組織的串聯性組織，與造反派紅衛兵對立。上海沒有類似的全市性幹部子女串聯組織，但上海一些幹部子女比較多的中學內，幹部子女與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的對立也十分嚴重。他們大多曾經是保市委的上紅總部成員，上紅總部垮台後，他們不願加入造反派的紅衛兵組織，自己另起爐灶，改換組織名稱與造反派對立。這樣的幹部子女組織在許多學校都有。如南洋模範中學的「0827」，上海中學的「十紅」，第五十四中學的「三紅」，復旦附中的「鐵血團」、市西中學的「紅聯站」，以及第五十一中學、師院附中、松江二中等學校的同類組織。這些組織，被上海的紅衛兵造反派也稱為聯動，或者乾脆叫「土聯動」；成員被認為是血統論在上海的推動者。

籌辦批判血統論的展覽，將持反對血統論觀點的中學生

18 《中學紅衛兵》就目前形勢答讀者問，編輯部1967年10月30日。此文是朱維鏗1967年10月左右給市革會的關於中申會的情況的附件。

19 這個消息載於1967年4月27日第35期《紅衛戰報》，「紅上司」主辦。

組織串聯到一起了。徐匯區和盧灣區是幹部子女較集中的區，1967年5月10日，這兩個區和一些中學的紅衛兵，在市二女中召開「打聯動大會」，批判上紅總部。會上由向明中學高三學生王毅捷宣讀《通令》，會後遊行。這些學校的紅衛兵，不久與交大附中等學校觀點相同的學生串聯，於7月中旬又在市二女中開會，籌備成立全市性聯絡網，北京「四三派」也有人參加。但會議開到一半，來了個電話說交大附中學生與同濟東方紅打起來了，與會者立即中斷會議去同濟大學抗議，會議雖然沒有結果，但持反「聯動」相同觀點的學校組織走到一起了。²⁰

7月下旬，一些學校又在交大附中兩次舉行會議，決定成立「中學運動串聯會」（簡稱「中串會」）；並決定演出大型歌舞劇，以擴大影響，即後來的《前進，毛主席的紅衛兵》。7月底，上海一百多個中學在文化廣場開會，批判上紅總部執行的血統論，並宣佈中串會已經成立。²¹ 中串會的主要骨幹學校及骨幹組織有：向明中學的「東方紅」、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中學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市西中學的紅上司、光明中學的紅上司、徐匯中學的「新徐匯公社」、市二女中的「市二兵團」、上海中學的「紅上中」和「28團」、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的紅革會、復興中學紅革會、比樂中學「28團」、第五十四中學的「新五十四公社」、南洋模範中學「東方紅公社」，等等。²² 而且其中屬於什麼市級組織的成員都有：紅革會、紅西南、紅東北、紅反會，等等，所以也可以說，這是個跨組織的串聯性組織。中串會的組織形式十分鬆散：沒有固定辦公地點，要開會時臨時選個中學作會址；而且相當一段時間裏，沒

20 王毅捷 1968年3月26日給「市革會教衛組、解放軍同志和市紅代會」的《請示報告》。

21 同上。

22 這些學校及組織的名單引自市六女中、控江中學、淮海中學、徐匯中學紅衛兵團，以及交大附中東縱、交大附中井岡山、第五十四中學三紅、延安中學井岡山 1968年1月16日給上海市革會的《中串會言論集》。

有負責人或領導班子，每區由一、二個學校負責聯絡，直到1968年1月27日，才在市西中學開會選舉出王毅捷等七人，作為常設性的聯絡員。²³

紅上司是中串會中起作用較大的組織。紅上司批判聯動和血統論最堅決，而且手裏有《紅衛戰報》，這是上海紅衛兵組織尤其是中學紅衛兵組織中，影響最大的報紙。1967年的《紅衛戰報》上，批判聯動或血統論的文章有五六篇。

中串會活躍的學校大多是重點中學。這些學校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都是上海的中學運動積極分子。他們大多是普通市民家庭的子女，許多人文革初期被血統論排斥在紅衛兵組織之外，甚至文革前就因階級路線被長期壓抑。文革激發了他們的政治參與意識，更激發了他們對政治等級身份的反抗意識。而反聯動展覽會以及中串會的形成，也使平民子女對幹部子女的對立，有了集體意識和對抗意識。他們張貼批判的大字報和大標語，還組織人員襲擊幹部子女的組織。中串會當時曾經有一份聲明，表達其宗旨：

中學運動串聯會是我們中等學校無產階級革命派為了促進學校的大批判、大聯合在與黨內一小撮走資派鬥爭的基礎上，在與聯動為代表的企圖從根本上來否定一年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動搖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反動勢力鬥爭的基礎上，在與妄圖從根本來否定一年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聯動分子鬥爭的基礎上，串聯而成的。……

一年來中串會的同志們在文化大革命中衝鋒陷陣，他們無

23 這七人是：向明中學王毅捷，交大附中金小蜂(原名徐增豪)，第五十四中學燕飛，交大附中魏威(原名魏楚麟)、光明中學馮軍(原名馮寶祥)、市西中學許宏綱、魏明。時間和名單均引自王毅捷1968年3月26日給市革會教衛組、解放軍同志和市紅代會的《請示報告》。王毅捷的這份《請示報告》中，說這七人是負責人，但據金小蜂和魏威文革後對筆者的回憶，說中串會沒有產生過負責人，說應該只是聯絡員。

愧是一小撮走資派、聯動分子和牛鬼蛇神感到最害怕、最棘手和最惱火的革命勢力。他們是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家。²⁴

幹部子女的組織也不示弱，頻頻出手反擊。於是在一些幹部子女較多的學校，尤其在南洋模範中學、上海中學和第五十四中學，雙方衝突不斷，甚至發生多起武鬥。1967年6月初，南洋模範中學一個華東局領導幹部的兒子被打傷，引發第二天全市幹部子女大遊行。參加者上千人，都穿着褪色的軍裝，紮着腰帶，許多男生還上身穿着藍白橫條海魂衫，下身穿着藍色的空軍褲；腳上穿着黑色燈芯絨面咖啡色塑料鞋底的「鬆緊鞋」，這是北京出產的，而不是上海出產的白色鞋底那種。當時，綠色的陸軍軍裝已經大眾化，幾乎人人都穿，不再像紅衛兵運動初期那樣只是幹部子女特有。為了存心區別於其他階層的子代，上海的幹部子女又流行起這樣的服裝，而且軍裝必須是褪色得發白的，而不是軍綠的，連鞋子也存心與眾不同。他們從淮海路出發，沿着衡山路遊行。張春橋的女兒、復旦附中的學生張維維也參加了這次遊行，但她穿得非常普通而且平民化，在一片褪色的軍裝中，只有她是白襯衫黑褲子。²⁵這次遊行被中串會認為是向他們乃至向文革的示威。

7月13日，《紅衛戰報》的紅1號(總第42期)上，刊登《關於中學運動的七點聲明》，由17個組織聯合署名，這17個組織來自17所中學。這個聲明，可以看作是中串會的正式公開宣言。文章認為，運動初期以血統論傷害了廣大教師和同學的保守派組織，有些又利用當前的大聯合，已經混入或正在千方百計混

24 《中學紅衛兵》就目前形勢答讀者問，《中學紅衛兵》編輯部1967年10月30日。此文是朱維錚1967年10月左右給市革會的關於中串會的情況的附件。

25 筆者當年也隨松江二中的同學參加了這個遊行，看到張維維。不過她沒有參加全程，而且不在她自己的學校隊伍中，而是在松江二中的隊伍中，走在筆者後面。

入大聯合機構，「打出造反旗號，以極左的面目出現，繼續和革命派對抗」，而「目前有些學校搞合二而一，搞調和折衷，搞兩全一散(全民選舉、全民聯合，解散一切左派組織)，大權沒有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中」，呼籲「革命造反派組織決不能和保守派組織平起平坐搞大合併。大聯合就是要以革命造反派為核心，權就是要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中」。7月中旬，中申會與市六女中和控江中學等學校，在市黨校為這七點聲明進行過兩次辯論。中申會方面的主辯者是上海中學的高三學生毛兵以及向明中學的高三學生王毅捷；對方的主辯者是控江中學的高二學生梅子涵。辯論的中心是「大聯合」應該是怎樣的聯合。

中申會的串聯活動正與市中學紅代會的籌建同期，他們對正在籌備的市紅代會非常不滿，認為市紅代會(籌)在各個中學推動的大聯合，只是為聯合而聯合，卻不去肅清中學紅衛兵運動中的各種錯誤或反動思潮，尤其北京聯動鼓吹得最起勁的血統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上海也有不小影響，必須着力批判：「反動血統論直接阻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發展，直接抵制了我們鏟除修正主義社會基礎的鬥爭，直接破壞了我們組織無產階級的階級隊伍。」²⁶ 中申會認為，許多中學之所以「聯而不合」，很大原因就是因為沒有肅清血統論流毒，那些曾經以血統論傷害過同學的幹部子女，對自己的過錯既無認識，也無檢討，更無道歉；而且有些人現在又成為學校大聯合後的負責人，讓那些曾經被傷害的學生不能接受，不願與他們聯合。²⁷ 中申會的這些觀點，是廣大市民階層

26 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學「紅纓槍」著《聯動的要害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載於《紅衛戰報》1967年6月17日第41期，「紅上司」主辦。

27 這個觀點是當年中申會觀點的徐匯中學高三學生文貫中在2009年9月24日在電話中對筆者談起的。當年的中申會成員：復旦中學高一學生管宇春、復旦附中高一學生張水榮、交大附中高三學生魏威在2009年11月25日筆者對他們的訪談中也談到這個觀點。當時的《紅衛戰報》上也有文章提及。

的子女，以批判血統論為鑿入，對文革前便已長期實行的階級路線政治等級身份制的曲線批判。

中申會對市革會把市六女中和控江中學的大聯合作為樣板尤其不以為然，認為他們大聯合強調「團結大多數」，是不分左派和右派，不分造反派和保守派，是「和稀泥」式的大聯合，實際上是放棄以造反派為核心的右傾行為。尤其沒有參加過任何重大事件的市六女中代表，卻擔任了市中學紅代會(籌)主要召集人，造反最早的幾個市級組織，地位反不如市六女中，這是排斥老造反。他們認為市六都是女生，女生比較聽話，徐景賢等市革會領導，就喜歡這種聽話類型的人；他們指責市六女中是「市革會的御用工具」，是「坐享文革其成」。²⁸ 中申會認為自己是老造反，參與了從安亭事件到「一月奪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現在卻遭到圍攻：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我們為捍衛一月革命的成果，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我們和企圖從根本上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澤東思想的「聯動」進行了持久的鬥爭；我們和極「左」思潮的代表——「聯司」展開了艱苦的鬥爭；我們頂住了九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的極左思潮的攻擊。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那些「策略派」卻始終態度曖昧，甚至夥同保守勢力來反對我們。

我們始終不渝地認為，我們和所謂策略派的政治分歧，是要不要依靠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問題，是要不要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²⁹

28 筆者 2009 年 11 月 25 日對原中申會成員管宇春、張水榮、魏威的訪談。

29 《給春橋同志的一封信》，載於照相影印版《紅衛戰報》，總第 47 期，1968 年 1 月 20 日，上海中等學校無產階級革命派、《紅衛戰報》編輯部主辦，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中串會所說的「策略派」，明顯是指市中學紅代會(籌)中的核心：市六女中以及控江中學的代表。因為他們都沒有參加過上海的安亭、解放日報、康平路等重大事件。在另一篇文章中，中串會的這個抨擊指向更加明確：

就在中學紅代會已經召開幾個星期後的今天，他們竟拒不承認已選出的九個常委，死抱住中學紅代會籌備組不放，妄圖在空間強行成立這樣一個奇妙的恆等式：市六、控江某些人=當然領導。……歷史將嘲笑你們，市六、控江的某些人。³⁰

其實，中串會的這些指責都是對着市革會的。一個當年的中串會成員回憶：

我們除了反對「血統論」，反對以市六、控江主持中學紅代會的筹建，其實還有一個沒有公開說出來的反對目標，就是張春橋。我們對市六、控江的不滿，實際歸根到底是對張春橋的。我們認為市六和控江都是張春橋控制的。張春橋位子坐穩了，就不要當初為他造反出力的人了，而是培植聽他話的人。我們那時根本沒有意識到，其實是毛澤東的戰略部署變了，他要鞏固文革秩序，我們已經不適合毛澤東的需要了。³¹

中串會的核心人物大多是中學生中的老造反，能言善辯會寫，組織能力和活動能力都非常強，讓市中學紅代會(籌)頭疼，

30 《你們想幹什麼》，載於照相影印版《紅衛戰報》，總第47期，1968年1月20日，上海中等學校無產階級革命派、《紅衛戰報》編輯部主辦，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文中的紅代會常委人數與筆者前面的訪談有些不同。

31 筆者2009年11月25日對原中串會成員管宇春、張水榮、魏威的訪談，這段話是魏威回憶的。

覺得他們難弄。中申會還提出，市中學紅代會籌建中也要有中申會的代表參加，遭市中學紅代會(籌)拒絕，說他們是中央已經號召大聯合之後再冒出來的組織，本身就違反了中央關於大聯合的要求；而且他們不能算是一個市級組織，只是個鬆散的申聯會。事實上，市中學紅代會(籌)還有個沒有說出的理由，就是覺得他們「專門搞對立，不是好組織」。³²但是中申會堅持說自己是全市性的大組織，老造反，一定要作為一方組織參加紅代會，炮司中學部在紅代會(籌)的代表紅鷗也一再幫中申會說話。12月下旬，張春橋表態，說就讓中申會參加吧。³³於是中申會在市紅代會(籌)也有了席位。最初由已經擔任向明中學革委會副主任的王毅捷作為代表，因為大家認為他善於言辭，可以幫中申會說話。但王毅捷所在的紅衛兵組織「反到底」中學部，認為他不是該組織負責人，說派往紅代會者必須是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要求換人。於是換了「反到底」中學部的另一個負責人。

中申會的鼎盛時期不長。市中學紅代會成立兩個月以後，1968年2月，中申會因文章《一切為了九大》遭到批判。骨幹成員全部被辦學習班，中申會從此不復存在。

《紅衛戰報》被三次接管

1966年底至1967年底，上海造反派組織的報刊中，最有影響的一是工人造反派辦的《工人造反報》，二是紅衛兵辦的《紅衛戰報》。

32 這話是當年參加籌建中學紅代會的軍代表、「南京路上好八連」副連長苗生元在筆者2009年8月12日訪談他時說的。

33 張春橋同意中申會參加中學紅代會的籌備，是原南京路上好八連副連長、中學紅代會的軍代表苗生元2009年8月12日對筆者說的。此外，在王毅捷1968年3月26日給市革會教衛組、解放軍同志和市紅代會的《請示報告》中，也提到1967年「12月下旬，張春橋同志指示，讓中申會進紅代會」。

群眾組織小報的興起在1966年底。上海文革中最早的群眾組織小報，是老保紅衛兵上紅總部及上紅大專總部合辦的《紅衛兵》，1966年9月16日創刊。這是文革中上海第一份由群眾組織自己管理、自己編輯的報紙，儘管因為這兩個組織與市委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在辦報內容上難免不受市委影響，但畢竟在上海地區開創了久違的應受憲法保護的出版自由。1966年底，這兩個保守派組織瓦解，報紙也停刊。但其他造反組織的小報隨即遍地開花，不但市級造反組織紛紛辦報，而且許多掛在市級組織之下的區級組織也自己辦報。

《紅衛戰報》是上海第一家紅衛兵造反組織的報紙，由紅革會在1966年10月17日創辦。第一期由紅革會單獨辦；從第二期開始，由紅革會與中學紅衛兵造反組織紅上司聯合辦。據說紅上司向市委申請辦報時，市委讓其與紅革會合辦，說上紅總部與上紅大專總部也是大學生組織和中學生組織合在一起辦報的。當時保守派和造反派還處於拉鋸狀態，市委這樣的安排，顯然一是為了抑制群眾組織正在膨脹的辦報衝動，二是為了節約經費和紙張；當然，可能也有讓大學生引導中學生的意思。紅革會和紅上司接受了這個安排。紅上司往《紅衛戰報》派去了自己的辦報人員。

解放日報事件後，《紅衛戰報》聲名大振，成為上海地區最有影響的紅衛兵報紙。報紙的編輯部設在文匯報社的二樓，兩個大房間。報紙最初是四開的小報，解放日報事件後，從第9期開始，改為對開大報(期間也有少數幾期是四開版面)。第13期上的主辦單位沒有紅上司的名字。紅上司認為紅革會想踢開他們，質問紅革會，紅革會回答說是忘記寫上去了。下一期，又恢復了紅上司的名字。

不過紅上司在辦報方針上確實沒有多少話語權。這份報紙，

名義上是兩家合辦的報紙，實際成了紅革會一家的宣傳機

器。報紙的宣傳中心都由紅革會常委決定，並不通過紅上司；而紅上司提出的內容卻一定要由紅革會常委來審查。

名義上是兩家合辦的報紙，卻只有紅革會一家當編輯，紅上司的人只能搞採訪、搞調查，而且搞來的材料也經常因為「質量不高」、「和目前形勢配合不緊」而被打入冷宮。紅上司的同志外出採訪要證件，紅革會某些頭頭說要「考驗考驗」、「得通過常委」，百般刁難。³⁴

1967年1月底，紅革會帶頭髮起的對張春橋的1.28炮打，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制止。中央文革小組急電發來後的1月30日上午，各派組織都接到緊急通知，讓派人去機關聯絡站所在的淮海路社科院開會，聽取對急電的宣讀。散會後，紅上司在《紅衛戰報》的幾個編輯人員立即討論報紙的命運，擔心紅革會有可能被砸或被解散，而這將會影響《紅衛戰報》的生存。於是，當晚紅上司便連夜派人接管《紅衛戰報》，要求紅革會方面的編輯人員退出編輯部。紅革會到場人員沒有表示異議，他們知道在一片楚歌自身難保的情況下，將《紅衛戰報》移交紅上司，是保全這張報紙最有效的選擇。他們交出了公章和刊頭。就這樣，從1967年1月31日的第21期起，《紅衛戰報》由紅上司一家獨辦。這期報紙的第4版還刊登了紅上司的一份聲明，宣佈「鑑於目前上海的形勢」，《紅衛戰報》自21期起由紅上司主辦。在後面的第22期報紙上，又刊登了一組批判紅革會的文章。紅上司用這一系列行動，撇清自己組織與紅革會炮打的干係。

這是《紅衛戰報》第一次被接管。這次接管，對紅上司也是一個轉折。過去，紅上司的中學生們只是大學生的追隨者；從接管《紅衛戰報》後，紅上司獨立辦報，開始有了自主

34 《紅革會某些頭頭的機會主義思潮必須批判》，載於《聯合報》1967年2月6日，原件藏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意識。³⁵ 紅上司和紅革會的關係非常密切。當初解放日報事件中，最支持紅革會的群眾組織就是紅上司，在解放日報社外靜坐支援紅革會的，許多都是紅上司下面的組織，這是上海的中學紅衛兵組織與大學紅衛兵組織的第一次聯手。所以，紅上司接管《紅衛戰報》，紅革會雖無奈也情願。一個當年參加《紅衛戰報》編輯的紅革會成員，後來回憶說，我們心甘情願地被接管，畢竟這可以使《紅衛戰報》繼續生存。

和《工人造反報》一樣，《紅衛戰報》在版面編排風格上也盡量向《文匯報》靠攏。《紅衛戰報》編輯部在文匯報社的二樓，四樓就是文匯報社的排版組，紅衛兵編輯們經常去四樓向文匯報的排版編輯們學習。也和《工人造反報》一樣，《紅衛戰報》基本不刊登那些道聽途說的「動態」之類，也不轉載一般小報都熱衷刊登的「首長講話」；絕大部分稿件都是原創；對外組稿和編輯部自撰稿相結合，重頭文章一般都由編輯部自己撰寫。

1967年4月，上海市革會政宣組以紙張不足為由，壓縮整頓群眾組織報刊，4月20日在《關於壓縮小報出版的請示報告》中提出：工人群眾組織的報紙只留《工人造反報》；其他職工組織由版司、上藝司和上體司合辦一張報紙，海運和鐵路各保留《海運戰報》和《鐵路工人造反報》但「內部發行」；中學和大學的紅代會(籌)可各出一份報紙。5月9日，市革會政宣組再次提出《目前印刷小報和批判資料情況的意見》，明確批准工總司所屬《工人造反報》(每周二期，大報4版，15萬份)、大學紅代會(籌)所屬《上海紅衛兵》(每周一期，大報4版，15萬份)、中學紅代會(籌)所屬報紙(五天一期，小報4版，10萬份)、版司等籌辦的文化類報紙(每周一期，小報4版，8至10萬份)、各大中小學校教師造反組織籌辦的一份報紙(每周一期，小報4版，8萬份)

35 以上資料為筆者2011年4月19日對原《紅衛戰報》編輯、光明中學學生馮軍的訪談。

以及內部發行的《海運戰報》、《鐵路工人造反報》等共7份報紙。並表示：「其他群眾報刊一定要出版，我們均不負擔紙張和安排印刷」。³⁶

市革會並決定，將《紅衛戰報》作為市中學紅代會(籌)機關報，7月，市中學紅代會(籌)派人接管《紅衛戰報》。7月13日出版的第42期，主辦者由原來的「紅衛兵上海司令部」，改為「上海市中學紅代會(籌)」，期號也改為「紅1號」，後面加了個括弧：「(總第42期)」。不過，原來紅上司的編輯班子，包括主編和主管，全部保留，市中學紅代會(籌)只派去了兩個聯絡員，實際後來常去的只有一人；日常工作仍由原來的編輯人員負責。這是《紅衛戰報》的第二次被接管，接管過程仍是十分平和。

但是這樣的和諧狀況沒有持續多久。原《紅衛戰報》編輯部的人員，主要來自交大附中及光明中學，他們仍然按自己的觀點和主張編輯報紙。這兩個學校是中申會的大本營，他們刊登的文章，好幾篇都是中申會觀點的。於是，《紅衛戰報》的主辦者和刊號換了，但辦報方向卻沒有換。第一期標明由市中學紅代會(籌)主辦的紅1號(總第42期)上，刊登了兩篇文章：《關於中學運動的七點聲明》，以及《必須正確對待紅革會》。前一篇文章話中有話，批判市中學紅代會(籌)的大聯合方針；後一篇文章以「紅衛兵評論員」名義撰寫，為紅革會抱不平：

我們一貫認為紅革會是一個左派組織，儘管她曾經犯過嚴重錯誤，但同她在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取得的功績相比，不過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我們不同意某些團體、某些同志出於自己狹隘小團體的私利，全盤否

36 以上關於市革會整頓群眾組織小報的資料全部引自金大陸著《上海文革運動中的群眾報刊》，載於《史林》2005年第6期，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出版。

定紅革會的錯誤意見，紅革會被你踏平了，上海高校的運動也就叫你糟蹋光了。

這篇文章從一開始就遭到市中學紅代會(籌)的反對，不同意刊登。但編輯部不聽紅代會的。7月11日，市中學紅代會(籌)又以全體委員名義簽署決議，不准刊登這篇文章。但編輯部還是不肯聽從，7月13日下午，得知紅代會已作出不准這期報紙上機印刷的決定，編輯部趕在紅代會來電話之前，加快速度印出報紙並馬上裝車發送。市中學紅代會(籌)很惱火，7月19日通知承接印刷《紅衛戰報》的文匯報社，停止印刷《紅衛戰報》，³⁷在此之前，市中學紅代會(籌)還以不供應紙張的辦法，試圖制約這個不聽話的編輯部。但是為時已晚，文章還是登出了；³⁸ 8月4日出版的紅2號(總第43期)和9月4日出版的紅4號(總第45期)，經過一番周折後也都出版了。³⁹ 這兩期的針對性更強：總第43期上長文《革命紅衛兵的功勳是什麼》，批判大型歌舞劇《萬歲》；總第45期上刊登長文《大反特反實用主義》，批判市中學紅代會(籌)的大聯合「敵我不分」，是「實用主義」。就這樣，《紅衛戰報》名為市中學紅代會(籌)機關報，實與市中學紅代會(籌)公開唱反調。

市中學紅代會(籌)無法管轄這個不聽話的編輯部，加上當時各紅衛兵軍區正在相繼成立，作為市中學紅代會(籌)的機關報，只由紅上司一家編輯也缺乏代表性。市中學紅代會(籌)於是從

37 據朱維錚所收集的關於中申會的資料中，一份題為《中申會要員江××對×××的講話紀要(摘要)》中說：「上次紅一號上刊登的《必須正確對待紅革會》就是在紅革會中學部的人的指導下寫的，偷偷地去印的。等到他們(市革會)發現，已經來不及了」。

38 《紅衛戰報》1967年紅2號(總第43期)刊登的《紅2號為什麼遲遲不出?》，作者是《紅衛戰報》編輯部工作人員。

39 「紅2號」後面的8月12日，《紅衛戰報》和《東方紅報》出版了一期批判上柴「聯司」的「聯合專刊」沒有標明期號，但下一期的《紅衛戰報》的期號是「紅4號」。

各軍區抽調人員，另外成立編輯部。先是換出入證，原來的編輯人員均不發給新出入證；後來乾脆將借用的房間退還文匯報社，編輯部全部遷離，搬去文革前的《青年報》報社。從1967年9月15日的紅5號（總第46期）起，《紅衛戰報》完全由市中學紅代會（籌）掌管。在這一期上，第一個版面就是通版的《毛主席論反對「左」右傾》，全是毛澤東的有關語錄；第三版刊登署名「紅匕首」的評論《千萬不能再搞派性鬥爭》：「『響當當，硬梆梆』的老造反從來不是可以自封的」。顯然，這些內容都是針對中串會的。這是《紅衛戰報》的第三次被接管。從此《紅衛戰報》從辦報人員到辦報方針，完全歸市中學紅代會領導。

1968年初，市革會再一次收縮群眾組織小報，4月25日，《紅衛戰報》與市大學紅代會機關報《上海紅衛兵》合刊，改名為《上海紅衛戰報》，作為市大學紅代會和市中學紅代會共同的機關報。編輯人員更換，期號從「忠」字第一號起。1969年5月，《上海紅衛戰報》和一直作為校刊發行的《新師大戰報》、《復旦戰報》等都被停刊。⁴⁰ 上海群眾組織報刊只剩工總司的《工人造反報》。

三派紅衛兵三台戲

如果以對文革的態度劃分，1967年的上海，紅衛兵中存在着三大派別。

一派是正在醞釀大聯合，準備籌建市大、中學紅代會的紅衛兵組織，市革會正努力將他們納入規範，他們也盡力按市革會的要求開展校園內外文革。雖然他們內部仍在為紅代會的席位爭吵，但他們的行動基本符合文革新秩序要求，與市革會關

40 以上關於市革會整頓群眾組織小報的資料全部引自金大陸著《上海文革運動中的群眾報刊》；來自筆者2011年4月19日對原《紅衛戰報》編輯馮軍的訪談。

係較密切。由於他們在各學校已經建立或正在籌建的「紅衛兵團」中都是負責人，所以他們被稱為「兵團派」。他們正在成為上海紅衛兵的主流派。一派是反主流派，在中學以中串會為代表，大學以紅革會和炮司為代表。還有一派是1966年文革初期的那些老保紅衛兵，更準確地說，是一批幹部子女，他們原來是上紅總部的骨幹或核心。上紅總部被解散後，不願加入造反派紅衛兵，在學校另立組織，長期與造反派紅衛兵對立。中串會提出的打聯動和批判血統論，正是針對他們的。他們因此與中串會十分對立，與持中串會觀點的組織時有衝突。

1967年夏，一向領風氣之先的北京紅衛兵興起大型歌舞熱潮，一些業餘文藝愛好者自己創作排演大型歌舞。與此同時，全國各地也出現不少節目。這些節目的結構和表現形式，大都模仿文革前被主流媒體着力讚揚的大型歌舞劇《東方紅》，集朗誦、獨唱、合唱和舞蹈於一體。在上海，當時受市革會大力支持而排演的文藝節目，還有大型歌舞劇《一月風暴》，演出人員共120人，一半是專業演員，一半是工總司下面造反組織的文藝小分隊隊員。

上海的三大派系紅衛兵也分別排出了三台戲。以文藝表演張揚自己的觀點，表現自己的存在。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三派紅衛兵各自排練出歌舞劇或大合唱：兵團派紅衛兵排練了大型歌舞劇《英雄的紅衛兵萬歲》，當時被簡稱為《萬歲》；中串會排練了《前進，毛主席的紅衛兵》，也是大型歌舞劇，被簡稱為《前進》；幹部子女紅衛兵排練的是大合唱《紅衛兵組歌》，被簡稱為《組歌》。

兵團派的《萬歲》，是在市革會的關心和大力支持下排練的大型原創歌舞劇。參加演出的有：上海音樂學院、上海戲劇學院、上海舞蹈學校、上海戲曲學校、上海兒童藝術劇院，都是藝術院校或藝術團體，加上復旦大學。參加演出的成員，除了兒童藝術劇院，都是紅衛兵。《萬歲》於6月16日和6月25

日正式演出；7月1日又在文化廣場演出，⁴¹ 徐景賢等市革會領導觀看演出並上台祝賀，電視台轉播。《文匯報》報道了《萬歲》的演出，說它「氣勢磅礴，洋溢着革命戰鬥豪情，演員們激情高昂，富有革命造反精神」。⁴²

但《萬歲》演出沒幾場，就遭到反主流派紅衛兵的批判，說它「要害是模糊兩條路線的鬥爭」，⁴³ 尤其中串會，認為《萬歲》「把紅衛兵緊跟毛主席批判走資派的歷史」，「歪曲成了破四舊與大串聯史」。7月1日那天演出剛結束，就有復旦紅革會的紅衛兵跳上舞台當場批判。中串會態度更是激烈，在8月4日的紅2號《紅衛戰報》上，以四分之三個版面，刊登長文《革命紅衛兵的功勳是什麼》，批判《萬歲》。

中串會的《前進》，也是原創大型歌舞劇。劇本執筆者主要是由交大附中、市西中學、徐匯中學等五所中學紅衛兵組成的編寫組，從1967年6月開始編寫，一個多月後完成。中串會決心編排出超越《萬歲》的節目，在編寫的歌舞劇本中，專門添加了上海紅衛兵「與走資派鬥爭」的兩場戲：「戰《解放》」和「一月革命」。

《前進》最初演出時，沒有明確主辦方。有人提出以中串會名義，但有人不同意，覺得中串會本身在當下中學運動中有爭議，別惹麻煩。最後決定署名「上海中等學校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演出。而實際上，參加演出學校的組織者們絕大多數是中串會觀點的，一共有40多所中學。交大附中人數最多，有40多人，其次是南洋模範中學、上海中學、比樂中學、向明中學、復旦附中以及徐匯中學。《前進》的演出陣營龐大：光是

41 關於《萬歲》是市革會支持的及其演出情況，引自《文匯報》1967年6月30日《英雄的紅衛兵萬歲明再度上演》。

42 同上。

43 這句話引自紅代會(籌)上海戲劇學院《革命樓》編輯部1967年7月6日編第93期《革命樓通訊》：《「英雄的紅衛兵萬歲」要害是模糊兩條路線鬥爭》，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樂隊就有80人，此外，舞蹈120人，合唱120人。雖然演出內容表現紅衛兵，服裝就是平時的軍裝，不需要服裝費，而且演員演出也全部是義務，最初既不發夜餐費，也無交通津貼，但其他方面多少總還是需要一些經費，例如舞台布景等。於是大家去賣廢紙，把學校和街上的過期大字報撕下賣，還割草賣過，甚至曾有賣血的打算。不過，後來賣門票有了些收入，解決了成本費用以及演員的夜餐和交通費。

市革會對《前進》不支持。《前進》排練後，組織者們在市革會文藝組軟磨硬泡了好幾天，要求給予演出場地。徐景賢批示：「給他們演三場，然後復課鬧革命」。一次，徐景賢去上海交通大學作報告，中申會的許錦根特地等在交大外面；待徐景賢做完報告出來時，許錦根上前邀請他去看《前進》。但徐景賢說：我不會去看，你們的任務是復課鬧革命，這種跨地區跨學校的演出，我不贊成。⁴⁴

為了尋求支持，《前進》劇組設法請到工總司的潘國平、戴立清、陳阿大和耿金章等觀看演出。公開身份是《解放軍報》記者的中央文革特派記者邢文舉，以及《紅旗》雜誌記者王某，也曾在《前進》排練時被請去觀看過。《前進》的組織者希望通過這些通天記者和已經躋身主流的工總司頭頭之口讚揚演出，從而獲得合法資源。工總司總部不久果然在《文匯報》上表態。但不是表示支持：

一位總部常委去觀看了為樹立一派旗幟而排演的戲，並表示這個戲是好的。結果，這一派就大造輿論，說工總司支持他們的演出。領導成員之間就開展了思想交鋒。這個常委開始想不通，認為只是支持他們的戲，而不是支持他們的派。大家擺事實，講道理，指出即使這個戲是好的，但也是為樹立派性旗幟而演出的，你從跨進劇場的第一步，

44 這是當事者對筆者的回憶。

就是支持了他們的派性。這個常委認識了自己的不對，堅決改正。⁴⁵

徐景賢和工總司的態度，全都來自張春橋，張春橋對這個演出不支持。1967年12月30日，上海中學紅代會成立時，《前進》劇組的許錦根在後台，給出席紅代會的張春橋遞紙條，邀請張觀看《前進》。張斷然拒絕，說：《前進》在上海演一百年，我也不會去看！⁴⁶

對這個演出，最反對的是籌建中的中學紅代會，認為這是為中申會樹旗幟，是「派戲」。為此，《前進》演出時，有幾次差點被衝砸。

《前進》自1967年9月26日，至1968年2月28日，共演出76場。1968年2月，中申會因《一切為了九大》文章遭批判，《前進》的演出隨之停止。

如果說，《萬歲》是一群文藝愛好者，借演出實現自己的文藝表演欲望；那麼《前進》更多是中申會對自己組織形象的有意識張揚；而《紅衛兵組歌》，則是一幫幹部子女不甘被文革邊緣化的行動。這幫康平路事件後，被沉寂了大半年的老保紅衛兵，在1967年7、8月又以排練《組歌》，顯示自己的存在。參演者都是原來老保紅衛兵的核心——幹部子女。他們的《組歌》不是原創，是北京101中學的高中學生改編自《長征組歌》的大合唱。將文革前夕蕭華上將撰詞的大合唱《長征組歌》，重新填詞，音樂旋律還是原來的。《紅衛兵組歌》1967年5月在北京的幹部子女中上演後，傳到上海。

45 1968年4月6日《文匯報》《一支自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主力軍——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46 這是當事者對筆者的回憶。又據1968年1月16日第一期《紅衛兵通訊》（這是份油印小報，沒有注明編輯單位）：12月30日在文化廣場後台……張春橋同志很氣憤地說：「什麼《前進》不《前進》，凡是派性的戲我都不願看，我在上海一場也不會去看」。

整個組歌最為自豪和強調的，就是紅衛兵組織的誕生、破四舊以及大串聯。這三個階段，正是幹部子女最輝煌時期。為了更貼近上海的文革，有些歌詞被修改，和北京略有不同。例如，在「串聯」一節中，原歌詞中有「九四上海雨夜寒，松花江畔英姿豪」句，前一句唱的就是1966年9月4日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事件。但上海幹部子女當時大多保上海市委，反對來上海串聯的北京紅衛兵，還和他們辯論過。於是這兩句歌詞在上海就被改為「渴飲延河清泉水，飢餐井岡大南瓜」。

組歌的中心是歌頌早期紅衛兵也即「老紅衛兵」的造反經歷，是失勢的幹部子女對失去的輝煌的懷念，歌詞反映出他們固執的批判指向：

驚四海，震五洲，降妖魔，鬼狼愁；
驚四海，震五洲，降妖魔，鬼狼愁！
八月革命風雷激，紅衛兵英勇破四舊，
條條大街戰鼓響，破舊立新反帝修，
橫掃一切害人蟲，鎮壓地富反壞右，
小將血戰紅八月，紅衛兵萬代美名留！

尤其當唱到「鎮壓地富反壞右」時，指揮者總要特地指揮全體合唱人員，三呼口號：「鎮壓地富反壞右！鎮壓地富反壞右！！鎮壓地富反壞右！！！」這是上海的演出者特地加上去的。⁴⁷

《組歌》參演者主要來自南洋模範中學、上海中學、第五十四中學、第五十一中學以及松江二中等學校，都是幹部子女較多的中學。1967年8月左右，《組歌》曾經在南洋模範中學和位於普陀區的101廠大禮堂演出過。由於演出場次少，在當時影響不大。

47 筆者當年曾參加過《組歌》的排練，所以記得這個細節。

這一時期，比較有影響的還有紅革會的《紅衛戰歌》，參演單位主要是復旦、師大、師院、交大等大學的紅革會，到1967年11月左右共演出過十幾場。

大學紅衛兵組織的大聯合

上海各大學的大聯合也不少波折。不少大學一波三折，很不順利。

紅革會、紅三司、炮司的發源地復旦大學，是上海高校中第一個實現大聯合的。1967年3月22日，復旦各造反組織，聯合成立上海全市大專院校中第一個以教學班為基礎的紅衛兵大聯合組織：「紅衛兵新復旦師」。成立大會在江灣體育場召開，全校六千多人參加，原紅革會的夏三弟擔任負責人。徐景賢到會講話，並被聘為「顧問」。上海兩報《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為此都發了消息。原紅革會的馬立新、謝葆晨、趙基會、金應忠，都先後成為「新復旦」的師部勤務組、作戰組、幹部組的成員；紅三司的潘嘯龍與東方紅公社的胡守鷹，都是副師長。

但是，復旦的大聯合是聯而不合，沒有多久就出現裂痕。起因是反對主持復旦工作的郭仁傑所推行的反逆流。「反逆流」實際就是批判參加過1.28炮打的頭頭們，而復旦三大組織當時都積極參加過炮打。4月13日，紅三司的譚啟泰、潘嘯龍等成立了「8.18串聯會」；4月25日，東方紅公社的胡守均，又聯合紅三司的一些戰鬥組，成立了「8.25串聯會」。8月3日，紅三司的安文江、潘嘯龍、譚啟泰等貼出大字報，宣佈退出「紅衛兵新復旦師」；8月5日，由「8.18串聯會」發展而成的「8.18兵團」，宣告另外成立「紅衛兵紅復旦8.18總部」，打出反對郭仁傑的旗子，負責人潘嘯龍、譚啟泰、安文江、蔡祖泉、吳中傑等。幾天之內，就從五十多人發展到一千多人。3月初大聯

合的復旦，重新又分裂成三派組織：「紅衛兵新復旦師」（「新復旦」）、「紅衛兵紅復旦8.18總部」（「紅復旦」）、「8.25串聯會」（「8.25」）。

一直到1967年的9月，在市革會的一再催促下，復旦的三派組織才重新實行大聯合，成立「8.18紅衛兵師」，原紅三司的潘嘯龍擔任師長，紅革會的趙基會為副師長，紅三司的安文江、潘嘯龍、譚啟泰等進入勤務組。但是，在這個大聯合組織中，三大派紅衛兵組織仍然貌合神離。籌建校革委會時，為了誰當「第一把手」，鬧得不可開交。原「8.25串聯會」欲推胡守虞為校革委會主要負責人，遭到其他派別的反對；胡守虞又提出，校革委會不設第一負責人，不排名次，由校革委會召集人們輪流「值班」。這個建議上報到市革會，未獲批准。就這樣，復旦大學的幾派紅衛兵組織合了分，分了又合，直到1968年1月25日，復旦大學革委會終於成立。紅革會的趙基會為第一召集人，紅三司的潘嘯龍為第二召集人，東方紅的胡守均為第三召集人。常委有：紅革會的謝葆晨、紅三司的譚啟泰、炮司的周谷聲，等等；委員有紅革會的勞元一、紅三司的安文江、炮司的邱勵鷗，等等。⁴⁸

相比之下，同濟大學的大聯合比較順利。同濟東方紅，是上海人民公社發起組織之一，在市裏比較有影響，校園裏的其他造反組織沒有一個能夠與之匹敵。據說剛成立時的一千多人，後來發展到四千五百多人，佔全校師生員工總數的70%左右。⁴⁹ 1967年6月1日，同濟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這是上海高校成立的第一個校革委會，革命委員會主任是城建系三年級學生陳敢峰。姚文元出席成立大會並講話。

48 以上資料主要引自復旦大學1986年5月編《大事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組織》。

49 這些數字引自《文匯報》1967年6月2日報道：《同濟大學革命委員會在鬥爭中產生》。

有師生六千多人的華東師範大學，大聯合曲曲折折。華師大最大的造反組織是紅革會，此外，還有紅三司、「造反大隊」等組織。1967年1月23日，紅革會聯合另外四個組織成立「新師大公社」。這個組織在不久的一月奪權中，成為上海人民公社發起組織之一。

但是，新師大公社成立時，因為將另一些被認為「右傾」的組織排斥在外，被排斥的組織誓言「不砸爛偽公社死不瞑目」，甚至早上晨練跑步時，也邊跑步，邊高喊口號：「砸爛偽公社！砸爛偽公社！」新師大公社則認為自己是上海人民公社發起組織，反對自己就是反對市革會。雙方的大標語貼遍全市，宣傳車四處活動，還舉行遊行示威，集會聲討，直至武鬥。⁵⁰ 就這樣，華師大的兩派內戰，從1967年1月底打到3月，兩個月的派仗，用去筆墨紙張等費用共一萬多元，⁵¹ 這在當時是很大數字。4月18日，華師大兩派終於聯合，成立「紅衛兵新師大師」。雖然師大的紅革會也曾捲入1.28炮打，原來的負責人葛焱被批判，但紅革會是大派，所以由紅革會的劉浩德任負責人。徐景賢到會並講話。6月17日，華師大校革委會成立。市革會將華師大的大聯合作為經驗，又去推動其他大學的大聯合。

在上海交通大學，最初的大派組織是交大反到底。反到底組織的等級很嚴密：核心是「反到底紅衛兵」，外圍是「反到底戰士」，再外圍是「反到底預備戰士」，劃分的依據是參加者的家庭出身。其他組織有交大紅三司、交大紅革會，以及革命造反團等。其中紅三司，本來勢力很雄厚，但因1.28炮打張春橋而式微。而在整個文革中，交大反到底始終只是交大校園內的紅衛兵組

50 以上關於師大的資料主要引自《在戰鬥中聯合，聯合起來戰鬥——華東師大紅衛兵是怎樣實現革命大聯合的》，載於《上海紅衛兵》1967年5月1日創刊號，上海市大專院校紅代會籌委會編。

51 《「內戰」的經驗教訓——紅衛兵新師大師代表5月10日於文化廣場發言摘要》，載於文革時期的小報《中學通訊》1967年5月28日，《上海公社》編輯部通訊組編。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織，沒有像復旦大學的紅革會和紅三司那樣發展成為全市性組織。

反到底是上海人民公社發起組織。反到底的負責人之一余小兵參加了上海人民公社的籌建，另一個主要負責人嚴步東後來也是市革會的成員；所以反到底在交大一家獨大，不把其他組織放在眼裏。反到底認為自己是老造反，上海文革重大事件都參加過，對工總司成立出過大力；而紅三司和紅革會則參加過對張春橋的炮打，是「犯錯誤組織」。所以，要大聯合，必須以反到底為核心。但交大的紅革會和紅三司等並不買反到底的賬；尤其紅三司，文革初期在交大所起作用不遜於反到底。4月12日，交大的紅革會、紅三司和革命造反兵團等，聯合成立「上海交通大學紅衛兵師(籌)」(簡稱「紅師籌」)。由於是幾個組織的聯合，所以人數一下子超過了反到底。紅師籌成為大派，反到底成了小派。但反到底認為紅師籌是「大雜燴」，「沒有群眾基礎，必須立即解散」；⁵² 反到底總部在紅師籌成立的前一天，4月11日，發表了一個聲明，《關於上海形勢的聲明》，態度強硬地強調大聯合要「以左派為核心，為領導力量」：

革命的大聯合，首先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它必須旗幟鮮明，堅持鬥爭。具備條件，講究方法。而決不是烏七八糟的大雜燴；革命的大聯合，必須強調以左派為核心，為領導力量，而決不能搞「全民黨」，政權平分，最後導致右派掌權；必須大樹左派和左派組織的權威，大長左派的志氣，而決不准抓住左派的缺點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抹殺左派的功勳；應該歡迎保守派的同志，犯錯誤的幹部起來造反，但絕不許歪曲「革命不分先後」、「造反不分遲早」的正確口號，來混淆左中右的階級陣線；歡迎對左派提意見，幫助開門整風，但絕不允許借此把左派打下去，把保守派抬起來，

52、這些話轉引自《上海交通大學紀事 1896-2005》，上海交通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顛倒歷史！一句話，誰否定無產階級革命派，誰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歷史成就；誰打擊無產階級革命派，誰就是打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必須發展壯大左派隊伍……整頓、鞏固、發展、強化左派組織，而不是什麼不分青紅皂白，「踢開總部」，解散左派組織，瓦解左派隊伍。大聯合也只能是為達此目的，否則就是適應階級敵人的需要，就是迎合資本主義復辟逆流的需要，就會使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廢！大聯合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把聯合當作最高目的去追求，那不是糊塗蟲，就是騙人的假動作。那種解散一切組織搞「全民黨」的做法，那種迎合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保守勢力的需要，在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前面，強迫左派組織，特別是左派力量比較弱的單位的左派組織解散的做法，是極端錯誤的！⁵³

這個聲明完全針對正在籌備的紅師籌大聯合，同時也是對壓倒一切的「大聯合」強烈不滿的表達。聲明一出，立即在校園內引起爭論，說這個聲明的核心就是「以我為核心」。幾天後的4月18日，反到底又舉行成立半周年紀念大會，馬天水和駐滬三軍代表到會並講話。反到底以這一連串的行動表達對大聯合的反抗。

5月10日晚上，為了促進交大的大聯合，市革會教衛組邀請反到底和紅師籌代表開座談會，建議紅師籌吸收反到底代表參加，由紅師籌6名、反到底4名代表，組成核心小組。但是反到底代表不同意，認為這樣就成為以紅師籌為核心，讓反到底去加入，這是瓦解左派隊伍。紅師籌也不同意6比4的名額比例，

53 《對目前上海形勢的聲明》，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總部 1967年4月11日，載於1967年4月17日第12期文革小報《反到底》，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動態組主辦。

而且堅持名單要按巴黎公社原則讓群眾討論。市革會撮合的這次聯合於是沒有成功。幾天後，5月19日晚，市革會在人民廣場召開聲討香港英國當局大會，會後遊行。紅師籌等主張打着上海交通大學的旗幟參加大會，反到底堅持要打「交大反到底」的旗幟。最後，反到底單獨遊行。

交大的大聯合就這樣始終無法實現。一次，張春橋向毛澤東談到交大的大聯合情況。張春橋說反到底不肯大聯合，是因為以誰為核心的問題沒有解決。毛澤東說：「什麼『以我為核心』，這個問題要解決。核心是在鬥爭中實踐中群眾公認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為核心』是最蠢的。」⁵⁴張春橋即在9月11日的市革會會議上傳達了毛的這個講話。9月19日，反到底和紅師籌終於聯合，成立了「交大紅衛兵師」。⁵⁵

在上海高校，大聯合比較曲折的學校還有：上海師範學院、上海中醫醫學院、上海鐵道學院、上海科技大學、上海水產學院、華東化工學院、華東紡織工學院。其中師院、鐵道、科大、華東化工、華紡，還曾發生多起武鬥，華東化工學院甚至因武鬥打死1人。

到5月4日，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音樂學院、上海戲劇學院、上海水產學院、上海海運學院等，實現了全校紅衛兵大聯合。而到9月20日，又有21所大學實行大聯合，至此，上海絕大多數高等院校都實現大聯合。

大學紅代會成立

1967年初的炮打張春橋事件後，上海最有影響的三大大學

-
- 54 《中央首長講話第二集》，南京郵電學院紅色造反團遵義戰聯1967年10月印。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聯合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也有收錄。
- 55 以上關於交大大聯合的資料主要引自上海交通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2006年編《上海交通大學紀事 1896-2005》。

生紅衛兵組織紅革會、紅三司、炮司，遭到毀滅性打擊。之後市革會派往復旦的郭仁傑，在復旦組織「反逆流」，整肅參與炮打的各派負責人，三派組織更是從此一蹶不振。而另一個在全市有影響的組織交大反到底，只有部分負責人參加1.28炮打，連忙撤換負責人，避免了全軍覆沒。這樣，有全市性影響的大學紅衛兵組織，只剩同濟東方紅，再加半個交大反到底。

一部分紅革會總部成員不甘被排擠出主流造反派，於1967年4月發起「重振紅革會軍威」，在一些大學成立了紅革會聯絡站。這個試圖東山再起的行動，馬上遭到同濟東方紅等組織的斥責，宣佈要「撕碎紅革會的破旗」，還砸了一些學校的紅革會聯絡站。此時的大勢已經是大聯合，紅革會重振軍威，既不合時宜，又遭其他組織打壓，市革會徐景賢也表示不贊成，最後不了了之。至於紅三司，自炮打後，總部負責人安文江等都遭批判，交大的紅三司接管了市總部，負責人雖仍然是安文江，但此時他對總部的事務已經了無熱情，不管不問；而交大紅三司，在交大校園內敵不過反到底，在市裏更是沒有什麼名氣，撐不起市面。1968年3月15日，紅三司在大專院校紅代會(籌)主辦的《上海紅衛兵》上發表聲明，撤銷市總部。⁵⁶ 至於炮司，本來人數就少，再因炮打受到批判，活動目標轉向外地，不再對上海局勢起影響。1967年9月下旬，炮司宣佈解散總部。

三大組織一蹶不振，大學紅代會的籌建便少了爭執。雖然，許多學校大聯合實際是貌合神離，聯而不合，但是畢竟以大聯合的要求，強制那些打內戰的學生坐到一起，就是恢復學校秩序的第一步。有了大聯合，才能恢復建立學校的權力機構。雖然波折不少，但比起中學，難駕馭的大學生的大聯合似乎要順利些。這也是因為全市中等學校有近519所，中學生64萬，市紅代會委員、常委的位置不易平衡。上海大專院校數目相對少得多，只有37所(其中24所全日制大專院校、13所半工半

56 1968年3月17日《上海紅衛兵》。

讀大專院校)。只要學校聯合了，市級紅代會的委員、常委位置，也就容易協商得多。對此，張春橋在1967年的一次市革會擴大會議上評論：「有一些主要的大學聯合得比較好，中學差些。」⁵⁷

不過，儘管紅革會因炮打而元氣大傷，但畢竟是大學中人數最多的組織，在大多數學校都是大派。所以各校大聯合後的「勤務組」，紅革會仍然佔了多數。以下是當時上海紅衛兵小報刊登的1967年上海部分高校大聯合情況。從表格可以看出，在許多大學，大聯合後的「勤務組」中，紅革會仍佔了優勢：

《上海高校大聯合概況》⁵⁸

學校	大聯合前 紅衛兵組織名稱	聯合 日期	勤務組 比例	大聯合後 名稱
上海師範學院	打劉指揮部(紅革會)， 井岡山總部	67.9.18	7:7	師院革命造反總部
上海外國語學院	野戰軍(紅革會)， 紅三司	67.9.20	9:4	外國語學院紅衛兵師
上海機械學院	紅革會， 紅三司	67.9.15	7:3	機院紅衛兵師井岡山 總部
上海第一醫學院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東方紅紅衛兵， 紅聯會	67.9.19	5:4:1	一醫紅衛兵師
上海科技大學	紅革會， 紅三司	67.9.19	未定	科大紅衛兵師革命造 反總部
上海工學院	紅革會， 東方紅兵團(紅三司)	67.9.18	未定	工學院紅衛兵師

57 張春橋 1967 年 4 月 12 日在市革會擴大會議上海的講話。引自葉昌明 1967 年 3 月 30 日——1967 年 5 月 19 日工作筆記：《徐景賢傳達春橋、姚文元同志精神》。

58 原表格載於《情況交流》1967 年 9 月 26 日第 206 期，復旦大學《情況交流》編輯部編。原文為鋼板刻字油印，16 開。表格中的「勤務組比例」，為各派紅衛兵組織代表在大聯合後的學校紅衛兵組織中所佔席位比例。

上海財經學院	紅革會， 紅三司， 炮司， 臨造會	67.9.18	未定	財經紅衛兵師革委會 (籌)
上海體育學院	東方紅公社(紅革會)， 紅三司	67.9.19	7:4	體院紅衛兵師
上海鐵道醫學院	紅革會， 紅三司	67.9.19	4:4	鐵醫紅衛兵團
華東政法學院	紅革會， 紅三司， 64(1)文革籌	67.9.19	5:4:1	華政紅衛兵團
上海半工半讀師範 學院	紅革會， 井岡山總部	67.9.18	7:7	半師革命造反總部
上海鐵道學院	紅三司， 井岡山	67.9.19	不清	鐵道紅衛兵師
上海交通大學	紅師籌， 反到底	67.9.19	5:5	交大紅衛兵師
復旦大學	新復旦師， 紅復旦8.18總部， 8.25	67.9.19	5:5:3	復旦8.18紅衛兵師
上海第二醫學院	紅革會， 紅三司	67.9.19	不清	二醫革委會(籌)

1967年10月28日下午，上海市大專院校紅代會第一次籌備會議在市革會文教組會議室召開。籌備會提議：由九所高等院校各派一名紅衛兵代表，組成大專院校紅代會籌備小組，負責大學紅代會的各項籌備工作；並委託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以及政法學院，分別起草《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大會決議》以及《紅衛兵組織條例》。籌備會還提議：由全市37所上海大專院校的紅衛兵主要負責人，組成上海市大專院校紅代會委員會；籌備會「根據革命性代表性適當照顧地區性的原則」，推薦同濟大學的陳敢峰、華東師範大學的劉浩德⁵⁹、上海

59 劉浩德，男，1941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華東師範大學學生，中共預備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華東師範大學紅衛兵組織「紅革會」主要負責人，1968年畢業分配至上海黃山茶林場；文革中歷

交大的嚴步東，上海戲劇學院的陸振球、復旦大學的趙基會、上海師範學院的繆財生⁶⁰、上海水產學院的龐尊思，以及上海科技大學、上海第一醫學院、上海海運學院的紅衛兵師或團的主要負責人，加上三所半工半讀大專院校紅衛兵主要負責人，組成13人的常委會。常委會的人數佔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⁶¹ 11月17日，上海市大專院校紅代會在文化廣場成立，會議開了兩天，19日的閉幕式上，張春橋到會並講話。

1973年2月12日至17日，共青團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會召開。上海團市委重建，團市委書記陳新發、汪明章、鄭均培、萬桂紅，上海的共青團組織恢復活動。但上海的中學沒有建團，紅衛兵組織取代了文革前設在中學的共青團組織，直至文革結束，是全國的唯一。在全國所有的省市，中學裏的紅衛兵與共青團組織並存，表現好的紅衛兵可以入團。但上海認為紅衛兵是文革產物，紅衛兵表現好才能入團，意味着共青團的要求和地位比紅衛兵高，這是對文革的否定。所以上海的中學不設共青團。但畢業前，紅衛兵可以轉為共青團員。⁶² 至於大學的紅衛兵組織，由於文革中的所有的大學生全部畢業，以後又有好幾年大學停止招生，所以上海大專院校紅代會只運作了一年不到，便不再存在。到「工農兵學員」進校後，重建共青團，但大學生的紅衛兵組織沒有再恢復。

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上海黃山茶林場黨委副書記。文革結束後被判刑9年。

60 繆財生，男，1940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師範學院政治歷史系學生，共青團員，政史系團總支書記。文革中曾任師院「紅革會」常委，上海市大學紅代會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1968年畢業分配至南京中山化工廠。

61 以上關於大專院校紅代會籌備會議的決定引自1967年10月28日《上海市大專院校紅代會第一次籌備會議紀要(供討論)》，金大陸提供。

62 金大陸主編《上海青年志》專記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鄉運動》，《上海青年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上山下鄉結束紅衛兵運動

文革從1966年開始到1968年，兩年多時間裏，本應畢業的1966、1967、1968三屆學生全部滯留在學校，中央一再提倡的「復課鬧革命」又未能真正實現。於是，讓這些學生統統畢業，是最好也是最現成的辦法。

還是在1967年9月，中央已經考慮將66屆大學生畢業分配。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1966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問題的通知》，提出：「分配大專院校畢業生，必須面向基層，面向工廠，面向農村。可以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單位，也可以分配到集體所有制單位，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在三大革命運動中鍛煉成長，做一個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⁶³ 文件中三個「面向」，後來的報刊上又加上一個「面向邊疆」，成為文革中畢業生分配去向的原則，簡稱「四個面向」。

1968年3月30日，毛澤東在黑龍江省革委會關於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工作的報告上批示：「我看這個文件好，可否轉發各地參考，請酌定。因畢業生分配是個普遍問題，不僅有大學，且有大量中、小學。」⁶⁴ 文件隨即在4月初轉發全國。全國各地大、中學生的畢業分配工作展開。在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畢業的學生全部由國家包分配。

1967年9月26日，上海市革會發出《關於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1966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問題的通知》的通知》，規定「可以有少數骨幹留校」，對於「在政治上有嚴重問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言行，以及道德品質嚴重敗壞或犯有嚴重的貪污盜竊而又屢教不改的個別畢業生，經群眾討

63 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年第二版。

64 同上。

論，報經市革會畢業生工作委員會審查批准，暫不畢業，生活上仍按學生待遇，留待運動後期處理」⁶⁵ 上海的大學畢業生分配開始。

一些被認為表現好的大學畢業生被分配在上海。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負責人陳敢峰，被分配至上海第五鋼鐵廠，1970年3月被任命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不過這個職務是象徵性的，不脫產，工作還在上鋼五廠。交大反到底負責人嚴步東，被分配進上海滬東造船廠。交大反到底的另一負責人余小兵，被分配進上海5703廠。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交大反到底楊小兵，被分配在上海江南造船廠，後來擔任市革會常委、共青團上海市委副書記。華東師範大學紅革會負責人劉浩德，被分配至安徽屬於上海管轄的黃山茶林場，後來擔任上海市革會常委，黃山茶林場負責人。等等。

那些參加過炮打的紅衛兵頭頭們則無此幸運。據說市裏有指示，這些人一律不留在上海。⁶⁶ 紅革會負責人、復旦大學學生馬立新，被分配至南京734工廠工作。紅革會負責人、上海師範學院學生李功佐，被分配至廣西省的一所學校當老師。紅三司負責人、復旦大學學生安文江，被分配至江西省瑞昌縣武山銅礦當井下礦工，整整十年。在礦區下井的其他大學生1972年後都陸續調到地面做技術工作，文科生基本調任教師，只有他因為參加過1.28炮打，始終是井下運礦工人，加工資自然沒他的份。後來總算有個隊領導照顧他，讓他當測量工和信號工，但也還是井下工作。⁶⁷ 紅革會負責人，復旦大學勞元一，1968年12月被分配至安徽農場，後來他自己設法調往北京工作。1971

65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匯集》(四)，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室1968年2月編印)

66 這是當年駐復旦大學工宣隊負責人張扣發回憶的。金大陸、金光耀、李遜2009年5月17日對張扣發的訪談。

67 《我不懺悔》，安文江著，《東方紀事》1988年創刊號，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

年6又被從北京抓回上海，關在復旦大學，重新調查他的1.28炮打之事。家裏人來看他，不被允許見面，他於是絕食，還給徐景賢寫信。1974年被放出，在復旦大學挖防空洞，「敵我矛盾作內部矛盾處理」。⁶⁸

也有參與炮打而始終不被分配工作的學生。如復旦大學孫悟空的胡守虜，因炮打張春橋，被判刑十年，關押八年。和胡守鈞一起的周谷聲，因參與4.12炮打，被「戴反革命帽子」，在復旦的機修廠「勞動」。所有這些人，都直到文革結束後，方獲平反。還有因為其他問題不被分配的。例如上三司負責人，上海戲劇學院學生趙全國，1967年一月奪權時被抓，關在第一看守所，直到當年5月才放出。以後一直在戲劇學院挖防空洞，直至文革結束。⁶⁹

中學生人數遠比大學生多得多。三屆的初、高中學生擠在一年分配，而且這三屆的中學生正是1949年前後人口出生高峰時期出生的。據統計，光是上海1966屆的初中畢業生就近15萬人，高中畢業生近3.1萬人。而1966年和1967年兩屆中學生人數更達44.5萬多人。⁷⁰ 上海城市無法消化如此巨大的新增勞動力，所以「四個面向」政策中能夠「面向工廠和基層」者不多，大批畢業生只能「面向農村」。1968年7月8日，上海市革會成立「上山下鄉辦公室」，各中學都成立畢業生分配工作組，開始1966、1967、1968三屆畢業生的畢業分配。主要是兩類去向：一類是去農場，包括上海郊縣農場、上海設在安徽省和江蘇省的農場、茶林場，還有外省市的農場和雲南省、黑龍江省等邊境地區的生產建設兵團。這些農場都是國營農場，有較穩定的

68 筆者2008年7月7日、8日、10日對勞元一的採訪。

69 筆者2009年1月24日對趙全國的採訪。

70 這些數據轉引自金大陸主編《上海青年志》專記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鄉運動》，《上海青年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

工資收入和醫療保險等福利保障，還有探親假。另一類是插隊落戶，去上海郊縣以及江西、安徽、吉林、雲南、貴州、內蒙古、黑龍江、遼寧等省的農村，和農民一樣記工分，按農業收成到年底分紅，沒有社會福利和保障。還有少數知青去投靠在農村的親友，到親友所在地「投親插隊」。

1968年6月下旬，上海首批赴江西插隊落戶的中學畢業生，由市中學紅代會常委王建華帶隊出發；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安徽省插隊落戶的中學畢業生出發；8月9日，上海首批赴黑龍江省務農的中學畢業生出發，等等。加上赴上海郊縣和上海所屬安徽茶林場、江蘇農場的學生，共動員下鄉22萬餘人。⁷¹ 1968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和市革會決定：通過上山下鄉安排三年積壓的幾十萬中學畢業生。決定1968、1969兩屆中學畢業生的全部，以及1966、1967兩屆尚未分配的畢業生，除極少數身體殘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難的外，統統動員上山下鄉，實行「一片紅」政策。⁷²

在上山下鄉的熱潮中，許多紅衛兵負責人帶頭去艱苦的農村，去遙遠的邊疆。尤其是第一屆中學紅代會的常委們，除了兩個技校畢業的常委一人被分配在上海的工廠、還有一人參軍外；其他常委全部主動要求上山下鄉。常委屠伯森⁷³是第一個下鄉的，去了上海郊縣的崇明農場。高靜慧後來去了內蒙農

71 金大陸主編《上海青年志》專記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鄉運動》。

72 同上。

73 屠伯森，男，文革開始時是上海市第51中學高中學生，共青團員。文革紅西南負責人之一、紅衛兵徐匯軍區負責人、市中學紅代會常委；中學畢業時被分配進上海郊縣農場，文革中入黨，擔任共青團徐匯區委書記。文革結束後被取消黨籍

村。還有蔣彪⁷⁴、葉定海⁷⁵、王建華⁷⁶，王福祥⁷⁷、夏寧⁷⁸等，全部帶頭上山下鄉。⁷⁹ 後來幾屆的紅代會常委們也爭先去農村，犧牲在黑龍江的金訓華，就是市紅代會的第二屆常委。

中申會的骨幹人物，也都報名上山下鄉。王毅捷、魏威、文貫中分別去了安徽茶林場、上海郊縣農場和吉林農村。紅鷗和幾個中申會成員張水榮、管宇春等，認為上述那些省份的農村還不夠艱苦，另外也想擺脫上海方面的控制，於是自行聯繫，去了河南蘭考農村，那是文革前樹立的「毛主席的好幹部」焦裕祿生前工作過的地方，當時生活條件非常艱苦。這些年輕人，在關乎自己大半輩子生活和前途的重大抉擇面前，義無反顧地主動選擇艱苦的農村，既有他們對空洞許諾美好未來的盲目信任，更有他們純真的理想主義一面。

小結

比起外地的許多省市，上海紅衛兵組織的大聯合，總體來說還算順利。其間最困難的是區分誰是「左派」。因為大聯合最初強調以「左派為核心」，也即只有具有左派名份的組織，才有成為「核心」的資格，於是為了這個名份爭吵不休。而1967年的各級革委會，尚未建立新的權威；而對於怎樣才算是左派組織，也無一定之規。沒有了權威機構的裁決，又沒有衡

74 蔣彪，中共黨員，紅反會負責人之一、市中學紅代會常委。

75 葉定海，男，文革開始時是上海市第64中學高中學生。文革中是紅衛兵組織「紅西南」的負責人之一，市中學紅代會負責人之一；中學畢業被分配進上海郊縣農場，文革中入黨，任上海農場管理局黨委副書記。文革結束後被取消黨籍。

76 王建華，紅衛兵楊浦軍區負責人、市中學紅代會常委。

77 王福祥，紅三司中學部負責人之一、紅衛兵儀錶局軍區負責人、市中學紅代會常委。

78 夏寧，紅東北負責人之一、市中學紅代會常委。

79 11個第一屆常委中，只有市北中學的江浩，筆者沒查到去了哪裏。

量左派的明細規則，誰都自封左派，誰都希望以我為核心，大聯合始終無法實現。於是到了1967年底，乾脆不管什麼派，也不講什麼核心，都一定要聯合。總之，一定要回到文革前以班級為基礎的狀況。自1966年8月開始的結社自由，就這樣行使了不到一年半的時間，斷然結束。

比起北京和其他一些省市，上海高校和中學的紅衛兵大聯合是平淡的。在大學，由於1967年初的1.28炮打，紅革會、炮司、紅三司，三大紅衛兵組織失去了討價還價的資本，大聯合的阻力相對少了許多。於是，上海的大學紅衛兵運動，除了校園裏的武鬥，幾乎沒有什麼值得成為焦點的事件。倒是中申會，因一篇《一切為了九大》出名，為文革的另類思索，留下上海的身影。

上山下鄉無疑釜底抽薪，結束騷動了將近兩年半的紅衛兵運動。以後，自1969年至1976年10月，雖然毛澤東和他信任的文革派，依然掌控着中國政局，依然不時掀起一陣又一陣的波瀾，但那都只是上層的政治鬥爭，作為廣大群眾參與的文革運動，隨着結社權的實際被取消而徹底結束。雖然，在中學裏還保留了紅衛兵組織，但這已經不是文革初期那種自由結社式的組織了。

上山下鄉運動中，雖然許多學生是自願報名，堅決要求去農村和邊疆，但在那個所有資源都被政府掌控的年代，留在城裏的生存之路幾乎完全被封死，熱情悲壯的「自願」背後，更多是無奈的沒有其他選擇的選擇。十年後，這些「自願」上山下鄉的城市青年掀起了大規模的返城風潮。那才是一場真正自願的群眾運動，而且是1949年後的三十年內，唯一的一場成功達到目的，卻沒有被「秋後算賬」的大規模群眾運動。這是後話。

上海文革初期共有三股文革勢力：紅衛兵、工人造反派、寫作組。紅衛兵催生了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在解放日報事件和康平路事件中，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又相互支持。但這樣

的蜜月很短，1967年初的1.28炮打張春橋事件，工人造反派與紅衛兵從此分道揚鑣。而後來大聯合成立的市中學紅代會與大學紅代會，與工總司的關係也始終不密切。上山下鄉更是結束紅衛兵運動，上海的文革舞台從此只剩工人造反派和寫作組，但這兩股文革勢力始終貌合神離，直到文革的最後一刻，兩股勢力才真心攜手，而那時大勢已去，文革失敗已成定局。這也是後話。

第二十五章

從工總司到總工會 工人造反派組織的體制化

1967年初的上海職工造反派組織狀況

自毛澤東支持張春橋在安亭事件中簽字同意工總司成立之後，上海各行業的職工造反派組織紛紛成立。僅據1967年2月26日到28日對輕工業、教育、商業、勞動4局統計，已有297個群眾組織。¹這4個系統的職工人數，在當時上海職工總數中不到五分之一，尤其人數最多的紡織工業管理局和第一機電工業管理局沒被統計進去。如果統計當時整個上海市的職工群眾組織，數字將大得多。

工總司始終是上海最大的群眾組織，也是上海最大的工人群眾組織。這不但因為工總司是全國唯一被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賀電支持的組織，是毛澤東關注和支持的組織，而且也因為上海工人在上海職工人數中所佔的絕對優勢。當時被認為的「工人階級」，比較集中的行業是工業、基本建設、運輸郵電、城市公用、農林水漁(農場、林場、水產和漁業)。據統計，據統計，1966年上海共有212.44萬全民所有制職工，其中以上行業的職工有153.01萬人；再加上近60萬集體所有制工廠的職工，共270多萬。而不被認為是「工人階級」的其他行業職工則不到60萬：其中商業、飲食服務、供銷，職工27.64萬；科研、文教、衛生系統職工24.76萬，機關團

1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1967年3月編《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

體職工5.85萬。² 工人階級首先從人數上佔了絕對優勢。所以，1967年後的上海，沒有任何一個群眾他組織的地位能夠與工總司相比。二兵團等組織曾經企圖自立山頭，都被以取締和解散告終。其他工人組織，人數少，影響小，不是根本成不了氣候，就是後來被工總司或其下屬組織衝砸或解散，例如前文提到的紅工司、五八兵團，又例如企圖發展成全市性組織的支聯站。

由於工總司的強大影響和地位，全市各職工組織成立後，紛紛掛靠工總司，成為其下屬組織。最早成立的是工總司的一批區級組織，都在1966年的11月或12月。當時安亭事件剛結束，跨行業、跨地區組織禁忌被打破，許多工廠的造反派組織與同區其他工廠的造反派組織互相串聯，成立跨行業的區一級造反派組織，掛在工總司名下，成為工總司最早的下屬二級或三級組織。最早成立的是盧灣區工總司的區級組織，在11月中旬。接着，在楊浦、普陀、閘北，這些工廠集中的行政區，區級組織也相繼成立，不久，上海十個行政區都有了工總司的區級組織。造反派的早期活動主要對着保守派，發生衝突時需要其他工廠造反派馬上派人前往支援。同處一個行政區內的工廠，儘管不一定同屬一個行業系統，但相距較近，有情況可以就近呼應，及時相助。不過最初，工總司總部並不清楚自己的實力。成立初期，那些剛造反的普通工人沒有組織經驗，更沒有規則意識。凡來掛鈎者，只要和總部的哪個人打個招呼，就算是掛靠在工總司下面了；既無專人管理，也不登記備案或造冊存檔。於是有的區級組織與總部這個領導掛鈎，有的區級組織經總部那個頭頭承認。結果形成大多數區都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區級組織並存在的狀況。而且因為沒有登記備案，工總司總部負責人根本不知道下面有多少組織，更不清楚有多少組織前面冠着工總司的名字。

1967年一月奪權後，市委被打倒大局已定，更多群眾起來

2 上海市統計局 1979 年編《1949-1978，上海市國民經濟統計資料》。

造反。行業造反派組織也紛紛成立。一些造反派成立產業管理局系統的造反派組織，也掛在工總司下面，其中機電一局、輕工業局、手工業局等的工總司局級組織成立得較早，都在1966年12月左右，其他局的工總司局級組織，成立時間大多比工總司區級組織稍晚，一般都在1967年1、2、3月。

除了工總司體系，其他行業也紛紛成立造反派組織，其中造反較早、較有規模和影響的有九個「司令部」，都是上海人民公社發起組織。但因為在影響和規模上遠不如工總司，所以當時被稱為「九小司」。它們是：上海出版系統革命造反司令部(版司)、上海市技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科司)、上海體育戰線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上體司)、上海藝術院校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上藝司)、上海醫務界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上醫司)、上海市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小教司)、上海中等學校教工革命造反委員會(教革會)、上海市財貿系統革命造反派聯絡委員會(財聯)、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公革會)。

到1966年底至1967年初，更多的組織紛紛成立。因為沒有登記制度，1966年至1968年上海到底有多少群眾組織，誰也說不清。光是1967年上海人民公社籌備時期，全市就一下冒出六百多個組織，都說自己是市一級群眾組織，以求成為公社組成單位。甚至本應維護社會秩序的公安局系統，也是山頭林立，有着不下十幾個組織。而在各基層單位，也是組織繁多。例如不到二千名職工的上海直流電機廠，文革中先後成立過21個群眾組織。³

貴陽經驗和歸口聯合

在呼籲學生回學校的同時，對職工群眾組織的整頓也在進行。1967年2月23日，上海的一月革命剛告一段落，上海人民

3 工總司 1969年5月28日第7期《情況匯報》，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同時，市革會公佈的第一個決議，內容之一就是要求整頓群眾組織，這個決議是張春橋主持起草的。決議要求：

我們建議按產業、按系統、按單位、按地區，實行條條與塊塊相結合的方式，建設無產階級的階級隊伍。工人的革命組織，不要跨行跨業跨地區，不要發展學校師生、黨政機關工作人員、醫務工作者和文藝工作者等成員，已掛鈎的要重新歸口。學生的紅衛兵組織，不要發展工人和貧下中農參加。凡是復員轉業軍人組織，所謂國際性、全國性的組織，以及以經濟主義要求為目的成立的各種組織，都是違背毛主席指示和黨中央規定的精神的，應該自動解散。這些組織的所屬成員，可分別申請參加本單位的革命群眾組織。在整頓組織的過程中，必須純潔無產階級革命派隊伍，把混進來的壞人清洗出去。⁴

這是毛澤東的意思，至少得到毛澤東的首肯。2月28日的《文匯報》發文《毛主席最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說「毛主席親自批准全文廣播和發表《當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任務》（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決議草案）」。第二天，在宣佈上海人民公社更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大會上，張春橋進一步解釋為什麼要「按照單位、按照產業、按照系統、按照地區」聯合：

我們建議，能夠按照鬥爭形勢的發展，現在有些組織需要考慮，按照單位、按照產業、按照系統、按照地區，加以調整。有些群眾性革命組織跨行業的很多，他又是工人組織，裏面又有農民，又有機關幹部，又有學生，又有文

4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1967 年 2 月 23 日決議草案《當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任務》，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藝工作者，很雜。有的學生組織為主又吸取了別的，有的工人為主吸取了別的。這樣搞不好，還是按照產業來組織好。同時，不是按單位來組織也有問題，那大家搞的都在上面，混進來壞人也不知道。如果在本單位組織，比較好，壞人不大容易鑽進來。同時從整個鬥爭，從批判，特別是從鬥、批、改這個要求來看，如果按系統來搞是比較適宜。比如說紡織系統的工人組織，如果他們實現一個大聯合，或者冶金系統的組織實行大聯合，他們在批判、在鬥批改紡織系統的問題或者冶金系統的問題，那就比較方便。⁵

在社會上，行業混雜，容易「混進壞人」；回到各自的工廠，相互知根知底，便於同級權力機構控制。文革初期發展出的基於結社自由的由地緣政治形成的組織與活動，被以這樣的理由要求結束，回到文革前以工作單位為中心的熟人社會中去。上海的這一系列動作，反映了中央決策層對群眾組織狀況的新要求，核心就是「按照單位、按照產業、按照系統、按照地區」聯合。這一要求，不幾天便以貴陽一家工廠大聯合的經驗形式見之於報紙。1967年3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介紹貴陽棉紡廠的大聯合經驗。這個經驗是中央文革記者站駐貴陽記者撰寫，毛澤東親自批發的。⁶《人民日報》並為此配發社論，社論強調：

在當前的鬥爭形勢下，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採用什麼樣的組織形式來組織革命隊伍呢？貴陽棉紡廠創造了大聯合的

5 張春橋在1967年2月24日「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開展三結合奪權鬥爭誓師大會」上的講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徐匯區聯絡站整理，1967年2月24日。

6 貴陽經驗是毛澤東親自批發這一史實，引自李近川著《再憶中央文革記者站》，載於《黨史縱橫》2009年第2、3期，中共遼寧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遼寧省委組織部、中共遼寧省老幹部局編輯出版。

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部門把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在統一的革命組織中，對革命和生產都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貴陽棉紡廠的經驗好得很，值得各地無產階級革命派認真學習和研究。……

他們提出並且實行「革命不分先後，組織不分大小」的原則，把一切革命群眾、革命群眾組織聯合起來。這是很重要的經驗。⁷

「大聯合」的口號，在一月革命前後就已提出。但「大聯合」的含義，有個變化過程：稍前，還只是針對走資派，要求造反派聯合起來共同與「走資派」作鬥爭；接着，是針對「奪權」，不能由某一個或幾個造反派組織單方面奪權，必須由多個主要的造反派組織聯合奪權，否則中央不予承認和批准。總之，這一時期的大聯合，是與走資派鬥爭的話語，是要求造反派組織聯合，形成統一陣營，共同對敵，共同奪權。這一模式最早是青島的奪權。《人民日報》為此在1967年1月30日發社論：《關鍵在於大聯合》，號召「建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幹部大聯合為基礎的革命造反委員會，這種組織形式，成為統一領導奪權鬥爭的權力機構」。上海的奪權也是這一模式，而且《紅旗》雜誌在1967年1月16日，為此還專門發了編輯部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只是因為1.28炮打，加上耿金章等造反派組織節外生枝，青島奪權比上海早了幾天。此時提出的大聯合，更多是為了防止少數造反派組織單方面奪權引出的紛爭；而且，「它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而不是亂七八糟的大雜燴」。⁸

但是「貴陽經驗」的大聯合，內涵卻有非常大的變化，核

7 《人民日報》1967年3月1日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好形式》。

8 《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人民日報》編輯部 1967.01.22。

心就是要求造反派們「自下而上地按部門把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在統一的革命組織中」，而且還要「革命不分先後，組織不分大小」，按行政系統「歸口」聯合。群眾更形象和直截了當地將這樣的「大聯合」稱之為「倒旗聯合」。上海市革會第一個決議的內容之一，就是體現這個要求的。

輿論對不願大聯合，或者只想以自己為中心進行大聯合的行為，展開了一系列批判，稱為「反對派性」、「圍剿派性」。這是文革正在被結束的一個重要措施，是一月革命後對秩序的重建。而重建的障礙，正是這些造反派們。這也又一次反映了毛澤東試圖結束文革的打算。毛澤東在要求學生回校復課鬧革命的同時，也希望職工回歸秩序。他在後來的一次講話中說：「本來在一月風暴之後，中央就在着重大聯合問題，但未得奏效。」⁹ 如同紅衛兵們回學校一樣，讓職工造反派們回工廠，也是個艱難過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遭到實際上的抵制，「未得奏效」。

「倒旗」聯合的困惑

王洪文是在華東醫院的病床上，從自己隨身攜帶的半導體小收音機聽到對貴陽經驗報道的。華東醫院是上海的高級幹部醫院，有着當時其他醫院所沒有的兩人一間的帶廁所的賓館式病房，還有其他醫院沒有的兩個特別大的花園。能進華東醫院看病，是十二級以上幹部的特權。自王洪文成為市革會副主任後，就開始享受高級幹部待遇。聽到廣播，王洪文馬上

9 毛澤東 1967 年 5 月對一個外國軍事代表團談話記錄，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 2003 年出版《毛澤東傳》第 1489 頁。此外，在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中，有一段毛澤東 1967 年 2 月的話：「革命群眾在優勢情況下，可以按部門、按系統、按單位實行大聯合，要注意保守勢力把革命派吃掉，不要用解散組織的辦法實行大聯合」。但未注明毛在何種場合說此話以及出處。

將王秀珍、葉昌明、戴立請、王腓利、陳阿大等叫去，在醫院開了個會。

貴陽經驗核心是倒旗聯合，工總司要不要「倒旗」解散？工總司的頭頭們都十分困惑。據陳阿大回憶，王洪文在醫院時甚至喪氣地對大家說：「這個經驗對我們，對工總司不利，壓力很大，看來我們要解散了，只好散伙了，你們要有準備。」¹⁰

種種輿論對工總司確實很有壓力：「工總司是最大的跨系統組織」，「為什麼要我們的組織解散，工總司卻不解散」，「你們已經完成歷史使命，好解散了」。奪權中被排斥在外的造反派組織更是議論紛紛，認為上海工人造反派是工總司一家獨大，沒有實行毛主席所說的大聯合，要求「解散工總司，歸口鬧革命」。在外造反的造反派頭頭們成天被催促解散組織回廠，也感到灰溜溜的。甚至工總司內部也有人提出工總司已經完成歷史使命，可以解散；而且寫成文章，準備登在《工人造反報》上，不過最終沒有刊登。¹¹

3月10日，張春橋接見工總司總部的部分負責人，在場的有陳阿大、戴立請、黃金海、王秀珍、王成龍、葉昌明、岑麒麟等。眾人向張春橋提出心中疑問，張春橋回答說：

工總司解散不解散的問題，如果你們按大方向辦事，群眾不會感到是妨礙，反之，勢必會解散……目前工總司沒人敢反是因為毛主席支持，但不能濫用毛主席的支持。全國第一個紅衛兵，本來也是毛主席支持的嗎，可後來方向不對又怎麼辦呢？¹²

10 陳阿大 1977 年 9 月 5 日。

11 筆者 2009 年 5 月 3 日對戴立請的採訪筆錄。

12 《張春橋 1967 年 3 月 10 日接見工總司委員記錄》，原文為手寫記錄。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張春橋還說，「我們根本沒有要解散」。張春橋要工總司把主要精力放在一百萬產業工人上，搞一些經驗比如抓革命、促生產，比如好的大聯合榜樣，「如果是按這個方向工作，我認為工總司不致會成為障礙」。¹³ 工總司是當時上海舉足輕重的群眾組織，全國的群眾組織也都以上海的工總司為榜樣。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始終非常關心工總司的動向。張春橋不會貿然表態解散它。張春橋沒有直接回答工總司解散不解散的問題。顯然，張春橋希望工總司能走出一條自己的大聯合之路。

在貴陽經驗發表之時，二兵團等稍有規模的工人造反組織剛被王洪文解散；其他工人組織不是人數太少，就是毫無名氣，根本不能與工總司相提並論。1967年初的上海，最主要的工人群眾組織只有工總司，所以王洪文認為對於工總司體系，不存在倒旗去與其他群眾組織聯合的問題。在一片質疑和困惑聲中，王洪文多次在工總司的會議上強調：上海與貴陽情況不同，上海只有一個統一的工人組織工總司，不存在再搞大聯合的問題。¹⁴ 王洪文還說，不管造反先後、不管組織大小，一律實行倒旗大聯合，「這樣做不是搞大聯合，而是造反派和保守派搞大雜燴」。王洪文並且佈置《工人造反報》盡快作出「不倒旗聯合的經驗」。¹⁵ 「不倒旗聯合」，就是上面不解散工總司總部以及工總司在各區、縣、局以及公司的聯絡站；基層不解散工總司所屬的造反隊。

工總司總部經商量決定，總部從三個方面推動大聯合。一是總部實行精兵簡政；二是對下屬的各區級組織進行整頓，實行歸口聯合；三是歸並區級組織。實際就是在工總司系統的內部進行整合。3月22日，工總司發出《關於響應毛主席號召，實行革命大聯合的決定》，號召貫徹貴陽和青島經驗，「實行按

13 同上，《張春橋 1967 年 3 月 10 日接見工總司委員記錄》。

14 葉昌明 1977 年 8 月 26 日。

15 同上。

單位、按部門、按系統的革命大聯合」，並且決定：「我總部和所屬各區、縣分部、各系統聯絡站，除少數必須工作人員處理非常必要的工作外，其餘全部同志都要回到原基層單位」，去幫助和推動自己工作所在單位的造反隊大聯合。在這個通知中，工總司總部還表示，工總司也是跨系統組織，是文革初期工人造反派「打破單位之間、部門之間的界限」建立的，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但是「今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種跨單位跨部門的組織形式已不適應於當前的鬥爭需要」。為了表明工總司總部實行歸口大聯合的決心，通知最後寫道：

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是我們工人革命派目前最為重要的一項光榮的政治任務。一旦上海的工人革命派實現了按單位、按部門、按系統的革命大聯合，我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作為跨單位、跨系統的組織，也就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我們將盡最大的努力爭取這一天早日到來。¹⁶

但是一個月後，工總司又在《工人造反報》上發文，說工總司和下面的造反隊都不解散：

實行革命的大聯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解散不解散？基層工人造反隊解散不解散？

不解散。

總部不解散，基層工人造反隊也不解散。不但不解散，而且還要鞏固、提高、發展、壯大。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者司令部，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自關懷下，在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下，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下，一直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16 《工總司傳單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辦公室資料組 1967 年 7 月編，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同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與舊上海市委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作了不調和的鬥爭，在偉大的一月革命風暴裏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上海階級鬥爭的實踐證明，它是上海工人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核心。所以，上海工人革命的造反司令部這樣一個左派組織根本不存在解散問題，基層的工人造反隊也根本不存在解散的問題。¹⁷

工總司實際存在到1972年10月，是全國造反派組織中，存在時間最長的。

整頓區、縣、局聯絡站

市革會對大聯合的要求是「歸口」，要各造反派組織按所屬系統或地區，按「條條」和「塊塊」實行歸口聯合，¹⁸將造反隊的歸屬關係按人事工資關係「歸口」，恢復到過去與與黨

17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關於組織工作若干問題的解答》，載於1967年4月30日《工人造反報》。

18 「條條」和「塊塊」，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特有的縱橫管理形態。「系統」就是按相同行業組成的行政管理系統，最上面一級是產業管理局，局下面管轄若干行業公司，公司管轄一批同類型行業的生產工廠，例如紡織工業管理局，下面有12個行業管理公司，如棉紡公司、毛麻公司、紡織機械公司等等，每類行業公司下面管轄一批同行業的生產工廠。棉紡公司下轄39家工廠，其中有王洪文工作的國棉17廠、王秀珍工作的國棉30廠、黃金海工作的國棉31廠、楊富珍工作的國棉一廠。又例如出版局，管轄各出版社、新華書店和印刷公司等；印刷公司則下轄各印刷廠。這是自1958年後逐漸強化的國營經濟的生產和組織構架。而「塊塊」，則是按行政區域劃分的管轄範疇，當時上海的市區劃分為10個行政區，郊區10個行政縣，下面又依級設街道、居委會；縣下面依級設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在一個「塊塊」內，有些企業，業務上屬「條條」管轄，但人事工資關係卻歸「塊塊」管轄。例如街道集體所有制工廠，生產業務屬市手工業局管理，但人事工資關係屬所在行政區的黨政管理；又如飲食業和小百貨零售業，商業業務由市商業一局或市商業二局領導，但人事工資關係都屬所在行政區管轄。這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種縱橫管理網絡。

政的人事管理平行的狀況。¹⁹ 工總司總部提出，凡不屬地區管轄的工廠內的造反隊，一律歸口回到所屬產業管理局去聯合。還根據張春橋要工總司將醫務、文藝、教育、出版等行業的造反隊劃出工總司的指示，²⁰ 要求凡掛在工總司下的這些系統的造反派組織，盡快與工總司脫鉤，回自己系統去大聯合。前面所提到的上海九個「小司令部」，除了公安局系統，當時其他行業都有造反派組織掛在工總司下：工總司直屬文藝指揮部(工司藝)、工總司衛生系統聯絡站(工司衛)、工總司科技系統聯絡站(工司科)、工總司教工市聯絡站(工教司)、工總司上海出版系統總聯絡站(版聯)、工總司直屬工人體育系統聯絡總站(工體司)，以及掛在工總司各區級組織下面的財貿系統的造反隊。此外還有其他一些造反派組織。這些行業的從業者以當時的階級分類，不屬工人階級，所以不能掛在工總司名下。所以除了工體司，這些「非工人階級」組織必須與工總司脫鉤，回自己系統去大聯合。

雖然上海工人只有工總司一個造反派組織，對於工總司總部來說無需「倒旗聯合」，但是，對於工總司下的各級機構組織，合併、歸口就是「倒旗」。所以，大聯合初期一直阻力很大。金祖敏對此曾經回憶說：

各區、局的幾派聯合問題，一直是個煩人的問題。許多工總司委員在區裏都有勢力，誰都想以自己為主，保留親自己的那個勢力。區級組織和局級組織相比，局級組織要好些，因為局級組織是空的，各工廠造反隊的勢力主要在區裏，區比

19 人事工資關係，即指職工個人檔案和工資發放管理的單位，除了臨時工等體制外的職工，絕大多數職工的工資和人事歸屬都是同一的。

20 張春橋的這個指示引自轉引自傳單《關於五、一二洗劫「版司」事件的嚴正聲明》，上海出版系統革命造反司令部(版司)1967年5月13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局複雜，我們就先解決局的問題，局解決了再解決區。²¹

工總司總部對區、縣、局，以及公司級這些二三級組織的整頓很費了一番工夫。困難首先在於將存在於同一區或縣的這類組織合併。還是在1967年初的1月4日，在范佐棟的極力主張下，工總司總部就曾經發文，規定下屬各區組織一律改名為「工總司某某區聯絡站」，原來名目不一的「區司令部」、「區指揮部」之類，一律取消。²² 但是這個通知發下去後，卻遭到抵制，大多數區內山頭依然故我地對峙；而且名字依然不統一：既有聯絡站、聯絡總站、指揮部，又有分部、司令部、兵團，等等。下面工廠內的造反派組織，也是幾派林立，有的掛在這個聯絡站下，有的掛在那個指揮部下，互不買賬。這次王洪文下了決心，一定要整頓。對這些大大小小的各級山頭，總部要求：各區縣，凡有兩個以上工總司下屬組織的，必須合併。

工總司區級組織鼎盛時期是在保守派和造反派鬥爭激烈的1966年底，以及後來造反派自己激烈內鬥的1967年上半年。當時區級組織起了很大作用，群眾組織之間的衝突，許多都是通過區級組織就近調人的。因為區級組織是由相鄰或相近的工廠的造反派組織組成，當時個人擁有家庭電話的極少，更沒有幾十年後出現的手機；就連工廠的座機電話也很少，一些中小型廠只有廠長室和門房間有電話，找人很不方便。但因為距離近，有事騎個自行車幾分鐘十幾分鐘就能聯繫上。所以工總司的區聯絡站或指揮部、分部之類，對應付各種武鬥和衝突起了很大作用。而到1967年3月以後，系統聯絡站興起，砸聯司時調隊伍，已經主要靠系統的局或公司聯絡站，例如8月4日凌晨，最先就是工總司冶金聯絡站去包圍上柴廠的。9月以後，武鬥被

21 筆者1989年8月12日對金祖敏的訪談。

22 1967年1月4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通令》，載於工總司1967年編《工總司傳單集》。

制止，衝突漸漸少了，大規模調集隊伍不再成為需要。這是區級組織被整頓的客觀背景。

但是區級組織的整頓貫徹得很艱難。因為工總司的區級組織大部分都是1966年安亭事件之後11月或12月左右成立的，有的區裏並列的幾個組織，成立時間只差幾天甚至一天，誰也不服誰。而且，說是行業歸口，但究竟是統一歸往所屬市局，即歸屬條條；還是將掛在區級組織下的同行業組織歸並，即歸屬塊塊；最初也沒個定規。一些區級組織趁此機會發展勢力，在「塊塊」裏拉「條條」。例如工總司盧灣區聯絡站和工總司南市區聯絡總站，1967年5月左右還在區裏發展系統大隊，前者拉的是鐵路系統的「工總司盧灣區聯絡站上海鐵路南站造反大隊」（盧聯南站大隊）。在區裏拉鐵路系統大隊的，還有楊浦區和閘北區等工總司區級組織。

這種在「塊塊」裏發展「條條」勢力的做法，引起系統造反派組織的強烈不滿。尤其鐵路系統的工總司上海鐵路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鐵聯），更是決心敲掉這些挖牆腳的組織。8月，趁着砸聯司和支聯站高潮，鐵聯連續發起武鬥，8月7日砸了工總司閘北區分部下的鐵路造反派組織，8月12日又砸工總司楊浦區聯絡站下的鐵路造反派組織。兩次武鬥得手，於是又在8月25日去砸盧聯南站大隊。而在此前的8月20日，兩派已經發生過衝突，那次鐵聯下面的盧灣區指揮部的人被打出鐵路南站，這次是去報復的。盧聯南站大隊早有準備，封鎖了南站大門。鐵聯盧灣區指揮部則從上海鐵路的各基層單位調集二三千人，用火車將人員運進南站；打頭的周國庭拔出剛從蘇南武鬥地區弄來的手槍，²³ 向天連開三響，高喊「衝啊」，帶領人員衝向盧聯南站大隊佔領的大樓，還調來消防車，將對方逼上了樓頂。上面的人往下砸石塊、彈石子，下面的人用包着棉花的台子頂在頭上作屏蔽、以消防龍頭沖着水作掩護往上衝。武鬥當場只

23 江蘇南部的常州、無錫等地，1967年武鬥激烈。

有一些輕傷，但武鬥快結束時，當上面的人舉着雙手投降下來時，下面有人竟然用大刀和長矛向俘虜砍戳，有人當場被扯出腸子。正在市革會開會的謝鵬飛聞訊趕去時，一條厚厚的血路已橫互在南站，空中瀰漫着濃濃的血腥味；周國庭見事情鬧大，早已人不知去向。謝鵬飛連忙向上醫司求助，聯繫了最好的醫生盡力搶救，但結果仍是五百多人受傷，重傷一百人左右，三人重傷搶救無效，相繼死去；整個南站因此停產許多天。²⁴

不但在上面，就是在下面的基層工廠，也是造反派組織林立，工廠內的眾多造反隊，各自掛在工總司的區級組織或系統組織或其他什麼組織下，佔山為王，互不服氣。所以在很多工廠，即使上面的區級或系統組織聯合了，下面工廠裏的眾多組織仍不願聯合。

整頓區級組織的難處還在於，各區組織的實力，原來都是靠掛鈎的工廠造反隊支撐，負責人也基本都是工廠造反隊的工人。這些造反隊一旦歸口，回所屬系統，工總司的區級組織便不剩幾個人了。因為按照「條條」、「塊塊」的歸屬，但凡有點規模的工廠，都屬系統的產業局管理，是產業工人的集中地。工廠的造反派組織歸口回所屬局或公司後，區聯絡站手下可以起點作用且屬於「塊塊」管轄的，就只有財貿系統的造反派組織。但財貿系統的造反組織不久又都歸口大聯合到財貿系統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財革會」)的「條條」去了；再剩下的就只有街道工廠和里弄生產組，成員大多是些原來的家庭婦女，政治文化素質不高，又都不算作產業工人。工總司各區聯絡站於是成了空架子，甚至連稍能力的負責人都無法產生。此外，本來工總司區級組織的許多負責人，奪權後以區裏群眾組織的代表身份被「三結合」，進入所在區的革委會工作，有

24 武鬥的日期和詳情引自「工總司盧灣區聯絡站上海鐵路南站造反大隊」1967年9月10日傳單《告革命造反派書》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以及謝鵬飛2009年對筆者的回憶。

的甚至已經被「結合」進區領導班子。如果撤消區級聯絡站，所有造反組織全部歸口回「條條」，工總司在各革命委員會的群眾組織代表資格也將失去，等於放棄在各區的權力和影響力。經過反復權衡和商量，最後工總司總部決定，保留區級聯絡站，留下部分原來的負責人，繼續在區聯絡站工作，即使人事關係不屬於所在區。這樣的情況，在縣也存在。

聯合後位子的分配也比較難處理。誰當「第一把手」，爭奪之激烈自不必說；而且分工負責，誰都想抓組織和宣傳(或稱政宣)，因為這在當時被認為是兩個最有權力的位子。工總司總部於是定出原則：一般由大派任主要負責人，常委人數一般為奇數，大派只比小派多一人。²⁵

最先合併的是普陀區。普陀區內的幾個工總司區級組織鬧得最厲害，相互不服氣，成天衝來砸去。工總司總部決定先從這個硬核桃着手。正好這個區的大派負責人鞏貴棠和張婉卿，前不久因為軋進黃文海的「雙造司」事件，一個被抓，一個躲起來，少了障礙。3月21日工總司普陀區聯絡站、工總司普陀區分部及工總司普陀區兵團實行大聯合，三派組織合併成立了工總司普陀區總聯絡站。²⁶接着，3月27日，虹口區的工總司虹口區指揮部與工總司虹口區司令部合併為工總司虹口區總聯絡站。

聯司被砸後，9月中旬，毛澤東關於「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衝突」的講話，由張春橋在8月首先傳達給工總司總部負責人們。王洪文說，毛主席都講話了，再搞下去不像話。如果再不聯合，幾個頭頭都搬掉。²⁷還規定，凡本人所在工廠派性嚴重且處理不好者，不能當頭頭。終於，9月16日，最後一個區——靜安區的工總司區級組織實行大聯合。靜安區的合併最困難，反反復復談判了好多次，總算要開聯合大會，卻又發生

25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26 工總司 1967 年編《工總司傳單集》。

27 筆者 1989 年 8 月 12 日對金祖敏的訪談。

波折，臨上主席台，一派又翻矛槍想反悔，被總部的王腓利硬壓着，總算開成了大會。

「脫鈎」和「歸口」

在「行業歸口中」，工總司總部要求：凡掛在區、縣，但行政關係卻屬行業系統的造反隊，盡快與所掛鈎的區、縣級組織「脫鈎」，歸口所屬行業系統。

最先整頓的是財貿系統。財貿系統的造反派組織「上海市財貿系統革命造反派聯絡委員會」（財聯），成立於1967年1月初，是上海人民公社發起組織之一，成員都是商店的職工，負責人是南市區土產公司大眾竹器店經理宋有福。但當時還有一些商店的造反隊沒有加入財聯，而是加入了所在區的工總司組織。工總司總部要求這些造反隊與工總司脫鈎，歸口加入財貿系統的造反派組織。工總司黃浦區聯絡站負責人之一是黃浦區一家商店的職工王志品。宋有福認為自己是「大派」，是正宗；王志品認為自己造反早，是老造反，剛開始怎麼都不願意歸口到財聯去。下面基層商店的工總司所屬造反隊，也生怕自己組織勢單力薄，被對方「吃掉」。經說服和多次談判，3月24日，工總司和財聯發出聯合通告，宣佈：「目前工總司內財貿系統的革命造反派組織，根據系統重新歸口的精神，同上海財聯聯合起來，定名為上海財貿系統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財革會）。」²⁸

財貿系統的「脫鈎歸口」，雖然有曲折，總體還算順利。而別的地方的歸口就沒有那麼順利。有些原來掛在工總司區級組織之下的造反隊，脫鈎後不願「倒旗」歸口。因為一般說來，工總司的區級組織成立時間都比系統組織早，而且實力也更強。要讓這些在區裏實力強的造反派組織，回系統去和那些

28 1967年3月24日工總司與「財聯」《關於實現財貿系統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的通告》，載於工總司1967年編《工總司傳單集》。

後成立的組織聯合，他們很不情願，覺得吃虧。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便是版聯和電業總部，都是原先參加工總司區聯絡站的一些造反派組織，歸口後不肯與系統原有組織聯合，自己重拉組織，乃至釀成與對立派武鬥事件。

上海出版系統原有較大的造反派組織是「上海出版系統革命造反司令部」(版司)，成立於1966年12月11日。成員以出版系統的出版社編輯人員為主，也有部分印刷廠工人，與機關聯絡站關係密切，上海人民公社發起組織之一。而在出版系統的印刷廠，有許多工人造反隊加入了工廠所在區的工總司組織。此外，輕工業局系統所屬文教用品公司也有印刷工業包裝及廣告制品的印刷廠。這些廠裏的許多工人造反隊，加入的也是工總司的區級組織。貴陽經驗發表後，這些組織從工總司各區級組織中脫鉤出來，但又不願歸口到版司去。他們商量後，決定聯合起來成立行業造反組織，還是掛在工總司名下。而此時市革會要求歸口聯合的決議已經出來，按理工總司總部不應當同意，但這些人找到的是總部當時負責宣傳和《工人造反報》的王腓利。《工人造反報》此時由文革初期被停刊的新民晚報社負責印刷，可《新民晚報》是張只有四開的報紙，印刷機開面小，不能印大紙張。見有印刷廠造反隊願意掛在工總司下面，王腓利首先想到的是這些廠的大印刷機器，想到以後印刷大開面宣傳品可以不用到處求人。他馬上簽字同意。²⁹

就這樣，「工總司上海出版系統總聯絡站」(版聯)在3月7日成立。但一成立就遭到版司指責，說這違反按系統歸口原則；版聯則宣稱，「張春橋批准，出版系統造反派組織要歸口，歸入工總司的輕工系統」。³⁰ 版司和版聯各有背景：版司後面是徐景賢的機關聯絡站，版聯後面是王洪文的工總司。雙方對出

29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30 「版聯」所引的張春橋的這個批准，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311 頁。

版印刷公司所屬造反隊的歸屬爭執不下，版司宣稱：出版印刷公司行政管理屬於出版局，應該歸口到出版系統；版聯強調：出版印刷公司人員以印刷工人為主體，應該歸口工人階級的組織工總司。兩派誰也不服誰，雙方的衝突從3月至8月，持續五個多月，其間多次發生武鬥。武鬥中當場打死2人，被打至重傷者搶救無效又死2人。³¹ 在市革會和工總司的一再調停下，9月13日，兩派才終於言和。之後，輕工業局下屬印刷廠的造反隊歸口輕工業局，出版局下屬印刷廠的造反隊歸口出版局。

這樣的情況不止出版系統，其他系統也都有發生。為了防止從區級組織「脫鉤」出來的造反隊另行成立行業性組織，工總司總部於3月25日又專門發佈《緊急通告》，聲明：「為了保證組織整頓工作順利進行，即日起停止各級組織的掛鉤和隊員發展工作，本通告發佈後建立的組織和吸收的隊員，本部一概不予承認。」³²

但是王洪文自己卻違反這個規定，而且那時已經是1967年的6月。當時電業系統新成立了一個造反派組織：「電業總部」，到工總司總部掛鉤。電業總部負責人是楊樹浦發電廠的職工，該廠就在王洪文工作的國棉十七廠隔壁，兩人比較熟悉。王洪文耳朵根軟，經不住熟人再三要求，同意了。電業系統原來有個造反派組織「電業戰士」，領導成員主要來自電業系統的局、公司機關和研究所。但這個電業戰士下面的造反隊，在各工廠裏都是小派。而新成立的電業總部下面的造反隊，主要來自上海電業系統舉足輕重的大廠如楊樹浦發電廠、吳涇熱電廠，而且在這些大廠裏本來就是大派。這些電業大廠的造反隊，原先掛鉤於工總司的區級或地區組織，脫離區級組織後，不願歸到電業戰士門下，就以歸口聯合為理由，拉起了「條條」，成立系統組織。於是在電業系統，後成立的電業總

31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311 頁。

32 工總司 1967 年編《工總司傳單集》。

部成了大派，先成立的電業戰士成了小派。電業戰士對王洪文非常不滿，說王洪文身為工總司負責人，卻違反自己定出的規矩；說這些大廠的組織本應歸口到系統組織電業戰士名下，卻另外成立系統組織電業總部，所以是個違背大聯合的產物。電業總部也不示弱，仗着人多，8月8日，以砸支聯站為名，糾集近二千人，在南車站路發起對電業戰士的武鬥，造成3死160傷，前面的砸聯司章節已述。王洪文自知承認電業總部理虧，所以特地關照去促進華東電業管理局造反派大聯合的王腓利，無論如何也要把兩派捏起來，哪怕被人說成是和稀泥。最後，兩派總算聯合，由電業總部的負責人張國富擔任工總司華東電業管理局聯絡站主要負責人，原因之一不但在於張是大派，還因為張是黨員。

大聯合中，不但有「脫鉤」後不願歸口之事，還有不肯解散組織，一定要歸口到不是自己單位所屬的「條條」之事。1967年5月底，上體司與工體司之間的武鬥，就屬於這種情況。上體司成員大都是職業運動員。工體司成員最初以分配進工廠的退役運動員為主體，掛在工總司名下，1967年初成立，負責人葛海珊。那些退役運動員，雖然人事關係被分配到工廠，在工廠拿工資，編制是工人，但仍然經常參加各種體育比賽。此外，還有部分工體司成員是工廠裏有體育特長或熱愛體育的工人。工體司在上海文革中名不見經傳，它的出名，完全是因了與上體司的一場大武鬥。1967年5月，體育系統大聯合，籌備成立體育革命委員會，工體司要求參加。但是上體司不同意，說他們是業餘運動員，人事關係在工廠，應該回自己工作的工廠去。工體司認為自己的成員同是運動員，而且許多人文革前經常參加各類體育比賽，除了人事關係在工廠，與專業運動員沒有什麼兩樣，為什麼不能參加體革會。工體司不甘心解散組織回工作單位，希望以參加體革會的方式，保留自己的組織，其實更是為了保留自己運動員的社會身份。5月26日晚，正值體

革會成立前夕，工體司負責人讓人潛入上體司，了解體革會的籌備成立情況；還有人去偷上體司的宣傳車，被上體司的人發現抓住暴打，第二天經工體司派人交涉方獲釋。但挨打者不服氣，又去市體委大樓貼標語，被發現又引起衝突。雙方積怨越來越深。工體司認為上體司阻礙自己加入體革會，決定向上體司示威抗議。5月30日上午8點，工體司在楊浦區工人俱樂部，調集楊浦、虹口、黃浦等區所屬組織人員近萬名，出動22輛卡車，於當晚包圍上體司所在的南京路市體委大樓。雙方衝突越來越激烈，上體司雖然調來了「靜體司」（靜安區體司）、「黃體司」（黃浦區體司）人員，還是抵擋不住，一部分人被逼至牆角，還有一部分人退到二樓。一場大武鬥直打到傍晚。工總司陳阿大聞訊趕去勸阻，也被打耳光。南京路被武鬥參與者和看熱鬧者圍得水洩不通。整個武鬥中，雙方被打傷者共54人，其中重傷11人；市體委大樓85%以上的大玻璃被砸碎，僅玻璃損失就達五千元，這在當時不是小數字。³³

1967年1月至8月，是上海武鬥最頻繁的時期。這些武鬥，除了年初造反派對保守派的衝砸外，都是造反派之間的互鬥。究其原因，都是為了在行業或地區造反派組織中，爭奪自己的老大身份。

在大聯合過程中，爭論的焦點是聯合後以誰為主。造反派組織互不服氣，都想以我為主；說是「倒旗」，都希望自己這派大旗不倒，要對方倒旗併入自己。貴陽經驗發表後，一些頭子活絡的造反派組織負責人馬上轉而成立系統組織，這些新成立的系統組織，和原有的系統組織互不服氣。例如上文所說的電業總部。又如冶金系統，2月左右已有人成立工總司聯絡站冶金聯絡總站；而冶金系統的幾個萬人大廠，如上海第一、第三、第五鋼鐵廠的造反派組織，原來都掛在區裏。歸口脫鉤

33 上海市總工會 1984 年 11 月 3 日編《有關五次武鬥事件》（《工總司大事記說明材料之八》）。

時，這些大廠造反隊聯合起來，推原來是工總司南市區總指揮部負責人的曹可祥為頭，成立工總司冶金聯絡站，組織成員都是上海幾個大鋼鐵廠中最正宗的產業工人，人多勢眾，成了大派；在他們之前成立的冶金聯絡總站，因為負責人所在工作單位是鋼鐵研究所，不是工廠，還又是小單位，號召力遠遠敵不過這些大廠，成了小派，雖然心中不服，卻也無可奈何。最後，由大派的曹可祥擔任大聯合後的工總司冶金局聯絡站主要負責人；不過小派的常委名額只比大派少一人，總算擺平。

工總司原先的勢力主要在區級組織，經過這樣的整合，形成統一的工總司組織架構：在各產業管理局設立工總司的局級聯絡站，局所屬行業公司設公司級聯絡分站；公司下的基層廠根據工廠規模，設造反大隊或造反隊；如果是設造反大隊的大工廠，下面的車間再設造反隊。由於作為工總司主要力量的產業工人都屬於各產業管理局的下屬工廠，因此經過大聯合的整合，工總司的勢力完全轉移至產業系統，不再在區和縣。就這樣，工總司的組織架構，回到文革前工會的組織架構狀況，與黨政組織的架構完全平行。

工總司成立半周年紀念大會

雖然，工總司總部始終在促進基層的大聯合，但實際上，各級造反派組織，包括王洪文在內的工總司總部成員，在進行歸口整頓的同時，還是充滿困惑和失落感。一方面，大聯合的要求來自毛澤東不容質疑的權威，出於對毛澤東的絕對信任和崇拜，工總司總部和所屬絕大多數造反組織馬上貫徹執行。但另一方面，造反派們感到很大壓力。因為畢竟貴陽經驗提倡的是解散組織，回到工作單位去。儘管工人造反派當時不一定明確意識到，這是取消自由結社的第一步，但他們能感覺到，可以隨便成立組織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整個4月、5月和6月，是工總司組織結構大調整時期，那些區和縣裏被解散了隊伍的許多造反派想不通，提出「紅旗還能打多久」的疑問，這是仿毛澤東早期一篇文章的提問。王腓利後來回憶：「經過這次機構大調整，加上當時老是強調大聯合，不要鬧派性，還有『二月逆流』對造反派形成的壓抑感，等等，造反派的氣勢比當初削弱了很多，我們也覺得造反隊萎了。」³⁴ 許多工人造反派去工總司總部詢問，說大聯合搞得造反隊的威勢都沒有了，有人說着說着甚至激動得哭了。³⁵

這種壓抑和失落感，終於找到了一個宣洩機會，那就是「工總司成立半周年紀念大會」。這個主意是在工總司工作的北京師範大學教師李衛民建議的。在此之前不久，幾個有影響的紅衛兵組織已經召開過這樣的大會：4月15日，同濟東方紅舉行成立半周年慶祝大會，市革會領導陳琳瑚、王少庸，以及警備區副司令等，應邀出席；4月18日，交大反到底也舉行成立半周年慶祝大會，市革會馬天水、朱錫琪等應邀出席。所以李為民建議一出，大家都說好。工總司是1966年11月9日成立的，到1967年5月9日，正好半年。造反派們正被大聯合弄得有點灰頭土腦，對紀念半周年建議「都一致贊成。傳達下去，真像打了一支強心針，大家都非常興奮和起勁」，要乘這個大會，「重樹造反派軍威」，「重振工總司雄風」。³⁶ 總部馬上召集各區、縣、局聯絡站負責人，在南京路國際飯店旁的一家劇場開會，王洪文到會。與會者情緒都很激動，問「我們這些聯絡站到底解散不解散？」王洪文等明確表示「不解散！」「歸口照歸口，造反派組織還是存在」，「下面的組織歸口合併，但是上面工總司不會解散」。³⁷

34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35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對葉昌明的訪談。工總司大聯合症結主要在於工總司區級組織和系統組織的關係這個觀點，就是葉昌明在被採訪時總結的。

36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37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對戴立清的訪談。

5月9日，工總司成立半周年紀念大會在人民廣場召開，徐景賢、馬天水、王少庸和駐滬三軍領導都被邀請參加大會；炮司、交大反到底、紅反會、紅西南，這些從工總司籌備成立時起一直站在工總司一邊的紅衛兵造反組織，也被邀請派代表出席大會。工總司已經好久沒有召開全市性大會了。葉昌明會前特地關照，參加大會的各廠造反隊一定要戴上工總司的工人造反隊袖章，打出工總司某某廠的造反隊大旗。整個大會場面，比「一月革命」時的大會還壯觀，密密麻麻的人群和各式旗幟標語，將人民廣場四周的道路擠得水洩不通。參加大會的人數據說有六十到八十萬。據王腓利回憶：王洪文是大會總指揮，工總司總部負責人都是大會主席團成員。一隊又一隊造反派們打着造反隊大旗進入會場，將人民廣場擠得滿滿。到後來，人實在太多，晚到的隊伍進不去，只能站在人民廣場外圍；再後來，許多隊伍更是堵在外灘無法進入：西藏路上的隊伍直排到泥城橋，福州路上的隊伍直排到外灘。主席台上放眼望去，眼睛能看到的，除了房子，就是造反隊的紅旗。「不得了多的隊伍」。³⁸

大會由潘國平主持，王洪文講話。王秀珍在會上發言。她五一節去北京觀禮，受到毛澤東接見，發言內容便是當時的「幸福情景」。這是王秀珍第一次在全市大會上露面。交大反到底和同濟東方紅在會上祝賀詞，市革會和駐滬部隊也都有代表發言。工總司的催生者包炮，被特邀來上海。包炮沒能趕上大會，不過會後，工總司總部特地贈送他一個編號為001的工總司袖章，顯示了上海工人造反派對這位工總司發起者和組織者的感謝。³⁹已經離開工總司總部的范佐棟，也被王洪文邀請出席。⁴⁰

38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訪談。

39 包炮被贈袖章之事，金大陸、筆者、金光耀 2009 年 11 月 18 日對包炮的訪談，載於《世紀》雜誌 2012 年第 3 期。

40 但之後沒有幾天，由於「新工總司事件」，范佐棟被懷疑是策劃者，從此出局工總司總部。第 21 章已經提及。

工總司召開半周年紀念大會，其他組織也紛紛仿效，有些比工總司成立早的組織，還特地補開大會。

徐景賢雖然出席了這次大會，但對工人造反派的這種做法非常不以為然，打電話向正在外地的張春橋匯報。張春橋說「連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嗎？這事本身就是山頭主義」。⁴¹ 第二天，5月10日，在市革會召開的文化廣場萬人大會上，徐景賢在講話中批評了「半周年紀念風」，說這麼多工人出來開會，影響生產；而且開這樣的大會要會議經費，造成浪費，還說：「連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徐的這個講話當天被電視轉播，儘管那時家庭電視機不普及，但許多人還是在工作單位看到了。第二天，《文匯報》又在第三版回答一封群眾來信。這個「答讀者問」的標題很長：《革命群眾組織不要大搞「半周年」慶祝活動——如果離開革命的大聯合去「重振」某一個組織的「軍威」，就會助長山頭主義、小團體主義》：「據說，有的革命群眾組織為了搞慶祝活動，竟把工作和生產停頓下來；有的還大搞請客看戲等活動；有的打算層層搞慶祝；在有些已經初步實現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大聯合的單位中，有的組織甚至重拉隊伍來搞這種慶祝活動。這些做法都是不妥當的，是不符合毛主席關於抓革命，促生產和要節約鬧革命等指示精神的，也是不利於實現革命大聯合的。」《支部生活》也發表徐景賢在文化廣場大會上講話的整理稿。雖然沒有點名，但誰都知道這是在批評工總司。

工人造反派非常光火。工總司總部一些負責人，以及一些工廠基層造反隊的造反派，一起去文匯報社要求公開辯論。光是黃金海就動員了一卡車自己所在的國棉三十一廠工人，打出「到文匯報辯論去」的標語，開到文匯報社。⁴² 戴立清等還去

41 以上資料全引自徐景賢 2003 年《十年一夢》。

42 黃金海 1977 年 8 月 25 日《交代關於工總司半周年紀念、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徐景賢辦公的康平路辦公處找徐景賢。他不知道徐在哪間辦公室，就一間一間敲：「徐老三，出來，和我辯論！」王秀珍則帶着葉昌明、王腓利、張寶林，加上工總司的軍代表康寧一，一起去南京找張春橋告狀。葉昌明在自己的筆記本中記下了準備匯報的要點：1. 形勢大好(與全國相比)，但階級鬥爭複雜，最近武鬥風日益嚴重；2. 工總司的情況；3. 我們對目前形勢的看法(和機聯站的分歧)；4. 我們的意見和建議。⁴³ 但張春橋避而不見。事後張春橋說，我知道你們來找過我，但那時你們那種情緒，我怎麼能見你們。⁴⁴

事實上，工總司籌備「半周年大會」，還有一個沒有說出來的情緒：那就是對着以徐景賢為首的原機關幹部。戴立清後來回憶：

大聯合提出後，我們有着很大失落感：文革中造反是我們早，安亭事件、色織廿四廠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康平路事件，都是我們工人造反派衝在前面，那時機關造反派這些人在哪裏？1967年市革會成立後，不批判老保了，而是開始反起派性，要求大聯合，都是針對造反派的。

我們那段時間日子難過，憋了一肚子氣。再加上按系統歸口鬧革命，他們就以此為借口，說「你們已經完成歷史使命，好解散了」。有人公開提出「解散工總司，歸口鬧革命」。而讓我們解散這類話，機關那派人講得最多。⁴⁵

所以，徐景賢再出面公開反對他們的大會，他們更有氣。接着，令徐景賢沒有料到的是，王洪文等工總司負責人，都像罷工似的，接連許多天拒絕參加市革會會議，請他們也不去。

43 葉昌明 1967 年 5 月 11 日工作筆記，以及金光耀為葉昌明工作筆記寫的介紹《一個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記錄》。

44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對葉昌明的訪談。

45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對戴立請的訪談。

徐景賢急了，打電話向張春橋請示。張春橋說：「那有什麼辦法，只好你們自己出馬，到他的國棉十七廠去，請他出山。」⁴⁶ 徐景賢只好約馬天水同去國棉十七廠。馬天水支吾着不肯去，不想陷進矛盾，徐景賢說你是老幹部，一定要去。他們給國棉十七廠打電話，說晚上去看王洪文。王洪文稱病，讓人回答說他身體不好。不過當晚，王洪文還是在國棉十七廠會議室接待了徐景賢和馬天水。一開始，王洪文態度冷淡。後來說到工總司半周年大會，王洪文表示對徐景賢講話不滿，說這樣會使原來赤衛隊的老保高興。徐景賢表示「我在大會上這樣說，也許會造成一些影響」，雖然沒有直接道歉，但有承認當時講話可能有不妥之處意思。見徐景賢這樣說，王洪文口氣緩和下來。馬天水先走了。徐景賢和王洪文兩人又談了會兒話，交換意見。徐景賢後來回憶說，「我發現他還是比較講道理的，但經不起別人挑。」⁴⁷ 王洪文耳朵軟，不僅是許多與王洪文一起造反的工人的感覺，看來徐景賢也有這個感覺。

張春橋回上海後，徐景賢向他匯報整個「半周年」事件經過。張春橋說：「我們有時候討論問題，內部議論的東西，與在外面大會上公開講的，有的是很不一樣的，這點你要注意。」徐景賢後來回憶說，他領會張春橋的意思：

我跟他不一樣。他對工總司是有恩之人，工總司的人對他五體投地。我跟工總司的人屬於平起平坐，大家一起造反的。我對自己有點估計不足，認為他可以批評的，我也可以批評。張春橋一直要我注意處理這方面的關係。經過這段曲折，我就注意這個問題了。

從此我與王洪文在上海的關係處得非常謹慎。⁴⁸

46 張春橋的話轉引自徐景賢 2003 年《十年一夢》。

47 徐景賢 2003 年《十年一夢》。

48 同上。

5月20日，張春橋在一個會上提到「半周年大會」，對工人造反派的做法表示理解，也有批評：

那天大會，你們要麼不給我打招呼，打了招呼總要說幾句，你們心情我知道，總是有些困難了，才開了大會。

上海的反復不大，比外地好，我總感到保守勢力猖狂些好，因為我感到上海的一月革命，奪權太順利了，外面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出大反復。

總理對上海很關心，主席對上海的一點好形勢都很珍惜。你們考慮局部多了些，考慮全面的少了。

有些鋪張浪費，這點我不大滿意，我們的同志太不樸素了，這樣是不能重振軍威的。我對《文匯報》的做法也不滿，跟他們談了。上海這個局勢，讓保守勢力再猖狂一些沒有什麼。我對上海的造反派是有信心的。⁴⁹

張春橋講話後，5月22日，王洪文在工總司的內部會議上，檢討了半周年大會之事。王洪文說：

有幾種思想：

- 一、驕傲自大，自以為了不起。
- 二、懷疑到張春橋，想到北京去告狀。
- 三、眼下無人，自己高於一切。

從我們最近暴露出來的問題來看，文匯報是批評得對。我們應該自我檢查。⁵⁰

徐景賢也在5月26日的一個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

49 轉引自葉昌明工作筆記 1967年5月20日。

50 葉昌明 1967年5月22日工作筆記，以及金光耀為葉昌明工作筆記寫的介紹《一個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記錄》。

工總司「5.9」大會問題，正因為和工總司一些同志接觸少，事先沒有很早和他們商量，只在6日晚上提了一下不要會開得太大，沒有提出會議的要求，對大會的一些要注意的問題我注意不夠。

跟春橋同志匯報了說，原來沒有要開這麼大的會就不要開這麼大，已經開了就要去。但是對這次會要堅決支持。9日後聽到了一些反映(如打架、停工、各組織連續提出要開半周年會，各基層也在不斷開)，認為這樣下去會對宣傳主席思想起衝擊作用，因此在10日會上講話時對9日大會作了答覆。現在想來，有一些話是不應該講的，沒有考慮到群眾的情緒，只有另一方面考慮。後來在黨校我也講了否認這個會是不對的，是滅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志氣。那次講話是沒有稿子的，不嚴肅的、不負責任的，我對講話助長了文匯報答讀者問的出來。

文匯報出文章也沒有和我們打招呼，這是不好的，但要看到這文章還是好的，不是把矛頭提到打倒的程度。在報刊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正常現象。⁵¹

張春橋雖然批評徐景賢，但當年的年底，工總司召開工代會，張春橋在閉幕會上，又批評「半周年」之事，說：

有些單位，他為了搞派性，搞個一周年紀念，半周年紀念，十三個月、十四個月紀念，那個帶勁兒，有個機會就要紀念，擺老資格，我希望工總司從這個會開始，把這個風真正地剝下來。⁵²

半周年事件雖然平息，但對於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們，這

51 轉引自葉昌明 1967 年 5 月 26 日工作筆記。

52 朱永嘉、金光耀 2006 年未刊稿《巳申春秋》。

是一次重要的情緒和意願表達：他們不願被解散，他們要在恢復秩序的新形勢下，繼續力爭和凸顯自己組織的存在。而在此之前，迫於大聯合及倒旗的輿論壓力，工總司下面的聯絡站和造反隊一片迷茫，不知自己的組織還能存在多久。半周年大會激起了他們對自己造反派身份的強烈認同，更激起他們將工總司作為自己組織的強烈認同。半周年大會是個轉折點，在此之前，工總司下面的一些造反派組織幾乎偃旗息鼓，半周年大會後，許多造反隊又重振旗鼓，重新神氣起來。⁵³

毛澤東提出以工人造反組織改造工會

1967年3月24日，北京市革命職工代表大會召開；3月25日，北京市工代會召開。馬天水想到上海的工總司總部工作人員都是工廠工人，長期脫產不回廠，總歸名不正言不順，是否也能通過工代會形式規範化。他找來原上海市總工會的工作人員、機關造反派施鉅康，讓他派人去北京取經。但是，派出的兩人去北京後發現，北京三大派工人造反派組織的代表雖然參加了會議，卻一個也沒有進工代會領導班子；進領導班子的是文革前的一些工會幹部，以及老工人、勞模先進人物。兩人回來後向施匯報，施覺得難辦，這樣的人員構成，在工總司那裏肯定通不過，於是沒敢向工總司匯報，就此不提。⁵⁴

4月12日，在市革會擴大會議上，張春橋對上海的大聯合提出要求：

市一級造反派組織，應當提出這樣的口號：到基層去，到

53 這個論斷，是王腓利、戴立清等，在筆者、金大陸、金光耀對他們訪談時，都曾經說過的。

54 這段史實，是當時去北京取經的兩人之一萬瑞章 1991 年間告訴筆者的。筆者在 80 至 90 年代，曾經和他同在上海市總工會工運研究所工作。

群眾中去。特別是現在基層中，(只)有一派的容易解決，有兩派的也好解決，有各派的到底怎樣聯合，沒很好解決。要工司一份材料，究竟全市八千個工廠，哪一個工廠聯合了，哪一個廠保守勢力佔優勢，要有典型(區、縣、局)。這是工總司的正業，要務正業，由總工會的造反派協助工總司做好大聯合工作，工代會的籌備工作。團市委要幫助紅代會籌備，特別有些中學造反派不佔優勢，團市委的造反幹部應該下去。原來提二月三月四月是關鍵，現在主席加了一個字：二——五月是關鍵。工代會、紅代會能在五月開最好，不要趕時間，可先開區的、產業的工代會紅代會。工人組織還是把教育、醫務、文藝、出版等劃出工司。另外一些組織不要採取吃進去的辦法，要鼓勵下面實行聯合。⁵⁵

1967年上半年，上海職工尤其是工人的造反派組織，大聯合進行得緩慢而艱難。一方面是前文所述，許多當慣了頭頭的造反派組織負責人，尤其是小派組織負責人，寧為雞頭不為鳳尾，不願聯合後屈居人下。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於全市性支聯站的興起。支聯站在各工廠，大部分都是些受壓或不得志的小派，全市支聯站的興起，使他們在與工廠其他派別衝突或談判時有了資源和資本。上海的大聯合是1967年3月開始推行的，但到6月以後，全市性支聯站興起以後，派別的對立越來越嚴重。工總司在7月31日抓支聯站負責人，8月4日砸聯司，在全市一舉消滅了對立面，許多對立組織也因此失去背景。8.4砸聯司之後不久，毛澤東的「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那段話公佈，工總司總部連夜開會佈置大聯合。整個9

55 張春橋 1967年4月12日在市革會擴大會議上海的講話。轉引自葉昌明 1967年3月30日——1967年5月19日工作筆記：《徐景賢傳達春橋、姚文元同志精神》。葉昌明工作筆記為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月，上海各大中學校一個又一個地實行大聯合；而在各工業和基建、交通系統，工總司總部也是盡力促進自己下面組織的聯合，即使被說成是「和稀泥」、「聯而不合」，先聯合了再說。總之，組織上一定要實現統一的歸口聯合，一個系統不能再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織。上海的9月，也被稱為「9月聯合高潮」，不但是學校造反派組織的聯合高潮，也是工廠造反派組織的聯合高潮。以至於上海幾家做招牌的商店，那些天日夜加班，都還來不及做承接的牌子。

非產業工人的系統：財貿、衛生、教育、文化、公安等行業，造反派組織大聯合，基本都在9月前後完成。比起工總司，這些行業的大聯合真正是倒旗聯合：大聯合後即成立革命委員會，原來的群眾組織全都取消，不再掛牌。

在實行區、縣、局造反派組織聯合的同時，召開工代會的籌備工作也一直在進行。自1967年3月始，全國各省市相繼召開工代會，也即「革命職工代表大會」。第一個成立工代會的是北京。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北京市革會的成立建立在「紅代會」、「工代會」和「農代會」成立的基礎上：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北京市貧下中農代表會議、北京市工代會、首都中等學校紅代會，都在市革會成立之前便已召開成立。而上海，不是成立這些機構後，再由這些機構派代表組成市革會；相反，上海市革會成立時，這一系列代表大會都沒有召開，張春橋因此說，

上海有個特點：先戴帽子，後穿衣。市革會先成立了，再來成立工代會、紅代會，產生代表參加市革會，市革會裏最多的成員應該是工人。⁵⁶

56 徐景賢 1967年5月4日講話，轉引自葉昌明工作筆記，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張春橋建議市革會委託工總司召開上海的工代會。市革會專門召開會議，討論關於以工總司為主召開上海市工代會事宜，確定工代會以產業工人為主體。此時上海其他有產業工人加入的造反派組織，如一、二、三兵團，工三司等，都已經被解散，產業工人只有工總司一個組織。⁵⁷本來希望上海的工代會能夠在1967年5月1日五一勞動節召開，但工總司各級聯絡站的大聯合進展很慢，時至5月尚未全部實現。工總司擬先在紡織系統召開紡織局的工代會作為試點。9月以後，大聯合的進度加快，工代會的籌備工作也提上議事日程。

而對群眾組織的轉型，毛澤東有讓工人造反派組織改造工會的想法：

主席講過：用工人的造反派組織來改造工會。⁵⁸

毛澤東7月至9月在上海時，對上海工人造反派十分關心，要上海早點開工代會。⁵⁹王洪文在工總司總部的一次會議上傳達說：

毛主席去年在上海時，我們好多同志，參加了鬥陳曹的電視大會，毛主席在看電視時，一個一個地問張春橋同志，這是誰，叫什麼名字，怎麼樣？主席還說：「他們現在年紀都很輕」。我們工作中有了一點好的東西，就肯定我們，支持我們，在報上介紹我們的經驗。⁶⁰

57 筆者1989年8月12日對金祖敏的訪談。

58 徐景賢1967年5月4日晚上7:30在《解放日報》社的講話，轉引自葉昌明工作筆記。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59 毛澤東要求上海早日召開工代會，轉引自工總司1967年11月3日《關於召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的請示報告》，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60 王洪文1968年2月16日工總司《第三次整風會報告》，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毛澤東還說：

上海地方大，班子可以增加到100多些人，機構不要太大，包括燒飯燒水在內。⁶¹

這個會議叫什麼名稱？北京叫「工代會」。上海市革會委託工總司，明確說要召開工代會。但是，工總司的造反派們不願意叫這個名字，從工總司總部，到下面的造反隊，一片反對聲，說這個大會是文革的勝利大會，應該是造反派的大會，如果叫「工代會」，那就是職工代表大會，就會成為全體工人的大會。如此不區分對文革的態度和觀點，會把老保也選上來。一開始，工總司10月8日給市革會的一份關於籌備工代會的請示報告中，曾經將會議名稱定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代表大會」，實際意思就是工總司內部的代表大會。這個方案，將參會名額分成兩類：一類是「工總司代表」；另一類是「列席代表」，也即不是造反隊員的代表，不作為正式代表，只能列席。⁶² 市革會沒有通過這個方案。

10月14日，工總司發文，設立籌備會議的辦公室，王洪文總負責。10月27日，工總司總部再一次打報告給市革會，還是沒有和全國一樣稱「工代會」，而且也不稱「大會」，而是稱「會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由這個會議選出工總司的常委和委員。⁶³ 對這個名稱和建議，市革會同意了。葉昌明文革後承認，他們當初不稱「工代會」的原因，是覺得工代會實際就是工會在文革中的稱呼，全體工人都有選

61 王洪文1967年9月29日傳達張春橋講話，並轉達張春橋傳達的毛澤東講話。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62 工總司1967年10月10日《關於召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會議的方案》，原件為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63 工總司1967年10月27日《關於召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會議的請示報告》，原件為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舉和被選舉的權利，擔心這樣會將老保選上來。所以他們起了這樣一個名稱，防止那些對文革有看法的工人被選上。這個想法，和張春橋的思路是一致的：

大聯合是革命派的大聯合，紅代會、工代會是革命組織的代表會，不是全體工人學生的代表會，不能由全體工人學生來選舉。⁶⁴

張春橋又一次提出不相信選舉，說：

這個會，不要搞繁瑣哲學，不要迷信資產階級民主這一套，又是投票選舉，又是什麼那麼選代表爭得一塌糊塗啊？我們不要學那一套，開得活潑一些。也可以多一些做代表的人。⁶⁵

對於參加會議的代表資格問題，決定參加對象基本以工業、交通、公用、基本建設等行業的產業工人為主，也包括手工業系統的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文化、教育、醫務等非工人行業一律不參加，這是張春橋的意思。11月10日，在友誼電影院咖啡廳召開大會籌備會議，參加的有市革會主要組室、辦公室負責人和工總司總部的一些負責人，以及財貿、出版等系統的群眾組織負責人；市革會領導成員也全都參加會議。這次會是為了解決工總司和其他群眾組織的關係，主要是關於出席工代會的範圍問題：工代會是以工總司的組織隊伍為基礎開的，由工總司單獨籌備；財革會和版司等組織所屬的財貿系統職工

64 張春橋的話轉引自葉昌明工作筆記：《市革會常委擴大會議，4.12，徐景賢傳達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精神》，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65 張春橋 1967 年 9 月對工總司總部人員的一次講話摘要原文記錄稿。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和印刷工人能否參加成為爭論焦點。⁶⁶ 財貿系統的財革會是1967年3月24日成立的。當時財貿系統不僅包括商業一局、商業二局這兩個商業和服務行業，還包括漁業公司。此外稅務、海關、銀行等財政管理部門和金融機構，大聯合後也都歸到財革會下。財革會認為，自己系統的職工文革前都是工會會員，既然工代會是工會的替代，財貿職工也應該有資格參加。工總司則認為，財貿系統的商店和服務行業職工，以及漁業的漁業工人，可以參加工代會；而稅務、海關、銀行等行業的職工，是坐辦公室的，應該屬於知識分子，所以不能參加。但是，財革會負責人宋有福，不願在自己系統對職工實行兩套政策。為此，雙方爭論得非常激烈。還有出版系統，出版局革命委員會認為，自己下面印刷工廠的工人，都是正宗產業工人，也應該有資格參加這個工人階級的會議。但如果編輯等人員不能參加，也實際是在出版系統實行兩套政策。最後還是由張春橋決定：這些系統的工人，都可以派代表列席成立大會，但群眾組織的所屬關係不動，以後財貿系統和出版系統可各自召開代表大會。⁶⁷

「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只有造反派能夠參加，參加資格的狹隘性太明顯。張春橋提出代表中要有保守派代表人物，他對葉昌明說：你們要考慮保守派，赤衛隊員號稱八十萬人，隊伍雖然沒有了，影響還有，還是要團結他們，也要有代表。張春橋提名楊富珍當工總司委員。張春橋後來解釋：

我們要樹一個標兵，就是楊富珍。這樣的一個人，又是勞動模範，又是老工人，但站錯了隊，如果把她爭取過來，

66 葉昌明 1977 年 1 月 21 日。

67 同上。又：1967 年 12 月 28 日，財貿系統在文化革命廣場召開「上海財貿職工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文革中上海召開「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的，除了工總司和財貿系統，其他系統都沒有召開過類似的會議。

作檢討，站起來揭發陳丕顯，揭陳丕顯如何利用她，這樣就可以使一大批老工人，一大批赤衛隊員安心下來，就和造反派不那麼對立了。⁶⁸

葉昌明遵囑，將楊富珍作為工總司總部委員候選人佈置下去，但下面區、縣、局聯絡站一片反對聲，工總司總部只好去做工作，說明這是張春橋的意思，一定要保證楊富珍被選上。⁶⁹。楊富珍後來當選了。她的當選，對瓦解工人中的保守派對文革的抵抗，起了很大的示範和表率作用。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

1967年12月3日至12月5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在文化革命廣場(即被改名的原「文化廣場」)召開。這天新聞的標題還是稱這次大會是「工代會」，或者雖然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但後面馬上緊跟着一個括號說明：「(工代會)」。大會召開期間，全市電視及有線實況轉播。當時上海有120多萬產業工人。參加這次會議的分配名額為正式代表9931名，分配列席代表為2393名。但是有144個單位內部派性鬥爭激烈，無法產生代表，所以實際產生的正式代表只有9280名。⁷⁰大會於12月3日下午正式開幕，張春橋以及市革會領導成員、解放軍駐滬三軍負責人，還有上海各群眾組織代表，都出席了大會。潘國平代表工總司致開幕詞，張春橋宣讀中央文革小組的賀電，王洪文作工作報告。12月5日下午舉行閉幕式，張春橋作長篇講話，王洪文致閉幕詞。會議代表近萬人，基本上都是從

68 張春橋 1968 年在浙江省市革命委員會座談會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9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對葉昌明的訪談。

70 上海市總工會 1985 年《第四次工代會——工總司大事記說明材料之九》。

工總司所屬各區、縣、局聯絡站產生，所以連黃金海都認為這「實質上也是一個大的山頭會議」。⁷¹

大會通過了工總司的委員名單。工總司原來一直以1966年11月9日成立大會時的主席團成員為常委，沒有建立過委員制，直到籌備這次造反派代表會議，才正式建立了工總司的委員會，共設44個委員，這份名單是工總司自成立後，第一份正式的委員名單。

這44個委員中，除了楊富珍、周林妹、戚榮繁三人，是作為文革前的勞動模範或先進人物代表，另外還有3人作為文革中先進工廠的代表，其餘38人全部都是工人造反派。本書前面章節提到過的許多人：王秀珍、金祖敏、陳阿大、葉昌明、黃金海、戴立清、王成龍、王明龍、馬振龍、徐美英、耿金章、岑麒麟、王腓利、張寶林、潘國平、蔣周法、張伯生，等等，都是這一屆工總司委員。最後一名委員張伯生，是1966年11月5日和6日工總司籌備會參加者之一，而且是工總司成立宣言的起草者。原來他只被作為大會列席代表，但最後公佈的工總司委員名單中有他。這是張春橋提名的，張春橋看了預審名單後問：寫工總司成立宣言的人哪裏去了？我建議放上他。⁷²

工總司在安亭事件後，除了很短時間有過六至七個常委，1967年初，耿金章、范佐棟被抓，常委還剩五人：王洪文、潘國平、陳阿大、葉昌明、蔣周法。造反派代表會議籌備期間，工總司總部討論過是否要調整工總司常委班子。但討論過程中，大家覺得工總司的老造反老頭頭很多，都是一起造反出來的，放誰不放誰進常委，容易引出矛盾。最後王洪文決定，還是維持原來的五人常委格局。但是此時，這五人中，潘國平已被邊緣，蔣周法因作用不大，王洪文又更多在市革會工作，剩

71 黃金海 1978 年 12 月 27 日。

72 金光耀、筆者、金大陸 2009 年 11 月對張伯生的訪談。又據王腓利的回憶，也說張伯生是張春橋建議放上的，因為他是工總司成立宣言的起草者。

下能夠發揮作用的常委實際只有葉昌明和陳阿大。所以事實上，還是以在總部工作的委員作為核心商量工作，常委等於虛設。在不是常委的委員中，最重要的是王秀珍、戴立清、黃金海、金祖敏、王明龍、王成龍和張寶林。他們與王洪文、葉昌明和陳阿大一起，形成了工總司總部的實際核心。但是這樣的「核心」不夠正式，缺乏權威性。1968年年底，工總司總部決定擴大常委班子。12月25日，總部正式向市革會打報告，請示增加常委之事：

工總司的核心領導機構是常委會，並由常委會主持總部日常工作。總部常委原有五人組成，隨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開展，淘汰了一人，現有常委四人。(其中潘國平同志因犯嚴重錯誤，而下放邊勞動邊檢查)，實際只有三人負責總部的領導工作(即王洪文、陳阿大、葉昌明)，因此領導力量感到薄弱。

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有計劃地培養大批新幹部的要求，以及核心是在鬥爭中形成的指導思想，我們注意了從總部原有委員中培養一批骨幹力量充實常委會班子。為了加強工總司的核心領導力量，健全常委會班子，使之更適應當前的鬥爭形勢和政治任務之需要，我們感到很有必要提升一批委員充實常委班子。

經工總司黨支部和總部現常委協商，一致建議常委名額暫定為十一人(增加七人)，提名王秀珍、金祖敏、黃金海、戴立清、王成龍、王明龍、張寶林等7位同志為候選人，召開一次工總司委員擴大會議(請各聯絡站負責人出席)，討論擴大常委問題。⁷³

73 工總司1968年12月25日給市革會的《關於擴大工總司常委班子的請示報告》。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對這個報告，市革會同意了。名單中，范佐棟的常委名額被取消，潘國平、蔣周法沒有明文取消。加上原來就是常委的王洪文、葉昌明、陳阿大，這個常委會一直保持到1973年上海市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的召開。但實際上，工總司總部平時開會，還是以核心人物為主，常委會不大被提起。以至於許多人後來記不起那時曾經有過常委會。

到1968年底，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都相繼被大聯合名義解散，統一的工代會替代了文革初期特有的職工結社組織，唯獨上海的工總司，仍然保留着最初的組織名稱。工代會召開後，工總司總部規定：市級機構仍稱工總司，區縣局和公司仍稱「工總司某某聯絡站」，⁷⁴ 基層工廠或單位仍統稱「工總司某某廠造反隊」。就這樣，工總司通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的召開，成功地將自己的組織體系全盤保留，甚至仍然保留工總司的名稱。這是文革群眾結社在全國的唯一留存。

工總司總部組室設置

工總司總部的辦公機構一直變化不定，尤其是初期階段。1966年底，工總司總部的機構設置是：秘書材料組、組織保衛組、總務內勤組、宣傳組、聯絡接待組。⁷⁵ 以後又有所變化。康平路事件後的一月革命期間，組室設置為：組織組、宣傳組、秘書組、後勤組、聯絡組、接待站。各組負責人由工總司籌備時期的發起組織派人擔任。組織組負責人最初是王明龍，「一月革命」時，王明龍作為王洪文的代表，去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由范佐棟和丁德法任負責人；宣傳組最初由范佐棟負責，范佐棟負責組織組後，由王腓利負責宣傳組；秘書組

74 工總司1968年5月《關於整頓組織加強組織建設的若干規定》，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75 1966年11月21日黃金海工作筆記。

負責人是戴立清和黃文海，後來黃文海因雙造司事件出局；後勤組由陳阿大負責；聯絡組負責人是繆南生和岑麒麟；接待站最初由陳金星負責，不久由張寶林負責；辦公室負責人為黃金海。

「一月革命」以後，工總司總部的工作人員越來越多，總部搬入市總工會大樓後，人員更是飛速增長，光是組織組就有近二百人。大多數都是通過熟人進來的，然後又介紹自己的熟人進來。所有人的人事工資關係都在原來的工廠。亂世之際，廠裏沒有人管職工的出勤，許多人於是樂得在外革命不去工廠上班。工總司總部也沒有人事管理制度，反正不需為這些人發工資，願來願走自便。有人最初是來總部告狀，告了幾天，和總部的哪幾個人混熟了，就乾脆留下來，也當起接待告狀的工作人員。甚至市委書記陳丕顯的丈人也一度在總部看守大門。⁷⁶總部工作人員越來越多，辦公大樓裏成天鬧哄哄的。3月，適逢貫徹貴陽大聯合經驗。王洪文提出，總部那麼多人，不知他們怎麼來的，也不知他們的個人情況和過去表現，趁着貫徹貴陽經驗，對總部實行精兵簡政，讓大部分人回廠去進行大聯合。經總部多次開會協商，確定只留少數骨幹，總共十幾人。這次精簡在前面章節已經敘述。被精簡人員臨回廠之前，總部請大家在南京路上的展覽館電影院看了一場電影《智取威虎山》。

1967年5月31日，工總司又一次調整總部機構。為了對應下面的歸口大聯合，按照市革會的組室建制，工總司總部也相應設置了工業組、交運組、市政組和郊區組。工業組由葉昌明和陳阿大等負責；市政組由張寶林等負責；交運組由蔣周法和王明龍等負責；郊區組由黃金海等負責。還設立群運組，由王秀珍負責；《工人造反報》由王成龍⁷⁷等負責；辦公室主要對內

76 工總司 1968 年 9 月 19 日簡報。上海市總工會文書檔案。

77 王成龍，男，1940—1977 年，受教育程度大學。文革前是上海搪瓷五廠廠長室文書，共青團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工總司」委員；文革中加入共產黨，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工人造反報》負責人，《文匯報》社黨委副書記。

處理機關事務。精簡之前的總部，各組頭頭大都是老造反，自恃有功，各行其是，各組工作內容交叉重複，職責不明，對外也不統一。葉昌明向王洪文提出，要設立工作流程和規範，明確各組職責，今後總部日常工作需要處理的問題，要經各組負責人開會商量決定。王洪文非常支持。就這樣，工總司總部各組的職責以及對外權限逐步理順，葉昌明也成為工總司總部主要負責人。由於常委人數太少，因此總部討論工作，經常召集各組負責人參加，各組負責人是事實上的核心。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第五次工代會。

工總司總部組室調整的另一原因，也是為了配合市革會的工業、交通、市政，以及區縣工業企業系統的相應工作。應市革會要求，工總司總部向市革會的相應組室派出人員，協助促進下面工廠和單位的群眾組織大聯合，整頓秩序，阻止武鬥。工總司總部向市革會的工業組派去陳阿大，向市政交通組派去蔣周法，向郊區組派去王明龍、張寶林，等等。這些人後來大都回工總司，只有陳阿大最後被留在了市革會工交組。

1968年4月15日，總部組室又一次調整，從原來的五組一室精簡為三組一室：常委秘書組，組長潘國平，副組長葉昌明、戴立清；政治宣傳組，組長王秀珍，副組長徐妙林；組織組，組長金祖敏，副組長王明龍；辦公室，組長黃金海，副組長蔡雲龍。此外，還有《工人造反報》，負責人倪淑英、王成龍。⁷⁸以後，又有所變更。到五屆工代會，只設一室兩組：辦公室、組織組、宣教組。

總之，從1967年3月到1968年9月，工總司總部共進行了四次精兵簡政。第一次是1967年3月，近300人，精簡了90%。但不久總部人員又逐步增加，到1967年月以後，增至200人，其中包括從原總工會機關被抽調至總部工作的40多機關幹部；12月

文革結束後自殺。

78 工總司《各組室總部工作人員名單》1968年4月15日，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造反派代表會議之後，因「機構重疊，人浮於事，分工過細，相互扯皮」，於是1968年2月初，總部實行第二次精兵簡政，人員減少到130多人，四分之三的原總工會幹部回原總工會，機構從五組一室精簡為三組一室。1968年9月7日的報載文章中引用毛澤東的話，說要精簡機構，⁷⁹ 總部於是進行第三次精兵簡政，人員從130人減少到72人，機構從三組一室調整到一組一室。1968年10月第四次精兵簡政，精簡為40多人，不久因一些人去工宣隊，總部只剩20多人。⁸⁰ 這以後，由於秩序的恢復，工人必須回廠，總部人員膨脹的衝動才被遏制。

「兩塊牌子一套班子」

1967年一月奪權後，各級革委會建立，在建立各級「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過程中，造反派組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級造反派組織既代表「革命群眾」，對將被「結合」進革委會的幹部評頭論足，發表肯定或否定意見；又代表「革命群眾組織」，推出自己一方的代表參加革委會工作；在幹部和科層人員普遍被批判打倒、無人指揮生產的最混亂階段，還負起了指揮生產的責任。但隨着各級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各項工作日趨正常，造反派組織作用逐漸減少。從合法性以及工作經驗工作效率，造反組織遠不能與新建立的革委會相比。工總司總部對此評論：

79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熱烈歡呼全國(除台灣省外)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全部成立》：「毛主席最近向全國發出了認真搞好鬥、批、改的偉大號召，並且指出：『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裏的鬥、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載於1968年9月7日《人民日報》。

80 這四次精簡見於工總司1968年9月19日簡報。上海市總工會文書檔案。

目前，一些局(公司)、區縣聯絡站，雖然已經撤消了和同級革委會重疊的機構，(如組織、政宣等)，但仍有一個工作班子，一般是區、縣、局十餘人，公司三五人。我們感到這些組織抓中心工作，既與革委會重複，單靠聯絡站又抓不起來，具體工作中則常產生矛盾。⁸¹

各級革委會建立後，能夠以群眾組織代表身份被「結合」進領導班子的造反派畢竟是少數。無政府的混亂時期已經過去，日常工作已經歸各級革委會領導或管理。沒有被「結合」的造反派頭頭，除了造反派組織的內部事務外，所能參與的事情和活動越來越少，精簡造反派組織和脫產人員將成為必然。那些沒有進入各級革委會的造反派，面臨着回廠回車間重新當工人的可能，一月革命時期的叱咤風雲不再。這使許多造反派負責人感到失落。因政治運動而生的造反組織和造反派，面臨着身份和作用的重新定位。

如何使造反組織對重新科層化後的各級黨政繼續發揮影響，工總司總部試圖從「兩塊牌子一套班子」打通路徑。所謂「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就是革委會和同級工總司組織機構，對外掛兩塊牌子，對內一套班子合署辦公。這個做法，首先由市城市建設局和黃浦區創建。1968年4月，工總司城建局聯絡站與城建局革委會合署辦公，1968年11月20日，王洪文提出要在工交系統各局推行；1968年12月31日，工總司總部打報告給市革會要求批准實行。報告中闡述這樣做的理由：

現在的基本情況是：在大部分基層單位中，造反隊的一些負責人和工作人員都結合進革命委員會，並分別在革委會的有

81 工總司1968年12月31日給市革會的報告《關於工總司所屬各級組織和同級革命委員會實行「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的報告》，原件為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關組室工作，造反隊一般不再設專職人員。通常情況下，以召開「兩委會」的形式，即隊委參加革委會議一起討論，決定全廠的工作和重大問題，革委會作出決定後，需要群眾組織出面抓的工作，由群眾組織出面，需要聯合出面的就聯合出面。這種形式，大家稱為「一套班子，兩塊牌子」。⁸²

但是市革會遲遲沒有給予回復。工總司總部不待市革會批准，就急着推行下去，在工交系統十三個局實行。各局在推行過程中做法不一，總的來說有兩種類型。在機電一局、郵電、化工、輕工、公用、儀錶、冶金七個局，工總司的局聯絡站保留了一個辦公室，留二三個專職脫產人員處理造反隊的日常事務，其餘人員均參加局革委會的工作。在電業、手工和城建三個局，不另設工總司局聯絡站的辦公室，但也有專人負責分管造反隊的工作；其餘的工作，「內部一把抓，外部看需要」，⁸³也即對內不分革委會和造反隊，對外按需要亮革委會或是造反隊的牌子。

這個建議的背後，體現了工人造反派在一月奪權後，對於自己身份轉換的焦慮。他們擔心科層重建，造反隊的作用不再，造反隊將有可能被取消。他們希望憑藉「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名份，進入重建後的科層管理體系，轉換自己的身份。革委會建立後，科層人員重回各職能科室，而工人中進入科層者卻不多。如果能夠實行「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大批造反派工人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進入革委會的各個組室，成為科層管理人員甚至領導人員。工總司總部在一份報告中說，這樣做的好處是：

82 工總司 1968 年 12 月 31 日給市革會的報告《關於工總司所屬各級組織和同級革命委員會實行「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的報告》，原件為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83 工總司調查組 1969 年 3 月 30 日《繼續發揮工人革命群眾組織應有作用的一個好辦法——工總司系統 13 個局實行「兩塊牌子，一套班子」的情況調查》(修改稿)，原件為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局革委會的工作班子得到更新，增加了工人成份。城建、郵電、電業、化工、一機、輕工、冶金、儀錶8個局聯絡站，共有63名工作人員進入局委會的各組室；同時，經局革會審查同意，聯絡站又從基層抽調了一批優秀工人造反派戰士和聯絡站同志一起充實進去。原來局革會的各組室，特別是組織和生產業務部門，工人很少，有的全部是原機關幹部，現在，各組室的工人代表已達50%左右。⁸⁴

但是，工人造反派的這個願望最後沒有實現。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始終沒有批准同意這個做法。工人造反派希望自己的革命名份能夠名至實歸的措施，沒有得到推行。

《工人造反報》停刊

從1967年12月開始，《工人造反報》的新聞業務全部歸市革會主管。每期報紙出版前大樣都必需送審，由市革會分管新聞報紙審閱的負責人簽字同意後，方可開機印刷。雖然報紙的負責人仍是工總司的王成龍，但王成龍必須向市革會負責。於是，雖然《工人造反報》編輯部的人事仍由工總司負責管理，各組室主要負責人仍由工總司派遣，報紙的內容也仍以反映工人和工廠的新聞為主，但報紙的業務實際不歸工總司總部領導。工總司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可以隨時隨意地對這張報紙施加影響了。包括負責工代會日常工作的葉昌明，也無法對這張報紙施加直接影響。即使王洪文，也是以其市革會領導的身份對報紙起影響。

自從1949年以來，憲法保護的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只在文革的群眾發動時期，即1966年至1968年間，部分得到兌現。但是這樣的好景不長，不到兩年，1969年後，有限度的出版自

84 同上，《工總司系統13個局實行「兩塊牌子，一套班子」的情況調查》。

由和言論自由被完全收回，全國各地的小報相繼停刊，傳單也被實際禁止。

1967年至1968年，全國各地相繼成立工代會，唯獨上海工總司，還掛着自己的牌子；唯獨上海工總司的機關報《工人造反報》繼續出版發行，各地革委會對上海意見非常大。張春橋對工人造反派講過許多次，說全國只有上海的工總司和《工人造反報》還保留；工總司要改名，《工人造反報》要停刊，否則外地意見太大。但王洪文一拖再拖，始終沒有照辦，他希望能保留這個輿論窗口，畢竟這是全國唯一留存的工人造反派的報紙。直到1970年9月，九屆二中全會後，張春橋再一次要求《工人造反報》停刊：「現在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上海還掛《工人造反報》的牌子，外地有看法，再辦下去不好。同時我們也領導不了這張報紙。一會兒復辟，一會兒復舊，隨便說一通，一會兒又鼓吹『天才論』」，「我同姚文元商量，還是集中力量搞好兩張報紙，《工人造反報》停了，《支部生活》也停了」。張春橋這回是一定要《工人造反報》停刊，為此，他讓《支部生活》也陪着停刊。

張春橋所說的「復舊」、「復辟」、「天才論」，起於《工人造反報》出的「事故」。1968年夏天批判「復舊」，市革委會要《工人造反報》批判上海打撈局的復舊現象。王成龍派人去該局調查後，佈置以評論員名義寫了篇社論《復舊就是復辟》，刊登在1968年9月25日的報紙上。文章一出，馬上遭來各方批評，張春橋也講這種說法不妥。王成龍接到張春橋的電話，緊張得臉色都變了，只好又趕緊佈置，再寫文章論復舊，但不再提復辟。但又引來各方批評，說你們上海怎麼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天才論」事故發生在1970年。當時正值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剛結束，9月21日，《工人造反報》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證明，每當無產階級出現一個偉大的天才領袖的時候，同時也必然會出

現一個傑出的政治家，作為他親密的戰友和最好的助手」，這顯然是形容林彪的。文章是徐景賢佈置的。因為即將提交四屆人大的憲法草案，已明文寫上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徐景賢臨去參加廬山會議前，佈置寫些文章，以迎接四屆人大。卻不料毛澤東在廬山借批判天才論批判林彪。王成龍等不知形勢有變，刊登了這篇完全不合時宜的文章。⁸⁵

姚文元要徐景賢以市革會的名義，起草關於《工人造反報》和《支部生活》停刊的決定，還要《工人造反報》寫一個《停刊詞》。王洪文只得同意張春橋、姚文元的意見，但又建議《工人造反報》的停刊時間再往後挪些，說一些群眾受不了。王洪文其實還是希望能拖就拖，並不真正打算停刊；而且工人造反報社此時仍在擴建印刷車間，還新裝了兩台自動輪轉機。但張春橋這次決心已下。1971年1月，他又一次催問《工人造反報》停刊之事。4月，徐景賢在康平路辦公室二樓會議室召開《解放日報》、《文匯報》、《工人造反報》以及《支部生活》「三報一刊」負責人會議。徐景賢宣佈上海市委決定：為了集中力量辦好兩報，停辦《工人造反報》和《支部生活》。4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發出《關於加強上海報刊的決定》：「上海一地報刊過多，內容重複，不利於進一步加強黨的宣傳工作」，「決定《支部生活》、《工人造反報》自四月中旬起停刊」。⁸⁶

主編王成龍打算在終刊號上發表《終刊告讀者書》，他佈置撰寫《終刊詞》。但《終刊詞》和終刊號的版面送張春橋、王洪文等審定時，張春橋4月8日批示：「在反驕破滿的時候，發表歌頌自己的文章好不好？是否只發市委決定就行了？請

85 以上關於復舊、復辟、天才論的事故，引自筆者2011年3月9日對原《工人造反報》工作人員徐敏、黃浩清、袁義永、吉傳仁的訪談。

86 上海市委決定，轉引自金大陸《上海文革運動中的群眾報刊》，載於《史林》2005年第6期，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出版。

酌。」王洪文只好在9日也批示：「請造反報研究，堅決按春橋同志批示辦，不需要說那麼多的好話。」4月12日王洪文又在終刊號的版面清樣上批示：「希望把最後一期報的工作做好。」王秀珍說：「他們在北京，日子已經很難過了，不要再給他們惹麻煩。」⁸⁷終於，1971年4月15日的第445期《工人造反報》上，刊登了上海市委的《關於加強上海報刊工作的決定》，以及《工人造反報》的《堅決擁護中共上海市委關於加強上海報刊工作的決定》。⁸⁸

《工人造反報》停刊後，編輯部的編輯人員去向沒有立即安排。據說，這是因為當時主管宣傳口的徐景賢想從這批人員中挑選一部分去充實《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但是王洪文沒同意，說這些人是工人階級的筆杆子隊伍，不能就此散了，要市工代會安排使用。三四個月後，大部分人都被分配進市工代會工作。⁸⁹主編王成龍被調《文匯報》，任第二負責人。

工總司改名工代會

工總司的改名，和《工人造反報》的停刊幾乎同步。從1971年初開始，工總司就開始籌備召開上海市工人代表大會，但直到1973年4月才正式召開，籌備時間長達兩年多。如此長的籌備時間，是因為其間發生林彪出逃事件，全部工作圍繞批判林彪，召開工代會之事被拖延了下來。

87 王秀珍的話轉引自筆者2011年3月9日對原《工人造反報》工作人員徐敏、黃浩清、袁義永、吉傳仁的訪談。

88 以上關於《工人造反報》及其停刊的資料，全部引自《上海市總工會清查情況專題匯報之16「工人造反報」清查情況》，上海市總工會運動領導小組1978年4月14日。

89 引自未刊稿《關於工人造反報》，原《工人造反報》工作人員萬豪根2004年8月19日根據原《工人造反報》工作人員呂冬發、錢耀環、楊海根、安文元4人的回憶整理。

1967年至1968年，全國各省市和地方都已召開工代會，取消了職工造反派組織；只有上海的工總司提出：「廣大革命群眾對『工總司』這個名稱有感情」⁹⁰，沒有召開工代會，而將本應是全市所有職工代表大會的「工代會」，開成了只代表一部分工人造反派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上海於是一直沒有工代會，在大一統的全國顯得十分突兀。而且，還造成財貿、教衛、文化等文革前一直有工會的行業，無法組建文革中的工會。張春橋為此幾次說工總司牌子還掛着不行。於是1971年年初，工總司給上海市革會打報告要求召開上海市工人代表大會。經市革會同意後，成立了工代會籌備小組，各區、縣、局也相應成立工代會籌備小組。但是始終沒有真正展開工作。1971年1月的上海市第四次黨代會，決議中有一句：「在階級鬥爭中產生的工代會(工總司)、紅代會等革命群眾組織經過多次整頓，成了黨組織和革命委員會的得力助手。」於是1972年1月12日，工總司打報告給中共上海市委和市革會，說由於批陳整風的深入開展及其他一些原因，工人代表大會推遲了，

考慮到市、區工人代表大會暫時還不能召開，我們根據第四次黨代會決議上關於「工代會即工總司」的提法，建議把公司以上的工人群眾組織先予改名：上海工人造反派司令部改名為上海市工代會；區、縣、局聯絡站、公司分站改名為區、縣、局、公司工代會；領導班子待以後開工人代表大會時再進行改選，目前可根據需要作適當調整。⁹¹

90 這句話是上海市第五屆工代會籌備小組秘書處1971年編輯的《情況交流》第35期上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認真做好工代會的籌備工作》一文中的。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91 工總司1972年1月12日給中共上海市委以及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工總司及其區、縣、局、公司組織改名為工代會的請示報告》，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工總司將市四次黨代會決議中的那句話，解釋成是「工代會就是工總司」，市革會沒有反對。工總司遂向各級聯絡站發文，要求自上而下全部更名。1972年10月以後，各工廠基層的造反隊全部改名為工代會。在改名過程中，已經先行改名為工代會的工總司總部一再強調工總司就是工代會：

根據市委5號文件精神，工交、財貿基層單位可通過召開基層工人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把造反隊改名為工代會，因此，很明確，原來的造反隊就是現在的工代會，不是要重新建立工人群眾組織。所以工人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的籌備工作，應當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由造反隊負責籌備。其他有關部門積極配合，不要另行建立一個新的籌備班子。⁹²

工總司從上到下改名為工代會。看起來，上海的工代會與外地統一了，實際上兩者有根本區別。外地的工代會是召開工人代表大會後產生的機構，上海卻是由工總司改名而來，從市一級的工代會到區、縣、局、公司工代會，到基層單位的工代會，負責人基本都是工總司體系的原班人員。工總司組織體系就這樣完整地保存下來，不但市、區、縣、局的工代會，甚至連基層工廠的工代會，基本都是工總司所屬造反隊的整套原班人員。

工代會改名上海市總工會

但是，工代會這個名稱也還是臨時性的，隨着秩序的重建，恢復文革前的工會，被提上議事日程。

上海市總工會是1967年初被奪權的。1967年1月6日，市總工會的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十個造反隊，在上海工人療養院聯合

92 《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加強工代會的組織建設》(討論稿)，上海市工代會1972年10月。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召開批判上海市總工會黨組資反路線大會。大會之後，「市總工會機關革命造反隊」宣佈奪總工會黨組的權。但是，由於是一個部門造反隊的單方面奪權，遭到其他部門造反隊的反對。後經協商達成協議，決定建立上海工會系統的造反派聯合組織「市總工會機關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簡稱「聯合總部」），承認奪權事實，由聯合總部掌權。但聯合總部仍覺得這樣的奪權不踏實，認為要和工總司聯合奪權才有保證。於是與王洪文聯繫，又在1月19日由工總司和聯合總部共同簽署奪權通告，對上海市總工會奪權。2月1日，工總司和聯合總部又與各區工會的造反派組織「上海工會機關革命造反委員會」一起，發出《聯合通告》，宣佈市總工會和各區工會辦事處、各產業工會停止對各級工會的領導，即日起暫停發展會員和收取會費；原當權派無權下達通知、文件和決定任何問題；積存的工會經費，除必要的日常開支及文革經費外，一律凍結，等等。從此，上海各級工會的業務停頓。⁹³

與此同時，1967年1月初，工總司總部搬入市總工會辦公大樓，原總工會的工作人員全部擠到大樓的五樓，而且與工總司和後來的工代會沒有關係。到1968年，文革前的上海市總工會一百多名幹部中，被「隔離審查」者30人，「靠邊審查」者60人。1968年12月2日，除十多名後勤人員和門衛等因工總司總部需要，留在機關大樓，絕大多數原市總工會機關幹部包括打字員等，加上市總工會所屬市工人文化宮的「大班子」人員，全都去了上海市總工會直屬幹校。⁹⁴上海市總工會不復存在。

1972年中央提出恢復工會建制。1973年「兩報一刊元旦社論」中，久違了的「工會」、「共青團」名稱重新出現，社論提出要「整頓和健全」工會和共青團。恢復這兩個文革前的群

93 上海市總工會 1979 年編《市總工會機關文革大事記》，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94 同上。

眾組織勢在必行，中共上海市委於是要求，由市工代會籌備，為恢復上海市總工會作準備。

但是，如同當初不願放棄工總司的名稱一樣，這次，工人造反派也不願再一次更改組織名稱。許多人認為，文革前的工會不能代表工人，是全民工會，所以文革中的工人組織名稱要「區別於舊工會」，因此屆次也不能與文革前的工會銜接：「文革是新生事物，不好銜接，應該從1967年造反派代表會議算」，「與十七年劃清」。據調查，提出這類建議的「大多是老造反，擔心抹殺文革」。⁹⁵ 也有人主張可以與文革前的工會銜接，但是，要把1966年11月9日的工總司成立大會也算一屆，加上1967年12月召開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這樣，文革前三屆，文革中兩屆，再開就是第六屆。至於1967年12月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是否算作一屆，也是爭論焦點。有人認為應該算，因為組織手續齊全，領導成員都是市革會批准的，而且中央文革小組還發來了賀電。反對者認為：當時的那個會是「代表會議」而非「代表大會」；而且代表只限於造反派；何況財貿和其他系統的職工沒有參加。總之，1967年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不是上海全體職工的代表大會，所以不能算一屆。尤其老工人，認為「造反派代表會議」有派性，反對將其算作一屆。⁹⁶

對於這些爭論，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央寫了報告。1973年3月9日，馬天水代表市委召開區縣局關於籌備工代會的會議，明確：正在籌備召開的上海市工代會算第五屆。為了表明即將召開的工代會仍是當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的傳承，主持常務工作的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葉昌明在這個會上講

95 以上引號中的文字，均引自1973年第五屆工代會籌備組的「討論情況」，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96 以上爭論的觀點均引自1973年第五屆工代會籌備組的「討論情況」。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話中特地強調，第五屆工代會雖然稱「工會」，但只是改名，是「工代會」的改名。⁹⁷

明確了屆次和名稱，還有參加對象的爭論。對於財貿系統職工的參加，意見比較一致，因為外地的財貿職工早就參加工代會。而對於醫院、學校、科研系統的職工，有人認為「知識分子多，不能參加」，但最後比較一致的意見認為，這些系統文革前都有工會，還是應該給予參加。

在討論更名後的上海市總工會常委和委員會名單時，王秀珍特別傳達了王洪文從北京發來的意見，王洪文此時已經去中央工作。王洪文要求：對原工總司44個委員的安排，「除少數人外，盡可能放進去，而且還要考慮找一些老頭頭的代表人物放進去。」於是，除了「已經揭露出來有明顯嚴重問題」者，以及被認為是「不起作用」者共13人，其中包括工總司發起人之一的蔣周法和工總司宣言起草人張伯生，其他絕大多數原工總司委員都成為第五屆上海市總工會委員。不但如此，王洪文還要求，已經不在工代會系統工作的原工總司委員，尤其是在市革會組、辦和各區縣局擔任領導者，都要放進總工會的常委會中，王洪文說，常委班子可以大一些。⁹⁸

工會負責人稱「主任」而不稱「主席」。工會負責人原來一直稱「主席」，1949年前也是這樣稱呼。但到文革前夕，為規避毛澤東的「主席」稱呼之諱，1966年8月31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通知，並經上海市總工會討論，各級工會主席一律改稱「主任」。五屆工代會沿襲了這一稱呼。

恢復工會後，工會會員的會籍怎麼處理？被算作四屆工代會的那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是造反派的代表會議，那麼多沒有參加造反隊的原工會會員，那時算不算退出了工會？現在要不要重新入會？而那些原來不是工會會員的造反

97 馬天水和葉昌明的講話均引自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405-399。

98 葉昌明 1977 年 4 月 5 日《交代關於利用總工會結幫的問題》。

隊員，是不是因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被算作一屆工會，就算工會會員了？尤其是臨時工，文革前不能參加工會，但許多臨時工文革中都參加造反派，他們現在是否也算工會會員？⁹⁹ 這些問題，後來都沒有明確規定，反正工會會員會齡的長短，與會員的實際利益本來就沒有關聯。於是，文革前是工會會員者，都繼續是工會會員；而上海的臨時工已經於1971年全部轉為正式工，也就都算作工會會員。

即將成立的上海市總工會，與文革前的上海市總工會，是否有傳承關係？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葉昌明強調，我們和文革前的總工會沒有關係，原上海市總工會已經變修而被砸爛了，

我們對原總工會不是搞接管，而是建立我們自己的新組織。現在的總工會和各級工會是從工總司和造反派改名而來的，不是恢復總工會。¹⁰⁰

1973年4月13日，中共中央轉發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關於召開工會代表大會的請示報告的批示，同意北京和上海召開工會代表大會。4月16日至21日，上海市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在文化廣場召開。市委、市革會領導人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出席大會，王洪文做工作報告。整個大會由金祖敏、王秀珍、楊富珍、戴立清和陳阿大輪流主持會議；由陳阿大宣佈「上海市工代會正式改名為上海市總工會，各區、縣、局和基層單位的工代會也統一改名為各級工會」。參加大會代表1598人，特邀代表148人；產生上海市第五屆工會委員158名，¹⁰¹ 工總司發起人岑麒麟、徐美英、黃文海等，還有老造反

99 1973年第五屆工代會籌備組的「討論情況」，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100 葉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101 上海市總工會1984年《工總司大事記說明材料之11——上海市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

耿金章、王腓利，以及財貿系統的宋有福等，都是委員。還增加了程德旺、王林鶴、顧和林、倪海寶、方靜等十多人作為委員，都是文革前上海的著名勞模先進人物。

第五屆上海市總工會主任王洪文，副主任：王秀珍、金祖敏、楊富珍、陳阿大、葉昌明和沈涵。這七人中，沈涵是文革前的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老幹部，楊富珍文革前是先進人物，其餘五人都是原工總司骨幹。常委會27人(包括主任副主任)，有潘國平(1974年增補)、黃金海、馬振龍、王成龍、王明龍、戴立清、張寶林、史桂昌等。27人中，原工總司造反派18人，佔三分之二；沈涵和史桂昌兩人都是文革前的上海市總工會常委。而區、縣、局、公司和基層單位的工會，也都基本由原造反隊頭頭擔任負責人。工總司的工人造反派體系就這樣通過工代會改名總工會，又一次被完整地保存和延續。

不過，四屆工代會被保留下來的區、縣、局、公司和基層單位的工人造反派，很多在後來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如一打三反、清5.16遭到整肅；此外，工總司以及後來的工代會、總工會，也一再整頓和調整自己的幹部隊伍。到1974年，文革初期的老造反甚至骨幹，大多被整肅下去，擔任原職者很少了。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主流人物順應政治和秩序需要的所為；同時也是通過清理和純潔隊伍，實行自我保護，不使那些品質不佳者成為反對派攻擊的口實。

小結

從被要求大聯合開始，造反派的狂歡結束了。對於造反派來說，大聯合首先意味着削藩，意味着結社權結束。

跨地區、跨單位、跨系統職工群眾組織的興起，始於張春橋1966年11月13日在上海對安亭事件的簽字；毛澤東對上海工總司的成立大加支持，引用憲法說「公民有結社權」。但僅僅

三個月後，上海文革新政權剛建立，又由毛澤東批示、張春橋在新政權上宣佈：群眾組織要按系統、按單位歸口聯合。上海文革新政權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後，頒發的第一個文件，內容之一就是整頓群眾組織。

「按照單位、按照產業、按照系統、按照地區」的組織形式，實際就是文革前的政府、黨、團、工會、學生會等所有社會機構和產業的組織形式。所謂歸口，其實就是回歸文革前群眾組織與黨組織的架構完全平行，被同級黨組織嚴密監控的狀況。雖然在1967年和1968年，共產黨基層組織尚未恢復活動，但此時黨組織的功能由黨政合一的革命委員會代行。於是，一切回歸文革前的秩序。職工群眾組織都被歸納到先是工代會後是工會系統中，不再允許體制外群眾組織存在。作為群眾組織的工總司，就這樣被科層化，回歸文革前官辦工會的構架。實際就是收回1966年11月安亭事件時，對工人成立全市性組織的許可。跨地區、跨行業的全市性群眾組織，被以大聯合名義取消。公民的結社權兜了一個圈子，在大聯合的口號下重歸名存實亡，又回到當初陶鑄們極力想守住的狀況。這是個耐人尋味的圓圈。

大聯合還意味着對許多造反派頭頭們苦心經營半年多的政治資源的剝奪。各個山頭，各個組織，都是一些造反派頭頭們好不容易才建立起的資源和人脈，一些造反派頭頭正是靠着擴張和提升自己組織的實力與級別，提高了在三結合權力機構中的談判資本。但大聯合幾乎消解了大多數造反派們的這些資源，也幾乎使他們曾經擁有的對秩序和權威的挑戰的能力重新歸零。雖然少數人因曾經是一派組織的頭頭，被「結合」進革委會當了負責人，或者進入管理層當了科層人員；但其他大多數人的工人身份沒有改變，各級革委會建立後，他們只能回廠重當工人。革命秩序恢復後，幹部的職業身份資源有限，只有少數人因革命名份的提高改換了身份。而對大多數造反派來

說，革命名份的提高，沒有為他們帶來實質利益。

1949年以後，工人從來不被真正允許擁有自己的組織，歷屆工會幹部都是黨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選舉產生。所以一旦文革中黨對社會的控制力量減弱，工人便馬上拋開工會，自己組織造反隊。但1969年以後，各級黨組織的權威重又恢復，全國所有的造反派組織被以大聯合的名義解散，再經過「清隊」和「一打三反」，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整合的力量就這樣被解構。但上海有所不同。對於上海最大造反派組織工總司來說，大聯合成為重新整合工人造反派力量的契機。雖然工人造反派們不可能抵制大聯合，但他們還是通過種種辦法，抵制大聯合對他們組織力量和組織體系的削藩；甚至利用大聯合，加強了各路造反派組織對工總司的認同。在兩次工代會的召開過程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先是極力想保持工總司的名稱，名稱守不住，就盡力保留人員；最後終於借着恢復上海市總工會，完整地將全部骨幹力量基本保留在工會體系。就這樣，重建後的上海市總工會，與文革前的工會，有名稱上的延續，卻沒有組織和人事上的關係。在外地，工代會的召開意味着群眾組織的徹底解散；但在上海，工總司卻利用四次和五次工代會成功轉型，將文革初的非常時期的群眾組織工總司，演變為本應是官辦的市總工會。上海工人造反派就這樣獲得秩序恢復後活動的合法資源，守住了自己的組織。

在這一意義上，雖然1967年的大聯合終結了公民結社權，但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卻利用轉型後的工會，部分地守住了自己的組織的獨立性。而這種不受政府或執政黨干涉的獨立性，正是結社權的重要內涵。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們憑着本能試圖守住這種獨立。這是全國的唯一，也是上海文革不同於外地的又一重要特徵。

毛澤東曾經想以造反派組織代替工會，雖然只是由幾派工人組織替代文革前的官辦工會，但這種由工人按照自己的意願

結合，成立工會，應該是工會的本相。工會本來就應該是工人自由結成的體制外組織，用以保護自己的各種權利不受侵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的設想，應該有着還原工會本來地位的成份。但是，毛澤東沒有在這條路上走下去，這樣的念頭在他腦裏大概只是一閃而過。最後，所有的群眾組織都被以大聯合的名義取消。這顯示毛澤東的文革，仍然是試圖用帝王的霸權話語，解決當代社會的民眾權利以及對政府和執政黨的監督。這當然是一條走不通的路。而且，在1949年後權力越來越集中的政治環境下，即使工人造反派組織一時替代了工會，最後的結果也一定是回歸官辦。

第二十六章

從幹校到「戰高溫」 科層的「革命化」

從「公社」到市革會的建制

「公社」籌備成立時，1967年2月3日下午，在上海圖書館召開的公社籌備會議上，討論過公社的體制：「決定各個組織派一名、二名代表作上海人民公社的委員，其中主要幾個組織的成員任常委，各組織有權撤換自己派出的代表或更換代表。」¹會上決定建立公社臨時委員會，實行各群眾組織委派代表制：

遵照毛主席「精兵簡政」的偉大教導，在公社臨時委員會下設七組一室，打破舊市委、舊市人委那套重疊龐大的官僚主義機構。臨時委員會及各組核心都採取集體委員制，除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外，都不以個人名義參加。臨時委員會初步協商出十九名代表：張春橋，姚文元，駐滬三軍負責人，工總司三名，農民二名，學生一名，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一名，七個組的負責人各一名。²

這個建制是2月3日討論的，當時公社由38個群眾組織組成。這19個名額由38個組織協商而來，所以會有工總司3名，機關聯絡站1名等內容。不過事實上，這個19名公社代表的建制沒

1 徐景賢 1970年11月24日與美國友人斯諾夫婦的談話。

2 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69年1月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

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就在第二天，張春橋為緩和那些沒能參加公社籌備會議的群眾組織的不滿，建議將「公社組成單位」改為「發起單位」。於是，更多的群眾組織將參加公社，19個分給特定38個組織的名額便失去意義。不過，19名最初進入公社（不久改稱市革會）的代表，大多數都實際參加了一個時期的工作。後來有所變化；尤其到1968年以後，隨着文革前的幹部和科層人員被重新啟用，加上大、中學學生全部畢業分配，市革會各部門負責人由推選又逐漸回到委任制。

公社剛成立時，王明龍負責組織組工作，登記前來申請加入公社的群眾組織名單，審核其資格。王明龍回憶：「其實這個審查也沒有什麼具體標準，主要就是看是不是造反組織。是造反組織，就可以加入公社。」³ 公社成立初期，組織組的工作就是忙着登記。而公社成員資格審查工作，實際上也沒有真正進行。不久，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逐漸回復到文革前的政府建制，群眾組織加入不再具有實質意義，登記和審查也就失去意義。最初公社的臨時委員會開會，要解決什麼問題，就由有關組的「召集人」去參加會議。公社和以後的市革會從來沒有召開過臨時委員會的全體委員會議，因為根本沒有實行過定期選舉，也從未明確過誰是委員。再後來，號召大聯合，群眾組織推選代表更失去意義。

公社和之後的市革會，分三個辦公地點。一處在康平路原上海市委書記處大院。馬天水、王少庸、徐景賢和王承龍在那裏辦公。王洪文在那裏也有一間辦公室，但他很少去。張春橋和姚文元只有開會才去康平路，平時基本在下榻的興國路招待所辦公。市委康平路大院內的工作人員，都是清一色的原市委機關幹部和機關造反派。另一處在延安西路33號大樓，從華山路370號門進去。這是原上海市委各部委的辦公處。機關造

3 筆者2008年9月27日對王明龍的訪談。

反後，這裏成為市委的「鬥批改」大樓。外灘的原市人委辦公大樓是第三處辦公地點。各個組室都在那裏辦公，主要由「三王」負責，三王即工總司的王洪文和王明龍，加上機關聯絡站的王承龍。這是張春橋在公社成立後的第一次會議上就指定的。但事實上，王洪文和王承龍並不經常去外灘，那裏的工作主要由王明龍和機關聯絡站的朱玉佩、朱維錚具體負責。

為了與文革前的市委和市人委的辦公機構相區別，公社臨時委員會所有的辦公機構，不稱「部」，而稱為「組」或「室」，負責人不稱「組長」而稱「召集人」。公社籌備會議時期共設七組一室，公社成立後增為八組一室。最初的組室職能在2月3日「公社」籌備會上規定如下：

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組，負責工交戰線生產領導，由原來的火線指揮部繼續擔任；

組織組，負責公社成員及群眾組織登記審查工作，以工總司為主；

政治宣傳組，負責新聞、出版、文藝等宣傳領導，以新革會為主；

聯絡組，負責各群眾組織、各基層革命造反派的聯繫及調查，以同濟東方紅為主；

調查組，負責政策研究、起草文件等，以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為主；

保衛組，負責領導公安、司法等工作，由公革會及警備區為主；

接待組，負責接待處理群眾來訪及外地串聯人員問題，由交大反到底及市人委機關造反派為主；

辦公室，負責處理公社日常事務，由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負責。

到六日正式辦公時，又成立了後勤組，變成八組一

室。每個組室，都由參加公社的組成單位分別抽調人員擔任工作人員。⁴

最初的八組一室召集人是：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組，召集人為工總司的謝鵬飛；組織組召集人為工總司的王明龍；政治宣傳組召集人為新革會的朱錫琪；聯絡組召集人為同濟東方紅的陳敢峰；調查組召集人為機關聯絡站的吳瑞武；保衛組召集人為公革會的王維章；接待組召集人為交大大反到底的余小兵；⁵ 辦公室召集人為機關聯絡站的王成龍；後勤組召集人為機關聯絡站的楊幼根。⁶ 不過，這只是最初的討論名單。實際上，公社和市革會領導成員，在1967年1至2月初沒有明確負責人。只有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和「三王」再加上文匯報的朱錫琪相對固定；其他群眾組織的代表都變更頻繁。市裏開會，只能開什麼方面的會，找什麼組室的召集人去。這些組室負責人和工作人員，既非民眾選舉，也非公社任命，既沒有權威性，也缺少責任感。而且最初只是作為各組織派出的代表，隨時可以撤換，人員頻繁上去下來，無法持續有效開展工作。徐景賢回憶當時亂糟糟的情景說，「上海市革會一開始就是大雜燴，各個造反派組織都往裏面派人」，派進去後，都在裏面為自己的組織爭權爭利益：要活動經費，要辦小報和傳單紙張，要摩托車、運輸汽車，等等。⁷

公社只存在19天。公社和改名後的市革會八組一室設置，看似革命而精簡，但除了謝鵬飛的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和上海生產及生活有關，其他組室的設立，都只是為了適應文

4 《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1965年11月-1967年2月24日)》(草稿)，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1969年1月編寫。

5 余小兵，原名余身偉，當時為上海交通大學學生，交大反到底負責人。

6 這個組室召集人名單，筆者是2007年向朱永嘉、王明龍、謝鵬飛等當事人詢問匯總的。

7 徐景賢2003年《十年一夢》。

革的政治運動，解決群眾組織的需求；而不是為管理一個大城市的生活和生產而設置。而且，即使是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也因工作人員大都是紅衛兵，沒有生產指揮經驗，雖然曾經解決不少應急事情，然大多只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缺乏全局和系統的管理調度，充其量只是個臨時性的應急機構，無法有效地發揮管理超大型城市所必須的功能。

於是，這個八組一室辦公建制，只運行了近一個多月，3月底便改組，當時稱之為「調整」。改名後的市革會最初設想成立12個組和辦公室：市革會辦公室、經濟計劃組、工業組、農村組、市政交通組、財貿組、文教衛生組、地區工作組、政法組、科技組、外事組、勞動工資組。與此同時，公社時期設立的聯絡組、調查組、政宣組、接待組，因為與城市管理無關，都被取消；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也被工業組取代。這個調整設想，回到原來市政府的機構設置：「組」的職能，就是原來市政府和市委的相應機構的職能。不同的是黨政合為一體，一元化。

這個設想在討論時遭到一片反對聲，誰不願意撤銷自己管的那個機構，都說自己的機構特別重要。最後只好折衷，保留了一些機構：公社原來的接待組和聯絡組合併，成立群運組，負責人謝宗範和原寫作班朱維鏗；政宣組保留，負責人仍是《文匯報》社的朱錫琪；原來以機關聯絡站為主的調查組撤銷；辦公室保留，由機關聯絡站王承龍負責；農村組由警備區張宜愛和老幹部張輯五負責；文教組負責人是老幹部陳琳瑚；組織組負責人是工總司的王明龍。以後，又經過一系列增減調整，至1967年底，市革委會設有辦公室、組織組、政宣組、政治組、材料組、工業組、市政交通組、教育衛生組、財貿組、科技組、經濟計劃組、勞動工資組、地區組、外事組、接待組、農村組、群運組、調查組、聯絡組、保衛組、專題寫作組、大批判寫作組、政法指揮部、三秋指揮部、火線指揮部、文攻武

衛指揮部、查抄物資組、畢業生工作委員會共28個機構。⁸

1968年，市革會先後撤銷政法指揮部、調查組、聯絡組、保衛組、查抄物資組、火線指揮部、畢業生工作委員會；撤銷農村組、群運組、接待組、三秋指揮部，成立郊區組；撤銷勞動工資組，其工作併入勞動局；撤銷工業組、經濟計劃組、市政交通組，成立工業交通組；撤銷政宣組、教育衛生組，成立文教組；將高教局併入教育局。同年市革會成立工宣隊一、二、三、五、六辦公室，1969年1月，這些工宣隊辦公室與市革會有關辦公室合署辦公：文教組又稱第一辦公室，地區組又稱第二辦公室，科技組又稱第三辦公室，郊區組又稱第五辦公室，財貿組又稱第六辦公室。材料組改為專案辦公室。1969年，市革會成立綜合計劃統計組、審批辦公室、防空辦公室、復員退伍軍人安置辦公室、清檔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撤消專題寫作組和大批判寫作組，後來成立了寫作組；撤銷原第三辦公室、市環境衛生局。⁹

這些組室建立後，以原來的機關工作人員為主，也吸收一些群眾組織的代表。徐景賢徵得張春橋同意，建立以群眾組織負責人擔任各個組「核心」、原來的機關工作人員負責具體工作的組合。¹⁰ 這些原機關工作人員雖然大都是普通科層人員，但他們有着管理經驗，駕輕就熟，很快使幾近癱瘓的上海生產和生活的管理系統重新運轉，上海經濟秩序逐漸好轉。加上隨着一些領導幹部的「解放」與「結合」，上海的經濟、生產和生活管理，終於逐步恢復正常運轉。

8 《上海人民政府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人民政府志》，上海社會科學院2004年出版社出版。

9 以上關於市革會建制的資料全部引自《上海人民政府志》。又據《中共上海黨志》：到1976年8月，市委、市革會工作機構有：辦公室、組織組、調查組、寫作組、統戰小組、專案辦公室、工業交通組、地區組、財貿組、文教組、科技組、外事組、郊區組13個部門。

10 同上。

三軍座談會事件

但是，工人造反派對科層人員的回歸很不滿意。王洪文說：「奪權以後，怎麼職權都到機關幹部手裏去了？」¹¹ 公社成立前，上海的運動基本在工總司的掌控之下，一些大的事情都一定有工總司參加。但公社成立之後，工作歸口，機關幹部越來越多地回歸管理，公社的工作逐步被機關幹部掌控。工人造反派感到被漸漸架空，覺得權都被徐景賢的這些機關聯絡站幹部們抓過去了，因為那些機關幹部大都加入徐景賢的機關聯絡站。謝鵬飛所負責的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公社成立後很快沒事可幹，各局的工作都不再向他們匯報。他們感到失落。其他造反組織也因為在市革會中所居席位不多而有牢騷。1967年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不多久，工總司和其他公社發起組織市革會底層大廳召開了一個會議。大家對大權旁落發了許多牢騷。主持會議的王洪文也認為，現在市革會大權都是機關造反派一派掌權，排擠工總司和其他在上海一月奪權中做出貢獻的組織，這種情況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三月初的一天下午，王洪文和王明龍，在上海警備區常德路禮堂與駐滬三軍領導開會，參加者還有上海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東海艦隊副司令高志榮、駐滬空軍副政委姬應伍，共六七人。王洪文後來在工總司的一次會議上說，是因為工總司的一幫人對機關聯絡站的人有意見，「馬上要幹，我不同意，為此找三軍開會商量」。

參加會議的李彬山覺出工總司的矛頭指向，會後，他馬上往興國路招待所向張春橋匯報。張春橋聽後，第二天就將王洪文找去批評。王洪文下午回到在巨鹿路空四軍招待所，只對王明龍說了兩個字：「右傾」，就悶頭睡覺。搞得王明龍摸不着頭腦，始終不理解王洪文這個「右傾」是什麼意思。¹²

11 徐景賢 2003 年著《十年一夢》。

12 筆者 2008 年 9 月 28 日對王明龍的訪談。

當晚，張春橋又將公社負責人中的七人都叫去：機關聯絡站的徐景賢、王承龍、朱永嘉和朱玉佩四人，工總司的潘國平、王明龍和謝鵬飛三人。還有三軍派駐公社的軍代表。王洪文沒參加，住進了醫院。張春橋在興國路招待所整整開了兩天整風會議。¹³ 過去張春橋對工總司的人，都是有事說幾句話或講一通話就散會。這次花兩天時間整肅工總司，足見他對此事的重視。會上，張春橋的態度非常嚴厲。潘國平後來回憶說，張春橋平時說話喜怒不形於色，這次如此震怒，他還是第一次看到。¹⁴ 會議一開始，張春橋就說：「王明龍，你有那麼大權力?!你要調動三軍幹什麼?你要搞的話，我和姚文元回北京，上海你去搞好了!」王明龍後來回憶說，當時自己被張春橋訓得腦子一片空白，不知道張春橋為什麼說自己調動三軍。¹⁵ 張春橋訓完王明龍，又轉向謝鵬飛：「謝鵬飛，你不是有很多話要講嗎?今天怎麼不說了?」「你說說，你們為什麼要開這樣的三軍會議?」謝鵬飛與朱永嘉關係比較好。朱的妻子和謝在一個廠工作，朱又曾在謝負責的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工作。事先，朱已經告訴謝，晚上張春橋開會，批評你，你就低頭認錯，不要辯護，這事與你不搭界。謝鵬飛本來就怕張春橋，看到張春橋發怒，而且有朱永嘉的招呼在前，更不敢多言，支吾了幾句，說自己對老徐有點意見。張春橋狠狠訓斥謝鵬飛，謝被訓得邊哭邊做自我檢討。¹⁶ 只有潘國平與張春橋強辯，說公社都快變成機關聯絡站的公社了，樣樣事情都要通過徐景賢。張春橋說：小潘，這事與你無關，你不要跳，王洪文自己都承認錯誤了。張春橋還給潘國平看了王洪文寫的檢討。¹⁷

13 筆者 2008 年 9 月 29 日對謝鵬飛的訪談。

14 這是筆者 2005 年在上海期間，與在美國的潘國平通電話時，潘國平告訴筆者的。

15 筆者 2008 年 9 月 28 日對王明龍的訪談。

16 以上均引自筆者 2008 年 9 月 29 日對謝鵬飛的訪談。

17 這是筆者 2005 年在上海期間，與在美國的潘國平通電話時，潘國平告訴

張春橋要在一旁的海軍軍代表蘇某發言，三軍座談會時蘇在場。他說：「有件事不是很正常，王洪文和王明龍找我們開了次會，講了些與徐景賢等機關幹部的矛盾，以及對徐景賢工作方面的意見。」說着，他拿出了當時的會議記錄，念了一遍。張春橋又轉向王明龍：「你，王明龍，你在部隊幹過，你懂得我們部隊的這一套，你們是想去爭取三軍的支持！你們這是有用心！」¹⁸ 張春橋批評得很重，但王明龍始終沒有說出是王洪文讓他召開三軍座談會的。

王洪文被張春橋嚴厲批評後，住在華東醫院一直不出院。張春橋要徐景賢去醫院看他。張春橋給徐景賢看了工總司徐美英給他的信。信中說王洪文在工總司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張春橋說：

看來，王洪文這個人毛病不少。但我們也要考慮到，要穩定上海200多萬工人的大局，對工總司的這幾個工人領袖，既要嚴格要求，又要慎重對待，這件事情看樣子到此為止了。我已經把他們所有的頭頭都召來談過話，現在王洪文在醫院生病，你還是去看看他吧。¹⁹

徐景賢去醫院探望了王洪文，王洪文出院。工總司與機關聯絡站實際與寫作班的這次紛爭，就這樣被張春橋平息。

王明龍始終認為他召開的那次會議是正常的工作匯報，不是針對徐景賢他們，而是針對原來的那批機關幹部，王明龍始終不明白張春橋為何如此震怒：

我向王洪文匯報，說紅衛兵小將對機關幹部的這種工作作風有意見。王洪文認為這種情況應該解決。他對我說，那

筆者的。

18 筆者2008年9月28日對王明龍的訪談。

19 徐景賢2003年著《十年一夢》。

下午開會向三軍匯報。為什麼要向三軍匯報，是因為之前張春橋曾經說過，公社工作主要由三王主持，如有重大事情，可向三軍匯報。三王，即王洪文、王承龍和我。駐滬三軍在公社有聯絡組，有事聯絡組的聯絡員會向各自的司令員匯報。所以我覺得這個會很正常，只是一個工作匯報會，根本不是告狀會，不是對着徐景賢和機關聯絡站的。我在會上也只談了紅衛兵對機關幹部的看法，根本沒提到徐景賢和機關聯絡站。^{20 21}

其實，即使王明龍不是對着徐景賢等，即使他在會上沒有提到徐景賢，工人造反派對徐景賢他們的不滿確實存在。這種不滿，既因文化差異引起，更因爭誰是正宗革命造反派的名份而引出。張春橋不過是找個機會，借題發揮。他不容許任何人碰寫作班，哪怕是他信得過的工人造反派。從事情後來的發展看，張春橋最不能原諒的是王明龍。據葉昌明回憶說，這是因為王洪文馬上作檢討，還寫了檢查交上去，王明龍卻把事情攬在自己身上，還一再為自己開這個會的行為解釋。²²

張春橋惱火的原因，應該不只是工人造反派反對機關幹部，更是因為他們越過他去找軍隊，他擔憂他們試圖與軍隊結盟生出的麻煩。張春橋的這個擔憂有先見之明。文革後來發展的事實證明，凡有軍隊介入的地方，兩派乃至幾派紛爭不斷，直至發展到大規模武鬥。上海則沒有這樣的麻煩，即時有，主要也在郊縣。例如青浦，屬於上海警備區管轄的縣武裝部介入文革，造成持久不斷的大規模武鬥。

三軍座談會事件，以及前面章節所提及的「徐老三」、

20 筆者 2008 年 9 月 28 日對王明龍的訪談。

21 但是筆者 2008 年 9 月 29 日對謝鵬飛訪談時，謝鵬飛的回憶也說這次會確實是對針對機關工作人員的，對他們掌握了公社的大部分權力不滿。雖然他沒有參加這次會議。

22 葉昌明 1977 年 5 月 23 日。

「王小七」的戲稱，顯示了徐景賢與王洪文的矛盾。這個矛盾不只是兩個人的位置高低權力多少之爭，更是奪權後的黨政工作機構，是以文革初期推動了運動發展的造反派為主，還是以原來的科層人員為主之爭。這個爭奪不僅在上海，而且在全國都非常激烈。

上海解放幹部的模式

「解放幹部」、「結合幹部」，都是文革中創造的新名詞，意即解脫被批判的幹部，恢復他們的工作，或作為「革命幹部」代表進入革委會。是毛澤東的要求。1967年3月31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引述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三結合」即是由「革命幹部」、群眾組織代表以及軍隊代表，三方組成黨政合一的革命委員會。在上海，局以下單位一般不派軍代表，「三結合」對象實際只有兩方：原來的幹部，以及群眾代表。最初的群眾代表，大多數是造反派組織推派的頭頭。

幹部要被「解放」，必須「深刻檢討」，「取得群眾諒解」。主要是檢討文革前的「執行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文革中的「執行資反路線」，以及以往的官僚主義作風。這種檢查被稱為「亮相」，這是對京劇行話的借用。而在上海，幹部亮相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必須揭發和批判同僚尤其是頂頭上司，而且要「敢於刺刀見紅」，即能夠揭發出置批判對象於絕地的「關鍵性」材料。這個模式首創於黃浦區。黃浦區委和區人委1967年初被奪權後，2月28日至3月初，區機關的造反派連續召開批判黃浦區委大會，要區裏的部局級以上幹部同區委

書記作「面對面的鬥爭」，「火線亮相」。張春橋對這樣的形式非常讚賞，說：這是「從鬥爭中考驗幹部」，「是創造條件讓當權派表現」的「重要經驗」。1967年2月下旬，市革會以黃浦區和川沙縣為試點，建立區和縣級革委會。以後的二十天中，張春橋、姚文元又四次親臨黃浦區聽取情況匯報。²³

1967年一月奪權後的市屬機關，幾乎所有處級以上幹部都被靠邊，好多單位連科級幹部也靠邊，整個權力機構無法有序運行，尤其是生產指揮系統，都是靠着以往的慣性運作。「解放」和使用有經驗幹部成為必須。儘管大批原來處於底層的造反派進入各級機構，但張春橋對他們也並不是十分放心。畢竟，日常業務工作還是需要經驗者。還是在一月奪權時，張春橋就表示，機關還是要由原來的機關幹部掌握，不要群眾直接掌權，工作要有連續性。²⁴ 3月的一天，張春橋將徐景賢、王洪文、潘國平、朱錫琪等造反派找去展覽館的咖啡廳，說：「毛主席有指示，要及時把犯了走資派錯誤的好人解放出來，並給予工作出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你們看，上海市有哪些領導幹部，要市一級的，可以考慮解放。當然了，毛主席說的是犯了走資派錯誤的好人。」他說：「像陳丕顯、曹荻秋這樣的，到現在還在對抗群眾批判的人，能解放嗎？」顯然張春橋的意思是說他們不屬於這個範圍。他要大家討論哪些市級幹部可以「解放」。王洪文認為馬天水還可以，因為每次開批鬥會他總是搶先檢查自己的錯誤，有時還能揭發陳丕顯和曹荻秋。對王少庸，王洪文和潘國平認為他是兩面派，「當面檢討，背後賴掉」。張春橋解釋：「他在山東挨過整，被關過好幾年」，「王少庸的作風是叫人不舒服的，但是他跟陳丕顯、曹

23 張春橋和姚文元親臨黃浦區之事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333 頁。

24 轉引自金光耀、金大陸、筆者 2009 年對王知常的訪談。

荻秋不是一條線上的。」²⁵ 經討論，大家都同意市委幹部中先解放馬天水和王少庸。

馬天水曾經對文革嚴重影響生產不滿，在1966年全國工交會議上提了很多意見，被林彪和張春橋狠批，從此對文革的態度轉變，表示要向毛主席支持的造反派靠攏。1967年1月6日，造反派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他不躲避批判，總是隨叫隨到；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後，他主動去報到，表示願意在上海臨時最高權力機構的領導下工作；他從2月以後就明確表示要和陳、曹劃清界限，並寫出了幾份被造反派認為「較有份量」的揭發陳丕顯和曹荻秋的材料。²⁶ 王少庸生於1908年，受教育程度大學，1932年參加共產黨。共產黨執政後他曾任青島市委書記，後來因一起冤案被關八年，1962年被甄別平反，1964年柯慶施將他調來上海，文革前任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分管市委工業政治部。被關了多年的王少庸弄不清黨內鬥爭的新形式，出來工作的兩年中，處處小心謹慎，但文革一開始還是被打倒。

徐景賢根據張春橋的佈置，先後找馬天水和王少庸談話，說張春橋、姚文元對他們還是寄予希望的，要他們既批判自己，更揭發陳、曹，越具體越好；還專門派人幫馬天水和王少庸寫檢討，稱為「馬王小組」。²⁷ 怎樣為馬天水和王少庸創造亮相機會？徐景賢和機關聯絡站的造反派商量，決定讓他們倆在批判陳丕顯、曹荻秋中亮相，「通過電視轉播，讓全市各條戰線上的人們都看到他們每個人的態度，確實是檢查、揭發、

25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26 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派代表在1967年4月23日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歡迎革命幹部出來造反大會」上的發言《對馬天水同志的的基本估計》；載於《工人造反報》、《財貿戰士》、《體育戰報》、《反到底》、《東方紅》、《新北大》1967年4月7日聯合編輯的《大會特刊》聯合版第4期。

27 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交待得比較好，群眾就諒解他們」。²⁸

以電視大會批判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主要領導幹部，並且以電視媒體傳播，自1967年1月6日的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始。在上海的市級幹部中，馬天水第一個在電視大會上面對面地揭發批判陳、曹。²⁹ 1967年3月16日，在批判陳丕顯和曹荻秋大會上，馬天水和王少庸面對面地揭發批判兩位昔日的上級：³⁰ 表現最突出的是馬天水，他對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咬牙切齒，手指着他們的臉，慷慨激昂地發言。被徐景賢等稱讚，認為態度好。³¹ 3月24日及4月4日，市革會兩次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歡迎革命的領導幹部站出來造反大會」，馬天水和王少庸作進一步檢討，然後，由市委機關造反派發言，對他們的檢討予以肯定。³² 張春橋馬上將這個方式推而廣之，提出可以在電視批鬥大會上，讓市裏的部、局、區領導幹部出來亮相：

我們考慮，這些幹部在鬥爭中亮相，不僅要進行自我批評，還要能夠揭發別人，同劉少奇、鄧小平、陳丕顯、曹荻秋劃清界限，應該使群眾、幹部都看得見。

這是實現革命的三結合的比較好的一種辦法。不是「和稀泥」，不是湊合，不是關在小房間裏指定幾個人三結合，而是發動廣大群眾，發動了廣大幹部。³³

28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29 在此之前，1967年3月14日，王少庸與原市人委文教辦公室主任陳琳瑚曾經在全市電視大會上發言。但那次陳、曹沒有出席，所以不是面對面。

30 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派代表在1967年4月23日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歡迎革命幹部出來造反大會」上的發言《對馬天水同志的的基本估計》。

31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32 5月13日這個日期引自中共上海黨史研究室編纂《中共上海歷史實錄》。

33 張春橋1967年4月14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轉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馬天水和王少庸隨即被「解放」，5月13日，又被結合進上海市革會領導班子。

如果說1966年年底之前，毛澤東的文革主張是以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等文革派的個人名義講話轉達，讓習慣了中央文件層層下達的幹部階層心存疑竇，而且那時毛澤東對於文革的依靠對象也還沒有表達得十分明確；那麼到1967年初，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尤其是中共中央等四個機構聯名給上海造反派的賀電，明確表達了毛澤東依靠造反派開展文革的決心。毛澤東是整個幹部階層的靈魂；緊跟毛主席，不被革命淘汰，是所有幹部的不二選擇。毛澤東鮮明的態度成為幹部轉向的最重要因素。而一向受上海幹部們敬重的馬老的榜樣作用，帶動了上海幾乎所有的幹部和原先對文革有看法的人們。以後，在電視批鬥大會上，幹部們紛紛亮相，揭發批判陳丕顯、曹荻秋。有的部局級幹部甚至聲淚俱下地聲討陳丕顯。赤衛隊總部的一些負責人也被組織「面對面」批判陳、曹。1967年12月24日下午，市革會在上海雜技場舉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丕顯、曹荻秋炮製御用工具赤衛隊，破壞工人運動的罪行大會」，王玉璽作為「赤衛隊黑頭頭」，和陳丕顯、曹荻秋一起站在台上被批判，一些原赤衛隊員上台揭發批判。³⁴ 這個做法也推廣到基層，基層幹部們也必須批判揭發他們的領導

這種必須當面揭發，「刺刀見紅」才能被「解放」的做法，成為上海解放幹部的模式。既使被批判揭發者眾叛親離，而且也斷了揭發者的退路，今後只能義無反顧地「繼續革命」。

上海較早「解放」的市級幹部中，還曾經有陳琳瑚。他文革前是市人委文教辦公室主任，1967年4月左右和馬天水與王少庸一起被解放，擔任市革會領導成員、教衛組負責人。但沒

34 《文匯報》67年12月24日《陳曹御用工具赤衛隊的罪行——赤衛隊一小撮壞頭頭的交代材料摘錄》。

多久，他帶隊去北京祝賀北京市革會的成立，五一節晚上，因為離隊去看老戰友，錯過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接見。回上海後，同去的王秀珍向張春橋、姚文元匯報：說陳琳瑚在北京到處拜訪老幹部，發文革牢騷，因為喝酒耽誤了見毛主席的重大活動；「而且在北京紅衛兵參加的座談會上，有人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不滿，陳琳瑚非但不批判，反而附和。」張春橋聽後，當着市革命委員會全體成員的面，狠批了陳琳瑚。陳琳瑚平時私下對張春橋的非議也被揭發。他被作為對文革有意見的「不見得派」，關押審查，從此離開市革會。

據不完全統計，僅在1967年中，上海電視台就轉播了51場批鬥大會；當時，上海電視台每月都要轉播四至六場批鬥大會，有時一天轉播兩場。層層通知，組織觀看，會後收集反映，尤其收集「靠邊」的幹部的反應。不但批判陳、曹，還批判許多社會和文化名流，例如著名演員電影趙丹、白楊等。每一次電視批判鬥爭會後都出有大會專刊。³⁵

1967年夏天毛澤東在上海時，對這樣的電視批鬥會看得津津有味。通過電視毛澤東第一次見到了主持批鬥會的王洪文：

毛主席去年在上海時，我們好多同志參加了鬥陳、曹的電視大會。毛主席在看電視時，一個一個地問着春橋同志，這是誰，叫什麼名字，怎麼樣？主席還說：「他們現在年紀都很輕」。³⁶

對於電視直播批鬥大會中造反派強迫陳丕顯、曹荻秋低頭彎腰，毛澤東看了說：「這算不了什麼嘛！」³⁷

35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未刊稿《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335 頁。

36 轉引自王洪文 1968 年 2 月 14 日《工總司第三次整風報告》，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37 轉引自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 年出版《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

以陳丕顯和曹荻秋為主要批鬥對象的電視轉播有三十多場次。雖然給毛澤東看的批鬥場面，允許陳、曹坐在椅子上，到要他們回答質問時，再站起來說話；但實際上，不被毛澤東看到的許多次批鬥會上，陳、曹被強迫低頭彎腰，胸前掛上大牌子，寫上名字打上叉叉。徐景賢文革後認為，上海電視批判陳、曹大會實際上違反中央規定，因為當時中共中央規定，省、市一級領導幹部不准在公開的報刊上點名，而電視鬥爭會完全是公開指名道姓地批判，外國駐上海的領事機構和商務機構，也可以從電視裏看到實況。³⁸ 1967年8月，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問題的通知》，文件開出經過毛主席和中央批准的一系列可以公點名開批判的名單。其中，上海是陳丕顯和曹荻秋。10月17日，《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文章，首次在正規報紙上公開批判陳丕顯和曹荻秋，對陳丕顯、曹荻秋的批判進一步升級。

市革會人員構成

為了體現市革會的群眾性，組成市革會委員名單中的群眾尤其是工人比例非常高，據葉昌明1968年3月20日在工總司總部全委會上宣佈的市革會各類人員比例：

去年二月份人民公社成立以來，各組織變化，人員變化，應當調整充實，確定159名革命幹部、三軍代表、各革命群眾組織代表。

比例：幹部15%(24人)，三軍15%(24人)；

群眾70%：工人27%(43人)；農9%；財11%；機關5%。

常委45人：領導幹部25%，群眾組織20%(9人)。

38 以上資料均引自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基本照顧到群眾組織，先進單位，在文化革命中影響大的。這個代表是初步的，最後報請中央決定。

工總司總部

王洪文、潘國平、陳阿大、張寶林、戴立清、康正勤、繆南生、葉昌明、耿金章、王秀珍、金祖敏、楊富珍、黃金海、徐美英。³⁹

王洪文對這份名單的由來解釋說：

這個名單不是現在搞的，革委會建立之後就考慮了。我們曾報了三次。以後等工代會、財代會、紅代會開過後決定。今年一月份春橋同志又催過。直到昨天才討論。

這次名單根據協商推舉上來，不採取大民主選舉辦法，用大民主造反派不可能選上的。名單是按發起單位：工總司、財革會、紅代會、紅東北、公安機關只一個；此外照顧先進人物，原來的影響，如炮司雖然犯過錯誤還是有個名額。要考慮代表的權威性。大會幾次討論，小會也討論過。⁴⁰

這個名單後來也沒有正式宣佈，不過名單上的人員後來確實都成為市革會委員或常委。1968年9、10月間，「全國山河一片紅」時，上海才正式向中央報送市革會委員的名單。不過，名單還是沒有對外宣佈。1970年，中央正式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定員編制：委員名額159名，其中正副主14名(保留1名)，常委30名(保留4名)，委員106名(保留4名)。⁴¹ 1970年1月16日，上

39 工總司 1968 年 3 月 20 日晚 7 點全委會記錄，上海市總工會檔案。原記錄中記錄了工總司的人員名單，沒有記錄其他人員的名單。

40 同上。

41 《上海市政權系統、地方軍事系統、統一戰線系統、群眾團體系統組織史資料(1949-1987)》，中共上海組織部等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1 年

海市革命委員會舉行擴大會議，審議通過了市革會委員名單：市革會主任張春橋，第一副主任姚文元；副主任為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楊富珍、馬天水、王維國、陳敢峰、王少庸等12人；⁴² 朱永嘉、葉昌明、陳阿大、黃濤、陳敢峰、金祖敏⁴³、張寶林等30名常委；還有106名委員。3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在市革會委員名單中，本書前面提到的許多人物都在列：工人造反派黃金海、王成龍、汪湘君⁴⁴、潘國平、謝鵬飛、耿金章、徐美英、傅世而、唐文蘭、梁飛、繆南生、馬振龍；還有其他系統的造反派頭頭胡永年、陳廣煊、宋有福、劉貴琴，造反派紅衛兵楊小兵、葉定海、繆財生。

1972年11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革會又增補四位副主任：文革前的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文革前的市人委外事辦公室主任馮國柱、空四軍政委武佔魁、以及工人造反派金祖敏。1975年9月和11月再增補文革前的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1975年10月調離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楊西光。⁴⁵ 這些市革會委員的構成情況，據徐景賢1970年的一次講話：

現市革會有150名委員，30歲以下40名(26.7%)，40歲以上30名(20%)；軍幹群，軍隊代表24名(16%)，幹部21名(14%)，群眾105名(70%)。

工人代表佔大多數，43名，農民21名，紅衛兵8名，其他勞動人民14名(財貿等)，知識分子16名，一般機關幹部3名。

上海市一級局長、處長以上幹部，現已解放76.5%，基

出版。

42 《上海人民政府志》。

43 金祖敏 1972 年被增補為市革會副主任。

44 黃金海、王成龍、汪湘君 3 人 1972 年被增補為市革會常委。

45 《上海人民政府志》。

層如工廠一級的幹部90%以上解放；幹部解放後，不一定恢復原來的職務。⁴⁶

作為文革新政權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對工人代表的吸收是1949年以來最多的，遠遠超過了過去的十七年。而這些工人代表中，工人造反派佔了相當比例。這決定了上海文革的力量對比，也決定了上海文革的走向和特點。

在政府和共產黨組織之間的關係方面，上海和全國所有的革委會一樣，市革會以及下面的各級革委會都實行黨政合一。直到1971年1月，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後，才恢復各級黨委會包括中共上海市委。市革會中的一部分機構劃歸市委，但市委辦公室和市革會辦公室仍合署辦公。中共上海市第四屆委員會第一書記張春橋，第二書記姚文元；王洪文、馬天水、周純麟、徐景賢、王秀珍為書記。市委的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1973年5月王洪文調離上海，由馬天水主持市委日常工作。⁴⁷ 至於市人民代表大會，文革初期被停止活動後，整個文革期間，上海未選舉產生過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也未召開過人民代表大會或開展過活動。

小班子和大班子

自1967年初的奪權後，各級革委會陸續成立。上海全市當時共有54個局級單位、六個相當於局級的單位，加上10個區、10個縣，共80個局級單位。但是，到1967年10月15日，這80局級單位，「已經建立三結合班子的」，只有35個。⁴⁸

46 徐景賢 1970 年 11 月 24 日與美國友人斯諾夫婦的談話。

47 《上海人民政府志》。

48 這個數字引自 1967 年 10 月 21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徵詢對「九大」問題的通知》中，姚文元同年 10 月 11 日給毛澤東的信。

市革會機構設置「改部為組」，這是毛澤東的主張。⁴⁹ 下面各級革委會也參照市革會的建制設立革委會的各組室。如何處理原來的幹部和科層人員，成為很大難題。那些原來帶「長」字的領導幹部，可以用「叛徒」、「特務」、「走資派」等名義打倒；但對普通科層人員就沒有理由全部打倒。有的革委會將原來的黨政科層人員一律靠邊，然後再挑選其中被認為可靠者，與下面調上來的群眾代表組成新的工作機構；也有的革委會，原來的科層人員除了被審查或打倒者之外，全部成為新機構科層的工作人員，與下面新上來的群眾代表一起工作。如此，文革前的機關科層人員，再加上文革中新進入的群眾代表，革委會機關的人員越來越多。據姚文元1967年給毛澤東的信中反映：

這幾個月中，市革委會人員大量增加。目前，有20個工作部門，3229人，辦公室下面就有763人。這還不包括各革命群眾組織脫產人員。無論如何，這個機構是太龐大了。⁵⁰

姚文元在這封信中還說，他同張春橋商量後，提出「至少要砍了一半，三分之二以至更多」。1968年2月23日，張春橋提出他的設想：

一年多來的經驗告訴我們，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不要搞大班子，要搞小班子，小的機構。革命委員會的辦公室機構要與原來的機構分開。原來的舊人委要搞鬥批改，但有的業務還可以讓他們去搞，過早的把機關用起來就會有問題，但也可以從原來的機構裏選一部分人，可以從群眾

49 徐景賢 2003 年著《十年一夢》。

50 姚文元同年 10 月 11 日給毛澤東的信，轉引自 1967 年 10 月 21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徵詢對「九大」問題的通知》。

組織裏選一部分人，參加革命委員會的工作，人越少越好。……主席在上海對我說：「你們上海的革命委員會搞20吧」。「當然工務員打字員不算」。⁵¹

張春橋提出「小班子」和「大班子」。小班子是新的領導成員，人員要少；大班子是被摒於革委會之外的沒有被「解放」的幹部，以及沒有被使用的原科層人員。1968年3月10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社論《革命委員會好》，發表了毛澤東的新語錄：「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有三條：一條是有革命幹部的代表，一條是有軍隊的代表，一條是有革命群眾的代表，實行了革命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實行了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繫群眾的領導班子。」4月2日，市革會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貫徹毛澤東指示。會上張春橋提出各級革委會的精兵簡政的問題，要求公司以上機關一律分成大小兩個班子，張春橋提出，小班子人員應佔原機關幹部人數不到三分之一以下，其餘人員可以另外組織起來進行鬥批改。⁵²精簡區、縣、局機關的結果，進小班子的不到10%。能進小班子的人員基本上是造反較早的科層人員，或者是必需留用的業務骨幹人員。90%的幹部和原科層人員被編進大班子。大班子的人沒事幹，就被要求開展鬥批改。⁵³

在市革會，由於那時黨的職能沒有恢復，原市委、市人委的工作被合而為一，兩個機關的幹部，再加上奪權後來機關工作的群眾組織代表，擠在一起。其中許多人由於沒有「解放」或不被造反派信任，不能參與市革會的日常工作。於是，沒有

51 張春橋1967年2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轉引自周良霄、顧菊英編著《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

52 《上海人民政府志》。

53 「鬥批改」是「鬥爭、批判、改革」的簡稱，最早見於《十六條》，是毛澤東對文革過程的最初設想。

資格參加日常工作的幹部們，被留在延安西路33號原市委辦公大樓，讓他們「對舊市委進行大批判」，這是大班子；市革會的工作班子設在外灘的原市人委辦公大樓，這是小班子。

選拔造反派也即文革中的積極分子進入各級革委會的領導層和革委會的工作機構，是毛澤東的要求，也是對文革的態度。小班子體現一月奪權成果，其中有多少留用人員，多少文革中的「新鮮血液」，始終被造反派們關注，防止「走資派的班底復辟」。尤其在工業、交通、基本建設等工人集中的系統，小班子的人員構成更是工人造反派們的關注對象。以下是1968年下半年，工總司對幾個局的小班子的調查統計：

上海輕工業局文革前局機關共有科室20個，各級科層人員307人。1968年11月時，小班子109人，是原局科層人員人數的35.5%。其中，原局級領導幹部3名，原處級幹部3名，原科級幹部31名，一般科層人員52名，一月奪權後從下面上來的工人20名。負責全面工作的局革委會負責人2名，1人是原副局長，另1人是工人即馬振龍。這109人組成了輕工業局的6個組室共28名「核心」人員。其中原幹部16名，工人12名。6個組室的具體情況是：辦公室4人，負責人是文革前的工廠技術員；原局機關科長1人，一般幹部1人，工人1人。組織組6人，負責人是原局機關的一個副處長，還有2人也是原副處長；3人為原工廠幹部；政宣組7人，負責人為原副科長，另一個負責人為工人，3人為原處、科級幹部，1人為原工廠黨委秘書，1人為工人；生產組5人，負責人為原局長兼黨委書記，2人為原科長，2人為工人。後勤組4人，3人為原處、科級幹部，1人為工人；支內組2人，都是原處、科級幹部。此外，還有不屬於小班子編制的專案組、清檔組、援外組、工宣隊辦公室。共有37人，其中幹部11名，工人26名。

輕工業局的大班子共有218人，都在下面的工廠「邊勞動，邊學習，邊清隊」。從這些人中「已揪出23名階級敵人，其中

局級3人，處級7人，科級5人，一般幹部8人」。⁵⁴

輕工業局結合進了許多群眾代表，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工人造反派馬振龍擔任了局革會負責人。而沒有造反派擔任局革會負責人的上海市儀錶工業管理局，情況則很不一樣。儀錶局的革委會，起初沒有群眾代表。文革前儀錶局的局機關共有15個科室，加上所屬的4個專業公司和一個設計室，共有各級科層人員599人。文革中局革委會成立後，於1967年11月進行機構改革，4個專業公司被認為是「修正主義機構」，沒有存在必要，於是與局機關合併，原有人員全部轉入革委會工作。對局革委會這樣的構成，儀錶局的造反派非常不滿，寫報告說這是「明目張膽地恢復舊班子、舊法統。原儀錶局的一套人員原封不動，各個處室，僅名稱變動一下(處改名為組，處長成組長)，五百多名機關幹部，都變成局革委會工作人員。局革會4名正副主任，2名是局級幹部(其中1名已揪出是叛徒)，1名是機關造反派代表，1名是解放軍代表，唯獨沒有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局革會常委會，也不吸收總聯絡站(即工總司儀錶局總聯絡站—筆者注)。」工總司儀錶局總聯絡站的造反派提出，局革委會必須有造反派參加。到1967年10月，兩名工人造反派補充進局革委會。毛澤東提出精兵簡政之後的1968年4月，儀錶局局革會劃定了小班子與大班子。小班子設4組1室，人員共121名，其中：組織組9人，政宣組13人，生產組36人，後勤組25人，辦公室31人，重點建設室7人。造反派再三要求進小班子，這個要求開始沒被理睬。直到1968年5月3日，馬天水到儀錶局檢查工作，責成局革委會必須吸收群眾代表進小班子，工人造反派才進入

54 以上關於輕工局的資料全部引自上海市革會工交組與工總司共同組成的駐輕工業局聯合調查組1968年11月20日的《關於輕工業局革委會、聯絡站組織概況匯報》，標題中的「聯絡站」即「工總司輕工業局聯絡站」。輕工局當時所屬專業公司16個，工廠586個，直屬單位12個，職工195000餘人。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了小班子。⁵⁵ 大班子409人，無事可幹，就讓他們進行「鬥批改」。⁵⁶

而在冶金局，1968年6月時，小班子80人，其餘400餘名科層人員被劃入大班子，分別下放勞動。⁵⁷

1968年8月19日，毛澤東在回答姚文元的詢問時答話：「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階級隊伍；三是整黨；四是減薪，科室人員下放。廠長、副廠長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⁵⁸ 但是，那些被擠於小班子之外的大班子原科層人員，再加上被審查被打倒的一大批幹部，是一個非常大的數目，如何安置這批人，困擾着各級革委會。

五·七幹校、戰高溫和四個面向

黑龍江又一次為毛澤東提供了解決文革難題的方式。前一次是1967年2月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這次是將幹部送往「五·七幹校」。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黑龍江省革委會在慶安縣柳河地區辦五·七幹校的經驗。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把精簡下來的幹部集中安排到農場，保留工資待遇，他們將這個農場命名為「五·七幹校」。這個名字源於毛澤東1966年5月7日給林彪的一封信。封信中的理念是毛的烏托邦。五·七幹校不但解決被文革淘汰的多餘幹部的去向，而且與毛澤東的理念正好合拍。毛澤東看到黑龍江的材料後，9月30日寫了一則批語：「此件可在《人民日報》發表。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

55 工總司《簡報》1968年5月8日第67期：《儀錶局內的一股復辟舊勢力》，上海市總工會檔案。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也有收藏。

56 以上關於儀錶局的資料來源全部同上。

57 《上海鋼鐵工業志》，上海鋼鐵工業志/上海冶金控股(集團)公司鋼鐵志編志辦公室編，上海社會科學院2001年出版。

58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2003年出版《毛澤東傳》第1526頁。

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以上請提到碰頭會上討論決定」。所謂「保留工資待遇」，實際就是保留幹部工資級別和幹部編制身份。

1968年10月5日，上海市革會召開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幹部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決定》，接着，10月9日，市革會決定在上海遠郊的奉賢海邊，建立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市革會和各區、縣、局以及文化系統等機關，也紛紛往市郊各縣包括上海在江蘇省的飛地大豐縣選址，創建五·七幹校。那些沒有進小班子的幹部，都被動員送去幹校。說是動員，其實就是強迫，無論有什麼個人或家庭或健康方面的困難，一律必須去。1968年10月15日，首批機關幹部赴奉賢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據統計，到1969年6月中旬，上海全市共辦五·七幹校19所，在校人員1.5萬人，其中處以上幹部1700多人；⁵⁹還有文化局、出版局、電影局報社以及作家協會等等文化藝術系統所屬的藝術家、作家和文化人。後來學員陸續增加到2萬。各區、縣、局也將所管轄的一些集體所有制人員下放去幹校。

幹校普遍建立了「牛棚」，專門關押「隔離審查」的對象，有幹部有文化人，被關者完全喪失人身自由。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還規定：被隔離審查者必須佩戴白袖章等標志，而且每人有編號，只叫編號，不呼姓名，與監獄犯人一樣。國棉十七廠文革初期的工作隊長施惠珍，被關在奉賢五·七幹校的隔離室，隔離室七人一間房間，施惠珍是78號，編號編到一百零幾號。他們出去勞動要排隊，專人看押，被稱為「牛鬼蛇神大隊」。每次出去，小孩圍觀，叫「牛鬼蛇神來了！」還拿泥巴扔他們。這些「牛鬼蛇神」中的上海市副市長張承宗、上海市總工會主任張祺等，過去都是地下黨，被作為「叛徒、特務」審查，不能出「牛棚」，連排隊出去勞動的資格都沒有。⁶⁰

59 這個數字引自《中共上海黨志》。

60 施惠珍在幹校的情況，引自筆者、金光耀、金大陸2009年12月20日對

除了「牛棚」，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等還有「羊棚」，是「靠邊審查」對象集中居住的地方，他們處境比關在「牛棚」者稍好些，但也分等次：被「隔離審查」者，因為不是領導幹部或知名人士，沒有資格進牛棚，就被「隔離」在「羊棚」裏審查，完全沒有行動自由；「半隔離審查」者，不能離開幹校，節假日也不能回家，來往信件要被查閱；「靠邊審查」者，進出必須匯報，早晚要向毛主席像「低頭請罪」；沒被宣佈「解放」但編入連隊參加勞動的「回班人員」，必須經常「匯報思想」，接受批判；還有雖被宣佈「解放」但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者（即黨籍沒被激活）。通常對幹部的審查，要到被宣佈「恢復組織生活」，才算基本結束。⁶¹

幹校選址都在郊區，許多人去幹校後無法照顧家裏老人、病人或未成年孩子。1968年底，馬天水向張春橋反映了許多幹校學員的具體困難以及輪換要求，張春橋沒同意。不過，張春橋提出：「實在不行，以後下工廠勞動也可以」。一些工業局如輕工業局、手工業局在市區辦五、七工廠，作為大班子人員的勞動場所。還有一些工業局，以及交通、財貿系統等29個單位，借基層單位場地，辦「學習班」，讓大班子人員進行鬥批改以及勞動。以上這些留在市區的大班子人員共1.09萬多人，其中處以上幹部900多人。⁶²

五·七幹校畢竟只是臨時安置地。既然稱為「幹部學校」，總有「畢業」的時候。但「畢業」後去哪裏工作？原來的工作單位，早被一月奪權後進來的群眾代表佔去了許多位置，回不去；計劃經濟體制又不允許解僱他們。於是，仿效對中學生的畢業分配，對這些幹部也實行「四個面向」：面向邊

國棉十七廠原工作隊隊長施惠珍及工作隊秘書王曾元訪談記錄。

61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346頁。

62 同上，第345頁。

疆、面向農村、面向工礦、面向基層文教單位。1969年7月27日，市革會召開大會，進行「四個面向」動員，8月起又向各系統下派指標。具體去向大致如下：

一是回原機關，或者重新分配去其他機關；被分配對象一般是業務人員或者處級以上幹部。二是參加赴雲南、貴州安徽等地的「知青慰問團」。上海市革會先後共派出2000多名幹部，分赴黑龍江、雲南和貴州等上海知青的安置地；後來，這批幹部以後都回了上海。

三是作為帶隊幹部，與知青一起插隊落戶；全市約有1700多名幹部將戶口轉去了黑龍江，還有少數去了吉林、內蒙古。這些幹部們的戶口一旦轉出上海，上海市革會就不想讓他們再回上海，專門派人去黑龍江要求將這批人「就地消化」，但黑龍江方面不同意；這批回不了上海的幹部，後來只得轉去離上海相對近一些的地方：安徽銅陵新橋礦、江蘇大屯煤礦和張家窪煤礦，都是上海的原料基地。直到文革結束後，這批人才陸續返回上海。

四是下工廠，1970年以及1971年，市革會幾次集中動員，要市和區、縣、局(以及局所屬公司和直屬單位)的原機關科層人員2萬多人下工業、交通、基建等基層勞動。當時正是夏季，工廠高溫季節缺勤多，需要勞動力，所以去時說他們是去「戰高溫」的，人事關係、工資關係仍在原機關，只去三個月，過了夏天就分配工作。但實際後來這批人員大都被留下繼續「戰高溫」；1971年12月24日，市革會發文將他們的工資和人事、黨團關係全部轉往所勞動的單位。從此，他們的編制不再是機關幹部，而是企業幹部。

五是去南京梅山鐵礦，當時稱「9424工程」。梅山鐵礦1969年開始興建，作為上海的鋼鐵工業基地，正需要大批工人、技術人員和幹部。當時有4800多名幹部去了梅山，以及江

蘇大屯等上海在江蘇、山東、安徽的原料基地。六是去上海的中、小學當教職員工，共有約3000人。⁶³

至於那些五·七幹校，1970年以後，由於絕大多數幹部已被「四個面向」安置，所以都逐步轉變為在職幹部和知識分子輪換下放勞動的場所。⁶⁴

陳丕顯、曹荻秋專案

對於陳丕顯和曹荻秋，張春橋找盡種種理由，不肯「解放」。尤其像陳丕顯這類的幹部，沒有任何「政歷問題」，在外地大多早就排職務和工作了。但在上海，始終不被解放。1967年6月，市革會成立材料組，後改名為市革會專案辦公室(簡稱「專案辦」)，負責人王少庸。對陳丕顯、曹荻秋的審查，各屬於專案辦下的兩個專案組。張春橋對這兩個專案組的進程非常關心，多次聽取工作匯報。張春橋蓄意要打倒陳、曹，示意專案組將他倆都定為叛徒。張春橋對王少庸說：

按陳、曹問題，現有材料(定)走資派已足夠了，(但)走資派、路線問題，用詞鬆一些，還是內部問題。投敵叛變自首是政治問題，就不同。⁶⁵

一般來說，幹部審查若屬於「路線問題」，只要檢討，有「深刻認識」，仍有出來工作的可能。因為「走資派」這個文革中的政治名份，只是執行了「錯誤路線」，是「人民內部

63 以上數字和資料主要引自《上海人民政府志》，《中共上海黨志》，《上海青年志》，以及未刊稿《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

64 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各單位所建立的「五七幹校」逐步撤銷。

65 王少庸1967年10月23日傳達張春橋講話，轉引自《上海文革史話》(未刊稿)第367頁。

矛盾」，但如果屬「政治歷史問題」就嚴重了。而叛徒，則是文革中幹部的最大罪名，只要被定為叛徒，那一定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張春橋一定要將陳、曹打成叛徒，做成鐵案。王少庸之後在傳達張春橋的這個講話時說：「他一講，我就領會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專案組甚至偽造證據，硬說陳丕顯和曹荻秋曾經叛變過。他們將陳丕顯和曹荻秋整整關押八年，拖着不結案。張春橋非置陳丕顯於死地的狹隘，連造反派內部的許多人都看不下去，上海對這方面的議論很多。陳丕顯一直在部隊，從來沒有被捕過。專案組硬是給陳丕顯定了個「黑小鬼」的罪名。說陳丕顯14歲時，在閩西長汀縣因病隨部隊傷員轉移途中，曾經被地方民團扣留，叛變成為「黑小鬼」。而事實上，民團根本沒有認出陳丕顯是紅軍，陳丕顯在被扣留二十天後，伺機逃了出來。專案組到處外調，搜羅他們想要的材料，但都無法定性。

身患癌症的陳丕顯自1967年2月被隔離審查後，一直關押，陳丕顯多次要求家屬探望不獲準。他兒子陳小津只好幾次寫信給中央和毛澤東，1972年下半年，父子才終於見面，1974年9月9日，陳丕顯在被關押了八年幾近絕望之時，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要求毛澤東「對我早日從寬處理，給我一點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實踐中徹底改造自己，或者先解除對我的隔離」。9月17日，毛澤東批示要政治局討論，還在批示後又加了一句話：「似可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⁶⁶ 毛澤東對陳丕顯的信作出批示，上海方面不得不辦，但又不甘心。尤其是張春橋，更是想方設法抵消陳丕顯出來工作將造成的影響。當年10月，張春橋將在北京參加全國計劃工作會議的黃濤叫去。張春橋告訴黃濤，陳丕顯給毛澤東寫信，毛澤東批示「似可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張春橋說：「似可作」，可以理解為性質嚴重，處理時考慮作為內部問題。於是1974年對陳丕顯的審查結論，對明

66 陳丕顯著《在「一月風暴」的中心》。

明沒有疑點的問題，存心在文字上模稜兩可，以留下尾巴和懸案：「經反復調查，無法查清」，「有的已經否定，有的無法繼續查證」。馬天水文革後交代說，他當時認為有些問題例如所謂對毛澤東「偵控」案，已經弄清楚了，但張春橋仍不肯放過，說：

你說弄清楚了，是否一點疑問也沒有了？我就還有點疑問。就算弄清楚了，且已經和陳丕顯說過，但作為懸案，又不是定案，也沒有關係。就是這個偵控是假案也沒有關係！現在又沒有時間繼續查，作為一個懸案，這樣比較主動。⁶⁷

而且，那些所謂證實陳丕顯是「黑小鬼」的莫須有材料，也仍被塞進向中央組織部報送的陳丕顯材料中。馬天水說：「這樣一來，他被捕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懸案了」。⁶⁸

陳丕顯終於被釋放。為治療鼻咽癌，他住進醫院。11月10日下午，市革會專案辦的人員向住在華東醫院的陳丕顯，宣佈了那個留尾巴的審查報告。1975年9月16日，經毛澤東批准，陳丕顯被增補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但陳丕顯不想再留在這個處處卡他的地方。他給復出的鄧小平寫信，要求調離上海。在鄧小平的安排下，經毛澤東同意，10月，陳丕顯調離上海去中央另行分配工作。臨行前，上海市革會將已經調離另行分配工作的原陳丕顯專案組人員再召集到一起，連續對陳丕顯召開了兩次批判會。

而對曹荻秋，張春橋、王洪文等非要給他定下叛徒的結論。王洪文說：「曹荻秋的問題否定了，我們就都被否定了，張春橋不是要下台了嗎？」⁶⁹ 但是專案組跑遍全國，逼供誘

67 《上海文革史話》(未刊稿)第 382 頁。

68 同上，第 384 頁。

69 同上，第 387 頁。

供，最終還是拿不出任何「鐵證」。1973年3月29日，對曹荻秋
的長期「隔離」終於撤銷；5月，曹荻秋被發配往市直屬機關
五·七幹校。同年9月18日，上海市委將《關於叛徒、修正主
義分子曹荻秋罪行的審查報告》報送中央，中央沒有批覆。因
為中央專案辦公室有人始終認為曹荻秋根本定不上叛徒。但上
海市委卻迫不及待地在上海四屆六次市委會議上以及區、縣、
局負責幹部大會上宣讀了那個報告。曹荻秋一直不服，兩次上
書，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申訴。1975年秋上海又一次
向中央要求對曹荻秋定性，並說上海市委的傾向是定叛徒。⁷⁰
曹荻秋案子就這樣一拖再拖。1976年3月29日，身心交瘁的曹
荻秋去世，沒有等到還他清白的那一天。

1967年至1968年間，大批幹部被打倒。在上海市委和市人
民委員會的領導幹部中，文革前擔任上海市委書記、常委、市
長、副市長的20人，除了張春橋、馬天水、王少庸3人外，全
部都被打成叛徒、特務、反革命兩面派、走資派、假黨員。副
市長金仲華1968年4月3日被逼去世，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
委、市人委各機關九百多名幹部遭到各種批判。市委教衛部長
常溪萍、市委統戰部長陳同生、中國科學院華東分院黨委書記
趙明新等46人非正常死亡；全市局以上幹部1019人中，被立案
審查者853人；處級以上幹部6161人中，被立案審查者5868人，
其中3617人被作為死不悔改走資派。⁷¹直到1969年中共第九次
代表大會以及1971年中共上海第四次黨代會之後，「解放」幹
部的步驟才加快，一些幹部方得到解脫，不過其中不少人的結
論中，還是被留下這樣那樣的「尾巴」。

70 《上海文革史話》(未刊稿)第389頁。

71 《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審查
報告》，轉引自徐建剛《「四人幫」迫害上海幹部群眾的三場運動》，載於
《上海黨史》1990年12期，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辦。

被「三結合」的新幹部們

「新幹部」在文革中是個特指的名詞，即文革中被提拔擔任各級革委會或黨委領導的原底層民眾。而在上海的許多語境中，新幹部更多被認為是造反派或對文革認同者。1967和1968年間大批各級幹部被打倒，形成權力空缺，「奪權」的號召更使造反派們認為，進入各級機構非我莫屬，義不容辭。

新幹部最早進入各級領導機構的，是在1967年至1969年各級革委會建立和充實時期。他們代表一方群眾組織，被「三結合」進新成立的革委會，這些人大多是老造反。在工廠或基層單位中，他們或者是工廠基層的造反派負責人或隊委；或者是工總司的公司或區、縣、局聯絡站負責人，大都是老造反。但那時市革會組室的功能，大多是應對文革政治運動，人員由各群眾組織推派而不是被委派，而且都是臨時性不是長期正式的。到1968年，市革會組室經過幾次調整，逐步恢復對城市的生產和生活的管理功能，陳阿大可以說是工總司第一個被正式調入市革會組室工作的。據陳阿大文革後回憶說，王洪文通知他去任職時告訴他：

叫你去工業組是我和張春橋決定叫你去的，去當二把手，代表工總司去掌權的。這是組織的決定，對你的信任，你一定要去的，不去不對的。你是第一個到市革會組辦去掌權的。你到工業組去，去工作去戰鬥的。那裏都是一些舊機關工作人員，情況很複雜的，對造反派有看法，想排斥工人去領導，你去了要跟他們去鬥爭的，有什麼情況和問題，你可以向我反映嘛。⁷²

與陳阿大差不多時期去市革會工作的，還有蔣周法等人，

72 陳阿大 1977年7月8日交代。

但以後都因個人品質或能力問題，離開了市革會，只有陳阿大一直待到文革結束。

在上海全市局和區一級的革委會中，新幹部佔了很大比例。據統計：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上海湧現出了大批新幹部。目前，參加工交、財貿各局和各區黨組織、革委會和工代會的領導班子，共有新幹部596人，其中工交各局332人，財貿各局89人，各區175人。⁷³

工廠和基層的新幹部比例更高：

在基層單位領導班子中，據工交系統調查，廠革會中的新幹部一般佔百分之八十左右，黨委(總支、支部)中的新幹部一般佔百分之五十左右。⁷⁴

又據上海市輕工業局1972年對所屬基層工廠的統計：

在基層單位中，湧現了新幹部5830人，其中廠級黨組織和革委會以上新幹部三千八百八十餘人，佔幹部總數百分之六十八左右；輸送到局、公司兩級領導機關325人，到市區62人，其中擔任主要負責人12人；局黨委17人中新幹部有6人，佔35%；局革會35名幹部中新幹部19人，佔54%；局各組室核心中新幹部有14人，佔38%；公司黨委正、副書記中新幹部有6人，佔30%。⁷⁵

73 上海市工代會 1972 年 3 月《在黨的一元化建設下，加強幹部隊伍和工代會建設(討論稿)》，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74 同上。

75 中共上海市輕工業局委員會在 1972 年一次市工代會上的發言：《在兩條路線鬥爭中培養教育新幹部》，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而在上海商業儲運公司，1972年——

我公司目前共有各級幹部220名，其中新幹部197名(黨員121名，團員13名)，佔現有幹部總數的81.4%，這些新幹部，除了有57人過去曾擔任過股、組長外，其餘都是來自生產第一線的工人同志。⁷⁶

又據1973年1月對上海最大的三個鋼鐵廠——上海第一、第三、第五鋼鐵廠——統計，三個廠共有職工近五萬人，

這三個廠，在廠、車間兩級黨、政、工三個班子中，就有新幹部1115名，佔幹部總數的81%。這批新幹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湧現出來的(即「老造反」——筆者注)佔34%，在清隊、一打三反和整黨建黨中湧現出來的佔66%。有黨員688名(其中新黨員167名)，佔新幹部數的62%。有女幹部120人，佔11%。從年齡看，多數是中年人，其中31歲至40歲的佔57%。從文化程度看，具有初中或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佔63%。⁷⁷

從1968年清隊以後，尤其是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對新幹部的能力和道德要求提高，老造反們被淘汰許多。但上海對幹部的提拔還是有底線，即必須對文革認同。一大批對文革高度認同的底層工人進入各級領導機關，無疑更加強化了上海文革的政治基調。上海文革初期以穩定的局勢成為全國的樣板；

76 中共上海市商業儲運公司委員會在1972年一次市工代會上的發言：《堅決執行毛主席的幹部路線和政策，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77 上海市工代會組織組1973年1月15日：《上鋼一、三、五廠新幹部隊伍的情況調查》(送審稿)。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以後又以對文革的堅定支持和響應，以及文革前便已奠定的其他城市無可替代的經濟生產強勢地位，成為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派依賴的政治基地。

市革會與軍隊的關係

與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軍人在相當一個時期當家的情況相比，軍隊對上海文革介入是最少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張春橋在中央的地位，使得上海的運動直接受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領導，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上海局勢的相對穩定。在外地最容易引起衝突的工人群眾組織，在上海由於工人造反派對張春橋的完全臣服，沒有大的動蕩，不需要軍隊維持秩序。

1967年1月日，毛澤東要求軍隊介入地方文革，支持左派。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的決定》。駐上海的陸、海、空三軍都派出了支左人員，並各自設立自己的支左辦公室，分管自己軍種派往各單位的支左人員。不過，三軍在市革會沒有設統一的支左辦公室，只設了一個「三軍聯絡組」，負責向三軍傳遞市革會組室的要求。3月，駐滬三軍——主要是上海警備區及東海艦隊、空軍第四軍，先後派出1.9萬名萬官兵進駐全市1800多個單位「三支兩軍」（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⁷⁸ 三軍分別支左上海的各局：警備區主要進駐教衛系統，以及鐵路、建工、郵電、房地、輕工業、手工業等系統的管理局。海軍主要進駐科技系統，以及第一機電、紡織、儀錶、港務、海運等管理局。空軍進駐第二機電管理局，還有上海紅衛兵最不聽話的復旦大學等。1968年公檢法系統實行軍管，也由空軍負責。至於上海十個區和十個郊縣所屬的單位，因為都有警備區派駐的人民武裝部，所以一般都由武裝部負責支左。

78 2001年《中共上海黨志》。

不過，上海地區，支左軍人只派駐到區、縣、局和市屬大廠及大學，行業公司大多不派。至於基層工廠，如果不涉及軍工生產，一般也不進駐。除非鬧得比較亂，會派支左人員去處理，但處理完後就撤出。上海是工業生產基地，工廠非常多，如果每個工廠都要派支左人員，不但派不過來，也會影響軍隊自己的日常工作。有些工廠因為生產軍用物資，例如上海柴油機廠和江南造船廠，生產軍用柴油機和軍用船隻，文革前就有軍代表常駐，負責處理相關車間的生產事宜，文革中支左人員就是文革前的軍代表。上海由於軍人派得較少，軍隊起的作用不大。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徵詢對三支兩軍問題的意見的通知》，提出在已建立黨委的地方和單位撤銷「三支兩軍」的機構和人員，⁷⁹ 根據這一指示，至1975年3月，上海三支兩軍人員大多撤出所駐單位。但在市革會還留有一些支左人員。

比起外地，1967年以後絕大多數原省市負責人都被打倒，大部分的省市都是軍人當政，不是軍人任主要負責人的省市只有四分之一；上海卻是少數不是軍人當政的省市之一。在大多數局裏，軍代表只是作為「三結合」中的軍隊一方，而且大部分只擔任副職，不像外省市那樣是擔任正職的實權派。比起全國各地，外地是軍人當家，上海是張、姚當家；外地是革委會聽命於軍代表，上海是軍代表聽命於市革會，軍隊在上海市革會沒有多大的發言權；外地是軍管，革委會聽命於軍代表，軍人當政；上海是軍隊派出幹部支援地方工作，聽命於各級革委會。上海只有市革會一個指揮系統，不存在市革會之外的另一個由軍隊指揮的中心。而上海市革會又只有張春橋一個權威。張春橋對軍隊本來就有戒心，也不想讓軍隊多介入上海運動。張春橋在上海具有着決定性權威，他的講話在上海是終裁，是最

79 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2006 年第二版。

高最後決定。這是上海與全國所有省市非常不同的特殊之處。

上海警備區所屬區或縣的武裝部，文革初期許多都與造反派關係不融洽。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武裝部的幹部，尤其是負責幹部對文革的態度，文革前按有關規定都是區委、縣委的副書記或常委，與本區本縣的負責幹部熟悉。文革中各區、縣負責幹部大多被打倒，令武裝部幹部首先從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們自然在支左工作中有傾向。一些區或縣發生的事件，許多與武裝部有關。例如青浦武鬥、南匯武鬥。又例如普陀區的「廖、馬、唐事件」、寶山縣的「黃金子事件」、盧灣區的王保全事件，等等。大都是武裝部批准的對造反派處理不當或過嚴案例，引起工人造反派的不滿，再去反審查並翻案。

在市裏，軍隊與造反派的關係也始終不融洽。文革前的上海駐滬三軍，警備區和東海艦隊的領導與上海市委的領導幹部的關係非常親密。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都是新四軍的，本來就熟悉。文革初期，上海市委被造反派追得東躲西藏，陶勇讓陳丕顯等人在東海艦隊開會，以避開造反派；陳丕顯被造反派關禁失去自由時，陶勇對廖政國說想帶一個警衛排去將陳丕顯搶出來。1967年1月31日，陶勇被發現死在一口枯井，事後調查結果是自殺。1967年底，原來設在上海的東海艦隊司令部，奉命遷往浙江沿海。海軍與上海市革會的關係從此更疏遠了。

廖政國與陳丕顯關係也很好。1967年初，上海警備區召開四屆黨代會，廖政國一定要請陳丕顯出席，而且讓他坐在主席台上，因為他認為南京軍區沒有撤陳丕顯的職。陳丕顯還是上海警備區的第一政委。這惹得造反派們非常不高興。上海市革會成立後，軍隊方面的代表最初是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廖政國響應毛澤東軍隊要介入文革支持左派的號召，在「一月革命」時支持上海的文革。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時，廖政國作為

駐滬三軍代表參加上海人民公社；2月5日公社成立大會上，廖政國代表駐滬三軍講話，祝賀公社成立，堅決支持左派。但事實上，廖政國與上海市革會的關係始終不融洽。首先因為廖政國不支持上海警備區內的造反派，不贊成在軍隊內開展文革，壓制警備區軍內的造反派。

警備區的軍內造反派，包括警備區機關的部分幹部和警備區文工團和軍樂隊的戰士，還有兩所警備區所屬醫院的軍人。他們要求在軍內也開展文革。他們貼大字報，開大會，對幹部罰跪、塗黑臉、戴高帽，司令員廖政國和副政委劉文學等也被戴高帽子。尤其廖政國，他戰爭年代數次身負重傷，失去右臂，腰間也必須以鋼絲背心支撐。被鬥得舊傷復發，行走困難。機關造反派所提意見主要是警備區對地方造反派的態度及對文革的態度，也有關於領導作風的。至於文工團和軍樂隊，都是和紅衛兵差不多年齡的小青年，希望能和紅衛兵一樣開展運動。罰跪等侮辱人格之事，基本都是這些小青年幹的。

正當警備區的文革越來越激烈，1967年1月27日，葉劍英傳達毛澤東指示，軍隊的運動要和地方運動錯開，不要同時開展。機關造反派得知後，立即自己宣佈解散機關造反組織，並將貼出的大字報全部撕下，以這樣的行動表示對葉劍英傳達毛澤東講話的響應。1月28日，中央軍委八條下達。警備區召開全體機關幹部大會，廖政國講話，表示：前一階段大家對警備區領導提意見，是對領導的愛護，我虛心接受，決不搞打擊報復。機關同志在葉帥指示下來後就主動撕下大字報，說明大家是聽中央和軍委的話的。警備區的運動就這樣平息。接着，許多人被派到地方支左，其中不少人是當初貼大字報的機關幹部。

但這批軍內造反派不久還是遭到整肅。1967年3月9日，警備區在天馬山辦學習班，宣佈之前警備區一月的批鬥領導幹部是反革命事件，將當初參加造反的機關以及文工團、軍樂隊的軍人們關進山洞多天，宣佈開除軍籍和黨籍。關了40多天後，

又分別轉移至少年教養所、提籃橋監獄以及警備區看守所。4月6日，軍委10條下達，其中有一條是關於對軍隊造過反的人不要追究。所有被關人員於是都被放出，警備區成立由副政委李彬山擔任組長的平反小組。11月，宣佈了對被關押過的軍人平反決定。李彬山對軍內造反派一直很同情，還有副司令員張宜愛，也是同情造反派的。

但到1968年，局勢又翻轉。那是因為南京軍區的意見。這些軍內造反派被作為亂軍派辦學習班，8月，司令部機關、文工團、軍樂隊、醫院等警備區所屬單位的造反派300多人，全部被南京軍區叫去辦學習班，內容是批判「倒許亂軍」。但9月，軍委辦事組將全部學習班對象都叫去北京，局勢重又翻轉。廖政國成為批判對象。上海的軍隊造反派尤其是機關造反派，認為自己根本沒有反過許世友，與南京軍區的運動毫無關係，他們說自己只是在1967年1月貼過大字報，葉劍英講話後就停止了，可警備區老是不放過他們。他們所以對廖政國有意見，廖政國被整整批判了八個月，身體狀況直線下降，170斤的體重掉到130多斤。後來還是周恩來發話說：「不要把螞蟻當大象，有病就應當治療！」廖政國才得到解脫。但學習班後沒有再回上海，而是調到南京軍區任炮兵司令員。

儘管廖政國被整走，但南京軍區仍不支持上海警備區的軍內造反派。上海市革會接納了這批造反派，讓他們在市革會擔任支左工作。張宜愛、李彬山都擔任了上海市革會的常委、市委委員。李彬山負責民兵工作，張宜愛負責郊區各縣的武裝部。徐海濤後來擔任上海市革會文教組負責人，此後又擔任了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的領導。還有一些因各種原因在警備區得不到重用者，也都被警備區派去地方支左。如王日初，康寧一等等。他們是1972年中央通知撤離支左人員後，仍留在市革會者。這些人中，許多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長期升不上去，他們對警備區有怨氣。而到了地方，他們中許多人擔任的

職務都比在部隊時要高。例如王日初，1949年前就參加革命，但因為「成份高」，始終不受重用，只是幹事。到地方支左，擔任了市革會組織組副組長，相當於局級幹部，在部隊就是師級幹部。許多在各局擔任革委會或黨委負責人的支左人員，在部隊都只是團級幹部，只相當於地方的處級幹部。所以他們認同上海市革會，覺得自己的前途只有在地方上才有希望。上海警備區也樂得將這些造反派們派出去：一方面他們與上海地方上的造反派關係好，省去警備區與上海造反派的周旋；另一方面他們人長期在外面，也省得他們在警備區內造反生事。據朱永嘉回憶：

原來警備區機關中那些造反的幹部在警備區站不住了，就出來了，由市革會接納了，參加「支左」。所以，在市革會領導下參加「支左」的警備區的人，都是軍隊的造反派，實際上都是給廖政國趕出來的人。包括在鐵路系統「支左」的警備區的人，也是軍隊造反派。他們跟鐵路系統造反派謝鵬飛、萬金榮這批人的關係很好。還有這麼一層關係。而警備區本身倒脫身了，不管上海的事情了。相反，市革會與警備區雙方的矛盾很尖銳。⁸⁰

1969年軍委將大軍區以下的文工團、體工隊等全部解散，只保留大軍區的歌舞團。警備區文工團和軍樂隊的成員大部退伍，上海籍的戰士被分配進上海工廠。因此以後警備區的風波中不再有他們。

警備區的軍內造反派，由於在處理上幾經反復，而且最後沒有給結論，於是到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時，又起來揭發警備區，說警備區實行了沒有廖政國的廖政國路線。他們要求徹底平反，給書面結論。在李彬山、張宜愛的支持下，他們召開

80 《上海「文革」期間的軍政關係——訪談朱永嘉》，顧訓中整理，轉引自《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

「軍人揭批大會」；會後，起草了幾份大字報，大都是針對許世友和廖政國文革初期的事情：《致南京軍區黨委的一封信》、《許司令、廖政國是怎樣鎮壓上海造反派的》、《許司令、廖政國在上海「四·一二」炮打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等等。而上海市革會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也借題發揮，鼓動他們將這些大字報送南京軍區大字報。在上海向南軍軍區送大字報的同時，1974年8月中旬，軍隊高幹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由王洪文主持。最初，會議氣氛很緊張，與會的軍隊幹部都做了挨整準備。毛澤東聽說後，說：每個同志發言時不要插話，發言後都要鼓掌歡迎。又說：「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數同志或多或少有些問題」。還說：「各地大字報揭露的都是老賬。這些人有錯誤，揭一揭也好」。王洪文傳達了這些話。⁸¹ 毛澤東還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⁸² 軍隊的「批林批孔」隨即轉向。

張春橋是1967年5月被任命為南京軍區政委兼上海警備區政委的。但他對南京軍區和上海警備區都沒有實際控制權。軍隊幹部本來就對文革有看法，加上張春橋從來沒有打過仗，在軍隊毫無威信。以至於一次，張春橋在市革會開會時發牢騷，指着脖子上的紅領章說：他們不承認我張春橋，但不能不承認這個。警備區與上海市革會的關係始終不融洽。即使廖政國被調走，後來調來的司令員也始終不能使市革會滿意。張春橋也多次向徐景賢等打聽周純麟等警備區領導對文革的態度。軍隊始終是他的心病。

在駐滬三軍中，駐滬的空軍是首先態度鮮明支持造反派的。還是在1967年的「一月革命」期間，駐滬陸、海空三軍中，空軍第一個表態支持造反派。1與24日，駐滬空軍首先舉行

81 尹家民著《「四人幫」借「批林批孔」插手軍隊紀實》，載於《黨史博覽》2012年第7期，中共河南黨史研究室主辦。

82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2003年出版《毛澤東傳》第1687頁。

遊行，幾十輛卡車從駐地開向市區，通過南京路等主要馬路，沿途高呼支持造反派的口號。1月25日，駐滬海、陸、空三軍遊行。1月26日，駐滬空軍出動飛機，在上海市區上空散發《給上海全市人民的決心書》等傳單十萬多份，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時，又是空軍，出動兩架飛機撒傳單。廖政國遭批判後，空軍與上海市革會的關係超過了警備區。尤其體現在對政法系統的軍管上。1967年3月1日，上海市政法指揮部成立時，由駐滬三軍共同負責：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東海艦隊副司令高志榮、以及駐滬空四軍的副政委姬應伍。但是，1968年1月25日，根據中央《關於對公安機關實行軍管的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卻只由空四軍一家組成，政委王維國任軍管會主任。這是張春橋費了些心思決定的。按一般規律，軍管公檢法的部隊都是陸軍，但上海卻是空軍。這是張春橋的意思，因為張春橋不信任警備區，不願將這樣重要的部門交由警備區軍管。⁸³ 同年6月，軍管會改為黨委，設常委會，成員均為空四軍軍管人員。此外，市委書記處的警衛工作也是空四軍負責的，就連張春橋、姚文元在興國路招待所的警衛也是空四軍派遣的。而在過去，這個工作一直是警備區負責的。對此金祖敏回憶說：「工總司與空四軍的關係，一開始就比警備區好，相當好。與廖政國談不攏，王維國會拉攏人，上海的支左部隊，空四軍的人很多。」⁸⁴

但是，上海市委與空四軍的關係，到1971年9.13林彪出逃事件前已經產生裂痕。空四軍在專案與審查中，抓了不少人，其中不少人是造反派，也有親造反派的老幹部，工總司對此有看法。⁸⁵ 尤其是1970年8月廬山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王維國

83 朱永嘉曾告訴筆者說，張春橋的妻子文靜曾對他說過，「公安局軍管應該是警備區，但他們不爭氣，所以才找了空四軍」。

84 筆者1989年8月對金祖敏的訪談。

85 同上。

跟着林彪反張春橋，上海的文革派對空四軍有了警惕。林彪出逃後，王維國被抓送北京，其他被抓人員關在警備區大場的營房。原來由空四軍軍管的上海公、檢、法系統也被清查，1971年10月由警備區和市革會派人員接管。市革會的警衛部隊也全部換人，重新由警備區擔任。

小結

「小班子」是科層被壓縮後的扁平機構。革委會建立初期，不問實際需要地合併科室，革委會的機關人員似乎比文革前大大精簡。但各種業務的客觀需要，加上對底層工人和文革積極分子的提拔，各機關小班子人數很快膨脹。小班子、大班子總人數大大超過了文革前的機關科室人數。科層自我膨脹的慣性，即使是毛澤東的文革也無法抑制。

文革試圖建立精簡的扁平化機構；但革命又要求置換科層人員，讓大批認同和支持文革的新人員進入各級科層，如何處理多餘人員成為難題。這也是共產黨執政後，每次機構精簡面臨的難題。由於沒有任期制，對各級領導幹部，無法通過任期輪換。於是只能通過尋找他們的各種問題，降低他們的政治名份，將他們趕下台。而對大量的機關科層人員，也由於就業的封閉性和終身制，無法流動和疏散；尤其向下級機關或基層單位的流動，如果不是去擔任負責幹部，往往被視作「犯錯誤」而降低名份，具有懲罰意味。於是每當科層被壓縮或調整、取消時，只能通過「下基層」之類的號召，以革命的光榮名份遣散這些人員。文革更是同樣如此，通過批判、審查、清理，去五·七幹校和四個面向，終於完成置換的全過程。

不過，這些被置換的幹部和科層人員，儘管戰高溫、下基層，名份降低了，但他們的編制身份沒有被轉換，他們的幹部編制身份仍然被保留。與此相對照的是，工人幹部雖然被提拔，名

份提高了，但編制身份卻仍然是工人，不被轉換為幹部編制。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文革前就有着幹部編制身份的幹部及科層人員的讓步和照顧；也是對文革中被提拔的工人幹部的限制和制約。

文革打倒幹部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黑幫，三反分子；第二階段，資反路線；第三階段：叛徒特務走資派。文革是一場對幹部的大規模批判運動，毛澤東開展文革的本意之一，是批判官僚主義，防止特權階層的產生。但是，底層群眾對幹部作風和官僚體制的批判沒有持續多久，運動很快被文革決策層導入對「資反路線」和「走資派」的批判。所謂「資反路線」，即是幹部們1966年6月至年底對文革的抵制。所謂「走資派」即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文革就這樣從可能的體制批判成為純粹的政治批判。對於批判「走資派」，從幹部的政治歷史中尋找問題，以「歷史問題」抹黑他們，是最簡便直接的辦法，例如陳丕顯的「黑小鬼」問題、曹荻秋的「叛徒」問題，等等，無一不是試圖從幹部的政治歷史中，尋找出打倒他們的理由。而文革的中堅張春橋也曾經被以同樣的理由炮打。「走資派」的概念更是混亂模糊，只以對毛澤東的忠實程度劃線。對幹部的官僚主義、特權以及和脫離群眾作風的批判，也即對幹部權力的監督，反而成為次要。而造反派們一旦掌權，同樣容不得批評。文革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與體制改革失之交臂。

第二十七章

從專題寫作組到市委寫作組 秘書化的知識分子

專題寫作組與大批判寫作組

1967年初的一月奪權期間，張春橋、姚文元回上海，以寫作班為骨幹的機關聯絡站成為張、姚的臨時辦事機構。一個月以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機關聯絡站主要負責市革會調查組的工作，研究政策和起草文件。3月，市革會調整辦公室，原來以機關聯絡站為主的調查組撤消。機關聯絡站的原寫作班人員，許多進入市革會各組室成為工作人員，還有些則閒在機關聯絡站沒事幹。但是張春橋、姚文元沒有忘記他們。市革會成立後，張春橋多次要求已經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徐景賢，「花功夫寫好市革會的文件和決議」。姚文元也要求「還是需要組織一些人專門寫文章」。¹

1967年4月1日，「市革會專題寫作組」成立，辦公地點設在榮昌路60號，文革前是市委政策研究室辦公處。吳瑞武被指定為組長，黨小組長王紹璽；成員王知常、吳瑞武、朱永嘉、陳冀德，這些原寫作班的人是骨幹。還加上原市委黨刊編輯室的蕭木，原財貿系統機關幹部朱惠民、原工業系統的機關幹部吳文虎，原社科院哲學所紀樹立，等等。後來又陸續增加不少人。朱永嘉因為「出身不好」，加上此前不久剛被復旦批

1 徐景賢 1977年12月13日。

判，所以此時只是組員。² 吳瑞武和朱永嘉同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師，文革前也是市委寫作班歷史組成員，生性謹慎，做事小心，不似王知常那樣張揚，也不像朱永嘉那樣有雄心。

專題寫作組實際起着市革會辦文和政策研究機構的作用，為市革會起草文件，起草給中央的各種報告以及各省市革委會成立時發去的賀電，等等。此外，還為市革會收集信息和做些調查研究。徐景賢在1967年初就已經讓人收集上海各方動態，由王知常負責，編寫打印成簡報，共出一百期，每天直報張春橋、姚文元。³ 專題寫作組成立後，收集情況仍然是重要工作內容。報告都是手抄複寫，所以每期數量很少，只有四五份；沒有刊頭，不編期號，只有具體的題目，不寫上報單位，直接送徐景賢，由他轉送張春橋、姚文元。⁴ 徐景賢還派出朱維錚等二人以《文匯報》記者名義，常駐文匯報社北京辦事處，專門搜集各類信息傳給上海，由陳冀德整理後交徐景賢；徐景賢再選報張春橋、姚文元閱。就這樣，徐景賢隨時了解北京乃至全國群眾運動動態，在市革會核心成員中消息最為靈通。很多時候，市革會開會，雖然是王少庸主持會議，但聽徐景賢講北京情況也是會議內容之一。不過，去北京的人後來都在11月被張春橋要求撤回。

這個聽命於徐景賢的寫作組引起王承龍的不滿。他也成立了市革會辦公室文件起草組和調查組。就這樣，名正言順地將寫作組的兩大主要工作內容全部攬走，架空寫作組。沒有了替市革會辦文的日常工作，寫作組的工作只剩下為報社寫批判文章，以及為徐景賢看稿子。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到1967年的夏末。

1967年9月，張春橋又讓秘書何秀文帶話給專題寫作組，說

- 2 有材料說朱永嘉是副組長，應該有錯。朱永嘉此時因為之前挨批判和出身問題，暫時只是組員，是朱永嘉自己對筆者說的。
- 3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808頁。
- 4 筆者親眼見到的，就有寫作組成員朱維錚1967年的一系列關於「中申會」活動的情況，全部都是手抄複寫紙復印。

北京組織了個一百多人的班子，專門寫大批判文章，上海也應將寫作力量集中，組織二百人撰寫重點文章。徐景賢將此話傳達後，大家覺得還是二三十人的班子為好，少而精。8月28日，經市革會討論，通過朱永嘉起草的《關於建立大批判寫作組的打算》，9月4日經與張春橋通電話同意，9月20日，市革會正式成立「大批判寫作組」，屬專題寫作組領導。朱永嘉任組長，成員約二十多人，主要來自原市委寫作班、華東局內刊編輯室，以及上海社會科學院和一些大學。還有中學紅衛兵，例如市六女中的姚真，《紅衛戰報》成為中學紅代會機關報後，她是編輯。大批判寫作組辦公地點在宛平路11號。⁵就這樣，原市委寫作班的成員們又回到了新成立的寫作組。

專題寫作組與大批判寫作組，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具體工作張春橋、姚文元沒有過問，名義上是市革會的下屬機構，實際由徐景賢負責。兩個寫作組的工作內容，最重要的是為市革會起草文件和決議，為上海的報刊以及《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等刊物撰寫大批判文章。

郭仁傑自殺

1967年初，以原市委寫作班為核心的機關聯絡站，面臨着來自各方的壓力。其中一個方面是自己內部事件不斷。首先是郭仁傑的死亡。郭仁傑是機關聯絡站的負責人之一。由於他是當初市委寫作班造反的極力促成者，因此他在機關聯絡站的地位僅次於徐景賢。公社改名市革會後不久，建立文教組，郭仁傑任負責人。另一個負責人是原市委文教辦公室主任，剛被「解放」的老幹部陳琳瑚。

3月15日批鬥紅革會負責人大會召開不久，3月21日，張春橋將徐景賢和郭仁傑找去，討論大學的紅衛兵運動。張春橋要

5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

郭仁傑回復旦大學，主持「復課鬧革命」的工作，張春橋說，復旦最大的紅衛兵組織是紅革會，回復旦的首要任務就是整頓紅革會，清算紅革會頭頭的炮打責任。⁶ 在此之前，張春橋曾經找過朱永嘉，希望朱擔任文教組負責人，主要負責整頓大學紅衛兵。朱推辭了，說自己對付不了這些年輕人。朱永嘉不受請，張春橋再找郭仁傑。郭仁傑很猶豫，不太願意去，因為他和紅革會的關係很好，還曾經是紅革會的顧問。郭仁傑動員吳瑞武當自己的助手一起回復旦，但吳覺得復旦是多事之地，也不受請。郭仁傑遲遲不去復旦報到，直到吳瑞武答應當聯絡員。

郭仁傑回復旦後，反復傳達張春橋指示：「目前，復旦的工作重心是開展反逆流鬥爭，關鍵是重新組織隊伍。」3月24日，他又在文化廣場再次召開對紅革會炮打張春橋事件的「反逆流」大會，到會的所有紅革會紅衛兵集體下跪「向毛主席請罪」。

但是，剛過一星期，風向變了。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4月6日，中央軍委發佈《軍委十條》，其中提到：「不准任意把群眾組織宣佈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准把革命組織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對於犯有某些錯誤的群眾組織，要積極進行幫助教育」，「一概不要進行群眾性的『請罪』運動。也不要強迫群眾寫檢討。」局勢似乎變得有利於正在挨整的紅革會。勞元一等人於4月中旬被宣佈「解放」；4月14日，紅革會「大批判、大聯合聯絡站」成立，郭仁傑任顧問。

不過，紅革會沒有忘記前些日子的批判和高壓。復旦大學、上海師範學院等學校出現大標語：「紅革會的大旗是廣大紅革會戰士用鮮血染紅的！」「紅革會是左派組織，其歷史功勳不許任何人抹煞！」「歷史不容顛倒，老保不許翻案，不許往革命小將臉上抹黑！」4月25日，紅革會在復旦舉行「紀念

6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8.25大串聯」集會。⁷這是對着同濟東方紅和交大反倒底的，因為此時上海正在籌備成立中學和大學的紅代會，上海的大學紅代會有可能主要由這兩個組織負責籌備；紅革會此舉同時也是對郭仁傑「反逆流」的不滿。

不但紅衛兵對郭仁傑不滿，張春橋也對郭仁傑不滿。因為郭仁傑在「反逆流」時，曾將毛澤東說紅革會炮打就是反革命的話傳了出去，還說這是張春橋告訴他的。郭仁傑這樣做，顯然是為了表明自己言出有據。但張春橋不承認自己曾對郭仁傑說過這番話。據安文江回憶：

紅衛兵當面問張春橋，張春橋說「毛主席沒有過這樣的指示，我沒聽說有過這樣的指示，也就不可能有這種傳達」。然而，郭仁傑的筆記本上確實記着：「春橋同志傳達：毛主席說……」⁸

張春橋當時透露這些話給郭仁傑，顯然是向郭顯示，整紅革會不是自己量小，而是毛主席的意思。但是，毛澤東的這些話，可能只是一時興之所至的隨口之言，所以張從未正式傳達過，只個別告訴了徐景賢和郭仁傑。真要讓張春橋對質毛澤東是否講過，必須毛澤東本人出面證明，這不太可能。張春橋只能矢口否認。當時徐景賢的工作筆記上也記下了同樣的內容。但徐景賢沒有出來為郭仁傑證明。

紅革會不願相信毛澤東會說這樣的話，張春橋不承認，紅革會更對郭仁傑盯住不放。郭仁傑陷自己於極大被動，既得罪紅革會，又得罪張春橋，還背上「偽造毛主席指示」罪名。而且，張春橋要求郭仁傑「反逆流」整紅革會，但郭仁傑批判紅革會沒多久，就又轉而扶持紅革會，畢竟他與紅革會關係一

7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

8 安文江 1988 年《我不懺悔》。

向較好。後來在大聯合時，郭仁傑說紅革會是老造反，在上海大多數高校都是最大的紅衛兵組織，要各校以紅革會為基礎建立紅衛兵師：復旦紅衛兵師的負責人由紅革會負責人趙基會擔任，上海師範學院紅衛兵負責人是紅革會的繆財生，華師大是紅革會的劉浩德。郭仁傑還要求其他大學也這樣做，引起張春橋不滿，也引起紅三司和炮司及其他組織不滿。紅三司的譚啟泰等人都是游雪濤小組成員，他們寫情報反映說郭仁傑四出活動，與紅革會關係密切。

還有與郭仁傑始終是對頭的王承龍，他所掌握的市革會辦公室聯絡組，出內部「簡訊」說郭仁傑企圖重振紅革會，而且還準備重振市一級的紅革會。徐景賢看到了這份「簡訊」，很為郭仁傑擔憂，因為「簡訊」稿子是由張春橋妻子文靜審定的。果然，張春橋看到這期「簡訊」後說：「這簡直不可容忍。機關內部竟有這麼一個人！」⁹

形勢已經對郭仁傑十分不利，郭卻在6、7月間，又與支聯站來往密切。市革會的組室負責人中，唯一公開表態支持聯司的只有郭仁傑。他對支聯站的人說自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徐景賢有一天問他「虎」指誰，他直截了當地說是張春橋。徐景賢後來回憶說，他當時「倒抽了一口冷氣，覺得他已經和我們分道揚鑣了」。徐景賢再三勸他不要捲入矛盾，說「作為機關聯絡站負責人只能促進雙方聯合，不能單方面支持任何一派」。但郭仁傑沒聽進去。¹⁰

8月5日，聯司被砸第二天，全上海四處砸支聯站。晚上，復旦紅三司的紅衛兵以郭仁傑是「復旦最大支聯分子」為名，突襲他在復旦教師宿舍的住宅；然後說發現了他的「流氓證據」，即婚外性行為。將他關進物理二系原子實驗大樓嚴厲拷

9 安文江 1988 年《我不懺悔》。

10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打；兩天後，又將他轉到閘北區公安局關押。¹¹ 8月10日，在復旦禮堂東側大草坪召開批鬥郭仁傑大會，前一階段因參與炮打被批判的安文江，擔任大會主席。復旦大學貼出《還郭仁傑廬山真面目》大字報，機關聯絡站也貼出《十問郭仁傑》，追查郭仁傑「偽造毛主席指示」，「勾結聯司壞頭頭」。¹² 市革會立案追查「紅革會—聯司—郭仁傑」。郭仁傑被揪到各造反組織批鬥。9月底，郭被釋放，但仍由機關聯絡站批鬥。過去與他一起的寫作班成員，除了王知常為他辯護，其他人都保持沉默。12月間，張春橋又在一份材料上批：「郭仁傑問題搞不清，對不起上海一千萬人民。」¹³ 市革會辦公室的負責人王承龍非置他於死地，將郭仁傑的案子列為市革會辦公室「102專案」。郭仁傑被秘密審查，在審查中被嚴刑拷打。徐景賢多次為他向張春橋說情未果。¹⁴ 1968年1月，郭仁傑生病，逃出被關押處，找到和他過去同為市委寫作班哲學組成員的程綺華。程綺華幫他化名住進醫院。王承龍得知，讓紅三司紅衛兵去抓郭，以「流氓罪」拷打他。¹⁵ 1月5日將郭送至盧灣區公安局。第二天，郭仁傑跳樓自殺。

郭仁傑的整個文革生涯都和紅革會緊緊聯在一起。他與紅革會一起造反，最後又因試圖重振紅革會得罪張春橋。王承龍挾私報復；還有紅三司，因與紅革會不合，將氣出在郭仁傑身上，對郭仁傑嚴刑逼供，下手非常狠辣。這些都是促使郭仁傑死亡的因素。

11 安文江 1988年《我不懺悔》。

12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285頁。

13 同上。

14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15 這是筆者聽朱永嘉說的。

王承龍與「11.10事件」

郭仁傑死後不久，機關聯絡站另一個負責人程綺華也遭整，整她的人又是王承龍。

機關聯絡站的核心是原市委寫作班。負責人除了王承龍不是寫作組成員，另外三人：徐景賢、郭仁傑、程綺華，都是市委寫作班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後，徐景賢和王承龍作為機關聯絡站代表進了市革會，徐景賢是市革會副主任，王承龍是市革會辦公室負責人。後來郭仁傑也被張春橋點名去市革會文教組，擔任負責人之一。只剩程綺華，負責機關聯絡站日常事務。

王承龍與徐景賢，雖然都是市革會主要領導成員，但傳閱文件，徐景賢名字排在王承龍之前，實際地位更在王承龍之上。這是王承龍的心病。¹⁶ 他私下對人說「出道是我早，運道是他好」；「我現在上有老，下有小，要扶老攜幼」。¹⁷ 「老」指老幹部王少庸，市革會七個負責人之一；「小」指徐景賢，年齡比王承龍小兩歲，造反比王承龍晚三個月。王承龍說「我造反時，他還不知在哪裏」。王承龍沒有看到，徐景賢與張春橋姚文元多年近距離的工作接觸，使得張、姚對徐比較了解，這是他王承龍沒有的優勢。王承龍也沒有明白，他作為機關聯絡站負責人之一，能成為市革會負責人實在是沾了寫作班的光。張、姚把寫作班看作自己的工作班子，所以機關聯絡站能在市革會七人領導班子中佔二人。王承龍不滿意自己的地位，他對徐景賢位置在自己之上始終耿耿於懷；而且還把另兩個機關聯絡站負責人郭仁傑和程綺華，都看作是徐景賢的人，必欲除之。

徐景賢文革前是市委寫作班的黨支部書記，精明能幹，表達能力強，筆頭又快，為人和善，在寫作班中有威信。他代

16 這是筆者聽朱永嘉說的。

17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811 頁。

表機關聯絡站當上市革會負責人，因自身能力得到許多機關幹部的認可。王承龍則不同。他文革前雖在《支部生活》編輯部，但連編輯都不是，只是處理群眾來訪。他筆頭很差，知識面窄，說話沒有水平。機關聯絡站很多幹部對他意見很大，認為他能力不大脾氣大，道理不多訓斥多，專橫粗暴跋扈；而且一朝掌權，也是小汽車進出，與走資派沒有兩樣。機關聯絡站的凌岩，召開市委機關聯絡站勤務組會議，曾寫過一份對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進行監督的條例。凌岩是《支部生活》編輯部的，和王承龍是同事。他的條例要求領導幹部應該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不能特殊化，不能有特權；要接受群眾組織的監督；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每個月要聽取一次市委機關聯絡站各部門的意見。這是份徵求意見稿，不過看得出很多地方是針對王承龍的。王承龍暴跳如雷，到王少庸那裏去告狀：「群眾組織居然爬到市革命委員會頭上來了。」¹⁸

王承龍與程綺華的矛盾，爆發在1967年的11.10事件。此時，市革會雖已建立，但原來的機關科層人員被看作留用人員，雖然有部分原機關工作人員參加了市革會各部門工作，但更多無事可幹。這些人不願被精簡，希望王承龍為他們說話。此時，負責機關聯絡站日常事務的程綺華，正在工廠參加短期勞動，機關聯絡站工作由凌岩主持。大家讓凌岩打電話約王承龍11月10日來黨校聽意見。王承龍答應來參加會議。10日這天，一百多人如約等候在淮海路黨校的機關聯絡站，但王承龍卻沒露面。凌岩再打電話去，方知他在上海展覽館參加市革會的一個會議。眾人很生氣，說王承龍不來參加會議也不打個招呼。他不來，那我們去。凌岩和參加會議的程綺華也跟着去了。眾人指責王承龍，與在場的王少庸和工總司的王秀珍發生爭執，王少庸拒絕聽意見，王秀珍則指責眾人，最後不歡而

18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散。¹⁹ 由於向王承龍提意見的那些人後來沒有什麼行動，事件也就暫時中止。但是王承龍對程綺華的不滿更加深了。

炮轟南京路事件

11.10事件沒幾天，11月14日，黃浦區百貨公司革委會有人以「革命群眾」的名義，貼出一張「炮轟南京路」的大字報。

南京路是上海乃至全國最著名最密集的商业街。「炮轟南京路」，事情要從黃浦區商業部門的鬥、批、改說起。「鬥、批、改」是毛澤東文革初期提出的文革三項任務，在《十六條》中的表述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後毛又多次提及。1967年8月，上海市革會討論鬥、批、改，要求各行業貫徹和開展。1967年11月13日，黃浦區百貨公司革委會討論如何貫徹執行鬥、批、改，有人提出「炮轟南京路」，實現南京路的鬥、批、改。於是，以《炮轟南京路》為題，具名「區百貨公司革委會革命群眾」的大字報就這樣產生，並馬上貼在最熱鬧的南京路紅衛商店（即原來的麗華公司）的大櫥窗上。11月16日，這些人又在紅衛商店門口裝上擴音機，設立「徵詢站」，貼出徵詢意見大字報。一時行人圍觀，交通為之阻塞。11月7日，一些人在南京路第一百貨商店等處貼出響應大字報：《熱烈歡呼「炮轟南京路」的革命大字報》、《評「炮轟南京路」大字報》、《建議撤銷四大商店——給中百一店、食品一店、服裝商店、東方紅百貨商店革委會、革命職工、造反派的一封公開信》，有的大字報署名「炮轟南京路戰鬥組」，號召「砸爛舊商店，徹底鬧革命」。還有的大字報主張取消一切櫥窗佈置，在櫥窗內都放上毛主席

19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822 頁。

畫像和語錄，將南京路「佈置成紅彤彤的世界」。有人在南京路上散發傳單，有人組織「炮轟南京路」大遊行，還有人打算去封第一百貨商店等大店名店。《解放日報》、《支部生活》、《市財貿戰報》、《紅旗》雜誌和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等單位都先後派人到現場採訪。²⁰ 但是，炮轟南京路行動沒持續多久。張春橋知道後，從北京打來電話要求制止。這場風波方平息。

炮轟南京路事件在張春橋的干預下結束。但是它所引發的連鎖反應沒有結束。機關聯絡站負責人程綺華首先挨整。她的丈夫張六吉，當時是黃浦區革委會副主任，分管財貿。11月19日，《文匯報》以群眾來信方式，對炮轟南京路提出質疑；11月20日和25日，《文匯報》又刊登文章，提出「炮轟」事件是「別有用心的人乘機搗亂，到處煽風點火，妄圖製造混亂」。²¹ 接着馬上追查事情來由，追查到黃浦區革委會，張六吉受審查。負責專案的王少庸和王承龍將對張六吉的審查定名為「11.10項目組」。「11.10」，就是凌岩帶人衝擊會場的那天的日期。²² 王承龍對那天眾人質問自己的情景始終懷恨在心。

張六吉文革前就是黃浦區副區長。1966年文革初期，是王洪文工作的國棉十七廠工作隊的副隊長。「炮轟」事件只是張六吉被審查的起因，而後就轉入對他的歷史審查。這是一貫做法，立案內容和審查內容完全不一樣。張六吉的家被抄，人被隔離審查。身為張六吉妻子的程綺華，也馬上受到牽連。抄家者在程綺華家，抄出一張程綺華與他人的合影照片，硬說照片上坐在中間者是國民政府時期的工福會負責人陸京士。照片馬上送到張春橋處，張春橋將徐景賢叫去，談程綺華的「問題」，給他看這張照片，徐景賢不敢為程綺華辯護。12月

20 以上資料全部引自《黃浦區志》。

21 《請看，誰在煽動「炮轟南京路」！》，載於1967年11月25日文匯報。

22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19日，上海市革會對程綺華夫婦同時採取措施：張六吉隔離審查，程綺華被機關聯絡站批判鬥爭。當天，機關聯絡站開大會批鬥程綺華，說她是壞頭頭，是機關保守勢力代表，要她交代與陸京士的關係。結果卻發現照片上寫着名字，那人雖也姓陸卻根本不是陸京士。批鬥會開不下去，但機關聯絡站還是受到衝擊。機關外事口的造反派，以及交大反到底的紅衛兵，宣佈罷免程綺華等人的職務，並改組機關聯絡站的「勤務組」。會後，對程綺華的批鬥繼續。程綺華被關在機關辦公室，不讓回家，實際也是隔離審查。²³

1967年12月，張六吉被押到中華造船廠的防空洞，被那裏的造反派和交大反到底的打手審訊，打得他遍體鱗傷，大小便失禁。據說連王洪文都看不下去，但那時他的地位沒有王承龍和王少庸高，也管不了市革會專案組。張六吉給張春橋寫信，但張春橋根本不回應。²⁴ 他最後死在漕河涇附近的一條小河裏，王少庸和王承龍的專案組說他畏罪自殺。但他口袋裏的筆記本還是乾的。

程綺華被整得家破人亡，自己也一夜間從造反隊負責人變成革命對象。王承龍又乘勝改組機關聯絡站領導層，將負責人全部換了一批，原來寫作班的人一個都不留。

程綺華挨整，還涉及張春橋妻子文靜。文靜當時是市革會材料組負責人之一。市革會材料組最初由市委黨校的劉傲章負責，是後來市革會專案組的前身。文靜去後取而代之。材料組是審查共產黨內高級幹部的政治歷史情況的，很大一部分內容是「審查叛徒」。一次一個原市委組織部的幹部去市革會辦公室，見文靜主持材料組工作，便對程綺華說：文靜自己的歷史有證據確鑿的變節行為，怎麼能主持材料工作？程綺華將此事向徐景賢匯報，徐景賢即向張春橋匯報。之後，雖然文靜很快

23 陳冀德 2008 年《生逢其時》。

24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被從市革會材料組撤下，但程綺華明顯感到，張春橋對她的態度變了，甚至在大庭廣眾之下，含沙射影地說她是紅皮白心的壞頭頭。²⁵

文靜離開市革會材料組，王承龍馬上邀文靜去他那裏工作，負責市革會辦公室下面的聯絡組工作，分管內部「簡報」和「簡訊」；而且讓她參加市革會領導成員的會議，還為她配備轎車。此事後來被張春橋發覺阻止。²⁶ 王承龍如此取悅文靜，顯然是想為自己增加砝碼。他對徐景賢不服氣，但無奈徐景賢和張春橋的關係比他近而且早得多，他和張春橋的關係只是在市革會成立後才建立。所以他想方設法讓文靜和自己共事，希望靠着與張春橋妻子的接近，可以壓過徐景賢。

1968年6、7月間，王承龍又把目標對着專題寫作組的吳瑞武。他讓人出面貼專題寫作組的大字報，說朱永嘉等人在對待郭仁傑和程綺華的問題上態度曖昧。他還讓人審查專題寫作組負責人吳瑞武，說吳有歷史問題，因為吳瑞武1949年前，曾在學校被集體參加過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對此，徐景賢心裏十分清楚，所有這一切最終都是衝着自己來的。由程綺華為負責人的機關聯絡站和以吳瑞武為組長的專題寫作組，是徐景賢的左右臂。郭仁傑與程綺華被整倒，徐景賢少了一個胳膊。專題寫作組若再挨整，另一胳膊也將失去。²⁷ 徐景賢不願意自己手下挨整，但他也不願與王承龍正面衝突。1968年7月，上海向各大專院校和中學派工宣隊。徐景賢以退為進，8月，以去工宣隊鍛煉的名義，將專題寫作組分散去各工宣隊：

67年底和68年初，我和王承龍的內部矛盾激化。他搞了一次機關聯絡站內部「心臟爆炸」（即11.10事件—筆者注），

25 陳冀德 2008 年《生逢其時》。

26 這是朱永嘉告訴筆者的。

27 朱永嘉語。

接着，借所謂「炮轟南京路事件」，郭仁傑事件多次將我的軍，並借口吳瑞武的歷史問題等，準備向專題寫作組開刀，我就避開他的鋒芒，採取化整為零的辦法，把專題寫作組所有成員分散到各大學去參加工宣隊，以在工宣隊中受鍛煉為名，把這支隊伍保護了下來。²⁸

朱永嘉去了駐華東師範大學工宣隊，王知常去了駐上海交通大學大工宣隊，蕭木等去了駐復旦大學工宣隊，陳冀德等去了駐華東紡織工學院工宣隊，吳瑞武去了駐上海外語學院工宣隊。大批判寫作組也解散，人員回原單位。徐景賢後來對人說，他將大家分去工宣隊，只是個權宜之計，避一避王承龍的鋒芒。²⁹

不想王承龍卻把事情做到底，從建制上徹底抹去專題寫作組。王承龍利用自己作為市革會辦公室負責人，掌握發文件權力之便，在寫作組人員去工宣隊的第二天，就立即以市革會名義發文，正式宣佈撤銷專題寫作組和大批判寫作組。王承龍的算盤是，既然由市革會發文取消，以後徐景賢若想再建寫作組，就必須經由市革會討論，那時他王承龍就能以自己市革會負責人的身份進行干預。王承龍特地當着朱永嘉、陳冀德等人的面，將寫作組的圖章一劈兩半，銷毀。那個紅色保密電話，陳冀德剛離去，王承龍馬上派自己信得過的人去掌管。

《紅旗》上海組稿小組

但是，兩個寫作組撤銷僅一個月，1968年9月下旬，姚文元指示徐景賢，在上海專門為他成立一個寫作小組。事情源於

28 徐景賢 1977 年 12 月 13 日，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812 頁。

29 朱永嘉和王知常文革後都曾經對筆者提及：徐景賢當時曾對他們這樣說過。

姚文元掌管《紅旗》雜誌。1967年8月和1968年1月，負責《紅旗》的三個副總編王力、關鋒、戚本禹，相繼被撤職並關押，連累整個1968年上半年《紅旗》雜誌未出刊；直到1968年7月方恢復出刊。復刊後名義上由陳伯達和姚文元共同負責，實際由姚文元主管。但是此時，三個副總編都被關押，姚文元手下沒有了寫稿和組稿人員。生性不喜交際的姚文元，只有在工作過的上海還有些人脈資源。他想將朱永嘉、王知常、蕭木調去北京，毛澤東圈了。³⁰ 可這三人寫作能力都較強，調去北京，便削弱了上海的力量，徐景賢捨不得放。姚文元同意讓三人仍留在上海，成立「紅旗雜誌組稿小組」，為《紅旗》寫文章和組織稿件，仍由徐景賢負責。³¹ 徐景賢立即將朱永嘉、王知常和蕭木從工宣隊召回，成立寫作小組，由朱永嘉具體負責。小組最初被稱為「朱永嘉小組」，以「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名義，為《紅旗》雜誌寫文章以及組織稿源。這樣為《紅旗》組稿的專門小組，是全國的唯一。組稿小組的組織關係掛在市革會辦公室聯絡組黨支部之下，在聯絡組有一間辦公室，但其實不受市革會辦公室管轄，核心仍是原來寫作組的成員。小組最初由徐景賢直接領導，稿件由徐景賢修改審閱。1969年以後，逐漸由朱永嘉直接向張春橋、姚文元寫信送稿。1970年姚文元以中央名義發下文件，正式任命朱永嘉、王知常和蕭木三人為《紅旗》雜誌上海組稿小組成員。

《紅旗》組稿小組最初是保密的，一般人不知道。為了避開王承龍以及其他人的注意，組稿小組下的寫作組被分散在各處，這是徐景賢建議的。王知常後來回憶說：

30 據吳錫濤 1976 年 11 月 23 日說，原來名單中還有徐景賢，後來勾掉了。吳錫濤的這個說法轉引自石平的《姚文元和紅旗雜誌》。載於網上刊物《記憶》總第 77 期。

31 以上關於《紅旗》雜誌組稿小組成立的資料是朱永嘉的回憶，轉引自《南風窗》2010 年第 8 期章劍鋒著《文革上海寫作組的那些人和事兒》。

徐下令各有關單位提供各種方便。徐還規定寫作組的人對外進行組稿、調查、開座談會等活動時，要以報社記者身份，或以市革會辦公室工作人員身份或以工宣隊員身份，不准亮出寫作組的牌子。³²

《紅旗》組稿小組存在三年，發展迅速，初具規模。不但抓寫作，對新聞出版文藝教育各界也有着影響，左右了上海的思想界。而且靠着和張春橋、姚文元的密切關係，尤其通過張春橋、姚文元佈置寫稿的題目和調查內容，得中央決策層風氣之先。1971年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正式成立。之後，給《紅旗》雜誌寫文章的任務，實際都由市委寫作組完成。不過，《紅旗》組稿小組名義上沒有被撤銷，一直存在到文革結束。

「小鋼炮」陳冀德

《紅旗》組稿小組時期，除朱永嘉、王知常、蕭木，另一個重要成員是陳冀德。

陳冀德³³生於1936年，1949年12月加入青年團。1954年高中畢業，在報考高校體檢時，被查出患肺結核，不能考大學。她於是邊治病邊工作，當了小學教師。兩年後的1956年，考入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當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的「反右」，她是班級裏反右領導小組成員，但她覺得班級裏那些所謂的右派言論，都是為響應黨的號召「大鳴大放」說的，「拿着人家鳴放時說的話作為反黨的證據，有點說不過去」。更何況她覺得這些話只是具體針對某件事、某個黨員。於是，別的班級都至少有一個右派，而她所在班級卻是整個師範學院唯一

32 同上，轉引自章劍鋒著《文革上海寫作組的那些人和事兒》。

33 陳冀德，女，1936年出身，受教育程度大學，中共黨員。文革中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重要成員，《朝霞》主要負責人。

的沒有揪出一個右派的。不久，她因此被作為右傾，由年級黨支部重點「幫助」，不過還好，沒有給她任何處分。她為此自責：「一個共產黨員在階級鬥爭中打了敗仗。」

1960年，還是學生的陳冀德，被挑選作為特邀代表，參加全國第三次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大會快結束時，毛澤東接見全體與會者。多年後陳冀德的回憶中，還記得當年的激動：「我……站在隊伍的中間，臉上因激動而淚流滿面，嘴裏不斷地歡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從北京回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會贈送的《毛澤東選集》四卷本的扉頁上寫下我的終身誓言：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永遠跟着共產黨走。陳冀德遵從自己的誓言，積極投入六十年代初期對文藝領域的批判。她與另一位女青年戴厚英，當時同被稱為「文藝思想戰線上的小鋼炮」。

1961年，中宣部和文化部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會後，對文藝方針政策進行調整。上海作家協會文學研究所由葉以群佈置，對當年在報刊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作一次全面清查，看有沒有將學術問題上升到政治問題的過頭做法。參加作協文藝思想批判會議的陳冀德，被分配檢查姚文元的文章。陳冀德將收集到的八十多篇文章認認真真讀了一遍，只覺得姚文元的文章一旦立論，不把對方駁倒不罷休。她認為這是姚文元的文風，不是問題。作協反左的文藝思想批判會結束後，大學畢業的陳冀德，正式被分配進文學研究所。很巧，她進文學研究所後，作協黨組給她安排的文藝理論指導老師，就是姚文元。不過，姚文元只輔導她寫了一篇小雜文，以後再不照面，連見面都不打招呼。

1964年，華東局內刊組織「批判文藝領域內的修正主義思潮」，上海作協領導孔羅荪被召去丁香花園，撰寫批判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文藝思想的文章。孔帶去文學研究所的陳冀德以及另外一人作助手。4月，孔羅荪文章寫畢，陳冀德任務結束，領

導安排她去參加第一期四清工作隊。而此時，正值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籌備成立，寫作班的文藝組正從各大學調人。陳冀德去的是個化工廠，空氣污染嚴重，她因此患上急性肺炎，不得不退出工作組回文學所。擔任寫作班黨支部書記的徐景賢知道後，將她要回寫作班，讓她管理資料和文件，負責文書和秘書工作。「從此，我幾乎再也沒有離開過寫作班。不管它叫專題寫作組，還是《紅旗》組稿小組，或是現在的市委寫作組。」³⁴

雖然被稱為「小鋼炮」，陳冀德卻只願在紙上作不謀面的批判，對於面對面的批判，她始終硬不下心腸。她後來回憶說：「我討厭人鬥人」。文革初期，批判文學研究所領導葉以群，指名要陳冀德發言。陳冀德後來回憶，她心中很矛盾：「思來想去，說什麼呢？我去揭發批判他不同意發表我的文章，還叫我去看『別、車、杜』的書？這不是拿着好心當驢肝肺嗎？……只有佈置我們去檢查『左』的錯誤這一點還可以一說。但這能全怪他嗎，是市委佈置下來的任務呀。」³⁵ 說葉以群不同意發陳冀德的文章，是指陳冀德的文藝評論文章。葉以群當時還勸她多讀些文藝理論方面的書，例如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著作，都是十九世紀俄羅斯的著名文藝理論家。說批判文藝界左的錯誤，即是指1961年作協的那次四十九天反左會議，以及對報刊文章的全面檢查包括對姚文元文章的檢查。文革中姚文元成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這次檢查便成為「整姚文元」事件。陳冀德在批判葉以群的會上講了這件事。沒過多久，傳來葉以群自殺消息。陳冀德非常自責：

我想到了我那次該死的發言。我認為上不了網上不了線的事情，自然有人會認為必須拎到網、線的高度上來大肆發揮一番的。……

34 陳冀德 2008 年《生逢其時》。

35 同上。

從此以後，直到四人幫被粉碎我不願參加任何批判會。³⁶

1966年底，寫作班造反，陳冀德跟着寫作班造反，也成為機關聯絡站的一員。不過此時，陳冀德的造反是被動的；甚至那天晚上的會上，寫作班全體成員討論要不要造反，陳冀德的態度明顯不積極。陳冀德對張春橋安亭事件簽字，最初也頗為反感：「我覺得他完全違背了黨的組織原則。頂不住了，投降了。」³⁷ 寫作班集體造反後，人員都去淮海路上的市委黨校，那裏是機關聯絡站的對外辦公處。陳冀德以及徐景賢的秘書王剛則仍然留在武康路2號，整理收到的傳單小報，送張春橋、姚文元和徐景賢。此外，陳冀德還為徐景賢保管文件，負責徐景賢與機關聯絡站負責人程綺華的聯繫。在武康路2號留守一段時間後，徐景賢又讓陳冀德去淮海路黨校機關聯絡站處理群眾來信。市革會專題寫作組成立後，搬往榮昌路60號，陳冀德專門負責接收去北京的朱維錚他們寄來的信件，她後來說自己那時是寫作組的管家婆。她的工作內容沒有變，還是守着那台紅色電話，記錄北京打來的電話，拆收朱維錚他們從北京寄來的各類傳單小報，以及各種手寫動態。此時的陳冀德，雖然似乎只是普通收發內勤，但她的作用已初步顯現，如徐景賢所說，她「實際上早已成為寫作組的總管家，是一個不是核心的核心，連朱永嘉都要讓她三分」。³⁸

1967年夏天，姚文元來上海撰寫批判陶鑄的《評陶鑄的兩本書》，要陳冀德為他的文章做資料校對。陳冀德去上海圖書館查找資料，為姚文元校出不少錯誤，受到姚文元表揚。

陳冀德在政治方面完全接受階級鬥爭的理論，作黨的小鋼炮。但她的經歷和她所受過的人文教育，卻又在她內心孕育

36 陳冀德 2008 年《生逢其時》。

37 同上。

38 徐景賢 1977 年 12 月 25 日。

了正直和同情，敢於表達自己的看法。她大學一畢業就進入寫作班，寫作班寬容融洽的人際關係，使她保留了自己的這些特點。在一片假話的年代，她顯得有個性，也敢於發表自己的看法。這是張春橋以後看重她的原因。

工人作家蕭木

寫作組核心成員大都受過大學教育，只有蕭木本人成份是工人。但恰恰蕭木最像知識分子。比起朱永嘉的不修邊幅和王知常的口無遮攔；個頭不高，紹興口音的蕭木，始終衣冠整潔，講話斯文，一介白臉書生形象。

蕭木生於1933年，少年時就喜歡寫作，文章曾經刊登在《開明少年》上。1949年共產黨執政，正值他初中畢業。他嚮往穿軍裝，想報考華東軍政大學，但遭家長反對，於是他轉而報考嘉興農業大學，因為免學費。剛進學校不到一個月，又遇鐵路招聘，他又去應聘。上萬人中取二十多人，他考上了。進鐵路後，先在金華和上饒當了一年多機務段工人；不久便被抽調去做宣傳工作，背着背包跑遍華東各省。在鐵路，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其間，他不改寫作愛好，發表許多文章。1954年，他被調到《上海鐵道報》當編輯，整日與文字打交道。愛好終於與職業高度吻合，他更是抓緊業餘時間寫作。在寫作方面，蕭木很感謝茹志娟。這位當時已經成名的女作家看了蕭木的小說後，特地找到他本人，鼓勵他寫作。他的努力也有了收穫，他以鐵路為題材，寫出多篇小說，出版了小說集《寬廣的世界》，受到文學界注意，成為上海知名工人作家之一。著名文學家茅盾，曾特地在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權威報紙《文藝報》上撰文，稱讚蕭木的作品，認為他是個有前途的青年作家。

1960年，蕭木被調到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黨刊編輯室當編

輯。當時黨刊《黨的工作》和《支部生活》，雖然只面向黨員幹部，但地位卻在發行量比它高得多的《解放日報》之上，原因就是因為這些刊物都是「內部發行」。知情權的多少是衡量政治身份的標尺之一，知情權越大，話語權越多，政治身份越高。進入這樣的工作單位，意味着被信任。但不久，蕭木就感到某些不適應。他喜歡文學創作，尤其被茹志娟和茅盾鼓勵之後，他希望自己能更上一層樓。但是每天工作十分緊張，早上8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天天如此，基本沒有屬於他自己的業餘時間。「這是我最大的苦悶」。他太喜歡寫作，文藝創作幾乎就是他生命的另一半。他只能利用每天午飯後的一點休息時間，別人午睡或下棋，他寫作。平時上下班的乘車時間也被利用，在擁擠搖晃的公共汽車上，記下自己的點滴思絮和靈感。

黨刊的成員，一半是1949年前參加革命的幹部，一半是從基層抽調上來的青年，革命性都很強。蕭木喜歡寫作，與那個革命化年代的環境總有點不太協調。反右和文革初期，他都被批評：你的筆是黨給的，要為黨寫作，不要為成名成家的個人主義思想左右。蕭木講話輕聲輕氣，喜歡練毛筆字，喜歡篆刻，這在當時也都被視為「閒情逸致」。他有着文人的敏感氣質，外界的變化很容易在他心中引起漣漪。花開花落，細雨秋風，他都會不由自主站在窗前，用心靈去品味。於是旁邊的同事會善意地調侃：「又來了！又來了！」不過好在大家對蕭木的「小資情調」只是溫和批評，並沒有粗暴批判。蕭木毫無怨言地接受大家批評，每天在日記上檢查自己。黨刊編輯室的領導也沒有因此將他看作另類，相反，文革前夕，他被提拔為黨刊編委，成為當時黨刊最年輕的編委。可他卻不願接受這個提拔，當黨刊負責人丁柯向他宣佈任命時，他不但沒有表示興奮，相反卻哭了。他說他喜歡做實際工作，不想當官。他那時除了黨刊的工作，滿腦子就是文學創作。而且覺得有了職務，就要「管」別人，以他敏感的性格，恰恰是他不擅長的。後來

還是黨刊的領導、市委秘書長李家齊找他談話，他才接受了黨刊編委職務。³⁹

蕭木與徐景賢早就認識。共同的文學及寫作愛好，以及共同的內斂謹慎的性格，使他們第一次見面，就成莫逆之交。他倆同年，但徐景賢在政治上比文人氣質的蕭木更成熟，相比之下，蕭木要拘謹內向得多。蕭木後來自己也說：

而我則生性拘謹，幼稚而又不善交遊，因而非常欽佩老徐的成熟，尤其羨慕他的輕盈和從容。儘管後來知道他其實與我同年，但我一直把他視為「同年大哥」也許在行事、為人都力求溫文爾雅，不張揚、不誇飾這一點上與我有同好，他也與我特別投緣，總是像兄長那樣關懷着我，且數十年如一日。⁴⁰

1962年，蕭木發表在《上海文學》上的小說《探索》，起初頗得好評，後來卻被一些人在作協的一次學習班上批判，說是「給大躍進抹黑」。蕭木得知後十分緊張，以至連作協通知他開會也不敢去。不想，過了一二個月，《上海文學》上發表了一篇評《探索》的長文，雖也指出了一些缺點，但從總體上，特別是從政治上，給予熱情讚揚和肯定，這篇評論的作者就是徐景賢。

文革開始後，蕭木「鼓起最大的勇氣和熱情主動接受文革洗禮，決心投入其中來一個脫胎換骨的改造」⁴¹。但是很快，文革之火燒到蕭木身上。事情是因他組織的一篇文章引起。1966年7月以後，上海結合四清開展工廠的文革運動，黨刊編委會選了一批工廠作經驗介紹，分工讓蕭木抓報道。文章寫成

39 以上和後面的關於蕭木的經歷全部都是蕭木告訴筆者的。

40 蕭木著 2008年《你走了，輕盈宛若白雲》。

41 這是蕭木對筆者說的。

後，刊登在《支部生活》和《黨的工作》上。其中一篇是關於國棉一廠的。文中提到一個「某車間搞技術的人」，貼了廠黨委書記大字報，工作隊組織反擊。黨刊的態度是支持工作隊的，文章發表之後工作隊更是大會小會批判這個技術員；技術員讀小學三年級的兒子，也被學校的孩子們打斷了腿。10月底，國棉一廠的造反派工人要蕭木去參加廠裏的大會。會上，那個腿上綁着石膏的十歲男孩被抬上台。蕭木震驚了：「我的心在裂痛，在顫抖。因為很顯然，我也是這樁慘案的製造者之一，我用的是筆」。⁴² 後來，蕭木又被另外幾個工廠批判，都是他曾經在黨刊上報道過的工廠，那些報道，使最初給黨領導提意見的工人，遭受到更多打擊。

正是在被「請」到多個工廠去「遊鬥」的過程中，一方面，親眼看到了工人造反派剛起來時，受到迫害的種種實例；另一方面，因有了較多的接觸，還發現他們並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粗魯、不講理，其中不少人還有好些正是我所缺乏的好品格，譬如率直、敢於擔當，有比較多的個人獨立自主意識等等，這使我心目中曾經是那樣崇高的既存秩序開始漸漸動搖以至崩坍，感情上也漸漸有保留地向工人造反派傾斜了過去。⁴³

其間，市委黨刊編輯部主任、副主任相繼被打倒，蕭木這個編委成了「候補當權派」，成為黨刊內部兩派焦點。他的辦公桌被抄，日記被搶走。這些日記，是他自上小學後就開始寫的，完全無保留地自我展現，是他的私地。第二天，「批判蕭木日記」戰鬥小組成立，一張張「剝去蕭木畫皮」的大字報貼出。本來性格就十分敏感的蕭木，更感到自己就像被剝得一絲

42 這是蕭木對筆者說的。

43 同上。

不掛，置於眾目睽睽之下。接着，批判蕭木文學作品的小組也成立，又是成批的大字報。12月25日晚上，機關造反派在餘慶路機關食堂，批鬥負責黨刊的李家齊、方揚和丁柯等人。蕭木害怕了，擔心自己被拉上台去陪鬥。以他的敏感性格，「這樣的屈辱，已經超出我能夠忍受的極限」。他逃了出去。⁴⁴

但他並沒有想好要逃到哪裏去。在街頭彷徨了大半夜，他稀裏糊塗地躲進了靜安公園。公園面對市委延安西路辦公大樓，市委在那裏開闢了大字報區。大字報前人群如潮，蕭木感受到人群的沸騰。他萌發了寫反映文革的長篇小說念頭，並為自己的念頭陶醉。他躲在靜安公園三天三夜，沒地方睡覺，也不敢回家。寒冷的冬天，總這樣露宿在室外，畢竟不是長久之計。他想起已經造反的徐景賢。

徐景賢看到蕭木就說：「蕭木啊，你怎麼到現在才造反，我一直在等你呢！不過革命不分先後，能夠起來造反就好！」徐景賢為走投無路的蕭木在康平路2號找了個隱蔽地方。那是1966年的12月底，寫作班剛宣佈造反。

我既為自己落後於形勢而深感到慚愧和焦慮，也為老徐能引領革命新潮流而感到欽佩和欣喜。但有時對這位原先溫文爾雅的老友如此快速地成為激進的革命造反派，多少又有點不敢相信。⁴⁵

1966年的年終，上海一片大亂。徐景賢風風火火，日夜奔忙，蕭木卻躲在徐景賢為他安排的小屋裏，悠閒地讀書看報。徐景賢暗中保護着蕭木，黨刊有人上門抓蕭木，都被他擋掉。就這樣，蕭木也算是機關聯絡站的成員了。他想投入運動，向徐景賢要求幹些雜事，徐景賢說你就管管收集傳單和小報吧，

44 這是蕭木對筆者說的。

45 同上。

可能對你將來寫小說有點用處。這樣的安排對蕭木真是得其所哉，他索性把鋪蓋搬進黨校內的機關聯絡站，白天利用各種機會收集傳單小報，晚上整理造冊，不到兩個月，他的收集就裝了滿滿三大櫃子。

市革會專題寫作組成立，徐景賢向朱永嘉推薦了蕭木，之後，蕭木又成為《紅旗》雜誌上海組稿組和市委寫作組成員。他後來回憶這段日子：「寫作是我終生心儀的事，何況還有那麼多書可以讀，工作雖是常常沒日沒夜，內心卻感到從未能有過的充實和快樂。」⁴⁶ 工作之餘，蕭木始終沒有放棄他的寫作愛好，以小說形式寫出了他眼中的文化大革命：《初春的早晨》。也正是由於對寫作的愛好，蕭木在寫作組也不忘爭取文學創作的空間。由他提議並堅持，上海市委寫作組後來辦起文學刊物《朝霞》。

蕭木在寫作上，政治、文藝，評論、創作，樣樣來得。徐景賢對蕭木十分欣賞，稱讚蕭木是多面手，號召寫作組的青年不但要學姚文元，也要學蕭木。⁴⁷

蕭木身上的文人氣質，始終與鐵血的革命衝突。對蕭木來說，革命與文學的選擇，幾乎困擾了他半生。對於文革的血腥、暴力和文化專制，蕭木雖然有感受，但他始終小心地不去激活心中的直接感受，他將自己的感受完全服從於黨的宣傳教育。他認為，大躍進後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民眾也是不滿甚多，但黨當時的教育一直說形勢大好，說那只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問題，而且後來到1964年經濟形勢也確實好轉。現在文革中群眾有怨言，但文革的負面也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成績遠遠大於失誤，他堅信黨有能力糾正而且正在糾正這些不足之處。⁴⁸

46 這是蕭木對筆者說的。

47 徐景賢 1977 年 12 月 25 日。

48 這是文革後，約在 2010 年，筆者和他閒聊時，問起他，難道沒有感受到

王承龍出局市革會

專題寫作組和大批判寫作組被撤銷後，一年多時間內，王承龍還是市革會辦公室負責人，徐景賢成立《紅旗》雜誌組稿小組，一直瞞着王承龍。王承龍認為專題寫作組既已撤銷，開會便不再通知朱永嘉。1968年年底一次市革會擴大會議上，正在上海的張春橋看到出席名單中沒有朱永嘉，便問負責市革會會議通知的王承龍，為什麼朱永嘉沒到會？王承龍回答說：專題寫作組已經撤銷，朱永嘉參加會議沒有名份和代表性。張春橋聽了大為光火，說：你要名份嗎？朱永嘉是《紅旗》雜誌記者，上海的什麼會議他都可以參加！還反問王承龍「你有什麼代表性？」王承龍不得不立即通知朱永嘉參加會議，以後再不敢有會不通知。⁴⁹

一年多後，王承龍被清出市革會，而且從此再沒回到政壇。他下去的原因與張春橋有關。事情的直接起因，其一是1968年4.12炮打私自閱檔之事。王承龍管轄的市革會組織組，幾個工作人員私下翻閱張春橋檔案。組織組是王承龍管轄的，這些人又都是王承龍信任的。儘管王承龍不一定知道此事，但要為此事負領導責。其二是「整理江青黑材料」之事。有一天，下面有人上交給王承龍一張照片，是江青三十年代當演員時攝的。王承龍將照片上交張春橋，但張春橋拒絕收下。江青三十年代的照片在文革中是非常敏感的物件。她文革初期提出「偵控」問題，說公安系統對她偵查控制，搜集她的黑材料；所謂「黑材料」，實際都是關於她三十年代當演員時媒體的報道、評論和照片。公安系統大批人員因之被審查甚至關押。王承龍

民間對文革的巨大不滿時，他的回答。

49 這是朱永嘉對筆者回憶的，此外，在上海揭批「四人幫」辦公室編的吳瑞武1977年3月18日《我在寫作班工作期間的揭發交待》中，也提及此事。

既沒有寫明照片的來龍去脈，也沒有寫上交哪個單位。⁵⁰張春橋不願接手惹禍上身。在這方面張春橋十分謹慎。曾有人上交毛澤東姪子毛遠新生母的材料，張春橋原封不動地退回，而且還特地在原件信封上寫明：「我沒有看過」。⁵¹

又據說，王承龍下去的真正原因是擁權自重，不按規則行事。例如，毛澤東到上海，住在虹橋的賓館。王承龍得知，不經任何請示手續，自己闖宮要求見毛。警衛不讓進，王承龍亮出市革會負責人身份，還是被擋住。事後上面查問是誰如此不懂規矩，硬闖主席住處。又例如，他不經引薦或介紹，直接跳過張春橋，打電話去北京找康生匯報什麼事情，而康生之前根本不認識他。康生一口回絕，說春橋就在上海，你找我幹嘛？康生而且隔手就打電話給張春橋，問王承龍是什麼人。張春橋後來對此事有回顧：

當然，認識王承龍這個人也不那麼容易，1967年我才認識王承龍這個人，覺得他有點不正派，但也覺得他還做過一些好事。1968年就不行了，中央同志也講了他不正常。我在上海，他卻背着我打電話給中央文革，被康生、江青發覺批了：「春橋在上海，為何不報告春橋？」不答覆他，並把電話稿抄給了我。我不怕，我找他談了，我對他說：「你是不是想奪權？」這話已經上綱上線了。我說，我負責市革會，你想奪權，你要告狀，可以超過我；是工作問題，你向中央文革報告，打電話，為什麼超過我？我不是在中央文革嗎？

找他談了，他還要賴，以後我把電話記錄稿給他看了，才沒有話說。以後又觀察了他一段，看看實在不行了，才開會。⁵²

50 王承龍 1978 年 9 月 3 日。

51 這是筆者文革後聽游雪濤說的。

52 張春橋 1968 年 12 月 12 日在機關小組的講話。此外，朱永嘉對筆者提及

王承龍從一個小科員，一下成為權傾一時的市革會負責人之一，便以為官銜就是能力和通行證，自大而無自知之明；卻又不懂官場規則，屢犯越規行為。加上王承龍對深得張春橋信任的徐景賢、朱永嘉等始終打擊擠兌，也觸犯疏不問親的官場慣例。此外，王承龍自恃造反有功，擁權自重，飛揚跋扈，忘乎所以。他動不動就訓人，不但新幹部，就連上海警備區的軍隊領導幹部廖政國、劉文學等，都挨過他的訓斥；市革會的老幹部馬天水、王少庸、黃濤等更不必說。就這樣，他在市革會得罪甚多，口碑非常差。金祖敏評論說：「似乎對王承龍印象好的人沒有的，沒有一個人沒被王承龍訓過，都挨過他的訓。」⁵³

王承龍也得罪王洪文。在市革會，他的位置在王洪文之上；他連馬天水等資歷比他老得多的老幹部都不放在眼裏，更不必說新出道的王洪文。1968年為恢復中共黨組織生活，開展整黨建黨。王承龍帶着工作隊，去王洪文工作的國棉十七廠試點。作為中共黨員的王洪文帶頭造反，得到毛澤東支持。廠裏大多數黨員和基層幹部看到毛主席支持王洪文，所以後來也都跟着加入了造反隊。因此，各級幹部「靠邊」者很少，到1968年下半年，大部分被「解放」擔任職務。王承龍說這是復舊，在1968年10月的《解放日報》上，連續刊登三篇文章，說整黨建黨中要警惕復舊，似乎是批判社會傾向，實際對着國棉十七廠，弄得王洪文非常不高興。⁵⁴

王承龍越過市革會直接找中央其他領導，導致自己下台之事，給許多文革中新上台的幹部以震撼。以後，王洪文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好長一段時間，黃金海、葉昌明等人不敢越

過此事，金祖敏也對筆者提及過；都說1968年間，張春橋在上海，王承龍越過張春橋打電話去中央匯報或請示什麼事情，張春橋很不高興，說「我在上海不問我，卻直接去問中央」。

53 筆者1989年8月12日對金祖敏的訪談。

54 筆者1992年5月17日對原上棉17廠職工唐文蘭的訪談。

過上海市委給王洪文寫信：「有王承龍教訓，上海有市委不匯報，直接寫信給北京，弄不好又說不清。」⁵⁵

1970年2月17日，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向市委寫了《關於揭發王承龍、朱玉佩問題的報告》。王承龍雖然還掛着市革會常委的職務，但實際上被「下放」，去上海第二機床廠當工人。馬天水說王承龍的問題由張春橋處理，別人不要過問。⁵⁶此時王承龍身體非常不好，但他在台上得罪太多，下了台沒人想到去看望他，更沒人為他說話。他自己說「我家門可羅雀」；妻子也受牽連被整。很長時間裏，他連工作證都沒有，只有一張「臨時勞動證」。直到1976年3月，他被革職七年後，徐景賢才第一次接見他，談了十分鐘話，說以後有困難可以找他。之後，他被分到上海鍛壓機床廠，擔任黨委副書記，總算有了工作證。王承龍以為過去的事都已經過去，一次他去外單位為本廠聯繫協作加工業務，前腳剛走，王秀珍後腳就派人去調查。⁵⁷他還是不被上面放心。

王承龍下去了，老是和徐景賢及寫作組過不去的對立面消除。不過，新的矛盾正在形成，那是來自工人造反派對寫作組的不滿。

小結

從專題寫作組，到紅旗組稿小組，到市委寫作組，名稱變了，但寫作組的核心任務沒有變，依然是奉命寫作，詮釋和宣傳文革。張春橋、姚文元雖然不過問寫作組的具體工作，但卻是他們的精神領袖。

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大都是共產黨執政後，自己培養的

55 黃金海 1976年10月38日。

56 王承龍 1978年9月3日。

57 同上。

文化人。1949年後的文科大學，教材越來越狹隘，歷史只以階級鬥爭為唯一解釋；政治經濟學替代了經濟學；哲學被簡化為辯證唯物主義；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法學等文科學科都被視為西方的偽科學；文藝理論除了馬、列、毛，只讀俄國的杜、別、車；文學創作除現實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其他都是歪門邪道，等等。如此單一的知識信息來源，以及扼殺思考和想像力的灌輸洗腦式的教育，只能教育出一幫馴服工具，培養不出思想家。他們的寫作，完全是出於「黨的需要」，是政治宣傳，而不是學術研究。更準確地說，他們不能算作知識分子，只能算是黨的秘書。這是1949年共產黨執政後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的共同特徵。他們關閉自己的直覺，聽任政治催眠。黨說什麼就相信什麼，黨的需要就是自己的事業，黨指向哪裏他們就打向那裏；奉命寫作，奉命批判；沒有學術思想，滿足於做詮釋，解釋和普及被執政黨稱為真理的理念，為執政黨的理念和政策做「正面解釋」。

寫作組的核心人物：朱永嘉、王知常、蕭木、陳冀德，有着那一代人的特點：熱情、獻身、忠誠，理想主義。他們中真正懂點政治的，大概只有朱永嘉。縱觀整個文革，工人造反派因為「生活問題」也即男女關係，或者「經濟問題」也即多拿多佔，被整肅者很多。許多人雖然一時當上各級領導，但後來被淘汰。而寫作組的成員則基本沒有這些問題。他們人格中傳統教育的價值觀還沒有被革命完全取代，直覺沒有被革命麻木，個性沒有被革命淹沒。所以直覺個性時時會與現實政治發生衝突。但每次衝突的結果，都是壓抑和克服自己的良心和直覺，強迫自己按照黨的要求思考和行事，並以黨的話語教化民眾。他們政治上民粹主義，知識上和道德上卻又對工人造反派不以為然；他們內心深處有着善惡判斷，卻又在現實中關閉自己的良知。這是中國從50年代起幾代知識分子的悲哀。他們是虛幻理想的殉道者。他們明知民眾對文革的巨大不滿，但卻以

為這一切不滿都是短見；他們看到文革造成的巨大破壞，但卻認為這些都是為長遠目標必須付出的短暫犧牲。

他們有着知識分子的入世情懷和道德自省，但是，他們給自己的定位只是做幕僚，為政策和思想做詮釋。他們不想當官，雖然與政治近距離，但又不願成為直接從事政治的官員。這是他們保持自己知識分子身份的最後底線，是他們對自己的定位；也是為了表示，他們所作的一切，包括為現實唱讚歌，不是諂媚，而是為了維護和追求心中的理想。這使他們的行動顯出巨大的矛盾：一方面，他們霸佔着文化和思想領域的話語權，是上海主流政治思想的核心，另一方面，他們卻又不願意從事核心政治；他們為權力服務，但自己並不追求權力，甚至刻意與權力保持距離。而且他們中的一些人，總想擺脫政治，從事自己喜歡的文學等專業，但始終身不由己。他們只能經常處於既懷念自己年輕時的志向，又必須為遠大理想捨棄自己的糾結中。少了對權力的追求，使寫作組內部少了紛爭，人際關係和諧，這在到處派性四伏、勢不兩立的文化大革命中少有。

第二十八章

砸爛公檢法 「群眾專政」的實踐

公安和司法系統的奪權

1966年11月9日工總司成立，打破職工不得成立跨行業組織的規定，形形色色的職工造反組織一哄而起。不但工廠工人成立各種組織，連政府機關的科層人員也紛紛成立組織。甚至本應維護社會秩序的政法系統，也是各派組織林立，一片混亂。

政法系統中，最舉足輕重的無疑是作為執法部門的公安系統。公安系統最初的造反組織是市公安局的「戰鬥組聯絡站」，成立於1966年11月12日。¹ 後來市局的文保處、消防處、政保五處、政保六處等部門的造反派，經過串聯籌劃，² 於1967年1月5日成立了公安系統的第一個全市性造反派組織「上海公安局系統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公革會」），負責人是上海市公安局文保處的幹部王維章，成員最初大多是市局的科層人員，後來也在各區縣的公安分局發展成員，以交通警察為多。

1967年1月11日，公革會與紅三司等十五個造反組織宣佈奪公安局的權。1月21日，公革會在建國西路75號大院召開「徹底砸爛市委、市局黨組、建立革命新秩序誓師大會」。四十餘名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公安局的領導被上台批鬥。會上宣佈公革會第一號通令，宣佈全面接管上海市公安局的一切權力。

1 文革傳單《三月風雲》，《三月風雲》編輯組1967年9月編印，原件藏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2 《上海公安大事記》，上海市公安局檔案處1999年編。

在此前後，上海各區和縣的公安分局也被先後宣佈奪權。³ 不久，公革會成為上海人民公社發起組織之一。

公革會奪權之後，公安系統其他造反組織也紛紛成立。主要有成立於1967年1月的「上海市各區(縣)公安員警革命造反聯合兵團」，以派出所戶籍警為主要成員，沒幾天後改為「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聯合兵團」(簡稱「聯合兵團」)；成立於1月15日的「上海人民警察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人革會」)，以交通警為主要成員；成立於1月的「上海市公安局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機聯站」)，成員最初主要是市局的科層人員，掛在徐景賢、王承龍他們的市委機關聯絡站下面；成立於1967年1月9日的「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簡稱「公聯司」)，等等。公安系統另一個有影響的組織是成立於1月27日的「上海市消防民警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消革會」)。這個組織成員並不多，與動不動就幾萬十幾萬人的工人或學生組織相比，只能算是個小組組織，之所以出名，是因為1967年7月的一場武鬥。還有「上海市消防義務兵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義革會」)，也是因那場武鬥而出名，成員也是消防隊的造反派組成；取這個名字是因為消防員是義務兵役制。

1967年1月11日，紅三司接管市公安局，1月13日，張春橋接見公革會的王維章等人，雖然沒有明確支持接管，但也沒有表示反對，讓王維章他們「不要問我，先幹了再說」。1月17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對紅衛兵奪公安系統權表態支持，而且傳達了毛澤東的支持態度：「大致上，全國大城市的公安機關都被接管了。他們做得對。這件事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支持的。昨天，毛主席講過，接管是不可避免的，主席他支持接管。」⁴

公革會的負責人認為自己得到張春橋的支持，公安局的

3 《上海公安大事記》，上海市公安局檔案處1999年編。

4 謝富治1967年1月17日對公安部幹部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年第二版。

權應該由他們行使。但公安系統其他幾個組織不服氣，認為這是一家奪權，老保奪權。因為公革會中機關幹部多，他們稱公革會為「公安局的赤衛隊」，認為公革會「唯我獨革」，「唯我獨尊」，想獨攬公安局大權。1月28日，聯合兵團和公聯司提出，公革會1月11日對市公安局的接管和奪權，實際是「接權」，「大方向錯了」。他們召開會議，宣佈要調動人去市局砸公革會。公革會聞訊先下手為強，組織上百人砸了公聯司總部及其所屬分部，搶走他們的印章、袖章和活動經費，還抓了他們的負責人和骨幹。2月3日，公革會又出動兩卡車人，以聯合兵團負責人宋春生參與1.28炮打為由，砸了設在長寧區公安分局的聯合兵團總部，並抓了宋春生，關押了一陣子。⁵

公革會幾乎和所有的公安系統造反組織的關係都不好。和聯合兵團、機聯站都有過摩擦；和消革會、義革會更是在1967年7月26日及27日，有過一場全市矚目的大武鬥。這場出動二十多輛消防雲梯車的武鬥，當時轟動上海。公革會與工總司也一直不和。王洪文們認為公革會是「假造反」，「假奪權」。他們稱公革會是「阿公老保」。戴立清在一次會上的講話，反映了工人造反派對公革會的看法：公革會是老保，我們把赤衛隊頭頭送公安局時，他們前門收進後門放出，可抓我們造反派時，卻當他們是現行反革命那樣用手銬；公革會是幾個小司令部中最壞的一個，因為他們有權抓人，專門與我們作對。⁶

與工總司關係比較好的是機聯站、聯合兵團以及消革會，都是和公革會關係不好的組織。楊浦區公安分局的警察宋桂生是機聯站的，與王洪文很熟悉。王洪文文革前是國棉十七廠的保衛幹事，與公安局經常有工作上的聯繫；國棉十七廠地處楊浦區，所以王洪文文革前便與楊浦區公安分局的一些人很熟悉。1966年夏，王洪文在廠裏造反時，曾得到楊浦分局副局長

5 未刊稿《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

6 轉引自岑麒麟1977年11月25日。

和一些幹警的支持。安亭事件後，楊浦分局響應毛澤東號召支持造反派，對王洪文和工總司大力支持，1966年12月下旬，楊浦分局曾派出警察和幹部，去擔任工總司總部的聯絡員和門衛；還指令眉州路和隆昌路的兩個派出所，派人在工總司總部的外圍巡邏，保衛工總司總部。而聯合兵團的負責人宋春生，五十年代就與戴立清熟悉，戴立清去蘭州前曾經是里委幹事，經常和長寧公安分局和下面的派出所打交道，和那裏的戶籍警也很熟悉。至於消革會，1967年初，工總司剛搬去總工會大樓辦公時，整個工總司總部的保衛工作都由消革會包下，消防車駕駛員們還為工總司的負責人開車，黃金海的駕駛員最初就是消革會的。

紅三司接管市公安局權的那天，市公安局大樓旁邊的市中、高級人民法院下午也被宣佈接管。接管者是成立於1966年12月26日的「上海市司法戰線捍衛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派」（簡稱「司革隊」），成員主要是中、高級法院的工作人員。但是，這個接管被華東政法學院的紅三司認為是「老保接管」，因為司革隊中有人是法院原來的文革小組成員。1月21日凌晨3時，華東政法學院的紅三司砸了司革隊的辦公室，宣佈由他們接管中、高級法院。司革隊向華東政法學院的紅革會求援。幾小時後，上午10時，華東政法學院紅革會一百多人衝進法院，撕去紅三司貼上的封條，與華東政法學院的紅三司發生衝突。雙方當晚在法院大樓的五樓開辯論會，直辯到深更半夜。第二天上午9時多，政法學院的紅革會與紅三司又為佔領秘書室等房間發生衝突，紅革會被紅三司趕出大樓。晚上10時，紅革會請來了五六百個工人以及其他學校的紅衛兵，再一次與司革隊一起反紅三司接管。1月25日凌晨，造反派以「上海市紅革會、公安學校紅色造反總司令部接管高、中級人民法院委員會」的名義，宣佈對法院的接管。這是法院的第三次被接管。接管委員會發出的《第一號通令》支持司革隊，說它是「堅定的左派」。不

過一天後，接管委員會又來了個180度的轉彎，再發出《特急通令》，說司革隊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並收繳了司革隊「接管」來的7個法院大印。1月27日，形勢又翻轉。凌晨，紅三司聯合法院內的另一派造反組織進行反奪權。4時，紅革會衝進大樓趕走了紅三司；5時，紅三司大批人員再一次回到法院大樓，再一次宣佈接管。

就這樣，上海中、高級法院的權，反反復復，拉鋸式地被奪了六七次。直至1月28日，上海市高、中級人民法院奪權聯合委員會成立，第八次宣佈奪權。法院的反復奪權是一個縮影，反映出各群眾組織之間是如何不買賬，你方奪權我再奪的亂哄哄局面。也反映出沒有規則的權力置換是如何隨意。

1967年6月中旬，「上海司法戰線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司革會」）成立。此時的司法工作已經完全停頓。這個組織的成立不是為了恢復司法工作，而只是作為一個群眾組織，參加全市性的造反派活動。同年10月14日司革會撤銷。

市人民檢察院於1月11日被接管，接管組織是成立於1966年11月20日的市檢察院的「東方紅戰鬥隊」。第二天，東方紅戰鬥隊又召開各區、縣人民檢察院造反派代表會議，宣佈成立上海市人民檢察院革命委員會，主持日常工作，並宣佈檢察院的三個領導幹部「靠邊審查」。⁷

從文保會到政法指揮部

1967年1月紅三司奪公安局權的第三天，1月13日上午，張

7 本節資料來源：1.《寸權必爭。寸步不讓——記上海市高級、中級人民法院的奪權、反奪權鬥爭》，載於文革時期紅衛兵小報《革命造反報》1967年2月22日第3期，紅衛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主辦。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收藏；2.《上海審判志》，上海審判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3.《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未刊稿。

春橋和姚文元去永嘉路上的公安局政保三處，接見公革會的王維章、聶松岩和韓成義等人。會後，張春橋要公革會負責人王維章通知一些群眾組織開會。下午，張春橋又在在錦江飯店十樓召集公革會、工總司、二兵團、紅革會、紅三司等15個造反派組織開座談會，談關於接管市公安局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張春橋對紅三司奪公安局權表示支持。但他又提出，只是紅三司一家力量不夠，也應該有工人參加。他建議成立一個工人、學生和公安局造反派的聯合機構，而且「可以考慮公、檢、法一道搞，最好連在一起」。⁸

康平路事件後，各派組織都要求公安局關押老保或自己的對立派，公安局感到難處理。所以開會之前，公革會負責人聶松岩事先已與王洪文商量，打算成立一個專門處理此類事情的機構。會議快結束時，聶松岩遞給張春橋一張紙條：「春橋同志：我們擬成立一個由專政機關與群眾組織相結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來處理文革中的問題。」張春橋看後，當即表示同意。張春橋說：「你們要行動就行動，不一定要找我們談了再行動。公安局的問題，不一定都參加，部分革命組織參加也可以，搞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委員會宣言。」⁹

1月16日，各造反組織在建國西路75號市公安局辦公大樓開會，王洪文參加。會上確定以公革會為主，工總司、二兵團、紅三司和紅革會，5個造反派組織抽調人員擔任常委，組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簡稱「文保會」）。1月20日文保會成立，發表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宣言》，10個造反組織在上面簽名。文保會由公革會派代表3人，其中2名是負責人名額；工總司代表1人；紅三司代表1人，以及市

8 《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在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邀請部分革命造反團體參加的座談會上的講話紀要》，1967年1月13日。

9 張春橋的講話轉引自王維章1979年1月22日證詞，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1981年2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四》。

法院、市檢察院造反派代表各1人，共7人組成核心。工作人員二百多名，其中一半是公安人員，一半是工人造反派和學生紅衛兵。¹⁰ 二兵團派出的工作人員最多，有上百人。¹¹ 文保會設常委制：公革會是文保會的召集人，由公革會派出聶松岩和韓成義作為召集人主持工作。¹² 工總司派出的代表是王洪文。¹³ 不過王洪文自己只去過一次，他派別人去參加會議。機關聯絡站派人協同公革會起草宣言和通告。

文保會處理過的比較大的事情有：1967年2月初，取締「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住房問題調查指揮部」，並拘留其中的幾個負責人；1967年1月24日，上海柴油機廠聯司和東方紅兩派武鬥，文保會派出人員前往調停，並抓了聯司方面的打人者。此外，還有《新民晚報》事件、上海郵局事件、錦江飯店電梯事件、漕溪北路事件，等等，大都是調停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和摩擦。¹⁴

1966年6月開始的一浪接一浪的批判，實際都是對整個國家機器嚴密控制民眾的權力的質疑。除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所有政府和共產黨的各級機構都被否定。作為國家機器的公安機關，也因為領導人的被批判，失去應有權威。文保會的成立，正是為了建立一個替代性的執法和維持秩序的權威機

10 文保會工作人員曹文秋 1978 年 11 月 23 日的證言，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四》。

11 公革會負責人王維章 1979 年的證言，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四》。

12 同上。

13 有材料說王洪文是文保會負責人，這顯然是記憶錯誤。因為此時王洪文的地位還不高，只是個群眾組織的負責人。

14 文保會工作人員曹文秋 1978 年 11 月 23 日的證言，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四》。

構。這個替代性機構，由群眾組織和公安人員共同組成。但是，這種讓群眾直接參與執法的做法，很快陷入困境，關鍵是拘捕和關押的審批權。這個權力，只有在文保會工作的原公安人員而且必須是文保會的負責人才有，其他人簽字無效。¹⁵ 應該說，文保會在這個問題上是謹慎的，不想使這一核心權力氾濫。所以，當一些群眾組織送人來要求關押時——例如工總司的陳阿大就曾經抓了人強行要文保會關押——他們頂了回去。

但文保會的成員都是群眾造反組織人員，而且大都是公革會的人員。他們的執法人員和造反派組織成員的雙重身份，使他們執法的公正性受到質疑。於是但凡文保會抓了某個群眾組織的人，這個組織一定會去文保會抗議示威，要求放人。人們不把文保會看作是執法機構，只看作是群眾組織的聯席機構。文保會沒有執法機構應該具有的權威。因此，文保會成立後，身份一直很難定位，無法行使原來公安局的職能，日常所做的最多工作，只是原來公安局的接待和調解工作，加上全市性集會的治安保衛。¹⁶

文保會與上海第一大群眾組織工總司的關係不好。王洪文與二兵團的耿金章鬧矛盾，又與公革會不和，他認為文保會被二兵團和公革會控制。¹⁷ 王洪文與二兵團不和，公革會的王維章等，便不敢再留二兵團的人在文保會工作。2月下旬耿金章被王洪文關進楊浦公安分局。文保會的工人代表原來以二兵團人員為主體，二兵團垮了，文保會也就沒了勢力。而王洪文因為

15 公革會負責人王維章 1979 年的證言，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四》。

16 文保會的這些工作內容，引自公革會負責人王維章 1979 年的證言，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四》。

17 文保會負責人聶松岩 1980 年 7 月 12 日證言，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四》。

對公革會和二兵團有意見，不去文保會，工總司的人於是也不去文保會。加上1967年3月以後，號召學校「復課鬧革命」，一些學生回學校去了，文保會實際只剩公革會一家。¹⁸

上海市革會成立後，於1967年3月1日，建立了市政法指揮部，統一領導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的日常業務，主要負責人是上海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東海艦隊副司令高志榮、以及駐滬空四軍的副政委姬應伍。工作人員由軍代表以及原來的幹警組成，不再有群眾組織參加。文保會名存實亡。1967年7月，文保會向市革會寫報告要求撤銷，停止活動。

任意抓人的開端

本應該維持社會穩定的公安系統，也捲入文革運動，幹部被鬥被靠邊，警察們紛紛成立各種造反組織，忙於打派仗，一片混亂。而北京下達的公安部長謝富治一系列講話，又都要求公安人員支持造反派，更使1966年底至1967年上半年的上海公安系統陷入無序。

首先是拘留受審制度。文革前的拘留、逮捕制度雖然不健全，但至少不是一個領導說了算，單位要將人送去公安局關押，必須經過黨委集體討論，並由單位保衛部門向公安部門打報告；如果是小單位，沒有保衛部門，則由街道的派出所出面打報告，由公安局有關部門審核、批准後，方能執行。單位不能隨便將人送去公安局，憑個人意志將人送去公安局關押受到很大制約。但這種制約在1967年初被打破。康平路事件後，周恩來說赤衛隊負責人王玉璽這樣的人應該抓起來，¹⁹張春橋直

18 文保會的這些工作，引自公革會負責人王維章1979年的證言，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1981年2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四》。

19 周恩來的這個話的出處，第12章中已注。

接從北京打電話給上海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長，要求公安局收押造反派扭送去的赤衛隊員。此時公安系統還未被奪權，於是，楊浦分局配合工總司，收押和審訊工總司抓獲送去的赤衛隊負責人。從1966年12月29日至1967年3月止，楊浦公安分局共關押赤衛隊員113名。²⁰ 大批赤衛隊員，在沒有任何收押手續的情況下被送審關押，只要造反派送去，公安局就收押。這樣先收押、再立案甚至根本不立案的做法，成為上海文革中隨意抓人關人的開端。趙全國被抓，更是群眾組織之間隨意相互抓人的開端。

1967年初成立的文保會，曾經為防止群眾組織亂抓人送去關押，規定必須由負責人簽字才能收押；但是，這個規定沒有實行多久，就隨着文保會的名存實亡而被沖垮。一些造反組織一個頭頭簽字，就非要公安局收押人，甚至不提供送押時所必須的當事者材料。例如1967年2月，工總司所屬徐匯區的一個造反組織，將徐匯區稅務局造反派的一個負責人扭送進徐匯公安分局，說此人是反革命，一定要徐匯分局拘留。徐匯分局的文保會認為送人方面沒有同時送來此人的案件材料，不能收押。送人方面說「不是拘留，是收留」，並保證兩天後送材料。但後來一直沒送，也不許徐匯分局放人。最後，在文保會一再催促下，他們匆忙讓徐匯稅務局的「紅旗戰鬥隊」送了一份材料。這個人就這樣從2月4日一直關到2月24日。²¹

市革會成立後，規定抓人必需市革會負責人簽字。幾個市革會負責人都有簽字權。但比起文革前抓人須討論、上報、再批准立案的手續，1967初期的抓人關人，還是沒有程序。只需一個人說了算，一張條子便關人。馬天水只抓生產，基本不審批這方面的事，徐景賢也不審批抓人；審批最多的是王少庸和王承龍，他們管專案，經他們批准關押的人非常多。不過，與

20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未刊稿。

21 《張崇邁、紀鳴歧等關於走訪前徐匯區文保會工作人員紅三司戰士左傾心同志》，上海市檔案館B14-3-101-63

公安局關押不同的是，專案組的關押是「隔離審查」，屬於政治隔離；公安局的關押是「拘留」，屬於刑事關押。

王洪文擔任市革會領導後也有審批權，被他一張條子送去關押的，大多是工總司對立面組織的成員。王洪文與楊浦公安分局的造反派關係比較密切，1967年1月11日紅三司接管市公安局時，工總司總部馬上討論如何應對。王洪文認為，公安局是專政機關，不應該由一家群眾組織接管，應該主要由公安局內部的造反派接管。王洪文要大家去各區公安分局，支持各公安分局內的造反派接管。王洪文並關照黃金海帶人去楊浦區公安分局。他對黃金海說，那裏有個幹警宋桂生是造反派，他要黃金海支持宋這一派。黃金海於是代表工總司支持宋。王洪文支持與自己關係好的一派接管，這一派以後堅決支持和配合王洪文。王洪文將那些要打擊的對手都送進楊浦區公安分局：工總司總部的范佐棟、二兵團的耿金章、戰到底的孫福祥，還有聯司和支聯站的負責人，等等，其中單是聯司和支聯站成員就有601人。楊浦分局的警察還參加審訊被關者。²² 1967年10月，楊浦分局在南大樓201室專設了一個機構，名為201專案組，由8名警察組成，直接處理工總司送來的「案子」。三個月就辦了29個案子，拘留關押36人。²³

造反組織代行公檢法職責引出混亂

公安系統的混亂還因警察造反引起。作為執法人員的警察，也造反成立群眾組織，大大降低了公安執法機構的權威和公正性，而執法人員和造反派組織成員的雙重身份，也使被抓人方面有借口衝擊抓人的組織。1967年1月24日，上海柴油機廠

22 這個數字引自《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未刊稿。

23 同上。

東方紅與聯司兩派衝突，前往調停的警察們也挨打。東方紅方面宣稱聯司打了公安執法人員，聯司則強調自己打的是公革會人員。雙方都散發傳單，互相指責。1967年初至1968年底，普陀、靜安、長寧、虹口和青浦、南匯、寶山等區、縣的公安分局或派出所，都曾發生造反派衝擊公安局事件。帶頭衝擊者許多都是工總司下面的區級組織頭頭。只要公安局抓了造反派組織的人，造反派就去圍攻，直到放人才了事。造反派們認為公安局已經癱瘓，具體辦事的都是些公安局裏的造反組織；這些公安人員以群眾組織的情緒參與派性，卻又以執法機構的身份處理派性。戴立清、陳阿大等提出，公安局抓工總司區、縣、局一級組織的頭頭，要事先與工總司總部通氣。1967年的上半年，因為抓人關人，不斷鬧出許多事件。有造反派組織抓了人要求關押被公安局拒絕，前往抗議的；更多的是公安局關了人，造反派不買賬，聚眾圍攻和衝擊公安局。

例如1967年2月，工總司靜安區分部將對立面組織5人送去靜安公安分局，說他們是反革命，一定要靜安分局關押。靜安分局認為這是兩派組織鬧矛盾，於是前門進，後門就把人放了。工總司靜安區分部常委姜達柱說這是公革會包庇反革命，動手扯警員的公革會袖章，與警員發生衝突，被靜安公安分局以干擾警務名義關押。²⁴ 工總司靜安區分部另一常委劉政明不服，於2月28日與3月7日，先後兩次調集幾千人衝擊靜安區公安分局，靜安分局所在的常德路一帶，接連許多天人群擁擠，車輛不通，秩序混亂。劉政明說你們不放人，那我們也抓人。他帶隊抓了靜安分局的局長、副局長以及靜安區公革會頭頭等5人，都關在上海貨車製造廠。幾天後，王洪文打電話給他，要他放人：「這事你不要管了！你記住，公安局總是公安局，

24 傳單《姜達柱的親口供詞》，上海靜安分局1967年3月9日印發，公革會行政分會1967年3月10日翻印。

姜達柱由上面處理，我們會讓他們放的。」²⁵ 接着劉政明因衝擊公安局也被抓關押。工總司的戴立清、陳阿大、王腓利等得知後，半夜開車往建國西路75號市公安局辦公大樓，將正在睡覺的市革會負責人王維章從被窩裏拖出來，帶到工總司靜安區分部，逼他讓靜安分局放人。5月，姜達柱、劉政明被先後釋放。²⁶

衝擊公安局的事也發生在普陀區。1967年2月23日晚12時，工總司普陀區聯絡站聯合上體司長寧區分部共80多人，與陝北中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發生糾紛，打傷36人，其中5人重傷。普陀公安分局經區武裝部同意，拘留了8個主要肇事者。工總司普陀區聯絡站不滿自己的人員被抓，3月7日，組織18個造反組織的數千人衝擊普陀公安分局。5月下旬，再一次包圍普陀公安分局，釀成7天7夜的武寧路橋事件。又如上海柴油機廠聯司1967年5月20日，組織上千人在福州路市公安局門口遊行示威，要求釋放被文保會抓去的人員，也屬此類事件，等等。還有寶山公安分局，1967年5月29日至30日，被紅東北等組織一千餘人連日在門口靜坐，「勒令」釋放被拘留人員。²⁷ 造反派不但衝擊公安局，還衝擊拘留所。1967年2月16日，虹口區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不滿自己一派人員被拘留。在虹口分局一派警員的支持下，於當日凌晨2時衝擊虹口公安分局拘留所，砸開大門，衝進拘留所。由於沒能搶下鑰匙，開不了監房門，他們便向被居留者的監房塞傳單，鬧了好一陣。²⁸

25 筆者2013年2月18日對劉政民的訪談，王洪文的話是劉政民回憶的。

26 此段資料主要引自岑麒麟1977年11月25日交代，筆者2013年對劉政明的訪談。以及《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四》。中的陳阿大1977年4月6日交代。

27 此段資料主要引自《上海公安大事記》，上海市公安局檔案處1999年編，以及《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四》。

28 傳單《控訴虹口兵團勾結虹口區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製造反革命暴亂事件的罪狀》，革委會虹口分會1967年2月16日，虹鎮派出所所造反隊翻印。

工總司下面的區級組織以及其他造反組織頻繁衝擊公安分局，以至於1967年2月28日，正在籌建的市革會政法指揮部不得不指示各級公安機關：凡涉及各群眾組織的案件，必需徵求市一級群眾組織負責人的意見。²⁹

作為執法部門的公安局、公安分局和派出所，文革前在階級鬥爭觀念指導下，擴大打擊面，積怨甚多，文革中政府權威掃地，也使以往與公安局有積怨者，以批判資反路線為由，衝擊公安機構。批判執法機構對他們的「資反路線」，要求公安局或派出所，交出搜集或整理的「黑材料」。1月30日，南市區周家渡街道的「鬧天宮戰鬥隊」包圍周家渡派出所，查封檔案室，收繳公安業務檔案和民警工作手冊30多份。1月31日，南市區「只爭朝夕革命造反兵團」200餘人衝擊董家渡派出所，毆傷民警多人。2月1日，虹口區長春街道的造反隊一百多人，將長春路派出所20餘名民警揪到總部，批鬥7個多小時，其中一名民警被指是「打人兇手」，剝掉警衣示眾，並遭毒打至休克。³⁰

上海公檢法系統被軍管

公革會奪權後，儼然代行公安局的職責。1967年2月，公革會及其區、縣分會，以鎮壓反動組織的名義，連續行動，取締近十個群眾組織，並拘留多人。法院的造反組織也代行法院權力。1967年2月14日下午，公革會閔行分會等11個造反派組織，召開公審大會。會上，徐匯區法院「捍衛毛澤東思想造反隊」的代表，宣讀徐匯區司法機關造反派的「聯合公告」，不經起訴程序，便給4名被宣佈為「反革命分子」者，分別判處徒刑20年、18年、15年、7年。如此以群眾組織身份行使司法機構的職

29 《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四》中的《馬文超等人證言》，普陀區公安分局馬文超等人1978年7月30日。

30 《上海公安大事記》，上海市公安局檔案處1999年編。

責，其權力和權威不但遭到其他組織的反對，也遭到本系統人員的批評。公革會政治部造反隊的一些成員，就曾對公革會代行公安局權力的做法質疑：

以群眾組織代替專政機關，對外的通令、通告均用公革會的名義，取締反動組織也用公革會。難道公安局就是公革會，公革會代替公安局了嗎？應該承認，公革會是臨時的奪權組織，但它畢竟是一個群眾性的組織，它絕不可能代替三結合的臨時最高權力機構，也不可能代替法定的專政機關。特別是張春橋同志批評了這種做法以後，依然明知故犯，在第四期《公安戰報》「公安簡訊欄內仍然刊出公革會取締反動組織和捕人的消息達八條之多。³¹

公、檢、法系統的造反派，身兼群眾組織和政法機構兩種角色身份，造成嚴重混亂。如此混亂狀況也在全國其他地區持續了整整一年。1967年3月1日，市革會成立政法指揮部，統一領導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的日常業務；3月3日，上海警備區派部隊對上海市監獄實行軍管；7月24日，市革會批轉市革會政法指揮部《關於拘留、逮捕、判刑、勞教審批權限問題的暫行規定》，將抓人權集中到政法指揮部。到1967年底，中央決策機構終於不得不於12月9日發文，對公、檢、法機關一律實行軍管。³² 公檢法被軍管後，對公安機構的衝擊才漸漸平息。根據中央的這個文件，12月19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派軍宣隊進駐市公安局，並在文化廣場召開軍宣隊進駐公安局大會，張春橋

31 傳單《打倒一切，排斥一切——評公革會第一號通令及其惡果》，公革會政治部造反隊和部分革命群眾 1967 年 3 月 10 日；閩北公安分局反到底革命造反隊 1967 年 3 月 12 日翻印。

32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中發〔67〕379 號：《關於公安機關實行軍管的決定》，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2006 年第二版

到會並講話。³³ 1968年1月25日，市革會召開公檢法幹部大會，宣佈成立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對上海市公安局、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實行軍管。3月21日，市革會政法指揮部撤銷。同年6月，軍管會改為黨委，設常委會。軍管後的同年7月，公檢法機關被軍管會分成大班子、小班子，82%科室人員和警察集中大班子，參加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由小班子取代公檢法各業務部門。1969年5月22日，市公檢法軍管會又決定，將二千多名在大班子的公安局、公安分局的科室人員和警察下放工廠「戰高溫」。全市各級公安政法機關大多數領導幹部被揪鬥打倒。到1971年全市公安機關內部清隊、整黨、一打三反運動基本結束。運動中受到打擊迫害的公安幹警5355人，其中被迫害致死147人。³⁴

林彪事件後，王維國被認定是林彪集團骨幹而關押審查，駐上海空四軍受清查。空四軍所軍管的上海公、檢、法系統也被清查和清洗。1971年10月上旬，中共上海市委調派了288名幹部，以市委聯絡員名義，進駐市公檢法機關，成立上海市公檢法臨時領導小組，行使市公檢法軍管會職權，警備區的譚維鑄為主要負責人。11月15日，市公檢法臨時領導小組舉辦原市公檢法軍管會軍代表學習班，揭發批判原軍管會領導王維國等8人。翌年9月8日，學習班結束，軍代表調回部隊。11月，市公檢法領導小組成立，組長譚維鑄。1973年1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市公安局組織體制：市公安局設17個部、室、處(局)和公安學校。1974年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撤銷，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高、中級人民法院恢復建制。³⁵

33 《上海公安大事記》，上海市公安局檔案處 1999 年編。

34 《上海通志·公安司法卷》。而據另一個統計，整個文革中，公安系統被打成反革命者 457 人，傷害致死者 149 人。(這個數字引自上海市公安局 1980 年 12 月證明，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四》。

35 《上海公安志》，上海公安志編纂組編。

其間，根據謝富治的指示，上海曾經撤銷勞動教養：1968年5月3日，上海市革會批准，上海停止審批收容勞動教養人員；1968年5月13日，市公檢法軍管會宣佈撤銷勞動教養和少年犯教養工作。不過，1970年後，上海實行變相勞動教養：在全市的一批工廠先後設立六七十個「勞動學習班」，將一些紅色颱風中被關押的青少年投放到這些學習班，由專人看管，白天勞動，晚上集體關押在廠。1971年7月21日，市公檢法軍管會恢復勞動教養工作。

上體司治安組「打擊流氓阿飛」

毛澤東對公檢法的接管和批判是支持的。還是在1967年1月的奪權風中，首都北京的公安局被造反組織接管，毛澤東就表態支持。公安部長謝富治在一次講話中轉達了毛的支持態度：「全國大城市的公安機關都被接管了。他們做得對。這件事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支持的。昨天，毛主席講過，接管是不可避免的，主席他支持接管。」³⁶ 毛澤東提出「砸爛公檢法」，也是謝富治傳達的。謝富治在一次講話中說：「砸爛公、檢、法，毛主席當我的面講過沒有十次也有八次。」³⁷ 毛澤東早就對公檢法的不滿，但是如此以極端方式砸爛的結果，卻使社會治安一片混亂。於是以「群眾專政」補充公安機構的空缺，「群眾專政」也是毛澤東提出，在他1967年8月4日給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出，說「文革另一個主要問題是群眾專政」。³⁸ 毛澤東認為不實行群眾專政，走資派就會專群眾的政。而事實上，

36 謝富治 1967年1月17日對公安部幹部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7 謝富治 1967年8月7日在公安部門爭羅瑞卿大會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8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1012頁。不過，最早提出「群眾專政」的是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

群眾專政的口號提出後，更多的是摒棄司法公安機構，群眾直接參與社會治安。這方面上海最典型的例子，是上體司的治安組以及「文攻武衛」發動的「颯紅色颯風」。

「上體司」全稱「上海市體育戰線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於1966年11月27日，是上海人民公社發起組織，主要負責人胡永年。³⁹

上體司的「治安」可以說是1966年「紅八月」的延續。上海市委被北京紅衛兵衝擊以後的10月，原來在江灣體育場的市足球隊、體操隊的運動員，即搬到南京西路上150號的市體委大樓，他們造反成立上體司後，辦公機構也設在體委大樓。一些人上街攔截「奇裝異服」，剪頭髮、剪衣服；「打擊流氓阿飛」，其實許多都是談戀愛的男女，拖進體委大樓毆打。不久，上體司又專門成立了打擊流氓阿飛小組。1967年初，上海各級政府機構癱瘓，公安機構沒了權威，工廠沒人管，許多人不去上班，成天混在街頭，社會治安很亂。2月中旬，張春橋在展覽館咖啡廳召開的一次市革會全體委員會上，講到上海的社會治安問題時，說：「市公安局已經癱瘓了，上海的流氓阿飛等很猖狂，沒有人管，我們的群眾組織應該自己把他管起來，上體司可以做這件事。」⁴⁰ 胡永年參加了這次會議，回去後，立即召開上體司常委會傳達。2月14日，「上體司治安組」正式成立，組長樓駿。後來還在十個區也成立「治安組」。

張春橋為什麼想到讓上體司維持社會治安？是否因為毛澤東對上體司的好評？幾天後，1967年的2月26日，《人民日報》轉載上體司所屬「魯迅兵團東方紅戰鬥隊」的一張大字報：《我們魯迅兵團向何處去？》，還同時刊登了上體司機關報

39 胡永年，文革前是足球運動員。文革中是造反派組織上體司負責人，任市革會委員、上海市體育運動委員會革委會主任。文革結束後被判無期徒刑，後被保釋。2014年病逝於上海。

40 轉引自《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490頁。

《體育戰報》上的一篇文章《為「東方紅」小將的一張大字報叫好》。這兩篇文章都是談造反派自身整頓的。毛澤東看到後說好，讓人民日報轉載。毛澤東對魯迅兵團的稱讚，大大提升了上體司的地位。

「流氓阿飛」在文革前就是個很寬泛的概念，沒有法律界定。尤其在破四舊後，外延更是擴大。舉凡穿着超出文革審美，男女談戀愛動作親熱如拉手、接吻，更不必說婚外性行為、街頭聚眾起哄，等等，都在流氓阿飛之列。將這樣一個界限模糊的打擊對象，交給一個群眾組織，後果可想而知。上體司治安組成立後，抓人不需法律手續，關人沒有時間限定，只要看不順眼就可以隨意關押，刑訊逼供。

上體司治安組有人甚至以打人取樂。刑訊逼供的方式，有以頭撞牆，拳擊腹部，凌空飛腳，摔背包，皮鞭木棍抽打，大頭針刺，煙頭燙，吊打等等。人被打昏後，涼水澆醒繼續再打。那些日子裏，體委大樓附近里弄的居民，徹夜聽到打人者的呵斥聲，以及被打者的慘叫聲，直到天亮，幾乎天天如此。有些人被抓到體委大樓挨打後莫名死去，海燕電影製片廠青年女演員鄭梅平，因一個男性在她家，她工作單位上藝司的造反派，說他們「搞男女關係」，送去上體司。鄭梅平被審訊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跳樓自殺。市六醫院骨科醫生、上海市副市長宋日昌之子宋嵐，市體育俱樂部電話接線員單靜，也都是被上體司治安組抓去後死亡。⁴¹

胡永年還讓人設計了一張通知書，被通知者必須按時往上體司報到：

現我上體司治安組根據革命群眾要求和部分已交代的口供，認為有必要責令你來我處進行當面談話、核實。如接

41 《文匯報》1980年10月5日《判處胡永年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信後不來我處而經核對確實的，將採取一切革命行動，切莫後悔莫及，為此請慎重思考選擇之。⁴²

曾經有接到通知不予理睬的，但後來都被抓去毆打。被抓去的人，還被強制先填一張所謂《社會渣滓登記表》。文革後對上體司所抓人數的統計，就來自這個表格。

上體司治安組及其下屬的各治安組，組織巡邏隊、小分隊，日夜巡邏於戲院、公園、里弄，將他們認為是流氓阿飛者抓去拷打。長寧區凱旋飲食店青年女藝徒項梅林，同一個男青年在中山西路學騎自行車，治安組說他們兩人有流氓阿飛活動，抓進去嚴刑拷打，項梅林不堪忍受折磨、污辱，跳樓遇救未死，但終身殘廢。⁴³ 和平飯店一名職工，被治安組的樓駿派人抓去，壓在運動墊子上，幾個打手輪番拳打腳踢，打得他口吐白沫，送醫院搶救，遍體鱗傷，落下嚴重傷殘。⁴⁴ 如有被抓女性不承認被指控罪名，他們甚至還要作「生理檢查」。⁴⁵

上體司治安組在其存在的一年半中，究竟抓了多少無辜，打了多少人，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僅從不完全的上體司自己制作的《社會渣滓登記表》統計，從其成立的1967年2月14日起，到1967年年底，抓人827名，刑訊毆打折磨致死3人，致殘24人。十個區的治安組和上體司直屬單位治安組所抓人員中，僅1967年3月至9月的不完全統計有363名；外加上體司直屬龍吳地區治安組、青少年體校文保組，以及風雨操場治安組，三處抓人170名。被十區和直屬治安組所抓人員中，活活打死2人，迫害致死2人，致殘5人。⁴⁶ 被上體司及所屬治安組打死和逼死

42 轉引自《文匯報》1980年10月5日《「憲兵司令」受審記》

43 同上。

44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495頁。

45 《文匯報》1980年10月5日《「憲兵司令」受審記》

46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494頁。

的人中，有3人的屍體是在上體司辦公大樓門前或與旁邊相鄰的國際飯店夾弄裏被發覺的，他們是演員鄭梅平、青雲中學幹部苗延富、閘北區新路菜場職工方欽國。

上海市民對上體司暴力治安十分不滿，稱上體司的有些成員自己就像流氓。向市革會和各公安分局的控告不斷。1967年9月8日，方欽國的屍體被發現後，上體司治安祖統一口徑，說方是自己逃跑失足摔死的。事發後家屬要求查明死因，方所工作的菜場職工輿論嘩然，要求懲治兇手。市革會裏也有許多幹部反對上體司治安組，提出應該解散這樣草菅人命屢屢打人致死的組織。10月19日市革會召集市革會政法指揮部、各區公安分局開會，上體司治安組負責人和各區治安組頭頭也到會。討論上體司治安組撤銷事宜。但上體司治安組頭頭堅決反對，說他們治安組是張春橋授權的，又拖了一年。第二年的1968年9月，在康平路辦公室的一次會議上，再一次提出撤銷問題，胡永年仍不同意。但會上張春橋一定要他們撤銷，說：「你們好事不要做過頭，好事做過頭要變壞事的，可以結束了。」⁴⁷ 上體司治安組這才終於解散。

文攻武衛指揮部颳「紅色颱風」

1967年8.4砸聯司之後的8月26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成立了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籌備小組，確定在已經實現大聯合的工廠，籌建文攻武衛組織的試點。上海的文攻武衛機構就此建立，以後又逐步擴大。⁴⁸ 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成立後，首要任務就是維持社會治安。張春橋後來對此解釋說：「主要不讓軍隊和群眾對立起來。三支兩軍去處理問題，總有

47 轉引自《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502頁。

48 關於文攻武衛的建立的詳細過程，將在後面的專門章節敘述。

一天會引起群眾不滿，人家打你，不能還手。」⁴⁹

從1967年底起，上海出動大批人員，在全市統一行動，颳紅色颱風。所謂「紅色颱風」，當時的解釋是「政治大掃除，是對階級敵人進行襲擊的一種革命行動，按照市委統一部署，協同公安部門集中行動互相出擊，全市先後組織了卅多次。每次參加的民兵少則幾千，多則幾萬、十幾萬，對全市各個角落，特別是壞人容易躲藏和避風的地方，依靠群眾大檢查，大清理。」⁵⁰於是，繼上體司之後，文攻武衛成為又一個「維持社會秩序」的群眾組織。

文攻武衛和公安局的職能不同：公安局抓的是觸犯刑法者，例如殺人犯搶劫犯等；文攻武衛抓的是算不上犯法，但有着「流氓阿飛」行為擾亂社會秩序者，這也是當初上體司的治安內容。但是，一則對所謂的流氓阿飛沒有嚴格的界定，全憑個人感覺；二則一些人對「生活問題」和「男女問題」特別敏感，加上被文革放大的禁欲主義，於是憑感覺抓流氓，將許多正在談戀愛的男女青年作為流氓，傷害了許多無辜。這樣擾民、恐民的行動，遠遠背離了維護社會安全的初衷。文革後，文攻武衛當時的負責人張寶林回憶這段往事時承認：「那時的打擊扒竊、打擊流氓行為有擴大化傾向。這和當時整個社會的思想禁錮狀況分不開，也和文攻武衛隊員的素質有很大關係。」⁵¹

第一次颳紅色颱風是在1967年12月25日，出動了五千餘人，一下子抓了2163人。以後，這樣大規模的聯合行動成為文攻武衛的特徵，每隔一段時間尤其逢年過節都要「颳」一次，對當時混亂的社會治安起到威懾作用。但無需任何法律手續就可以隨便打人抓人關人，一定會傷及無辜。1968年，颳過三次

49 張春橋在1974年9月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召開的民兵組訓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年12月第17期，上海警備區民兵鬥爭史資料組編。

50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調查組1973年9月《上海城市民兵調查》。

51 筆者2010年10月22日對張寶林的訪談。

「紅色颱風」，出動近5萬人次，共抓3201人。1969年，市革會又成立市維護革命新秩序辦公室(簡稱「維辦」)，以文攻武衛為主與市公檢法軍管會以及市革會有關組辦組成。於是由「維辦」出面，組織了更多的颳紅色颱風行動，先後10次，共抓6743人；其中，2月的一次行動從2月4日延續到2月15日，出動28萬人次；7月的行動從7月下旬一直延續到9月底，連續組織了9次行動。⁵² 此外，1968年夏季，王少庸認為外灘海員俱樂部圍觀外國海員的人太多，當時國門緊閉，來滬外國人少，市民像看稀罕一樣圍觀外國人。文攻武衛指揮部組織了一次行動，突然包圍，將所有看熱鬧的人抓起來，以卡車集中到交大的空教室，逐一登記後，大部分訓斥一頓後釋放。少數「態度不好」者被關兩天兩夜才放。⁵³

以下的表格是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1969年7-9月行動記錄：⁵⁴

行動時間	行動名稱	行動人數	抓人數
7月23日	颳「颱風」	14600	663
7月29日	搜查公園、車站、碼頭	12000	511
8月29日	水上大搜查	30000	60
9月1日	颳「颱風」	6600	994
9月2日	搜查旅館	29000	141
9月3日	搜查公園、空房	20000	185
9月16日	整頓交通	27000	未記載
9月20日-23日	打擊投機倒把	未記載	848
9月26日	颳「颱風」	未記載	40
合計		14萬餘人次	3442

52 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組 1980年12月編《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第16期。

53 張寶林 1978年2月6日，載於《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行之四》中的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年2月編。

54 《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1年1月第22期，上海警備區民兵鬥爭史資料組編。

這種集中人力集中時間的大規模突擊行動，是1949年後各類大規模戰役式、運動式、速決式打擊的延續，以嚴厲的手段和震撼的統計數字顯示威懾力。對穩定社會秩序起着很大作用。但是，這樣的穩定，卻是以許多人的冤枉或處罰過頭為代價的。這些行動沒有相應的統一標準，沒有正常的法律約束，全憑參加行動人員的個人感覺，無需充分取證，勢必擴大打擊面，造成假案錯案，輕罪重打甚至濫抓無辜。據統計，文攻武衛指揮部以及後來改名的市民兵指揮部，在上海十區和十縣，歷年共抓人10萬以上，人次10.4295萬。而上海當時人口數字是一千萬不到。⁵⁵

文攻武衛還有自己的查詢證，可以不經其他機構審批就自行抓人；後來還設立審理組，自行審理被抓者，審理後不通過公安部門，直接要法院按照他們的審理結果判刑。甚至自設監房，除了市區兩級指揮部有專門的監房共11處，許多工廠的倉庫、地下室、防空洞也成為關人的牢房。⁵⁶ 在這些牢房裏，刑訊逼供、毒打「犯人」之事時有發生。上海縣文攻武衛指揮部就曾因此打死1人，2人不堪忍受自殺。

游雪濤的第二情報機構

文革中公安機構癱瘓，原由公安機構或其他有關部門行使的監督和掌控社會動態的職能，被市革會的一些機構甚至一些非正式機構代行。這方面最突出的是游雪濤⁵⁷和他的辦事機構。

游雪濤文革前是團市委的《青年報》記者。他在各路造

55 《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行之四》中的《關押人數》統計。這個統計沒有說明是哪些年的統計。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年2月編。

56 同上。

57 游雪濤，男，1935年生，中共黨員。文革前是團市委《青年報》記者，文革中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群運組副組長，文革後被判刑14年。

反派組織中都有熟人，經常聚在一起談論各種社會動態和運動情況。游雪濤文革前就經常撰寫只供領導看的「簡報」、「內參」之類，他認為這些文革信息很有價值，也可編成「簡報」之類的信息匯集，供市革會領導參考。便和原團市委辦公室副主任夏運開、紅三司負責人譚啟泰等，將搜集來的情況包括小報上的信息寫成文字。此時正值1967年上海1.28炮打張春橋前夕，游雪濤覺察出正在聚集的反張情緒，1月27日寫出《關於上海出現一股反張春橋同志的逆流的情況》，署名「掃雷縱隊」。以此為第一期，接着又連出幾期，都是關於炮打張春橋情況的，包括北京來滬紅衛兵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生宿舍抨擊張春橋的言論。通過徐景賢送張春橋，張很感興趣。

此時的「掃雷縱隊」類似群眾組織，但又很鬆散，沒有固定成員。徐景賢將原來機關聯絡站在興國路上佔領的一處資本家房子，給游雪濤作辦公處。於是興國路成為各路人馬向游雪濤提供信息的集中地。《掃雷情況》出了兩個多月後，1967年3月，中央號召歸口大聯合，游雪濤被所在工作單位青年報社選為報社的革命委員會委員，他於是回報社，《掃雷情況》停止編印，掃雷縱隊無形解散。

幾天後，徐景賢打電話給游雪濤，要他去市革會群運組工作。群運組組長是謝宗範。游雪濤擔任群運組副組長，負責群運組的簡報。游雪濤去後的第一個調查是對郭仁傑的，因為郭仁傑想重振因1.28炮打而式微的紅革會。但謝宗範認為郭仁傑是機關聯絡站的人，徐景賢的手下，不同意調查郭仁傑。游雪濤與謝宗範關係相處不好。王承龍便要游雪濤去他的市革會辦公室，說打算在市革會辦公室也設一個群運組。王承龍還將永福路上的原市委招待所給游雪濤作活動場所。

但市革會辦公室的群運組最終沒有成立，因為此時正值王承龍與徐景賢爭權，徐景賢說市革會已有的組室，為什麼辦公室還要再重複設立，這是在搞第二市革會。於是游雪濤的這

個機構沒有正式身份。說是市革會的工作機構，對外卻沒有名稱，工作任務也不由市革會直接佈置；說是群眾組織，一切活動的物質和資金，卻都由市革會辦公室承擔，而且有些調查來自張春橋和徐景賢的佈置。由於永福路辦公處的門牌號碼是244，於是被稱為「244」，也被稱為「游雪濤那裏」。組織形式還是如掃雷縱隊時期，十分鬆散，人員流動性很大。除了游雪濤和吳錫敏二人，加上一個打字員、一個司機，沒有固定成員。需要調查哪方面的情況，就去找那裏的熟人。直到文革結束清查時，這個機構才被清查機構追稱為「游雪濤小組」，算是有了個正式名稱。所出資料最初定名為《群運動態》。但第一期出後，王少庸說，既然這個機構不屬市革會群運組，那還是將前面的「群運」二字拿掉，就叫《動態》。

游雪濤調查的事情和領域有：1.28炮打情況、郭仁傑與紅革會動態、第二軍醫大學兩派組織「紅縱」和「紅旗」的情況、上海警備區情況、華東局機關幹部情況、工總司的「雙造司」事件、上海鍋爐廠「東方論壇」情況、「共向東」情況、「4.12炮打」情況、「中串會」情況、復旦大學「反復辟學會」情況、浙江造反派組織「紅暴」情況、支聯站情況、北京大學「3人小組」、葉劍英來上海行蹤、「老串會」情況，等等，有好幾十例。至於4.12炮打，游雪濤在之前，即預言軍方將有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動作，寫成簡報，只送張春橋。但被張春橋批評，讓秘書何秀文打電話去要他燒掉底稿，說這樣會影響與軍隊的關係。日後果然發生4.12炮打事件。張春橋又讓王承龍帶話：「這次炮打，你是很早預見了，我沒有你敏感。」⁵⁸

游雪濤搜集的情況中，也有許多文革的負面，例如「紅海洋」，⁵⁹ 例如「早請示，晚匯報」、「天天讀」，例如毛澤東

58 筆者 2014 年 9 月 13 日對游雪濤的訪談。

59 「紅海洋」是文革初期對毛澤東崇拜的一種形式，即將城市主要街道沿街的建築，都刷上毛澤東語錄，或塗上紅顏色。

像章交換，例如群眾組織之間的派仗，等等。

許多案子，張春橋都知道，甚至本身就是張春橋交辦的，或者是張春橋妻子文靜聯繫的；一些人的關押，也經張春橋、王少庸等同意。這些文字張春橋都看過，並在好幾十件文字上親筆批示。⁶⁰ 例如「老串會」，1967年秋張春橋讓人帶給游雪濤十張照片並帶話，要他調查江蘇省委10個廳局幹部來上海的活動情況，說這些江蘇幹部組織了個「老串會」（「老人串聯會」）。游雪濤立即讓在滬寧沿線各城市有親友者去摸情況，編寫《動態》，上報張春橋。張春橋閱後，親自找游雪濤詢問：「能不能了解一下，他們是怎麼住進上海的某大飯店去的？通過什麼關係？哪些人來和陳丕顯聯繫過？他們跟上海軍隊裏面誰有聯繫？」幾天後，游雪濤即上報又一份《動態》：《陳丕顯在磨刀——我們對蘇南一支反革命地下武裝的調查看法》，說在整個長江以南存在着一支以各種名義出現的反革命地下武裝，這支地下武裝上受10人指揮部即「老人串聯會」領導，下同上海紅衛軍勾結，而後台則可能是陳丕顯。⁶¹ 對如此荒唐的捕風捉影，張春橋批示，要求與江蘇省革會聯繫，並要游雪濤「集中精力，爭取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徹底弄清楚這一支反革命地下力量在上海的上下左右的聯繫。」⁶² 這一案子，在上海涉及上海港務局黨委書記、海洋漁業公司黨委書記，以及上海戲曲學校的一些幹部。而復旦大學的「反復辟學會」案，日後成為清查「5.16」運動時的10個大案之一，株連甚廣，不少人被關押多年。

張春橋交辦此類案子時，都會給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張

60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486頁。

61 同上，第482頁。

62 轉引自游雪濤 1980年9月12日交代，載於《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年2月編。

春橋曾經讓游雪濤去了解公安部門在什麼情況下安裝監聽器。張春橋對游雪濤說的理由是：「主席經常來上海，如果被安裝竊聽，那豈不成了我的責任？這可怎麼了得！」⁶³ 又如一次張春橋將游雪濤找去說，聽戲劇學院有人反映說葉劍英最近來過上海，還找過兩個演員。這事到底有沒有？按理說中央領導來了，要事先和市革會打招呼，我們好做保衛工作。你是否向文藝界打聽一下。⁶⁴ 張春橋的理由似乎十分正當，是為了對葉劍英的保護。游雪濤立即派人分八路出動，還找到那兩個演員，設法套出葉劍英當時和她們的談話，然後報張春橋。張春橋似乎只是為了葉劍英的安全，讓游雪濤調查一下葉劍英是否來過上海。但當游雪濤興師動眾地將葉劍英的行蹤和言談都調查來，張春橋沒有半點阻止，還評論說：看來葉劍英就是喜歡找老人馬。

再如上海警備區司情況。當時警備區一些軍內造反派，希望為文革初期因反廖政國而受壓制之事平反，通過夏運開找到游雪濤，要求轉張春橋。張春橋此時剛擔任南京軍區政委和上海警備區政委，聽了游雪濤匯報後說：名義上我是警備區政委，實際上他們從不向我匯報情況。他要游雪濤設法了解情況，還要游雪濤以他張春橋的名義，向交大「紅尖兵」索取他們搜集的關於警備區材料。⁶⁵ 游雪濤即讓警備區的軍內造反派整理匯編出資料：《警司材料摘編》、《關於上海警備區大搞資反路線的情況》、《上海警備區目前運動的情況點滴》，加上搜集警備區黨委會議文件、廖政國在軍內的講話、警備區14名軍以上幹部對文革的態度等，還有游雪濤讓人整理的談話記

63 筆者 2014 年 9 月 13 日對游雪濤的訪談。

64 同上。

65 游雪濤 1980 年 9 月 12 日交代，載於《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

錄，共20多份資料，一並轉交張春橋。⁶⁶張春橋每份必看，非常重視，在材料上做過不少批示，還根據這些材料當面質問過廖政國。

游雪濤的機構掛在市革會辦公室下，但又沒有正式名義，而在這一時期，

市革會張春橋和等人向我交辦的調查任務卻五花八門，一件接着一件，弄得這裏的人既要工作，又沒有一個進行這些工作的名義和身份，許多人為了完成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和市革會交辦的任務，都不得不仍用他們原來所在的單位和組織甚至自己個人的名義在進行，成了一個很特殊的機構，這正是張春橋所需要的。⁶⁷

這些沒有正式名義和身份的人員，使用的許多調查手段是非常規的：跟蹤盯梢，打探臥底，拉出來，打進去，甚至綁架扣押，這也是當時許多群眾組織派性內鬥的手法。游雪濤知道，如果作為正式機構，這樣的行動不合常規，所以他自稱是「在一條特殊戰線上戰鬥了一年又兩個月」，並說自己「為無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上海的戰鬥指揮機構提供了大約一百萬字以上的各種情況反映和調查報告。」⁶⁸游雪濤游走在正式機構和非正式機構的邊緣，游走在正常的情況匯報和非正常的情報打探之間。但正因為沒有市革會工作機構的正式身份，日後市革會不必為這個機構所作的事情承擔責任。這是游雪濤以後才悟出的「這正是張春橋所需要的」。

這其實就是第二情報系統。張春橋看樣子是希望手裏有

66 筆者 2014 年 9 月 13 日對游雪濤的訪談。

67 游雪濤 1980 年 9 月 12 日交代，載於《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

68 游雪濤《一年工作總結》，同上。

一支能為自己所用的情報機構。文革前，這樣的機構是由特殊部門掌控的，甚至上海市委都不一定完全了解其工作對象和內容。張春橋明白有些領域不是他應該涉及的，例如軍隊，這從他有些講話可以看出。張春橋知道自己讓游雪濤做的有些調查，嚴重違反中共的行事規則，這從他對游雪濤調查的評論可以看出：

有點像是一個情報系統的組織，做的是類似內務部的工作，在一個非常時期是必要的，長此以往可不行，人家攻起來，說張春橋在上海搞了一個特務組織，可不得了。⁶⁹

張春橋既想擁有自己的情報系統，又不願承擔責任。而不知深淺的游雪濤，以能被張春橋賞識而榮幸，十分起勁賣力，最後陷自己於囹圄。

至於《簡報》、《情況匯編》之類，文革前的市委和各市級機構、報社都有編寫，向上反映認為應該引起重視的社會動態。文革中市革會各部門也都有編寫，匯報自己所轄系統發生的情況。但與情報搜集不同的是，編寫此類簡報需經同級黨政同意，而且內容一般只限於自己管轄領域。即使是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組派往各地的聯絡員，收集情報也是中央文革小組授權。而游雪濤的簡報有所不同，不但搜集社會動態，而且系統地搜集上級領導人或軍隊的動態，越級越域越規，是其他簡報之類從未有過的。搜集手法也是秘密行動，被搜集情況的單位的黨政毫不知曉。這種沒有更高級機構授權的秘密調查行為，違反共產黨的組織原則，甚至徐景賢都感到危險。朱永嘉也曾勸告徐景賢少與游雪濤接觸，說他的行動類似東廠，當心惹出事情。

69 游雪濤筆記，1967年3月29日《徐景賢來電談掃雷組織問題》。載於《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1981年2月編。

文革中此類搜集情況者，不止游雪濤。市革會寫作組也有類似行為。例如朱維錚和姚漢榮搜集中串會的資料，也是系統性的。跟蹤中串會成員，利用與中串會成員關係接近者，打探消息，騙取資料，等等。硬將中串會的活動與華東局聯繫起來，因為中串會去過華東局。不過寫作組的調查是對下的，不涉及市革會，更不涉及警備區和其他駐滬部隊。而張春橋和徐景賢，明知游雪濤的調查已超出一般調查範圍，卻不但不反對，還不斷佈置題目。張春橋在游雪濤上報的多份《動態》上有批示。徐景賢則對游雪濤的《華東局機關「黑線人物關係」圖》⁷⁰ 很讚賞，批示：我們上報的情況不要老是零零碎碎，是否過一段時間也能有這樣系統深入的材料。⁷¹

游雪濤的調查引起許多人警惕，包括王洪文，還包括警備區和空四軍，尤其空四軍王維國負責的公檢法系統，有自己的情報系統，反過來收集了大量游雪濤的活動情況。此時正值林彪與張春橋、江青裂痕擴大。游雪濤的行動，非常有可能被張春橋的對手指為插手軍隊。張春橋也覺得不能再任游雪濤調查。徐景賢建議解散游雪濤的機構，將游雪濤調往市革會專案組。張春橋同意。1968年6月26日，市革會明確要求游雪濤解散機構。9月，游雪濤的機構正式解散。1971年，游雪濤被關進市民兵指揮部，隔離審查了整整3年。

小結

文革中的「群眾專政」和「大民主」相輔相成，都是革命的暴政。從1966年的「紅八月」，到1967年1968年的「群眾專政」，本來就已非常薄弱的法制，被「砸爛公檢法」的口號取消；加上本來應該維持社會秩序的公安人員也革命造反，社會

70 這份圖表是游雪濤手下的華東局機關幹部造反派作的。

71 筆者2014年9月13日對游雪濤的訪談。這段話是大意。

秩序混亂不可避免。而讓毫無法制觀念的底層群眾作為公安人員的替代，在沒有任何法律約束的情況下執法，後果必然導向暴政。

文革以「批判走資派」宣揚對幹部的權力監督。但實際上，除了運動最初期一些群眾向幹部提意見的大字報，對幹部權力的監督幾乎沒有進行。所謂的群眾專政，對象也不是「走資派」，而仍然是十七年的打擊對象。實際是借群眾的名義，繼續行使自上而下的專政。至於游雪濤的對象，雖然也有幹部，但也不是對幹部的權力監督，而只是張春橋、徐景賢對政治對手的調查。

不過比起外地，上海的「群眾專政」基本在市革會控制之下，除了上體司的治安組以及個別組織的「群眾專政組」（例如工總司普陀區聯絡站在滬西工人俱樂部的「群眾專政組」）。上海市革會1967年3月就建立了政法指揮部，以後的文攻武衛指揮部也是在市革會的領導之下，這使得上海死亡的人數低於外地；當然，濫抓無辜、無證關押的現象同樣存在。

第二十九章

十萬工宣隊員進駐「上層建築」

工人階級領導一切

128名「工代表」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召開後，工人造反派成為工廠文革的代表，他們也認為自己是上海工人階級中的革命派。但是1968年7月，張春橋忽然要求向上海市級機關派工人代表。他從北京回上海。在康平路辦公室，向市革會佈置了一項緊急任務，要求挑選140至150名工人，到市一級的機關和部門工作。張春橋說這是去改造舊機關。¹由於張春橋催得緊，第二天便由市革會工交組負責人黃濤主持會議，向各局革委會傳達並分配任務，限四天內向市革會上報名單。各局馬上要所屬專業公司革委會在兩天內上報名單，公司又馬上要所屬工廠立即在一天內上報名單和材料。選送的條件要求是「造反早」，「造反表現好」。由於時間太緊迫，最後只定下128名，後來被稱為「128名工代表」。這128人絕大多數來自工業系統，以第一機電局和紡織工業局所屬工廠最多。

從推薦的表格顯示，128人具體情況如下：男94人，女34人；公司革委會常委或工總司公司聯絡站常委9人，工廠裏的普通造反隊員25人，其餘大部為車間或工廠級的革委會或造反隊的委員；「一月革命前後殺出來的老造反」80人，老保

1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574頁。

7人。² 128人中，黨團員比例特別高：文革前的中共黨員87人，共青團員6人，非黨團員35人；文革前擔任黨支部書記或黨支部委員、工會主席、生產組長、團支部書記等基層幹部的61人，普通工人67人。

128個「工代表」人員集中後，由市革會組織組負責人金祖敏負責，在原市委黨校辦了兩周學習班。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賢等接見全體人員。張春橋說：「把你們選上來，你們就要大膽幹，要把舊機關老爺們的作風沖掉，搞出成績是你們的，搞錯了我負責」；「你們是真正的工人代表，是要派到市革會各組、辦和區、縣、局去參加領導工作的」。³

張春橋為什麼突然提出要選送工人代表去「佔領上層建築」？而在之前，他對工人造反派的評價似乎並不高。他的一次講話很能說明他那時對工人造反派不放心的真實思想：

上海工人運動這麼蓬蓬勃勃，作為一個集體的力量，工人造反派是非常厲害的。但是，真正政治水平比較高，工作能力比較強的領袖人物，還沒有。如何幫助他們提高政治思想水平，這是關係能不能培養出接班人的大問題。非常重要。⁴

張春橋的改變，是否因為他了解到毛澤東打算以工人替代紅衛兵的態度，所以馬上在上海選派工代表，想在上海首先創造經驗？待考。不過，就在上海派出工代表的幾天後，7月26日，毛澤東向北京的清華大學等派出工宣隊。張春橋只想到派一些工人去「上層建築」擔任領導，毛澤東卻是派出大批工人去制約學生。

2 筆者根據「工總司」1968年對128名工代表的情況登記表統計。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3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574頁。

4 張春橋1967年4月14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版。

工代表的分配去向，是市革會的組織、政宣、工交、財貿、教衛、科技、外事、材料、郊區等9個組室，以及各區革委會，市直屬機關聯絡站。基本上是一個機構去4至5人；市革會材料組分去得較多，有11人；工總司總部也被分去5人，⁵其中1人是後來擔任上海市婦聯主任的汪湘君。⁶張春橋要求凡被分配去工代表的單位，要組織熱烈歡迎。於是，有些單位敲鑼打鼓、高呼口號，夾道迎接前往的工代表。這些工代表絕大多數都受到重用，被安排進市革會各組辦各區革委會的核心，擔任負責人。進工總司總部的5人，3人不久去了市革會科技組和財貿組的工宣隊，1人回廠，只有汪湘君留下。此時，工總司總部，也因人員都被抽調去各組辦工宣隊，只剩葉昌明一人看家。汪湘君成為工總司總部組織組負責人，葉昌明也將她看作工總司主持工作的第二負責人，雖然她在工總司連委員都不是。1973年五屆工代會，汪湘君成為工代會常委。

這128人的選調，不是由工總司經手；而是市革委會佈置，由各局革委會執行。因此，儘管從報送上來的表格顯示，這些人大多是老造反。但其實，除了在公司革委會或工總司聯絡站的幾個人文革初期表現比較積極外，其餘的人雖然是造反派，但一般活動範圍只在本廠，不參加社會上反上海市委的那些事件。例如汪湘君，上海停經片廠的女工，1966年8月就貼工廠領導的大字報，而且是廠裏的第一張大字報，可算是「老造反」。但她之後就沒有再寫大字報，也沒有參加工總司成立大會和安亭事件，更沒有參加上海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的事件。廠裏後來成立造反隊，她也並非隊長。而且她廠裏的造反隊也不參加市裏的活動，只在廠裏「抓革命、促生產」，工廠

5 筆者根據1969年各局上報「工總司」的名單材料統計。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6 汪湘君，女，1938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畢業。文革前是上海紡織機械配件廠女工（文革中調上海停經片廠），共青團員，廠工會婦女委員；曾被評為三八紅旗手。1968年被作為「工人代表」派駐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1973年上海市第六次婦女代表大會召開，任上海市婦聯主任。

的生產一直完成得比較好，在公司有點名氣。後來廠裏成立廠革會，她被選為委員。可以說，汪湘君是比較平和的老造反。其他許多工代表也是這樣，之所以被挑選上，正是因為他們在文革中比較平和的政治表現，以及文革前被主流政治認可的表現。金祖敏曾經對汪湘君說過，當時挑選工代表時，要求中有「文革前表現」一條，最好是黨團員、積極分子、勞模先進人物、三八紅旗手，再加上文革中「路線覺悟高」；金祖敏還說，最好就是這樣的，只要具備這樣的條件，一定挑選上。⁷汪湘君文革前就曾經被評上過三八紅旗手。

所以，工總司的一些老造反對他們並不認同，認為他們不是真正的老造反。造上海市委反時，既沒有聽說過他們，也不認識他們，更不說和他們並肩造反過。工總司一些人對將他們作為工人代表很不理解；尤其對連工總司總部都被派進工代表很不理解。黃金海說：「怎麼，他們是『真正的工人代表』？那原來以群眾組織名義結合進革委會的工總司的人難道是假的工人代表？」⁸汪湘君剛去工總司總部時，就感到了這種情緒：

我進去，覺得工總司的人對我們有看法，像黃金海等人，不會對我們服貼的，總部星期六開碰頭學習會，他們會說些牢騷怪話，當然不是明當明地講。不過，他們講也不是沒有由頭，總有事情的。具體講些什麼，現在記不得了。我自己覺得，上面對工總司和王洪文不是十分相信的，所以要派我們這些人去了解他們的想法。

據我知道，派去市級機關的那些工代表也沒有太平過，那裏對他們橫有意見，豎有意見，徐景賢他們也不服貼那些派去的工代表。⁹

7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11 年 3 月 6 日對汪湘君的訪談。

8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575 頁。

9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11 年 3 月 6 日對汪湘君的訪談。

不過後來工總司總部的造反派們還是接受了汪湘君。她以後成為上海市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的常委，作為總工會核心人物的每周碰頭會，她自然都參加。

這128人，到文革結束時，51人因各種原因先後回廠，仍在各機關的77人，大部分成為成為市革會各組辦所屬小組，或者區、縣、局革委會所屬組辦的負責人。一些人日後得到重用。汪湘君以後成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上海市婦聯主任。原上海柴油機廠工段指導員徐成虎，後來成為上海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原上海第七針織廠女工、廠革委會第一召集人蘇桂珍，後來成為中共徐匯區委副書記。¹⁰

上海最早的工宣隊

工人造反派的地位達到新的高度，是在毛澤東向北京的大學派駐工宣隊，以及提出「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之後。

1967年春季開始，全國各地武鬥日益升級，以後更是發展到倉庫、商店、汽車、火車甚至銀行被搶劫的混亂局面。甚至軍隊也頻頻遭到襲擊，軍械被搶。中央一再發通知、通令，都無濟於事。到1968年夏季，一年多時間，武鬥不但沒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而且發展到動用槍炮等武器的準內戰規模。群眾運動已經走進自我異化的死胡同，成為社會動亂的痼疾，毛澤東必須遏制和結束這場內戰。1968年7月3日，毛澤東簽署批發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制止廣西壯族自治區武鬥的《佈告》，7月24日再次簽署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制止陝西省武鬥的《佈告》。這兩個佈告措辭嚴厲，顯示毛澤東不能再容忍武鬥繼續。接着，7月26日北京市60多個工廠三萬多名工人，組成「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京各大專院校，阻止大學

10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575頁。

內的武鬥。7月27日，毛澤東又派出由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組織的、數萬名工人組成的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

在毛澤東往北京的大學派出工宣隊解決大學武鬥狀況之前，上海已經着手解決一些單位長期不斷的武鬥。還是在1968年2月中旬，工總司舉辦第六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參加者為國棉二十四廠、上海絲織三廠、614廠、7315廠等等，共28個單位，據當時《工人造反報》報道：都是「長期『內戰』，武鬥嚴重而聞名於全市的老、大、難單位，兩派頭頭勢不兩立，互相咬定對方是老保、反革命，多次打傷很多階級兄弟、姐妹」。¹¹文中所提的所謂「老大難單位」，即「時間長、問題大、難解決」，且內戰不休、武鬥不斷的工廠和單位。

1968年4月下旬，工總司向73個單位(包括5個公司、2個區、2個縣、6個局)；派去由約300人組成的58個調查小組。這73個單位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老大難單位。¹²這項工作由戴立清負責，機構名稱就叫「解決老大難單位辦公室」，最初屬工總司分管，專門解決工業交通系統的老大難單位。7月24日，中央關於制止武鬥和搶劫軍械的7.3、7.24佈告下達後，上海市革會即召開擴大會議，要求各群眾組織貫徹執行。工總司總部在市革會擴大會議之後連夜召開全體委員會議，佈置貫徹中央文件。同時決定，「在總部工作的全部常委、委員，帶領工作人員組成12個宣傳隊，集中三天時間，深入到梅林食品廠、國棉二十二廠、大隆機器廠、新滬鋼鐵廠等12個老大難單位宣傳7.3佈告。」¹³第二天，宣傳組就下了工廠。

工總司總部派宣傳隊進駐首批老大難單位的兩天後，北京

11 《從端正學風入手，狠抓階級教育，做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工總司第六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解決「老大難」單位的幾點經驗》，載於《工人造反報》1968年3月3日。

12 工總司《簡報》1968年4月28日第82期總第82期。

13 工總司《簡報》1968年7月26日第88期總第108期。

派工宣隊的消息傳到上海。7月28日，上海市革會成立工宣隊領導小組，由王洪文負責。當日，王洪文在市革會工交組召開會議，工總司的王秀珍、戴立清、黃金海、葉昌明、陳阿大等都參加。王洪文傳達張春橋關於貫徹7.24佈告的指示，並指示工宣隊由老大難辦公室負責派出，進駐老大難單位，促進大聯合，推進三結合。8月3日至4日，首批工宣隊進駐大隆機器廠、上海無線電四廠、101廠、國棉二十八廠、上海電扇廠，共10家工廠；後來進駐單位陸續增加到數百個。這樣的單位，當時市革會曾列出400多個，約佔全市工交、財貿、文教、衛生戰線主要單位的8%。¹⁴ 張春橋說「數字有保守，可能還要多」。¹⁵ 到8月中旬，老大難辦公室組織了400多個以工人為主體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共5800多人，進駐老大難單位；此外，幾天內還「集中地出動20多萬人，大張旗鼓地宣傳兩個佈告，在全市造成強大的輿論」，「宣傳佈告，發動群眾，揪出壞人，搞好班子，促進生產」。¹⁶ 8月以後市革會籌備成立市文攻武衛指揮部；8月5日之後，老大難辦公室也歸市革會領導，辦公室地點設在外灘中山東一路12號原市革會辦公處。8月14日，市革會將上海向老大難單位派工宣隊的做法，向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匯報，毛澤東批示：這個材料講得很具體，有說服力，建議轉發各地。」¹⁷

這時派出的工宣隊類似「救火」，主要解決一些工廠長期兩派對立，無法正常開展生產的亂局；工交系統還專門成立

14 這個數字引自1968年8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發《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落實兩個佈告解決四百多個「老大難」單位問題的情況報告》中發〔68〕133號。

15 張春橋1968年8月22日在上海市革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年版。

16 1968年8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發《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落實兩個佈告解決四百多個「老大難」單位問題的情況報告》，中發〔68〕133號。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7 同上。

了工業團部，負責各局的老大難單位。8月11日第155期《工人造反報》以頭版頭條發表社論《馬蜂窩就是要捅》，提出：在一些單位裏，「一小撮壞人篡奪了領導權，他們對外抵制，對內控制，對上封鎖，對下高壓，壓制群眾，打擊報復，實行白色恐怖，大搞武力統治」，「有些頭頭中了反動的多中心論的毒，資產階級派性十足。他們佔山為王，認友為敵，迷信實力底下出政權，大搞以我為中心」。姚文元將文章送毛澤東，毛澤東看後說「很好」，¹⁸ 文章馬上被《紅旗》雜誌第二期轉載。這篇文章顯示了工總司解決老大難的決心。但事實上，許多「馬蜂窩」裏的「馬蜂王」，本身就是工總司系統的老造反，在工總司總部或聯絡站有着人際背景。所謂「捅馬蜂窩」，也就是撤銷他們在革委會或造反隊的任職。但他們人還在原單位，影響還在，往往風頭一過，矛盾又起，有些單位因此長期不得安寧。到1969年年底，還有30多個單位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¹⁹

老大難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後來組成市革會的工宣隊三辦，進駐市革會科技組，但同時仍負責工交系統的老大難單位。先後派出工宣隊，進駐全市工交系統8個局、24個公司下屬的454個單位。不久，市革會向全市派出工宣隊時，又協助市革會工宣隊一辦、二辦和六辦，從工交系統調集工宣隊員，為120個工宣隊配備人員進駐大學、醫院等單位。1969年1月，市工宣隊各辦公室與相應對口的市革會各辦公室合署辦公，工宣隊三辦與科技組合署，工作重點轉向科技系統。工交系統的老大難單位逐步轉交給工業和交通系統各局自行解決處理。²⁰

18 姚文元 1974年1月17日下午對上海市總工會常委及部分委員會的講話。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19 這個數字是戴立清在他的 1993年完成的回憶錄中提及的。

20 戴立清 1993年《戴立清回憶錄》(未刊稿)。

市革會派出十萬工宣隊員

就在上海市革會向一些「老大難」單位派出工宣隊不久，1968年8月5日，毛澤東向「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贈送芒果；8月15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在《熱烈歡呼雲南省革委會成立》的社論中，公佈毛澤東的指示：「我國有七億人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也應當在鬥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覺悟。」8月25日，《紅旗》雜誌又發表社論，送審時的原標題為《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認真搞好鬥、批、改》。毛澤東審閱時，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並加上姚文元的署名。²¹ 文中再一次傳達毛澤東對於工人階級作用的批示：「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門、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工人宣傳隊要有步驟、有計劃地到大、中、小學去，到上層建築各個領域中去」，並強調「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當前一項偉大的歷史使命」。²² 姚文元的文章一出，整個工人階層為之振奮。作為工人階級參與文革的榜樣的上海工人造反派，更將此看作是毛澤東對他們的莫大信任和支持。

毛澤東關於「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話發佈第二天，8月16日，上海市革會就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派工宣隊事宜，

2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出版。

22 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載於1968年8月25日《紅旗》。

王少庸、徐景賢、黃濤等，王洪文以及工總司的王秀珍、陳阿大、戴立清、金祖敏等，都參加了會議。王少庸提出，市革會初步打算：由工總司負責，從工廠中抽調十萬名表現好的產業工人，老造反，有一定鬥爭經驗，進入除公檢法外的市革會各個部門和十個區。這天是星期五，王少庸要求下星期一也即8月19日首先調集骨幹。²³ 從各工廠抽調大批人員組織工宣隊的工作，由戴立清負責的老大難辦公室下面的工業團部統一佈置，要求各局革委會向各工廠調工人組織工宣隊。由王秀珍負責的文教系統工宣團也同時成立。近十萬工宣隊員的調人和組織工作進行了十天。8月22日，張春橋主持市革會擴大會議，決定工宣隊首先進駐上海26所大學。²⁴ 張春橋提出：「大、中、小學都要派，還有科研單位、社會科學、舊黨校、設計單位，總之有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都要派，都要去」，「先進大學、文藝單位」；對於工宣隊的領導問題，張春橋指示由市革會直接抓。²⁵ 自此，由工總司負責了幾天的工宣隊工作，改屬市革會領導。

姚文元文章發表的前一天，8月24日，上海戲劇學院和上海海運學院已經進駐了工宣隊。姚文元文章發表的當天，上海各大學師生都舉行集會和遊行慶祝。第二天，8月26日，一萬多名工宣隊員進駐復旦、交大、師大等20所高校。各路工宣隊一大早先集結在即將進駐的大學附近，然後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手裏舉着《毛主席語錄》，排成幾路縱隊，舉着工宣隊大旗，浩浩蕩蕩開進校園。²⁶ 大學師生們也以極大熱情歡迎工宣隊的到來。喧天的鑼鼓，熱烈的口號，還有醒目大標語：「歡迎你

23 1968年8月16日上海市革會擴大會議記錄。

24 1968年8月22日的《文匯報》報道。

25 張春橋1968年8月22日在上海市革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6 這個場面是當年進駐復旦大學的工宣隊長張扣發回憶的。金光耀、筆者、金大陸2009年5月17日對張扣發的訪談。

們，毛主席派來的親人」，「向工人階級學習，向工人階級致敬」。上海師範學院紅革會在校門口刷出的大標語更是熱情洋溢：「歡迎你們——安亭事件的老戰友，見了你們格外親」。8月27日，第三批工宣隊進駐二醫、外貿、科大鐵道等大學。至此，從15個工業局所屬250個企業抽調的1.1萬名工宣隊員和218名軍宣隊員，全部進駐市高教局、教育局和28所高校。²⁷ 對參與過炮打的大學，尤其復旦大學和上海師範學院，派出的工宣隊人數比例相當高。師院工宣隊與學生的比例幾乎是1：2，復旦是1：5。工宣隊的建制仿效軍隊：團、營、連、排、班。派駐的各大學以及各局、區、縣，設工宣團；派駐的大學或各局的下屬公司或大廠，設營部或連部；再以下設排或班。

9月5日至12日，3.1萬餘名工宣隊員，進入十個區的513所中學和1249所小學。每所中學最多100人，平均50人；小學原來按街道劃分有110個學區，平均每學區派去50人，共5700餘人。²⁸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機關，以及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進駐了500人。隨後的幾天，大批工宣隊員與軍宣隊一起，又源源不斷地陸續進駐醫療衛生、文化、出版、新聞、財貿以及科技系統。區級機關和街道以及郊縣，也各進駐數千人不等；到1969年3月，上海全市共派出工宣隊員九萬餘人，號稱十萬大軍。²⁹

緊接着到來的1968年國慶節，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邀請近萬名全國各省市工人和工宣隊代表去北京觀禮，上海去了700名，王洪文領隊。他們中有葉昌明、王腓利、王秀珍、汪湘君、張伯生等等，還有楊富珍。一大批觀禮代表被作為毛主席請去的客人，住進毛澤東所住的中南海，房間是中南海警衛人員特地

27 金大陸主編《上海青年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

28 《上海市革會1968年9月27日關於工宣隊進入中小學情況給毛澤東等的報告》。

29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578頁。

騰出來的。周恩來總理向工人代表問寒問暖，他的夫人鄧穎超還去代表們的住地為他們鋪床，鋪的床正是上海觀禮代表們的。³⁰ 10月1日，觀禮代表們在天安門觀禮台上觀看盛大遊行，晚上又上觀禮台看煙火。10月5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以及其他中央領導，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全體代表。10月6日，全體觀禮代表又應邀參加了為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巴盧庫舉行的盛大宴會。巴盧庫前一陣在中國訪問，這個宴會是為他送行的。幾乎所有的工人代表都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國家級宴會。一些上海工人將宴會上的蘋果等水果偷偷藏下一個，帶回廠與同事朋友分享。

工宣隊與市革會部門合署辦公

工宣隊進駐各單位後，9月，在市革會工宣隊領導小組下，以工宣隊「文教戰線辦公室」和「工交戰線辦公室」為基礎，擴大為工宣隊一、二、三、五、六辦公室，都屬市革會領導。工宣隊「一辦」分管大專院校、文化、電影以及出版系統，由王秀珍等負責；工宣隊「二辦」最初分管全市中小學和醫療衛生單位，由工總司張寶林負責；工宣隊「三辦」最初分管科技以及海運、港務、鐵路、物質、建工、交運、電力、房地等系統，由戴立清負責；工宣隊「五辦」分管郊區，由王明龍負責；工宣隊「六辦」分管財貿，由黃金海負責。至於工交系統，本來就被認為是產業工人集中之地，而且陳阿大1967年底已經是工交組負責人，所以沒再成立相對應的工宣隊辦公室；工交系統的那些「老大難」工廠或單位，仍由老大難辦公室派遣工宣隊。市革會組織組因有金祖敏在，所以也沒派工宣隊。

30 這個細節是當時的上海觀禮代表張伯生回憶的。筆者、金光耀、金大陸2009年9月11日對張伯生的訪談。

在工宣隊進駐前，市革會本來已經有各個職能辦公室，負責人大都是老幹部。當時市革會各組的工作主要是「政治性」的，具體業務都由所屬各局管理；而工宣隊的工作內容也是政治性的。所以工宣隊各辦公室的工作與市革會各組重合。張春橋說市革會日常工作實際上是工宣隊在辦。1969年1月，工宣隊各辦公室與市革會相應各組合署辦公：市革會文教組與工宣隊「一辦」合署，由工宣隊的王秀珍負責，加上原來的上海警備區副政委徐海濤，老幹部羅毅。市革會地區組與工宣隊「二辦」合署，由老幹部王克、王一平、軍代表，與工宣隊的張寶林等，組成三結合領導班子。³¹ 市革會科技組與工宣隊「三辦」合署，由工宣隊的戴立清負責，加上老幹部許言、軍代表田書堯組成「三結合」領導班子。市革會郊區組與工宣隊「五辦」合署，由老幹部張輯五負責，加上上海警備區副司令員張宜愛，以及工宣隊的王明龍，組成三結合領導班子。市革會財貿組與工宣隊「六辦」合署，由工宣隊的黃金海負責，與老幹部續中一和軍代表廖雲台組成三結合領導班子。市革會工交組，因沒有派工宣隊，所以仍然稱「工交組」，由老幹部黃濤負責，與工總司陳阿大和軍代表組成三結合領導班子。市革會組織組由金祖敏負責，與軍代表王日初和另一個老幹部組成核心。外事組由老幹部馮國柱負責，工宣隊的陸繼川參加核心。工總司的王秀珍、戴立清、黃金海，就這樣成為市革會領導部門的主要負責人；陳阿大、王明龍、張寶林，以及稍後去的王腓利，也都成為部門負責人之一。工總司系統的造反派們，先後進入市革會各組、辦以及區、縣、局等單位擔任領導者，達168人。³²

而在各工宣隊，許多負責人也都陸續進入進駐單位的領導

31 不過張寶林在「二辦」時間很短，就被調到「五辦」。

32 這個數字引自《中共上海黨志》，《中共上海黨志》編委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2001年出版社。

班子。1973年底，上海18所大學共進駐工宣隊員1538名，其中共產黨員1167名，共青團員16名，女性310名；原來是工人的988名，文革中造反當了領導的新幹部135名，文革前的幹部425名。這1538名工宣隊員中，共有731人被結合進學校或系一級的領導班子；其中擔任校黨委和校革委級的正、副書記或主任者19人，常委和委員54人；擔任系黨總支和系革委會正、副書記或主任者137人，常委和委員93人；其餘基本擔任系以下部門負責人。³³ 而在全市，到1974年4月，工宣隊員總數1.0713萬人，進駐1935個單位，其中女性2919人，共產黨員6350人；被結合為黨的書記、委員或革委會主任、委員者共4142人，其中結合進黨委班子者189人。在這189人中，擔任正、副書記者36人。³⁴

1972年軍隊支左人員逐步撤出地方。隨着基層黨委會的恢復，上海除文教和科研系統外，進駐基層的工宣隊也逐步撤離，到1974年，全市工宣隊員從1968年底的十萬多人，減少到一萬多人，進駐在全市18所大學、1516所中小學、202所醫院，以及30所市屬科研單位。³⁵ 工宣隊的全部撤離是在文革結束後。1977年11月6日，上海執行中共中央批准的教育部黨組《關於工宣隊問題的請示報告》，全市工宣隊全部撤出進駐單位。

從師院開始的高校大搜查

一萬多名工宣隊員進駐大學沒幾天，市革會召開各工宣隊團長和政委會議。張春橋講話並介紹北京工宣隊的經驗，說他們進駐北大、清華後，採取革命行動，進行大搜查，搜出許多武鬥兇器、黃色小說和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黑材料，取得輝煌戰果，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張春橋講得很多，分管大專

33 上海市總工會 1974 年 1 月《駐上海市文教系統工宣隊員情況表》。

34 上海市總工會 1974 年給上海市委的《匯報目前工宣隊的狀況》。

35 同上。

院校的工宣隊「一辦」的負責人王秀珍後來回憶說，她當時覺得這是個暗示：上海的工宣隊也可以採取同樣行動。³⁶

9月2日，王秀珍去上海師範學院。工宣隊和軍宣隊負責人向她反映：工宣隊進駐師院後，隊員的住宿問題尚未全部解決，而可作宿舍的「留辦」樓，被師院紅革會總部佔着不肯讓出，且不許任何人上留辦三樓；還反映說，工宣隊進駐師院後，師院紅革會就有人將大包小包拎出學校，甚至晚上9時以後，有人將拎包從院牆裏面甩到外面去，工宣隊員看到後去追，沒追到。師院是炮打張春橋的老窩，估計他們是在轉移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黑材料。王秀珍聽後表示，留辦是馬蜂窩，就是要捅，不要怕。

「留辦」原來是越南留學生辦公室兼宿舍，文革開始後，越南學生回國，師院紅革會便佔領了留辦，作為總部辦公處兼宿舍。這裏住宿條件是兩床一室，比學生宿舍的8床或4床一室條件好，且離學生食堂近。紅革會將一樓和二樓作為紅衛兵宿舍，三樓作為師院紅革會勤務組的辦公處和負責人宿舍；樓頂安裝着整天播放的大喇叭。這裏是師院紅革會的堡壘，也是師院炮打的發源地和策劃中心。工、軍宣團第二天即討論，決定首先對留辦採取行動，端掉這個紅革會的堡壘，並對全校學生宿舍進行大搜查。他們制定了查抄內容、行動時間、重點部門和重點對象。9月4日上午，進駐師院工宣團的政委和團長向王秀珍等請示，說今天下午就行動。王秀珍當即表示支持，並打電話請示王少庸，王少庸請示市革會主任張春橋，張春橋同意。³⁷

9月4日下午，上百名工宣隊員強行進入留辦，將師院紅革會的辦公資料全部翻看後悉數收繳；對個人物件也不放過，全

36 王秀珍 1981 年 1 月 5 日，1981 年 4 月 3 日。

37 以上資料全部引自《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 年 2 月編。

部搜查，認為有問題的當場扣留。晚上，一場大搜查在師院展開。一千多工宣隊員，對師院2500餘名師生進行大搜查，學校大門被封鎖，主要道口設立崗哨，由工宣隊分組對學生宿舍一個一個地進行查抄。查抄人員上鑿天花板，下撬地板；學生的箱子、鋪蓋和私人用品全部被翻查，私人信件也不漏過。學校門口，進出的學生若攜帶書包或箱子，必須打開檢查。師院許多學生家在上海，工宣隊還去一些「重點對象」家裏抄家；一些住在師院的教工和幹部也被抄家。查抄的重點是武器和其他兇器，以及「炮打材料」。

晚上，張春橋給師院工宣團部打電話支持查抄行動。³⁸ 當晚，王秀珍和「一辦」的其他負責人驅車去師院視察「行動戰果」，看完後回康辦向王少庸和徐景賢匯報。王少庸聽後表示，大專院校是死角，全市二十六所高校要借工宣隊進駐的機會都掃一掃。徐景賢接着表示：復旦、外語、上音、華紡，這幾個大學要重點搜查，尤其復旦，是炮打的老窩。³⁹ 王少庸認為全市性查抄大學，事關重大，必須請示張春橋；經請示，張表示同意。⁴⁰

第二天緊接着查抄復旦大學。復旦是炮打張春橋的發源地，自然被列為查抄重點的重點。王秀珍親自動員復旦的查抄行動。9月5日早晨，她驅車至復旦工、軍宣團的團部所在地，召集全體工宣隊負責人開會。王秀珍說：「昨天師院工宣隊在學校裏採取了革命行動，進行了大搜查，搞到了許多武器彈藥和整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她要求復旦也採取行動，並再一次表示：不要怕，有什麼事情，我們市革會負責。⁴¹ 復旦工

38 同上。張春橋當晚來電話之事，轉引自其中的上海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第一辦公室文革中編寫的《大事記》，轉引自《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五》。

39 王秀珍 1981 年 4 月 3 日。

40 同上。

41 《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行

宣團立即召開工宣隊連長和指導員會議，佈置行動方案：成立臨時指揮點，由工宣團政委和團長在廣播台指揮，團部負責人分工把守各要害部門；控制電話總機，不許打電話；學校大門和各大樓樓梯口都派人把守，不許進出，不許上下；行動以系為單位進行，制定重點對象以重點搜索，一般對象動員自己交出；等等。在要求支持和配合的復旦校革會負責人會議以及全體工宣隊員動員大會召開後，一千名工宣隊員對全校五千名師生查抄行動當日便開始。搜查了學生之後，因人手不夠，又組織才被查抄過的學生去查抄教師宿舍。⁴² 這次查抄行動，內容之一就是查抄學生中是否藏有針對張春橋的資料；內容之二是查抄對文革不滿的文字。尤其參與過炮打的學生，更是重點搜查對象，胡守鈞等人的筆記本和信件全被收繳，成為以後批判他們的最重要資料。

在查抄復旦的同時，9月5日下午，「一辦」召開進駐上海各高校工宣團、營負責人緊急會議。師院工宣團政委張惠民介紹師院9.4查抄行動的經過和經驗；王秀珍要求各大學也照此辦理。⁴³ 接下來的兩天之內，上海各個大學一片恐怖，學生人人自危。

9月8日下午2時，各大學工、軍宣隊負責人會議在延安西路200號召開。張春橋、王少庸、徐景賢等出席會議。會上聽取了各校關於查抄行動的匯報。張春橋講話表示「支持工人階級的革命行動」：⁴⁴

這幾天的行動怎麼評價，說法不一，有人想鑽我們的空子，這要有一個統一的說法。革命行動我們實現沒有想

之五》中孫林寶(當時進駐上海師院工宣團的團長)1977年12月28日證言。

42 同上。

43 同上。

44 上海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第一辦公室文革中編寫的《大事記》。

到，很突然，通過行動查到很多東西，這個行動很必要，是一個革命行動……。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材料不能擴散，開公審會你一定要講材料，替他們作宣傳，不講，群眾會同情他，不宜開……。抄家問題，必須慎重考慮，並且要辦手續，不應普遍抄……。展覽會可以辦，要注意，你們不要怕犯錯誤，犯錯誤也能得到鍛煉，上海就是要創造這樣的經驗……。⁴⁵

查抄大學生宿舍，是上海工宣隊的第一個「戰績」，以這樣的外部力量介入，徹底結束上海各大學的紅衛兵運動。

「三工」的矛盾

最初的工代表有些是被派往各區、局革會的。工代表派出後不久，工宣隊又進駐各區革會；而工總司在各區局本來都有聯絡站。於是在這些單位，又有工代表，又有工宣隊，還有工總司的聯絡站，被稱為「三工」。工宣隊與派駐單位的工代表以及工總司的造反派頭頭有矛盾。1969年工總司曾經專門對上海十個區「三工」的團結問題進行調查。調查結果認為「三工」之間關係，有的團結，有的矛盾很尖銳。有些區革委會的幹部在工代表和工宣隊進駐時表示「我們歡迎真正的工人階級來領導一切」，引起聯絡站造反派們的不滿。一些工代表、工宣隊員也認為自己是經過單位挑選，由市革會派出的，「領導一切，領導你們」。於是「三者關係緊張，各搞各的，互不服氣」，甚至鬧着要回原單位。⁴⁶

45 原駐上海財經學院工宣隊教導員陳全福的筆記，轉引自引自《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五》中的王秀珍供詞。省略號是原引文中的。

46 工總司 1969 年 8 月 8 日第 73 期簡報。

比較工宣隊而言，工總司聯絡站的工人造反派對工代表更不服氣。因為工宣隊隊員畢竟流動性比較大，一般不結合進領導班子；而工代表一來就進領導層，而且一般都是副主任，最不濟也是常委。相比之下，聯絡站的工人造反派，最高的才被結合進革委會當常委。所以聯絡站的工人造反派認為工代表是坐享他們造反的文革成果：

工總司區聯絡站的造反派認為「我們聯絡站是工人組織，我們也是工人代表，為什麼我們不能領導一切」，「我們揪出了區裏的走資派，建立了區革委會，鬥爭了那麼長時間，還不能當常委，工代表一來就是常委」。不服氣。對工宣隊，聯絡站認為他們是進駐區屬有關係統領鬥批改的，他們主要是負責進駐單位的工作，不應參加區革委會的核心領導。⁴⁷

這些矛盾直到後來，身份不確定的工總司各區聯絡站，轉變為明確的區工會之後，才漸漸消解。

各工宣隊負責人基本都是工總司體系的工人造反派，僅工總司總部就派出26人擔任各級工宣隊負責人，總部只剩葉昌明看家。工總司原來的影響主要只在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工廠工人也即「產業工人」中，通過派工宣隊，影響擴展到全市所有的行業系統。而在這些系統，原來都有造反組織：財貿系統原來有財革會，科技系統原來有科司，醫務系統原來有上醫司，新聞系統原來有新革會，出版系統原來有版司，中學有中教司，小學有小教司，當初都是上海人民公社發起組織。這些組織雖然在各級革委會成立後停止活動，但原來的負責人都是老造反，各單位的掌權者。工宣隊進駐後，對一些老大難單位領導班子進行整頓，這些單位原來的造反組織負責人對之不滿，產

47 工總司 1969 年 8 月 8 日第 73 期簡報。

生矛盾。尤其是財革會，工宣隊進駐前還有活動，工宣隊進駐後，各級財革會的活動被全部停止，財革會的人很有意見。⁴⁸

工宣隊的困境

十萬工宣隊進駐各單位時，正值「清隊」運動高潮，工宣隊成為「清隊」的主要領導者。一年多後，1970年，又一場運動「一打三反」開展；幾乎同時，中共中央又發動「清查5.16分子」運動。雖然此時各級黨組織恢復，成為單位運動的領導者，但工宣隊也都有參與。這三場連續性的運動，目標重又回歸為以十七年打擊對象為主。三場運動製造出大量冤案、假案、錯案，其中許多都是工宣隊參與的。例如復旦大學的「胡守鈞小集團案」，由市革委會立案，工宣隊具體執行。又如上海師範學院一打三反中清查「兩次炮打」，由工宣隊政委親自主持指定「作戰計劃」，將參加過炮打的部門和人，都作為一打三反運動的重點打擊對象，逼死二人，逼瘋一人。在一片打擊批判、深挖狠鬥的浪潮中，工宣隊不可避免地成為決策層的工具和打手。雖然大多數工宣隊員不贊成打人，但他們所執行的政治高壓和對知識的歧視，也是另一種巨大殺傷。也有少數工宣隊員出手狠毒，打人致死。例如駐中國科學院華東分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的第一批工宣隊員，就在「清隊」的1968年底，與軍宣隊一起，將該所黨委委員潘加林活活打死。

不過，許多工宣隊在解放幹部、落實政策方面還是作了不少努力。工宣隊進駐之時，正是各個單位黨政組織恢復和健全之際。在許多單位，幾派各不相讓，工宣隊起了調和作用，使得秩序很快恢復。以後，對清隊一打三反等運動對象的甄別，許多工宣隊也起了很大作用。

毛澤東對文革混亂秩序無奈，在動用軍隊制止混亂未得

48 葉昌明 1977年6月14日。

奏效後，希望以派遣工宣隊的方式結束混亂。由於派得匆忙，缺乏後繼的實施細則，於是工宣隊在組織體系上，就只是成為毛澤東為解決大學武鬥的應急措施。比起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那些組織嚴密、規則嚴謹的各類工作隊，工宣隊可以說是一盤散沙，從中央到地方到基層，沒有明確有效的管理機構，更沒有成熟統一的運行程式。甚至工宣隊的管理歸屬也十分模糊，是屬於市革會管轄，還是屬於市總工會領導？從名義上說，應該屬於市革會領導，但市革會並沒有相應的專門機構。到1973年底，全國高等學校的工宣隊處於低潮。據統計，至1973年10月，全國高校共有工宣隊員4892人，比1971年減少61.8%，四分之一的高校沒有工宣隊，有些省大部分甚至全部高校沒有工宣隊，有的院校只有幾名工宣隊員；不少地方的工宣隊輪換頻繁，抽強補弱，骨幹越換越少。⁴⁹ 上海的工宣隊同樣也存在許多難題。葉昌明曾經給王秀珍寫信反映工宣隊情況，說工宣隊是三不管：派出單位不管，進駐單位不管，上級組織也不管；而且工宣隊與進駐單位的黨委和革委會的關係處理也是難題：

一是進駐單位黨組織建立後，工宣隊要接受黨組織的一元化領導，再要獨立開展工作是不行了了……有一些單位怕被講成凌駕於黨組織之上，把工宣隊的活動都停止了，這樣無形中，工宣隊也就解體，都成了進駐單位的工作人員了；二是進駐單位的黨組織普遍是不重視(或不敢抓)工宣隊的建設問題，一些工宣隊領導當黨委負責人的，還較好些，但因工作忙亂，也顧不過來，一些進駐單位老幹部當負責人的，對工宣隊也不敢抓，工宣隊的建設和發揮作用問題沒有被提上黨委的議事日程來研究；三是一些沒有結

49 《關於加強高等學校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意見的請示報告》(討論稿)，國務院科教組1974年1月。

合的工宣隊員(特別是非黨的隊員)感到無事可做，因為工作都有黨委、革委會搞了，自己不結合的沒有職權，說話不算數，解決不了問題。⁵⁰

葉昌明的信反映了工宣隊的困境：文革的秩序和權力機構的權威已經恢復和建立，當初為了緩解衝突、制止混亂而派出應急的工宣隊，便顯得多餘，尤其是那些沒有被「結合」進領導班子的工宣隊員，更是處於無事可幹的尷尬地位。

毛澤東派出工宣隊，希望在團粒結構的土壤中「摻沙子」，改變土壤結構。工宣隊初期浩浩蕩蕩，憑籍人海戰術先聲奪人，以整個上海產業工人十分之一的比例派出「十萬大軍」。但工廠畢竟是生產單位，長期派出這樣大量的工人勢必影響生產。於是，各工廠利用工宣隊員輪換的機會逐漸減少人數。到1974年7月，據市總工會一份材料統計，全市工宣隊員總數下降到1.0713萬人，只有1968年派出初期的十分之一。這份統計材料還舉例說：上海科技大學師生約2500人，工宣隊員27人，比例是92：1；上海鐵道學院師生約1800人，工宣隊員29人，比例是60：1；同濟大學工宣隊員97人，但全校黨支部加上教研組室就有104個部門，每個部門還分配不到1個工宣隊員；小學的工宣隊員就更少，平均每所小學只有1.8人。⁵¹

葉昌明的信送上去不久，市革會同意在市總工會的組織組內設立工宣隊聯絡組，負責各系統工宣隊的聯繫，協調各區工會與工宣隊的關係。但仍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隨着時間的推移，工宣隊本身的弱點很快暴露。工宣隊員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據統計，1974年派駐上海18所大學的工宣隊員1538

50 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葉昌明1972年9月15日《給王秀珍的匯報》。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51 上海市總工會1974年給上海市委的《匯報目前工宣隊的狀況》。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名，其中受教育程度小學390人，中學1042人，大學53人。同一份統計顯示，當時派駐電影局、電台、文化局、出版局、《解放日報》、《文匯報》，教育局和衛生局的工宣隊員945名，其中受教育程度小學312人，中學598人，大學35人。⁵² 進駐復旦大學的工宣隊員90名，其中受教育程度小學32人，中學和中專54人，大學1人。⁵³ 有意思的是，工宣隊頭頭一般都是由小學或中學文化程度的工人擔任，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工宣隊員大多只是普通隊員。從可以查到的工宣隊名冊來看。工宣隊員的受教育程度：進駐大專院校和文化科技單位的工宣隊員，受教育程度中學的佔三分之二或五分之三，小學佔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進駐中小學或地區街道的工宣隊員受教育程度更低，小學程度佔一半以上，有的工宣隊佔到三分之二以上，甚至還有半文盲。一些工宣隊員們說，他們「憶苦思甜時苦水倒得出，討論業務時道理講不出」。⁵⁴ 工宣隊進駐之初，各個大學和文化、科技、醫務等等單位還在秩序恢復時期，工宣隊還能以政治運動的辦法開展工作。而當進駐單位業務逐漸走上正軌，光靠政治運動和空洞說教不行了：

現在工作要深入到業務領域中去，工宣隊剛進駐的一套辦法已不適應了，而我們的本錢很少，碰到有關業務、技術、教改方面的事情，就沒了發言權。往往人家來請示工作，自己感到點頭無把握，搖頭無根據。⁵⁵

另外，生產的壓力使一些工廠將生產或行政骨幹陸續抽回

52 上海市總工會 1974 年 1 月《進駐上海文教系統工宣隊情況同濟表》，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53 上海市總工會 1972 年《復旦大學工宣隊幹部同濟表》，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54 葉昌明 1972 年 9 月 15 日《給王秀珍的匯報》。上

55 同上。

廠，而把老、弱、病號、即將退休人員、甚至不能堅持正常工作的工人派去工宣隊充數，以弱換強。如上海玻璃廠派駐北站醫院的7名隊員就有8種毛病。新中動力機廠派出的3名工宣隊員中有一個是患心臟病的，上棉二十二廠還把一個患哮喘的49歲老年女工，和另一個患膽結石的53歲老工人，派到新華醫院當工宣隊員。⁵⁶ 上海焦化廠1971年送到上海化工學院的10名工宣隊員，只有2人身體較好，其他8人都有各種職業病或慢性病，無法正常上班。「進駐中小學的工宣隊員中老年多，文化水平低的多，不會講話的多，身體有病的多，工廠讓他們到學校裏來休養。」⁵⁷ 上海耐火材料廠派駐市四中學的11名工人中，「9名患肺疾和高血壓、肝病，在廠裏都是半休或全休的」。工廠工人半休和全休，工資要打很大折扣，去工宣隊，既休息，工資又全拿，可謂一舉兩得。新中動力廠派出的3名隊員，「一個是聾子，一個是心臟病患者，一個是鬧情緒在廠裏擺不平的幹部」。⁵⁸ 而有些工宣隊員也不安心在派駐單位工作，甚至不願意被結合進派駐單位的領導班子，怕人事關係會因此被轉入派駐單位，「以後要改變成份，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自己要變成被揪鬥對象，被紅衛兵鬥起來吃不消」。還有人怕在進駐單位講錯話，被抓小辮子，說「出來時清清爽爽，時間長了弄不好背個包袱回去」。⁵⁹

在大多數單位，工宣隊員無法進入業務領域，只能做總務，後勤和管理人員的工作，他們整天忙於聯繫參觀，採辦器材，維修房屋，甚至打掃衛生這樣的瑣事。如上海音樂學院一些工宣隊員，做打字油印和收發文件工作，衛生局一些工宣隊

56 上海市總工會 1974 年給上海市委的《匯報目前工宣隊的狀況》，以及上海市總工會簡報。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57 葉昌明 1972 年 9 月 15 日《給王秀珍的匯報》。

58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1974 年 5 月 21 日《關於地區工宣隊的情況和進一步加強領導的意見》。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59 上海市總工會 1969 年簡報。

員做專職統計。一份市總工會工作簡報這樣概括中小學工宣隊的工作：「學生打架時，工宣隊員成了派出所的民警；教師之間發生糾紛時，工宣隊員成了調解員；學校開門辦學時；工宣隊員成了聯絡員；學校造房子搞基建時，工宣隊員成了材料採購員。」⁶⁰ 這些是些樸素而有自知之明的工人，他們寧願做這些與工宣隊政治身份不符的瑣碎雜務，希望通過這樣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尷尬處境。

但也有許多不懂業務、只會抓階級鬥爭的工宣隊員。進駐傳染病醫院的工宣隊，院方按照衛生條例的規定為他們定做隔離鞋，但工宣隊頭頭指責這是「糖衣炮彈」，「腐蝕工宣隊」；外文書店發行英文原版教材《林格風》，銷路很好。工宣隊指責這是「修正主義黑線回潮」，下令停售；上海書畫社印製水印木刻銷售給外國來賓，工宣隊指責是「單純外匯觀念」，組織批判。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電影《春苗》，劇本中有個情節是水昌伯砍竹子到城裏去賣。工宣隊員認為「翠竹是新生事物的象徵，水昌伯是貧下中農，怎麼會砍掉翠竹呢？」於是提出砍去這個細節。1974年6月的全市工宣隊大會，這些事被作為工宣隊員「懂行」的典型事例介紹宣揚。

首批工宣隊員有一些老造反，尤其各級工宣隊，帶隊的頭頭都是老造反。不過當時上海工廠及其上級單位公司或局，正在充實調整革命委員會和稍後的黨委會，各工廠的造反派不會讓有能力的自己人在這時離開本單位。因此被派出的工宣隊員，有許多是在本單位受排擠或受冷落的另外一派的老造反。1969年以後，工宣隊員中又增加了相當數量的原工廠幹部。在工廠建立革命委員會時，有些原來的幹部因各種原因沒有被結合進革委會，但是打倒他們也沒有充分理由，人事編制的限制又不能將他們貶為工人解聘，長久掛着也不是事情。於是這些幹部被派往工宣隊。據市總工會1974年7月統計，在進駐全市文

60 上海市總工會 1969 年簡報。

教系統的工宣隊員中，原幹部佔29%。在有些單位，原幹部的比例更高。如上海戲劇學院47名工宣隊員中原幹部28名，佔總數60%；上海第一醫學院被結合進領導班子的工宣隊員76人，原幹部40人，佔55%。⁶¹

小結

文革從派工作組引發矛盾、群眾起來造反開始，到又一次派工作組式的工宣隊結束矛盾，結束文革的群眾運動。但是，工宣隊的權威來自毛澤東，而不是自身的能力和素質。這樣的知識程度，不要說領導高等教育、現代科技和文化藝術事業，就是在這些領域取得發言權都是困難的。雖然毛澤東給他們的責任是進行階級鬥爭，但這類空洞的說教，在繁重的日常業務前，成為實際上的干擾。而且，共產黨的組織體系職能恢復後，工宣隊實際只能處於尷尬的多餘地位。

毛澤東提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但究竟怎樣才是達到「領導一切」？姚文元的文章提出的只是口號，毛澤東對此也未有具體闡述。於是，只有位置的多少是可以量化的。這使工人造反派對「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理解，主要還是在對領導位置佔有的多少上。他們沒有明白，「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本質上是與「階級鬥爭為綱」相輔相成的，他們「領導一切」和高於其他階級階層的權利和地位，只是因為他們的工人身份，是政治名份的附加值，而不是他們的先天權力。如此對體力勞動者的簡單頌揚，真正的目的，是為了貶低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並非真正看得起工人。一個正常的社會，各個社會成員和階層都是平等的，不應該有哪個階層是「領導階級」而高於其他階層，更不應該有哪個階層是被打擊對象。

61 《關於工宣隊進駐上層建築領導鬥批改的一些情況》，上海市總工會 1974 年 7 月 27 日。

「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儘管在基層，被三結合的工人幹部確實擁有比文革前大得多的權力，但在權力的上層，工人並沒有多少話語權。工人階級真正擁有的，只是執行政策的權利，是不折不扣執行毛主席指示的權利。

事實上，1949年後的中國工人，已經離馬克思主義本意上的自在或自為階級越來越遠，作為階級的整體素質越來越下降。首先表現在整個工人階級缺乏強烈的階級意識。從文革前的很長一段時期始，個人利益便不被鼓勵提倡，社會強調的是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於是，由個人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共同構成的價值判斷座標，被抽去了其中的一根軸，只剩下另一根單一的可以任意挪動但卻永遠構不成平面的軸線。工人的個體利益時時遭到貶低和壓抑，使得作為整體的工人階級，失去了判斷階級利益的具體而實際的參照。於是形形色色的虛假利益乘虛而入。對本階級權利和利益的深刻了解是階級意識的基礎，而文革前的工人階級已被灌輸教育得將黨的利益、政權的利益，等同於階級利益，完全失去了以個體利益抽象出階級利益的能力。

工人階級沒有獨立政治意識的素質，不但與十七年灌輸式的政治教育有關，還與十七年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有關。計劃經濟取消了勞動力市場，勞動者失去依靠交換自己的勞動力而生存的基本條件，只能依賴於企業與政府。勞動力是勞動者的自我，勞動者通過與勞動力市場的交換，得以了解自身的價值。勞動力成為計劃經濟對象，勞動者的價值和地位便只能由計劃者決定，派給什麼身份就是什麼等級，勞動者的自我就這樣喪失。文化革命中處處可以看到這種自我判斷大於或小於實際自我價值的現象，「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就是由當政者決定各個階層價值的最具體體現。而工人階級，對這樣判斷大於價值的口號完全接受，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應該高於知識份子，永遠領導知識份子。而在與執政黨的關係上，勞動者得到的不是

勞動報酬的全部，但宣傳機構卻將本應作為工資形式支付的社會福利統統說成是當政者的恩賜，彷彿不是勞動者養活了黨和政府，反倒是黨和政府養活了勞動者。於是，一方面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宣傳，另一面卻又是「黨是大救星」的歌頌。加上沒有罷工的權利，與侵害自己權益鬥爭的手段被取消，勞動者實際成為政治的棋子。

勞動者自我意識的集合體是階級意識。當工人階級的每一個分子失去了本身應有的活力，作為階級整體的活力必定枯竭。經濟上的依附性必然造成政治上的依附性。過去，工人除了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但正是對勞動力的自主，使他們能夠以罷工等鬥爭形式發揮自己的階級力量。而當勞動力也不能成為屬於自己的自主之物時，當捍衛自己利益最基本的罷工權也被取消，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便只能是一空話，更不要說「領導一切」。那只是被賜予的名份。

第三十章

清隊、一打三反和清 5.16 回歸自上而下

從文藝界開始的清隊

自從1967年初的一月革命從「走資派」手中奪權之後，文革的打擊目標開始回歸，走資派不再是唯一和主要對象。1967年4月，中共中央轉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的自首叛變材料》，6月，中共中央下達《關於「抓叛徒」問題的通知》。後來，江青將「抓叛徒」等歸結為「清理階級隊伍」。江青在11月27日的北京工人座談會上說：「在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都要逐漸地清理階級隊伍，有黨內、也有黨外。黨內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務及犯了錯誤死不悔改的人」。這是「清理階級隊伍」（簡稱為「清隊」）這個日後打擊面極廣的運動第一次被提出。

江青這個講話應該代表着毛澤東的意思，因為毛以後幾次提出要清理階級隊伍。還是在1967年1月31日，毛澤東在譚震林關於農口幾個單位階級鬥爭情況報告上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¹ 這個批示沒有提及「走資派」和執行「資反路線」的幹部，徹底批判的對象是「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

1 轉引自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

子」。之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都在社論中將「清隊」作為文革的又一項任務。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更明確提出：「這場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們講，要搞到底。什麼叫搞到底？這是一個問題。估計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兵簡政、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文革的批判目標，又一次轉型。

根據中央佈置，上海市革會成立材料組，下設「抓叛徒查線索小組」。江青講話後不久，1967年11月20日，徐景賢即對上海文藝界的清隊發表講話。1968年1月11日、2月5日以及2月6日，市革會連續召開擴大會議作出決議：將清隊作為1968年上海文革的重要任務佈置和動員，要求「黨政機關和行政管理部門要在清理階級隊伍的基礎上，有領導有步驟地實行精兵簡政……進一步揭開階級鬥爭蓋子」。² 整個清隊的「專案工作」由王少庸負責，起初市革會專案辦公室具體辦案人員大多是原機關幹部。1967年6月中共中央關於「抓叛徒」的通知下達後，9月，市革會專案辦公室專門成立了「群眾專案聯絡組」，以支持「群眾辦案」，為他們開具去外單位或外地調查所必須的介紹信，提供查資料和提審案犯的方便，解決調查經費，等等。光是開具介紹信，最多時一天可開出一二百張。與此同時，王少庸和王承龍還選調了一批「有造反精神」的紅衛兵到專案辦公室當領導或骨幹，例如交大反到底的負責人余小兵等。³

上海的清隊，首先在文藝系統開展。1967年12月10日張春橋在對上海文藝出版界代表的一個講話中提出：

拿走資派來說吧，拿混到文藝界裏的地、富、反、壞、右

2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一周年決議》，載於《文匯報》1968年2月8日。

3 《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第60-61頁。

來說吧，揭露了批判了很多人，但這些總的來說是揭得不深、批得不透，比如電影界是不是都揪出來了？按名單上看看差不多了，但還有一些沒有上名單。你們造反派交上來的名單有很多我知道的，有一些我知道的還沒有，還有一些我還不知道的……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這幫人，他們老早就叛變了，像田漢這些人一捉起來就叛變了，他們在南京完全是在國民黨張道藩的控制之下，像演劇幾隊，都是國民黨的，就是他們的手，把一批青年引到國民黨中去的。

這件情況不僅電影界，哪個單位都是這樣。別的地方也少不了。但這種情況十幾年來中央一再說，一再提，但是始終解決不了，始終清理不了，這些單位，我們派人進去，要麼被排擠出來，要麼就被同化掉。⁴

張春橋在這個講話中提到的「演劇幾隊」，即是指抗日戰爭時期的「抗敵演劇隊」，共十個隊，雖然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屬下的抗日宣傳文藝部隊，但實際領導是中共的地下黨，由周恩來親自組織。其中演劇九隊在1949年中共掌權後，成為華東文工二團，後來在此基礎上建立上海人民藝術劇院。而就在張春橋這個講話的近一個月前，11月12日，江青在對北京文藝團體的一個講話中表達了對上海人藝的不滿：「上海人藝……還是那些老傢伙霸佔着，最壞了！」。顯然，張春橋一個月後在講話中特地點名演劇九隊，應該就是回應江青的。張春橋講話後不幾天，12月16日，《文匯報》第三版刊登出整版長文：《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內的反革命別動隊——揭穿「抗敵演劇宣傳九隊」的反動真面目》，並配社論。12月25日，上海宣傳系統造反派鬥爭陳丕顯和曹荻秋大會，「清算陳丕顯曹荻秋之流招降納叛罪行，清理宣傳系統階級隊伍」，上

4 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海的清隊就這樣首先從文藝界展開。以後，清隊又擴展到其他行業，1967年底和1968年初，佈置到各區縣局。

1968年5月19日，毛澤東對姚文元報送的《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批示，要求轉發全國。姚文元在資料送毛澤東時，用了「清理階級隊伍」句，清隊在全國全面鋪開。而此時，上海的清隊已經開展了近半年。中央批轉北京新華印刷廠經驗後，上海市革會成立清隊專案辦公室，全市各單位普遍成立清隊專職機構。1968年9月23日市革會正式上報中央的《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情況報告》：

到目前為止，全市已經挖出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共142453人。其中過去掌握和處理的有53344人，新挖出來的89109人。內有叛徒4727人，特務15786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3254人。……

此外，還揪出現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⁵

由這些數字可見，幾乎近一半的「階級敵人」都是清隊中「新挖出來」的。革命製造着越來越多的敵人。到1968年12月清隊運動高潮，市專案辦公室列為重大案件的965起，重大集團性案件731起，立案審查達16.9405萬人，5449人被迫害致死。⁶其中包括「上海地下黨案」、科技系統的「二線一會案」、「國民黨滬中區特務集團案」、等等。其中，「國民黨滬中區特務集團案」，以及前面提及的「演劇九隊案」，都因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活動過有關。大案中又套許多大案和小案。例如「上海地下黨案」，按照原上海地下黨系統的原工委、職委、學委、教委、文委、警委等系統，建立了39個大案，845個

5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話》(未刊稿)第427頁。

6 《中共上海黨志》，《中共上海黨志》編委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2001年出版。

小案，由市專案辦公室直接抓的有十大專案，代號從501直到509再加上個320。十大專案中，僅根據工交專案組六個「集團案」的不完全統計，就涉及292個單位；被審查者達589人；其中受隔離和拘留審查233人，逼死38人，打傷致殘78人，精神失常9人。文革結束後，曾經對這六個案件做過統計：⁷

名 稱	涉及 單位	被審查 總人數	被隔離 和拘留 人數	嚴重後果		
				迫害 致死	傷殘	精神 失常
503 滬東棉紡	127	292	52	11	35	5
504 滬西棉紡	52	52	44	5	11	1
505 頤中煙廠	47	56	33	10	10	2
506 中山鋼廠	7	7	7		2	
509 上海電話公司	24	124	60	8	10	1
320 絲綢	35	58	37	4	10	
合計	292	589	233	38	78	9

1949年前的地下黨系統的各級幹部們更是首當其衝，不是叛徒，就是特務。文革前擔任區、縣、局以上領導職務的原中共地下黨員99人被撤職，65人被拘捕或隔離審查，4人被逼死；⁸ 市一級幹部中，

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常委、市長、副市長20位領導幹部，除張春橋、馬天水、王少庸3人外，全部被誣陷為「叛徒」、「特務」、「走資派」等，副市長金仲華被迫害致死。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市人委機關900多名幹部被誣陷審查批鬥，市委統戰部長陳同生、教衛部長常溪萍

7 上海市經委1980年10月17日，載於《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第65頁，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1981年2月。

8 《上海通志》第45卷專記第一章《文化大革命紀略》，上海社會科學院2005年出版。

等46人被迫害致死。全市局級以上幹部1019人，受立案審查853人。處級以上幹部6161人，受立案審查5868人，有3617人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資派」。⁹

十大專案下，各單位造反組織自行掌握的案子，更是不可勝數。科技系統的「二線一會案」，株連14個科技單位639人，239人被關押，2人被活活打死，4人被逼死，10人被毒打致殘。文化界的清隊，全市相當於文藝六級以上的文化人，幾乎都遭到衝擊，80%以上被立案審查。¹⁰著名電影演員上官雲珠、著名鋼琴家顧聖嬰、著名電影導演鄭君裏、著名滬劇演員筱愛琴，都是這一時期被逼死的。

1967年11月下旬，上海電影系統還發生大規模打人事件：11月23日，天馬電影製片廠造反派將「叛徒、特務、黑線人物」集中到廠廣場，120多人被點名毒打，有人當天就被逼瘋；然後又將這些人關押，繼續審訊逼供。同一天，海燕電影製片廠也揪鬥毒打100多人。11月29日，上海科教電影製片廠也揪鬥毒打40餘人。整個電影系統遭到毒打的共452人。¹¹

「抗敵演劇九隊」被張春橋點名後，全國所有十個「抗敵演劇隊」數以千計的原演劇隊成員遭到殘酷打擊。上海因此案受到審查的有導演、演員鄭君裏，戲劇家、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呂復，演員、上海人藝演員劇團團長高重實，共41人。鄭君裏、呂復和高重實，都曾先後任演劇九隊隊長或改編後的文工團團長。呂復被打斷一條胳膊，高重實被毒打後自殺，鄭君裏被關進監獄並死於獄中，上海因此案被逼死的共有7人。¹²

9 同上，《上海通志》第45卷專記第一章《文化大革命紀略》。

10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447-450頁，以及徐建剛《「四人幫」迫害上海幹部群眾的三場運動》。

11 中共上海黨史研究室2004年編纂《中共上海歷史實錄》。

12 《上海通志》第45卷專記第一章《文化大革命紀略》。

而在郊縣，清隊使4.56萬人遭到不同程度迫害，2922人被逼死。¹³ 只松江一個縣，清隊中被揪鬥的「九類」對象就有5063人，其中被作為「走資派」者36人，「叛徒」53人，「特務」568人，「地主」340人，「富農」249人，「反革命分子」1840人，「壞分子」1129人，「右派」83人，「現行反革命」707人，「資本家」58人。¹⁴

清隊要求「大揭大議」、「深挖細找」。¹⁵ 許多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的案子由此產生：上海計算機打字機廠一個女工閒聊時說自己當年是「從天上到上海來的」，勞動人民怎麼坐得起飛機？一查，原來是國民黨軍官老婆，再查，原來是軍統特務。同廠一個工人懂英文，愛看英文報紙，家裏住的是洋房，門上有個小玻璃，裏面看得見外面，外面看不見裏面，工人怎麼會英文怎麼住得起洋房？一查，原來是汪偽和國民黨特務。上海量具刃具廠一個工人過去曾經給日本軍官當過廚師，肯定有問題，審查，不承認，把家屬找來，再查，結果是特務；再順藤摸瓜，於是深挖出一個涉及13個單位的日本特務集團。¹⁶ 當然，這些逼供查出的「特務」，日後沒有一個屬實。

這樣拿着放大鏡找階級敵人，結果是階級敵人遍地。上海氧化鐵顏料廠，全廠160名職工，被查出的特務、漢奸、惡霸、反革命有20名；¹⁷ 上海電訊器材廠，1100名職工，清隊時被審查對象有120人；上海色織十六廠100多職工，清隊時被「揪

13 《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審查報告」，轉引自徐建剛《「四人幫」迫害上海幹部群眾的三場運動》，載於《上海黨史》1990年12期，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辦。

14 《松江縣志》，上海市松江縣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15 這句話出自1969年5月26日市革會辦公室調研組編《簡訊》第239期《全市清隊工作情況綜述》。

16 工總司1968年7月至9月的《簡報》。

17 同上。

出」者10人；上海直流電機廠職工人數2000不到，清隊時批鬥對象82名，其中定為「敵我矛盾」者46名，其中廠級幹部10名；等等。¹⁸ 這些被揪出來的人，或被扣工資，停發獎金，黃浦區財政局200個職工，揪出60人，47人被減工資、凍結銀行存款；¹⁹ 上海第二鋼鐵廠被揪人員209人，佔全廠職工數4.9%，其中59人被扣工資；在車間或全廠的批鬥大會上「陪鬥」人員有185人。²⁰ 更多的人或被強迫延長工作時間，或被調離原工作崗位去幹骯髒繁重的體力活，許多人白天上班，晚上還要寫各種交代、匯報、認識。

清隊根本不重證據，從精神和肉體上折磨，逼着交代。結果越交代越離奇。上海科技系統，凡共產黨執政前夕，沒有去台灣者，都是潛伏特務；共產黨執政後從海外回國者都是派遣回國特務，如此清出個「兩線一會案」。這個案子是文革前夕四清時就開始的，到文革清隊時又被重新翻出立案。受牽連的科研單位十四個，直接受審查被迫害者630餘人，被作為特務遭關押者239人，打死2人，逼死4人，打傷致殘10人。²¹ 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一個清隊對象被軍宣隊的軍人連續刑訊逼供三十多小時，被逼承認自己是特務，軍宣隊又逼着他交代發展了多少特務，他交代了一二人，不行；他只好再擴大到三四十人，還是不行；在所裏的職工名冊上畫圈，還是不行；最後他乾脆指着這個軍宣隊員說「還有你」。²²

崇明縣的「反共救國軍」案，最初只是對兩個相互來往比較多的農民懷疑，在連續審訊下，一人熬不過酷刑，只得按辦案人員的要求和暗示，交代說自己參加了特務組織「反共救國

18 工總司 1969 年 3 月 4 日、11 日及 28 日的《情況匯報》。

19 工總司 1969 年 2 月 28 日《情況匯報》，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20 工總司 1969 年 3 月 24 日《情況匯報》，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21 《上海文革史話》第 437 頁。

22 同上，第 441 頁。此外曾任上海科技系統工宣隊負責人的戴立清，文革後也對筆者講起過這個細節。

軍」，說另外一人是大隊長，手下有40多人。那個「大隊長」於是被更殘酷折磨，吊打28次，肋骨被打斷，終於又交代出80多個特務。這個「特務案」，最後發展到涉及好幾個公社，被審查者達806人，其中4人被逼死，7人自殺未遂，1人致殘，37人重傷，31人輕傷；還有一人因被關押審查，家中嬰兒無人照看，悶死在床上。²³ 類似這樣的冤案、假案，在整個清隊時期遍佈上海。

又據1969年5月26日市革會辦公室調研組編《簡訊》第239期《全市清隊工作情況綜述》，全市到1968年底作為九類對象揪鬥的有16.9405萬人，到1969年3月，九類揪鬥對象還有13.6566萬人。²⁴ 除了地、富、反、壞、右之外，歷史上曾被俘、被捕過的，革命前從事過中共地下組織工作的；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社會關係複雜的，在海外留學或工作過的，在國民政府或軍隊工作過的；有過「不恰當」言論的，等等，統統都被列為審查批鬥對象。在清隊最高潮的1968年，全上海自殺8188人，死亡5607人，是上海1949後非正常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年。²⁵

上海的清隊到1968年底基本結束。

胡守虞小集團案與一打三反運動

上海的清隊開展兩年後，1970年初，中共中央又連續發出三個文件：1月31日的《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的《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要求「打擊反革命，反貪污、反浪費、

23 《上海文革史話》第444頁。

24 同上。

25 這個數字和論斷引自《上海公安志》，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出版。但死亡的5607人，是計算在自殺的8188人中，還是8188之外的又一個數字，筆者感到表達得不清楚。

反投機倒把」(最後一條「反投機倒把」，在上海主要為「反盜竊」)，稱為「一打三反」，重點是打擊「現行反革命」。和清隊一樣，文革初期的目標「走資派」依然未列為主要對象。一打三反運動就這樣在全國推開。2月4日和2月8日，上海市革會連續開會，傳達中央精神，佈置開展運動，並成立了一打三反運動辦公室，由王洪文主要負責。

上海的一打三反運動是從復旦大學拉開序幕的。1970年的春節剛過，復旦校園貼滿了大字報，都是針對「胡守庸小集團」的。將所謂小集團的名稱以胡守庸名字命名，而不是以炮司頭頭周谷聲的名字命名，反映了徐景賢對胡守庸的看法。徐景賢後來對此說明：「胡守庸小集團案，是我直接策劃和指揮搞起來的」：

1967年底或1968年初，復旦三派大聯合時，我參加了三派在新華一村的談判，兩大派的頭頭紅革會的趙基會和紅三司的潘嘯龍沒有明目張膽地要權，而胡守庸是小派，他卻一再聲稱自己應該當一把手，好久不肯讓步，我又認為他是有野心的人物。²⁶

徐景賢對周谷聲尤其是胡守庸等印象不好，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應該還是由於1967年的1.28炮打張春橋事件。徐景賢認為1.28炮打首先是由炮司發起的，「只不過後來被紅革會搶了頭功」；胡守鈞和他的「孫悟空」，對炮打張春橋提出最早，態度最堅決。²⁷ 所以一打三反首先拿胡守鈞開刀。還是在1968年4月左右，胡守庸被隔離，不久逃出，徐景賢本想讓復旦處理此事，但緊接着4.12炮打爆發，只好作罷；他對市革

26 徐景賢 1977年5月16日供詞，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年2月《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

27 同上。

會和寫作組的人說，這次又便宜了他們。張春橋和姚文元也認為胡守虜和周谷聲等人「很壞」。張春橋還在復旦的一次大會講話時說，下一次文化大革命可能就是我們革你們的命。徐景賢後來回憶說，他當時領會這句話主要是對紅革會頭頭和胡守虜等人說的：

我把胡守虜等人看作是張、姚和我的「政敵」，一直想把他們整一下。工、軍宣隊進駐後，我記得我說過胡守虜是「隱患」這一類的話；我在向復旦軍宣隊介紹情況時，還詳細地談過我對胡守虜等人的看法。1970年一打三反開始後，當時工、軍宣隊秉承張、姚和我的旨意（具體怎麼佈置記不清楚了），對胡守虜採取了隔離審查……²⁸

對胡守虜的審查完全是先定性，再找罪證材料。如果只是以炮打張春橋為定罪原因，似乎理由不足，而且有報復之嫌。終於，復旦的工宣隊在邱勵歐處查抄出一批信，找到了「罪證」。邱勵歐是復旦物理系的女生，和胡守虜在復旦同是一派，當時已經被分配去浙江喬司農場。胡守虜被隔離後，工宣隊便追查至喬司農場，查抄邱勵歐的宿舍，在邱勵歐的鋪蓋裏發現一大批信件，還抄出一本《鬥爭就是幸福——遠方戰友書信集》，都是畢業後同學間的來往信件。那時許多同學將來往信件最後都寄到邱勵歐處，大家經常去她那裏看各地同學的來信。後來，陳健煒等挑選一部分來信，由陳健煒的女友、上海教育學院66屆畢業生孟金英匯編為書信集，油印後寄發給各地同學。工宣隊認為有了大收穫，悉數帶回上海。徐景賢佈置將一些「尖端」的信件選出來「給領導看」。市革會印刷廠印出大字本後送徐景賢：

28 同上，《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

我看了認為確實很有質量，就在一天晚上，當張春橋到康平路小禮堂二樓203室開另一個會議的機會，我把這幾封信的排印稿給張春橋看，他一面開會一面翻閱，散了會後他對我說：「靠得住嗎？」我說「靠得住，已經拿到了原信」。記得我還說了幾句是從邱勵歐處拿到的，何穆是和胡守虜、周谷聲一伙的，復旦正在查等。他沒再說什麼，就下樓去了。我知道只要「靠得住」，張春橋是同意整他們的。²⁹

在此之前，復旦已經抄出胡守虜的日記，現在又找到了胡守虜與其他人的通信集。這些信討論時局和人生，有紅衛兵天下捨我其誰的激越，也有年輕人對文革的迷茫和思索。徐景賢認定寫信者是個反革命小集團。他將駐復旦的工宣隊負責人張扣發以及軍宣隊負責人方耀華找去談話，定下調子，說這是個和五十年代的胡風集團一樣的有綱領、有組織、有目的、有計劃的反革命小集團。2月24日，市革會召開由徐景賢主持的碰頭會，會上，將復旦大學作為上海一打三反運動的重點，胡守虜、周谷聲、邱勵鷗等人，被定為「胡守虜反革命小集團重要成員」。他們都是炮司的核心人物，周谷聲是炮司的負責人。整個復旦大學，因「胡守虜反革命小集團」被抓回學校審查者有四十多人，³⁰都是已經畢業工作了當年學生。

1970年春節剛過，出逃回滬的胡守虜被復旦工宣隊抓獲，隨即被宣佈隔離審查。已經被分配去浙江喬司農場的邱勵鷗、被分配去南京無線電廠的周谷聲等等，也都被押回上海，有的戴上手銬，有的五花大綁，關進復旦的「隔離室」。徐景賢要朱永嘉等人將搜查所得的信件、日記等，突擊編出一本像當年《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那樣的材料，連開本大小和編輯板

29 同上，《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

30 這個數字，是邱勵歐 2013 年 9 月 13 日，在給筆者的 E-mail 中寫到的。

式都仿當年的式樣。徐景賢親自修改並撰寫序言，經張春橋審閱同意，印刷了二十萬冊，向全市散發。每天都有成批成群的人被組織去復旦校園看大字報。復旦大學又一次成為運動的中心。

文革初期慣於從走資派言論中找出「問題」批判的紅衛兵們，如今自己的言論書信也被找出大把「問題」。一場批判在全市開展。胡守虜等被兩次揪到以江灣體育場為中心會場的萬人大會上批鬥，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都參加，張春橋聽了大會錄音。³¹ 在1970年4月22日的批鬥大會上，徐景賢、王秀珍以及王維國都作講話，戴立清也代表工總司講話，大會由駐復旦大學工宣團團長張扣發主持。所有的發言都由寫作組起草的。這些被批判的紅衛兵，當年曾經為工總司的成立及早期活動起過重要作用。當初工總司的籌建，出力者除了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就是上海的炮司，尤其周谷聲和邱勵歐，起了重要作用。工總司初期，炮司派出許多紅衛兵，為工總司總部負責人當聯絡員，他們開會時作記錄，平時負責聯絡。現在，王秀珍以市革會負責人身份號召對他們揭發批判；戴立清的發言更是說他們當初「陰謀控制工人運動」，「用特務手段，假借為工總司領導成員配備秘書之名，暗中按上釘子，每人一個，就連工總司一般工作人員，後面也跟上兩個『尾巴』」。³² 這個發言也是寫作組起草的。工總司總部以這個發言，撇清自己與炮司的關係。

因胡守虜小集團案被隔離審查者，最多時達四十多人。胡守虜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十年，³³ 炮司的周谷聲和邱勵歐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其他人都受到各種處理。他們的親友也受株連，有的親友甚至被逼得經神失常。上海和外地

31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534 頁。

32 戴立清在 1970 年 4 月 22 日《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胡守虜小集團反革命罪行大會》上的發言：《胡守虜之流是工人階級的死對頭》，載於復旦大學政宣組 1970 年 5 月編《革命大批判文選》。

33 胡守虜文革後平反，實際在監獄和勞改農場被關 6 年。

受胡守庸小集團案牽連而遭迫害的，在一百人以上。³⁴ 例如，因為《遠方戰友書信集》收進了紅鷗給周谷聲的信，經徐景賢批准，王秀珍親自寫信給蘭考縣委，將在那裏插隊落戶的紅鷗和另一個中學生海鷹，於1970年3月揪回上海審查批判。專案組一定要她們承認是胡守庸派她們去蘭考的，目的是在蘭考建立反革命根據地，實現以「農村保衛城市」的反革命計劃。³⁵ 紅鷗從1970年3月一直被關到1973年2月左右的春節放出，關了近三年。其他參加過炮打者，也被押回復旦。例如紅革會的勞元一，1971年6月在已經工作的北京被抓，用一架飛機押往上海。一到上海就被關在復旦，家裏人來看他，學校工宣隊不讓。勞元一絕食，還給徐景賢寫信。徐景賢指示放他出來，但放出來後讓他去挖防空洞，懲罰性勞動。就這樣，勞元一被關了近兩年。被關的還有紅三司的潘嘯龍和譚啟泰。

有市裏「胡守庸小集團案」作榜樣，下面也動不動就是「××小集團」。這也是文革前常見的罪名。參加過兩次炮打的「炮打分子」，或曾為炮打提供材料者，甚至只是私下對張春橋有過議論者，都在打擊範圍之內。如炮司、紅革會等紅衛兵組織的成員，如上海圖書館藏書樓職工，如張春橋曾經表態說「無事」的朱錫琪、艾玲、邵傳烈等。他們均被立案，關押隔離。

還有上海音樂學院，因為曾經有人對江青的樣板戲音樂有看法，私下對張春橋表示不滿，於是被張春橋說成是「炮打的大本營」，「革命樣板戲的對立面」，甚至專門指示：「你們可以準備些材料，抓幾個，槍斃幾個才能震動」。³⁶ 就這樣，不論與案子有無關係，也不論家中有無孩子老人，音樂學院的700左右全體師生員工統統被關在學校，一律不准回家。專案人員還專門繪製了一系列「反革命集團黑線網」圖表，僅1970年3

34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534 頁。

35 筆者 2011 年 4 月 26 日對侯美度的訪談。「紅鷗」是她在文革初期的名字。

36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521 頁。

月中旬的幾天內，就有23人被隔離，關進陰暗潮濕終日不見陽光的地下室，或者關進只有3、4平方米的練琴房，不准通信，不准親屬探望，關押時間最長的四年半，最短的四個多月，大多數被關兩年以上。聲樂系一個教師，原定隔離名單中沒有他，卻被隔離。有人向辦案負責人提出，回答是「超額完成任務，很好嘛！」這位教師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關在地下室中達四個月。還有23人被「半隔離」，也被定下一系列限制：不准與人談話，不准看大字報，行動必須走指定路線，等等，關押時間長達二至四年。更多的人被以「辦學習班」或其他名義受審查。據不完全統計，音樂學院當時被扣上各種「反革命」帽子者多達110人。佔全院總人數15.8%。審訊手段也是逼供套供誘供加酷刑，鼓動對象要敢於交代「自己連想都不敢想的問題」。一些人被整得精神恍惚，神志不清，被迫胡編亂造。辦案者就在廣播喇叭叫嚷「某某某放了衛星」。一個1949年只有5歲的職工，被宣佈為「國民黨潛伏特務」。音樂學院在僅1970年一年中，被逼自殺3人，被逼經神失常或半失常8人。更有甚者，一個被誘逼出來的「轉移黑材料」的交代，牽涉東海艦隊的一個快艇艦長，艦長此時正在海上執行任務，學校專案組立即通過市革會，下令艦隊從海上將這位艦長追回審訊，最後將艦長逼得自殺而死。³⁷

而在上海師範學院，工宣隊政委親自主持指定「作戰計劃」，將參加過炮打的部門和人員作為一打三反運動的重點打擊對象，或揪鬥、或隔離審查，或辦「封閉式學習班」。整個運動中，師院逼死2人，其中1人是幹部，1人是紅革會的學生池東明；逼瘋1人。³⁸

37 1977年3月26日《文匯報》《憤怒控訴「四人幫」大搞法西斯專政的罪行》。

38 上海師範學院運動辦公室1977年11月4日，轉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1981年2月《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

除了政治案件外，一打三反運動還清出一大批「經濟案件」。據1972年12月運動基本結束時統計，全市共揭出「犯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等經濟問題人員13.1645萬人，金額5630萬元，經濟集團案459個」。作為全市辦案典型的虹口區六個財貿公司，8319人被作為運動對象，佔全體職工的43%。³⁹

到1972年一打三反運動基本結束，188904人受審，被立案的「反革命集團」有122個，被扣上「現行反革命」罪名者29242人，1651人被逼死。⁴⁰ 上海十個區，每區揪鬥的重點對象都在數千人以上，有的高達萬餘人；閘北區一打三反中揪鬥了5700人，其中屬「政治問題」者360多人，屬「經濟問題」者5400多人；徐匯區揪出有「政治問題」者570多人，有「經濟問題」者5500多人。郊區十縣，揪鬥人數6.4萬人，非正常死亡520人。⁴¹

到1972年，一打三反運動基本結束。

清查「5.16分子」

「5.16分子」典出「5.16兵團」，原是1967年上半年，北京出現的一個秘密組織，起名自1966年中共中央的《5.16通知》，據說宗旨是砸爛國務院，打倒周恩來。1967年9月8日，《人民日報》等發佈的姚文元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文中根據毛澤東的意思，將這個組織定為「形左實右」的「反革命組織」。1970年3月27日，幾乎與一打三反運動同時，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清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上海由於正在開展一打三反運動，所以清查「5.16分子」不像外地一些省市那樣大規模。不過，還是涉及到許多人。

39 1977年4月13日解放日報《情況簡報》，轉引自徐建剛1990年《「四人幫」迫害上海幹部群眾的三場運動》。

40 《上海通志》第45卷專記第一章《文化大革命紀略》。

41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522頁。

1971年4月，市革會第二辦公室成立，由王洪文負責，專管各種「防擴散案件」。⁴² 專案組列出十個「反革命大案」：胡守虜小集團案、炮打聯合專案、反復辟學會案、聯司案、中申會案、共向東案、狂代會案、江蘇老人申聯會案、南京三團兩隊復員軍人案、解放委員會案。⁴³ 這十大專案，有一些是一打三反時的案子，例如胡守虜小集團案、共向東案，延續到清5.16分子。更多的是1971年專門立案的。炮打聯合專案組是1971年5月，市革會專門成立的涉及全市高校的案子。復旦大學、上海師大、華東師大、上海音樂學院、上海第一醫學院、上海外語學院和上海科技大學共七所高校，受到各種審查者856人，其中逮捕拘捕368人，逼死12人，逼瘋12人，全市因炮打張春橋受到審查者(不包括一般請罪檢查)，達2500多人。⁴⁴

這十大專案，反復辟學會案，是1967年下半年復旦大學的一個討論時局的學生論壇。江蘇老人申聯會案，是1967年至1968年間，游雪濤小組搞的無中生有、捕風捉影的事情，說江蘇有一批老幹部組織了老人申聯會並派人到上海活動；這個根本不曾存在的組織，使得108個幹部在清5.16分子運動中受到審查，其中6人被關押。⁴⁵ 「中申會」案，主要針對影印版《紅衛戰報》，及其刊登的《一切為了九大》，一些中申會成員被從插隊落戶的農村揪回，關在原來的中學審查。前面章節已提及。《一切為了九大》的執筆者毛兵，1971年春節期間被抓投入監獄，整整關了4年，被逼得精神錯亂。「共向東」案，是市革會政宣組工作人員朱根富、閔孝思、吳敦宏和胡志宏4人，以「共向東」為名，散發傳單抨擊文革。1967年11月清隊剛開

42 所謂「防擴散案件」，即因議論和批評毛澤東、江青、林彪等文革中在位的中央領導人被立案者，案件內容甚至連一般辦案人員也不准了解，更嚴禁傳播，否則也論罪處理，因此稱「防擴散」。

43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522頁。

44 徐建剛1990年《「四人幫」迫害上海幹部群眾的三場運動》。

45 《文匯報》1980年12月5日於有海《張春橋和他的「二四四」特務組織》。

始，便被立案，主要成員或被隔離審查，或被毒打，並遭多次批鬥。1971年再一次被立案，主要成員又一次被關押，直到1973年才結案，給予黨紀處分。在整個清查5.16分子運動中，上海有近二千人被作為5.16分子，受到不同程度打擊。⁴⁶

由於5.16分子反革命集團根本是個子虛烏有的組織，即使在北京和外地也從未存在過，上海的許多案子更是十分牽強，找不到確鑿證據。1973年3月，市專案辦公室起草報告，對到底是否有5.16分子反革命集團和5.16分子表示疑問，歷時兩年多的清查5.16反革命分子運動無聲無息地結束。⁴⁷不過，十大專案中的狂代會案，因為與迫害戲劇學院教工有關，當事者文革後被再次審查。

三場運動的嚴重後果

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5.16反革命集團，三場運動一個緊接着一個，受到各種迫害的人數，佔整個文革中遭到迫害人數的80%以上。⁴⁸文革結束後的1984年4月對上海文革案件復查統計：全市共有各類文革案件34.87萬多起，加上被株連的家屬親友，涉及面100萬餘人。其中幹部案件10.1295萬起；「叛徒集團」、「特務集團」、「反革命集團」等集團性案件949起。全市非正常死亡人數1.1510萬人。⁴⁹

1970年開展一打三反運動的三個中共中央文件之一《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將判處死刑的權力下放，更使後果嚴重。當時的這個文件要求：「殺人由省、市、自治區

46 徐建剛 1990年《「四人幫」迫害上海幹部群眾的三場運動》。

47 同上。

48 《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審查報告》，轉引自徐建剛《「四人幫」迫害上海幹部群眾的三場運動》，載於《上海黨史》1990年12期，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辦。

49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428頁。

革命委員會批准，報中央備案」；還要求「對於那些氣焰囂張，罪惡纍纍、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殺掉」，「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這樣才令人心大快，敵人震懾」。⁵⁰ 就這樣，死刑判決無需最高法院認定，省市可自行決定，使得生命又少了一道保障。同時，又提倡「群眾辦案」，市公檢法軍管會將要判刑者名單下發至基層工廠或單位的生產班組，讓群眾討論判刑。在有些班組，職工討論得比較認真，但更多班組的討論，與其說是「群眾辦案」，更像是「不負責任的決定」：輕率、冷漠而又隨口的「槍斃」、「無期徒刑」，似乎根本沒有想到他們是在給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判定生存的權利。⁵¹ 1969年至1972年審理的反革命案件最多，處刑也最重。而這四年，正是「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5.16反革命集團」，三場運動鋪開之時。

在這三場運動中，許多單位造反派私設牢房。比起一些進駐大學工宣隊軍宣隊對被審查者的精神折磨，這些私牢乾脆就是酷刑。後果比較嚴重的私刑牢房有：中華造船廠、江南造船廠、滬東造船廠。其中光是中華造船廠，在1967年至1970年間，就設立私刑牢房15間，刑堂30多處，組織和訓練打手200餘人，使用酷刑30餘種；先後關押103人，不但關押刑訊本廠原地下黨幹部，而且關押刑訊市裏和其他單位的幹部，例如市委組織部長楊士法。被關押者無不遭毒打，打死逼死者多達12名（廠內職工10人，廠外被送往該廠的2人），被打傷、致殘、逼瘋者21人。前章提的機關聯絡站負責人程綺華的丈夫黃浦區副區長張六吉，就是在這個廠遭到毒打後，被逼自殺的。滬東造船廠造反派私設的牢房關押的41人中，逼死4人，7人被逼得自殺（未遂），多人致殘。⁵² 還有江南造船廠的私刑牢房：

50 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1 筆者當年工作所在的班組工人，就是這樣討論定案的。

52 這幾個私刑牢房的資料均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68年至1970年，先後「審查」迫害了，其中有129人被非法關押，(在廠的29名地下黨員，無一倖免)，慘遭嚴刑拷打，3人被活活打死，29人被迫害逼死，29人被打成重傷致殘。⁵³

文革結束後對文革中的「反革命」案以及其他刑事案件重新鑑別。其中，尤其「反革命」案件，幾乎沒有一個能夠經得起重審。據文革結束後統計：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共審理反革命集團案件624件(其中1968年未作專項統計)。1969—1972年審理的反革命案件最多，處刑也最重。這4年中，共審理這類案件540件，其中1969年為455件，1970年為34件，1971年為22件，1972年為29件。這些案件中，有的是幾個人一起議論，建立各種名稱的組織反對「文化大革命」，一般都按反革命集團予以處刑；有的參加了反革命組織，但目的不明確，也未進行活動，而由於有政治歷史問題，當時都當作反革命集團成員判刑。……

「文化大革命」期間判處的反革命案件數量較多。1966—1976年，共受理反革命案件8499件(1968年缺統計)，佔全部刑事案件數的22.20%。其中，1966年佔20.26%，1967年佔11.29%，1969年—1971年分別佔36.14%、46.18%和36.24%，1972年佔21.61%，1973年佔9.01%，1974年佔5.65%，1975年佔4.88%，1976年佔4.70%。1970年，全市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的人數佔當年判處死刑人數的65.26%。

1981年《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罪證材料附件》中的「附件9」。還有，筆者文革結束後在上海市總工會工作時期的直接領導、總工會生產部長王克順，也告訴過筆者，他文革中曾經被關在中華造船廠，遭到毒打。

53 同上。

1974年，將破壞上山下鄉運動案件列入「反革命破壞上山下鄉」專項中統計，全年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人數共22人，其中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共14人，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5人，判處管制和其他刑罰各1人，免予刑事處分1人。⁵⁴

而這些「反革命」中，被判處死刑的，據1980年上海市各級人民法院統計：

文化革命期間全市共判處死刑290件，309人，其中反革命案158件，172人；普通刑事案132件，137人。到11月底為止，在已復查的258件，268人中，發現冤殺案43件，44人，其中反革命案件42件，43人；普通刑事案1件，1人；錯殺案52件，53人，其中反革命案45件，46人；普通刑事案7件，7人；論罪可判無期徒刑和死緩的錯殺着，但對外不公開糾正，作為內部總結經驗教訓的40件，45人，其中反革命案14件，16人，刑事案件26件，29人；改變反革命性質，維持原判死刑的26件27人；維持原判的97件94人。尚未結案的還有32件41人，其中反革命案件27件，36人普通刑事案5件，5人。⁵⁵

這還只是文革剛結束時的甄別數字。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徹底否定文革，被糾正、平反的數字，更應該多得多。⁵⁶

54 《上海審判志》，《上海審判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

55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1980年12月8日《上海市各級人民法院復查處理「文化革命」期間判處的刑事案件情況的材料》，(80)滬法刑字第159號，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1981年2月編《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罪證之五》。

56 筆者沒有收集到這些數字，待以後補充。

造反派被整肅

文革初期的1966年下半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許多人被貼大字報、抄家、批鬥；到年底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及1967年初的一月奪權，幹部成為主要衝擊對象。而從清隊開始，前十七年的政治和刑事打擊目標又開始復位。文革初期一度對個人道德及生活作風等稍有的放鬆或寬容也重新收緊，以至於一打三反運動剛開始時，揪出的都是些「男女關係問題」，而非「現行反革命」。⁵⁷ 階級鬥爭的目標又重新向下。這使得許多本來就有着各種性格作風缺陷的造反派，被重新上台的原幹部，以及早就對他們不滿的原保守派或對立面組織的群眾進行清算。根據中央文件，一批犯有生活腐化、貪污盜竊錯誤的造反組織人員被查處。

清隊剛開始，工總司就開始對所屬各區、局聯絡站，領導核心人員的政治情況進行調查。從1967年12月13日至1968年1月20日止，共調查10區和15個局的聯絡站、以及工總司總部和造反派計449人，「經初步分析，具有各類問題的有260人，佔全部被調查人數的58%」。調查報告把260人的問題歸為以下幾類：

- (1)本人政治歷史有重大問題者；
- (2)本人是壞頭頭，已被政法指揮部和文攻武衛指揮部等拘留的；
- (3)本人就是阿飛頭子，原單位準備送去勞改的；
- (4)反革命家屬，本人思想極端反動者；
- (5)妻子為小業主或資本家的老闆娘；
- (6)本人思想一貫反動的；
- (7)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開地下工廠；
- (8)亂搞男女關係，腐化墮落分子；

57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521 頁。

- (9)直系親屬和社會關係中有重大海外關係的；
- (10)社會關係複雜者；
- (11)一個單位有幾個，代表面不廣的，一個廠有三、四人在同一系統當頭；
- (12)不屬工總司系統的如財貿、學生在工總司系統工作者；
- (13)自己跑出來掛鉤，單位不同意的，有的單位甚至不給發工資。⁵⁸

這13類情況，除了第(2)類中，可能會有一些如武鬥、打人、強姦侮辱婦女等確實違法的案子；其他12類，尤其所謂政歷、社會關係問題，都是當時階級鬥爭語境下的所謂「問題」，如今看來不成問題或不成嚴重問題。當時對這13類造反派的處理，主要是解除造反隊頭頭職務，回原單位工作，一般都不作刑事處理。造反派遭整肅，王洪文等很清楚是反文革勢力對造反派的反攻倒算。1968年4月11日，王洪文在工總司總部委員擴大會議上講話，說清理階級隊伍中：

颯起了一陣右傾翻案風，明顯的特點就是：否定革命造反派，否定一月革命，為資反路線、走資派、叛徒、特務翻案，並企圖從組織上搞垮革命造反派。公開叫囂：「一月革命就是反革命篡黨奪權」，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抓住造反隊和革命委員會的某些缺點錯誤和某些同志存在的一些小問題，斷章取義，攻其一點，造謠誣蔑，無限上綱，到處揪「壞頭頭」、「黑手」。⁵⁹

58 《專案調查情況報告》，原文無成文時間及作者，從文章內容看，作者應為工總司，成文時間應在1968年1月底左右。原件為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59 王洪文1968年4月11日：《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決粉碎右傾翻案反革命逆流，全面落實毛主席最新指示，迎接全市革命人民代表會議》，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王洪文舉例說，交運局有個赤衛隊員說：我就是翻案。交運局造反聯絡站負責人被整，許多機關幹部都參與；章華化工廠的赤衛隊員在造反隊辦公室門口刷上大標語：「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王洪文說，一些人對揪造反派頭頭非常感興趣，對批判走資派卻提不起勁。王洪文強調：「清隊的對象是指公安六條，不是犯了錯誤都要揪，不能隨便揪壞頭頭。」⁶⁰

但是，接踵而來的一打三反，還是整肅了不少造反派，尤其一打三反運動，最初從整紅衛兵造反派開始，後來發展到整職工造反派。在許多工廠，一打三反運動鋪天蓋地的大字報，絕大多數針對造反派，特別是那些文革中鬧派性、武鬥、打人等問題嚴重的造反派。其中有造反派自身問題，也有重新上台的幹部，抓住造反派的問題打擊報復，還有當初的老保的反擊。一份1969年的調查報告顯示，工總司所屬區、局聯絡站常委以上頭頭，自1967年3月到1968年3月，被公、檢、法軍管會(組)拘留或逮捕的有30人：

其中：本來是敵我矛盾的有5人，直系親屬被關、管或好人犯了嚴重錯誤的有25人。在運動中，有的打着造反旗號，把鬥爭鋒芒指向市革會和工總司，企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的渾水摸魚，幕後策劃，打死人；有的貪污盜竊，強姦婦女等犯罪活動。初步了解，在總人數中，現可結案的有15人，尚未結案15人。這些人的分析，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

1.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本來是壞人，運動中又幹盡壞事。×××於1948年參加國民黨任情報員，並搜集我軍事情報，運動中大搞打砸搶，造成嚴重流血事件。×××因強姦少女於1959年判刑二年，運動中包庇壞人和破壞有關單位文化大革命等，繼續犯罪活動。×××於1961年參加「新共產黨」反革命集團，任總理，運動中又幹盡壞事。

60 同上。

2. 打死人的策劃者和兇手。×××於1967年8月策劃火攻國棉14廠，打死朱世芳。×××是打死上海化工學院邱賢宏的兇手。

3. 貪污盜竊，強姦婦女，生活腐化墮落。×××強姦少女一人，腐化12人，貪污盜竊數千元。×在1958年強姦少女2人，運動中又有強姦婦女等罪行。

4. 污蔑偉大領袖，把矛頭指向市革會和工總司。×××在運動前寫過反動字句，攻擊三面紅旗，運動中又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咒罵林副主席和江青、春橋同志以及污蔑解放軍。××在1962年蔣匪企圖竄犯大陸時，妄想叛國投敵，運動中對市革會和工總司恨之入骨，以他為首密謀企圖綁架、暗殺市革會和工總司負責人等犯罪活動。

5. 大搞打、砸、搶、抓，造成嚴重後果。×××在1961年寫過反動信件，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運動中挑起101廠、804廠的嚴重武鬥事件，之後，又積極參與普陀區幾個大規模武鬥事件，並造成嚴重後果。⁶¹

1970年，工總司組織組又曾對所屬九個局的工總司聯絡站進行調查，九局聯絡站共有委員124人(其中常委41人)，「由於各種原因，不能繼續留任領導崗位工作的有47人(其中常委4人)」。據這份調查報告統計，這47人中：「掌權後犯錯誤，有14人」；「不符合接班人條件的有17人」；「系統歸口或工作調動的有15人」；「壞人、混進群眾組織1人」。

而根據1972年工總司總部下發的《新幹部統計表》統計，工總司在輕工業局所屬十個公司聯絡站的負責人共121人，因本人掌權後犯有政治、經濟、生活上嚴重錯誤或者不稱職等原因，被清洗出領導崗位者64人，佔全局造反派頭頭的50%左

61 《關於各、區、縣局聯絡站常委以上被拘留、逮捕的情況報告》，工總司情況組1969年4月19日。

右；⁶² 又據輕工業局下面的鐘錶公司所屬31家工廠統計，造反隊委以上負責人348人，因以上原因下台者234人，佔全公司造反派負責人的70%左右。⁶³

造反派儘管受到整肅，但和其他被審查的幹部、群眾不同，他們基本沒有被刑訊逼供，沒有遭受皮肉之苦。他們大多只是被貼了一些大字報。除了少數被公檢法判刑者外，大都只是被造反隊聯絡站解除職務，回廠回生產班組幹活，或「掛職下去勞動」。⁶⁴ 直到1970年6月，張春橋提出「要正確對待老造反」，運動轉為重點揭批「現行反革命分子」，着重打擊1967、1968年兩次「炮打」張春橋者以及對江青有不滿言行者。⁶⁵

小結

清隊、一打三反和清5.16，是對政治名份的又一次鑑別和劃分，是文革對象的又一次轉換。但和之前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及「一月奪權」不同，政治名份的自我鑑定不再被承認，自上而下的鑑定重又恢復。本來，批判「資反路線」和「一月奪權」，政治名份的評定權，從十七年一貫掌握在各級幹部手裏，顛覆為由底層群眾掌握評定權。由底層群眾評定幹部是否「革命」，決定是否予以「解放」。但是這樣的時期非常短，革委會建立，隨着一批又一批幹部的復職，運動的領導權又漸漸回歸到幹部們手裏。革命對象重新回到十七年，回到文革前的標準。

文革始終有兩個目標。一個是十七年階級鬥爭的目標，

62 工總司1972年11月下發《新幹部統計表》，工總司輕工業局聯絡站填寫，筆者根據表格統計。

63 同上。

64 《關於九個局聯絡站領導班子分析情況匯報》，工總司組織組1970年5月29日。

65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524頁。

一個是毛澤東的文革目標。這兩個目標此起彼伏在運動的最初期，幹部們將十七年目標作為主要打擊像，後來毛澤東的目標走資派成為運動重點。但到清隊，十七年的目標重又回歸。而政治身份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判定權，則隨着這兩個目標的轉換而轉換。造反派的目標和毛澤東的目標是一致的，造反派始終試圖顛覆以往的打擊標準，堅持將「走資派」作為頭號打擊對象。雖然都是階級鬥爭，但一個矛頭向上，一個矛頭向下。可以說，整個文革就是對階級鬥爭具體對象的爭執。造反派始終堅持矛頭向上；復職後的各級幹部堅持原來的打擊目標。到清隊開始，打擊目標重新又向十七年的目標回歸。不過，清隊時新的革委會的權威尚未完全確立，幹部們即使被「解放」，「三結合」進革委會，也尚未恢復以往的權威。因此，清隊的目標，是由造反派組織和革委會共同決定的。

橫掃、紅八月、清隊，是一脈相承的。檔案中記載的才是最真實的被領導認定的名份。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被領導認定的真實名份。這個名份隱藏在檔案中，隨着每次政治運動的需要，有選擇地被拋出。許多被清查對象的材料，實際都是由各級黨委在「四清」便已內查外調，或從檔案中挖出，有些在文革發動時期的「橫掃牛鬼蛇神」中，已經拋出過。只是毛澤東主持制定的《十六條》不許將批判矛頭對着群眾，才暫時擱置一邊。到了清隊，由造反派組織和剛成立的革委會接棒，再次被拋出。由於幹部失去權威，沒有了制約，於是所有的哪怕芝麻綠豆大的事情都被拋出。

清隊、一打三反和清5.16，三場運動實際就是各級黨政收回政治名份評定權的過程。清隊時，還是造反隊和革委會一起提出對象，所以可以說是回歸的過渡時期；到了一打三反和清5.16，就是由革委會提目標了。政治名份的鑑定重新回歸自上而下，不再是自我認定，不再是群眾給幹部貼標籤。尤其後兩場運動：一打三反和清5.16，目標大多對着造反派。上海市革會

專案組1971年列的十個「反革命大案」，除了「老串會」對着老幹部，其餘九個大案，基本都是清查造反派。而在各基層，從一打三反開始，不少造反派受到整肅，那些有着這樣那樣問題的造反派，大多是在這兩場運動中落馬的。造反派的自身素質，使得幹部和反文革勢力有理由對他們秋後算賬，這也是每場革命高潮之後必然的自我清理。與此同時，幹部的審查權，也完全回歸各級黨組織。雖然，這樣自上而下的評定，很多是由工宣隊和軍宣隊實施的，但在革委會權威尚未建立時，工宣隊和軍宣隊代表着政權的權威。

清隊、一打三反和清5.16，是文革前政治運動模式的回歸。這樣的回歸，不但在於政治名份評定權的回歸，而且還在於運動目標和標準的回歸。文革將大量精力投入對幹部的歷史審查和隊伍的純潔，而不是對制度的改革。對「叛徒」、「特務」的審查成為運動重點，「走資派」反而越來越成為次要。而且究竟何為「走資派」，概念越來越空泛。對幹部濫用權力的批判，全部被對幹部歷史的審查替代；對幹部特權制度，也基本沒有衝擊。只要恢復權力，「待遇」馬上跟着恢復。就這樣，文革無法發展出對幹部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的制度改革。

第三十一章

市總工會 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特殊領地

市總工會的碰頭會和兼任制度

1967年一月奪權後，尤其是1968年毛澤東提出「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後，許多工人造反派先後離開工總司總部或工總司的各級聯絡站(以後是工代會、市總工會或各級工代會、工會，下同)。聯繫這些已經不在總部的老造反的紐帶，是總部「碰頭會」制度。

還是在1967年4、5月份，工總司總部制定了學習制度，內容主要是學習馬列和毛澤東著作，由王洪文後來是王秀珍或葉昌明傳達市革會指示過佈置工作。參加對象是總部各組組長，他們就是前面章節經常提到的金祖敏、陳阿大、黃金海、戴立清、王明龍、王成龍、張寶林、王腓利等，後來又加上馬振龍、汪湘君。1967年底的四屆工代會，設立了委員會，常委還是原來的五常委，但其中潘國平和蔣周法已邊緣化。¹ 王洪文擔任市革會領導職務，不常去總部，陳阿大去市革會工交組工作，總部只剩葉昌明一個常委。所以，總部討論工作和學習，還是依靠這些組長們。他們是工總司總部實際上的核心，也是四屆工代會的核心。

1968年底到1969年，金祖敏擔任了市革會組織組負責人，張寶林擔任了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負責人。接着，「工人階級領

1 此外，范佐棟最開始也是常委，耿金章一度是常委。

導一切」，工總司總部的核心人物都去了工宣隊，不久工宣隊與市革會相應辦公室合署辦公，他們都擔任了市革會各組辦領導，或成為組辦成員，總部只剩葉昌明一人留守看家。由於這些骨幹成員都離開工總司總部，王洪文就制定了工總司的委員「學習會」制度，時間是在1969年初，全市為恢復共產黨活動的「整黨建黨」開始後。內容主要也是學習文件、報刊社論，以及傳達領導講話包括王洪文講話等。² 王洪文自己較少去總部參加會議，不過總部開展「小整風」時，他一定會到場。這樣的學習會，開始是每周二次，後來改為每周一次。

最初開會全體委員都參加，分成兩組；將這些核心人物分到兩個組作為骨幹。但人太多不方便。後來碰頭會就只召集那些已經在市裏其他部門擔任領導的委員，如王秀珍、金祖敏，以及陳阿大、黃金海、戴立清、王明龍、王成龍、張寶林、馬振龍、王腓利等。此外，總部若有事要商量，也將這些在外面擔任領導的老頭頭召回開會討論。工總司的重要事宜包括五次工代會的籌備，都先在這些人中商量。³ 參加學習的一度還有王日初，他不是市總工會常委，但最初也被邀參加每周的常委碰頭會，因為他那時是警備區派駐工總司的軍代表，後來擔任市革委會組織組負責人之一。常委中的楊富珍基本不參加學習會，她雖然曾宣佈造反，但始終和造反派合不來。一開始葉昌明也通知她，她幾次都不去，以後葉昌明也就不通知她了；但如果是工作研究會，她有時也參加。不過這一階段的學習會還沒有形成固定制度，時有時無，斷斷續續。

1973年五次工代會組建市總工會常委會和委員會時，葉昌明曾經請示：對那些已經幾年不在工會工作的老委員，是否還要放進常委中？王洪文通過王秀珍轉達，盡可能都放進去，

2 葉昌明 1977 年 4 月 5 日《交代關於利用總工會結幫的問題》。

3 以上資料全部引自葉昌明 1977 年 4 月 5 日《交代關於利用總工會結幫的問題》。

常委會可以大一些。王洪文要求，讓那些已經擔任市裏其他職務的工人造反派都兼任市總工會領導成員。王洪文自1967年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到1971年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以後又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期間始終兼任上海市總工會主任。而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王秀珍、市委組織部負責人金祖敏、市工業交通辦公室負責人陳阿大，都兼任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中共十大召開以後，王洪文又要求將其他原來是工人，文革中擔任了中央委員或市級領導職務的工人造反派也納入市總工會常委會。

從五屆工代會始，市總工會建立了常委學習制度。每周一上午八點半到十一點半，常委集體學習毛澤東提出的六本馬列著作，這是「雷打不動」的固定制度，每周半天。⁴ 1973年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召開以後，王秀珍又要工人新幹部陳佩珍、馮品德和張國權也參加市總工會常委學習碰頭會。他們不是市總工會常委或委員，但都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說是學習會，內容也不只是學習，還有「湊湊情況」，「商量一些事情」，例如批林批孔中工會打頭陣，「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情況等。⁵

就這樣，王洪文以擔任黨政負責職務的工人新幹部兼任工會負責人的措施，以及市總工會常委學習會的制度，加強文革工人新幹部對工會的認同感和凝聚力。而那些已經擔任各級領導的新幹部，又為市總工會獲得更多的政治人脈和資源，尤其擴張了工會的影響力。下面的工會的人事安排也是這樣。市總工會在組建區、縣、局工會領導班子時，一般盡量安排已經擔任黨委或革委會正副領導或常委的新幹部，兼職工會主任。例

4 此時王腓利、張寶林、王明龍等因為各種原因而淡出總部，前文都有提及。此外，警備區軍隊自1967年1月後，就向工總司派出「支左」小分隊，小分隊的負責人也都參加「碰頭會」。王洪文自己較少參加「碰頭會」，只有在「小整風」時才參加，平時都由葉昌明具體負責；後來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離開上海，他明確由王秀珍負責管理這些老頭頭。

5 馬振龍1979年10月18日。

如紡織工業管理局的唐文蘭、輕工業管理局的馬振龍、徐匯區的蘇桂珍、靜安區的錢永年等等，當年都是工總司下面的聯絡站負責人；共產黨的組織活動恢復後，都擔任了所在局或區黨委的副書記，後來也都被安排擔任所在區或局的工會主任。於是，各級工會的大多數正職主任，都由擔任了黨政領導的新幹部兼任，日常工作由副主任主管。此外，對其他已經擔任黨政負責工作的工人新幹部，市總工會也要求盡量讓他們兼工會職務。市總工會並要求各級工會也建立這樣的碰頭會制度，那些有工會職務的工人黨政負責幹部，必須回工會參加組織活動。對於那些沒有工會職務、卻在區、縣、局等領導部門工作的其他新幹部，市總工會要求區、縣、局工會多加以關心，經常對他們進行考察、了解。⁶

雖然，工會主要負責人由同級黨委負責人兼任的制度，文革前就一直沿襲。但文革前黨的幹部兼任工會主要負責人，是為了加強黨對工會的控制和領導；而文革中工會幹部由擔任各級黨政領導的新幹部兼任的做法，使得工會獲得黨政資源和支持。

市總工會還要求區、縣、局工會，關心和團結派駐的工宣隊負責人和工代表，也邀請他們參加區工會的學習碰頭會或其他活動。1972年8月5日，王秀珍多次召集各工宣隊負責人在市總工會開會。王秀珍在會上說：「總工會要關心工宣隊工作，並要把他們當作一項經常性工作來抓。總工會應該有這個責任關心進駐上層建築的工宣隊。」接着市總工會向王秀珍打報告，說：「工宣隊不能作為一般工作人員來使用。工宣隊的工作最好要明確由誰來抓」；提出：「到會同志一致要求總工會今後對這一批工人幹部關心教育。」王秀珍看了報告後，批轉金祖敏。於是市總工會組織組設立了四人工作小組，由市總工會組織組組長兼職負責，對工宣隊狀況進行調查。葉昌明要

6 葉昌明 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市總工會所辦的工人政校和幹部讀書班，每期吸收工宣隊營、團級以上幹部參加。市總工會建立了工宣隊幹部名冊，作為準備輪訓的對象，到文革結束時共輪訓二百多人。葉昌明還佈置辦公室向工宣隊各連隊增發市總工會編印的內部刊物《情況交流》，以及市總工會的其他材料，每次都分發一千多份。⁷ 王洪文對上海的工宣隊更是關心。1972年至1973年上半年，已經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回上海，多次向王秀珍關照一定要抓好工宣隊：

工宣隊進駐要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要當主要領導，不當辦事員……這是支戰鬥部隊，在上層建築都擔任領導工作，要關心他們。工宣隊是培養幹部的很好途徑，我們培養信幹部，一個是從工廠選拔，另一個是工宣隊，因為他們已在上層建築鍛煉幾年了工宣隊是工人隊伍派出來的，市總工會應該管起來，工會開什麼會議請他們參加，我們有什麼精神他們回去就傳達了……這支隊伍太重要了，掌管了上層建築的領導權。我們要靠這些幹部支持我們，你一定要管好。⁸

雖然，上海的工宣隊，主管單位是市革會，工宣隊的工作會議都由市革會召集，市總工會從不插手工宣隊的具體工作，所作的只是思想教育和政治培訓工作。但市總工會始終將工宣隊看作自己階級的隊伍，傾注了大量關心。工宣隊成員都是工人，工宣隊員尤其是工宣隊的領導，也對市總工會有着階級認同。市總工會對工宣隊的關切，事實上使工宣隊成為工會的又一支重要政治資源。

7 《揭發批判四人幫及其餘黨利用工宣隊控制上層建築，大搞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上海市總工會組織組 1977 年 6 月。

8 王秀珍 1978 年 3 月 29 日《補充揭發交代與王洪文的反革命罪行》。

此外，市總工會還通過辦「學習班」的方式，培養工人新幹部對市總工會的認同感。王秀珍對此文革後回憶說：

凡是送往各區、縣、局擔任領導工作的新幹部，很多人都參加過市總工會辦的學習班，或者在市總工會工作一段時間，經過考察了解的。這樣實際上形成了一個體系。為了擴大市總工會這個山頭，我提出把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的新幹部，都吸收列席市總工會常委，王洪文同意，就這樣做了。⁹

靠着以上這許多政治資源，上海市總工會成為上海的一個重要政治力量。¹⁰ 由於絕大多數區、縣、局工會主任，同時都是區、縣、局黨委書記、副書記或常委，因此工會的事只要他們點了頭，就是黨委點了頭；向他們匯報，就是向黨委匯報。¹¹ 在申報和審批手續上非常便捷和容易溝通，而且從組織手續上也順理成章。

「工會領導權要掌握在造反派手裏」

比起文革前的工會，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在工會幹部任命方面有着較大的自主權。雖然，區、縣、局工會的常委和正副主任，仍然必須像文革前那樣，首先報市委組織部同意，然後工會才能進行選舉；但是，由於王洪文、王秀珍都是市委副書記，金祖敏是市委和市革會組織組的「第一把手」；與市總工會關係密切的王日初是組織組「第二把手」。所以，在一

9 王秀珍 1976 年 11 月 25 日《我的第二次揭發交代》。

10 以上內容大部引自葉昌明以及 1977 年 4 月 5 日《交代關於利用總工會結幫的問題》、1977 年 6 月 14 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以及王秀珍 1978 年 6 月 30 日交代。

11 葉昌明 1977 年 4 月 5 日《交代關於利用總工會結幫的問題》。

般情況下，他們同意就是市委同意了。在這方面，上海市總工會有着其他省市沒有的優勢：市委主要負責人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都是堅定的文革派，市委支持市總工會的工作，市總工會也堅決服從市委領導。在區、縣、局工會幹部的選派標準方面，市委和市總工會基本是一致的。

上海市總工會規定，局、區、縣工會正、副主任和常委的委任或調動，必須經由上海市總工會同意和批准。1970年左右，上海機電二局和上海城建局黨委欲增加本單位工會常委，事先未同上海市總工會商量，上海市總工會就聲稱不予承認，並要這兩個局的黨委檢討錯誤，向上海市總工會補辦手續。¹²下面的工會也是這樣，擔任了黨政領導職務的工人新幹部兼任工會職務的狀況，使得各級工會對工會幹部的安排更自主，因為工會可以通過這些「自己人」貫徹自己的意向。因此，比起文革前，文革中的市總工會對工會幹部的選拔和任命，有着大得多的空間，這種情況是1949年以來所不曾有過的。

在審批下面工會領導班子時，市總工會以造反派是否佔優勢作為衡量標準，強調「工會要完全由新幹部掌權，工會領導權要掌握在造反派手裏」，還規定：各級工會的第一負責人只能由「新幹部」組成；工會的普通工作班子中可以有文革前的工會幹部，但他們只能幫助做些具體工作，不能進工會的領導班子。上棉二十一廠讓一個文革前的廠工會委員擔任廠工會負責人，被指責「復舊」，要撤換這個幹部。在審批各級工會的領導班子時，是否造反派佔優勢和佔主要領導位置，是衡量這個工會班子好壞的標準。1973年五次市工代會之後，王秀珍提出，各級工會中「老的不要放，有二個當當代表就可以了」，各級工會負責人中，只要象徵性地放一個文革前的工會幹部就

12 葉昌明 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王秀珍 1975年11月25日的《我的第二次揭發交代》中也提及區、縣、局級工會幹部調動必須經市總工會同意。

行了，但不能當一把手，一把手一定要新幹部；那些原工會幹部所起的作用，只是「當當參謀，出出主意」。而且如果主持工作的造反派新幹部被調職，市總工會一定要再調一個造反派新幹部去接替，不能讓文革前的工會幹部接替。¹³ 是否認同文化大革命，是市總工會挑選工人新幹部的首要標準。造反派尤其是「老造反」，在同等條件下一般都會是首先被考慮的對象。在選拔幹部時，市總工會——

把是否造反派、老造反，有否造反精神和鬥爭性，以及是否大膽潑辣、敢講話、敢提意見等表現，都作為取捨的標準。特別是把這些人員是否對張春橋、王洪文等有感情，能否緊跟我們作為最重要的條件；把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否參與「炮打」事件，是否「支聯」的，是否反過工總司，都作為考察的重要依據。¹⁴

是否在工總司以及後來的市總工會工作過，是市總工會考察培養幹部的重要依據之一。葉昌明曾感嘆：「在總工會工作過的新幹部出去後，就是和那些直接選上來工作的新幹部在感情和看法上不一樣的。」¹⁵ 金祖敏就是這樣，他1967年6月從所工作的上海電機廠調往工總司總部不久，被王少庸調去市革會工業組工作，但工總司總部有人提出，新幹部被提拔之前，必須要在工總司工作過，然後作為工總司的造反派代表，派出去參加三結合，一定要金祖敏回工總司工作一段時間，金祖敏於是又去了工總司工業組一段時間。¹⁶

文革期間的上海，各級工會幹部，尤其是工會的正副主

13 葉昌明 1977 年 6 月 14 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14 同上。

15 葉昌明 1977 年 4 月 5 日《交代關於利用總工會結幫的問題》。

16 筆者對金祖敏 1989 年 8 月 12 日的訪談。

任，基本上都是工人新幹部。經過一打三反、清五、一六等一系列運動，老造反中不少人被整肅，原來工總司區、縣、局聯絡站的頭頭因各種原因大部被淘汰，到1970年，區、縣、局一級的工代會的負責人基本換了一批人，不再是運動初期的老頭頭。但是，新上去的工會負責人運動初期也大都是造反派，至少是文革的認同者。那些原來的赤衛隊員，尤其是赤衛隊的各級負責人，不可能進入文革中的工會，除非像楊富珍那樣有影響並曾「反戈一擊」。就這樣，文革中的上海各級工會，成為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領地和凝聚中心，也是工人造反派走向其他各級領導位置的出發地。

市總工會視工會為工人自己的組織，不許他人干涉。據王秀珍說：

王洪文提出：工會要監督各級單位組織，基層工會的工作由市總工會來管，各級黨委放手讓工會幹就是了；區、縣、局開工代會，一定要經過工總司總部批准，不准同級黨組織過問，不許工會向黨組織匯報工作。¹⁷

王秀珍這裏所說的「不許工會向黨組織匯報工作」，主要指的是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期間，市總工會向下佈置開展運動時，要求各級工會不要向黨委匯報會議內容。

葉昌明在守住工會領地方面做得很成功。例如普陀區工代會(之前是聯絡站)，在四屆工代會後，一直由區革委會主任楊富珍兼任負責人，她儘管在1967年初曾表態支持造反派，但實際上和造反派始終格格不入，也很少參加市總工會的活動，王秀珍和葉昌明等始終覺得楊富珍「不是自己人」，想調換她。但因為楊是張春橋親自點名安排為四屆工代會委員的，不便撤換。直到1973年4月，上海市五次工代會召開之後，各區接着

17 王秀珍 1978年6月30日《揭發交代在總工會犯下的反革命罪行》。

召開區工代會，市總工會趁普陀區召開工代會之際，以楊富珍擔任區革委會負責人工作太忙為由，不讓楊富珍再兼區工會工作，另派人將楊替換下來。¹⁸ 如果楊富珍是造反派新幹部，即使她不是工會幹部，市總工會也一定會讓她兼職工會幹部。還有靜安區，主持靜安區工代會的兩人原來是市工代會派去的。但後來覺得他們「被區委拉過去了，不站在我們這一邊了」，也是趁區五屆工代會召開之際，改換了市總工會信得過的人。靜安區委原來打算讓這兩人連任區工會負責人，但市總工會堅持換人，區委只得聽從。¹⁹

而對於曾經為工總司起過作用的老造反，市總工會不會忘了他們。例如上海第七紡織機械廠工人秦愛芝，當年對解散工三司起了關鍵作用，後來被安排在徐匯區工會，擔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在鬥爭中培養和使用新幹部」

不但在工會，工人造反派還希望有更多成員能夠進入黨政機構。

1967年革委會建立階段，一些區和局，兩派或幾派各不相讓，聯合不起來，工總司便派調查組進駐，促成聯合。聯合後，一些調查組的負責人被留下，擔任工總司在這個局(或區)的聯絡站負責人，以後再結合進局(或區)的革委會任負責人。如輕工業局的馬振龍就是這樣，先是作為工總司派駐輕工業局的調查組組長，促成輕工業系統的造反派大聯合，以後留下，任輕工業局聯絡站負責人，不久被結合進輕工業局革委會任副主任，入黨後又擔任局黨委副書記。根據工總司1970年統計，工總司在上海21個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公用事業的管理局(包

18 葉昌明 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19 同上。

括市直屬單位)的聯絡站，加上工總司在上海十個區的聯絡站，共有局和區一級的聯絡站造反隊委(包括常委)393人，其中137人被結合進所在局或區的革委會，為34.8%；104人進入所在局或區的組室，佔26.5%。²⁰而紡織局所屬13個公司，工總司在這些公司聯絡站的隊委和常委，被結合進所在公司革委會人數的比例還要高，為53%。²¹

市總工會還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黨政機構輸送優秀工人幹部」的要求，進而對黨政幹部的任命也施加相當大的影響。據王秀珍回憶，王洪文經常強調：工會有責任培養、輸送幹部。王洪文規定：「任命市革會組、辦，區、縣、局的黨員幹部，都要徵求市總工會同意或推薦幹部。」²²1974年，市總工會負責人葉昌明在上海市委的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共產黨組織發展黨員和提拔幹部，要徵求工會的意見。所以，市革會組織組負責人王日初向王秀珍討論區、縣、局幹部的調配增補事宜時，王秀珍會讓他去聽聽市總工會葉昌明等人的意見。²³身兼上海市委組織部主要負責人和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的金祖敏，1974年更是提出要力爭在二三年內，使工人新幹部在上海區、縣、局的第一把手(即主要負責幹部)中佔50%。

如何培養和輸送新幹部？1972年上海市工代會的一篇文稿中提出：

怎樣在鬥爭中培養、使用新幹部？其具體做法大致有：(1)配備一正多副，讓剛提拔起來的新幹部在一定的領導崗位進行鍛煉；(2)組織新幹部輪番參加工宣隊、調查組，讓他

20 筆者根據工總司1970年3月《新幹部情況統計表》匯總統計。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21 筆者根據工總司發給紡織工業局的聯絡站所統計的廠、公司表格匯總統計，原表格標題為《新幹部情況登記表》。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22 葉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23 同上。以及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以及葉昌明1977年4月5日。

們到階級鬥爭尖銳複雜的地方去經風雨、見世面，在鬥爭中學會鬥爭的本領；(3)把各級工代會作為培養、鍛煉新幹部的場所，有計劃地把新幹部送到各級工代會工作，經過一段時間鍛煉、考察後，再安排到其他部門中去。²⁴

先擔任工會幹部，成為「文革中湧現出來的工人新幹部」；然後再以工人新幹部的身份，去擔任黨政幹部。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擔任黨政幹部的路徑模式之一。各級黨委或革委會工作班子尤其是領導班子中，必須有「文革中湧現出來的工人新幹部」參加，是當時中央決策層所要求的對文革態度的標尺。所以當市總工會提出哪個黨委或革委會沒有新幹部，一般都會被重視。市總工會認為哪一個局、區的黨委或革委會裏沒有工人新幹部，會向這些區或局的工會派出幹部。而擔任了市委副書記的王秀珍，通過市委組織組的金祖敏和王日初，將工會任職的工人新幹部安排進各區、縣、局黨委或革委會。有時候市總工會甚至會事先和市委組織組商量好，這些去工會工作的新幹部，將來擔任黨委或革委會的什麼職務。例如1974年，市總工會向靜安區工會派出錢永年任區工會主任。派出前，市總工會已經與市委組織組說好，錢去後將任副書記。後來，錢去靜安區工會不久，就擔任了中共靜安區委副書記。下面各級工會也以「體現文化革命成果」為由，要求革委會和黨委，在領導班子中增加工人新幹部的名額。

而在各區，由於上海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工廠都屬相關工業局領導，區裏都是些集體所有制的小廠，基本沒有被認為的產業工人。有區委向市總工會打報告，要求支援些產業工人去擔任幹部。自1968年至1975年底，上海市總工會共向上海的十

24 上海市工代會1972年3月《在黨的一元化建設下，加強幹部隊伍和工代會建設(討論稿)》。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個區輸送工人新幹部45人。²⁵ 例如中共盧灣區委，在1974年7月12日，以書面形式向市總工會提出申請幹部的報告：「我區革委會組織組……等組室亟須充實工人」，要求市總工會「能否從市屬工交系統產業工人中選調六七名優秀幹部以充實加強區革委會有關組室的核心」。7月15日葉昌明在這個報告上批示：「想法搞幾個人去」。之後，從市總工會機關調了3名工人新幹部，派去盧灣區，也是先去區工會工作，再由區委和區革委會調去別的部門。

就這樣，許多工人造反派先擔任工會幹部，然後再以新幹部的名義，被調往黨政機構。從1968年至1976年6月止，上海市總工會(包括之前的工代會)系統的幹部，有168人被調往全市各單位：其中，到市革會各組辦的33人，到各區、局的93人，到各公司基層的4人，到市總工會直屬單位的38人。「他們所任的幹部級別是：任區、局革委會負責人以上的42人；任區、局組室負責人的96人；任一般幹部的30人。」²⁶

於是在上海，工人在各級黨委和政府機構中的比例，與全國各地相比是相當高的。1970年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106名委員中，工人代表33名；30名市革會常委中，工人8名；15名主任副主任中，工人3名。而在政黨機構中，上海1971年恢復成立的第四屆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書記，工人佔2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佔4名。²⁷ 尤其1968年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發表後，大批工宣隊進駐新聞、出版、文藝以及大學、中學、小學

25 上海市總工會運動領導小組1978年1月25日《上海市總工會清查情況專題匯報之七——關於四人幫及其餘黨通過上海市總工會安插親信、包庇壞人的清查情況》。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26 同上。

27 《經中央批准的中共上海市第四屆委員會名單》1971年1月13日中共上海市委文件滬〔71〕，兩名工人市委書記是王洪文、王秀珍，4名工人常委是：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楊富珍。這組數字是筆者統計的，和第二十六章所引徐景賢的講話略有出入。

等「上層建築領域」，擔任了各級黨政領導，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這些工人新幹部大多擔任實職、掌握實權；許多人雖然只是副職，但權力往往比擔任正職的老幹部還大。

此外，中央各部門也向上海要幹部。王秀珍曾說：「四屆人大召開之前，中央各部要幹部，要上海送副部長。現在是中央要幹部，市裏也要幹部，但各級班子中老的多，青的少。今後區委書記區委副書記，我看就在工宣隊中選，使我黨後繼有人」。²⁸ 王秀珍所說確有其事。工人造反派在各級領導機構中的席位，以及對他們意願的重視，被看作是對待工人階級和文革的態度。中共中央及國務院，曾多次要上海輸送「優秀工人幹部」，毛澤東和周恩來對此都曾有過指示，周恩來向王洪文交辦過此事，還曾批評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輸送幹部不多。²⁹

「工會要抓大事」

1949年後，共產黨執政初期，工會工作的內容較多，包括參與立法、參與勞動工資和福利政策的制定等等。後來隨着對全國總工會領導李立三及賴若愚的相繼批判，工會工作內容收縮。³⁰ 不過，雖然工會工作越來越缺乏獨立性，但文革前的工會還是盡量在給予的空間，努力為職工辦些實事。1966年文革開展後，各級工會停止活動。1973年4月11日，中共中央轉發北京市委、上海市委關於召開工會代表大會的請示報告的批示，

28 《揭發批判四人幫及其餘黨利用工宣隊控制上層建築，大搞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上海市總工會組織組 1977 年 6 月。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29 上轉引自海市公檢法文革後《關於培養「工人大使」、「組閣」是否列入起訴書的幾種意見》。

30 到文革前，工會面向底層工人的主要工作內容，一是組織勞動；二是對職工進行政治宣傳和組織政治學習，三是對勞動保護、勞動保險與工會會員福利執行情況等實施監督，四是開展職工的文藝體育活動，五是開展職工業餘教育事業，六是女工工作。

提出工會工作的任務³¹。這些任務概括起來就是：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術培訓、「抓革命促生產」、輸送工人幹部、生活福利、安全生產和勞動保護。其實也就是文革前工會工作的傳統內容。但實際上，這些工作沒有恢復。這一方面是由於全國總工會沒有恢復活動，中央在這個批文後，對工會工作就再也沒有具體佈置；另一方面也是王洪文對工會工作的理解。在中央這個批示下來後不久，王洪文曾經對王秀珍等說過：

你們不要以為中央規定這七項任務，你們就照本搬。市總工會要抓大事，抓階級鬥爭，抓學習，其他事不要去管。生產不要抓，群眾生活不要抓，什麼勞動競賽、安全生產等都不要抓，要抓這些就走上舊工會「三會一團」的老路（筆者注：「三會一團」即：全民工會、福利工會、生產工會；「一團」即工團主義）我們工總司從建立起，就是抓大事的，抓住與走資派鬥爭不放的，這就是大事。³²

文革前夕，上海市總工會所設工作機構，除了辦公室、組織部等針對工會本身業務的部門，針對基層職工工作的部門有：宣傳部、教育部、體育部、生產部、女工部、生活部。文革中，工會被批判為「三會一團」：即福利工會、生產工會、全民工會以及工團主義，這些部門工作全部停頓。1967年底工代會成立後，直至五屆工代會的市總工會，機關設置只有兩組一室：組織組、宣教組和辦公室。組織組是對工會系統本身的，負責各級工會的幹部人員的審批和培訓；辦公室是對內的，處理市總工會機關內部事務。於是只有政宣組是對職工的，「抓階級鬥爭，抓工人的思想和路線教育」，這就是文革中市總工會的全部工作內容，也即王洪文所說的「大事」。但

31 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32 王秀珍 1978 年 6 月 30 日《揭發交待在總工會犯下的反革命罪行》。

是這個工作內容很空泛，作為市總工會，可以要求各級工會組織工人學習這篇社論，領會那個講話；但作為基層工會，這樣的工作內容幾乎是空泛的。因為在工廠，廠革委會設有政宣組，也是負責「思想教育和政治學習」的，工會的工作和革委會政治宣傳部門的「思想教育」工作完全重合。基層工會幹部覺得無具體工作可幹，要求市總工會佈置符合工會特點的群眾工作。

而在市總工會，工總司和工代會時期，一直是來什麼運動就向下佈置什麼內容，沒有常規的日常工作。負責工會、青年團和婦聯工作的市委書記王秀珍，對工會工作完全沒有概念，甚至連共產黨的群眾工作內容也全然不知。只知道運動來了就召集工、青、婦開會，要求工、青、婦發動群眾投入運動。工會始終沒有屬於自己的日常工作，總是跟着政治運動轉。不要說工會最核心的為工人說話謀利，就連工會福利和對勞動保護的監督工作，也都沒有開展。反正工會會員和非工會會員在福利享受方面沒有任何差別；而勞動保護和女工保護，都由行政負責，工會根本不過問。此外，文革前工會的另一經常性工作是職工困難補助，幫助調查了解經濟困難的職工家庭生活狀況，以根據困難的不同發給不同的經濟補助；文革中全部改由行政操作。工會完全成為政治運動部門。市婦聯的工作也是這樣，連婦女保護等最傳統的內容都沒有。

就這樣，由群眾組織工總司演變而來的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連文革前官辦的上海市總工會都不如，更加沒有群眾工作意識，完全成為政治運動的附庸。

會費、會籍和工會財產

文革前，要加入工會，必須本人填寫表格申請，獲批准後，領取工會會員證，同時每月必須繳納工會會費，從每月工資中扣除。在福利待遇上，工會會員也與非工會會員有着差

別。³³ 而文革中，只要進入有工會建制的單位工作，就自動成為工會會員，不必申請，也不必繳納會費。上海的工會會費是1967年初停止收取的。1967年2月1日，工總司與原上海市總工會、市總工會所屬企事業、以及工會各區辦事處、各產業工會的造反組織，發出《聯合通告》，宣佈上海市總工會和各區辦事處、各產業工會，停止對各級工會的領導，即日起暫停發展會員和收取工會會費，積存工會經費一律凍結。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76年11月，整個文革期間，上海工會會員沒有被收取過工會會費。

加入工會，沒有了以往所必須的一套程序，只要進了工廠，就自動成為工會會員，沒有了申請手續，甚至連每月一次的工會會費都不必繳納。原有的工會會員和非工會會員的待遇區別也全部取消。至於工會會員證，文革中更是從未頒發過，各級工會甚至從未對自己所屬會員進行過登記造冊。中共中央1973年4月11日轉發北京市委、上海市委關於召開工會代表大會的請示報告，批示上寫着：「除混入工人隊伍的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外，工人群眾中包括進步的、中間的和落後的，凡是要求參加工會的，應當讓他們參加」。說是「要求參加工會的」，實際是不必要求，只要是在編制中的職工，就一定成為工會會員。1971年，上海市勞動局又頒發文件，取消了工會會員和非工會會員在社會保障和家屬福利待遇上的差別。這些程序和待遇差別，本來蘊含着對工會會員身份及其權利和義務的不斷提醒和強調。於是，除了政治符號意義外，文革中的工會會員和非工會會員沒有了區別。文革初期批判工會是「全民工會」，其實文革前對工會會員的資格還是有嚴格設定。工會真正成為「全民工會」，始於文革。工會會員身份的模糊也和全國總工會遲遲沒有恢復工會工作和活動有關，雖然上海的金祖敏1975年後被正式調去北京負責中華全國總工會的

33 這些差別見本書第15章第一節。

恢復工作，但直到文革結束，全國總工會一直沒有恢復活動。在中國這樣大一統的社會結構下，如何收取會費等，都是由中央一級的機構制定規則和標準的，地方無權自行決定。

還有工會經費。文革前工會經費按工資總額的一定百分比，由政府劃給市總工會。1968年10月，原上海市總工會機構被撤銷時，全部結餘經費及暫收款共5574.71萬元，悉數上繳上海市財政局。³⁴從此，這筆款項再也沒有歸還。無論是後來在文革中成立的工代會和工會，還是文革後恢復的工會。沒有了工會經費，文革中的市總工會機關，包括之前的工總司、工代會，日常開銷例如辦公大樓的房租、水電等，只能由政府財政撥款；需要活動經費時，向市革會和市委打報告，獲批准後，也由財政部門下撥。至於市總工會機關和所屬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文革前由工會經費支付，文革中都由工作人員的原單位發給。文革中所有被提拔到機關工作的新幹部，他們的身份轉換沒有全部完成，因為人事和工資關係都仍在原工作單位，長期「借調」，包括市總工會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葉昌明。只有十幾個機關的勤雜人員例如司機、門房、電話接線員、打字員、炊事員等，工資是由政府財政撥款付給的。

文革前工會系統有許多產業，例如市工人文化宮和各區工人俱樂部。³⁵1967年12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召開後，工總司的一些區聯絡站曾經有接管所在區工人俱樂部或工人體育場的打算，被總部制止。文革中，除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宮外，上海市總工會所屬產業都被劃了出去；各區、縣工人俱樂部和工人體育場也被劃出去。所謂「劃出去」，實際就是白送給所在地方政府。王洪文對這些原工會財產的態度是「不管」：

34 上海市總工會編《上海工運志》，上海社會科學院1997年出版。

35 這些產業是：上海市工人文化宮、滬西工人文化宮、滬東工人文化宮、海員俱樂部、虹橋工人療養院、杭州屏風山工人療養院、上海半工半讀業餘大學、上海工人幹部學校。此外，在各區、縣，還有不少區、縣工會，轄有工人俱樂部和工人體育場。

對於工會的俱樂部、療養院等，我們都不管。這裏面人員很複雜，接管後很可能背包袱。我們現在主要是抓階級鬥爭，抓思想教育。如果(開會辦公)沒地方，可以去借。現在不是管的時候等以後市裏研究，將來再說吧。³⁶

但是主管工會常務工作的葉昌明，感到工會不能老是跟着政治運動轉，還是要開展些實事。而要開展工會原來的實事，就必須依托和利用這些原來屬於工會的事業和產業。他始終想將那些原屬工會的產業要回來。1969年以後，在葉昌明一再交涉下，工總司和之後的市總工會，先後要回了大部分產業，其中包括各區工人文化宮，以及工人業餘大學和工人政治學校。這些工會資產的回歸，是文革後期的上海市總工會的工作內容，向文革前的工會工作內容逐步恢復的重要依托。

恢復工會傳統活動

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開辦的第一個事業單位是工人政治學校。文革前，上海市總工會有着培訓基層工會幹部的工人幹部學校，文革中被撤銷。葉昌明覺得一些「老頭頭」受教育程度低，素質差，一些人犯錯誤被淘汰；他想到辦工人政治學校，對工人造反派的老頭頭進行政治培訓和教育。1967年7月25日，工總司給市革會打報告，要求辦工人政校。市革會批覆同意。負責人最初是市革會組織組委派的原華東局老幹部遲鵬，工總司也派出原上鋼五廠技術員倪叔英等擔任負責人。後來幾經調整，到文革結束時負責人是文革前市總工會的幹部史桂昌。

1969年8月26日，上海工人政治學校正式開學。開學大會很隆重，張春橋和王洪文到會並講話。市革會其他領導成員、

36 王洪文在1968年3月20日工總司全委會會議上的講話，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駐滬三軍負責人也參加大會。參加工人政治學校第一期學習的學員共674人。其中第五連學員，即是128名「工代表」中的102人；此外，還有45名工宣隊員，40名市和區文攻武衛指揮部成員，以及工總司各區局聯絡站的成員和基層單位革委會擔任委員的工人。³⁷以後，工人政校前後共辦輪訓班18期，學員1.0290萬人；理論訓練班五期，學員198人；短期訓練班七期，學員2250多人³⁸；還有一期為時一年的工人理論骨幹學習班。工人政校所安排的學習內容根據形勢和政治運動而定，諸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批林批孔、評法批儒，以及文化大革命形勢，等等。

工人政校是培養和發現造反派新幹部的基地。市總工會曾直接將看中的對象送到工人政校，專門組織「苗子班」學習。葉昌明還曾經規定：工人政校要加強對學員的考察，每學期結束後，學校要填報一批可以作為培養對象的學員名單，報送市總工會組織組。³⁹

市總工會開辦的另一個學校是上海業餘工業大學。這座學校創建於1960年。1963年學校教學業務劃歸市委教育衛生工作管理，人事和組織關係直屬市委領導；文革前夕，改為半工半讀工業大學，又劃歸市總工會管理，但隨即而來的文革中辦了移交。1972年初左右，市革會文教組向市總工會表示可以歸還。葉昌明文革前業餘時間一直上夜校，對夜校向職工傳授知識的教育功能印象很深，馬上派人去接收。教職員工都是原來的，校領導由總工會委派，最初是原來的老幹部江征帆。接着，又建立了黃浦區分校以及虹口區分校，還打算陸續在其他

37 《文匯報》新聞報道《上海工人政治學校勝利誕生》，以及上海市總工會1985年2月編寫的《工總司大事記》專題材料之八：《關於上海工人政治學校的情況》。第一期學員數字，前者報道是674人，後者記載是660人。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38 同上。

39 葉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區開分校。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時，市總工會曾派岑麒麟去工大領導小組「放火燒荒」，批判學校教師的「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回潮」。結果逼得一位中層幹部要自殺，差點出人命。只好又將岑調離。

葉昌明還曾經打算在市總工會設立生產組，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交流活動，這也是文革前工會的傳統工作內容，但被王洪文否決了。王洪文認為技術交流是生產業務，說工會成立生產部門，那還要市革會的工交組幹什麼？那時正是五次工代會後，市科技協會派人聯繫，打算將所屬工人技術交流站還給市總工會。王洪文不同意市總工會抓生產，收回之事作罷。

葉昌明原來還有恢復工會的療養事業的打算，後因文革結束而未果。

上海市工人文化宮，也是文革中恢復較早的工會事業單位。經過一年多的大修，1972年5月，關閉了六年多的文化宮重新開放，開放的第一二天，就有六千多人次前往參加了各種活動。接着，「東宮」——滬東工人文化宮和「西宮」——滬西工人文化宮，以及各區、縣的工人俱樂部也都相繼開放。有人建議：毛澤東那個著名的關於文化部協會是「裴多菲俱樂部」的批評，使「俱樂部」給人不好的印象，而且「俱樂部」好像是純粹玩樂的，還是叫「文化宮」好。就這樣，各區工人俱樂部開放後，統一更名為區或縣工人文化宮。⁴⁰

開放後的市工人文化宮，在市裏一些文藝專業單位的協助下，舉辦了一系列培訓班：舞蹈、歌唱、民樂、管弦樂、作曲指揮、滬劇、話劇、京劇、樣板戲、曲藝、小分隊化妝、朗誦、詩歌、文學創作、文藝評論、繪畫、書法、攝影，等等。而且每年組織幾次大型群眾文藝匯演。對那些被認為精彩的節目，還專門組織專場演出，或作為保留節目在文化宮演出。群

40 文革結束後又改回「俱樂部」的名稱。

眾文藝文革前就是市工人文化宮的強項，現在重又活躍，為積累多年的民間興趣愛好提供學習和表演的平台。不少人文革結束後成為文化界知名人士。例如日後成為劇作家的宗福先，畫家鄭辛遙、王劫音，作家沈善增、曲藝演員孫明等。此外，文化宮的體育組負責基層工廠的群眾體育活動，組織各類球類比賽活動。後來還成立了兩個專業球隊：上海工人足球隊和上海工人籃球隊。1976年又成立上海市工人乒乓隊，已經開始進行集訓，不過未及舉行比賽，文革就結束了。

市總工會成天搞政治運動，看似轟轟烈烈，底層工人根本不感興趣；上海市工人文化宮恢復活動後，才真正為文革中的上海職工提供了學習和娛樂場所，受到職工們的歡迎。但文化宮畢竟身處文革，許多活動脫離不了文革政治。不說各種培訓班作品反映的都是歌頌文革的內容，那些大型展覽，例如《一月革命展覽》、《批林批孔展覽》、《反擊右傾翻案風展覽》等，也都是配合時事之舉。

還有大型群眾歌詠大會，是文化宮在文革中組織的影響最大的系列活動，由市委寫作組出主題，由市文化局群眾文藝小組和市工人文化宮為主，共同舉辦。從1974年1月12日到1976年5月23日，先後舉辦18場，全部都是配合形勢或歌頌文革。後來成為文革象徵的歌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首先在群眾歌詠大會上唱出的，作詞者是文化宮詩歌班的學員。這首歌在1974年3月5日的「批林批孔專場」首次演唱，以後成為歌頌文革的必唱曲目，還被收進197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戰地新歌》第三集，作者署名「上海市工人文化宮文藝學習班」。⁴¹

41 本節關於文革中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宮活動情況，主要為2010年11月2日及同年12月8日，筆者對文革中的市工人文化宮副主任吳林深的訪談記錄，以及《文匯報》當時的一系列報道。

工人理論隊伍

「工人學理論小組」是文革前的產物，比較著名的是成立於1958年3月的上海求新造船廠的銅工彎管小組的「工人學哲學小組」。在報刊媒體的推動下，1959年全市工人學哲學小組遍及工業、交通、基本建設、財貿等系統，參加這類小組的職工人數近二萬。文革中，隨着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升溫，幾乎每個工廠、車間都建立了學毛著小組，參加者各年齡段的工人都有，以青年工人中的積極分子為主體，活動內容主要是學習毛澤東的文章。這些小組一般屬廠部或車間革委會的「政宣組」管轄，基本都是業餘時間活動。此外，還有一些工廠車間，組織「工人大批判小組」。這些都是後來工人理論小組的雛形。

1972年，上海滬東造船廠閥件車間小車四組的工人，被組織通讀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市革會工交組在內刊《工交情況》報道了這一活動。張春橋看後，於1972年5月20日批示：「資產階級教授讀不懂，工人讀得懂。要這個小組堅持下去。」於是市委寫作組在11月舉辦了有三十多個青年工人參加的《資本論》學習班。⁴² 1973年林彪事件後，毛澤東一再提倡「學理論」，「不要上陳伯達一類政治騙子的當」，提倡「讀馬列的書」。之後，許多工廠的工會也紛紛組織工人成立理論小組。這些理論小組，有的就是原來的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也有新成立的。學習內容主要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即學習毛澤東當時提倡讀的那些馬列著作。隨着批林批孔及評《水滸》運動興起，又開展「評法批儒」，即評中國歷史上的法家思想流派，批判中國傳統的儒學思想。到1974年，各種工人理論小組越建越多。

上海市總工會真正試圖將工人理論隊伍打造成自己的政治力量，始於1974年，當時正是批林批孔運動開展之際。主要從

42 《上海通志》45卷專記第一章《文化大革命紀略》。

兩個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全市性的工人理論隊伍網絡，二是培養工人理論隊伍的骨幹。1974年7月，上海市總工會在《關於培養工人理論隊伍意見》中提出：要在從市到局、公司、基層、車間，逐級建立起一支工人理論隊伍，爭取在一二年內在全市工交、財貿系統中發展到一二萬人。⁴³ 葉昌明還提出：

要從市到各級建立工人理論隊伍網。市總工會要經常聯繫一定數量的理論隊伍。各區、縣、局也要考慮建立理論隊伍網，通過這支骨幹力量，把周圍的理論隊伍帶起來。理論隊伍要分科研究，要佔領上層建築，哲學、歷史等陣地，各方面都要有我們的專家。⁴⁴

要從市到基層建立一支網，建立一種組織形式，一層一層抓下去，從組織上得到保證。

要想辦法抓網，要有形的網，不要無形的網。

可以建立組長廠，10個廠一個組。自己活動，要定期交任務。⁴⁵

按照葉昌明的「抓網」要求，由上海市總工會宣教組首先抓「重點理論隊伍」，要求每個行業公司，都要建立一個重點理論隊伍；並要求下面的工會將本系統中「拔尖」的基層理論隊伍上報。再根據這些被上報的「理論隊伍」，挑選確定了55個單位的理論隊伍，作為直接聯繫的重點對象。其中有上海第五鋼鐵廠二車間、滬東造船廠、上海第二十一棉紡織廠、上海鐵路分局機車保養段、上海鐘錶元件廠、上海照相機三廠等工

43 上海市總工會：《關於培養工人理論隊伍的意見》，1974年7月21日。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44 葉昌明：在市總工會辦公會議上的講話，1975年6月10日。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45 上海市總工會《關於王秀珍、葉昌明利用工人理論隊伍進行篡黨奪權罪惡活動的清查情況》，1978年1月。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廠的工人理論組。市總工會宣教組經常去這些單位的工會，了解理論小組活動的情況，組織他們參加各種「理論討論會」或「批判交流會」，交流活動經驗，並經常給這些理論小組寄發「學習資料」。1974年8月8日，江青也曾派人向上鋼五廠送批林批孔材料，以示關心和支持。以後，市總工會又進一步提出每個行業公司也都要有一個「重點理論隊伍」，於是各區、局工會又上報了一批理論隊伍共261個，連同前面上報的55個，全市共271個「重點理論隊伍」。⁴⁶

按照葉昌明的「理論隊伍要分科研究」的要求，市總工會宣教組又佈置建立分科研究小組。一般有：哲學組、歷史組、政治經濟學組、文藝評論組、國際問題研究組，有些單位還成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研究組、自然辯證法研究組、馬克思《資本論》研究組，甚至還有法律研究組、戲曲研究組和體育史研究組。⁴⁷到1975年底和1976年初，全市工人理論隊伍形成了網絡：

市第一建築工程公司：共有理論隊伍成員970人，佔全公司6000名職工的15%以上，其中黨團員佔57.5%。

紡織系統：3300多個工人理論小組中，哲學組56個，政治經濟學組112個，歷史組87個，文學評論組37個，法律組7個，國際問題研究組25個。⁴⁸

又據上海市總工會宣教組1976年3月的統計：「工交、財貿、農場的工人理論隊伍共有2.044萬個小組，30.3563萬人，佔全市職工數的10%，其中理論隊伍分科研究小組有1968個，2.3637萬人。」⁴⁹除了建立一支全市性的工人理論隊伍網絡，

46 上海市總工會：《關於工人理論隊伍建設情況的報告》，1975年12月3日。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47 同上。

48 同上。

49 上海市總工會：《關於王秀珍、葉昌明利用工人理論隊伍進行篡黨奪權罪

上海市總工會還十分注意培養工人理論隊伍的骨幹，舉辦各類「理論學習班」或「理論短訓班」。市總工會曾經特地讓工人政校舉辦了一期為時一年的工人理論骨幹培訓班，工人政校別的班都是三個月一期，只有這個班學時一年。

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批林彪聯繫孔孟之道，報上登出《林彪與孔孟之道》，中央文件上也摘錄了許多孔孟語錄供大批判。但是，這些文言文的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文字，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工廠幹部根本看不懂，更無法向群眾傳達。許多工廠便讓文革中分配進廠的新工人參加宣講。他們中不少文革前的初高中生，古文底子比較好，能夠讀懂和解釋文言文。上鋼五廠便是這樣做的，讓青年工人對中央文件中的文言文一個字一個詞地解釋。市革會馬上抓住了這樣的典型。不久，由《解放日報》記者出面，組織該廠二車間工人理論小組組長林耀華⁵⁰等青年工人，以「工人語言」寫出《〈論語〉選批》，刊登在《解放日報》上，整整一版。《人民日報》也轉載。上鋼五廠被樹為「工人理論隊伍」樣板，七十三萬人被組織去該廠學習。⁵¹ 林耀華1975年作為「上海工人理論隊伍」的代表，參加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當上主席團成員。

而實際上，工人理論隊伍雖然名為研究理論，卻沒有絲毫形而上的理論色彩。說是學理論或研究理論，其實只是重複或抄襲報紙上的文字。對於來自外國的馬列著作，多數成員連讀都讀不通。即使是中國的儒、法著作，由於是文言文，加上複雜的歷史背景，一般工人也很難讀懂。那些工人理論小組寫的文章，都只是簡單地將古代的孔子、孟子的文言文翻譯成現代漢語，再抄一段劉少奇或林彪的話互相對照，然後批判一下，

惡活動的清查情況》，1978年1月。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50 林耀華，男，1948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文革前是高中二年級學生，文革中被分配進上海第五鋼鐵廠當煉鋼工人。

51 這個數字引自《上海通志》45卷專記第一章《文化大革命紀略》。

就算是一篇論文。這樣的文章，卻被出版社競相出版。僅以上鋼五廠和滬東造船廠為例，文革期間上海人民出版社為這兩個工廠的工人理論小組出版了近十本書：上鋼五廠的《儒法鬥爭史講座》、《儒法對立的自然觀》、《〈論語〉選批》、《談談資產階級法權》、《煉鋼爐前的政治經濟學》，滬東造船廠的《兩種社會兩種工資》、⁵²《船台上的政治經濟學》、《復辟資本主義的黑棋——評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這些書，有些還被外地的出版社再版，例如《〈論語〉選批》。

如果仔細分析工人理論隊伍的構成，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工人理論隊伍的骨幹成員，不是文革前進廠的工人，而大多是文革中被分配進廠的「老三屆」中學生，也即當年的紅衛兵。許多人在理論學習的旗號下，研究自己感興趣的學科。如上海重型機器廠的一個車間理論小組的青年工人，在1974年期間辦了份油印的雜誌，內容有工人自己寫的小說、詩歌，甚至還有對西方文藝名著的評論。有一篇文章是評論德萊賽的長篇小說《嘉莉妹妹》的。這本在當時被批為「資產階級黃色小說」的美國名著，卻被這本油印刊物高度評價。⁵³這類工人理論小組實際上已辦成了興趣小組。還有的青年工人，在宣講「儒法鬥爭」史時，聲色俱茂，表情生動，簡直像說書，這是利用宣講之際，實現對表演藝術的追求。因此，不少工人理論隊伍的活動，實際是年青一代對知識及個人興趣的追求。許多人在文革結束後考上了大學。對此，葉昌明說：

我提出要將理論隊伍和老造反結合起來，彌補理論隊伍缺乏文化大革命鬥爭實踐和在現實鬥爭中的鬥爭性不強的問題。⁵⁴

52 這本書是與「上海五七幹校六連經濟組」一起寫的。

53 這是筆者1974年間去該廠時親眼所見。該油印刊物的主編，筆者至今記得名字：鞠新華。

54 葉昌明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葉昌明的所謂「理論隊伍缺乏文化大革命鬥爭實踐」，指的就是參加者大部分是文革中進廠的學生，而不是工人造反派。「在現實鬥爭中的鬥爭性不強」，應該就是指許多理論興趣較多在理論和歷史，而不是當前政治。

除了市總工會，上海市委寫作組也將培養工人理論隊伍作為工作內容之一，這是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要求。1974年1月，姚文元在上海接見市委寫作組全體成員時指示：「我們現在就是要從工人、農民中選拔理論隊伍。」他要求寫作組通過辦學習班的方法擴大隊伍。於是市委寫作組又先後舉辦十期工人理論學習班，人員大多數都是從工廠的工人理論小組中挑選。⁵⁵在這方面，寫作組的優勢顯然要比市總工會強得多。不說寫作組核心成員都是受過系統教育或從事業務多年的專業人員，就是在發表平台方面，寫作組有自己的刊物，而且其中大部分還是同類領域中全國唯一的刊物，例如《學習與批判》；上海僅有的兩張報紙：《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也是寫作組的勢力範圍。

市總工會與寫作組有過合作。1974年，市總工會曾與寫作組合作編寫《歷代法家著作選注》，市總工會抽調了上鋼五廠的林耀華作為負責人，寫作組則從復旦大學和上海師範大學⁵⁶抽調了一批專家和教授。但書出版後，只署市總工會的名。朱永嘉等很不愉快，反映到張春橋處，張春橋批示：只要有了成果，出版社用哪家的名都可以；還批評說，這麼點屁大的事情也值得大驚小怪。這場糾紛才沒鬧大。⁵⁷

55 《上海通志》45卷專記第一章《文化大革命紀略》。

56 上海師範大學在文革中由原上海師範學院、華東師範大學、上海教師進修學院等大學合併而來。

57 何秀文1977年4月21日。這事林耀華也曾對筆者提起過。

小結

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是文革初期的群眾組織在全國的唯一留存，也是造反派最後的獨立領地。這樣的工會，與文革前的工會以及與文革初期的群眾組織有何異同，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題目。

工人造反派掌握的上海市總工會與文革前的最大不同，就是與黨的關係。文革前的工會依附於黨，處於黨的嚴密控制之下，工會工作必須聽命於同級黨組織。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則形成了一個活躍於黨的系統之外的政治強勢體系，而且通過工會影響黨政。這種現象是文革前所從未有過的。這種狀況，使得工人造反派的要求主張得以上下內外呼應。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後，黨的幹部大都兼任行政幹部，使得黨政合一日趨嚴密，黨的權力日益集中。但在工會系統，工會幹部兼任黨的職務的狀況，反而分割了黨的權威，削弱了黨對工會的控制。在這一意義上，尤其是在參與及影響上海各級黨政機構的政策方面，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有着比文革前大得多的話語權。王洪文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工會在上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文革中的上海工會系統與文革前工會的不同，還體現在幹部的組成。文革前的工會幹部主要由三方面組成：老幹部，他們大多數是共產黨奪取政權時期，從事工廠運動的幹部；勞模先進人物；工廠工人，當然一定是歷次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黨的依靠對象」。文革中的上海工會系統的幹部，基本由造反派組成；雖然也有少數文革前的工會幹部，但那只是為了體現「幹部政策」，只是點綴，所以他們最多只能擔任副職。所有工會系統的幹部，正職基本都是造反派。這並不違背1949年一以貫之的「提拔歷次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幹部標準，這不違背幹部政策，因為這些造反派就是文革這次政治

運動中湧現的積極分子。但是，由於文革只是1949年後歷次政治運動中的一次，而將工會系統全部只由文革中的積極分子擔任，就顯得非常狹隘。這樣的狹隘，正是文革中的上海工會系統被認為「派性十足」的緣由。

工人造反派是工人的組成部分，儘管他們具有很強的幫派意識，但他們也具有很強的階級認同感。在黨和政府同時又是企業所有者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文革中的社會衝突主要只能表現在政治層面而不在經濟層面，工人造反派的參政因此並沒有為工人帶來多少實際利益。他們所起的作用更多是在民主權益的爭取上。上海工人造反派與黨的關係文革後被批判為「派性」，「工會凌駕於黨之上」。其實，工人造反派的這種派性實際是對自己利益集團的參政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訴求，具有民主成份。作為一個政權結構，本來就應該是各種利益集團的協商和互動。但執政黨認為自己已經代表了所有階層和集團的利益，不需要，也不允許任何利益集團出頭為自己爭取利益。而且文革中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利益尚未分化，在別的階級或階層都沒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的情況下，工人造反派面對的不是其他利益團體，而是整個政權；加上沒有制度層面的相關機制，於是顯得非常孤單和突兀，也引起反感。

工會的地位是工人地位的反映。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地位雖然高，但仍然是虛假的。因為工會的權利不是來自憲法的「自由結社」，而仍然依附於黨。只是文革前的工會依附於整個黨，文革中則依附於黨中的一個派別，這個派別勢力大一些，工會的力量就強一些。工人不能通過自由結社選擇當政者。文革的經濟體制畢竟仍與文革前一脈相承，黨和政府仍是企業所有者，工會的真正獨立是不可能的。這也是掌握着工會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從來沒有為工人爭取權益的最根本原因。而在事實上，文革中上海工會與廣大職工關係不大。市總工會最在意的，是文革新幹部在各級黨政位置的數目，而不是維護職

工權益。王洪文一再強調工會要抓大事。王洪文的這個大事，就是鞏固文革秩序，警惕反文革勢力。這使工會陷入政治派別的紛爭，脫離為工人說話辦實事的天職。這樣的工會，地位再高，也失去了工會的本質，甚至比文革前的工會更脫離職工。

與上層工會領導人極強的領地意識對比，文革中底層工人的工會意識卻普遍下降。沒有了加入工會的申請手續，取消了工會會員和非工會會員的待遇差別，造成工人們工會意識的淡泊。加上工會只抓「大事」，連文革前的傳統活動內容都停止，工會基本功能萎縮。於是，一方面是上層工會人物對工會獨立地位的強硬維護，另一方面卻是普通工會會員對工會的日益疏離。直到文革後期，葉昌明等意識到這種脫離底層工人的趨向，決心以替工人辦實事的行動，回歸群眾組織的職能，情況才有所改變。但是這種回歸，也只是回歸到文革前的工會套路，仍沒有回歸到工會工作的本質。在這樣的體制下，不可能被允許，也沒有任何路徑。

上海工人造反派將工會看作自己的領地，看作是最能保持文革勝利成果的領域，高度警惕黨政對工會的滲透。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比較集中在工會系統而沒有進入黨政系統時，他們的措施似乎帶來了工會獨立的現象。但是這樣的獨立卻又是脆弱的。因為他們所針對的，不是黨政對工會工作的干預，而是反文革勢力對工會的滲入，是在政治鬥爭層面對自己派別的保護，而不是在政治權益和經濟利益層面對廣大工人的保護。而對於工人組織，最具本質意義的是工會的獨立，以及結社、集會、言論和新聞的自由。因此，如果文革沒有結束，隨着時間的推移，如果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進入黨政，他們還會這樣視工會為獨立領地嗎？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第三十二章

市委寫作組

張、姚在上海的輿論總管

(上)

市委寫作組的成立

到文革中後期，上海的文革勢力，除了以王洪文為核心的市總工會的工人造反派，另一支重要力量就是以張春橋為核心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

文革中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正式成立是在1971年。而在此之前，還是在《紅旗》雜誌組稿小組時期，朱永嘉已經借着張春橋、姚文元的各種講話批示，陸續建立成立了一系列專題小組。當時姚文元提出，以任務帶隊伍；張春橋提出，班子不要拉到市革會，放在外面，目標比較小。朱永嘉贊成，說：這個方法好，人歸我用，思想工作人家管，發現好的苗子就拔上來。¹ 徐景賢也主張將這些專題小組分散在各處。《紅旗》雜誌組稿小組剛成立的一年多時間內，王承龍還是市革會辦公室負責人。為了避開王承龍以及其他人的注意，「徐下令各有關單位提供各種方便。徐還規定專題小組的人對外進行組稿、調查、開座談會等活動時，要以報社記者身份，或工宣隊員等其他身份，不能亮出寫作組的牌子」。² 這些專題小組主要有歷史組、哲學組、自然辯證法組、經濟組、文學組。

- 1 張春橋、姚文元和朱永嘉的話都轉引自吳瑞武 1977年3月18日《我在寫作班工作期間的揭發交待》，上海揭批「四人幫」辦公室編。
- 2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816頁。

各個專題小組的建立並非張春橋、姚文元直接授意，卻又都緊密秉承張春橋、姚文元的意向：1968年底，姚文元說要搞些「批孔」的材料，朱永嘉於是向復旦大學歷史系和歷史研究所抽調人員，1969年3月，在上海市圖書館西樓借了201室成立歷史組，成員有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教師余子道、王守稼等。後來又成立了黨史組，由余子道負責。1969年5月，為批判蘇聯戲劇理論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戲劇理論，以及批判周揚「四條漢子」等，在解放日報社借了兩間屋子成立文藝組(後來一部分搬到康平路182號5樓，一部分搬往紹興路上海人民出版社大院內)，負責人是作家協會文學研究所的陳冀德；後來又成立了文學概論組，由文學研究所的戴厚英負責。

1969年夏天，張春橋來上海為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作準備，他將朱永嘉、王知常和蕭木找去，一起讀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樣本並提意見。年底，朱永嘉便是在康平路181號建立了「學習毛選第五卷文章小組」，組長是市革會工交組借調來的機關幹部章樹焜，組員有復旦中文系教師胡錫濤、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倪墨炎、空四軍幹部吳振標、中華船廠工人高志仁等七人。以這個組為基礎，後來成為哲學組，組長仍是章樹焜。1969年10月，姚文元說要研究科學家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於是在文匯報社借兩間屋子，成立自然辯證法小組，由華東師範大學教師王紹璽負責。王紹璽文革前就是市委寫作班成員。

一次談話時張春橋講起，周恩來到上海時曾說魯迅的最後十年是在上海度過的，上海應該在魯迅研究上做點工作。朱永嘉於是很快建立了魯迅研究小組，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師姚漢榮負責。1969年10月9日，姚文元對朱永嘉報送的選題發表了一些意見，並提出編兩組資料：一是「魯迅論孔子」；二是「五四以來反對派、右派以及蔣介石關於孔子的言論」。³朱永嘉將這兩件事交給在上海圖書館的歷史組，但歷史組成員都

3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816 頁。

是研究古代史的，沒有研究中國現代史的人。於是將曾任市革會專題寫作組組長、此時在工宣隊的復旦大學歷史系教師吳瑞武調回，負責歷史組。1970年12月7日，上海第四次黨代會召開前，成立「上海市第四次黨代表大會決議起草小組」，成員除朱永嘉、王知常和蕭木外，還有顧澄海等十多人。地點就設在市革會工交組；這個組後來成為經濟組，由市革會工交組幹部顧澄海負責，地點在陝西路南京西路的原政協辦公樓內。

這樣的「以任務帶隊伍」，是各專題小組寫作的基本格局。朱永嘉陸續從上海各大學以及文化、學術單位調來人員，以他與張春橋、姚文元直接聯繫的信息資源，加上自己廣泛的人脈資源，逐漸擴展着《紅旗》組稿小組的涵蓋領域。只要張春橋、姚文元表露點什麼說法，朱永嘉馬上以此為依據，建立一個新的組。就這樣，《紅旗》組稿小組逐步發展，下面的專題組越設越多。到1971年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正式成立之前，已經初具規模。

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與林彪嚴重分歧；1971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名為批判陳伯達、實為批判林彪的「批陳整風會議」。7月，張春橋、姚文元到上海，在康平路辦公處召見徐景賢，說經過反復考慮，決定正式重建市委寫作組。負責人仍是《紅旗》雜誌組稿小組的朱永嘉、王知常和蕭木。張春橋強調說：「至少要培養一支二百人左右的我們自己的理論寫作隊伍」。⁴張春橋並對徐景賢說：他們抓意識形態，我們也要抓意識形態。朱永嘉說：「我們這個寫作組，某種意義上是與林彪集團對着幹的產物」，⁵「我們只聽張、姚的，其他人的話可聽可不聽」。⁶在籌建寫作組過程中，徐景賢曾請示

4 徐景賢 1977 年 12 月 13 日。

5 朱永嘉 2011 年 9 月 4 日《與 9.13 事件相聯繫的上海文匯報 3.16 文章》，載於網上博客《我母親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missyoumymothe>。

6 這話朱永嘉對許多人說過。筆者曾問過朱本人，朱說他當時是有這樣的思想。

張春橋，要不要成立市委宣傳部。張春橋說不必了，反正現在有市革會文教組和寫作組。7月7日，徐景賢起草通知，宣佈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正式成立。徐景賢到會並講話，強調寫作組要起到不是市委宣傳部的市委宣傳部作用，不但可以抓寫作，抓理論，管教育、文藝、新聞、出版等，而且也可以去各個行業調查研究。

寫作組成立初期，沿襲《紅旗》組稿小組建制，仍以原負責人朱永嘉、蕭木、王知常為核心，朱永嘉主要負責。1973年5月，蕭木被調北京任王洪文的學馬列輔導員，實際上等於政治秘書；於是又增加王紹璽⁷。1976年6月，又將各組負責人顧澄海⁸、陳冀德、章樹琨⁹，都增補為核心成員。¹⁰ 如此，寫作組核心成員共6人：朱永嘉、王知常、王紹璽、顧澄海。陳冀德、章樹焜。這6人，再加上在寫作組時間比較長、起作用比較大的組員例如哲學組的高志仁、郭紹緒，文藝組的徐輯熙、姚漢榮、高義龍、劉景清、余秋雨，自然辯證法組的鄧偉志、朱維錚，等等，再加上秘書組人員及其他行政服務人員包括駕駛員，組成寫作組的本部，共有四十人左右，都參加寫作組本部的學習。¹¹ 不

7 王紹璽，男，1931年生，文革前是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中文系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文藝組成員，中共黨員。文革中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核心成員。文革結束後被開除黨籍。

8 顧澄海，男，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工業政治部幹部，中共黨員。文革中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核心成員、經濟組組長。文革結束後被開除黨籍。

9 章樹琨，男，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工業政治部幹部，中共黨員。文革中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核心成員、哲學組組長。文革結束後被開除黨籍。

10 歷史組負責人吳瑞武不是核心，因為他同年3月已被調往文匯報社。

11 在未刊稿《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說寫作組分本部組織，外圍或附屬組織，臨時組織等好幾個層次，層層擴散；各層次的工作人員工作證也不一樣，有的用市革會工作證，有的用《學習與批判》記者證。筆者曾就此詢問過寫作組的總管朱永嘉，他說，寫作組沒有如此等級，他本人尤其對等級之類非常不在意，更何況文革就是要打破等級。所有的組，都是根據形勢或需要建立的。因為設立的組多，所以根據業務性質歸類，例如黨史組的業務由歷史組管。否則那麼多都由他親自管，管不過來。至於工作證，那是因為寫作組的前身《紅旗》組稿小組最初設在

過即使是「本部」成員，人事關係也仍然都在原工作單位。各組的業務骨幹大多是大學教師，或文革前的上海社會科學院人員。許多人之前還在郊區的幹校，因此被調回上海市區。朱永嘉從各方大量借調業務人員，他認為：「共產黨的領袖總要搞一點理論的」，「理論上的權威也會轉化為組織上的權威」。¹²

因事設組的構架

寫作組成立後，辦公處設在康平路141號，朱永嘉他們從原來的康平路165號搬出。所屬各組除經濟組外，也先後陸續從原來借用的臨時辦公處搬來，分別設在康平路141號(文藝組)、147號(哲學組)。這兩幢房子原來是《支部生活》的。還在182號(歷史組、自然辯證法組、電影組等)也佔有幾個樓面。

有的組下面再設組。文藝組下面設的組最多：最初下面設有《摘譯》組，後來又設立了文藝批判小組，文學概論小組；還有《朝霞》編輯組，地點在紹興路上海人民出版社內；以及魯迅研究小組。1975年下半年，成立電影組，也歸文藝組管，但具體工作由徐景賢直接抓。歷史組除了批判孔子，後來為編寫中共黨史和世界近代史資料長編，下面又設黨史編寫組和世界近代史資料長編編寫組。前者主要由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教師組成，後者主要由上海師範大學的教師組成。自然辯證法組的下面，又設理科大批判組。此外，復旦大學學報《學習與批判》雜誌與市革會教衛組的《教育實踐》雜誌，業務上都歸

康平路市委機關大院，門口有警衛，出入必須通行證，所以他曾向市革會為《紅旗》組稿小組的人申請了數份。但他們不是因為是「核心」才被發，而是因為工作需要。後來成立寫作組，從市委機關大院搬出到康平路141號，通行證就沒有必要了，只有少數需要經常出入康平路機關大院請示匯報工作的人才有通行證。至於記者證，那是為了下去訪談或組稿方便，基本是發給《學習與批判》雜誌的人員的。

12 轉引自司馬東去1999年《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寫作組管，負責人高志仁，下面還有一班人編寫《教育學》。

就這樣，寫作組因事設組，組下設組，搞得組織機構有點亂，像個鬆散的網絡，攤子越鋪越大，人員越調越多，最多時有三四百人，但究竟多少誰也講不清楚。因為人員都是借調，沒有登記造冊。很多人被借調上來，完成了某個臨時工作後，又回原單位，所以流動性很大。各組都埋頭幹自己的事情，不去過問其他組在幹什麼，組與組之間互不通氣。

寫作組經常舉辦各種學習班，以這樣的方式，一挑選適合人員，學習班結束留在相關小組；二與學員保持經常性聯繫，建立基本作者隊伍。據統計，這樣的培訓班學員共有八百七十多人。但越來越多而龐雜的各種小組、課題，不是朱永嘉一人能夠管得過來的。而且由於所有的人都是借調，構不成一個有編制的實體單位。那些從機關、學校、工廠借調來的人員，工資還可以由原單位發放；但那些從農村借調來的人員，生活費用和其他福利卻沒有着落。因為農村人民公社是按在生產隊的出工多少記工分，到年底結算後分紅。借去寫作班，不算為本隊出工，沒有工分，就分不到錢。寫作組只好讓上海人民出版社撥些經費，每月25元發給幾個長期被借調在寫作組的農村青年，作為生活費，但終不是長久之計。此外，許多青年都已到談婚論嫁年齡，結婚需要房子。而那個時候，房子由所在工作單位分配，房子是緊缺資源，單位對借調出去的職工一般不會考慮。所以朱永嘉希望給寫作組一個正式的編制。他建議恢復社會科學院，有了這樣的正式編制，就可以將被借調人員的工資和人事關係等都調到社科院，解決體制身份、工資和房子等一系列問題。1974年6月1日，朱永嘉寫了請示報告《加強理論隊伍建設》給張春橋、姚文元，建議恢復成立社科院，說這樣便於管理，也便於讓更多人參與管理，發揮作用。但兩天後張春橋6月3日批覆：

對社會科學院問題，我認為不忙於建立，一搞這類機構，勢必增加許多行政問題，忙於應付。¹³

姚文元批覆：

我覺得寫作組(或寫作班子，這個名稱不一定不好聽，中央文革也叫小組)，還是按照上層建築領域革命的需要，今後的戰鬥任務及事物本身的發展規律來考慮組織形式較為實際，不在乎名稱，而在乎實際。……

寫作組要保留評論權。要作為一支堅持毛主席路線的戰鬥隊伍而存在。¹⁴

讓寫作組始終處於不固定狀態，有利於根據需要，隨時淘汰或吸收人員；也有利於隨時調整結構，可大可小可解散。這顯示出張、姚對文革前景的不自信。據說有一次朱永嘉去北京見到姚文元，又問起此事，姚文元說：「老朱，你將攤子攤得這麼大，運動來了怎麼辦？」朱永嘉回來後，說起姚文元的這話：「這是為我好。」¹⁵直到1976年六七月間，朱永嘉再一次提出恢復成立上海社會科學院，並從市裏爭取到淮海中路上的原市委黨校房子作辦公處。但這個打算因兩個多月後文革結束而未果。

除了0.2元的夜餐費，寫作班全體成員，從朱永嘉、王知常起到普通組員，沒有稿費，也沒有一分錢的經濟補助。朱永嘉在寫作班雖然是負責人，但與別人相比，他的特權是：在機關食堂，別人吃粳米飯，他吃大米飯，因為他有胃病。

13 轉引自孫光萱《上海市委寫作組舉辦的各類學習班》，載於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7期《書屋》。

14 轉引自司馬東去1999年《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

15 這是原寫作班成員谷梁告訴筆者的，朱永嘉當時說這話時，他在場。

張春橋、姚文元的忠實追隨者

寫作組的靈魂是張春橋、姚文元，他們的思想無時不刻地影響和指導着寫作組。對寫作組編寫的文字，他們都有許多批示或改動，他們也經常同朱永嘉等通信或談話，或通過別人轉達想法和指示。文革結束後，從寫作組收繳的張春橋、姚文元的批示、信件、電話記錄、文章改稿等(其中包括少量的江青、王洪文的批件)，共有401份。這只是個不完全的數字，因為寫作組沒有文書檔案的收發登記制度。朱永嘉、王知常在這方面有着名士的隨性，事情只要做完就行，沒有想到記錄和留檔，抑或是存心不歸檔；文革結束時，許多張、姚批示和信件又被銷毀。此外，寫作組辦了那麼多學習班，也沒個記錄，文革結束後清查時只能靠回憶。但從這401份文字中，也可感受到張春橋、姚文元對寫作組的影響。¹⁶ 朱永嘉文革後分析寫作組和張春橋、姚文元的關係：

這是他們一手抓起來的，他們抓這個攤子比較得心應手，要做的事情我們盡努力去做，跟市裏別的機關比，辦事效率高，反應快。對他們來講，運用上比較自如。

有我們這個班子，至少工作方便，要了解上海各方面的情況，要掌握班子內部的情況，這跟他有一個秘書不一樣。想做什麼事情、搞什麼調查研究，要寫文章搞輿論也方便了。但是他也沒有用我們這個班子搞關係網，因為上海他基本上都掌握了。如果我們這個班子在北京的話，還要擔負另外的任務，就是做公關，不跟方方面面聯繫，你想站住腳跟，是不可能的。對姚文元來講，他在上海也是有了一個工作班子，毛澤東佈置什麼任務，他馬上下達到

16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827 頁。

我們這裏，就能夠比較快地完成，如果有什麼重點宣傳任務和重點調研任務要我們做，我們也可以竭盡全力配合。¹⁷

徐景賢忠實地根據張春橋、姚文元的指示，制定上海的輿論導向。他文革後交待說：

我與寫作組朱永嘉、王知常、蕭木的關係是同生死、共命運、互相依存、互相利用的關係。在上海，他們需要我這個市委書記做他們的保護傘，我也利用我的職權，為他們提供一切方便，我知道方便他們就是討好了張、姚。而我也需要他們經常給我通一些消息，看一些張、姚的批件，問一問《紅旗》雜誌的精神，我就可以據此來「指導」上海的輿論工作。¹⁸

朱永嘉同樣是張、姚指示的忠實執行者：很多時候，張春橋、姚文元只是一個想法，只要有所表示，朱永嘉就會努力設法去實行。但不同的是，徐景賢是張、姚說什麼，他便做什麼，不敢越雷池一步；朱永嘉則是利用張、姚的講話和批示，把雞毛做成令箭，一點一點地擴大寫作組業務。他是文化人，又是文革的積極參與者，有着文化和革命的雙重使命感。一方面，朱永嘉對張春橋敬重，將張春橋看作毛澤東思想的代言人和闡釋者、文化大革命領頭人；另一方面，朱永嘉希望能在思想文化領域有所建樹，借張、姚的話開拓自己心中的革命文化園地。不過，儘管朱永嘉對張春橋的指示說一不二，別人也將他看作是張春橋、姚文元的代言人；而張春橋也很欣賞朱永嘉，但他與朱永嘉始終保持距離，他與朱永嘉的深入交談並不多。文革後朱永嘉對此曾多次感嘆：「我對張春橋赤膽忠心，

17 轉引自《南風窗》2010年第8期章劍鋒著《文革上海寫作組的那些人和事兒》。

18 同上。

張春橋對我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心裏話。」¹⁹ 在這方面，張春橋似乎與蕭木有過稍深入交談，不過也是在文革後期。

從文革前的上海市委寫作班，到文革中的市革會專題寫作組、市革會大批判寫作組、《紅旗》雜誌組稿小組，直到上海市委寫作組，寫作組的名稱雖經多次改變，但核心人物和奉命寫作的核心任務，始終沒有變化。與文革前的寫作班相比，文革前寫作班只是一個臨時組成的單純寫作班子，上面說寫什麼就寫什麼。文革中的寫作組卻是市革會和市委領導下的一個職能部門，工作內容既有寫作，又不限於寫作。上海市革會自成立後，市革會政宣組只存在一年多就被撤消；而1971年恢復後的中共上海市委，也不設市委政宣部門。於是，寫作組代行了市委宣傳部門的許多職責，還包括原來由市委辦公廳相關機構承擔的部分文件起草、調查研究等職能，成為不是市委宣傳部的市委宣傳部。

奉命寫作是寫作組的基本任務

奉命寫作，始終是寫作組最本職的核心工作。這些寫作內容，可以大體歸納為五個方面：為《紅旗》雜誌和各類報刊撰寫大批判文章，為張春橋、姚文元起草重要文章或講話，根據形勢和各類政治運動需要編纂資料匯編，為市革會起草重要文件，為市革會其他領導起草講話稿。從這些內容來說，寫作組可以說是張春橋、姚文元以及市革會、市委的秘書班子。

不過，寫作組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秘書班子，因為市革會有秘書組。一般文件決議和領導講話都由秘書組起草，只有重要文件和決議才由寫作組起草。這顯示寫作組在主流話語中的地位。例如市革會成立後的第一個決議，1967年2月23日《當前

19 這是朱永嘉2008年間和筆者的一次漫談時說到的。以後朱永嘉還幾次對作者這樣說過。

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任務》就是王知常、蕭木等起草的；此時市革會專題寫作組雖然對外還沒有正式宣佈成立，但人員已集中。為市革會起草的文件還有：1967年5月20日的《關於掌握鬥爭大方向，用大批判推動一切的決議》，1967年5月26日的《關於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鞏固革命新秩序的五項決定》，1967年8月5日的《關於迎接文化大革命全面高漲的意見》，1968年2月5日的《發揚一月革命精神，全面落實毛主席最新指示，迎接市「革代會」的召開的決議》，等等。此外，寫作組也為市革會領導起草講話，有為馬天水的；也有為徐景賢的，但不多，徐景賢一般自己準備講話稿，寫下幾條提綱，很少照本宣科。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8月，專題寫作組和大批判寫作組撰寫了大量批判劉少奇以及陳丕顯、曹荻秋的文章，其中有些還是系列文章。例如《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曹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專題廣播十一講，《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陳丕顯、曹荻秋》，《徹底清算陳、曹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農村版），《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俗講話》，由張春橋與徐景賢改定的《評陳丕顯的五次假檢討》，等等。又例如批判劉少奇的「七評」。這些文章，都以上海的「兩報一刊」即《文匯報》、《解放日報》、《支部生活》名義，發表於上海的報刊；其中五篇被《人民日報》轉載。毛澤東此時正在上海，看了批判劉少奇系列的前兩篇，讓張春橋帶話說寫得好。寫作組情緒更高，打算像1964年中蘇論戰那樣，也來個九評。毛澤東又說文章不要發得太密，於是到第七評停了下來。²⁰

《紅旗》組稿小組時期，《紅旗》雜誌每期都要向該小組約三四篇文章，都是些大批判文章或文革經驗總結，從中挑選刊用。據不完全統計，組稿小組被《紅旗》雜誌採用和發表的稿子有41篇。其中，由組稿小組撰寫，以「上海革命大批判寫

20 這是朱永嘉對筆者回憶的。

作小組」、「宮效聞」、「齊永紅」等署名的文章22篇；由組稿小組幫助撰寫或改寫後，以基層單位署名的文章19篇。²¹ 其中有同濟大學五、七公社的經驗，有與文匯報社一起組織的關於鄉村赤腳醫生的報導，有與新華社上海分社合寫的上海機床廠七·二一大學的經驗；還有為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召開的理工科大學座談會、文科大學座談會寫的紀要。復旦理科和文科的幾個試點，也都是朱永嘉派人去抓的。

寫作組寫文章的特點，一是集體改稿：由一人寫出初稿，然後大家討論修改，一稿一稿又一稿，你改我改大家改，到最後，也分不清究竟以誰為主寫的。反正就是一定要完全符合張、姚和「上面」的需要，個人的思想和風格根本不被允許。二是緊扣現實政治，而且一定要「革命激情高漲」。三是文章「最後的尾巴一定要翹上去」，即點題一定要聯繫現實而且要振聾發聵。²² 例如《紅旗》組稿小組被佈置的第一篇文章《從八大到九大》，後面「翹上去的尾巴」是關於選舉的。當時正在籌備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會上將選舉中央委員，而巴黎公社式的選舉是文革初期《十六條》中強調的。但是，到1967年革委會普遍建立時，選舉結果卻很不利於造反派。如天津市成立革委會籌備小組時，選舉出的「老保」佔多數。所以姚文元明確佈置：這篇文章的結尾就是要「破除對選舉的迷信」。但是改了36稿，「尾巴」始終翹不上去，最後只好不刊用。²³ 還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革命和孔家店的反動》，是1969年朱永嘉根據張春橋要求而佈置的。張春橋10月19日在康平路一次關於大批判的會議上提出：孔夫子要批，不能開一二炮就算了。朱永嘉馬上佈置歷史組寫文章，寫了很長時間，改了17

21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

22 這3個特點是蕭木向筆者歸結的。

23 同上。改了36稿是王知常回憶的，但據蕭木回憶說沒有這麼多，只有16、17稿多。

稿。姚文元閱後認為可以發表。但張春橋看後，認為現實感不強，講歷史太多，社會主義時期卻講得不充分，也攔下了。²⁴

為張春橋、姚文元寫作，也是寫作組的工作之一。張春橋、姚文元一般不用別人為他們起草講話稿。只有代表市委、市革會作綱領性工作指導的重要講話，或者中央佈置的講話，才由寫作組起草。因為那不是他們個人的講話，所以必須經市委常委或中央討論通過。例如1970年1月上海第四次黨代會上張春橋的政治報告和姚文元的講話，還有紀念中共成立五十周年的社論。後者是周恩來提出的，他建議張春橋寫一篇回顧中共五十周年文章。毛澤東圈閱，表示同意。張春橋即回上海，讓朱永嘉找人協助他。朱永嘉成立了個由他自己和蕭木、王知常等八人組成的起草小組。²⁵ 這是闡述毛澤東文革理念和建黨思想的「重頭文章」，1971年7月1日中共50周年紀念日，以《紀念中國共產黨五十周年》為題，由「兩報一刊」作為社論發表。

編寫大事記，匯編資料集

張春橋、姚文元還佈置寫作組編各種資料匯集。其中，最重要的是《偉大的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一月革命大事記》以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各種反動思潮資料匯編》。

《偉大的一月革命勝利萬歲》是1968年初編寫的，當時徐景賢根據張春橋的意圖，提出要總結一月革命經驗，由此組成蕭木為主的編寫小組編寫完成。《一月革命大事記》的編寫在中共「九大」前夕。1969年1月，寫作組還在《紅旗》組稿小組時期，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正準備召開，徐景賢提出編寫關於一月革命的大事記，他召集朱永嘉、蕭木、王知常等人，說

24 吳瑞武 1977年3月18日《我在寫作班工作期間的揭發交待》，上海揭批「四人幫」辦公室編。

25 這是蕭木告訴筆者的。

「張春橋、姚文元指示說，上海九大代表多數來自基層，不了解上海一月革命是怎麼一回事，開起會來人家一攻就沒有辦法了。」他指示要「搞一份大事記一類的材料，給代表們武裝一下」；還說「要讓基層來的代表都能很快記牢，背得出，像修改黨章的要求一樣」，「你們這些歷史學家(指羅思鼎小組的四個人)怎麼沒想到把一月革命中春橋、文元同志的活動記錄下來，這是將來寫黨史的珍貴史料，張、姚幾次對我說，再不組織人搞，過幾年就要忘記了，真可惜！」朱永嘉於是組織人員，由吳瑞武具體執筆，編寫了一份上海文化大革命簡介，發給即將參加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的上海代表人手一冊。接着又在此基礎上擴充，編出六萬多字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以及附件《張春橋、姚文元1966年12月—1967年2月講話記錄摘要》。1969年11月，徐景賢將清樣送張春橋、姚文元。張春橋看後在樣稿中作了多處記號和修改。但又要求徐景賢不要再付排，而且要徐景賢將已經印出的也全部銷毀。徐景賢只好讓將全部底稿、記錄、資料及版子等全部銷毀，僅留三份鉛印清樣稿。²⁶

另一份長篇資料匯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各種反動思潮資料匯編》，也是寫作組在1969年《紅旗》組稿小組時期編寫的。1969年11月4日，張春橋將朱永嘉找去，說要宣傳繼續革命思想，可以編寫一本關於文革期間各種「反動思潮」的資料匯編。張春橋提到武漢的「北斗星協會」、湖南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省無聯」)，講到「二月逆流」。於是，由朱永嘉、蕭木和王知常分類，歷史組組長吳瑞武具體負責，從上海圖書館收集了各地小報和傳單進行摘錄，於當年12月編寫出初稿。摘錄的內容，主要是文革中全國各地民間的異端和反文革思潮。又因為張春橋要求將1967年的「二月逆流」也作

26 吳瑞武《我在寫作班工作期間的揭發交待》。文革結束後，從張春橋、徐景賢的辦公室中各查出兩本，分別保存於上海市檔案館以及中央檔案館。本書在很多地方都引用了這本資料。

為專題之一，所以，也收集了中央高層幹部如葉劍英、陳毅、譚震林、李富春、聶榮臻、烏蘭夫等的講話。1970年編出第二稿，由朱永嘉刪改定稿。但此時葉劍英和李先念等已經成為政治局委員，吳瑞武提出，將他們編進去不妥。於是又編了「簡編」，作為定稿送張春橋。

寫作組編寫的資料還有：專題寫作組1970年4月編的《陳伯達反動言論摘編(解放前部分)》。1971年的《知識是先天有的還是後天有的——中國近代地主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言論摘編》，《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中國近代地主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言論摘編》。還有市委寫作組下面的哲學組1972年編的《批判林彪在兩大戰役中反對毛主席戰略部署的罪行》。1972年1月由蕭木起草的上海對外宣傳文革的專用提綱：《上海文化大革命簡介》，張春橋審閱。1973年5月由寫作組下屬黨史組和歷史組編的《托派資料》，包括托洛茨基的言論和簡介，姚文元親自修改，據說是毛澤東要看。²⁷ 1976年寫作組下面的黨史組編的《鄧小平民族革命時期言論摘錄》、鄧小平《修正主義言論摘編》，等等。

還有一些資料，雖然沒有署名寫作組，但實際也由寫作人員組編寫。例如1967年3月的《以紅革會某些人為代表的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動逆流紀要》，署名「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當時寫作組還沒有重新成立，機關聯絡站負責人之一郭仁傑，要求機關聯絡站下面的調查組吳瑞武編寫，最後由徐景賢、郭仁傑修改定稿。徐景賢將小樣送張春橋，「張春橋看了很感興趣，哈哈大笑，還用紅鉛筆在上面改動了兩處。」²⁸ 此外，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批判胡守鈞的一套小冊子，雖然名義上是「復旦大學胡守鈞小集團專案組」編輯，但專案組只是

27 據吳瑞武《我在寫作班工作期間的揭發交待》，當時朱永嘉曾經向他暗示是毛澤東要看。

28 吳瑞武《我在寫作班工作期間的揭發交待》。

收集資料，內容是寫作組決定並編輯的。寫作組而且模仿毛澤東當年制定的批胡風小冊子《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卷首加「編者按」，每節加「按語」，語氣也模仿毛澤東；連小冊子的封面、板式、開本，也都完全模仿《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這套小冊子印行了近20萬本，在當時影響很大。

為毛澤東的文革提供依據

各類調查研究，是寫作組又一項重要工作。這些調查研究，有的是對當前工作中或社會上存在問題的調查，為市革會採取相應措施或制定相應政策提供參考依據；有的是工作經驗總結；有的是針對性地向上級有關部門反映情況或上海的觀點；還有的是根據張春橋的佈置和要求所作的社會基本狀況調查，為張春橋的理論研究提供資料。而張春橋的研究，是為了向毛澤東的文革提供理論和現實依據。

解決工作存在困難和問題的社會調查，主要有1974年對上海蔬菜供應的調查，1974年關於上海赴外地上山下鄉插隊落戶知識青年情況的調查等。工作經驗總結的調查報告，最有影響的是1973年的《上海城市民兵情況調查》，包括八個典型調查，總報告由蕭木定稿。該報告被國務院轉發全國。²⁹ 這一類調查，還有「設計革命調查」、「如何掌控地下水調查」，等等。

還有的調查，是為政策調控取樣。如農村人民公社生產隊所有制向大隊所有制過渡的調查。當時農村人民公社是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制，以生產隊為基礎進行經濟結算。而農業樣板山西昔陽縣的大寨大隊是以大隊為基礎。朱永嘉曾在1975年11月至1976年3月，先後在上海郊縣幾個比較富裕的公社組織召開座談會。座談會記錄整理後報張春橋、姚文元等。張春橋很感興趣，認為這是在所有制問題上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29 文革結束後國務院又發文撤銷這個轉發文件。

的突破。這個調查從1975年至1976年，先後進行過多次，得到張春橋多次批示。³⁰ 又如上海縣農村調查。這個調查共包括八個專題調查：《關於農村各階級地位的調查》，《關於農村人民公社三級經濟狀況》，《關於農村社隊工業問題》，《關於農村私有經濟問題》，《關於農村住宅問題》，《關於農村貨幣管理問題》，《關於農村分配工作的若干問題》，《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³¹

還有一些調查是政策性調查，例如造船調查，外貿調查，前進農場調查。對造船調查是在1974年「風慶輪」遠洋歸來之後，³² 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為此指示對中國的造船工業以及遠洋運輸能力等作調查。³³ 當時正是王洪文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時期，王洪文讓身邊的四個工作人員包括蕭木承擔這一調查。四人定下五個港口城市包括上海作為調查對象。蕭木覺得上海有寫作組可用，便在1974年10月21日打電話給朱永嘉，請他幫忙進行對上海方面的調查。³⁴ 朱永嘉佈置後，由寫作組的經濟組負責，共寫出十五份調查報告。

外貿調查有兩次。第一次在1974年10月左右，都是寫作

30 吳瑞武《我在寫作班工作期間的揭發交待》。

31 同上。

32 「風慶輪」是上海遠洋運輸公司自1965年以來，由國家計劃安排國內船廠建造的第十艘萬噸級遠洋船，由上海江南造船廠建造，全部國產設備。1973年底到1974年初進行輕載試航。當時正逢世界石油危機，世界遠洋運輸業很不景氣，一艘萬噸遠洋輪只以原價的20%便可買到。周恩來因此提議購買一批船隻，加強中國遠洋運輸能力，外貿部門於是動用外匯買了一批船隻；更有部門提出，可趁此機會向國外租船組成中國的遠洋運輸船隊，成本還可以降低。但上海方面認為風慶輪的遠洋成功，顯示中國能夠自主造船，反對向國外買船和租船。

33 據蕭木對筆者說，這個調查由李先念指示而來的情況，是王洪文的秘書米士奇文革後查到告訴他的。

34 以上關於造船調查的資料，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869頁，以及蕭木2012年1月18日對筆者的回憶。

組下的經濟組負責的。事情起因是由於上海方面對國務院外貿部的一些做法有意見。當時外貿部鼓勵多頭出口、自行出口。這是外貿部調動各地各部門出口積極性的放權舉措，但因此出現同行業壓價競爭現象。寫作組協助黃金海負責的上海市革會財貿辦公室，將這些情況報外貿部。朱永嘉還給張春橋寫了封信，認為「外貿部的出口不是服從於國內工業生產的需要，而是要國內生產服從外貿需要」。³⁵張春橋在信上劃了一條線，批示：「這個題目，我有興趣。」於是朱永嘉即要經濟組去組織人員調查。但是這個調查進行了一段時間後，朱永嘉自覺調查來的材料說明不了觀點；加上四屆人大剛閉幕，寫作組有人覺得：「李先念還是副總理，部長還是新的，人家剛上任，我們就告狀，不好」，調查就攔下來了。第二次調查在1976年2月到5月，正值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調查的重點是1974年和1975年。調查內容涉及電站設備、機床、造船、汽車以及鋼材行業的進口狀況，上海口岸出口商品比例結構變化，等等共6個專題，思路都是反對依賴進口，強調自力更生，經朱永嘉審定後上報。³⁶

前進農場調查，是因為1974年國務院農墾部打算將國營農場退出全民所有制，將薪給制改為集體所有制的工分制，即與農村人民公社一樣，評工分，年底結算分紅。對此，張春橋對朱永嘉說：「馬克思主義在國營農場這個問題上怎麼不靈了呢」³⁷？朱永嘉則考慮到國營農場工資制若改工分制，那些被分配去的知青生活將更困難。他於是佈置寫作組的文藝組陳冀德等去前進農場調查，寫出針對農墾部的《前進農場宣言》，刊登在《學習與批判》1975年的第11期上。

35 引自朱永嘉在文革結束後的一份交待，這份交待沒有寫明哪年寫的，只寫了月和日：1月15日。

36 同上。

37 朱永嘉2009年10月3日《崇明一日遊》，載於網上博客：《我的母親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e3afd90100fcia.html

這些調查，都是與國務院或有關部門在經濟政策上的不同意見或分歧，本可以用討論方式商榷，卻被寫作組以文革特有的階級鬥爭話語，上升到「兩條路線的鬥爭」，在報紙上大張旗鼓地宣揚撻伐，作為毛澤東、張春橋、江青等文革派打擊周恩來、鄧小平等國務院務實派或政治對手的炮彈。

還有一類調查是根據張春橋的要求佈置的。張春橋一直想對當時中國的經濟所有制和階級狀況進行研究，為毛澤東的文革提供現實依據，並上升到理論，總結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高度和新貢獻。張春橋曾多次對徐景賢、朱永嘉等人表示，當前的社會狀況到底是怎麼個情況，各個階層、階級到底在想些什麼，他們與過去相比到底有什麼變化，我們應該心中有數。³⁸文革中大量新工人分配進廠，許多出身其他階級，對工人階級傳統帶來哪些有利或不利因素。他說：

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我總感到做各種工作，沒有這樣基本調查，心中無底。在工人階級隊伍中，這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到底怎樣？哪些東西對階級的影響很大，這屬於我們工作的基本建設問題，心中要有數。企業管理不研究自己隊伍的狀況，了解思想狀況，階級隊伍的來源和狀況，只能泛泛而談。請工代會、工交組以及在座各位對本廠做些調查，了解你們的一個工廠和一個車間，了解歷史和現狀。從階級鬥爭來看，我們的政策路線進行教育有哪些人，我們講話有用，哪些人不聽，都要通過這樣的調查才能有數。……

(老工人，青年工人)只能說明自然狀況，沒有說明政治狀況。青年要做些階級分析，也不能說所有青年工人都好，都不好；依靠老工人，老工人中間究竟什麼狀況，資產階級思想到底通過哪些渠道影響我們工人階級隊伍。……

38 這是朱永嘉在2013年筆者向他詢問時，對筆者說的。

要做周密系統的調查，這種調查也說明對本階級的認識是不容易的。³⁹

階級關係調查是寫作組所做的所有社會調查中，調查時間最長，調查規模最大的。從1973年開始，到1976年，先後集中調查的有三次。如果不是文革結束，還不會結束。第一次調查是1973年。歷史組去上海第31棉紡織廠，經濟組帶復旦大學經濟系師生去上海第一鋼鐵廠。去國棉31廠的歷史組共列出9個專題：《老工人的思想政治狀況》、《新幹部隊伍狀況》、《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工人狀況》、《工人出身的技術員狀況》、《退休老工人的作用問題》、《青年工人學技術狀況》、《工人的業餘文化生活》、《女工健康狀況》、《經濟困難的職工狀況》。這些專題全部寫出後，被選中兩篇，連同經濟組寫的一篇調查，合印成一冊上報。⁴⁰第二次調查在1975年2月15日至3月上旬⁴¹，去上海機床廠作工人階級隊伍調查以及工人幹部隊伍狀況調查。因為張春橋在當年1月北京召開四屆人大期間，到上海小組重提階級隊伍調查問題，說調查進度太慢，並說：

工人階級隊伍裏政治、經濟、思想情況怎樣？特點和弱點是什麼？……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講是最有遠見、大公無私，但作為一個工人來說，只知自己的工作，也會影響自己的世界觀，很有局限性，很狹窄，不過這些問題不能拿到社會上講。⁴²

張春橋後來說，他這樣想是因為「1972年我在上海住了兩

39 張春橋 1972 年 11 月 2 日在接見市工代會部分委員時，關於調查工人階級隊伍狀況的講話。上海總工會檔案。

40 吳瑞武《我在寫作班工作期間的揭發交待》。

41 同上。

42 轉引自《上海市總工會清查情況專題匯報之六：「四人幫」及其餘黨指令總工會「調查」工人階級階級隊伍狀況，拼湊「張春橋思想」的罪行匯報》。

個月，感到工人的隊伍變化不少，老工人有老工人的問題，新工人有新工人的問題」。

第三次調查在1976年間。6月12日，張春橋在朱永嘉給他的一封信上作了一段較長的批示，說自己最近正在重讀《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越讀越感到自己對今天各階級的情況不甚了了，越是覺得應該弄清楚。」⁴³ 據說張春橋還提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個提法是值得研究的」。⁴⁴ 朱永嘉接到批示後，立即組織寫作組下的哲學組，抽調復旦大學哲學系的教師和學員共三十人左右，再一次進行調查。調查前，朱永嘉明確告知：

這次調查不是搞一般的階級組成情況，主要是說明社會主義時期，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階級關係的變化，重點是變化！……

劃分階級，從政治上看，就是看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從經濟上看，就是看對資產階級法權的態度。⁴⁵

這次調查分四個內容。一對「資本家」也即1949年前的企業經營者的發家史和現狀調查，二對知識分子調查，三對工人階級狀況調查，四對幹部狀況調查。尤其第四個調查，之前張春橋曾提出過，毛澤東所認為的「新生資產階級」究竟是什麼概念，在現實中指何種類型的幹部。所有調查中，這才是真正切中毛澤東文革理論命脈的調查。但朱永嘉覺得不好辦，因為首先確定調查對象就是難題，太敏感。這個調查被朱永嘉壓下

43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 第 876 頁。

44 轉引自《上海市總工會清查情況專題匯報之六：「四人幫」及其餘黨指令總工會「調查」工人階級階級隊伍狀況，拼湊「張春橋思想」的罪行匯報》。

45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 第 876 頁。

來，沒有進行。⁴⁶ 所有調查中，對資本家的調查基本完成，調查對象是1949年前上海紡織行業的榮毅仁家族。1976年9月，又打算對知識分子調查分析。朱永嘉當時透露，調查到最後，可能由張春橋寫成一篇《社會主義社會各階級的分析》。⁴⁷ 但不久「四人幫」被抓，文革結束，全部調查就此中止。

所有制和社會階層的現狀，當政者在各個時期都應了然於心，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但在文革的政治環境下，這樣的調查不可能跳出以階級鬥爭理論劃分政治身份的思維定勢。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張春橋真的寫出了朱永嘉說的那篇文章，那一定是詮釋毛澤東的「走資派」理論，

在所有的社會調查中，最有意思的當屬「資產階級法權」調查。張春橋1958年寫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得到毛澤東好評。毛澤東在破除等級分配方面有着非常執着的情結，始終念念不忘戰爭年代的供給制。1974年10月20日，他又重提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不但在接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並讓周恩來轉告：「要春橋寫這類文章。」⁴⁸ 張春橋於是再寫關於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他只化了幾天時間，一口氣寫出《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刊登在1973年3月的《紅旗》雜誌上。毛澤東看後，在文章題目上一連畫了五個圈，表示滿意。

文章發表以後，張春橋覺得還應該有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實際行動。他於是佈置上海市委的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在上海搞一次測算：如果在上海實行幹部們的「供給制」，對這些幹部不發工資，按級別包下他們及全家人的吃飯穿衣等開

46 這是朱永嘉文革後對筆者說的。

47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877頁。

48 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2003年出版《毛澤東傳》第1714頁。

支，將需要多少財政支出；如果將全市工人的八級工資制，都改為「供給制」，又需要多少開支。此事由馬天水佈置上海市革會的綜合計劃組和財政局、勞動局測算，由寫作組的經濟組負責聯繫各方測算結果。最後的結果讓所有懷念供給制情節者止步：財政開支將增加好幾倍。⁴⁹ 因為說是破除法權的供給制，實際是更加嚴格的等級分配制。尤其孩子撫養費、保姆費等等，在工資制度下全由幹部自己支付；改為供給制，按幹部級別分配，反而是更多的剛性支付。工人也是這樣，無論子女多少，至少得按上海最低人均生活標準發放每人津貼。如此測算下來，上海的財政根本無法負擔。報告送給張春橋，張春橋只得作罷。⁵⁰ 推行供給制一事就此歇攔，再不被提起。

調查研究工作，文革前主要由市委辦公廳政策研究室承擔，根據市委佈置進行專題調查，為市委的決策提供參考和依據。文革中市委和市革會不設政策研究室，這些工作被由寫作組承擔。不過，與文革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政策研究室的調查研究課題，基本由市委佈置；文革中，除了張、姚的佈置，其餘課題大多由寫作組自己制定。比起文革前的市委辦公廳政策研究室，寫作組在這方面有着大得多的主動權，甚至起着市委智囊團的作用。這自然是因為寫作組與張春橋、姚文元的直接聯繫。張、姚雖然也是上海的市委書記，但更是中央決策層核心人物。所以文革中的市委寫作組的話語權，超過市委的其他幾個書記們。所有這些調查，都是先有概念，然後根據既定的概念去尋找資料，以概念框現實。這是文革前就早已形成的調查研究方式。在這種套路下進行的社會調查，除了為現實政治和政策製造依據之外，注定無法得出真正與事實貼近的結論。

49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50 這是筆者詢問朱永嘉為何供給制的財政支出，比工資制要多出那麼多，朱永嘉回答筆者的。

標注「大字本」

大字本是市委寫作組一個重要而長期的工作。這個工作是毛澤東通過姚文元向上海佈置的。「大字本」，就是字印得大一些的書，是專門印給毛澤東看的。毛澤東患白內障，看原書吃力，要求將字印得大些。書的內容都是中國歷代歷史典籍，後來還有中國古代詩、詞、賦；每本都不厚，拿在手裏看着不累。

最初的大字本是北京方面按毛澤東提出的文章篇目，按照原書內容印的，沒有斷句也沒有注釋。1972年12月下旬，姚文元打電話要朱永嘉對《舊唐書·傅奕傳》注釋。朱永嘉一聽書目，馬上就感覺到是毛澤東要看，因為文章中的歷史人物傅奕反對佛教，反對先驗論，朱永嘉覺得這是針對林彪的。他立即組織復旦大學歷史系教師王守稼等進行標注。接着，姚文元又佈置《晉書·謝安傳》、《晉書·謝玄傳》、《晉書·桓伊傳》、《晉書·劉老子傳》。朱永嘉也馬上組織人標注，很快完成。四篇文章合在一起正好成一本，印後送北京。1973年春節，張春橋、姚文元來上海，將朱永嘉叫去興國賓館，給他看他們送北京的那個本子，上面是毛澤東親筆寫的批示：「請政治局同志一閱」。毛澤東還親自校對，查出一個錯字，也改在這個大字本上。從此，為毛澤東標注大字本，成為寫作組又一個工作內容。姚文元一般將書目批注在朱永嘉向他匯報工作的信件上，朱永嘉根據內容找適合人選作標注。歷史典籍主要由歷史學者和大學歷史系的教師如譚其驤、陳旭麓、陳守實、楊寬、王守稼、姜義華等標注；詩賦一類的，由復旦中文系的教師注釋；諸子百家由復旦哲學系的教師負責。知道是為毛主席工作，所有參加標注的人都覺得光榮，不分晝夜廢寢忘食，有了病也不肯休息。完成後，都在上海澳門路中華印刷廠排印，正文用四號老宋字體、注文用小四號老宋，全部繁體。版本長30厘米，寬20厘米，用60克米色道林紙，線裝。後來，每種還

專為毛澤東加印兩冊宣紙本。一方面保持古書的模樣和質感，另一方面宣紙比現代紙張輕得多，讓年邁的毛澤東拿着看時可輕鬆些。

其實，毛澤東自己古文閱讀能力很強，根本無需借助注釋。他要姚文元為他刊印有注釋的大字本是為了給其他人看。他曾經指名印《清史稿·張勳傳》給許世友看，要江青看《後漢書·李固傳》和《後漢書·黃瓊傳》，要姚文元看《舊五代史·李襲吉傳》，等等。就像他曾經要林彪看《三國志·郭嘉傳》，要王洪文看《後漢書·劉盆子傳》。這是毛澤東開展文革「批判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話語後面的又一套話語。如果說前者是毛澤東從西方馬列主義而來的階級鬥爭話語，那麼這些古書則是毛澤東內心深處的帝王權術話語，毛澤東以推薦古書的方式旁敲側擊地讓對方領會。

到1975年9月，寫作組共為毛澤東標注了近90篇古文(文革後找到的有86篇)，其中有王夫之的《讀通鑑論·秦始皇》節選，有章太炎的《秦獻記》和《秦政記》，有柳宗元的《封建論》，等等。最後一篇是1975年8月注釋的庾信的《枯樹賦》。毛澤東對上海送去的注釋提出四條意見，後來又提了三條意見。晚年毛澤東對這篇感嘆枯樹的駢賦有着自己的感受，上海將樹枯的原因歸結於移植，毛澤東認為是因為各種自然和人為外界因素的傷害，與上海的解釋不同。江青於是將《枯樹賦》與另幾篇賦的注文，又交北京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梁效」寫作組注釋。知道梁效也在做注釋，而且與江青有關，朱永嘉遂放緩了進度，直至最後中止。朱永嘉後來解釋自己當時這樣做，是為了避免與江青及梁效發生矛盾。還有幾篇人物傳記也拖着，即使已經完成的連篇：《蘇峻傳》與《孫恩傳》，也沒有再送上去。朱永嘉文革後回憶，他當時感覺到那些文章是針對鄧小平的，但那時鄧小平還沒有被公開點名批判，他覺得很難辦；而姚文元也沒有催促。就這樣，《枯樹賦》後，還有八

篇文章都被拖了下來，再沒有完成注釋。⁵¹

文革中通過朱永嘉佈置和組織的古文校注，還有對《二十四史》和《清史》點校工程的參與。前者可以追溯到1953年，毛澤東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要吳晗與范文瀾一起組織校點《資治通鑑》。這個點校在1956年完成並出版。以後，對《二十四史》的點校全面鋪開，且因毛澤東的讚賞支持，成為學術界傾注全力的重點工程，但1966年因文革停頓。70年代初，根據毛澤東要求，周恩來佈置，工程重新開始。上海方面承擔的典籍有：《新唐書》、《舊唐書》、《新五代史》、《舊五代史》以及《宋史》。復旦大學和上海師範大學完成了點校工作。⁵²

市委常委的政治學習輔導員

寫作組還有一項日常工作，是為上海市委常委們作馬列著作學習輔導。毛澤東在1970年8月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的廬山上，與林彪分歧加深。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要全黨「學一點馬列」。

不久，9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中午，徐景賢將王洪文和蕭木叫到自己家吃飯，這是王洪文和蕭木兩人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徐景賢告訴蕭木，他和王洪文已經商量定，每天中午抽出午休時間的兩個小時學馬列，「雷打不動」。但是馬列的書不易讀懂，所以想請蕭木擔任他倆的學習輔導員。徐景賢其實完全看得懂那些馬列著作，他讓蕭木當輔導員，是為了拉住王洪文一起學。徐景賢和王洪文之前一直面和心不合，廬山會議他們的

51 此節關於大字本的資料，基本引自朱永嘉《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朱永嘉口述，朱紹君整理，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

52 1972年，上海師範學院、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半工半讀師範學院、上海教育學院、上海體育學院五所高校合併為上海師範大學，此後直到文革結束，上海綜合性文科大學便只有復旦和上師大兩所。

共同支柱張春橋被攻，徐景賢首先以共同學習馬列著作為由，伸出和解之手。就這樣，王洪文和徐景賢每天中午休息時間，在榮昌路20號的一幢小洋房內學習馬列著作，由蕭木作輔導。第一本先學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一個月後，上海市委的其他常委：馬天水、王少庸、王秀珍等等，還有在市委擔任常委的軍隊幹部，都要求一起參加學習。於是學習又擴大到市委常委，學習場地轉到康辦小禮堂。寫作組的其他成員也擔任輔導員，讀毛澤東推薦的三十本馬列著作。

1972年9月，王洪文奉調北京，將蕭木也借調去，參加籌備中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黨章修改工作。十大閉幕，王洪文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說毛主席交給他的主要任務就是讀馬列，將蕭木留下來當他的學習輔導員，每天兩個小時學習。後來又增加了陳永貴、吳桂賢。而在上海，市委常委們也沒有因王洪文和蕭木的離去而中止學習。除周日和周四外，每天上午10點至12點堅持學習。周四不學習是因為上海市委給自己定下規矩，常委每周四必須下基層了解情況或者處理問題，也是雷打不動。一直堅持到文革結束，全部學完了毛澤東要求幹部讀的30本馬列著作。寫作組的朱永嘉、王知常和王紹璽，先後擔任過市委常委讀馬列輔導員。1974年「評法批儒」及「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因為儒法原著都是文言文，於是寫作組也輔導市委常委學習文言文，講解毛澤東推薦的那些古文。馬天水和王秀珍還曾要求王知常單為他倆「開小灶」，講解有關的古文。

像上海市委這樣，長時期堅持每天抽出兩個小時學習馬列著作的，全國各省市沒有第二個。1975年，市委常委、市委辦公室主任張敬標要輔導學習的王紹璽寫篇報道，將上海局勢的穩定與市委常委堅持學習相聯繫，爭取在《人民日報》發表。王紹璽心裏不願意，又不便推脫，只好向徐景賢請示。徐景賢表示：雖然像上海這樣堅持學習馬列的省市委確實不多，但上海局勢的穩定，不一定和天天讀掛上鉤，而是因為毛澤東的支

持；而且寫這樣的報道，有自我表揚之嫌，不好，春橋同志肯定也不同意，不寫為好。於是沒有寫。⁵³

群眾歌詠大會以及知青函授教育

還有些活動，由寫作組建議或發起，與其他部門共同組辦。主要有群眾歌詠大會，知青函授教育以及資助上海知青插隊落戶的外省公社辦小作坊等。

群眾歌詠大會是1974年初興起的。1973年12月，朱永嘉在一個會上提出組織群眾性的歌詠大會。市工人文化宮向上海市總工會匯報後，葉昌明非常支持。12月22日，市工人文化宮負責人與朱永嘉一起，約見市文化局群眾文藝小組負責人。朱永嘉建議，先組織二三場，以碼頭工人、城市民兵、上山下鄉等為內容。⁵⁴ 文革後，朱永嘉回憶說，那就是唱紅歌：「那時，許多人攻擊文革，所以我想到大唱革命歌曲振奮士氣。以大唱革命歌曲發動和鼓舞群眾是我們黨的傳統，我解放前在上海地下黨時，就是經常以唱《團結就是力量》等紅歌來吸引群眾的」。⁵⁵ 於是，由市文化局群眾文藝小組和市工人文化宮，共同組成上海群眾歌詠大會籌備小組。按朱永嘉的要求，首先組織碼頭工人、上海民兵、上山下鄉三個專場，三個專場同時分頭籌備。1974年1月12日，上海文革中的首場群眾歌詠大會以歌唱碼頭工人專場，在上海雜技場舉行。1月14日歌唱民兵專場，1月17日歌唱上山下鄉專場，也都在上海雜技場舉行。民兵專場

53 王紹璽 2009年10月《與景賢相處的日日夜夜——徐景賢逝世二周年祭》，載於網上福壽園徐景賢紀念文館：<http://mem.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80780&joursid=93416>

54 吳林深 1977年12月10日《關於四人幫餘黨利用群眾歌詠大會大造反革命輿論的情況》，原件由吳林深收藏。

55 這是朱永嘉 2011年1月7日在電話中對筆者說的，他並且說，這和現在的「唱紅歌」是一回事，同一個形式和手段。

演出時，姚文元看了電視轉播，非常高興。⁵⁶ 以後，群眾歌詠大會便作為文革中的一項重要活動持續開展，演唱的大多數歌曲，都是配合形勢新創。詞和曲主要由市文化局派專業人員，輔導市工人文化宮的業餘作者們創作。從1974年1月起，到1976年文革結束，由市總工會出面，市文化宮具體組織，包括和市婦聯、團市委、市紅代會等有關機構，一起舉辦共18場歌詠大會：

1. 1974年1月12日歌唱碼頭工人專場，
2. 1974年1月14日歌唱民兵專場，
3. 1974年1月17日歌唱上山下鄉專場，
4. 1974年3月5日歌唱批林批孔專場，
5. 1974年3月15日歌唱自力更生專場，
6. 1974年3月30日歌唱教育革命專場，
7. 1974年5月3日歌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專場，
8. 1974年7月4日財貿系統「社會主義到處都在勝利地前進」專場，
9. 1974年7月25日歌唱工宣隊專場，
10. 1974年11月19日學習風慶輪革命精神專場，
11. 1975年1月5日革命兒歌專場，
12. 1975年1月14日歌唱國營農場專場，
13. 1975年1月23日熱烈慶祝四屆人大勝利召開歌詠大會，
14. 1975年3月6日歌唱婦女新面貌歌詠大會，
15. 1975年5月21日「學習革命樣板戲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歌詠大會，
16. 1975年7月13日歌唱教育革命專場，

56 這是朱永嘉在1月17日的歌唱上山下鄉專場結束後，在雜技場的休息室，對歌詠大會籌備班子的人員，以及報社、電視台等人員講話中提到的。轉引自文革中的市工人文化宮副主任吳林生1978年3月9日《在群眾歌詠大會中與朱永嘉的接觸》。

17. 1975年12月20日歌頌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新民歌演唱會，
18. 1976年5月23日「歌唱文化大革命，深入批判鄧小平」群眾歌詠大會。

此外，還有兩場是團市委舉辦的：1975年5月4日團市委、市紅代會聯合舉辦的「歌唱革命新一代」歌詠大會；1975年6月28日市婦聯、團市委聯合舉辦的「紅小兵學理論，爭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小尖兵」歌詠大會。⁵⁷

由於上海市委沒有成立宣傳部，這些在外省市屬於市委宣傳部分管的群眾文藝活動，在上海雖然不是寫作組具體組織，卻是由寫作組命題，牽頭組織，是寫作組影響群眾文化生活的一個縮影。這些歌詠大會，都配合某項政治運動或任務。籌備第一場歌唱碼頭工人專場時的1974年1月7日，正值上港五區貼出《當好碼頭的主人，不做噸位的奴隸》大字報，隨即被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刊登，在全國造成很大影響。歌唱碼頭工人專場正是為了配合這張大字報。歌唱城市民兵專場，正值國務院和中央軍委1973年11月19日向全國轉發《上海城市民兵情況調查》，上海市委準備12月24日召開全市大會傳達。歌唱批林批孔專場，則是為在上海推動批林批孔運動，那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在這個專場首次演唱。學習風慶輪革命精神專場背景是風慶輪事件。歌唱國營農場專場的背景是《前進農場宣言》。而歌唱文化大革命專場，組織了全國各地的文化局的人員來觀摩，是國務院文化部部長于會詠要求的，他要把群眾歌詠大會形式推向全國。這個專場被拍成新聞紀錄片，為此又加演了兩場。

群眾歌詠大會這個群眾政治動員的唱紅形式，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從歌唱文革開始，最後的兩場卻是歌唱結束文革：

57 這些歌詠大會的日期和主題，均見於當時的《文匯報》報道。

「熱烈慶祝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從1976年12月26日到12月27日，連演兩天。⁵⁸

類似這樣寫作組參與的事情，還有知青調查和知青函授。由市革會地區組所屬知青辦公室出面組織，去上海知青上山下鄉之地慰問，寫作組參加並負責寫調查報告。知青慰問團了解到的最大問題，就是知青生活很苦，很多青年養不活自己。對於這樣關係總體政策的狀況，上海方面也無法改變。不過朱永嘉提出可以發揮上海的工業優勢，幫一些生產隊辦小作坊或工廠，優先招收上海知青。此事由寫作組吳文虎打報告給市革會後，市革委會批撥專用款，工交組提供設備。但在當時連農民都無法填飽肚子的情況下，這樣的努力無疑杯水車薪。

知青慰問團了解的另一個問題是知青對學習知識的渴望。於是，由朱永嘉建議，從1974年開始，慰問團在安徽、雲南、江西三個上海知青較集中的省的一些縣城，為上海知青進行函授教育，由上海派去的教師定期上課。寫作組吳文虎負責聯繫定點和落實教師。因為要求聽課的人多，於是在縣城設點上大課，各鄉知青派代表去聽課。最開始是四門課：農業機械、醫藥、政治經濟學、寫作。教材由上海交通大學，上海第二醫學院、復旦大學等編輯。聽課的知青，有些後來成為文革中的工農兵大學生。鑑於知青對學習知識的渴望，朱永嘉提出編輯出版《青年自學叢書》；同時，他提出，寫作組的刊物《學習與批判》，也以上海在農村的知青為主要讀者群，讓他們有雜誌可看。

58 本節資料主要引自文革中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宮副主任吳林生1977年12月10日《關於四人幫及其餘黨利用群眾歌詠大會大造反革命輿論的情況》，1978年1月13日《關於群眾歌詠大會的一些補充》，1978年3月9日《在群眾歌詠大會中與朱永嘉的接觸》，筆者2011年對吳林深的訪談記錄，以及當時的《文匯報》報道和評論。

第三十三章

市委寫作組 張、姚的上海輿論總管 (下)

寫作組編輯出版的書籍

市委寫作組各專業組最初都是因編書計劃成立的：文藝組編寫《文學概論》；文藝組下的魯迅小組編寫《魯迅傳》。歷史組編寫《儒法鬥爭史》和《中國共產黨史》，哲學組編寫《哲學小辭典》，經濟組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育組編寫《教育學》。還有電影組，編寫電影劇本《春苗》、《盛大的節日》、《蒼山志》、《歡騰的小涼河》。到文革結束時，除了《文學概論》沒有寫出，其他各組的書都寫出了初稿或修改稿。

最先出版的是《魯迅的故事》。這本書是《魯迅傳》的先期產品。《魯迅傳》小組成員大都是各工廠借調來的青年，過去從未接觸過這方面資料，剛開始時不知從何處入手。朱永嘉建議，先寫一些關於魯迅的故事，既可積累資料，也積累和加深對魯迅的了解。1973年《魯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石一歌」。但《魯迅傳》到文革結束都沒有完成。

《哲學小詞典》1973年2月開始編寫。之前中國沒有自己編輯的哲學詞典。1955年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將蘇聯哲學家羅塔爾與尤金合著的《簡明哲學詞典》譯成中文出版，很有影響。毛澤東也多有評論，還當面對尤金表示過不同意書中對「同一性」的定義。朱永嘉希望編出第一

本中國自己的哲學詞典，作為文科教材的輔助資料。他將原來的「學習毛選第五卷文章小組」，改為哲學組，編寫《哲學小詞典》。1973年9月，《哲學小詞典》徵求意見稿出版，印數2萬冊；3個月後，又印出第二版徵求意見稿，也是2萬冊。1974年為配合「批林批孔」運動，特地趕編出《哲學小辭典：儒法鬥爭史部分》。1975年姚文元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在《紅旗》雜誌當年第三期刊出後，哲學組將「全面專政」、「資產階級法權」等條目增加進《哲學小辭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同年5月出版，印數10萬冊。就這樣，本應純學術的《哲學小詞典》，被放進毛澤東的許多論述和思想，加入大量牽強應時的條目，終於逃不脫文革書籍的模式。

《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是作為上海高校文科教材編寫的。文革前，全國各出版社曾出版過各類中共黨史或革命史著作共十幾本，但文革中劉少奇被批判，加上許多中共元勳被說成是叛徒、特務或走資派，記載他們活動的黨史書籍全部都被否定。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時，毛澤東在會上講中共黨史。雖然毛澤東講中共黨史是為了解釋他發動文革的動機，但這激起全黨全國對中國近代史和中共黨史的興趣。一些單位自己編寫打字油印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被再三傳抄。1970年大學恢復開辦，首批「工農兵學員」進校。文革強調「路線教育」，中共黨史在各校都是主課，但因沒有教材，老師只講課，不發講義。學員們要求發講義。於是暫用北京大學1970年編的中共黨史講義。1971年5月，寫作組為張春橋撰寫《紅旗》雜誌社論《紀念中國共產黨五十周年》，朱永嘉向張春橋反映各校希望出版黨史教材的要求，建議編寫中共黨史。張春橋說：

毛澤東對寫中共黨史沒有興趣，說寫了以後人家還是可以改的，斯大林搞的《聯共(布)黨史》，還不是被赫魯曉夫反

了，另搞了本《蘇共黨史》。而且中央暫時不會編寫黨史，因為原來負責此事的董必武和康生，如今年紀都大了。¹

但張春橋又認為，

有一部黨史比沒有好，即使以後被反掉，畢竟也還是留下文字記載。張春橋說，蘇聯的《聯共(布)黨史》就是地方先搞起來的，以後斯大林過問了，這本書就成為蘇共的黨史了。……

要搞你們自己搞，地方先搞起來，將來中央再搞。中央搞可以有兩個辦法：一是從各地編的黨史中挑選一本最好的；二是從各地黨史班子中選人到中央來編。²

文革前，歷史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選材權和解釋權全在中央。但是1971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卻提出了地方可以先編寫黨史教材的意見。³於是全國各地都組織編寫黨史教材。7月21日，上海也在寫作組的歷史組下，又成立黨史組。朱永嘉自己就是研究歷史出身的，他希望上海能編寫出一本被中央選中的中共黨史。1973年《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上下冊)作為復旦大學教材，內部印行。1975年又出修訂本，擴大到上海全市高等院校試用，兩版合計印行1.5萬冊。此外，還出了縮編本《中國共產黨歷史學習提綱》兩種，作為中學教師的教學用書和中學生的課本，共印行100萬冊。張春橋1973年11月看了第一版中共黨史後，認為沒有擺脫《聯共(布)黨史》的影響，從概念到概念，理論到理論，枯燥乏味。他建議寫黨史要向《史

1 轉引自吳瑞武 1977年3月18日《我在寫作班工作期間的揭發交待》。

2 同上。

3 金光耀、筆者、金大陸 2010年對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原黨史組成員余子道的訪談。

記》學習，寫得生動具體，有情有景，引人入勝。⁴朱永嘉於是決定先按人物事件類型等，編寫通俗小冊子；待積累了資料，小冊子成規模後，再回過頭去寫黨史。就這樣，編寫了《毛主席在井岡山》、《方志敏》、《五次反圍剿》、《蔣經國在贛南》、《延安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陝北「蘑菇」戰》，等等，作為「中國現代史叢書」出版。

在文革批判一切，獨尊毛澤東的語境中，寫作組編寫的這本中共黨史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時代烙印。全書只見毛澤東不見其他人，大批共產黨的創始人和功臣宿將甚至朱德的名字都被抹去；相反原來名不見經傳的張春橋和江青卻作為功臣上了黨史。當時全國這樣的中共黨史有好幾本。上海與外地的不同處在於，上海利用獨特的資源，開闢了過去沒有涉及的汪偽時期歷史。此時上海市監獄還關押着一批汪偽時期當事人。寫作組與監獄聯繫，由監獄組織這些犯人寫回憶錄。回憶錄中的一些歷史細節後來被寫進上海編的中共黨史。寫這段歷史的執筆者黃美真等，日後成為研究汪偽時期歷史的著名學者。

在翻譯出版方面，寫作組的經濟組、哲學組和文學組，全都有自己的翻譯組，翻譯出版了不少書籍。朱永嘉希望上海出版的書籍在幾年內能自成體系。朱永嘉自己是研究歷史的，對歷史方面的書籍特別關注。他提出四個方向：一、人物傳記，主要是近代外國政治人物的傳記、自傳、回憶錄，言論集等。二、國際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主要是美國、蘇聯的關係、第二世界國家政治動向和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民主義鬥爭，以及重要財團、財閥和跨國公司的歷史。三、外國主要政黨史；四、現代世界史和現代軍事史，主要是二次大戰以來的世界通史和有代表的戰爭史、戰役史。蕭木也提出，中美、中日建交後，天下大勢已定，以後翻譯工作還是要多搞些思潮、學術一類的書。於是出版了戴高樂的《論中蘇問題》，歷史文獻《德

4 吳瑞武 1977年3月18日《我在寫作班工作期間的揭發交待》。

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會議記錄摘編》、《開羅文件》、《戰後帝國主義經濟》等等。這些書出版後都送中央，周恩來看了《戰後帝國主義經濟》很稱讚，要求以後這類書只要出版，都送他一套。⁵ 此外，朱永嘉還組織人編寫《戰後世界史長編》。這套書原計劃編到70年代，按年代分四編，每編分若干分冊，十年出齊。到文革結束時，已經出版第一編的第一、二冊，1945年和1946年。文革結束後，這套書的編輯沒有停止。由朱永嘉佈置出版的書還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國人物傳記：1972年的《田中角榮傳》，1973年的《蓬皮杜傳》和《愛德華·希思》，1974年的《基辛格》等等，配合對當時訪華的外國首腦等的了解。

外國文學方面的書籍，有蘇聯小說《多雪的冬天》、《人世間》和美國暢銷小說《愛情的故事》、《海鷗喬納森》等等。以翻譯編輯書籍為理由，許多專業人員和教師包括巴金，得以從幹校回上海，總算又能從事與專業有關的工作。這也是朱永嘉的主張，他覺得專業人士還是應該從事本專業工作，長期耗在幹校不是事情。

寫作組編寫的又一類書籍是《青年自學叢書》。經朱永嘉提出項目後，主要由上海師範大學編輯，其他大學也有負責編輯相關教材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起陸續出版。內容共20多類，出了數學、物理、化學、語法修辭、歷史、地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等，還包括農業技術、醫藥、知識、軍事技術、天文學，魯迅著作等等。當時的《人民日報》介紹出書目的：「為了滿足廣大農村青年特別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自學的要求，給他們提供精神食糧。」⁶ 這套書出版後供不應求，包括周恩來都向上海要書。出版社一再加印，只上海的印數就有726萬冊，還不包括全國各地出版社的印

5 吳瑞武 1977年3月18日《我在寫作班工作期間的揭發交待》。

6 《上海出版一套青年自學叢書》，人民日報 1973年6月26日。

刷數量。⁷ 在寫作組牽頭編寫的眾多書刊中，《青年自學叢書》是與民生貼得最近的，是否定知識年代的一片少有的知識綠洲。這是寫作組文化人對知識的本能反應。許多當時的青年文革後回憶，都說是「文革中出版的最有用的書」。

在國內文學作品方面，經寫作組過問的書籍，主要有長篇小說《虹南作戰史》。在編輯《朝霞》的1973年之前，寫作組原來只作文藝和文學評論，不組織文學創作。毛澤東「利用小說反黨」之說，使徐景賢和朱永嘉心有「預」悸。於是自文革1966年開始後，除了8個樣板戲及其拷貝衍生品，以及頌聖音樂美術文藝作品之外，文化事業一片空白，出版更是如此，連身處文革決策核心的張春橋、姚文元自己都感到有違文革形象。1970年，張春橋和姚文元對出版工作指示，要求迅速改變出版空白現狀。6月，由市革會郊區組、上海縣革委會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組成的寫作組，赴上海縣的號上大隊進行文藝創作。這個寫作組成員，包括一名代表上海縣和七一公社黨委但不參加寫作的公社幹部；三名農民，其中兩名是中學畢業回鄉的青年，當時是公社的「土記者」；還有一名是文藝出版社的編輯周天。這樣的由黨的幹部、業餘記者、專業作者組成的創作方式，稱為「三結合」寫作。

號上大隊在上海縣七一公社，在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有毛澤東為那裏的農業合作化材料寫的按語。該大隊文革中成為「堅持開展農村兩條路線鬥爭」的典型。三結合寫作班子在號上大隊調查一個多月後，最先寫成的是三十萬字的報告文學《號上作戰史》。市委寫作組朱永嘉等審稿後，建議改為長篇小說，加強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內容。1971年7月起，寫作班子又用四個月時間將報告文學改為小說。1972年2月，近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虹南作戰

7 賀越明著《青年自學叢書出版內幕》，載於《炎黃春秋》2014年第6期，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社出版。

史》(第一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署名「上海縣《虹南作戰史》寫作組」。這是全國除台灣香港之外,文革中創作並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這部小說在寫作時,以超越六十年代初出版的柳青的長篇小說《創業史》為目標,因為《創業史》「沒有寫出黨內兩條路線鬥爭」。而實際上,大量直白的議論說教,概念化的人物形象,唯階級鬥爭的故事情節,使這本書毫無可讀性。如果不是為了特定目的,幾乎沒有人能從頭到尾看完一遍。倒是從反面生動地詮釋了文革對文學的審美和要求。而這樣的作品卻被徐景賢列為上海的重點圖書向全國推薦。1972年10月,張春橋、姚文元主持召開上海文藝工作座談會。會上姚文元說:「謝謝你作了件好事,寫了一本小說。」張春橋說:「這部小說要寫下去,寫到第二部、第三部,直寫到文化大革命。不要只限於一個區、一個縣,要寫上面的路線鬥爭。寫到市裏的鬥爭。」「希望你們不要迴避矛盾,大膽點寫寫看。」1976年5月,約50萬字的《虹南作戰史》第二部初稿完成,送市委寫作組審查,但因為「沒有突出同走資派的鬥爭」,被要求重新改寫。不久,文革結束,第二部最後未能修改出版。⁸

《虹南作戰史》的創作方式被姚文元肯定,認為集體創作「是個路子」。創作組人員到處介紹「三結合創作經驗」。於是上海幾乎所有長篇小說的創作,都必須三結合,專業作者一定要搭上幾個業餘作者。上海電機廠的「五一工人大學文科班」,由該廠工人學員、下放該廠的原報社和出版社編輯、文革前的工人作家「三結合」,出版了中篇小說《小將》。參加這個三結合創作的工人作家胡寶華,因此當上全國四屆人大代表。但這本小說同樣也是索然乏味,無法卒讀。

三結合的創作方式違反創作規律,大多數創作組矛盾百

8 以上關於《虹南作戰史》資料包括張春橋、姚文元講話,全部引自《上海縣志》,上海縣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出，寫不出作品。1975年朱永嘉向徐景賢提出，文藝創作還是要允許作者保留自己的風格，不能強求一律；⁹ 加上此時《朝霞》所刊登小說也都是個人創作，三結合寫作才沒有再強行推廣。

寫作組的刊物

從1973年5月始，寫作組相繼辦了八個刊物：文藝組編的《朝霞》叢刊、《朝霞》月刊，以及不定刊《摘譯(外國文藝)》、《摘譯(外國哲學、歷史、經濟)》、《摘譯(外國自然科學)》；自然辯證法組編的《自然辯證法》雜誌；教育組編的《教育實踐》月刊；此外，還有名為復旦大學學報實際上由寫作組編輯的《學習與批判》月刊。所有刊物，都不發稿費。

這些刊物都是寫作組重要的對外窗口。據統計，上海市委寫作組從1971年成立至1976年被停止活動，共發文章八百多篇，其中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的有76篇，在《學習與批判》上發表的有76篇。¹⁰ 寫作組在自己的這些刊物上比較常用的筆名，文革前就有的筆名有羅思鼎、丁學雷——這兩個筆名都是寫重要的大文章才用的，還有「伍丁」，這是批判《海瑞罷官》時期的筆名，意思是五個人，即市委寫作班時期的歷史組朱永嘉等四人加上姚文元，當時幾篇文章都是批判學者李平心的；這些筆名文革中繼續使用。此外，常用的筆名還有：「康立」，康平路上的歷史組之意；「方澤生」，方始為毛澤東的學生之意；「方岩梁」，取之毛澤東的一句詩：「風物長宜放眼量」；「石一歌」，魯迅組十一個成員之意；「任犢」，文藝組青年甘為人民的牛犢之意；「史鋒」，歷史組要作歷史研究的先鋒之意；「翟青」，哲學組青年之意；「卞思祖」，思

9 朱永嘉 1977年11月15日。

10 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考的自然辯證法組之意；「鞏學慶」，工業學大慶之意，等等。還有常見於《學習與批判》的「宮效聞」，是因為經濟組負責人顧澄海是市革會工交組借調來的，「工」、「宮」同音。¹¹ 又因為寫作組最初地點在丁香花園，所以，姓「丁」的筆名特別多：丁加、丁川、丁影、丁菱、丁葵，等等。¹²

《摘譯》與《教育實踐》

寫作組最早的刊物是《摘譯》，最初專門刊登國外當代文學作品；以後，又增加門類。共有三種分冊：《摘譯(外國文藝)》、《摘譯(外國自然科學)》、《摘譯(外國哲學、歷史、經濟)》。三種《摘譯》都是32開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尤其《外國文藝摘譯》，只有軍以上幹部才有資格購買。

還是在《紅旗》組稿小組時期，蕭木從專供縣、團級以上領導參閱的內部新聞報刊《大參考》得到啟發。那上面偶然會刊登一些蘇聯、美國等國家的文藝動態信息，但很短。蕭木建議，寫作組可以編一些這樣的資料，而且還可以編得更具體些。朱永嘉讓陳冀德負責，建立了一個編譯組。編譯組在上海圖書館借了一間屋子，就近查找參考書。文革中，上海圖書館仍然能進口國外新書，是文革中不多的國外書刊信息來源。最初的資料篇幅不長，都是摘錄，用複寫紙謄寫，只有幾份。內容主要是蘇聯和東歐國家文學作品中對非斯大林化的看法，對「修正主義」的批評等等。只送張春橋、姚文元和徐景賢，為他們提供國外特別是蘇聯的文學動向。¹³

11 這些筆名的義，是筆者2013年向原寫作組的朱永嘉、蕭木、王知常、高志成等詢問的。此外，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的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中，也有提及。

12 這些筆名的含義，是朱永嘉、蕭木和王知常對筆者解釋的。

13 筆者與蕭木的談話。

市委寫作組成立後，編譯小組仍由陳冀德負責，算是文藝組下的一個小組，地點始終設在上海圖書館內。1973年5月，《朝霞》叢刊出版。蕭木和陳冀德等覺得，外界對《朝霞》叢刊反應很好，就決定將編譯組的內容也出刊物，名稱定為《摘譯》。編譯組最初只有五人：上海外語學院俄語系的許老師和日語系的朱老師，華東師範大學俄語系的倪老師；還有出版社的王晟明，他是因印尼排華而回國的華僑，精通英語，擔任編譯組長。此外，再加上陳冀德。¹⁴ 最初不敢請專業的翻譯名家。一直到後期，才請了一些著名翻譯家，如巴金、蕭岱、朱雯、包文棣等，但也不署他們的真名，只能用筆名。¹⁵ 翻譯家蕭岱後來曾負責過《摘譯(外國文藝)》。

1973年11月，《摘譯(外國文藝)》第一期出版，重點文章是蘇聯劇本《禮節性訪問》。從1973年11月第一期至1976年底停刊止，《摘譯(外國文藝)》共出版31期，發表文學作品102篇。到1976年10月文革結束，已出28期。每期發行1.5萬冊；此外，還有3期也已編好，經中央工作組同意，對這3期內容作部分修改後，仍出版發行。

1974年9月，《摘譯(外國自然科學)》創刊，共出版9期，另有兩本專輯；每期印數9萬冊。

1975年1月《摘譯(哲學、社會科學)》創刊，共出22期，每期印數10萬冊。¹⁶

張春橋、姚文元都對《摘譯》很感興趣，幾乎對每期都會談些感想或意見。¹⁷ 姚文元看了第一期《外國文藝摘譯》後，要求每期前面要加「導讀」。陳冀德後來回憶她對姚文元這個

14 陳冀德 2008 年《生逢其時》。

15 同上。

16 以上數字均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861 頁。

17 王知常 1977 年 5 月 6 日。

要求的理解：「《外國文藝摘譯》介紹的都是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國家的文藝作品。前面沒有導讀，等於放毒。」她於是將戴厚英調來撰寫導讀。戴厚英原來在文藝概論組，後來文藝概論組取消了，她便沒事閒蕩着。戴厚英對外國文學熟悉，寫導讀這類文章駕輕就熟。從1974年開始，《外國文藝摘譯》每期都配有批判或評論文章，作者多為寫作組的文藝組或哲學組的青年。

《摘譯》的「外國文藝」和「哲學、社會科學」，是文革中唯一專門介紹外國文藝和國外社會科學動態的雜誌。雖然是「內部發行」，但影響很大。許多人，包括許多日後成名的知識分子，回憶《摘譯》，都說它是文革中最具信息量的雜誌，受益匪淺。在那個封鎖一切外來信息的年代，《摘譯》開了一線對外窗口，雖然只是一線很窄的縫。此外，編譯組還先後翻譯了一批外國小說。首先翻譯的是蘇聯小說，如沙米亞金的《多雪的冬天》、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間》、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等。後來也翻譯美國的小說，有阿瑟·希勒的《愛情的故事》、理查德·貝奇的《海鷗喬納森》等。

寫作組辦的最後一個刊物是《教育實踐》月刊。1974年，上海師範學院、上海教育學院、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半工半讀學校、上海體育學院等5所大學，合併為上海師範大學。《學習與批判》以復旦大學學報的名義出版後，上海師範大學也要求出學報。1974年12月《教育實踐》創刊。名義上由師大和上海市教育局組成編委會，但審稿定稿要經過寫作組。到文革結束，共出13期，每期發行數6.3萬冊。

《自然辯證法》

《自然辯證法》雜誌編輯組的前身，最初是復旦大學理科大批判組。到1968年底，文革進入「鬥批改」的「批」階段。從1967年底1968年初開始，各行各業都聯繫自己的實際開展大

批判，「批判十七年修正主義路線」，到1970年，黨組織重建後，各級黨政機構更是設立專門的大批判組。復旦大學挑選了四五十個理工科教授和教師，設立理科大批判組，撰寫《自然科學發展史》。這是朱永嘉的意思，他後來回憶說，設立這樣的大批判組，一是為了緊跟政治形勢，開展大批判；二也是為了讓一些被冷落甚至被關押批判的知識分子解脫出來，多少幹些與他們專長有關的事情，不要荒廢了所學專長。¹⁸ 接着，華東師範大學也辦起了理科大批判組。《自然科學發展史》以毛澤東的哲學理念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為理論依據，資料寫成後，由市委印刷廠以中號的仿宋字印成冊，送中央。朱永嘉後來告訴編輯人員說，是毛澤東要看。¹⁹

1972年秋姚文元到上海時，對朱永嘉和王知常說，五十年代北京曾經有本刊物《自然辯證法通訊》，現在能否再辦起來。²⁰ 姚文元對科普作品非常有興趣，文革前就搜集了許多科學幻想和科學普及書籍。朱永嘉立即行動，10月20日和21日，他在寫作組連續兩天召開「自然辯證法問題」座談會，並將座談會記錄摘要報張春橋、姚文元。10月26日，張春橋批示可以出刊物，姚文元也同意。²¹ 於是，以原來的復旦大學理科大批判組為基礎，辦起了《自然辯證法》雜誌，最初由王知常主要負責，後來由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王紹璽負責，他是市委寫作組負責人之一，之前在市委寫作組文藝組。雜誌的編輯成員有原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紀樹立，華東局政治研究室的鄧偉志等。編輯部地點設在文匯報社大樓內。²²

18 這是文革後朱永嘉多次對筆者說起的。王紹璽也對筆者說過同樣的話。

19 筆者2011年3月2日對原市委寫作組成員王紹璽的訪談。

20 同上。

21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860頁。

22 筆者2011年3月2日對原市委寫作組成員王紹璽的訪談。

1973年6月，《自然辯證法》雜誌創刊。雜誌為32開本，雙月刊。到1976年10月文革結束，共編輯14期，出版13期。每期都是兩種版本：32開版和16開版。16開版是用六號宋體字印刷的大字本。大字本每期送姚文元十到二十多本，由他轉送中央其他領導。姚文元轉送了哪些中央領導他沒告訴編輯人員，但第二期，朱德辦公室曾經打電話來索要，後來就每期都通過市委機要交通站，專送兩本大字本給朱老總。32開和16開兩種開本都公開發行。每期20萬冊。最後一期因文革結束未及付印。此外，編輯部還編輯出版《外國自然科學哲學摘譯》，一年四期；從1974年9月至1976年8月，共出八期。另外還出了兩本外國自然科學哲學摘譯的專輯：《人類科學專輯》、《遺傳工程專輯》。²³

姚文元的初衷是想將《自然辯證法》雜誌辦成科學普及讀物。姚文元在《自然辯證法》創刊前，曾經為這本雜誌定下兩條辦刊原則：「一不為天下先；二離政治遠一點」。但後來這兩條都沒有做到。王知常後來回憶說，「我體會姚文元的意思，他喜歡科普作品，希望留下點東西。但實際後來也沒留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批判鄧小平以後，這個雜誌還是跌到政治裏面去了。」²⁴ 尤其1975年「批鄧」時，連文章題目都十分政治化：《科技領域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提的什麼綱——評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等等，一看就是大批判文章。²⁵

已經編輯出版的《自然辯證法》雜誌，主要涉及宇宙學、生物遺傳學、人類學、環境學，以及中西醫互補關係等學科或理論。此外，編輯組還組織復旦大學的理科教授和教師，翻譯出版了一批西方自然科學名著，例如16世紀波蘭天體學家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16世紀意大利物理學家、天文學家伽利

23 筆者 2011 年 3 月 2 日對原市委寫作組成員王紹靈的訪談。

24 金光耀、筆者、金大陸 2009 年對王知常的訪談。

25 同上。

略的《伽利略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美國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的《愛因斯坦選集》，美國物理學家楊振寧的《基本粒子發展簡史》，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的《宇宙之謎》，奧地利物理學家薛定諤的《生命是什麼》，等等，出版成冊；還有馬克思的數學手稿，也是在《自然辯證法》上首發的。此外，還編了一批資料，如德國數學家大衛·希爾伯特的《23個數學問題》、英國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羅素的《數理邏輯》等。其中，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一書，毛澤東後來曾經建議許世友讀。²⁶

在貶低科學的文革期間，《自然辯證法》雜誌的出版，對普及科學知識尤其是前沿科學起了作用。例如關於現代工業引起環境污染危機的警告，關於人類祖先從非洲走出的推斷，都是首先在《自然辯證法》刊登的。但文革將任何事物都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貼上階級鬥爭標籤，科學普及很難「離政治遠一點」。一些學科和理論，例如黑洞、紅移、宇宙大爆炸、氣候異常、生態危機，等等，本來完全可以客觀介紹，正常討論，卻被以哲學的名義武斷歸納加粗暴評判，以社會制度或政治觀念劃線。例如認為環境污染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困境；例如對愛因斯坦的評價，以外行與無知挑戰科學巨人。使得這份科普雜誌，終於沒有跳出文革大批判的窠臼。

《學習與批判》

《學習與批判》是綜合性社會科學雜誌，是繼《朝霞》叢刊和《自然辯證法》雙月刊後，寫作組創辦的又一個重要刊物。自1973年9月創刊，到1976年9月停刊，《學習與批判》共出38期，最高發行量96萬份。

26 同上。王知常因此估計，這些出版的自然科學理論書籍，毛澤東應該都看到了。

出一本社會科學綜合期刊，始終是朱永嘉的心願。1973年春天，毛澤東指示大學學報要公開，北京大學學報復刊。朱永嘉決定上海出學報，以復旦大學學報的名義出；還是老辦法，幹起來再說，先不向上海市委匯報，造成既成事實。朱永嘉在復旦讀大學，畢業後留任復旦教師。長期的復旦生涯，使他對復旦的學術資源非常熟悉；而且他雖擔任市委寫作組負責人，但兼着復旦大學黨委常委的職務，在借調人員上有着優勢。所以他首先選擇以復旦大學名義出版學報。1973年5月，蕭木調任北京。而此時，寫作組的另一個骨幹王知常也不在寫作組，林彪事件後他被調往王維國專案組。5月，朱永嘉以寫作班缺少人手為由，專案組那裏的事也近尾聲，於是王知常被調回。王知常回來後不久，便着手籌辦學報。1973年9月，《學習與批判》創刊，16開，月刊，負責人王知常。

《學習與批判》這個刊名，是寫作組人員共同討論決定的。第一期創刊詞《致讀者》中點明了刊名的意義：「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思想，學習和總結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豐富經驗，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不過，說是復旦大學的學報，但除主要負責人王知常是復旦大學教師，其他成員大多不是復旦的；而且實際上的編輯部也設在市委寫作組本部，康平路141號2樓，不對外。由於對外宣稱是復旦學報，所以編輯部在復旦校園內設了一間辦公室，專門接待自己找上門來的聯繫者；只有兩個人，除了接待來訪者，還負責接收寄給《學習與批判》的稿件或信件，都是不明真相的作者或讀者自己投去的，因為雜誌末頁上印着的編輯地址是「復旦大學」。真正屬於編輯組(當時叫「臨編組」，臨時編輯小組)的成員，是從寫作組的文藝組、哲學組和經濟組調來的。「臨編組」的人員換過三次，每次都從寫作組下的各組抽調來。有經濟組的馬羽，文藝組的徐輯熙，哲學組的孫樂英、郭紹緒，文

藝組的余秋雨也一度參加過「臨編組」，後來因為突發肝病，離組回鄉療養；還有魏永征。「臨編組」主要負責稿子的文字把關。對每篇稿子內容負責的，是寫作組下面各組的負責人。哪個組寫出稿子，那個組負責人就要對這篇稿子負責。而每期雜誌的主題和重點文章設想，大都是朱永嘉提出。

雜誌的組稿內容基本圍繞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當前形勢。諸如「批林批孔」、「評法反儒」、「批《水滸》」、「批鄧」，等等。這方面的文章非常多。二是毛澤東的最新講話或批示。寫作組有張春橋、姚文元等方面的信息渠道，容易獲得毛澤東對一些事情的評價，例如1974年第10期上的第一篇文章「老子是一部兵書」，就是根據毛澤東當時一個談話寫的，這是已經去了《紅旗》雜誌社工作的原市革會大批判組成員胡錫濤傳來的信息；還有那些關於評論《紅樓夢》人物的稿子，也都是按毛澤東對《紅樓夢》的評價寫的，等等。三是毛澤東所感興趣的古書或文章。朱永嘉等從1972年起就開始為毛澤東標注古書，從而了解毛澤東的興趣和關注點，例如1974年第2期上的《評淮西之捷——讀〈舊唐書李愬傳〉》，以及同年第9期上的《讀〈三國志·郭嘉傳〉》，等等，都是當時毛澤東通過姚文元要上海為他標點注釋的大字本。又如1973年第3期上的《鄒容傳》，是毛澤東多次推薦晚清民主革命家鄒容的《革命軍》文後，朱永嘉組織復旦歷史系教授陳旭麓撰寫，以「陳今」為筆名發表。四是張春橋、姚文元的講話或佈置。這方面的信息優勢寫作組得天獨厚。例如1973年第1期上的《論尊儒反法》，便是姚文元直接佈置的。那是個星期天的下午，朱永嘉正回復旦宿舍家中休息，姚文元從北京打電話到復旦宿舍的門房間，讓叫朱永嘉接電話。姚文元要朱永嘉好好學習毛澤東最近寫的一首古體詩：「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這首詩前幾天他的

秘書剛給朱永嘉看過，不過當時秘書只許朱永嘉看，用腦子記，不許抄錄。姚文元在電話中又說：楊榮國已經寫文章了，你們怎麼沒絲毫動靜呢？朱永嘉第二天便組織歷史組的王守稼撰寫了《論尊儒反法》，修改後先登在9月的《學習與批判》創刊號上，之後姚文元立即將此文轉載在當年10月的第10期《紅旗》雜誌上。²⁷又如1976第3期《由趙七爺的辮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辮子兼論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大辮子》，源於張春橋的一段話：「造反派有小辮子，但走資派更有大辮子，就像魯迅的《阿Q正傳》中阿Q和小D互揪小辮子，他們其實應該共同去揪趙七爺的大辮子。」等等。

雜誌的重要文章基本都是朱永嘉出原則和題目，寫作組下面各組的寫手撰寫稿子，王知常具體修改定稿，最後由朱永嘉統一審定。此外，各組還將本組正在編寫書籍的完稿片段或副產品，發表在《學習與批判》上，例如哲學組的《哲學小詞典》詞目選登，魯迅組的《魯迅傳》選載，經濟組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選載，黨史組的《汪精衛賣國記》，摘譯組的外國小說評論，等等。還有《紅旗》組稿小組給《紅旗》雜誌提供的卻未被採用的稿子。總之，這個雜誌可以說是上海市委寫作組的窗口，或者可以說就是寫作組的同仁刊物。當然，也有外稿，作者主要是上海高校教師、寫作組所辦各類學習班的青年學員、還有工廠和一些基層單位的寫作班子。所有文章，以定向組稿為絕大多數。也有自發的投稿。絕大多數文章都以筆名發表。以真名發表者不多，基本都是大學的教師，尤其是復旦大學的教師，如劉大傑等，因為畢竟這份刊物冠着「復旦大學校刊」名義。用真名的還有余秋雨等很少幾人，一方面因為朱永嘉很賞識余秋雨的文才；²⁸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的文章

27 朱永嘉 2009 年 1 月 20 日《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憶》，載於新浪博客《我母親的博客》。

28 這是朱永嘉文革後對筆者說的，他說他那時是將余秋雨作為培養對象的。

都是自己完成，不用別人參與修改。對工農兵作者，基本都以真名發表文章。

《學習與批判》將讀者群定在上山下鄉的知青，²⁹ 對文章的表述方式有着自己的特殊要求：既要角度新穎，又要明快易讀；既要觀點犀利，但又不能被反對者抓住把柄；既要從史料或經典出發，但最後一定要落實到當前政治；所有刊登文章，都要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學術性不要太強。偏偏許多稿子，因為是大學教師所寫，最初或多或少有着學術論文的特點，引經據典，層層論述。於是被一遍又一遍地修改，這人改了那人改，直改到成為針對時局的政論文。到定稿時已經面目全非，分不出誰是作者了。這也是文章不以真名發表的又一原因。

雜誌的主要欄目有：「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經濟問題研究」、「教育革命經驗總結」、「儒法鬥爭史研究」、「在鬥爭中努力學習」、「外國文學評論」、「人物傳記」、「近代史研究」、「社會調查」，等等；內容除了當前政治，還涉及文史哲經；所登文章在政治的敏感性、題材的廣泛性和內容的可讀性等方面，都在全國同類刊物之上；文風犀利，語言活潑，立意新穎，且從張春橋、姚文元處得風氣之先，經常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搶先發聲，是文革後期影響最大的綜合性社科類雜誌，被稱為「小《紅旗》」。許多文章被各種報紙和刊物轉載。其中由王知常主筆的《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一文，被江青推薦，作為批林批孔運動的參考文件散發全國。³⁰

《學習與批判》的大量文章，都是借古諷今，影射比附。歷史成為打擊對手的政治武器，史學成為黨派的宣傳工具。這是毛澤東五十年代所提倡的「古為今用」的延伸。許多文章寫得霸氣，強詞奪理，是體現寫作組文化霸權主義的最典型標

29 這是朱永嘉文革後多次對筆者說的。

30 司馬東去 1999 年《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

本。但是，鼎盛之下埋伏着危機，連主編負責人王知常都深感前景的莫測。他曾對人說過：我們每出一篇文章，就是為自己添加一塊墓碑。³¹ 文革後，王知常解釋這句話：我當時感覺到保守勢力非常強，如果一旦反過來，我們是不會有好下場的；再加上與工人造反派的內部矛盾重重，且工作量很大，人累得不行，即使不出事，也可能會病倒。³²

《朝霞》及其叢刊

《朝霞》是文藝刊物，分叢刊和月刊。也是寫作組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1973年5月起出版。到文革結束，《朝霞》叢刊共出14輯，每輯發行18萬到40萬冊。³³ 《朝霞》月刊共出34期，每期發行30萬冊左右。³⁴

文革前夕，上海共有刊物58種。³⁵ 1966年文革開始後，上海和全國一樣，所有刊物基本停刊，只剩《故事會》——一本由群眾文藝館編輯的通俗文藝刊物，還在艱難運轉。1971年5月，廣西的《廣西文藝》改名為《革命文藝》復刊，成為文革中全國復刊最早的文學刊物。接着，同年12月，北京的《北京文藝》改名為《北京新文藝》復刊。³⁶ 到1972年6月，全國各省和直轄市共有十幾種文藝刊物或畫報復刊和創刊，而文化大都市上海，卻慢了幾拍。

31 這句話是文革結束後不久，一個曾經在寫作組工作過的青年許國良對筆者回憶的。

32 這是2011年5月5日，筆者在寫這段章節時，向王知常求證這句話，他解釋的。

33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859頁。

34 同上。

35 上海地方志辦公室編《上海通志》第38卷「文化藝術(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36 《革命文藝》1972年又改回《廣西文藝》刊名，《北京新文藝》1973年改回《北京文藝》刊名。

上海文革中創辦文學刊物，始於市委寫作組負責人之一蕭木的不懈努力。還是在1973年1月，始終懷着文學之夢的他召集寫作組的文藝組、哲學組部分青年開會，鼓動大家以文學形式「歌頌火紅的時代」。在這個基礎上成立了一個業餘創作小組，成員有陳冀德等八九人，小組取名「苦鬥」。因為蕭木覺得寫作要下苦功夫，不能為名為利，而且不能佔用工作時間。蕭木和陳冀德建議集體創作，筆名用中國農曆的24個氣節，用完了再從頭開始。蕭木喜歡這些名字，覺得充滿大自然氣息，又富有詩意。不過，這個小組後來真正寫出小說的，只有蕭木和陳冀德，節氣筆名也只用了清明、谷雨、立夏。³⁷

蕭木想辦刊物。一向喜歡擴展業務的朱永嘉，這回卻不是很贊成。說：「做不得的。這不是搶着給人當靶子嗎？寫小說，能有幾個是好下場的？」³⁸ 蕭木又去找徐景賢。蕭木反映文革的小說《初春的早晨》已經完稿，他將小說送徐景賢，說是請徐景賢提意見，其實是想就勢向徐景賢提出辦文學刊物要求。徐景賢花了幾天時間，認認真真地看了，並提出自己的意見；但對辦刊物，他沒作正面回答。蕭木再三逼問，徐景賢只是說：蕭木啊，你政治上總是太天真，有些事是可以做，不可以說的呀！蕭木領會徐景賢的不回答就是回答，意思是你們可以先做起來呀！他回來向朱永嘉匯報。朱永嘉說：這話不是讓我們自己擔肩胛嗎？那就先做起來再說。³⁹

蕭木和陳冀德商量後，決定先不說刊物之事，而是舉辦創作學習班。他們沒敢找原來的那些專業作家，當時他們大都被去了五七幹校；也沒有找文革前的工人作家，這些人大部分回原工作單位了。⁴⁰ 陳冀德想起了《故事會》。《故事會》是

37 這是蕭木告訴筆者的。

38 陳冀德 2008 年《生逢其時》。

39 這是蕭木告訴筆者的。

40 陳冀德 2008 年《生逢其時》。

上海文革期間，唯一沒有被停刊的文藝刊物，由群眾文藝館主辦，發行量很大，讀者層次主要是農村和底層市民。文革中文藝小分隊演出，很多節目往往改編自《故事會》。陳冀德去找群眾文藝館的負責人，果然得到了一份《故事會》作者名單。根據這個名單，加上《文匯報》社和《解放日報》社文藝組推薦，確定了約三十人，作為第一期創作學習班學員，絕大多數是文學青年，也有幾個老作者；在進行了一天的集中學習後，學習班就組織下工廠或農場「深入生活」，三四人一個小組。幾個星期後回來，匯報「下生活」後的創作構思。匯報會開二三天，許多人都拿出小說構想。就這樣，稿源有了。⁴¹

蕭木他們的這些行動本來背着朱永嘉。而就在此時，姚文元讓秘書胡鼎君帶話給朱永嘉：說外地已經辦起文藝刊物，上海為何不動？⁴² 蕭木和陳冀德最初只說組織文藝創作，不提辦刊物之事，就是怕最終報到張春橋、姚文元那裏通不過。現在，有了稿源，姚文元也催促他們辦刊物，於是，寫作組正式籌備辦刊物，由陳冀德起草，署朱永嘉名正式報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他們都圈閱，表示同意。⁴³ 與此同時，蕭木和陳冀德開了一個老作家座談會，參加者有作家茹志娟、菡子，還有原來上海青年文學雜誌《萌芽》的編輯部主編施燕平等。徵求他們意見，也希望從他們那裏得到些支持。但這些被邀請開會的老作家態度都不積極，他們文革中已經為自己過去的作品吃足了苦頭，不想再惹禍上身。⁴⁴

不過施燕平還是被調來，被調來的還有歐陽文彬，她曾經是《萌芽》雜誌的編輯。施燕平後來被北京調去復刊《人民文

41 蕭木《你走了，輕盈宛若白雲》，以及筆者 2010 年 12 月與蕭木的談話。

42 朱永嘉 1977 年 11 月 5 日交待。

43 這個過程引自朱永嘉 1977 年 11 月 5 日交待。

44 施燕平《我的工作簡歷》，載於 2004 年《當代作家評論》第 3 期，遼寧省作家協會《當代作家評論》雜誌社。

學》。以後，又調來姚真當編輯，她原來是市六女中紅衛兵骨幹，曾經是《紅衛戰報》作為中學紅代會(籌)機關刊物時期的編輯，又曾是市委大批判寫作組成員；此時剛從教師培訓班結業，本來就要分配在上海，各方面正符合條件。於是，編輯人員「老、中、青」都有了，符合文革的「領導班子應該由老中青組成」要求。此外，還從工廠、農場等處，輪流「借調」來青年作者，既協助編輯工作，也以這種方式進行作者輪訓。編輯部地點就設在紹興路上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院內。

刊物的名稱最初定為「上海文藝叢刊」，大32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封面是向上的條形動態圖案，這是蕭木特地請名家設計的，共設計了十幾種圖案和刊頭，還專門在出版社辟了一個小房間展出，請大家評議挑選。1973年5月，「上海文藝叢刊」的小說集《朝霞》出版，扉頁上沒有如文革慣例那樣印上大段毛主席語錄；而是影印了毛澤東書寫筆迹：「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這是蕭木和陳冀德的辦刊宗旨。所載作品，除了石一歌的傳記選載《魯迅在廣州》，以及蕭木以「清明」為筆名寫的小說《初春的早晨》，基本都是第一期創作學習班學員寫的。書名「朝霞」，取自其中一篇小說的題目《朝霞》，作者是史漢富，上海胸科醫院的一名青年職工。這本集子印數30萬冊。⁴⁵雜誌送張春橋、姚文元 and 市革會領導，人手一冊，也是試探，看他們有什麼反應，如果批評，就馬上停止再編新刊。姚文元看了第一期，不但沒有批評，而且很高興，特地去寫作組說：「朝霞是一種高捲雲，它能吸收陽光中的紅色，並把它反射出來，所以是紅色的。」⁴⁶第一期叢刊剛出，在北京的蕭木向上海反饋信息：張春橋對《朝霞》每篇必看。⁴⁷3個月後的8月，又出了第二本集子《金鐘長鳴》，其中，署名

45 陳冀德 2008年《生逢其時》。

46 姚文元的話轉引自朱永嘉 1977年11月5日交待。

47 徐景賢 1977年12月25日。

「立夏」的《金鐘長鳴》，作者是蕭木；署名「谷雨」的《第一課》，作者是陳冀德。12月又連出兩本：《鋼鐵洪流》和《珍泉》。這四本集子都以「上海文藝叢刊」為刊名。

經朱永嘉同意，1974年1月20日，《朝霞》月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6開本。創刊號沒有發刊詞，很低調。期刊定名為「朝霞」，因為大家覺得還是這個名字最好。之後的「上海文藝叢刊」，從《珍泉》開始，也全部改名為「朝霞叢刊」，每輯書名不同，選本輯中被認為質量最好的作品作為書名。

從1974年第一期《朝霞》月刊起，朱永嘉要求作品要觸及時事。據陳冀德回憶說，這是「朱永嘉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對《朝霞》月刊提出了帶有方向性的意見。」⁴⁸ 編輯部一致認為朱永嘉的意見非常及時。馬上在月刊和叢刊上，刊登「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生活」征文啟事；同時，編輯部又組織編輯們分批去各處「深入生活」，感受文革脈搏。

在稿子刊用方面，期刊和叢刊各有側重：期刊主要刊用來稿，盡量從眾多投來的稿件中發現新作者；叢刊主要刊登組稿，組稿對象是被認為較成熟的作者。署名一般都用真名，只有寫作組的人員有時用的是筆名。例如蕭木、陳冀德都曾在《朝霞》的雜誌和叢刊上發過小說，但用的都是筆名，就是蕭木曾經建議的那些節氣。

《朝霞》最初由蕭木負責，但叢刊第一期出版之後沒多久，蕭木被調往北京，《朝霞》由陳冀德負責。雖然陳冀德從來沒有被明確指定為負責人，但她的寫作組本部人員身份，以及她犀利果斷的工作作風，使她成為實際上的「第一把手」；還有姚真，後來也參加領導班子工作。朱永嘉文革後回憶說，「因為姚真是我要重點培養的人。」⁴⁹ 編輯部成員先後有駐上海空四軍軍人林正義，上海儀錶局所屬一家無線電廠的職工段

48 陳冀德 2008 年《生逢其時》。

49 朱永嘉 1977 年 11 月 5 日交待。

瑞夏，上海第一百貨商店職工朱敏慎，加上姚真；還有前面提到的文革前的編輯人員施燕平、歐陽文彬，以及後來調去的任大霖。1975年，《人民文學》準備復刊，施燕平被調去北京主持復刊工作。於是，又調來任大霖，他文革前就是著名的兒童文學作者，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少年文藝》雜誌主編。

在所有編委中，老編輯人員因為文革前就在出版部門工作，所以人事關係仍都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資由那裏發。而段瑞夏、林正義、朱敏慎等「工農兵作者」，都是「借調」，職務身份有着雙重性和不確定性，一旦有事，便會被打發回原單位。例如林正義，後來因為空四軍陷入林彪案，只好離開編輯部回軍隊去了。只有姚真，因為調她時，她正值教師培訓班結束待分配，於是人事編制被調入《朝霞》所在的人事部門上海人民出版社，是極少數不是「借調」而是正式調入寫作組的人員。《朝霞》編輯部的人事、黨務和行政工作都歸上海人民出版社管，但編輯業務包括選題、組稿等，都由寫作組管，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本沒有發言權。

《朝霞》是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文藝為政治服務」傳承的延伸與極端。從文學創作本身來說，《朝霞》在文學形式和文學技巧等方面都是大倒退：概念化，公式化，絕大多數作品都只是政治理念的直接圖解說教，味同嚼蠟。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在那文化一片凋零的年代，《朝霞》還是為眾多的文學愛好者提供了文學園地，為單調而沒有色彩的社會生活提供了些許希望。文革後成名的一批作家：賈平凹、路遙、劉心武、余秋雨、錢剛、古華、葉蔚林、陸天明、王小鷹、孫頤、趙麗宏、劉緒源、黃蓓佳，等等，都曾在《朝霞》發表過文章，有的更是起步於《朝霞》。

比起1971年和1972年就創刊或復刊的全國各地其他文藝刊物，《朝霞》創刊不算早，但它一出世，就成為文革主流文學的樣板。這一方面源於上海本身在全國文革中的樣板地位，另

一方面也源於《朝霞》編輯以及作者群的業務能力。兩個主要編輯施燕平和歐陽文彬，文革前分別是全國有影響的上海文學刊物《萌芽》的編輯部主任和編輯，有着豐富的編輯經驗。作者群中，有文革前便發表過作品的作者，如作家菡子、李瑛、任大霖等；工人作家胡萬春、張士敏、仇學寶、樊天勝等。發表的作品雖然是文學創作的大倒退，但比起全國同類文學刊物，總還算相對離文學近一些，更多一些讀者。

小結

文革中的市委寫作組，既起着市委辦公廳的部分作用，諸如文件起草、調查研究、情況收集、政策研究、政策解釋，又代行市委宣傳部的輿論掌管職責，而且還直接抓出版、編刊物，是個多功能的機構。文革後，寫作組被批判，說他們「影射史學」、「陰謀文藝」。但其實，他們所有的作為，都是1949年後中國政治文化的常規，是輿論控制和政治功利主義的必然結果。「影射史學」就是歷史為現實服務的翻版；「陰謀文藝」，就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極端，文革前的那些著名史學、文學大家的作品，與寫作組的作品沒有實質上的差別。只不過文革前這些任務要求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執行，文革中則被集中到寫作組，由少數幾個被信任的寫作組成員壟斷和代行。

從張春橋、姚文元佈置給寫作組的各種課題，可以感覺出毛澤東在文革中的許多思路。雖然，那些課題不一定是毛澤東的直接佈置，但以張春橋與毛澤東的關係，焉知不是張春橋所認為的毛澤東的心思？從這點上說，上海市委寫作組，不但是張春橋的秘書班子，也應該是毛澤東的文人班子，以各種調查、資料匯編，為毛澤東尋找和提供文革的理論和現實依據。

比起文革前的市委寫作班，文革中的市委寫作組又有不同之處：文革前的寫作班是黨的寫作班子，文革中的寫作組則是

黨內一個派別的寫作班子。文革前的寫作班只是秘書班子，只提供政策參考，並不具有話語權。而文革中的寫作組卻有着很大的話語權：中共「九大」以後，外省市都恢復了省市宣傳部，唯獨上海始終沒有恢復市委宣傳部，輿論被寫作組管理和引導。寫作組代行着市委宣傳部門對政策和思想解釋的話語權，為張春橋、姚文元管理左右着上海的思想界，甚至對整個中國的思想界也有很大的影響，成為不是市委宣傳部的市委宣傳部。

寫作組雖不具備市委宣傳部的行政管理職能和網絡，但宣傳功能卻更直接。所有重要文章都由寫作組自己撰寫，通過自己的刊物發表。因為和張春橋、姚文元的緊密關係，寫作組和中央決策層距離比較近。毛澤東對張春橋、姚文元的信任，使他們對張春橋、姚文元幾乎有種崇拜感，也使他們對執行張春橋、姚文元的指示有種崇高感和使命感。⁵⁰ 在知識分子被一片打倒的氛圍中，能夠在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革命運動中「站在最前線」，是他們引以為自豪的，也是他們忘我的動力。他們在文革中顯示了自己的忠誠，被允許重新延續文革前的職責，重新成為權力的秘書；並且又有了新的職責，那就是去管理其他知識分子，剿滅異己思索，統治思想界。

不過，寫作組雖然壟斷着上海的輿論，但在文化教育上沒有發起過事端。上海文化教育領域的事端，許多是市革會教衛組發起的，例如劉麗華事件，例如驪山中學事件，這些事件寫作組都不參與，因為朱永嘉等對此心底並不贊同。這是個很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寫作組代表和詮釋着文革派的思維方式，在政治理念上與文革派是相同的。但另一方面，寫作組成員內心對知識尊重，反對批判教師，反對批鬥專家學者，認為應該讓專家學者發揮專長。這與寫作組成員自己大都受過高等教育有關。

50 這是朱永嘉幾次對筆者提起的。

朱永嘉想借文革在上海做些文化建設，他想留下些東西。他做一些當時別人看來是忌諱的事情，將寫作組的攤子鋪得越來越大。但文革的理念和價值觀是十七年階級鬥爭的延續與極端，本來就只是強權政治的影子，做得越多錯得越多。他苦心經營的那麼多想超越前人的東西，到文革結束後，都成為廢紙。這是文人被御用的悲哀。

第三十四章

批林批孔

身份轉換的焦慮

文革始終遭抵制

196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提出：黨組織要「吐故納新」，「吸收新鮮血液」。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共產黨的組織活動全面恢復，包括發展黨員。但是，許多造反派的入黨遭到抵制。有着舉手表決權的共產黨員們，不願舉手通過造反派的入黨提議。這些黨員文革初期大部分是保守派，他們始終看不慣造反派。他們知道，在黨政高度合一的制度下，卡住造反派的入黨，就是卡住他們擔任各級幹部的途徑。行使對他們的入黨表決權，正是他們阻止造反派們進入權力機構的最後機會。在許多工廠，黨組織生活恢復後，對於發展造反派們入黨，一次又一次討論，黨員們就是不同意。造反派也拿那些不是幹部的普通黨員們無奈。「九大」以後雖然在工人中發展了許多新黨員，但其中許多是1968年後被分配進廠的新工人，也即原來的學生。1970年，工總司總部曾經對所轄10個區、21個局、一個市直屬公司的聯絡站作調查。統計表格顯示，造反派負責人，也即工總司聯絡站的常委和委員共400人，其中78人在中共「九大」前就是黨員。由於中共「九大」召開前，上海只在少數試點單位發展了個別黨員（陳阿大就是「九大」前夕發展的），所以這78個黨員應該基本都是文革前的黨員。表格還顯示，「九大」後至制表的1970年7月，

322個非黨聯絡站負責人中，被發展入黨的只有21人。¹

在幹部提拔方面，造反派進入領導崗位最多的是在他們工作的工廠。據工總司1972年3月統計，

在基層單位領導班子中，據工交系統調查，廠革會中的新幹部一般佔80%左右；黨委(總支、支部)中的新幹部一般佔50%左右。²

工總司輕工業局聯絡站1972年底曾經對所屬10個公司下面的工廠、加上1個直屬廠的造反派作統計。共統計「1966年至1967年4月文化大革命初期湧現出來的人員」，也即「老造反」5657名，其中去市裏工作的8名，到區和局工作的26名，到公司工作的69名，在本廠廠部工作的2036名，去工宣隊54名，被拘留的18名，被判刑的23名。³從這張表格看，輕工業局的「老造反」，到1972年，被提拔至市裏和區、局工作者只佔造反派總人數的0.6%；留在本廠擔任各級負責人的，近40%。而在本書第三十一章所引用的那份工總司1970年的調查表格中，400個造反派聯絡站負責人，擔任區、局革委會主要負責人的16人，擔任區、局革委會常委的63人，擔任委員的70人，進入區、局黨委核心的15人。⁴到1973年：

1 《各區、局、公司聯絡站新幹部情況統計表》，工總司1970年7月。

2 《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加強新幹部隊伍和工代會的建設》(討論稿)，工總司1972年3月。

3 《輕工業局66-67年湧現出來人員的現狀分佈概況》，該表為《人員登記表》的綜合統計表，《人員登記表》為市總工會1972年編制，發至公司工代會。表格上注：「填表範圍是1966年至1967年4月文化大革命初期湧現出來的人員，包括廠一級和相當於廠級基層單位」。一般在1972年9月至12月填寫，由局工代會匯總統計。因此估計這份匯總表應該在1972年年底製成。

4 《各區、局、公司聯絡站新幹部情況統計表》，「工總司」1970年7月。

各級工會組織積極為黨培養和輸送了一大批工人新幹部。截至七三年四月止，全市被選送參加工交財貿系統的各級領導班子的新幹部有四萬七千多人。⁵

但工人造反派對這樣的狀況不滿意，他們認為，在大多數單位，正職往往還是由老幹部擔任，造反派只是副職。1974年，上海市委召開組織工作座談會，市總工會打報告給市委分管群眾組織工作的王秀珍，要求工會也召開組織工作座談會。經同意後，市總工會從6月下旬到7月上旬，按行業連續召集各局工會座談會。座談會上大家反映，雖然文革以來，許多新幹部擔任了各級領導，但阻力還是很大。化工局工會反映說：化工局黨委21名委員中，新幹部14名；局所屬27個工廠，新幹部佔了近一半。儘管如此，新幹部當上「把手」（即負責人—筆者注）的卻不多，當上「第一把手」的一個也沒有；即使是「第二把手」，在局所屬5個公司中，也只有1名。城市建築局工會反映：城建局所屬6個公司共36名公司黨委常委，其中一半是文革前的黨員；而這些公司26個組室的51個組長中，只有7名是新幹部。上海鐵路局工會反映：局49個正副組長中，只有6個是新幹部；局下屬13個單位的工會主任，12個都是40歲以上，6個是文革前的工會主任；而且提拔幹部時，先看原來的幹部級別。冶金局工會反映：他們為了提拔工人新幹部，開了介紹信，去基層廠查閱準備提拔對象的檔案，基層廠黨組織的人看到後說，工會怎麼來考察幹部？不給他們看檔案。⁶

此外，自從1967年秩序逐步恢復以後，造反派因各種原因，被清理整肅者不少。據工總司1972年3月的一份報告顯示：

5 上海市總工會組織組1974年7月5日《關於召開工會組織工作座談會的意見(討論稿)》，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6 上海市總工會1974年6-7月的工會組織工作座談會記錄，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自1967年以來，經過清隊、「打三反運動」和幾次整頓組織，有相當一批新幹部因各種原因被撤職、免職和調整下去。一機、紡織、輕工、化工、儀錶、手工、二機、冶金、電業等九個工業局，被調整下去的有137人，佔新幹部總數的44.5%；財貿各局被調整下去的有49名，佔新幹部總數的36.3%；各區被調整下去的有135名，佔43.5%。加上還有一批人員沒有免職而實際上已經下去的，則比例還要高。在這些人中間，除了極少數是混進革命隊伍的壞人外，大多數都是屬於犯錯誤的新幹部。⁷

從一個工業局範圍看，上海輕工業局所屬10個公司的工總司聯絡站頭頭共121人，到1971年因各種原因被清洗出領導班子的有64人，佔全局造反派頭頭的50%左右。⁸ 1972年，輕工業局所屬鐘錶公司工代會，對下面31家工廠的原造反派委共384人的情況進行調查。其中：「被清除出各廠領導班子」者243人，佔67%。表格將清除原因和人數歸為以下幾類：「清隊」時被清除者9人，「一打三反」時被清除者2人；因落選或群眾意見大等因素被「班子調整」下台者115人；此外，因「個人品質或生活問題」14人；因「本人政歷(即政治歷史—筆者注)或社會關係(即親屬中有『地富反壞右』或『海外關係』等—筆者注)」37人；被判刑者3人；「工作調動或支內」(即「支援內地」)12人；「自己退出」者4人；自殺者1人。⁹

從全市各區、局一級造反派頭頭情況看，1970年，工總司總部曾經對所轄21個局、1個市屬公司、10個區聯絡站負責人中，下台者共484人列表分析。原表格將其分為六類人員，

7 《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加強新幹部隊伍和工代會的建設》(討論稿)，工總司1972年3月。

8 《新幹部分析情況統計表》，「工總司」輕工業局聯絡站1971年2月23日。

9 《上海輕工業局鐘錶公司造反派新幹部情況統計表》，鐘錶公司工代會1972年11月。

並對每類人員界定：一類，係「混進來的壞人」，共15人，佔3.3%；二類，係「社會關係複雜」，共91人，佔18.8%；三類，係「掌權後犯嚴重錯誤被撤職的人」，共139人，佔28.7%；四類，係「調幹、支內」，共20人，佔4.1%；五類，係「基層任職」，共64人，佔13.2%；六類，係「其他原因(歸口、精簡，未上來工作)」，共155人，佔32%。¹⁰

所有這些工總司總部和之後的上海市總工會所作的調查都顯示，那些在1967年一月奪權時，以「群眾代表」身份被「三結合」進各級領導班子的工人造反派，之後遭到一波又一波的清洗，人數不少。

1974年，文革進入第八個年頭。儘管報刊和中央文件中一再宣稱：文革「深入人心」，「取得了偉大勝利」，但實際上，對文革抵制始終存在。上海是工人造反派的發源地和根據地，上海的工業和經濟在全國的地位、王洪文在中央的職務、張春橋在毛澤東心中的地位，工總司的強大，使得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有着全國其他任何地方造反派所沒有的優勢。但即使這樣，上海在使用和提拔造反派新幹部方面還是遭到了強大的阻力。這種阻力，首先來自幹部階層，他們中的大多人在恢復秩序後的「三結合」時期，被陸續「解放」，恢復職務；儘管他們一再被教育要「正確對待」，但被侮辱批鬥的記憶陰影不可能抹去。而那些文革初期被造反派衝擊的普通黨團員和基層幹部——他們中大多數都是當初的「老保」，更是始終和造反派格格不入。文革以發動一批人批判打倒另一批人的革命方式，替代過去老人培養提拔新人的幹部制度，勢必造就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的對立陣營，以及無法愈合的心理鴻溝。加上許多造反派自身的缺點毛病，更使對他們的淘汰和抵制師出有名。造反派從工人身份向幹部身份的轉換，遇到強大阻力。

10 工總司1970年對所屬區、局聯絡站頭頭的《下去人員統計表》，分類說明為原表格備注。

這是對造反派的抵制，更是對文革的抵制。這種無形和有形的抵制，讓文革發動者毛澤東不安，所以毛澤東後來會說：他一生做的兩件大事中的文革，贊成的人不多；而跟着毛造反的造反派們更是擔心，這種反文革勢力的聚集發酵，終將發展成否定文革的強大能量。

市總工會帶頭批判「兩個否定」

終於，反擊反文革勢力的時機來了，那就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1973年7月，毛澤東對王洪文和張春橋的一次談話中，將批判林彪與批判儒家聯在了一起，說林彪與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儒反法的，說中國歷史上法家是向前進的，儒家都是開倒車的。批林批孔運動就此開展。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向全國轉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匯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毛澤東批示同意轉發。中共中央於1月18日將《林彪與孔孟之道》，作為1974年1號文件下發。

幾天後，1月24日，正是中國新年，春節的年初二。下午，王秀珍在家請客，請的都是市總工會工人造反派們：金祖敏、陳阿大、葉昌明、戴立清；此外還有軍代表康寧一和王日初。吃過晚飯，王秀珍提議給在北京的王洪文打電話拜年。電話接通後，大家一個挨一個地向王洪文問好拜年。一圈下來，王洪文又要王秀珍接電話。王洪文告訴王秀珍：北京開兩個萬人大會發動「批林批孔」，一個是今天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召開的萬人大會；另一個是明天1月25日軍隊將召開的萬人大會，明天的大會江青將親自作動員。王洪文還說：「市總工會要抓大事，批林批孔就是大事，市總工會要打頭陣，也可以召開萬人大會，你要去講話」，「批林批孔要聯繫實際，聯繫九、十次路線鬥爭的實際，清查林彪死黨餘孽」。¹¹ 王秀珍問

11 王秀珍 1976年11月25日。但據葉昌明對筆者回憶，他記得在王秀珍家

大會如何開，王洪文說：「要收集資料，聯繫文化大革命，上海有這方面的典型」，「比如講文化大革命的怪話，發牢騷，翻文化大革命的案」。¹² 王洪文還說，如果上海市委沒準備馬上開，也可以由市總工會開；會的規模要大一些，要有聲勢；市委在運動中要發揮工、青、婦的作用。又說，這次運動就是要批判解決翻文革案的問題¹³ 王秀珍放下電話，當即向在座者傳達，要市總工會立即行動；王秀珍並馬上向中共上海市委傳達。

1月26日，張春橋也打電話給馬天水，說北京已經召開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大會的實況錄音有十個多小時，正在整理，整理後將發往全國。張春橋特別關照馬天水，北京的大會批了「走後門」，「市委常委要檢查一下，你們自己有沒有走後門的問題？如果有，要趕快解決，爭取主動，不然運動一來就被動了」。

馬天水立即召開常委會傳達。查下來，市委常委都有「開後門」的問題，而且張春橋也有。在一片上山下鄉的形勢下，他三個中學應屆畢業的女兒，一個都沒有去農村。其中小女兒雖然中學剛畢業時被分配在上海郊縣國營農場，但很快就通過駐上海空四軍的關係，走後門進了空四軍當兵；然後又通過朱永嘉，從空四軍被「推薦」進復旦大學外文系，成為工農兵學員。當時空四軍方面提出，單送張春橋女兒一人上大學太顯眼，再送一人，兩人一起「推薦」。雖然整個過程具體都是張春橋的妻子文靜操作，但張春橋也認為孩子還是要念點書的，沒阻止。批林批孔運動中批「走後門」時，復旦大學便有學生對此貼大字報。張春橋批示：送去農場。小女兒得知後哭了，

吃飯是年初一，而不是年初二。

12 王洪文的話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 677 頁。本章資料來源，除注明出處之外，全部引自《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 30 章。

13 葉昌明交代材料留底 1981 年 1 月 21 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不願去農場，說要退就退回空四軍。¹⁴ 沒過多久，2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說對走後門「需要具體分析，慎重對待」，「放到運動後期處理」，這是毛澤東的意思。張春橋的女兒，還有市委常委會其他人子女的「走後門」問題，就全部不再被提及。

2月2日，市總工會在文化廣場召開「上海工人深入批林批孔大會」。各級工會負責人、各工宣隊負責人共一萬多人參加大會；市革會各組辦，各區、縣、局的常委書記和基層黨組織負責人，都被通知列席大會；市委常委全部出席。上海鐵路局被作為這次大會要批判的「復辟倒退」典型。會上鐵路局的人當場遞條子要求上台發言。這是徐景賢的建議，徐景賢說既然是揭矛盾大會，就不要搞老一套的按部就班發言程序，要有氣氛，可以讓大家都搶話筒發言。¹⁵ 不過市總工會沒有全照徐景賢的建議做，只安排了鐵路局一家上台搶話筒，搶話筒後就宣讀早已準備好的講稿，批判上海鐵路局黨委成員中沒有造反派新幹部。然後馬天水講話，順勢批判上海鐵路局黨委。大會的其他發言，或批判黨委對批林批孔運動領導不力，或揭發有人「復辟倒退」，「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王秀珍也在會上講話，號召各級工會「發揚一月革命」精神，將「批林批孔」作為頭等大事，發揮工人階級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的主力軍作用。還點了普陀區驪山中學和化工局辦公室主任路佩珊的名，說這是「兩個否定」（否定文革、否定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的典型。這兩個被作為典型的事件，前者源於驪山中學兩個教師認為文革中教育質量下降的言論，後者源於路佩珊對文革幹部政策的批評，說文革是普遍換班排斥老幹部。

市總工會動員大會，為工會系統樹立了榜樣，接着區、縣、局工會紛紛召開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市總工會動員大會

14 張春橋小女兒的這件事，文革後朱永嘉和王知常都曾對筆者提及過。

15 葉昌明筆記本 1981 年 1 月 21 日，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的第二天，2月3日，建築工程局召開「建工局工人批林批孔大會」。下一天，2月4日，機電一局工會召開五百人參加的「機電工人批林批孔大會」。接着機電一局工會又連續召開了幾次大會：2月9日在上海船廠召開批判「崇洋復古」現場會，3月4日在江南造船廠再次召開全局系統的「揭矛盾大會」，3月20日又召開有二百多名工會幹部參加的會議，23日再擴大到整個局所屬基層廠工會幹部一千多人。2月7日，楊浦區工會召開「楊浦區工人批林批孔大會」，等等。這些大會都邀請同級黨組織和革委會的負責人列席。其實，說是「邀請」，實際是讓那些幹部來「受教育」的。學習市總工會的動員大會模式，區、縣、局工會的動員大會也安排「自由發言」，爭發言，搶話筒，營造熱烈氣氛。大會內容都是聯繫本系統的「復辟」和「兩個否定」，揭矛盾，大批判。¹⁶

幾天後，王洪文又打電話給王秀珍，說儀錶局所屬上海燈泡廠黨委壓制造反派，階級鬥爭蓋子沒有揭開。¹⁷ 上海燈泡廠的情況刊登於市委組織組編的《組工簡報》第7期上，題目是《上海燈泡廠新幹部入黨阻力很大》。其中提到這個廠的老造反張燦明至今沒能入共產黨，是「傾向性問題，是一股逆流」。王秀珍馬上於2月10日，和馬天水、葉昌明、朱永嘉等一起前往上海燈泡廠發動「揭矛盾」，並當場宣佈由市委組織組、市革會工交組、市總工會，三方派人組成聯合調查組。第二天，由葉昌明帶領的三人小組進駐燈泡廠，宣佈王秀珍對簡報的批示。七天後，2月18日，張燦明被發展入黨；一個月後的3月16日，被提拔為廠黨委列席委員；¹⁸ 一年後的1976年初，又被提拔為儀錶局黨委副書記。

16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689頁。

17 王洪文打電話給王秀珍之事，引自王秀珍 1976年11月25日《我的第二次揭發交代》。

18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684頁。

市總工會動員大會所提出的批判「兩個否定」，尤其使因各種原因下台的造反派們振奮。他們紛紛控訴自己被整肅清理的經歷。2月中旬化工局黨委召開的幹部會上，幾個工會幹部衝上主席台搶話筒，將主持會議的局黨委書記攆於一邊。造反派們本來就對他們在清隊、一打三反、批5.16等運動中受到整肅不滿，對被自己文革初期批判過的幹部重新上台不甘，現在這一切終於有了反擊的政治理由。於是已經擔任領導的造反派們批判黨委領導對批林批孔運動的抵制行為，沒有當上領導的造反派們批判黨委對造反派提拔重用不得力，下了台的造反派們批判當初對他們的清洗整肅。在許多工廠和單位，工會成為批林批孔運動的實際領導者，有的黨委領導幹部被批判或實際「靠邊」。

徐景賢解釋一月革命遭批判

面對越來越亂的局勢，主持上海工作的馬天水有點吃不準，覺得這樣最終會亂了自己；但又擔心以自己老幹部的身份出面勸說，造反派們不會買賬。馬天水和市革會工交組的負責人、老幹部黃濤一起去探望正在生病住院的徐景賢，告訴說市革會準備召開工會系統的幹部會議，希望徐景賢到會講話，以對運動「適當引導」。馬天水認為身為造反派的徐景賢出面講話，工人造反派們應該比較容易接受。

2月23日，市革會在延安西路200號原文藝會堂召開工會幹部會議，市革會各組、辦以及各區、縣、局黨委負責人列席參加。會議組織了七個單位發言，其中也有「老造反」談如何正確對待自己的發言。徐景賢到會並講話。徐景賢提出，「要正確理解一月革命精神」，「揭矛盾的積極分子對自己要一分為二」，「黨委要加強對運動的領導」，「不要隨便宣佈靠邊」，「不要搶材料」，等等。會議的主旨如市革會辦公廳編

的《簡訊》第54期標題和內容所示，《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決心把批林批孔運動進行到底》：「進一步明確了這次運動的內容和要求，新幹部和老幹部、幹部和群眾都是一條戰壕裏的戰友，要團結起來，共同批修，把矛頭對準林、孔，對準復辟倒退思潮」。徐景賢的這篇講話的內容，於第二天2月24日，被《文匯報》以評論員「鮑蔚文」的署名發表。文中將「一月革命風暴精神」歸納為：「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還提出「要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觀。一個革命者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要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如果只注意革別人的命，而不注意革自己的命，那麼在革命運動中就會成為『曇花一現』的人物，甚至會成為革命的阻力」。¹⁹

市總工會的工人造反派看到這篇文章後，立即察覺這是對着他們的。第二天，黃金海對王日初提出：「徐景賢講話有問題，下面群眾有反映，好像在『收』嘛，這個講話與我們市總工會前幾天召開的批林批孔大會不一樣。」王秀珍聽了王日初轉達的黃金海意見後，馬上將文章找來看，說：「是有問題，對一月革命的評價不對！一月革命最根本的經驗是奪權，文章卻沒有講。」王秀珍找葉昌明，要他整理出一份材料，然後以「群眾來信」名義報張春橋。幾天後，王秀珍將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等人召集到東湖賓館，告訴他們，她給王洪文打電話，王洪文很惱火，說以後市總工會開會不要徐景賢去講話，還說：「誰叫你們發表文匯報文章的？你們知道在全國造成了什麼嚴重後果？有的省批林批孔運動的火剛剛點起來，現在就等着《文匯報》文章去把群眾運動壓下去」。²⁰

19 《文匯報》1974年2月24日《發揚革命精神，爭當革命闖將》。

20 王日初1977年3月21日，以及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我的第二次揭發交代》，上海市、區、縣、局黨員負責幹部會議秘書組1976年1月24日印發。

2月27日，馬天水接到張春橋來信：

《文匯報》的思想評論，我覺得寫得很不好……

特別是對一月革命風暴的精神，解釋得不對，抽掉了向走資派奪權的基本內容，還有什麼一月革命風暴呢？……

老實說，從嚴格意義上講，一些方面一些單位的權，並沒有也不可能在一月風暴中奪過來，有的奪過來又失掉了。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也就在這裏。……

不然，還批林批孔批覆關、倒退幹什麼呢？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要搞多次？……

我的這些意見，也不要印發，更不要弄到報上去了。²¹

同一天，張春橋還在一份簡報上批示，提出要「注意在批林批孔中湧現出來的新人物、新的積極分子」。²² 馬天水接到張春橋的信後，立即召開市委常委會議傳達。徐景賢作檢討，說自己的講話「歪曲了一月革命精神」。徐景賢並給張春橋寫了一封檢查認錯的信。3月6日，王秀珍在東湖賓館，向市總工會葉昌明等傳達張春橋的信。兩天後的3月8日，正逢國際勞動婦女節，下午在市革會禮堂舉行紀念「三八」婦女節大會，動員批林批孔。馬天水到會講話，在講話中傳達了張春橋信的內容。

馬天水和徐景賢本來打算給越來越熱的運動降點溫，卻被工人造反派向張春橋告狀。張春橋的來信，反又推動上海批林批孔運動回暖升溫。有張春橋來信，馬天水、徐景賢不但不敢再質疑市總工會；而且馬上以實際行動轉向，和市總工會一起去基層發動運動。

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接連佈置召開各種會議，動員大家投入運動，在運動中「重新站隊」，號召「老造反要立

21 張春橋的來信轉引自王秀珍 1976 年 11 月 25 日《我的第二次揭發交代》。

22 王秀珍 1976 年 11 月 25 日《我的第二次揭發交代》。

新功勞」。除了前面提到過的上海燈泡廠；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等，還分頭去各工廠「放火」，例如化工局所屬上海第九制藥廠、紡織局所屬上海第五棉紡織廠、冶金局所屬上海冶金機修總廠等工廠。他們將這些工廠的黨委、革委會，作為對文革「反攻倒算」或「復辟」的典型。第九制藥廠是因為黨員孫永健曾對《文匯報》1973年《破格提拔，大膽使用新幹部》一文提出過不同意見；第五棉紡織廠是因為造反派在1970年曾經被整肅；冶金機修總廠是因為「清隊」時期，造反派曾經衝擊軍代表辦公室，事後軍代表發現一份檔案找不到，於是查問了衝擊者。這次運動一來，這些舊事又重新被提起，第九制藥廠的孫永健被多次批鬥，停止黨組織生活，並被「辦學習班」三個月；第五棉紡織廠已經調離的當年的黨委書記，被揪回批鬥，還被撤銷一切職務，下車間勞動；冶金機修總廠的那個軍代表也被批判，該廠的這個事件還被作為「用假材料鎮壓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典型事例，在4月6日全市批林批孔萬人大會上介紹。²³

此外，市革會的內部刊物《簡報》、《情況反映》，以及市總工會的內部刊物《情況交流》，大量刊登「復辟」、「倒退」、「打擊造反派」、「否定文革」的情況，以及造反派的反擊批判行動。尤其衝在運動前面的市總工會，葉昌明還嫌市總工會原有的《情況交流》信息容量太小，讓將版面擴大至八開，增加欄目，擴大發行至基層工會，並和外地工會進行交換。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則在各種內刊文章上作批示，支持各單位造反派的行動，特別是市總工會反映的情況。葉昌明說：市總工會告狀最靈，一告總是告準的，所以大家都怕工會。²⁴ 就這樣，由工會系統打頭陣，層層揭矛盾，造反派們又振奮起來，沉寂了多年的大字報欄又重新熱鬧。

23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 684、685 頁。

24 汪湘君 1977 年 8 月 29 日。

但是，如果仔細分析這些大字報，可以發現一個現象：大字報的作者幾乎都是文革初期的老造反，或者少數幾個被鼓勵起來的青年職工。大多數職工完全沒有了文革初期的參與熱情，只作看客。就連那些文革中被分配進廠的中學生，他們中有許多都是當年的紅衛兵，寫大字報是好手，但在這場運動中，大多置身度外作壁上觀。²⁵ 對接連不斷的運動的厭倦情緒，對不斷發難的造反派的反感心理，正在蔓延。

造反派「重振軍威」

為了進一步了解中央決策層對批林批孔運動的意向，王秀珍與馬天水商量，經張春橋、王洪文同意，由王秀珍單獨去北京，直接向張春橋和王洪文匯報和領旨。這個行動十分秘密，除了馬天水，其他市委常委們都不知道。王秀珍3月20日到北京，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將她接到釣魚台王洪文住處。3月21日至23日，王秀珍在北京待了三天，除了兩次短暫的外出，以及一次跟着王洪文出去打獵，基本就是在釣魚台等候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的接見。三天中，王洪文斷斷續續和王秀珍遭過一些話：

主要二方面。一方面，軍隊九、十次路線鬥爭一些問題沒解決，幾個總部多次運動蓋子沒揭開，人換了，路線沒換。王洪文批了鐵道兵一封信等。第二方面的內容是要上海抓緊幹部工作，配置親信。我去北京，帶了王洪文要上海籌辦的黨代會、人代會名單，還有準備參加各組辦領導工作的人員名單，共三份名單。王洪文沒仔細看，說，等張春橋、姚文元接見再說。主要上海準備二十幾個人，選

25 筆者當時工作的上海電機廠，就是這樣的狀況。積極貼大字報的，都只是當年的造反派。

點人，抽上來，到各組辦工作，作為準備，將來中央要調人。還說「上海的工作無非抓兩條，一條是抓階級鬥爭，一條是培養幹部。林彪一伙都能培養周宇馳、于新野，我們為什麼不能培養一些青年幹部呢？」「國家機關各部的工作很重要，這些部門解決了，對全國有影響」。²⁶

3月24日下午，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三人一起找王秀珍談話。王秀珍匯報上海批林批孔運動情況以及市委的下一步打算，他們三人邊聽邊談，發表了很多看法。對於批林批孔運動，張春橋的話主要有以下幾點：

要抓一批好的單位，批一批矛盾尖銳、資本主義復辟的單位開刀，否則對中間的震動不大。……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從群眾中還會湧出新生事物，要支持，要發揚。總結了經驗，你們心中有底了，別的地方武鬥，我們也不受干擾。……

上海工作，你們放手去做，出點岔子也不要緊……

上海你們要放手工作，工、青、婦放手讓他們去做，你把上海工人隊伍抓好就行了。……

這次運動是發現、鍛煉幹部的好機會，各組、辦，工、青、婦，都可以抽人上來鍛煉，如果中央要，就可以輸送。²⁷

張春橋要上海在郊縣搞一個郊縣試點，說「如果亂了也才一個縣」。²⁸ 王洪文說：「上海工人階級這支隊伍穩住就

26 王洪文這些話轉引自王秀珍 1976 年 11 月 25 日《我的第二次揭發交代》。

27 張春橋的這些話轉轉引自王秀珍 1976 年 11 月 25 日《我的第二次揭發交代》。

28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 688 頁。

好」。²⁹ 姚文元說：「先進廠如上棉十七廠³⁰也要揭矛盾」。談到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姚文元說：「不是經過一、兩次路線鬥爭就能解決的」。³¹

3月25日，王秀珍趕回上海，立即先向馬天水匯報，再向市委常委傳達。馬天水雖仍有疑惑，但也不再要求謹慎行事。4月6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廣場召開批林批孔經驗交流大會。七個單位在會上介紹了這一階段深入開展批林批孔鬥爭的情況和經驗。其中有按照姚文元的意思組織的上棉十七廠的發言。大會號召「發揚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積極投入批林批孔運動，在事關路線，事關大是大非問題面前，充分發揮骨幹作用和模範作用」；並要求各級領導「都要認真注意在鬥爭中發現和培養大批敢於反潮流、富有革命朝氣，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覺悟比較高的新生力量，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個大會，既是「批林批孔」運動的進一步動員，又為投入運動的積極分子提供了被培養重用的希望和前景，動員能量非常大，運動轟地一下全面鋪開。許多工廠的大字報欄第二天便被貼滿。

林彪事件剛發生時，中共中央曾經向全國傳達過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信中有「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之句。從1966年文革開始，到1974年，屈指數來正是八年。造反派們說：「像這樣搞才有勁，又有點一月革命風暴的味道了」，³²「現在造反派又像文革初期那樣，可來勁啦」。³³ 馬天水、徐景賢等更是號召第二次奪權。徐景賢說：「現在還是有相當大的多數單位的領導權

29 王秀珍 1976年11月25日《我的第二次揭發交代》。

30 即原來的國棉十七廠，文革中改為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

31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688頁。

32 黃金海 1977年3月5日引葉昌明的話。

33 黃金海 1977年7月19日引王秀珍的話。

不在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手裏」；馬天水說「要敢於引導群眾揭矛盾，要揭開矛盾，可以點名」。³⁴ 市總工會葉昌明則在工會系統以及區、縣、局會議上一再強調：

「批林批孔」運動的實質就是復辟和反復辟，有的權不在我們手裏，有的奪來後又失掉了，有的一直沒有奪來。要發揚一月革命的精神，再奪權。³⁵

一些造反派說得更明確：

這次批林批孔要解決文化大革命所沒有解決的問題，解決領導權得而復失的問題，解決新幹部、老造反入黨的問題，「鬥爭的焦點是圍繞着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肯定還是否定的問題」。³⁶

上海市總工會成為整個上海批林批孔運動的中心，王秀珍不斷從王洪文那裏得到中央決策層新動向，通過工會系統層層向下傳達；各、區、縣局工會連續召開各種批判會、揭矛盾會、交流會。王秀珍和葉昌明在各種會上號召「老造反要立新功勞」，號召工會要沖在運動第一線，運動開展得十分熱鬧。葉昌明後來回憶：

我鼓吹要在這次運動中重振工會「軍威」，說工總司的威信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殺」出來的，這幾年工會的工作太平淡，沒有起色，威信降低了，要趁這次運動的機會，把工會發動起來，在鬥爭中提高工會的威信。工會就是要

34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 30 章。

35 葉昌明 1977 年 6 月 14 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36 轉引自《上海輕工業志》，上海社會科學院 1996 年出版。

在這樣的鬥爭中發揮積極的戰鬥作用，黨委才會重視工會了。我在工會會議上講，現在市委很重視發揮工會在運動中的戰鬥作用，就看我們自己能否發揮主觀能動性了。³⁷

市總工會提出，上海燈泡廠，靜安區清潔管理站、上海第四百貨商店等單位，是復辟倒退的典型。不但這些單位，這些單位所在的區：靜安區和普陀區，都存在翻案風，要大膽揭矛盾。長寧區廖、馬、唐事件、寶山縣黃子金事件等，也被重新提起，說這是典型的對造反派反攻倒算。³⁸ 王秀珍要求市總工會去基層「點火」，葉昌明號召：揭矛盾要敢於揭「爆炸性問題」。在工會幹部會議上，葉昌明提出：「現在市委很重視發揮工會在運動中的戰鬥作用，就看我們自己能否發揮主觀能動性了」，「工會不要坐等黨委的佈置，應當主動向黨委請戰；即使黨委不佈置，工會也可以按市委的精神馬上行動起來；工會對於黨委在運動中的不正確意見要敢於抵制」。³⁹ 市總工會以上海燈泡廠為典型，組織市總工會所轄的上海工人政治學校學員去參觀，並要政校將學員組織成調查組，去其他工廠了解情況。市總工會還佈置各區、局工會組織人員去運動開展得好的單位參觀、學習、取經，並特別佈置：各級工會要在運動中發揮老頭頭、老造反的作用。「老造反」、「老頭頭」，即「一月革命」前造反者，尤其曾經擔任過造反派組織的負責人者。市總工會要求召開這些人的座談會，將他們組織起來投入運動。葉昌明多次親自召開部分區、局的老頭頭座談會。市總工會機關也根據王秀珍的要求，將機關工作人員都派去基層點火。在市總工會的發動和佈置下，各級工會層層召開「老造

37 葉昌明 1977 年 6 月 14 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38 這幾個案子大都是 1967 年間，由區武裝部批准的對造反派處理不當或過嚴案例。

39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 30 章。

反座談會」；整個工會系統派出大量有老造反參加的聯絡員隊伍，到區、縣、局和重要單位去尋找復辟倒退典型，要黨委召開揭矛盾大會，還要黨委在大會上明確表態。⁴⁰

造反派們提出，「批林批孔聯繫實際」，就是聯繫對一月革命的評價和態度，聯繫對造反派的培養、提拔和使用。有人提出：大聯合時，造反派失去百分之五十權力；成立革委會三結合必需有老幹部，又使造反派失去三分之二權力；到黨委會成立，造反派的權力百分之一百地失去了。造反派們尤其對黨員的發展狀況提出質疑，認為許多工廠重點發展1968年以後進廠的青年工人，是「以青代新」，即以發展新進廠的青年工人代替造反派新幹部，是反文革勢力對文革的變相抵制；提出：「造反派就是要入黨，造反派就是要當官！」「造反派就是要掌權！」工人造反派對身份轉換的焦慮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了，現在他們終於直截了當地說出了心中的願望。

座談會參加者，有許多是老造反中沒有被重用者，或一度掌權，但以後又被罷官靠邊一擱到底回去當工人者。他們之中不少人因各種原因被下台，有些人甚至被關押過。他們的挨整原因，有自身因素，也有對立派群眾和重新掌權的幹部們對他們的報復；還有造反派自己對隊伍的多次清理。這些人中包括長期被冷落的「兵團」等當初與工總司對立組織的負責人。這些被邊緣化的老造反們提出，他們是被右傾翻案勢力打擊迫害整下去的，右傾翻案勢力正是那些文革初期被批判、後來又重新掌權的幹部們。他們要求平反，質疑「為什麼老幹部犯了『走資派』這樣的大錯誤還給落實政策重新當幹部，而新幹部犯些錯誤就不落實政策了？」他們為雙方身份轉換的不對等而感到不公。

從1974年3月開始，尤其王秀珍去北京與張春橋、王洪文面談之後，到5月，上海的批林批孔運動達到高潮。全市層層召開

40 葉昌明 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各種大會：揭矛盾大會、黨委擴大會、工會幹部擴大會、批林批孔經驗交流會。例如機電一局，從2月4日至3月13日，連續召開了五次大會；還在工會幹部擴大會議上當場宣佈：撤銷長江電器廠黨總支書記兼工會主任的職務，因為此人「對批林批孔有抵觸情緒」。整個機電一局在二三個月內，揭出有「兩個否定」問題的單位185個，佔全局所屬工廠單位數的45%；被點名者上千人，其中廠級幹部103人；還限令局幹部人事部門在三天內啟用一批下台的「老造反」，把他們安排到局或工廠的領導或科層職務上。於是一些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受到批判的造反派重新被安排位子。⁴¹

在冶金局，3月18日、23日連續在上海第二鋼鐵廠的禮堂召開大會。老造反們爭相上台發言，揭發局黨委「利用一打三反運動迫害新幹部」，「執行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10名局級和廠級幹部被點名。在紡織局，工會發動層層揪「右傾復辟代表人物」。幾個月內，全局被宣佈停職靠邊的幹部共510人，其中廠級以上的黨政幹部99人，中層幹部216人，涉及全局157個部門和單位。⁴²

在黃浦區，區工會連續在五星劇場、延安劇場、大光明電影院等處，召開「批林批孔揭矛盾大會」、「徹底揭開黃浦區階級鬥爭蓋子大會」，全區各方老造反聚集一堂，許多人自請自來。台上台下、會場內外，串聯呼應。在五星劇場召開的揭矛盾會上，由於參加會議的老造反分屬過去的幾個對立派別，會上發生衝突，幾乎引起毆鬥。在大光明電影院的那次會上，一個正在受審查的老造反跳上台搶話筒，掌握了整個會場；14個基層黨組織負責人，被當場揪到會場接受批判；一些在文革恢復秩序後曾經被審查批判過的老造反，要求重新定性自己的案子；還有人對自己不被發展入黨提出意見。在長寧區、普陀

41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 696 頁。

42 同上。

區，這樣的批判大會，同樣也十分熱鬧。⁴³

市總工會在這場運動中打頭陣。整個3月、4月和5月，王秀珍經常在東湖路招待所召開會議，召集葉昌明、黃金海、戴立清、馬振龍、陳阿大等交流運動情況，對區、縣、局和重要基層單位的領導班子情況分析排隊：批判誰，打倒誰，工會如何行動。王秀珍要他們「親自抓住一兩個典型開刀」。已經擔任了黨的領導人或組辦負責人的戴立清、黃金海，積極在自己系統推動運動。在皖南黃山地區上海後方基地，3月28日在聯合機械廠召開「再批克己復禮現場大會」，同時在旌德、績溪、貴池、岩寺等地設分場。戴立清、葉昌明主持會議，近萬人收聽拉線廣播。大會宣佈：聯合機械廠造反派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受壓，因此停止廠黨委、廠革委會工作，由另行成立的廠「革命領導小組」接管；停止兩個原廠級領導的黨內外一切職務，隔離審查，並當場由武裝民兵反扭胳膊押出會場，關進隔離室。⁴⁴在黃金海擔任負責人的財貿系統，3月4日，在雜技場召開財貿系統批林批孔經驗交流大會，黃金海到會並講話。他列舉本系統的三十多個「復辟倒退事件」，例如供銷公司第二批發部，有一月革命造反的老造反四十多名，卻一個都沒有入黨。黃金海指出「這是對新生事物、對文革的態度問題」。又如上海釀造五廠的團支部書記年齡偏大，黃金海質問為什麼上級主管局和公司，不挑選年輕人做青年工作，是否看不起「兒童團」。⁴⁵黃金海還提出，漁業公司黨委成員大部都是文革前的臨時黨委的人，一月革命奪得的權，現在又都重新喪失，這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的反奪權，要發動群眾「將公司蓋子徹底揭開」。黃金海後來承認，其實，漁業公司黨委成員的領導班子「完全是我們直接審批的，反過來打成復辟勢力。這個公司

43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 696 頁。

44 同上 692 頁。

45 同上 694 頁。

原來各方面的工作還是好的，一下子又打得分裂了，批林批孔完全扭到糾纏歷史老賬上去了」，「導致漁業公司生產急劇下降」。⁴⁶ 在上海鐵路分局，2月2日市裏的批林批孔大會，謝鵬飛沒有參加，他當時在廠勞動。事後他認為那個大會上鐵路局代表的發言是表面文章，沒有揭到要害。他於是帶人到分局和路局刷大標語，要揭開鐵路局「復辟倒退」的蓋子。

工會在信息掌握和傳遞上佔着優勢。王秀珍幾乎天天與在中央的王洪文通電話；而正是在批林批孔之前的相當一個時期，張春橋與徐景賢的聯繫卻越來越少。於是許多的中央精神或決定，其他幾個市委常委還不知道，王秀珍卻早就知道了，並在一些場合率先表態，令徐景賢難堪。而且整個工會系統，有着完整的組織網絡：從市總工會，到各區、縣、局，到基層單位，直到車間，都有工會建制，最下面還有工會小組。王洪文不時從中央傳來的信息被上海工會系統層層傳達動員，上通下達，一呼百應。市總工會成為上海批林批孔運動的實際指揮部。

對比工會系統，在黨的系統，雖然各黨委或支部有宣傳委員，但由於中共上海市委不設宣傳部，所以各黨委也不設宣傳部。於是政治運動一來沒法層層傳達，無法形成自上而下的統一佈置；基層黨委更是信息不靈通，許多工廠的黨委只能去工會打聽運動動向。就是在市裏，馬天水和徐景賢也不得不承認工會的權威，要求各級黨委召開揭矛盾會議時，需對工會所提意見明確表態。市總工會對自己在上海「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帶頭作用頗為自得，葉昌明說：

工會在運動中有了威信。過去不重視工會的黨委，運動一來就重視了。有的黨委書記過去從來不到工會辦公室去，現在也經常跑工會打聽消息。現在只要市總工會一開工會幹部會議，那些黨委書記就緊張了，總要設法來打聽開會

46 黃金海 1977年7月19日。

的消息。而我卻還在有些會上公開規定，工會幹部回去不能向黨委傳達匯報會議的情況。⁴⁷

上海「批林批孔」運動急剎車

批林批孔之火在上海越燒越旺。在許多基層工廠，一些造反派又到處串聯，打探運動消息，撰寫大字報，或者要求為自己平反。有些造反派又重新拉起隊伍，組織起「戰鬥隊」，摩拳擦掌，準備開展第二次文革。許多人不滿足於只在廠裏貼大字報，又像文革初期那樣，將大字報貼到主管公司或局，甚至市委機關、市革會各組、辦。造反派的思路也仍然沿襲着文革初期，凡是幹部，只要不是文革中的「新幹部」，都在火燒之列。雖然葉昌明曾經在各種會上提出：「現在和文革初期不同，不要提『踢開黨委鬧革命』」，但許多造反派還是將矛頭對準了黨委。許多人尤其對清隊和一打三反時期的支左部隊有意見，因為許多過頭的處理和不實的案子都是軍人辦的。造反派要求將那些已經回部隊的支左人員叫回來接受批判。還有人要求查閱自己一打三反時被整肅的檔案。

就這樣，「批林批孔」之火，已經不只是燒向那些「否定文革」的幹部們，而且燒向文革後建立起的新秩序。自從大聯合和清隊以後，「造反有理」的口號越來越不再被提起；批林批孔運動批判復辟倒退，使造反派感覺到這個口號回歸了。市總工會後來在一份工作總結中承認，有些造反派：

在運動中還用八年前的「造反派」、「保守派」來分人分線，個別單位就出現了重拉山頭的苗子，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直到現在，這種錯誤觀點在一部分工會幹部中還有市

47 葉昌明 1977年6月14日《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

場。這實際是一種值得警惕和防止的宗派主義情緒。⁴⁸

4月中旬和下旬，楊浦區委召開擴大會議揭矛盾，六天會議，八百多人參加。市革會辦公室主任張敬標被叫去參加，因為他當時兼任楊浦區革委會主任。在會上，與會者逼着張敬標回答問題，高呼「張敬標必須老實交代」，文革初期批鬥幹部的場面幾乎重現。在奉賢縣，文革初期的口號再現：「炮轟中共奉賢縣委員會」。而沉寂了多年的兩派矛盾也重新浮起：松江縣文革初期曾經對立的兩派重新開戰，在縣委和縣革委會上互相責難，大字報直貼到市革會的郊區組，兩方都要求郊區組支持自己這派。而在復旦大學，更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大都對着兼任校黨委常委的市委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

市委和市革會越來越無法控制下面的局面。馬天水覺得這樣下去不行，但他又不敢勸說和制止工人造反派，他對幹部一向比較嚴格，但對工人造反派卻比較遷就，似乎這樣就是支持文革。他只好打電話給張春橋，將上海的情況如實匯報。張春橋回話說：「誰叫你們把自己搞亂的？」馬天水有點不服氣，說：「我有責任！但這和你二月底給我寫的那封信有很大關係」，「是根據你二月來信的精神搞的」，「市總工會在這裏邊起了不少作用」。聽馬天水這一辯解，張春橋沒有再說什麼。張春橋接到馬天水電話後，與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緊急商量，由王洪文通知王秀珍，讓她去做市總工會的工作。⁴⁹

而就在差不多的時間，全國有些省市如江西、浙江、湖北，一些文革初期的造反派萬里浪、翁森鶴等，對大聯合時期對自己這派的處理不滿意，又開始串聯、上訪，1966年底的局面重現。為平定局勢，4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1974年的12號文

48 上海市總工會《1974年工作情況和1975年工作意見的報告》(二稿)，有下劃線的句子，在正式稿中被刪去。

49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701頁。

件：《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幾個問題的通知》，要求「批林批孔運動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不要成立戰鬥隊一類群眾組織，也不要搞跨行業、跨地區一類的串聯」；已成立的聯絡站，上訪團、匯報團一類組織要解散；已經回部隊的三支兩軍人員，不要再回支左單位參加批林批孔，等等。這是對批林批孔運動的剎車。

上海的批林批孔運動之火，是張春橋、王洪文要市總工會點燃發動的，現在張春橋又要市總工會再去說服平息，實在有些前後不一。中央的這個文件，為上海提供了轉彎的台階。王秀珍立即召開市總工會常委會，將葉昌明、黃金海、陳阿大、馬振龍等人找去錦江飯店，傳達張春橋指示；佈置學習12號文件。王秀珍說，「領導同志指示很及時，如果現在再不剎車真要把我們自己給搞亂了。楊浦區已經出現把張敬標搞去批判了。春橋說『這樣搞下去今天可以揪張敬標，明天就可以揪你王秀珍、徐景賢，後天就可能揪你馬天水，這樣搞下去，不是要把我們自己搞亂了嗎？』我們頭腦發熱，光知道到處去點火，再按這樣搞下去就有點危險了。」王秀珍又說：「上海好辦，開兩個會促轉化，一轉就轉過來了，外地可沒那麼容易，可熱鬧啦，像徐州等許多地方，都成立了批林批孔領導小組，實際上把省、市委的權都奪了。」⁵⁰ 王秀珍要大家轉彎急剎車，說：「馬老非常愛護我們工會，一定要我們工會先開會把這個精神傳下去，做工作，這樣比較有利，不會挫傷工會的積極性。」⁵¹

張春橋要上海剎車，他意思是讓遼寧先出頭。他曾經對人說過：遼寧有毛遠新，遼寧帶頭，我們上海跟着學。⁵² 文革進入第八個年頭，支持文革者越來越少。尤其林彪事件之後，中央的

50 黃金海 1977 年 7 月 19 日。

51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 30 章。

52 這是蕭木告訴筆者的。他說張春橋有幾次和他談話時，都流露出這樣的意思。

文革派越來越孤立。儘管他們仍不時生出一些風波，發起一個又一個運動，但文革初期那種一呼百應的局面不再，民眾對接連不斷的運動已經厭倦。江青和張春橋始終是眾矢之的，所有反對文革的勢力，矛頭都是對着他倆。張春橋的不得不謹慎為上。

上海的「批林批孔運動就這樣緊急剎車，偃旗息鼓。黃金海對此很有意見，覺得許多幹部對文革抵制，一些造反派受壓受整一直得不到解決。如今好不容易有了機會，火點起來了；但問題剛提出，還沒有解決，卻突然來了個急煞車，他想不通。王秀珍說服黃金海：

王洪文講了，上海「否定文化大革命」「壓制新幹部」不能這麼提。上海要是都這樣了，全國還有什麼文化大革命？中央各部和外地這個問題才嚴重呢，我們在上海是幸福的，沒體會，北京幾個領導，他們在中央工作，還是主席信得過的吶，有人還要攻呢，說他們是乘電梯上去的，有的說是坐直升飛機上去的，還有的說是坐火箭上去的，又沒打過什麼仗，又不是什麼三八式、三九式的幹部，可不服氣吶。我們不要去為他們添包裹，使他們被動。⁵³

但是黃金海還是忍不住。1975年12月，正是批判鄧小平的時期，在市委召開的縣、團級幹部會議的小組批鄧討論會上，黃金海聯繫上海實際，重提上海的批林批孔運動，發牢騷說：「批林批孔來個急剎車，搞成個夾生飯」；又說市委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左右搖擺，一會兒到處點火，發動聯繫實際揭矛盾，一會兒又要轉了，弄得基層意見很大。黃金海在發言中，還對當時徐景賢的一個講話，以及上海的其他一些情況發牢騷。黃金海的小組發言被匯報到張春橋處，張春橋寫了很長一段批示：批示中說：

53 黃金海 1977 年 7 月 19 日。

批林批孔來個急剎車，搞成個夾生飯，我負責。這方面的教訓還少嗎？……

批林批孔的問題已經解決了，黃金海為什麼還要在批鄧時重新提出來，不要被個人主義這個鬼纏住了。這方面的教訓還少嗎？⁵⁴

王洪文在張春橋的這份批示上批：「要在小範圍裏批評幫助黃金海」，「摸黃金海的老虎屁股」；姚文元批示「照春橋批示辦」。1976年1月8日，王秀珍根據王洪文的要求，將部分市總工會常委召到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王洪文工作過的保衛科，傳達王、張、姚指示。黃金海不服氣。會議直開到深更半夜，因為周恩來逝世消息傳來才終止。

市總工會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衝鋒陷陣，威風一時，但一個「急剎車」，連牢騷都不許發。對此，總工會很有想法：

總工會「放火」衝在前頭，被當槍炮使用，顯得威風一時。這真是政治上的幼稚可笑。一到「急剎車」、「急轉彎」，就自找苦吃了。

所以不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時，我們是很有想法的，並不想再衝在前頭，下面工會也缺少積極性，但還是再被當槍使了一回。這是由於我們畢竟是和文革捆綁在一起的，已經身不由己了。⁵⁵

小結

比起徐景賢，工人造反派對一月革命的理解更直接：就是「奪權」。所以一月革命沒有奪到的權，在以後的運動中還

54 張春橋的批示引自王秀珍 1977 年 4 月 4 日，以及施尚英 1977 年 7 月 15 日。

55 這是葉昌明在看了筆者這一章的草稿時，寫在草稿邊上的批注。2014 年。

需要不斷地再奪。這是工人造反派對文革的理解：也是他們對「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理解，要求名至實歸。

上海的批林批孔運動，映射出造反派對身份轉換的焦灼。文革進行已經八年，儘管「培養和提拔文革中湧現出來的新幹部」一再被宣揚，但是對文革的抵制始終存在，尤其抵製造反派進入各級領導層。在上海，雖然當上幹部的造反派比外地多得多，但仍有許多造反派因為自身的缺陷或幹部們的抵制，沒有上去或是上去了又被刷下來。這些造反派只是具有了「文革新生力量」的革命名份，但卻沒有轉換成幹部身份。而在他們看來，沒有當上幹部，就是沒有奪到權，所以必需第二次奪權。他們將此乾脆簡化為「造反派就是要當官」。上海的批林批孔運動在上海，就是造反派要求以他們在文革中掙得的革命名份，換取體制身份的運動。

整個批林批孔運動，看似非常熱鬧，但參與者只是那麼幾個造反派。而且運動的形式，也重新回歸自上而下：王洪文在北京佈置，市總工會和市革會發動，下面層層呼應。張春橋說聲不要搞亂自己，運動馬上剎車。民眾在文革初期顯現的底層的能量和張力，到此時已經完全不再，顯示出文革群眾運動的真諦。

第三十五章

新幹部 轉換了身份的造反派們 (上)

新幹部進入各級領導機構

1967至1968年間，各級幹部大批被打倒，形成權力空缺；奪權號召更使造反派們認為進入各級權力機構義不容辭。從1967年一月奪權後，通過三結合，大批造反派以群眾代表的身份被結合進各級革委會。許多過去的普通幹部或工人擔任了領導職務，他們被稱為「新幹部」。據統計：到1973年4月，上海全市「被推選參加工交財貿系統的各級領導班子的新幹部有四萬七千餘人」。¹ 比起外省市造反派普遍受壓和被邊緣化的狀況，上海的這個數字相當高。批林批孔運動被「急剎車」後，上海的工作重點轉入「考察和培養新幹部」。1974年6月25日，中共上海市委召開組織工作會議；7月23日至24日，市總工會也召開組織工作座談會。兩個組工會議的中心，都是要求「在組織上鞏固和發展『批林批孔』運動的成果」，「最重要的是要集中解決一批優秀的造反派入黨。否則，充實各級領導班子也是空話。當然，不能再提造反派，可提九、十次路線鬥爭中的積極分子、『批林批孔』積極分子。」²

上海前一階段批林批孔的中心，就是揭發各級黨委阻止造

1 上海市總工會1974年7月5日《關於召開工會組織工作座談會的意見(討論稿)》，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2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話》(未刊稿)第706頁。

反派的入黨和提拔，只是造反派們鬧得太過頭被張春橋叫停。而這兩個組織工作會議，實際上就是繼續實現造反派們前一階段提出的願望。王秀珍在市總工會的組工座談會結束後講話，她的講話，給造反派們很大鼓舞：

培養幹部工作，上海形勢好的，但對黨中央要求培養大批幹部還有差距，為黨挑重擔、幹革命，我們工作做得很少。前幾天中央各部都向我們上海要人，十幾個部，國務院、文化部，也要上海派人，大量任務，把上海優秀工人送出去。現在我們卻拿不出。所以工青婦要物色苗子進行考察，把這項工作抓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³

王秀珍所說中央各部向上海要工人幹部，確有其事。中共中央及國務院多次要上海輸送「優秀工人幹部」，毛澤東和周恩來對此都曾有過指示，周恩來向王洪文交辦過此事，還曾批評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輸送幹部不多。⁴

1974年以後，發展造反派入共產黨速度加快，對造反派提拔使用人數也增加。可以說，上海對造反派的大批發展入黨和提拔使用，正是在1974年以後。僅以發展入黨為例：上海從1968年底開始試點發展黨員，到1973年底，五年中，全市共發展黨員13.6萬名；而1974年一年就發展黨員3.8萬餘人，其中第四季度發展了1.7萬餘名。⁵

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常委和委員名單中，可以看到不少文革初期出名的造反派。他們大部分是工人，也有幹部和學生。這些人中，許多都擔任了各級領導職務：陳阿大

3 王秀珍在1974年6-7月市總工會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4 上海市公檢法《關於培養「工人大使」、「組閣」是否列入起訴書的幾種意見》。

5 這些數字引自金祖敏1974年12月6日在全市「納新工作交流會」上的講話，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是市革會工交組負責人之一；葉昌明是市總工會副主席；張寶林曾經是文攻武衛指揮部負責人之一(1973年以後回原單位)；黃金海是市革會財貿組負責人；耿金章是市輕工業局基建組副組長；王成龍先是《工人造反報》負責人，《造反報》撤銷後任《文匯報》第二負責人；繆南生是上鋼三廠革委會副主任；馬振龍是輕工業局黨委副書記；汪湘君是市婦聯負責人；傅世而是上海鐵路局革委會副主任；梁飛是上海港務局革委會副主任；唐文蘭是上海紡織工業局黨委副書記；潘國平是上海市總工會常委；宋有福是南市區竹木器公司革委會副主任；胡永年是上海市體委負責人；陳廣煊是上海衛生局革委會副主任；楊小兵是共青團上海市委副書記。劉浩德是上海在安徽的黃山茶林場黨委書記；葉定海在文革後期擔任了上海市農墾局的黨委書記。倒是市委寫作組，除了朱永嘉是常委外，其他人都沒有進市革會。也有擔任市革會職務卻沒有實職的，例如嚴步東是市革會常委，工作單位在江南造船廠，但卻只是一個普通技術員，連車間負責人都不是。

謝鵬飛、潘國平等，1973年之前在市裏和局裏也沒有實職，他們都在廠裏「勞動」；他們的市革會委員身份，只是有了參加市革會全委會議，聽取有關報告或文件傳達的資格。換句話說，他們的身份沒有真正轉換。他們所具有的，只是比普通老百姓早一两天得知部分中央決策信息的權力。

工人造反派領袖王洪文

所有擔任領導職務的造反派中，王洪文是被提拔最快職務最高的。

前面章節已提及，1967年一月奪權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王洪文成為市革會的七名主要負責人之一。而從當時市革會傳閱文件的順序看，王洪文排在最後第七名：張春橋、

姚文元、馬天水、王少庸、徐景賢、王承龍、王洪文。王洪文因此被戲稱為「王小七」。不過，王洪文卻從來不稱徐景賢為徐老三，背後也不這樣稱呼；王洪文也從來不說自己是「小七子」，工總司總部的工人造反派有時對他這樣開玩笑，他總是制止。葉昌明曾經在一次工代會組長會議上說：

王洪文進步很快除學習認真外，很重要的他從不計較個人地位。文化大革命初期，市革會領導成員把王洪文排在第七位，在徐景賢、王承龍後面，我們都不服，說怎麼把王洪文排成了小七子？王洪文總是批評我們，說是為革命不計地位，去比小七子、小八子幹什麼？把工作做好就行了。⁶

徐景賢文革前曾經在張春橋屬下工作過，和張春橋的關係遠比王洪文近得多。王洪文只是工廠裏的一個幹事，徐景賢文革前就是市委的科級幹部，處理事情比王洪文能幹老練得多，在機關的人脈也比王洪文深廣得多。王洪文剛進入權力機構時，應該不會對徐景賢排在自己前面不服氣。王洪文最有意見的，是一批原機關科層人員，他們掌握了市革會各部門的權力，而工人造反派所佔位置則不是很多。王洪文認為這是徐景賢有意排斥工人的結果。直到1968年底工宣隊的派出，格局才有所變化。隨着毛澤東提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工人階級的地位又一次被拔高。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身為貧農家庭出身、黨員、復員軍人、國有大型企業工人、上海最大工人造反組織負責人的王洪文，比起其他造反派，政治條件無疑是最好的。

王洪文當了市革會領導後，一直比較謹慎，對中央各項恢復秩序的措施積極相應，也要求自己手下的工人造反派們緊跟中央部署。他對工人造反派有着很大影響，對他們容易逾越規

6 轉引自原總工會幹部唐行南 1977 年 9 月 2 日。

範的草根行動有着很大約束力。上海除了1968年6、7、8月聯司和支聯站時期比較亂，其他時期一般都比外地平穩。尤其1967年初，王洪文堅決主張吸收保守派入造反隊，還有1967年下半年，王洪文堅決要求工總司下面的各聯絡站實行大聯合，哪怕「和稀泥」也要實行聯合。這些都是上海局勢穩定的重要原因，王洪文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王洪文在工總司中有威信。他處事比一般造反派謹慎，行事正派，為人隨和。工總司總部的一些老造反，相互之間會有所不服氣，但對王洪文，除了早期的少數幾個人，大家基本都是服貼的。尤其1967年12月的四次工代會以後，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領袖地位奠定。葉昌明文革中評價王洪文說，文革初期，許多造反派最初的造反：

往往是被走資派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受到壓制，為自己的問題起來造反的，這些人往往自己有一些問題，所以造反掌權後很快就垮掉了；王洪文起來造反就不是這種情況。他是黨員幹部，是先起來批判工作隊的資反路線，後再受到打擊壓制的，所以基礎比較好，在廠裏一開始造反就有上千隊伍拉得出，這是其他廠辦不到的。⁷

戴立清對王洪文的評價：

他這個人還是比較傳統的。他那一系列身份：黨員、復員軍人、保衛科幹部，給人以信任感，我過去對他印象一直比較好，覺得他穩重，人品正派。他處理事情不是冒冒失失的，拿不准時不輕易表態，不像我們那樣心急，所以差錯出得少。但他耳朵根比較軟，容易被人說服。⁸

7 葉昌明 1977年6月14日《交待我的反革命罪行》。

8 筆者 2007年9月9日對戴立清的訪談。

直到文革結束後，說起王洪文，參加過工總司籌備會議的老造反張伯生這樣評價王洪文：

我對王洪文印象不錯，他比潘國平穩重。他的出身等各方面條件，在當時都是比較突出的。王洪文平時不太講話，不過，講起話來，比王秀珍有水平多了。⁹

王洪文的黨員身份，既對王洪文自身是一種規範和約束，也比其他造反派容易被保守派和老幹部認可和接受。因為這意味着，王洪文文革前的表現是符合共產黨的要求的。徐景賢對他的評價是：

王洪文給我的總的感覺是：他受着黨的長期教育和培養，身上總有一點共產黨員的黨性，有翻身感，有一定的組織、紀律觀念，因而他對造反同伙中的黨員特別信任。至於受他重用的王秀珍、金祖敏、唐文蘭等人，也都往往自認為是共產黨員，內心深處對工總司的那一批非黨老造反是看不起的。¹⁰

在文革進程的各個重要時刻，王洪文都較好地順應了文革發展的需要：例如安亭事件中聽從張春橋勸告及時回滬，例如康平路事件後發展保守派入造反隊，例如最早反對經濟主義，例如大聯合時期整頓「馬蜂窩」，例如不參與兩次炮打，例如始終認同市革會的權威並保持一致，等等。這使得工總司沒有出大的不合毛澤東文革要求的差錯，也使得工總司的骨幹人物對王洪文的領袖地位非常認同，都說文革中的上海工人沒有像外地工人那樣大分裂，離不開王洪文。葉昌明說：

王洪文很善於團結人，堅決按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

9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 年 9 月 11 日對張伯生的訪談。

10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部矛盾的指示去做。當時處理赤衛隊、二兵團的問題，工總司多數人主張搞，不要他們參加工總司，只有王洪文堅持搞團結，才得到妥善處理，否則上海工人階級要大分裂，上海的形勢不會這麼好。有些單位老大難，歸根到底是未按王洪文意見正確處理赤衛隊的問題。¹¹

陳阿大說：

我曾經說，工總司建立以來，沒有分裂沒有搞成幾派，內部還是一致的，除了張春橋關心支持外，主要是我們的頭頭(王洪文)好，我們選對了，跟對了，如果不是他的話，工總司內部不知搞成什麼樣子了。叫潘國平當頭是不行的，叫我當頭是幹不了，沒有水平的，我們支持王洪文，跟王洪文跟對了……王洪文是工人階級的領袖，是工總司的光榮，是我們小兄弟的光榮。¹²

甚至直到文革後，葉昌明、黃金海、戴立清等回憶王洪文時，都說自己當時對王洪文很佩服，甚至崇拜。王洪文當了市革會領導後，也沒有架子，仍是平等對待當初一起造反出來的「小兄弟」，比較為別人着想，也好說話。王腓利妻子臨產，半夜步行了一站多路乘夜班公交車去醫院。王洪文知道後，責怪當丈夫的：「出了事怎麼辦？你應該向我借車子」。讓王腓利很感動。一次在機關事務管理局所屬飯店吃飯，工作人員在一旁站着，王洪文要大家都坐下，工作人員說不行，這是規矩，王洪文說，大家都是父母生的，不要有那麼多規矩。王洪文個性不是很強，甚至骨子裏不是很自信，他肯聽從別人意

11 這是葉昌明在文革中說過的話，轉引原總工會幹部自唐行南 1977 年 9 月 2 日。

12 陳阿大 1977 年 9 月 5 日。

見，不過這點也被工總司的一些老造反說成是「耳朵軟」，容易被別人說服說動。對一起造反出來的「弟兄」們，只要沒有太大的問題，王洪文總是不忘提攜。王腓利回憶說，王洪文曾經想安排范佐棟回工總司當委員，可見王洪文不是氣量狹小的人，後來因為懷疑范佐棟參加新工總司，才作罷。張寶林評價王洪文，認為論能力在工人造反派中不算是最強的，黃金海、葉昌明、戴立清，能力也都很強，但王洪文關心人，也善於用人，知道誰適合做什麼工作。所以大家願意跟着他。

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對王洪文領袖地位的由衷認同。工總司總部的頭頭們，儘管有很強的派性，儘管對寫作組造反派不服氣，時不時會鬧出點風波；但他們對王洪文卻都是認可擁戴的。雖然他們自己的工作能力不比王洪文差，但他們都由衷地服貼王洪文，認為王洪文政治上比自己強，為人正直。在工總司總部，除了早期的潘國平、耿金章等，再沒有發生過挑戰王洪文權威的事件。王洪文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榜樣，也是他們的驕傲。

文革前擔任工廠基層幹部時間不長的王洪文，比起許多經驗豐富的老幹部，甚至比起徐景賢，在政治資源、人際資源、尤其是工作能力等方面都非常欠缺。市革會最初對他的安排還是比較實際的：主要負責群眾組織方面的工作，促進群眾組織的大聯合；還有工宣隊和文攻武衛方面的工作，也由王洪文分管。作為全國最大城市上海的領導人之一，王洪文顯然需要更多的工作實踐磨練。馬天水、黃濤等老幹部將王洪文看作毛澤東支持的文革新生力量，真心實意地處處輔佐王洪文。尤其有着豐富的上層工作經驗、對上海各方面的工作包括各方人員十分熟悉的馬天水，在這方面的付出更多。張春橋對王洪文也十分關心，不斷敲打。張春橋在上海一言九鼎的地位，尤其使王洪文免去許多其他新人一般都會遇到的因權威不足而遭到的抵制。

王洪文需要更多時間的磨練，積累經驗和各種資源包括人

脈資源。但毛澤東對王洪文的關注，使王洪文身份轉換時間一下縮短許多。

毛澤東關注王洪文

毛澤東對王洪文的了解最初得之張春橋。張春橋、姚文元1967年初回上海工作時，每隔幾天就要向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寫書面報告，匯報上海情況。據徐景賢回憶，毛澤東當時「給了張春橋一個任務，要他物色新的上海市委領導的人選」。這樣，從張春橋一系列書面匯報中，毛澤東陸續了解了工總司及王洪文的情況。

1967年7月21日至國情前夕，毛澤東一直住在上海。砸聯司那天晚上還和張春橋乘着防彈轎車去外灘。看到工人造反派戴着藤編安全帽，手持長矛，守衛在市革會門前，毛澤東很高興，說上海工人造反派能夠掌控局勢。後來，毛澤東在一場批鬥會的電視實況轉播中，看到了王洪文的形象。當時王洪文正在批鬥會上作總結發言，毛澤東仔細聽着王洪文的講話，張春橋在一邊向他介紹王洪文的情況。據徐景賢後來的回憶，王洪文在電視中的形象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

毛澤東與王洪文第一次見面，是在1968年的10月1日國慶節。王洪文是上海赴北京參加國慶觀禮代表團的領隊，和上海的許多代表們一起住進了中南海。10月1日那天，檢閱遊行隊伍之後，馬天水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毛澤東時，說王洪文希望見主席，毛澤東同意了。¹³ 張春橋將王洪文帶到屏風隔着的貴賓會見廳，隨即離開，單獨留下王洪文。林彪也在場。這次個別談話，王洪文給毛澤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徐景賢後來認為，毛澤東中央會議上當眾推薦王洪文，表揚上海工人，肯定上海

13 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局勢，顯示了毛澤東想從工人中提拔新生力量的念頭，從1968年那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王洪文時便已開始。

王洪文「種過地、當過兵、做過工」是張春橋當初向毛澤東介紹王洪文時總結的，這樣的條件很合毛澤東的心意。毛澤東後來一再對人說王洪文「種過田、當過兵、做過工，工、農、兵都齊了，後來又當過幹部，經歷比較全面」。毛澤東還十分關心王洪文的文化程度，再三向張春橋打聽王洪文會不會寫文章。不過張春橋此時似乎沒有體會出毛澤東的更深意圖，只是將此看作是毛澤東對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關注：

主席去年問過我一次，王洪文同志會不會寫文章，今年又問過一次。為什麼老是問，一方面是主席對王洪文同志很關心，更重要的是關心你們成長的問題。¹⁴

國慶觀禮後，上海觀禮團的其他代表都於10月12日集體離開北京，王洪文卻沒一起回滬，他被留下列席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這個會從10月13日開到10月30日，會上將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還批判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這是王洪文第一次參加黨內高級會議。在10月13日的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讚揚了上海，說：「我覺得上海比北京強，120萬工人掌握了形勢」。10月31日的閉幕會議上，毛澤東對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說：「介紹一個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來看一看」。

因為毛澤東對王洪文的關注，張春橋回上海後，將王洪文在市革會中的位置調整，排到徐景賢之前，緊挨在馬天水、王少庸之後。徐景賢後來在回憶中說：「本來上海的紅衛兵給我起的外號叫『徐老三』，現在王洪文才成了真正意義上的

14 《張春橋 1970 年 5 月 1 日下午在康平路小禮堂接見工總司委員時的談話》，工總司 1967 年 5 月 2 日。原件藏上海市總工會。

『王老三』」。在市革會，王洪文原來主要負責群眾組織，以及工宣隊、文攻武衛，這以後開始協助馬天水負責上海的全面工作，還負責「清隊」的專案。1968年下半年，被停止了近三年的中共黨組織活動重又開始，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也在籌備中。王洪文擔任上海「九大」籌備小組負責人之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在張春橋和姚文元起草、林彪宣讀的政治報告中，特地提到上海工人對文革的作用：「具有革命傳統的上海工人階級，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廣大革命群眾、革命幹部聯合起來，於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奪了舊市委、舊市人委中走資派的權力。」王洪文被作為上海工人階級的代表，擔任上海參加「九大」代表團的負責人；還被指定為華東大組的組長之一，多次參加了毛澤東親自主持的小型會議。中央還決定由王洪文代表全國工人階級在第二天的大會上作發言。這是一種象徵：過去，這樣一類全國性的大會往往安排勞動模範、先進人物作為工人階級發言，作為全國工人的表率。而這次，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派卻選擇了工人中的造反派作為全國工人的代表和表率。

安排王洪文發言，直到4月13日才由毛澤東最後拍板決定。王洪文特地向同去參加「九大」的徐景賢借了十五元錢，去大會小賣部買了一條黑色的確良長褲，上身穿着文革中流行的軍裝，新的。既顯示工人階級的形象，也符合王洪文轉業軍人身份。4月14日，在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發言後，毛澤東親自宣佈「王洪文同志講話」。王洪文的這篇由徐景賢起草，張春橋、姚文元審閱修改的發言稿，內容不長，完全是表態性的對九大各項決議的擁護以及貫徹的決心；發言的意義在於這是被精心安排的政治亮相。王洪文的名字通過這次發言，被媒體報道傳播，全國乃至全世界知道了這個正在上升的新名字。在這次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王洪文和上海的徐景賢、王秀珍、

楊富珍，都當上了中共中央委員，馬天水、金祖敏、陳敢峰、王維國，當上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這次會上，以林彪為首的軍隊幹部，向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發起攻勢，張春橋受到與會代表不點名圍攻。江青又一次搶在事主前面，與張春橋一起向毛澤東告狀並求救。毛澤東當然明白對張春橋的圍攻其實就是對自己發動文革的強烈不滿，他又一次選擇了江青和張春橋。雖然緊接着受到公開批判的是陳伯達，但是毛澤東與林彪的親密關係已經出現裂痕。廬山會議結束後，江青在住處秘密接見了赴廬山參加會議的王洪文和徐景賢。江青對王洪文說：「知道吧，對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應該聽懂了江青的話，這句話傳遞了毛澤東對王洪文的期望。¹⁵

奉調北京學習

1972年9月，王洪文奉調北京學習。這是張春橋從北京打電話通知王洪文的，要他移交上海的工作，並帶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帶個秘書，因為要在北京待上一段時間。據徐景賢後來回憶，王洪文不知中央調自己去學習什麼，也不敢問張春橋，放下電話，就趕緊去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商量。大家都認為，林彪事件後，中央需要增補幹部，王洪文去中央學習，肯定是被進一步重用，而且很可能會進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6日晚上，馬、徐、王在錦江飯店小禮堂為王洪文餞行。第二天，王洪文帶着秘書廖祖康，在虹橋機場登上飛往北京的飛機，上海市委的常委們赴機場為王洪文送行。

王洪文赴北京後，和張春橋姚文元住在一起。中央對他的安排是一面跟着周恩來參加中央工作，一面學習。中央辦公廳給王洪文送去馬、恩、列、斯、毛著作，供他學習。這是對王

15 這一節的資料，除注明出處的之外，全部引自徐景賢《十年一夢》。

洪文的培養和考察。尤其毛澤東，更是密切關注着王洪文——

毛澤東等王洪文安頓下來以後，連續找他談了幾次話。詳細地詢問他的歷史，並且在交談中提出各種問題，聽取他的看法和觀點，既對王洪文進行考察和面試，又對他進行開導和幫助。毛澤東還關照周恩來親自幫帶王洪文，凡是周恩來主持的會議，周都通知王洪文參加，中央政治局的小型會議，中央處理七機部問題的會議，解決河南兩派的會議，甚至連絕密的討論運載火箭把人造衛星送上天的專案會議，都要王洪文參加並讓他發表意見，這也是周恩來對王洪文的幫教和考察。¹⁶

王洪文小心謹慎，努力按照中央要求去做。中央說調他去北京是為了加強學習，他也就努力認真學習，還向上海市委徐景賢提出，將蕭木調去北京繼續做他的學習輔導員。¹⁷徐景賢十分不情願放蕭木離開上海，因為蕭木是上海市委寫作組主力，工作努力，筆頭也好，此時正在與陳冀德籌辦《朝霞》雜誌；但既然王洪文點名，他只好放人。王洪文還要求徐景賢幫他物色一個英語老師，他要學英語，因為毛主席也在學英語。徐景賢後來從復旦大學外語系調去一個英語教師，從ABCD開始教王洪文。此時的王洪文躊躇滿志。他整天不是學習就是開會，毛澤東還派他去新疆、浙江等地區，處理因群眾組織派別對立而長期遺留的矛盾。王洪文自己本來就是群眾組織的頭

16 徐景賢《十年一夢》。

17 王洪文在北京有兩個秘書，一個工作秘書小沈，另一個生活秘書廖祖康，國棉十七廠造反時就一直跟着王洪文的原廠技校學生。兩個秘書已經屬多；張春橋和姚文元在北京都只有一個秘書。蕭木作為王洪文的政治輔導員調去王洪文身邊，文革後有人說蕭木是徐景賢的上海市委寫作組安排插在王洪文身邊的釘子，顯然與事實不符。蕭木是王洪文自己點名要求調到北京的。

頭，後來又作為上海市革會負責人，專門處理上海群眾組織之間的糾紛，在這方面有經驗。雖然對於群眾組織的兩派尤其對於上海鄰居浙江的兩派，他心底有傾向，但首次作為中央代表，他基本按中央要求處理矛盾，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很滿意。據說，毛澤東對張春橋說：

王洪文做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他的條件比你、我兩個都優越，我們要了解工農兵，還要搞調查研究，他自己做過工，當過兵了，已經具備這種條件了。¹⁸

不久，張春橋告訴上海市委的徐景賢等：看樣子，洪文回不來了；經他和姚文元、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馬天水主持。這是王洪文將留在中央工作的信號，毛澤東欣賞王洪文。接班人問題一直是林彪事件後毛澤東的一個心病，現在毛澤東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得到解決了。

但王洪文畢竟從政時間很短，沒有資歷。沒有資歷不僅是經驗不足，也使人無法從資歷中了解其真實能力和品德，所以毛澤東似乎對自己又一次選的這個接班人還是有些不放心。中共十次代表大會籌備召開之前，毛澤東要王洪文看《劉盆子傳》。王洪文沒有聽清毛澤東要他看的究竟是什麼，也不敢多問，他趁回上海調查研究時，找寫作組的朱永嘉等，說要讀劉什麼子。朱永嘉猜出是「劉盆子」。劉盆子是《二十四史》中《後漢書》裏的一個人物，原本是個放牛娃，赤眉起義時被立為皇帝，但根本勝任不了皇帝的職務。對中國歷史非常熟悉的朱永嘉，聽說毛澤東要王洪文看這篇文章，馬上領會到毛澤東的意思，是希望王洪文不要像劉盆子那樣，不成大器扶不起。但朱永嘉不便明說。朱永嘉去和徐景賢商量，徐景賢出主意：只按文章的字面意思，將古文翻譯成現代白話文，不作任何其

18 徐景賢《十年一夢》。

他解釋和議論。朱永嘉照此辦理，逐字逐句翻譯了一遍。王洪文聽着，不動聲色，沒有任何表示。徐景賢和朱永嘉都認為王洪文是個明白人，他應該明白毛澤東的弦外之音。¹⁹

王洪文去中央後，很不習慣中央的行事規則。他給馬天水打電話說自己非常寂寞，有時一整天就是開會。²⁰

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3年5月間，中共中央召開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第十次代表大會籌備事宜。周恩來宣佈，根據毛澤東提議，政治局決定將王洪文調到中央，列席政治局並參加工作；根據毛澤東意見，王洪文負責黨章修改小組，起草修改黨章的說明並提出新的黨章草案。由於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只選出一個主席即毛澤東，一個副主席即林彪。林彪事件後，中共中央主席便只剩毛澤東一人，政治局內，三分之一被認為是親林彪者，或死亡如葉群，或被審查如陳伯達、黃永勝等，補充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員成為當務之急；而且那個將林彪立為接班人的「九大」黨章也急需修改。

最初王洪文負責的班子，寫出的是《關於黨章修改的說明》，只是個事務性的報告。報告送上去後，在「十大」召開的前三天左右，被送了回來。上面是毛澤東的筆跡：「說明」二字被劃去，加了「報告」二字，再下面寫着「王洪文」三字。²¹毛澤東決定由王洪文在「十大」作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共前幾次黨代會上的黨章修改報告，一般都由即將升任為毛澤東副手者作：「七大」是劉少奇，「八大」是鄧小平，「九

19 以上資料均主要引自徐景賢《十年一夢》。

20 轉引自張春橋 1972 年 11 月 2 日下午在接見市工代會部分委員時的講話。上海市工代會會議記錄。原件為上海市總工會文書檔案。

21 這是蕭木對筆者回憶的，他參加了《關於黨章修改說明》的起草。

大」沒有這個內容。「十大」由王洪文作這個報告，這表明，毛澤東要重用王洪文。8月20日，中共「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會議召開，雖然毛澤東沒有到會，但他讓周恩來宣佈了一個更具震撼性的決定：由王洪文擔任選舉準備委員會主任，而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等排在王洪文名後，都任副主任。周恩來宣佈了毛的這個決定後，立即謙恭地從主持人的席位上退讓，請王洪文接着主持會議。一百多個參加會議者立即明白了毛澤東要讓王洪文當他的接班人的意圖。

毛澤東的這個意圖遭到抵制。「十大」召開前，在周恩來主持的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上，當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讓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提議後，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員們都不表態；張春橋和姚文元因為大家都不吭聲，也不便表態，場面十分尷尬。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提出：副主席一個就可以了，他的意思很清楚：周恩來擔任副主席，不贊成將王洪文放上去。為了「打通思想」，「統一認識」，8月23日晚，由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黨政軍直屬機關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傳達和解釋毛澤東選調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思想，說服大家不要看不起「兒童團」。儘管如此，許世友仍然不服氣，多次插話陳述自己的意見。張春橋指責許世友「反對毛主席的意見」，許世友當眾大聲呵斥：「你有什麼了不起」。周恩來講話後，到會的老幹部們用掌聲表達對周恩來的敬意。但輪到王洪文講話，講話結束時一片沉默，沒有人鼓掌。討論由誰作修改黨章報告時，提議王洪文的人寥寥無幾。這些跡象都表明中央高層幹部對王洪文不認可，使王洪文從一開始感覺到老幹部們對自己的抵制。王洪文以後對徐景賢提及當時情景仍不能釋然。

馬天水也出席了這次會議。面對沉默的集體抵制，馬天水以自己老幹部的身份為王洪文說話：「我打頭陣表了態，表示支持和擁護王洪文為黨中央副主席候選人。我當時說：我同王

洪文相處一段時間，覺得王洪文看問題還比較全面，不是一個衝衝殺殺的人，他在上海主持過一段時期的工作，我感到他比我強」。²²

1973年8月24日下午，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毛澤東出席並主持大會。毛澤東坐在主席台中央，左右是王洪文與周恩來。毛澤東宣佈，由周恩來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念完政治報告後，由穿着嶄新軍裝戴着領章帽徽的王洪文念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修改黨章的報告。8月28日，「十大」閉幕會，毛澤東沒有出席。但在投票選舉中央委員時，周恩來宣佈：「今天的大會，毛主席請假；毛主席委託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選舉十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王洪文站起，走到毛澤東座位前，拿起桌上放着的毛澤東的選票，走向投票箱將選票投了進去。毛澤東的這一系列安排，使王洪文閃亮登場，一下站到了中國政治的前沿。接着，8月31日，全國報刊統一刊登了前一天舉行的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新聞公報，其中，最具新聞意義的就是王洪文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在毛澤東、周恩來之後。

這是毛澤東第三次為自己挑選的接班人，前兩次是劉少奇與林彪。²³

受命王維國專案

1970年的廬山會議之後，王洪文負責上海的「批陳整風」，即批判陳伯達。第二年9月13日林彪外逃死亡事件發生。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來負責的林彪專案組，華東地區的林彪

22 馬天水 1976年11月21日《我的補充揭發交代》，上海市區、縣。局黨員負責幹部會議秘書組 1976年11月25日印發，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

23 本節內容除注明的外，其餘皆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 2003年出版《毛澤東傳》，以及徐景賢《十年一夢》。

案件，由許世友和王洪文負責，上海設材料組。王洪文推薦，經許世友同意，由戴立清具體負責專案工作；將王知常調去負責文字工作。另外，還調去駐市總工會的軍代表康寧一，空軍和警備區的一些軍人，共八九人，組成專案組。最初的材料都直接報周恩來，同時也報許世友和張春橋，但不經上海市委和警備區的其他領導。

在對王維國專案的一些處理上，王洪文和許世友經常爭論，意見不一。矛盾具體體現在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清查上。林彪案件在上海和江浙一帶，對象主要是駐上海的空四軍和駐杭州的空五軍。毛澤東派許世友和王洪文一起去浙江處理空五軍問題。王洪文認為對空五軍的幹部應以教育為主，不主張都處理。許世友的觀點不同。對上海的空四軍幹部也是這樣，「王維國專案組」前後共審查56人，其中除4人上報中央「林彪專案組」審查外，其餘人員經過一段時間審查後，都沒有正式結論，也即沒有硬給他們做出「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的結論。以後都移交空四軍處理。²⁴ 王洪文這樣做，可能是想為這些軍隊幹部留有些餘地。王維國的妻子杜貴珍，被認為「參與了王維國一系列反黨活動」，但王洪文認為不能因為丈夫的事情株連妻子，在審查了一段時間後將她釋放。還有其他許多人，例如李偉信的弟弟李偉嵩，空四軍政治秘書處韓洪奎，等等，王洪文認為他們不了解真相，只是執行者，責任不應由他們負，對他們可實行從寬處理。文革結束後，這成為王洪文的罪名之一，說他包庇這些人，企圖拉攏他們從而把他們控制在自己手裏，這些人都被重新處理。

此外，許世友在處理駐上海空四軍幹部問題時，將所有原來空四軍的高級幹部都換班，另外派人。王洪文認為不妥。張春橋也認為不能怪下面幹部，主要是上面的責任。王洪文主張原來的班子能保留的盡量保留，不要另外再派人，打擊面不

24 《上海文革史話》第641頁。

要太寬，包括在杭州的空五軍。原空四軍軍長鄭長華，是五十年代初期的空軍戰鬥英雄。據說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後，曾說過：對那些戰鬥英雄要保。²⁵ 在王洪文上報的關於鄭長華的材料中，只說鄭曾經吹捧過林彪父子，至於是否參與過林彪的活動，認為查無實據。王洪文希望保留鄭長華的空四軍軍長職務；許世友決定調鄭長華去南京軍區審查，王洪文拒不肯放，說「在空四軍保留這麼一個人有好處」。他讓鄭長華繼續主持空四軍工作，並對他說：「我還是信任你的」，「你大膽工作」。但南京軍區方面執意要對鄭長華進行審查，1972年鄭長華被送中央專案組審查。王洪文嘆道：「這樣一來，我想保留鄭長華當軍長又不成了。」²⁶ 王洪文的一些主張和做法，許多都與許世友發生矛盾。王洪文還試圖影響對浙江空五軍陳勵耘等人的審查，也都被許世友堅決抵制。²⁷

毛澤東拋棄王洪文

中共「十大」以後，王洪文跟着周恩來工作，周恩來給毛澤東的重要報告，都由周恩來起草，與王洪文共同署名。1974年6月，周恩來病重住院。毛澤東委託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一時期，也正是四屆人大醞釀名單的最後階段，江青希望能掌控以後的國務院，一次又一次地要王洪文向毛澤東進言。身為副主席的王洪文，雖然在黨內地位排名比江青和張春橋高，但心甘情願地跟着江青等的指揮亦步亦趨。毛澤東多次批評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加上姚文元是「四人幫」、「上海幫」。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遵從江青之意，赴長沙見毛澤東，反對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毛澤東此時對政治

25 這是參加過王維國專案審查的王知常告訴筆者的。

26 《上海文革史話》第 642 頁。

27 同上，第 643 頁。

欲望強烈卻又到處樹敵的江青不滿，他更對身為副主席，卻總是跟在江青等屁股後面轉的王洪文失望。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東西；「『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麼多人要團結」。但王洪文沒有悟出毛澤東不滿的嚴重性；或者，他無力也無意擺脫江青和張春橋的控制。他本來個人意志就不強大，在上海工總司時就被認為「耳朵軟」。到中央工作，沒有政治和人脈資源，更無政治經驗尤其是高層政治生活的經驗，只能聽命於江青和張春橋。何況他是張春橋一手提拔的，過去他與張春橋是教誨和被教誨的關係；現在儘管領導關係變了，張春橋不會再像過去那樣直接教導他；但張春橋的判斷和主張，在雙方關係中的影響矢量沒變。以他的能力，根本不能與張春橋相比，無法抗衡張春橋。加上對文革的共同觀點和利益，他根本無法如毛澤東所希望，跳出「四人幫」圈子，成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

12月23日，王洪文又赴長沙見毛澤東，這次是和周恩來一起去的，在長沙住了三天，27日回北京。毛澤東再一次要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王洪文在長沙期間，向毛澤東寫了份檢查：

主席：

這次來長沙向主席匯報工作，又一次聆聽了主席的教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別是主席對我的批評「你不要搞四人幫」。主席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我誠肯(懇)的接受主席的批評教育。這次主席批准在這裏住三天，我應借這個機會來回憶，總結自己犯錯誤的經驗和教訓。

兩天來我認真的回憶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錯誤。

主席發現以後曾多次指示，「你們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們不要搞上海幫」。我沒有堅決的按主席的指示辦事。當工作中遇有問題時不是和政治局多數同志商量，研究解決問題，而是只找少數幾個同志。雖經主席多

次指示，我仍然不覺悟，脫離不開小圈子。主席在離京前的政治局會議上又指示「你們不要(搞)上海幫」。以後有同志來找議事我仍然頂不住。因此就繼續犯錯誤。10月17日來長沙向主席匯報關於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為「風雷(慶)號」批示發生爭吵一事我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因為當時在提名總參謀長人選問題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見，這本是黨內生活中允許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數同志正確的解決問題，而是只聽了少數同志意見。錯誤的把提總參謀長人選問題和江青同志批示「風慶輪」問題同小平同志爭吵聯繫在一起，並且亂加猜測，因而就得出結論說可能有別的什麼問題。因此我就提意(議)向主席報告。

在這個問題上的是(事)實是：小平同志並不錯，而是我犯了嚴重錯誤，因為總理身體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聽取各方不同意見，而是只聽少數同志意見，又不加分析就錯誤的向主席報告。干擾了主席。我的錯誤是嚴重的。²⁸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召集十幾名政治局委員在住處開會。毛澤東長達兩小時的講話，主要內容是批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要求加強黨內團結，提出「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毛澤東還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前一時期的「批經驗主義」進行批評。從可以見到的材料來看，毛澤東似乎從來沒有公開批評過張春橋，這是唯一的一次。但是，即使可能是唯一的批評，毛澤東也是以批評自己的形式作的：「我也犯了錯誤……我沒有看出來，只聽了一

28 轉引自薛慶超著《中國現代史論：中國外交重大突破毛澤東的南方決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遍」。²⁹ 另一方面，毛澤東也無堅決清除江青之意，對江青充其量只是告誡和批評，這也應該是王洪文無力擺脫江青的最重要原因。但周恩來抓住了毛澤東的批評，佈置在政治局範圍內，學習討論毛澤東的講話。周恩來因病不能主持會議，決定由王洪文召集。王洪文一再推托，拖着不召開會議。5月27日，經毛澤東批准，由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³⁰

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後，毛澤東始終在一邊觀察。毛澤東對王洪文的政治能力失望。王洪文自己在許多方面也不思進取：一次接待一個國家總統，他本應事先準備，了解對方國家情況。可他對外交部送給他的資料連看也不看。第二天接待時，什麼也談不出，只好翻來覆去地問那個總統：你到中國飯吃得慣吧，住得慣吧。外交部工作人員存心如實記下王洪文的這些話，寫成簡報，報送毛澤東，據說毛澤東看了很生氣。³¹ 王洪文的文化知識也讓毛澤東無法與之交流。毛澤東對反文革勢力總是憂心忡忡，擔心「復辟」。一次他對王洪文講起張勳復辟的事，王洪文不知張勳是誰，問毛澤東辯子兵是怎麼回事，毛只好說「你自己去查」。³²

對王洪文直升飛機式的提拔，使得王洪文既無法在各個台階積累工作和政治經驗，也無法在各個領域和地區積累人脈資源。毛澤東再一次拋棄自己選拔的接班人。毛澤東向周恩來和鄧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強，「威望不高」。根據毛澤東的意見，1975年6月下旬，王洪文回上海和浙江「幫助工作」。7月1日，葉劍英寫信給毛澤東，建議由鄧小平主持工作，毛澤東批示「同意」。從7月初開始，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鄧小平主

29 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 2003 年出版《毛澤東傳》第 1731 頁。

30 此小節資料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 2003 年出版《毛澤東傳》第 1734 頁。

31 筆者 1989 年 8 月對金祖敏的訪談。

32 這是蕭木告訴筆者的。

持。從此，王洪文再也沒有主持過中央工作。³³

對於王洪文的工作能力，在他身邊工作過的蕭木有着評價：

比起一般工人，王洪文無論是在考慮和處理事情的能力上，還是在政治上，要強一些。他如果是一步一步地上去，在各種位置上受到鍛煉，也許有可能會鍛煉出工作經驗和能力。但他卻是一下子被提拔上去的，這使他的經驗能力與責任嚴重不對稱。而且王洪文實際是奉命造反，沒有獨立判斷政治是非的能力。他對政治是非的判斷標準就是「最高指示」，毛澤東的話。³⁴

1975年7月，失意的王洪文回了上海。同行的廖祖康通知市委辦公室，給王洪文準備一間辦公用房間。不過人們沒有聽出言外之音：王洪文打算長住上海了。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不知道北京發生的事情，不知道王洪文已經失寵於毛澤東。王洪文向他們透露了中央的鬥爭，說：「當前中央鬥爭很複雜，要有上山打游擊的準備」；8月19日，王洪文去上棉三十廠，臨走時說：「只要我不被打倒，不死，下次還要來的。右派上台，我就來不了了」。³⁵ 回康辦的路上，同行的王秀珍覺得他剛才的話不妥，說：你這句話講得太露骨了，能這樣嗎？王洪文答：「要有這個思想準備。文化大革命誰勝、誰負的問題，遠沒有解決，有些人根本不承認我這個副主席，不承認文化大革命，不承認新幹部，好多地方新幹部都被打下去。還要

33 毛澤東對王洪文的態度轉引自遼先知、金沖及主編 2003 年出版《毛澤東傳》第 1739 頁。

34 這是 2007 年間，一次筆者向蕭木問起王洪文的工作能力時，蕭木對筆者說的。

35 轉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幫」專案小組辦公室 1977 年 3 月《反黨分子王洪文的罪行年表》。

圍繞文化大革命再鬥。你看鄧小平的講話，不就清楚了嗎？」³⁶ 另一次，在錦江飯店小禮堂樓上，王洪文邊喝酒邊埋怨：「什麼主持工作，還不是讓我往火坑裏跳！」「現在我有什麼權？黨中央和國務院是他(指鄧小平)的，軍隊也是他的，我只有一个辦工農兵讀書班的權！這是毛主席定的呀！」³⁷

王洪文在上海無所事事，除了視察工作，很多時間放在吃喝、打獵、釣魚、看電影。後來他對人說：「去年我回上海，實際上是半休息狀態，太氣了」。³⁸ 而此時，「王洪文犯錯誤了」的消息悄悄在幹部間流傳。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很着急。馬天水說：洪文在上海沒事幹，鄧小平這個人很能抓權，我們要勸他趕快回北京。他老不回北京，慢慢權沒有了，在群眾中影響也沒有了。徐景賢說：洪文回北京一見報，政治謠言也就會沒有了。要他趕快回北京抓工作。王秀珍說：我們勸他回北京好，他在上海也沒事做，情緒不高。大寨會議他沒參加不要緊，計劃會議他要參加，代表工人在會上講話。³⁹

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三次勸王洪文回去。11月15日王洪文終於回北京。但回北京後，吃喝打獵釣魚依舊。請王洪文吃飯喝酒最多的是葉劍英，有時半夜三更也會打電話將王洪文叫去。王洪文大概認為中央高幹都是這樣，吃吃喝喝是一種幹部待遇；或者他覺得自己已經被高層政治遺棄，不再被信任，所以也不再願意收緊骨頭謹慎行事。他的秘書看不下去，說：「王洪文這個人完蛋了，照這種樣子，肯定完蛋」。這個秘書打報告，執意離開王洪文，後來在文革結束前的半年，終於如

36 王秀珍 1978 年 3 月 29 日《補充交代與王洪文的反革命罪行》。

37 徐景賢 1976 年 11 月 5 日《徐景賢的初步揭發交待》，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

38 轉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幫」專案小組辦公室 1977 年 3 月《反黨分子王洪文的罪行年表》。

39 王秀珍 1978 年 12 月 24 日。

願。⁴⁰ 金祖敏曾經勸過王洪文珍惜機會，好好學習，王洪文聽了很不高興。⁴¹ 蕭木也曾經勸過王洪文。一次王洪文又被葉劍英叫去喝酒，酒席散後，蕭木與王洪文整整談了三小時。蕭木以老師的身份，勸王洪文不要沉湎於吃喝、打兔子。王洪文聽着，最後表示：

我有我的難處，我難以開展工作，許多人根本不承認「十大」的路線。我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更是不被承認。⁴²

顯然，王洪文存心以自己的沉淪，表達對政治失意的不滿。整個鄧小平主政時期，王洪文情緒都十分低落。直到1975年底，名為「反擊右傾翻案風」，實為批判鄧小平的運動開展，王洪文才又重新活躍起來。不久，因北京群眾悼念周恩來，引發1976年丙辰清明天安門事件，鄧小平被革職。但王洪文也沒有因此重新復權。接替鄧小平的是華國鋒，毛澤東再次挑選的接班人。毛澤東不會想到，這個接班人，將結束他視為自己一生所作兩件大事中的一件——文革。王洪文將被華國鋒永遠結束政治生涯。

其實，正如蕭木的評價，對比中共的其他幹部，王洪文並不算能力差的。公平地說，王洪文有一定的工作能力，雖然不是很強，這與他資歷太淺有關，也和他不強的個性有關。大凡比較隨和的人，在果斷方面總會有點欠缺。王洪文從政時間太短，還沒有來得及積累處理事情的經驗，即使在文革初期的上海市革會任職副主任之職時，有了點經驗，但那是非常時期的經驗，尤其是在一個否定規則和秩序時期積累的經驗。這樣的經驗反而是誤導，經驗越多，誤導越大。二是資源不足。王

40 筆者1989年8月對金祖敏的訪談。

41 同上。

42 這是蕭木對筆者說的。

洪文只在上海市革會工作過，所有的社會資源都只在上海。如果他在其他省市和中央的部門工作過，資源就會多得多。王洪文直升中央，除了上海，他再指揮調動不了他人。文革時期又是黨內派別對立最嚴重時期。王洪文是以造反起家的，在幹部階層對文革沒有認同的情況下，他們把王洪文看作是自己的對立面派別的代表，自然不會與之合作。王洪文的造反派身份，使他無法與老幹部融合，即使他作出姿態，老幹部也不會接受他。他的人脈資源只有江青、張春橋和上海的造反派。文革打倒一批幹部，讓打倒他們的造反派上台，還要讓被打倒者輔佐這些造反派，實在勉為其難。

新幹部們：王秀珍

王秀珍是工總司除王洪文之外最重要的人物。這並不是因為她的能力，而是因為她在上海市革會及上海市委的職務。除了王洪文，她是所有上海工人造反派中職務最高的。

王秀珍與王洪文在工總司成立前因造反而結識。工總司成立前的籌備會議，王秀珍雖然沒有參加，但她參加了成立大會及隨後的安亭事件。1967年3月間，王洪文趁落實大聯合的貴陽經驗。對工總司總部大精簡後，他親自將王秀珍調到總部。工總司籌備時期的共產黨員只有王洪文和岑麒麟，但岑麒麟因為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對農村餓死人有過議論，「四清」中被暫緩黨員登記，政治名份較低，不宜給予重任。王洪文調王秀珍去工總司，顯然是因為王秀珍的共產黨員和曾經的勞動模範身份，加上王秀珍當過工長的基層工作經驗。王洪文還特地在工總司總部新建立一個組：政治組，讓王秀珍當組長。這個組的工作內容是政治教育，由黨員王秀珍負責總部造反派的政治思想工作。⁴³

43 這是王腓利告訴筆者的。不過，政治組存在時間不長。1967年4月，總

1967年3月下旬，張春橋要王洪文推薦一個女性參加市革會工作。王洪文首先推薦了自己廠一起造反的黨員唐文蘭，廠黨委的檔案管理員。但張春橋認為她和王洪文同廠，一個廠出兩個市革會成員不太合適。王洪文於是推薦徐美英，但張春橋認為徐美英是手工業局下面工廠的，屬於集體所有制，不是產業工人。王洪文又推薦王秀珍。張春橋回去看了王秀珍的材料，後來又讓她參加了一次市革會會議，非常滿意：全民所有制大廠的技術員，雖然是幹部編制，但也可算是產業工人，又是共產黨員、勞模、參加過安亭事件的老造反，而且說起話來，也是呱呱啦啦能說上一陣。⁴⁴

此時正逢近五一勞動節，徐景賢便讓王秀珍作為上海代表團成員，赴北京參加4月20日的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大會結束後，一行人又留在北京，等候參加5月1日的勞動節觀禮活動。5月1日中午，毛澤東和林彪乘坐敞篷車開進勞動人民文化宮；王秀珍所在的上海代表團這天在中山公園，無緣見到毛主席。但下午4時多，突然來了通知，讓各省市赴京觀禮代表團的帶隊人準備，晚上登天安門看煙火。帶隊的陳琳瑚去看望老朋友不在，就讓王秀珍去了。晚上，在天安門城樓上，王秀珍受到毛澤東、林彪以及江青等中央領導接見，王秀珍拿出準備好的一大包工總司紀念一月革命的徽章，送給他們。王秀珍被毛澤東接見的消息，第二天便由《工人造反報》出了號外。5月9日，適逢工總司成立半周年紀念大會，王秀珍在大會上介紹自己見到毛主席、林副統帥的情景，有關文章後來又登在報紙上。上海市民從此知道了王秀珍的名字。

回上海後，王秀珍即按王洪文的要求，去一些大廠為工總司總部物色可靠的工作人員，她抽調了近十人進總部，都是造

部宣傳組的主要工作《工人造反報》被獨立出去，成立編輯部。宣傳組於是與政治組合併為政宣組。

44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反派，而且文革前各方面表現包括個人品質都符合規範，其中大半是共產黨員，包括金祖敏。1968年初，市革會籌備在3月30日召開「上海市1968年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由市革會政宣組和文教組聯合籌備，王秀珍作為工總司代表參加大會籌備工作。大會後，她被留在文教組。9月，市革會派出工宣隊，王秀珍是工宣隊「一辦」負責人，對口市革會文教組。1969年1月，市革會各組辦與進駐組室的工宣隊合署辦公，王秀珍成為文教組負責人。

王秀珍先後擔任的職務有：上海市革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此外，王秀珍還是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中共第九、第十屆中央委員，全國人大第四屆常務委員會委員。據說，王秀珍的上海市委書記職務，是江青提議的。據王秀珍回憶，1971年上海召開第四屆黨代會前，由金祖敏去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匯報籌備事宜以及即將恢復成立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人選，回來後，他告訴王秀珍：「在政治局討論時，江青提出上海是對外開放的城市，外賓多，應有一位女書記，江青提你當書記，大家同意了。」金祖敏還告訴王秀珍，江青提王秀珍名時，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人都一聲不響，而且葉群還提名王維國也當市委書記。王秀珍後來回憶說：「我聽了金祖敏說了後，我內心一直感激江青，認為我這書記是她給的。我還認為江青最關心支持我們婦女，因此我就到處吹捧和效忠江青。」⁴⁵

王秀珍對王洪文非常佩服，從最初造反，就將王洪文作為榜樣，請王洪文去她廠介紹經驗；後來更是將他看作工人的代表和領袖，對王洪文的佈置說一不二地執行：

我對王洪文感恩不盡，覺得是他帶我出來工作，是對我幫助最大的人。1968年王洪文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以後，

45 王秀珍 1977年4月4日。

又聽他透露過毛主席曾找他談話，問得很詳細，一談幾小時。這樣，更感到王洪文了不起，認為他是上海工人的代表和首領。⁴⁶

1972年王洪文上調北京後，作為市委書記和市革會副主任的王秀珍，分管了上海的組織、政法和民兵工作，還有工會、青年團、婦聯的工作。但王秀珍過去從未有這方面的工作經驗，當上市級領導後，也沒有人對她進行這方面的傳授；加上文革前的工、青、婦工作在文革中遭到批判，失去了延續性。因此王秀珍既是外行，又沒有可以借鑑的文革前的傳承。市總工會的勞動保護、勞動保險、生活福利、業餘教育、文體活動等，婦聯的婦女地位和婦女保護，都是共產黨領導下工會和婦聯的工作內容。但王秀珍從來沒有在這些方面有過關懷，甚至連共產黨執政後一直熱衷的勞動競賽、1975年開始的計劃生育等，王秀珍也沒有向總工會和婦聯佈置過相應的工作或活動。王秀珍對上海群眾組織的領導，就是配合各種政治運動，要工、青、婦發動下面的群眾緊跟和響應，響應的形式不外乎開大會、貼大字報。從這一點上，應該說王秀珍確實是抓住了共產黨群眾工作的最核心最本質的內容：灌輸加動員。而這也是王洪文對上海工會工作的佈置：「工會要抓大事」。

王洪文去中央工作之前，在上海開展工作很大程度上靠老幹部馬天水、王少庸和黃濤等人的輔佐。另外一方面，那些走上各級領導崗位的造反派新幹部們，更是王洪文最大的政治和人際資源，他們對文革對王洪文都有着高度的認同。王洪文被毛澤東選中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是他們的驕傲，而王洪文也將他們看作是自己最可靠的根基。1972年9月王洪文奉調北京前的一個日子裏，將馬天水和王秀珍找去康辦談話。在馬天水還沒

46 王秀珍 1976 年 11 月 25 日《我的第二次揭發交代》，上海市、區、縣、局黨員負責幹部會議秘書組 1976 年 1 月 24 日印發。

到之前，王洪文特地對王秀珍關照：

我走了，你有什麼重要事情要找工總司的老頭頭商量，我們在市委、市革會裏頭工作，就靠工總司和這幫老頭頭的支持，碰到問題了，找他們，會幫你出主意的。有什麼問題，你可以直接打電話給我，我支持你的工作。⁴⁷

我去北京之後，你要把工代會工作抓好，首先要把工總司幾個老頭頭團結好，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戴立清等人，這幾個人對文化大革命是有貢獻的。這幾個人是很勇敢的，我到市革會，後在市委工作，是他們支持我的，你和金祖敏到市革會來，也是靠他們支持的。我走之後，你要經常找他們談談，商量一些問題，聽聽他們的意見，這幾個人是有水平，有辦法的。像黃金海，戴立清政治上是很敏感的。多跟他們通通情況，你要靠他們支持，還要經常提醒他們不能出什麼問題。⁴⁸

王洪文顯然一是希望自己離開上海後，那些當初的老造反繼續發揮作用；二是擔心自己不在，沒人壓得住他們，所以囑託王秀珍代替自己，繼續重用他們，同時也管束他們。而這不僅是王洪文的擔憂，也是張春橋的擔憂。也是在9月，張春橋在上海時，對王秀珍有過同樣的交待：

王洪文到北京去了，工總司這幫「司令」交給你了，你要挑好這副擔子。我知道你會有困難的，這些「司令」不會服你，但我們支持你，你要把這些「司令」抓住，多找他們談談，多徵求他們的意見，市委、市革會和我們(指王、張、姚)有什麼精神多給他們說說。我是願意跟這幫「司

47 王秀珍 1978年3月8日《揭發交代與王洪文的反革命罪行》。

48 王秀珍 1978年6月15日。

令」打交道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經常找他們談，商量一些事情，找潘司令談得最多。⁴⁹

王洪文和張春橋顯然都不放心工人造反派身上未脫的草根氣，這些工人造反派雖然擔任了各級領導，但還不熟悉和不適應共產黨上層政治的運作方式。他們的造反精神，在已經恢復了秩序的上海，有時可能惹出麻煩。在這方面，王秀珍顯然是合適的管理他們的人選。王秀珍對王洪文言聽計從，不像其他老造反有時會自行其是；王秀珍文革前就是共產黨員，有着共產黨員的服從特性，「聽話」，比較容易被掌控；王秀珍又是老造反，為王洪文信任，容易被造反派們認同。她可以成為王洪文和上海工人造反派之間的紐帶。

事實上，那些老造反最初並不十分服帖王秀珍，雖然她在工廠造反可算很早，也參加過安亭事件，應該算是老造反。但在工總司早期發展過程中，她基本沒有參加那些大的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康平路事件、一月奪權、取消兵團和內部反對派、整頓工總司區局組織，等等，她都沒有起什麼作用。不像戴立清、黃金海、王明龍等人，他們的活動史就是工總司的發展史。一些工人造反派尤其不服王秀珍的能力。金祖敏評論：「王秀珍也是個草包，沒自己頭腦。王秀珍講話不行，東扯西拉，當了市委書記後，到處訓人。」金祖敏將王秀珍與王洪文比較：「王洪文口才可以，寫東西不行；王秀珍就連口才也不行，講話發言，東扯西拉。」⁵⁰ 葉昌明則認為王秀珍「只管大事不管小事，但大事又管不來」；「只會要求發動群眾，跟在各項政治運動後面轉」。⁵¹ 王秀珍在工作討論中，很少能提出自己原創性的建議設想，都是重複報紙上的套話，不得要

49 王秀珍 1978 年 6 月 15 日，括弧內的文字為原來所有。

50 筆者 1989 年 8 月對金祖敏的訪談。

51 葉昌明文革後曾多次這樣對筆者說過。

領，沒有自己的主張和思想。幾次工總司整風會議，對王秀珍提的意見都是「喜歡亂講話」，「亂批評人」，實際就是覺得她自以為有了權力就擁有了真理。但另一方面，由於王秀珍擔任市革會副主任和市委副書記，更由於被王洪文信任，王洪文對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指示，基本都通過王秀珍佈置或傳達，所以一些老造反對王秀珍儘管不服氣，但還是服從。而且王秀珍經常向王洪文匯報各人表現，王洪文要批評誰，也通過王秀珍傳達，王秀珍實際成為王洪文對工人造反派的代言人。所以大家對她雖有意見，但都還是尊重她的。

王秀珍後來回憶說「我忠心耿耿死心塌地地按照王、張的指示辦，管這幫小兄弟」。王秀珍經常召集他們開會，傳達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最新指示，議論形勢，預先討論區縣局領導班子人選，對自己要在市革會上的講話的發言稿提修改意見，解決老造反或工人新幹部發生的麻煩或問題，等等。⁵² 王秀珍經常強調：張春橋始終支持我們造反派，王洪文是我們工人造反派的代表，我們要為他們爭氣。⁵³ 王秀珍還對大家進行「造反史」教育。王洪文曾經表示過，上棉十七廠那間原來自己工作過的保衛科辦公室，「這個辦公室是有意義的，要保留下來」。王秀珍於是要十七棉廠黨委將這個辦公室按原樣保留，桌椅按原樣擺放，王洪文文革前的選民證也按原樣壓在辦公桌的玻璃板下，

1975年2月初和2月15日，我曾兩次帶領「小兄弟」去這個辦公室開會，以增強對王洪文的「感情」，效忠王洪文。第一次帶了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王日初、金祖敏。我和金祖敏傳達王洪文、張春橋對黃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這幫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團，效忠

52 王秀珍 1978 年 6 月 15 日。

53 同上。

王洪文，為王洪文爭氣等。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馬天水和我們多關心新選進的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給他們補上文化大革命這一課。當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個晚上，我藉這個機會帶祝家耀、周宏寶、張國權、陳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補委員，去十七棉進行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紹了所謂王洪文的「造反史」。我還要他們不要忘記這些「歷史」，要為王洪文爭氣，為「四人幫」效忠。⁵⁴

不過，王秀珍在「管」上海的這些工人造反派的同時，也無力不從心之際。就能力而言，黃金海、戴立清、葉昌明等比她強得多，而且有自己的主張和看法，以王秀珍的水平，很多時候難以說服和壓得住他們。而且他們還沒有完全適應上層政治生活規則，行事處世比較直接，有時會惹出點麻煩。例如黃金海的「批林批孔急剎車」牢騷，例如葉昌明的兩次刊物風波(後面章節將詳述)，等等。王秀珍也覺得這些造反派新幹部不好管理，她會經常向王洪文、張春橋反映這些人的不是。以至於王洪文身邊的秘書廖祖康對她很有看法。一次，在和黃金海、戴立清、葉昌明等人聚會時，廖祖康說：

為什麼不向「三位」(王、張、姚)寫寫信呢？你們不寫，人家小報告一張一張，你們幾個(指葉昌明、戴立清、王明龍、黃金海)在張春橋眼裏形象是很壞的，這裏主要是王秀珍在搞名堂。⁵⁵

54 同上。其中提到的祝家耀文革前是工人，文革中曾任公安部副部長；周宏寶文革前是工人，文革中任國務院教育部負責人、教育部臨時領導小組組長；張國權文革前是工人，文革中是第一任復旦大學工宣團團長，1974年任國務院六機部黨組成員；陳佩珍文革前是營業員，文革中任市婦聯副主任、市革會財貿組領導成員。

55 黃金海 8 月 24 日《我和廖祖康關係交代》。

王秀珍努力管好當上新幹部的工人造反派。在純潔新幹部隊伍、清理口碑不好的造反派方面，王秀珍執行得最堅決。以至於許多造反派對她有意見。在這方面，王秀珍對自己的市委書記和工人造反派負責人的雙重身份，有點轉換和把握上的困難。有時她從共產黨政治生活準則出發，去修理這些新幹部，有時她又從文革造反派群體利益出發，去維護這些自己人，結果是新幹部們認為她胳膊朝外，老幹部們認為她派性嚴重。

新幹部們：金祖敏

在擔任上海市級領導的文革工人新幹部中，金祖敏無疑是僅次於王秀珍的重要人物。這是因為他所處的職位：上海市革會以及中共上海市委組織組的負責人。組織組負責各級幹部的管理、選拔和調動，也負責向中央推薦幹部，重要性在其他部門之上。

金祖敏在安亭事件前就造反了，可以算是老造反。後來，他所在的上海電機廠成立造反隊，他被推為廠部造反隊負責人。1967年一月奪權中，被推為廠部的臨時負責人。負責了兩個月的生產後，因為主張讓原來的幹部們出來工作，一些造反派說他太右，另一方面可能也因為對指揮這樣一個大廠生產的力不從心，他回了原車間。⁵⁶ 1967年6月，正值王明龍和王秀珍去工廠為工總司總部挑選幹部。王明龍工作的上海重型機床廠和金祖敏工作的上海電機廠，都在上海近郊的閔行工業區，都是上海數一數二的重工業大廠。王明龍是工總司閔行地區聯絡站負責人之一，造反時認識了金祖敏，對金祖敏很好感，向王秀珍推薦。

1967年6月，金祖敏作為第一批正式調入工總司總部工作的五人之一，被調工總司總部的工業組。⁵⁷ 不久，王少庸指名要

56 以上為筆者 1989 年 8 月 12 日對金祖敏的訪談。

57 金祖敏調工總司的經過，是王明龍告訴筆者的

金祖敏負責處理普陀區問題。1967年的下半年，普陀區很亂，武鬥幾乎天天不斷，發生衝突的單位計有七十多個，國棉十四廠8月19日的武鬥打死1人，一〇一廠8月6日的武鬥死2人；國棉二十二廠和紡織專件廠也是衝突不斷，國棉二十二廠到1969年還打死1人。金祖敏去市革會工業組，擔任了普陀區調查組的組長，他以調整造反隊領導班子的辦法解決矛盾：「我解決了些老大難問題，如普陀區。我向基層抽了些素質好的幹部，至少是黨員和老工人，去充實工總司區、縣、局聯絡站的班子」。⁵⁸到年底各派的矛盾總算稍有所平息。1967年8、9月，閔行地區造反派借反新工總司之際，打壓另一派「紅色暴動兵團」（簡稱「紅暴」），金祖敏工作的上海電機廠的地下室裏也關了好多人。金祖敏知道後，堅決要求廠裏自己一派的造反隊放人，不許打人，還組織人員挨個去各地下室檢查是否關人。在金祖敏的努力和堅持下，上海電機廠的兩派對立很快消除，以後也沒有大的反復。

1968年「4.12炮打」後，市革會組織組被改組。王洪文提議，派金祖敏接手，王少庸同意。⁵⁹金祖敏負責上海市革會的組織工作後，雖然也提拔了不少工人造反派，但他更注意被提拔者文革前的表現和經歷。他比較多地挑選黨團員，挑選文革前便有基層工作經驗者或工齡較長者。對那些文革前受過處分或在群眾中口碑不佳者，金祖敏不會因為是老造反而特別關照，相反會有所抑制。他去市革會組織組不久，負責幾個局的領導班子組建。「我把一些本應勞動教養、卻在文革初期造反上去的人拉下去了，我不同意他們當頭頭」。⁶⁰又例如他對自己所工作的上海電機廠的廠革委會「第一把手」的安排，最初

58 筆者1989年8月12日對金祖敏的訪談。

59 這在徐景賢的《十年一夢》中有提及；金祖敏在1989年8月12日筆者去訪談他時，也說自己是因1968年4.12炮打市革會組織組改組而去的。

60 筆者1989年8月12日對金祖敏的訪談。

他希望文革前的副廠長張惠民擔任廠革委會主任，雖然這個副廠長始終對文革有看法，與造反派對立。但金祖敏認為他硬，「我佩服他」。可是張惠民不肯當「第一把手」。金祖敏於是安排了另一個老幹部，原廠武裝部長、文革中被「三結合」的黃維雄，擔任廠革委會主任；卻不讓另一個造反派頭頭當「第一把手」。為此，廠裏的造反派頭頭還和金祖敏拍過台子。後來他去北京負責重組全國總工會，他也是堅持不同意將浙江造反派頭頭翁森鶴放進省工代會。⁶¹

王洪文對金祖敏一直很重用，金祖敏認為，「王洪文是同意我的做法的。王洪文也認為有些老造反自身有很多問題，提拔上來擺不平」。工總司的一些人因此對金祖敏有意見：「工總司的人對我有看法，說我右，說金祖敏到底文革前是黨員幹部，對造反派感情不同」。⁶²

金祖敏在市革會組織組負責老幹部的復查。1969年各省革委會負責人會議，討論各省省委的名單。上海方面本由王洪文參加，王洪文正生病住院，上海便派出金祖敏。會間，周恩來找金祖敏單獨談話。周恩來問金祖敏對幹部政策的看法，金祖敏回答說：應該相信大多數幹部是好的，真正壞的不是少數，而是極少數。周恩來很贊同，說要盡早將一批老幹部解放出來。金祖敏後來回憶：「我回上海後，馬上進行佈置，要求處以下幹部的解放由各區完成。」⁶³ 市級幹部的「解放」，包括陳丕顯、曹荻秋，都是張春橋直接過問的。金祖敏認為解放老幹部的阻力來自張春橋：

61 筆者 1989 年 8 月 12 日對金祖敏的訪談。

62 同上。

63 同上。

張春橋對我有過看法，是為一個老幹部。那是在1969年，這個老幹部還在五七幹校，我打了個報告，要調他去一個局當二把手。張春橋很惱火，在市革會上批評我說：這種人你根本不了解，怎麼能當幹部？張春橋是不想讓老幹部出來工作的，我曾經安排過兩個老幹部的工作，都被張春橋批評過……因此，我始終覺得，張春橋嘴上說要解放幹部，但實際上，我去市革會組織組當一把手，許多解放幹部的報告，送上去都被壓着不批。⁶⁴

在周恩來與金祖敏的幾次見面中，周恩來反復強調，培養新幹部，要重點培養文革前當過基層幹部的人。還說，要當一名省委書記，沒十年工作鍛煉不行。你們這些人都是在特殊情況下上來的，並不是你們本身就具備了條件。金祖敏後來說，他理解周恩來的意思是：培養新幹部要有基層工作經驗，所以他在挑選幹部時，特別注意文革前的經歷，盡量挑選文革前曾擔任過車間主任、支部書記、工段長等基層職務者。

工總司初期，總部黨員非常少。王洪文所以去調來王秀珍和金祖敏，都是黨員，歷史上沒有任何不良記錄。但是，從造反資歷來說，他們兩人雖然都是安亭事件時期的老造反，可工總司的幾個「大戰役」他們都沒有參與總部的行動；而掌權以後的地位，他倆卻是最高的。這讓有些造反派很不服氣，說王洪文「一手拉王秀珍，一手拉金祖敏」，卻將他們這些一起打頭陣的弟兄摺在一邊。直到1968年底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大批老造反隨工宣隊進入各級機構，這樣的牢騷才有所平息。

金祖敏在任上海市革會副主任期間，分管組織和人事工作。1975年初，中共中央為準備恢復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活動，準備召開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了籌備組，金祖敏任組長。從此調任北京。

64 筆者1989年8月12日對金祖敏的訪談。

新幹部們：黃金海

黃金海不是工總司最初的常委，但重要性不亞於常委。1973年上海市第五次工代會上，他成為上海市總工會常委。

工總司總部骨幹中，黃金海的老造反和文革情結十分強烈。他對文革有着特殊的感情，對文革的任何非議或政策轉向他都非常敏感。他認為文革使他終於敢對車間和廠領導的壓制說「不」，而且以後還讓他這個普通工人當上了領導。不過黃金海認為自己不被張春橋信任，因為1.28炮打張春橋那天，張春橋將他們幾個工總司骨幹找去開會，會上只有陳阿大態度堅決，要調人去砸紅革會，黃金海和其他人都沒有作聲。黃金海認為張春橋從此對自己有看法。

黃金海對王洪文十分佩服，但有不同看法他會直說。1967年初，因為屢次建議敲掉兵團王洪文都沒同意，他認為王洪文處理兵團手軟，氣得不幹了，回自己工作的工廠。還是戴立清幾次去勸他，才將他勸回工總司總部。1968年1.28炮打張春橋事件一周年，紅革會在文化廣場開大會，請黃金海去參加，黃金海認為張春橋對紅革會曾經說過不追究，他就在會上講話說，小將犯錯誤，改了就好。我們工總司仍然和紅革會戰鬥在一起，團結在一起，勝利在一起。黃金海的這個講話被市革會寫成內參報上去，王洪文來找黃金海，說你怎麼代表工總司去出席這樣的大會？不過王洪文沒因這些事對黃金海有看法，還是很信任他。王洪文認為黃金海做事認真，有責任心。1970年黃金海成為上海市革會委員，1972年又被增補為市革會常委。

1968年9月，工宣隊與所進駐的辦公室合署辦公，黃金海擔任了市革會財貿辦的負責人。1969年初的上海財貿系統派性嚴重，從上到下分為兩派。雖然1967年3月24日，兩派終於大聯合，成立了財革會，但始終是面和心不和，聯而不合，矛盾叢生。而且因為兩派都要「結合」自己看中的幹部，不願「解

放」對方提出的幹部，所以到黃金海帶領工宣隊進駐財貿系統的1968年9月，還有上千個幹部沒有解放；局處級幹部有八個「集團案」，涉及幾百人，有的甚至還被關在「牛棚」裏沒有放出。黃金海後來回憶，他去財貿辦後，決心抓二手。一手是大力落實幹部政策。工宣隊進駐財貿辦沒幾天，就在文化廣場召開財貿系統萬人大會，專門強調幹部政策。工宣隊六辦還成立了專案復查組，經過一年多的內查外調，對八個集團案做出結論：沒有一個是證據確鑿的，全部否定；對財貿系統處以上幹部全部結案，沒有一人被定為叛徒、特務、走資派或反革命。有些已經被定為叛徒之類的，也都重新結案。⁶⁵

解放幹部的阻力，不僅來自造反派，也來自原來負責專案和清隊的幹部，因為他們不願否定自己的「工作成績」。黃金海後來回憶說，如果不是進駐的工宣隊與原來財貿系統的人事都沒有瓜葛，靠原來的財辦復查，「真不知道會拖到何年何月」。經過這樣的調整，財貿系統所屬局、公司，主要負責人基本都是老幹部，第二負責人基本由支左軍人擔任，「三、四把手」由新幹部擔任，「做到老中青，軍幹群兩個三結合」。許多老幹部都是黃金海極力主張解放的。當時所在單位硬頂着不肯解放他們，說他們是叛徒、特務、假黨員，非要開除他們的黨籍。黃金海不惜得罪造反派，甚至撤了一些老造反的職務。例如東風肉類加工廠，有些職工國民政府時期曾經集體加入過國民黨，本不是什麼大問題，而且共產黨執政後也已經對他們做過「一般歷史問題」的結論；造反隊負責人卻在清隊時對他們逼供誘供，又搞出了幾十個「國民黨員」，一批黨員、幹部都成了國民黨，長期不予解放。「我就到廠裏召開全廠大會，發動揭蓋子，將幾個造反派頭頭全搞了下去，這批黨員幹部才解放出來」。還有醫藥公司的一個造反派頭頭，當時已經結合為局

65 本章關於黃金海的回憶和資料，除注明外全部引自黃金海2011年所寫未刊稿《與葉永烈商榷》。

革會常委，為了將醫藥公司黨委書記許道傳打成假黨員，搞假材料，假錄音。黃金海認為這是誣陷行為，經查實後，撤了這個造反派頭頭的一切職務，並進行批判。黃金海後來回憶：

這些老幹部是黨多年培養，又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是國家的寶貴財富，不依靠他們，靠誰？自以為是，非出漏子不可……靠軍隊支左幹部，政治上雖強，但他們對商業貿易不熟悉；靠造反派新幹部，雖說他們原來都是財貿職工，接受新事物能力強，但要讓他們負責上層領導獨擋一面，尚缺經驗，難免會出問題。儘管財貿系統控告我的信像雪片似的飛向市革會，指責我復舊，但我不得不堅持。事實證明我這樣做是對的，符合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即毛主席指示「路線確定後，幹部是決定因素」。

黃金海的另一手是堅決促進大聯合，宣佈：堅持派性的，不管哪一派哪一級，堅決清除。那些堅持派性者，大多是老造反，自恃造反有功，不給他們在革委會中安排位子不罷休。黃金海將兩派各自的頭頭王志品和宋有福，統統擱了下去，讓他們回原單位。黃金海的這兩手，得罪了許多老造反，告狀信寫到上海市革會甚至國務院，說黃金海到財貿辦打擊老造反，「大搞復舊」。但黃金海的做法，得到王洪文、馬天水和徐景賢的支持。還有一次，張春橋在一次市革會會議上訓斥市革會財稅局的老幹部張松濤，要他下去勞動，張松濤只得提出辭職。但黃金海說，不要一被批評就下去。領導批評應從正面理解，大膽把工作抓起來。他沒有讓張松濤下去。機關於是有人貼黃金海大字報，說他對抗張春橋指示。後來王洪文向文黃金海了解是怎麼回事，聽了黃金海的解釋後，王洪文說：張松濤是你手下的人，你看着辦吧。⁶⁶

66 黃金海文革後對筆者的回憶。

黃金海進財貿辦後，繁雜的業務工作很快讓他感到巨大壓力。黃金海將自己擔任財貿辦負責人，看作是「黨對自己的信任」。他要求自己，「只能幹好，絕不能幹壞，否則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會被某些人嘲笑」。黃金海文革後回憶說，他工作上就是依靠有豐富經驗的老幹部，「在他們身上我學到很多」。但黃金海起用幹部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必須認同文革，必須「正確理解和對待文化大革命」，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否則不予使用。服裝進出口公司黨委書記王鈺，因為對馬天水的一個工作批示不滿意，黃金海便認為他「對抗市革會」，在外貿系統的會議上多次說他是「老右傾」，還將他貶去五七幹校「勞動」三四年，後來雖然讓他回公司，但也只安排當副手。⁶⁷

工交組和財貿組，是上海市革會兩個最重要的業務部門。黃金海後來回憶：「這麼一個重要的大口，擔負着上海一千二百萬人的柴米油鹽衣食錢，我一個普通工人從未接觸過這個領域，深感責任重大，壓力很大」，光是每天供應全市的蔬菜安排，就是不能出一點差錯的系統工程，黃金海深感「真是如履薄冰，戰戰兢兢；常常晚上難以入眠，每天早上五點半就醒，總想着每天必須要有五萬擔蔬菜必須落實」，「唯恐出一點紕漏」。但當時在文革的衝擊下，全國副食品都短缺；而且外省市對上海在文革中的老大地位有看法，不願多供應上海。即使有國家調撥計劃有時也不能按原計劃調進。黃金海除了盡量與外地搞好關係，還組織商業二局、水產局、糧食局及崇明縣，共同將崇明島上的老鼠沙沖積地，建設成上海自己的副食品基地。直到文革結束後，老鼠沙一直仍是上海副食品和水果的供應基地。為了切身了解漁業工人的艱辛，保證上海的海鮮供應，黃金海曾經兩次跟隨上海漁業公司的捕魚船出海，其中一次跟船兩個星期。文革期間，上海的商品供應一直領先

67 黃金海 1977 年 7 月 19 日《我追隨「四人幫」所犯的反革命罪行》，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幫」小組辦公室 1977 年 7 月 26 日編。

全國，這不能不說與黃金海的努力分不開。

黃金海對文革是十分認同的，文革中的政治運動他都積極投入。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展後，黃金海在財貿系統「點火」，說外貿的一些單位「權根本沒有奪下來，這次要解決造反派掌權的問題」；說工藝品公司在清查5.16時，趁機整了造反派；說針織站重訂檢驗規則，是重走文革前的老路；說漁業公司造反派「一月革命」奪來的權又被奪回去了，等等。他的「點火」，使得這些單位派性又起。

在財貿業務上，黃金海也是以文革思維方式，以大批判開路，所謂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他認為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就要破，就要鬥。1974年的春季廣交會，因國際上絲綢價格下降，外貿部隨行就市，也採取了靈活的傭金價格；但黃金海說這是括「降價風」，傭金制是「克己復禮」，在廣交會上進行批判。結果使當屆交易會原定絲綢價格全部被推翻，成交下降。到當年秋季廣交會時，不得不更大幅度降價。又如1976年的外貿清倉，他將上海的外貿商品積壓原因，歸結為外貿部「投降賣國」，「崇洋迷外，拜倒在洋人腳下」，「破壞毛主席統制對外貿易政策」；還把清倉出來的實物辦展覽，「進行路線教育」，不但組織外貿系統的幹部觀看，還將觀看對象擴大到對口生產的有關工業局以及總工會的學習班。又如1976年8月，為感謝中國一筆價廉物美紡織品的成交，美國代理商給上海紡織品公司送去一塊刻着「感謝」字樣的銅牌。黃金海對許多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太低始終有意見，覺得連外國人都說我們的價格低，這是低價典型。他報告了馬天水。張春橋知道後，支持他們向外貿部送大字報，黃金海照辦了，佈置上海外貿局向外貿部送大字報。1974年廣交會上，黃金海認為上海梅林罐做成西德的「俱樂部牌」不允許印一個中國字，更不允許印中國製造，這是「賣國投降主義」堅持要做自己商標「梅林牌」，印上中國製造。

文革後黃金海回憶自己當時的觀點和做法，承認自己當時確實「極左」。他回憶，在當時西方對我國嚴密封鎖的國際環境下，中央同意的「定牌商標」（如中國的「梅林」牌，標成德國的「俱樂部」牌）、「中性包裝」（含糊生產國，做成第三方如港澳產品）等通融做法，是有利於轉口貿易、擴大我國商品打入國際市場的。但經上海這麼一抵制，造成其他口岸思想上很大混亂，對外也造成不良影響。不過，黃金海始終認為自己當初反對中國省區內部相互競爭，降級降價出口沒有錯，因為這樣造成中國商品國際價格過低。因此上海與外貿部關係搞得很緊張。⁶⁸

這些工作上的不同意見或分歧，被文革上升到「兩條路線鬥爭」，作為打擊政治對手的炮彈。黃金海痛心中國的許多商品在國際上價格太低，心疼因銷售不對路積壓在倉庫的外貿商品；但他將這些都作為路線鬥爭、階級鬥爭，作為批判反文革勢力的依據，使自己陷入了黨派鬥爭的困境。

黃金海對王洪文印象非常好，認為他穩重，待人和善。當年1.28炮打和4.12炮打，要不是王洪文沉得住氣，工總司就有可能翻船。文革結束後，黃金海談論起王洪文，說自己當時對他「很崇拜」。⁶⁹ 王洪文要求他辦的事情，他都會很願意地努力去辦。

新幹部們：葉昌明

整個文革十年，從工總司，到工代會，到總工會，王洪文始終是主要負責人。但實際上，主持實際工作的一直是葉昌明，雖然他的職務只是副主任。

葉昌明是工總司籌備時期的元老，而且是成立大會發言

68 這是筆者將這段關於黃金海的文字請黃金海核對史實時，他對筆者說的。

69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12 月 13 日對黃金海的訪談。

者以及成立大會主席團成員。安亭事件後，王洪文召開部分參加過工總司籌備會議的單位開會，確定五人常委，葉昌明是五常委之一。1967年12月解放日報事件後，葉昌明有一陣子回自己工作的研究所。那時工總司總部事情不是很多，他年輕，才二十出頭，常守在總部的范佐棟與黃文海三十多歲，他和他們處不好。他覺得在總部無所事事，於是回自己單位合成纖維研究所。1967年1月底，《文匯報》的一個記者找他，說工總司總部現在很亂，希望他回總部。他於是回到總部。不久，正逢范佐棟宣佈「三天不回總部就開除」的決定。葉昌明和戴立清等認為這是針對王洪文的，連夜找到王洪文報告。范佐棟隨即被清除。葉昌明也因此更被王洪文信任。

比起黃金海、陳阿大和戴立清，葉昌明自1967年1月底回工總司總部後，基本沒有離開過工總司以及後來的總工會。工總司早期，始終守在總部的是范佐棟，范佐棟被削職以後，只有葉昌明始終守在總部。1968年底工宣隊進駐市革會各組辦並與組辦合署辦公，工總司總部的老頭頭們等，都去了工宣隊，只有葉昌明留在工總司總部看家。王洪文雖然始終是工總司、工代會和總工會負責人，但因為身兼市革會負責工作，後來又去中央，所以不是經常去工會，主持工作的是葉昌明。他是四屆和五屆工代會實際主持工作的負責人。工總司從一個群眾組織演變為工會，具體规范化工作都是葉昌明做的。他規範總部各組的工作，理順各組職權範圍，主持籌備了上海的第四、第五次工代會，並且是主持常務工作的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在葉昌明的主持下，總工會建成為工人造反派的凝聚中心。

葉昌明個子瘦小，說話不多，思維縝密，綿裏藏針。工總司由他當家，基本平穩地渡過各種轉折：從工總司，到工代會，到總工會；尤其對工代會以及後來的工會轉型，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他文革前沒有從事過工會工作，當了總工會副主任後，也沒有人對他進行過共產黨工會工作的培訓。但是，越到

文革後期，葉昌明越是感到工會不能總是「抓大事」，搞運動，總要做些與職工切身利益相關的工作。葉昌明後來回憶說，工總司轉變為工代會後，他感到工會工作太空，跟着政治運動轉，運動一來，佈置各級工會「發動群眾貫徹響應」；卻始終沒有工會自己的日常工作。下面基層工會有意見，葉昌明自己也覺得，總工會是「運動來了忙得團團轉，運動過去閒得沒事幹」。參照文革前的工會，他覺得至少在文藝和體育以及業餘教育方面，工會應該恢復文革前的工作內容，真正為廣大職工做點實事。到文革後期，上海的工會工作內容日益向文革前靠攏。雖然，沒有恢復工會原來的「生產」（即勞動競賽、勞動保護）和「生活」（即勞保福利）工作，但在文娛和體育活動以及業餘教育等方面，已經與文革前相差無幾。前面關於上海市總工會的章節已述，上海市總工會恢復了市工人文化宮和各區、縣工人俱樂部的活動，恢復和建立了工人業餘大學以及工人政治學校，建立了工人足球隊，這些都與葉昌明的努力分不開，都是葉昌明千方百計去爭取來的。沒有恢復勞保福利工作內容，也是因為沒有經費，管不了：文革中不收工會會員費，所以工會沒有活動經費，要錢只能靠政府撥款。

此外，許多老造反在文革初期衝擊各級黨委階段時，衝勁很足；可到了奪權後的秩序恢復階段，卻根本坐不下來，不能實實在在地抓具體工作，加上有些人在生活上和經濟上犯錯誤，甚至違法。葉昌明後來回憶說，他主持工作的指導思想就是求穩。求穩的第一個做法就是對工會系統的人員進行整頓。他將那些生活、經濟上有問題，或者辦事不牢靠或者派性比較嚴重的老頭頭們逐漸淘汰。工總司成立時期的許多人，以及一些區、縣、局聯絡站負責人，都是這一時期下去的。例如潘國平、岑麒麟、蔣周法等，又例如工總司普陀區兩派的負責人，還有閘北區、靜安區的一些負責人等。對一些工作能力不強的老頭頭也淘汰。文革後葉昌明回憶說：

我這個人雖然是造反派，但心裏還是有許多老框框，總覺得挑選幹部，個人品質要過硬，工作能力也要強些。我們當時有這樣幾句話：枕頭不要睡錯，口袋不要摸錯，屁股不要坐錯，男女、經濟、政治都不能有差錯。所以，在我手裏淘汰了好些老造反。對我來說，選拔幹部最好是老造反，但也不是必要條件，我印象裏，最早的一批老造反很多人總有點「抖五抖六」的（上海方言「做事粗心冒失」之意——筆者注），所以，我也挑選了一些不是造反派的人上來。這樣，黃金海和戴立清在這方面對我很有意見，認為我把老造反弄下去太多。⁷⁰

在葉昌明的整頓下，到文革後期，各區縣局工會的主要負責人，基本換了一批，文革初期工總司聯絡站的負責人大都被淘汰。不過，葉昌明在淘汰有各種問題的老頭頭時，仍堅守一條底線，那就是挑選各級工會幹部還是盡量要老造反。他規定，區、縣、局工會的負責人和常委人選，一定要事先和市總工會商量，然後報市委組織部批。這樣做，是為了保證工會掌握在工人造反派手裏。他後來說，他覺得區、縣、局一級工會一定要控制好，如果市總工會不重視管好這一級組織的話，一些老頭頭肯定會被剔除光。至於區、縣、局工會的委員人選，可以由區、縣、局自己決定，但報市總工會備案。

如何既保存文革原動力——文革初期就造反的「老頭頭」，又保證執政的幹部有一定能力，且個人品質被社會大眾接受，始終是文革面臨的一大難題。文革中的上海市總工會也遇到這樣的難題。

70 這是文革後葉昌明幾次在和筆者閒談時，一再提及的。

新幹部們：陳阿大

和葉昌明一樣，陳阿大也是工總司總部常委。1966年11月工總司籌備成立時，陳阿大被推為成立大會主席團成員。但是在紅衛兵對主席團成員資格審查時，因父親陳七二幫鄰居埋藏黃金以躲避紅衛兵的抄家，被取消坐主席台的資格，但還是常委。

陳阿大矮矮胖胖，喜歡體育，造反派戲有時戲稱他為「胖阿大」。他對王洪文忠心耿耿。他認為王洪文是黨員、保衛幹部，做事不會錯。他對別人說：「王洪文靠牢張春橋，阿拉靠牢王洪文。」他最初和范佐棟關係較密切，兩人經常一起出入。但後來王洪文和范佐棟有了嫌隙，陳阿大便堅決站在王洪文一邊，將范佐棟對他講要王洪文靠邊的打算，轉身報告王洪文。下面的聯絡站說王洪文在工總司內部拉一派打一派，要和王洪文辯論，陳阿大調人將他們打下去。王洪文因此說：「阿大，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只有你最積極支持我」。⁷¹ 這話，徐景賢也多次聽王洪文說過。據徐景賢文革後回憶：王洪文幾次跟他提起，在王洪文危難時刻，總是陳阿大調隊伍來救他。有幾次，反對派把王洪文抓去，陳阿大又將王洪文從對方手裏搶回來。王洪文說陳阿大雖然缺點多，人緣差，在工總司裏威信低，但講義氣。

陳阿大喜歡拋頭露面，喜歡到處表態，一些群眾組織的負責人給他起了個綽號「陳表態」。⁷² 他尤其喜歡代表工總司總部處理下面的糾紛，但凡哪裏發生武鬥，陳阿大一定會出現在那裏。工總司有份簡報也說「哪裏有武鬥，那裏就有陳阿大」。不過這句話容易使人覺得陳阿大是去參加武鬥的，所以在定稿時刪去，改為「哪裏有武鬥，總部常委陳阿大就在那裏制止武鬥」。他自己說：

71 陳阿大 1977 年 9 月 5 日。

72 丁德發《陳阿大造反及其他》，載於網上刊物《記憶》2011 年 12 月 30 日 14 期總第 79 期。

我聽到哪裏有武鬥，就想起毛主席「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教導，想起武鬥打傷的是階級兄弟，損失的是國家財產，搞鬼的是壞人，就非去不可，有的人怕死，我就不怕死，相信有了毛澤東思想，天大問題都是能夠解決的。⁷³

但是，陳阿大處理兩派矛盾的辦法就是壓一派，支持一派，加上講話經常隨心所欲，亂說一氣，反而更激化矛盾。版司和版聯的矛盾就是被陳阿大火上加油的。

陳阿大愛發議論愛說大話，但說話毫無邏輯，做事沒有章法，既可以卑躬到任人耍笑，又可以不講理到暴跳如雷，全看對象地位。他的作風甚至也頗遭自己人的非議：他善於打小報告，一點小事就向王洪文或張春橋匯報。他喜歡沾小便宜，時常借錢不還；吃晚餐、出入市革會所屬飯店從來不按規定付錢；看見別人有好東西就伸手討要。他喜歡對人惡作劇，經常不真不假地打人踢人，伸手摘別人的帽子往地上扔，市革會的老幹部包括警備區的司令員們，都被他惡作劇過。他喜歡對下面擺威風，門衛查他證件，他大發脾氣要求查處門衛，還逼着門衛當面道歉；乘坐的汽車闖紅燈被交警攔下，他指着交警鼻子罵。他上班午休時間喜歡打羽毛球，陪他打的大都是市革會的小車駕駛員。但他打球只許對方輸不許贏，自己輸了就摔拍子甚至將拍子往對方身上砸，將對方的頭都砸破。他坐小車時毫不尊重駕駛員，經常上車鞋子一脫，把腳擱在駕駛員椅背上，等於擱在人家耳朵旁。他的司機除了為他開車，還要為他家買菜、燒飯、拖地板、洗衣服、洗尿布、抱小孩、接送孩子，等於是免費保姆。⁷⁴

陳阿大造反後，房子一搬再搬，越搬越好越大，最後搬進

73 轉引自工總司 1968 年第 46 期簡報《顆顆紅心忠於毛主席——記總部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講用會》：《哪裏鬥爭最尖銳，哪裏就有陳阿大》。

74 陳阿大 1977 年 8 月 10 日。

的新康花園的公寓式花園洋房，是上海最好的住宅之一。五大間的房租是40元，幾乎相當於他每月的大部分收入。他起初房租分文不付，直到1969年，張春橋對新幹部要求：你們要住好房子，就得自己掏房租，⁷⁵ 他才開始支付，但卻是按照他文革前的租房費支付，自報每月3.6元。以後儘管越搬越大，越住越好，但始終只按這個數字交付房租。而廠裏補貼他每個月15元的「房租津貼」，因此他每月還賺進12.4元，接近他每月工資的四分之一。

他也比較貪小。只要聽說哪裏有好處，他一定不肯錯過。他向工廠借了件棉衣，事後不肯歸還；他聽說機關給運動員發運動服，馬上也去討要；他回廠勞動才幾天，馬上領新工作服歸為己有；他經常以老幹部工資高為由，向他們討要香煙，要他們請客吃飯；他出入飯店不肯掏錢，服務員向他開賬單，他大發脾氣。他平日有專門的轎車上下班，卻要機關給他買月票，還向自己的人事關係所在工廠每月領取交通費5元。在那個提倡廉潔的年代，這樣的行為讓很多人不恥。

即使是一同出來的造反派，也大多看不起他，說他「乖」，「會看山水軋苗頭」，這都是上海話，意為「精」，「會看風向善於投機」。更多的是說他「阿污」，這是上海人對那些能力差卻又自我感覺良好者的稱謂；也有形容拉大旗作虎皮、拿雞毛當令箭之意。對陳阿大的被重用，造反派們私下議論說「陳阿大惹人惹福」。⁷⁶ 黃金海和王腓利對陳阿大的評價是：「三等白相人，獨吃自家人」，意思是沒有本事，只會在自己人前擺譜。尤其是一些黨員造反派更是看不慣他。和王洪文一個廠造反出來的唐文蘭，就說自己看不慣陳阿大：「流裏流氣的。我畢竟是黨員，對自己嚴格要求慣了，文化大革命中與這些人總合不

75 轉引自陳阿大 1977 年 9 月 23 日交代。

76 這是胡永年在 1977 年 9 月 17 日交代中寫的。筆者文革後也曾多次聽到葉昌明、戴立清等這樣評論。

大來。」⁷⁷ 金祖敏也說「我不喜歡陳阿大」。⁷⁸

1967年下半年大聯合期間，市革會要求工總司派人協助處理下面工廠和基層單位的派性武鬥，促進大聯合。工總司派出了陳阿大。派陳阿大去，一個原因也是由於他特別喜歡調停糾紛。就這樣陳阿大去了市革會工業組，當時的負責人是文革前市委工業政治部副主任楊慧潔。以後市革會工業組和市政交通組合併為工業交通組，文革前的中共上海市委交通政治部副主任、老幹部黃濤，擔任了工交組主要負責人，是「第一把手」。陳阿大擔任工交組「第二把手」。

工總司的工人造反派中，陳阿大是第一個被正式任命為市革會的部門負責人的。陳阿大文革後回憶說，當時王洪文找他談，說這是張春橋和王洪文共同商量的：

叫你到工交組是我和張春橋決定叫你去的，去當二把手，代表工總司去掌權的。這是組織的決定，對你的信任，你一定要去的，不去不對的。你是第一個到市革會組辦去掌權的……為什麼叫你到工交組去工作，你要好好想想，這是培養你。⁷⁹

從此，陳阿大一直在市革會工交組工作，直到文革結束。

文革伊始，造反派中的黨員很少。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為了讓造反派也能參加九大，1968年10月1日，市革會確定上棉十七廠、良工閥門廠和上港七區，作為上海「整黨建黨」試點單位。良工閥門廠即是陳阿大工作的工廠。張春橋點名要發展陳阿大為黨員。張春橋說：「我們現在造反派隊伍中黨員太少，假如不在老造反中發展黨員，以後要長期掌權是掌

77 筆者 1992 年 5 月 17 日對上棉十七廠，職工唐文蘭的訪談。

78 筆者 1989 年 8 月 12 日對金祖敏的訪談。

79 陳阿大 1977 年 7 月 8 日。

不牢的。」⁸⁰ 據陳阿大自己回憶，在一次張春橋召集的市革會負責人會議上，討論到陳阿大的入黨問題，張春橋說：

現在有很多人反對你阿大，攻擊你很厲害，就是攻擊我嘛！誰都知道我是支持你的，現在如果我不出來講話，保你阿大，你要垮台了。潘國平是阿飛司令，保不住了。阿大，我是怎麼也要把你保下來的，我不把你保下來，這是我們市革會的錯誤，你王洪文就成了空架子了，成了光杆司令了。否則我也被陳丕顯、曹荻秋攻擊對了，我支持的你們工總司的頭頭，都是一些烏龜王八蛋。在上海我就是要讓你陳阿大第一個入黨，參加九大。⁸¹

王洪文也在一旁說：我同意陳阿大入黨，當九大代表。我們分頭去做工作。1968年，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和徐景賢一起去良工閥門廠，召開了座談會。會上張、姚專門強調，要從革命造反隊伍中發展新黨員。陳阿大就這樣被突擊發展入黨，旋即當上九大代表赴京參加九大。這在剛剛恢復秩序的1969年，是非常大的榮譽。陳阿大歷任的職務有：中共上海市委委員，市委常委、上海市革會常委、上海市總工會副主任、全國人大第四屆常務委員會委員。

陳阿大在上海工人造反派中，地位僅次於王洪文、王秀珍和金祖敏：九大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全國人大第四屆常務委員會委員，這些身份，除了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只有陳阿大全部擁有。這一切都與張春橋分不開：四屆人大常務委員，上海原來報送葉昌明，結果換成了陳阿大，王秀珍不解，曾問過王洪文，王洪文說：「我和春橋同志商量的，陳阿

80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

81 轉引自陳阿大1982年7月20日交代。

大在工人中影響大」。⁸² 實際大概更是張春橋的意思。張春橋對陳阿大評價很高：

陳阿大這樣的工人幹部是難能可貴的，我們就是要培養和提拔這樣的工人幹部。⁸³

對此金祖敏曾有評論：

我覺得王洪文也不是真正信任陳阿大，真正信任陳阿大的是張春橋。我覺得張春橋喜歡草包，他對王秀珍也非常喜歡，王秀珍也是個草包，沒自己頭腦的。王秀珍講話不行，東扯西拉，當了市委書記後，到處訓人。⁸⁴

張春橋的秘書何修文認為，可能因為張春橋覺得陳阿大能夠代表上海工人階級：

張春橋看中陳阿大，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陳阿大的出身、經歷，在當時來說都算比較好的。不像其他人多少有點問題：戴立清是去內地建設又回來的臨時工；黃金海講話不像陳阿大那麼直白，有點圓滑；葉昌明在研究所工作，不是工廠工人；而且陳阿大是大廠的工人。還有可能也是因為張春橋覺得他能夠壓得住下面的造反派。⁸⁵

戴立清認為張春橋看中陳阿大有相當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要樹立一個上海工人的形象，他曾聽張春橋說過，

82 王秀珍 1977 年 8 月 14 日。

83 轉引自《文匯報》1977 年 11 月 20 日《陳阿大究竟是個什麼貨色？》。

84 筆者 1989 年 8 月 12 日對金祖敏的訪談。

85 筆者 2011 年 4 月 12 日對何修文的訪談。

毛主席講，到一個地方不要許多年過去了，卻還是連一個當地幹部都找不出。要培養土生土長的幹部。你王洪文、王秀珍都是外地人。⁸⁶

工總司總部骨幹中，潘國平被非議太多；戴立清是臨時工；葉昌明工作單位不是工廠；黃金海雖然是全民所有制大廠的產業工人，但和王洪文、王秀珍同屬市紡織工業局，而且同屬紡織工業局下的棉紡公司，一個系統出太多市級領導不均衡，而且黃金海「出身不好」；王洪文和王秀珍都是外地人，連上海方言都說不好，都不是車間第一線的生產工人。相比之下，陳阿大是上海人，出身工人家庭，十年工齡，共青團員，退伍軍人，老造反，所工作的上海良工閥門廠是上海有名的全民所有制重工業工廠。這一切，使得陳阿大在各方面符合上海產業工人的形象。加上陳阿大是工總司最早的常委，這應該也是張春橋看中他的原因。

當年擔任市革會工交組負責人的黃濤，則認為張春橋重用陳阿大，是因為他以為陳阿大在工人造反派中有影響力：

張春橋為什麼看重陳阿大？我覺得，張春橋用陳阿大，是為了罩住下面的造反派，他覺得陳阿大在造反派中有影響。不過實際上，下面也不服貼陳阿大。⁸⁷

黃金海對陳阿大印象也不好，好幾次與陳阿大鬧得不開心；王腓利曾多次向負責幹部的王秀珍和金祖敏反映下面對陳阿大的意見。王洪文對王腓利說，他其實也想將阿大弄下去，但張春橋不同意。王腓利所以認為：

86 筆者 2007 年 9 月 9 日對戴立清的訪談。

87 筆者 2010 年 12 月 29 日對黃濤的訪談。

我們工總司內部沒有一個人對阿大印象好。但大家都說，就憑「陳阿大」這三個字，他就不會下去，因為他簡單粗糙，大概張春橋認為這就是工人形象。⁸⁸

張春橋與陳阿大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67年1月5日晚上，準備召開第二天的「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的籌備會上。陳阿大與徐景賢爭論，一定要將會場放在人民廣場，並拍着胸脯保證為會場裝高音喇叭以及調一百萬人參加大會。陳阿大那種以「我們工人」自居的形象，肯定給張春橋留下深刻印象。後來在1967年的1.28炮打中，張春橋將工總司的工人造反派找去自己住處，又是陳阿大最堅決，說要調人去砸紅革會。陳阿大以這樣的「工人階級」形象，被張春橋欣賞。

王洪文深知其他老頭頭們看不起陳阿大，幾次特地找陳阿大談話，轉達對他的意見：

黃金海、戴立清、王明龍他們對你意見很多，幾個人在背後議論你，你知道嗎？說你會吹牛、拍馬屁、講空話，又沒有本事，位置很高，對你不服氣。還講我對你信任重用，對他們不信任重用，我知道了狠狠地批了他們一通。這是搞非組織活動，在背後隨便議論人是錯誤的。但他們對你這些意見，你要去聽一聽，你是有這個毛病的。⁸⁹

陳阿大進入市革會工交組後，用和他一起工作的市革會工交組負責人黃濤的話說：「什麼都要抓，什麼都沒抓」⁹⁰。黃濤1968年月被「解放」時，是市革會市政交通組負責人。後市革會市政交通組和工業組合併，成立工交組(工業交通組)，他

88 王腓利 2009 年對筆者的回憶。

89 陳阿大 1977 年 7 月 8 日。

90 筆者 2010 年 12 月 29 日對黃濤的訪談。

又是負責人。陳阿大對工業生產管理一竅不通，根本不知怎麼抓工作，但他和黃濤合作倒是沒有什麼大的矛盾，因為他根本就不管工作，反正一切上有黃濤處理，中有工交組其他幹部對付，下有各工業或交通的業務管理局的幹部執行。黃金海對此評論說：工交組沒有老幹部黃濤撐着，阿大一天也混不下去。⁹¹ 陳阿大自己也承認，工交組工作全靠黃濤，他在工交組的工作很輕鬆，甚至在他思想上無所謂上班下班，

上午在家睡覺，中午來機關，有時下午二點來上班，到辦公室後就找人下單旗，有時舉啞鈴、拉力器等活動，晚上在辦公室踢足球，或去打乒乓、打羽毛球等，一搞幾小時。總之，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辦公室成了我的體育健身房，上班就是這麼幾件事。在我的思想上，除「四人幫」及王秀珍外，對工交組根本不放在心上，認為反正有黃濤。⁹²

長期和陳阿大一起工作的黃濤對陳阿大的評價：「陳阿大，就是四個字：草包一個。」⁹³ 但張春橋真正看重陳阿大的，恐怕正是他的「草包」。因為「草包」簡單無腦，不會出大紕漏。事實上，陳阿大也正是這樣，整個文革十年，他雖然幹不成任何事，但也沒有惹什麼麻煩。不像黃金海、葉昌明等，多少都曾經給張春橋惹出點事情。而且因為「草包」，別人有事也想不到找他商量或處理，反而少了工作干擾。對此，朱永嘉文革後認為：上海是全國第一工業大城市，市革會工交組比其他任何組室都重要，放其他工人造反派，雖都比陳阿大能幹得多，但他們個性都比較強，有自己的主張，讓他們當副

91 這是文革後黃金海在和筆者的多次聊天時說的。

92 陳阿大 1977 年 8 月 10 日。

93 筆者 2010 年 12 月 29 日對黃濤的訪談。

手，會比較難合作。陳阿大雖是草包，但不管事，所以反而不會產生太多干擾。⁹⁴

陳阿大說話東扯西拉。王秀珍雖然說話不得要領，但至少會說套話，會照着別人給她起草好的稿子念；傳達上面的佈置或精神時，表達得還算清楚。陳阿大連念稿子都念不順，套話都套得文不對題，傳達都傳達得離題萬里。偏偏他又喜歡逢會必發言，而且講話經常亂開無軌電車，東扯西拉，不知所云；秘書給他起草好講話稿，他也會扔開講稿亂講。經常讓其他造反派感覺丟臉。下面反映說，阿大作報告，記吧，不知他講些什麼；不記吧，不尊重新幹部。馬振龍對此形容得很生動：

有時工交組開會，各局的領導都來了。輪到陳阿大講話，我們新幹部就擔心他鬧笑話。他一講話，會場的氣氛就變了：老幹部手上的筆放下來了，筆記簿合起來了，煙抽起來了，交頭接耳起來了。看到這種情況，我們真心疼，而阿大講話又確實沒有什麼內容，有時顛三倒四，文不對題。為了維護他的威信，我還是硬着頭皮做記錄。⁹⁵

就連欣賞陳阿大的張春橋，對陳阿大毫無邏輯的胡言亂語也無法忍受。上體司的胡永年回憶說，有一次張春橋主持的會議上，討論一個什麼文件，「陳阿大的發言語無倫次，連張春橋聽了都打斷他的話說：『阿大，你不要發言了，你看看再發，怎麼搞的，你越講我越聽不懂了』。」⁹⁶ 為了幫助陳阿大提高，黃濤曾經找了幾個大學程度的幹部給他補習文化，但補不進。

雖然對工交組的工作從來不上心，但陳阿大有兩個權抓着

94 這是筆者和朱永嘉在一次討論時，朱永嘉說的觀點。

95 上海市工代會 1971 年整風學習記錄。

96 胡永年 1977 年 9 月 17 日。

不放。一是幹部任命權，工交組任命下面的幹部，一定要徵得他的同意；二是住房分配權，他曾任房地系統工宣團團長，從此將分派房子的權力握在手裏，親自批辦了許多事例。文革中造反派們要求分條件好些或面積大些的大房子，找陳阿大是個捷徑，他也確實為許多一起出來造反的工人們分配了房子。

陳阿大對王洪文始終忠心耿耿。他對王洪文的評價與對徐景賢的評價不同，說老王夠朋友，講義氣，就是耳朵皮太軟；講到徐景賢，陳阿大說他這個人門檻精，太刁滑。⁹⁷

在擔任了市級領導幹部的上海工人造反派骨幹中，陳阿大能力最差，最遭非議，但地位卻緊挨在王秀珍、金祖敏之後，這讓許多造反派內心深感不服。文革中，上海造反派的兩個最典型的負面形象，一個是陳阿大，另一個是潘國平。「當時我們造反派被牽頭皮最多的兩個人，一個是陳阿大，能力差，被人稱『阿污』；另一個是潘國平，被人稱『花花公子』。」⁹⁸而葉昌明則感嘆：陳阿大和潘國平這樣的人被看作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典型，這是我們的悲哀。⁹⁹

新幹部們：戴立清

和黃金海一樣，戴立清也不是工總司最初的常委，但重要性不亞於常委。也和黃金海一樣，1973年上海市第五次工代會上，他成為上海市總工會常委。

戴立清沒有參加工總司成立的籌備會，但他廠裏的司機王漢清參加了。於是戴立清作為工總司發起單位的代表，成為工總司的委員。雖只是委員，但他被稱為「不是常委的常委」，重要性可見一斑。1973年上海市第五次工代會上，他成為上海

97 轉引自丁德發《陳阿大造反及其他》。

98 這是王腓利對筆者說的。

99 這是葉昌明在看了筆者這一章的草稿時，寫在草稿邊上的批注。

市總工會常委。戴立清參加了文革初期工總司參與的幾乎所有大事。王洪文認為戴立清能幹，負責，能吃苦，很信任他。初期曾將工總司總部秘書組的公章交他掌管。他不負重託，在1966年底的那次黃文海等逼他交公章的虹口會議上，他堅持不交，並馬上匯報王洪文。從此更得王洪文信任。

1968年11月4日，市革會工宣隊第三辦公室成立，對口市革會科技組。領導核心由三人組成：工人代表戴立清，軍隊支左代表田樹堯，幹部代表秦學能；秦學能後來調離，由老幹部許言接替。戴立清是「三辦」的主要負責人。原「老大難辦公室」分管的工交系統老大難單位，全部轉到三辦。解決一個，轉回工交系統一個。上海許多武鬥工廠矛盾的解決，不能不說與戴立清的努力和能力分不開。

1968年10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一次提出「清隊」後，馬天水和王少庸要「三辦」重點抓科技系統的「老大難」單位和清隊；姚文元也從北京來電話，說要看科技系統的簡報。¹⁰⁰ 12月初，王洪文找戴立清談話，說現在工交老大難單位不多了，你可以將「三辦」的工作重點轉向科技系統。1968年11月，戴立清上任「三辦」。當時沒有交接，也沒有文書檔案的移交。原來的市革會科技組「大班子」，只留下五名7月派去的工代表，幾名業務幹部，還有6月進駐的軍宣隊和9月進駐的工宣隊。這些先期進駐者匯報情況，說科技系統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敵情嚴重，市區有『兩線一會』，嘉定有『光機特務集團』」。科技系統清隊運動的成績很大，挖出了一大批潛伏特務。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2月9日，在科技系統市革會禮堂召開「對敵鬥爭大會」。會上中科院植物生理所、材料研究所和電器科學研究所的軍、工宣隊介紹「清隊」經驗。戴立清在會上講話，市革會領導馬天水到會，對戴立清的講話加以肯定。這是戴立清擔任「三辦」負責人後

100 戴立清 1993年《戴立清回憶錄》(未刊稿)。

第一次公開亮相。這個講話完全是他偏聽偏信、主觀臆斷的充分發揮。戴立清肯定了科技系統前一階段的清隊，下結論說科技界「知識分子多，統戰對象多，進口貨多，集團案件多，現行反革命多，特務多」。大會內容第二天便由《文匯報》報道，植生所的經驗還被印發至各單位。

戴立清很快為自己的這個講話付出代價。12月大會之後，他派人去大會發言的三個研究所蹲點，「本打算抓住典型，總結經驗，特別是總結他們在大會之後有何新的推動」。卻不料去蹲點的幾個聯絡員，接觸實際後，回來的匯報，令他們大吃一驚。首先是耿金章，他是戴立清帶來的聯絡員，派去藥物所。剛過三天，耿金章來反映，說駐所裏的軍宣隊對專案對象搞逼供信，不讓休息睡覺，總是在半夜提審；還辦什麼「抗大式學習班」，實際是關押被審查對象；而且還用電線編成的鞭子毒打他們。戴立清和軍代表田書堯再去其他研究所了解，發現全是這樣，而且越是被認為「清隊」搞得好的研究所，情況越是嚴重。原來，還是在戴立清被派工宣隊三辦之前，6月20日，便已有軍宣隊四百人進駐科技系統；9月13至23日，市革委又先後向科技系統所屬45個單位，派去4個團共3152人的工宣隊。¹⁰¹ 這第一屆工、軍宣隊的清隊重點，是「兩線一會」案。¹⁰²

2月，植生所革委會將「兩線一會」作為所裏清隊的重點。第一屆軍宣隊和工宣隊進駐後，又更進一步開展。當時駐植生所軍宣隊帶隊的李光華，認為所裏甚至整個中科院華東分院有個「國民黨潛伏集團」。¹⁰³ 10月15日，第一屆軍、工宣隊，在

101 第一屆工、軍宣隊的派出日期引自中共上海科學技術工作委員會文革後（約在1980年左右）編纂的《中共上海市科技系統黨史大事記》。

102 所謂「兩線一會」，可以追溯到文革前，原是上海科技系統四清內容之一，因1966年底的撤消工作隊而中止。1968年初上海的清隊開始，「兩線一會」案又被重新提出，而且作為「清隊」的重點。

103 以上幾個日期全部引自《中共上海市科技系統黨史大事記》。

植生所舉辦封閉式「抗大清隊學習班」。被審查對象白天寫交待，夜間被提審，遭受毒打。21位高級研究人員全部遭到嚴重迫害。所裏的科技人員夏某被作為「突破口」，連續刑訊逼供30多小時，承認自己是「潛伏特務」還不行，必須交待發展了多少人。最後逼得夏只得照着所裏的職工名冊畫圈，一下交待了140人，連逼供他的軍代表也算進。植生所的「經驗」馬上被第一屆工、軍宣隊推廣，整個科技系統各單位都辦「抗大式學習班」，疲勞提審，刑訊逼供。試驗生物研究所被逼交代出120人，藥物研究所逼供出105人。到戴立清進「三辦」之前，中科院所屬14個單位，「挖出」的「兩線一會分子」共達603人，全部都被看管或關押着。戴立清不得不重新審視科技界的「敵情」和「清隊」——

為此，我們深感問題嚴重，同時也感到12月9日在會上提出的「幾多」現象，不是事實，它無疑會對清隊工作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知錯必改，有錯必糾，我們下決心要徹底糾正違反黨的政策之錯誤！事實上，以後的一年多，我們一直在落實這個問題。¹⁰⁴

戴立清最初的感覺是不能這樣搞逼供信。為了扭轉狀況，戴立清和同去的軍代表田書堯等人，一方面將情況迅速上報市革會，寫了好幾份專題簡報，並以此建議撤換第一屆工、軍宣隊。另一方面分頭下所，找軍宣隊和工宣隊談話，要他們立即停止逼供信並放人。考慮到1969年春節將近，要求他們將各研究所的「抗大式學習班」解散，先放人回家過節，案子後查。大多數工、軍宣隊同意了，但逼供信最嚴重的植生所，軍宣隊辦案人員拒不接受。他們手持材料，堅持說自己有證據。戴立清和田書堯只好直接找到派出他們的東海艦隊支左辦公室，幾

104 戴立清 1993年《戴立清回憶錄》(未刊稿)。

次要求撤走這批軍宣隊。這批軍宣隊的成員，都是外地部隊衛生學校的學員，剛畢業就被分配進東海艦隊，年輕氣盛，好大喜功，「階級敵人」抓得越多越好。他們不肯撤，非要抓出成效。而就在戴立清他們與東海艦隊交涉期間，植生所副研究院雷宏淑，1949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1969年1月18日被逼自殺。戴立清一再去支左辦，甚至找到東海艦隊副司令員高志榮反映情況，說你們再不撤，我們就自己把他們趕走，終於將這批軍宣隊全部請出科技系統。他們在科技界造成的後果是：2人被活活打死、4人自殺。10人被打成殘疾，另有9人自殺獲救。¹⁰⁵

1969年1月，經市革會批准，新組成的第二屆工宣隊進駐科技系統；2月9日，原於1968年9月進駐的第一屆工宣隊撤離。戴立清要求一拆「牛棚」，二建班子，三認真結案。2月17日，中國的傳統節日春節，各研究所終於將關押人員基本釋放，回家過年。

新的第二屆工宣團進駐後，在市革會「三辦」領導下，首先甄別「兩線一會」案。工宣隊負責專案工作的負責人，是原上海機床廠辦公室主任、老幹部周強華，他和第二屆軍代表田書堯一起做了大量周密調查。1969年5月，第二屆工宣隊向市革會「三辦」打報告，提出科技系統「大規模存在兩線一會案」的真實性很小，雖沒有直接說是假案，但其實就是懷疑該案的存在。到1969年10月，對該案639人甄別結案，並經市革會有關部門對「兩線一會」案作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結論，雖然不是徹底否定，但總算結案；¹⁰⁶ 而到1970年12月，又對1402人甄別結案。至此，絕大部分涉案人員都被結案。

105 造成嚴重後果的第一屆工、軍宣隊，文革後沒有受到懲處。相反，他們所造成的後果，文革後卻算到了戴立清頭上，戴立清判決書上的罪名之一，就是迫害上海科技系統人員。對此，戴立清和田書堯等都覺得不公正。

106 這是田書堯從當年的檔案中看到的。此外，葉永烈書中提到的彭加木案與李志俠案，與戴立清無關，都是市公安局辦案並關押的，戴立清告訴筆者，他當時雖然必需協助公安局，但卻不知案件的具體內容。

三辦成立不久，黨中央準備開第九次代表大會。市革會要三辦(科技組)報政策性調查報告。戴立清佈置辦內工作人員調研，上報了十九名知名科研人員情況。這十九名科研人員都是國際著名的科學家，有的是全國人大代表，有的是全國政協委員。他們當時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受到衝擊，有的被隔離。張春橋批示：落實政策。十九名科學家才恢復工作。

對在科技系統的工作，戴立清以後回憶：

在科技系統三年，我着重就是擦屁股，落實政策，為12月9日大會上我自己的那個講話擦屁股，用行動改正那個講話。¹⁰⁷

1969年戴立清入黨。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指定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和王洪文，負責華東地區的林彪案件清查。王洪文指定上海對空四軍的審查由戴立清負責，這是王洪文對戴立清的信任。有科技系統清隊的教訓，戴立清一再要求不准逼供信，不准出人命。不過還是有人自殺，後來總算搶救過來。但王維國的妻子杜桂珍在關押期間瘋了。專案組的成果是查出暗殺毛澤東計劃，這是空四軍軍務處處長蔣國璋交待的。這個內容後來王維國本人否認，史學界也有懷疑。不過戴立清表示，他當時不允許辦案人員逼供誘供，而且蔣國璋是由老幹部成波負責審查的，應該不會逼供誘供。他當時也對蔣國璋的交待心存疑竇，但按規定全部報送中央。後來中央文件中這部分內容，就是上海報上去的。

1973年，王維國專案基本告一段落，馬天水建議，調戴立清往上海在安徽皖南地區的「小三線」。¹⁰⁸ 戴立清去時，

107 筆者 2007 年對戴立清的訪談。

108 這是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判斷，認為蘇聯可能會與中國開戰，要求「備戰」，在他認為打仗打不到的山區建設備用工業體系，在四川建設「大三

小三線已經初具規模，但職工的生活保障沒有跟上去，戶口油糧關係、蔬菜肉類供應、子女上學，職工看病，等等，問題一大堆。那裏的職工都是上海各廠調去的，只有解決這些問題，才能使大家安心在那裏工作。此外，交通、生產、與當地政府和居民的關係，也都是矛盾。戴立清去「小三線」三年，解決了許多困難。到1976年，已經自成體系，獨立生產，而且開始上繳利潤，產生了相當效益，生產出援助越南的武器。但是，「小三線」建設本是宏觀決策錯誤。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調整外交政策，加上蘇聯瓦解，冷戰結束，「小三線」失去意義。這個本來最讓戴立清自豪的建設，就這樣成為歷史遺跡。

戴立清的臨時工身份，在1971年上海勞動局發文全面轉正臨時工時，轉為全民所有制工廠的工人編制。在他去「小三線」工作時，妻子被市革會特別批准，從蘭州調來上海工作。

戴立清在工總司總部被大家公認為能幹。他做事決斷，能吃苦，點子也多；甚至他的字也寫得很漂亮，被張春橋稱讚。早期工總司內一些比較難處理的「硬骨頭」，王洪文都交戴立清啃，例如砸「聯司」剛結束後的那幾天對上柴廠的善後，例如處理「老大難」單位的矛盾，等等。戴立清則認為王洪文為人正派，做事謹慎，像個共產黨員的樣子，值得信任；不似一些造反派那樣冒冒失失，也不像潘國平沒有肩胛。他說：

王洪文在我的接觸中，不是不學無術，不動腦子，而是比較正直，比較穩重，讓人信得過。缺點就是耳朵軟。他信任我，我不說死心塌地，也是堅定地跟着他，一心撲在他佈置的工作上。到頭來，跟得越緊，錯誤越大。¹⁰⁹

戴立清的個性比較露鋒芒。他的老造反意識十分強，尤其

線」。上海的軍工生產「小三線後方基地」選在皖南。

109 這是筆者文革後，問起戴立清對王洪文的印象，他這樣回答的。

對「工人造反派」身份和對文革強烈認同，對自己人忠心耿耿死心塌地，這使他給人以派性強的印象。他去安徽小三線，第一件事就是調查那裏有多少老造反。

戴立清和寫作組的知識分子合不攏，他不喜歡徐景賢和他手下的那批幹部，認為這些人長期在機關，習慣看上級眼色行事；他稱他們為「秀才」；「徐老三」這個綽號就是他和另外幾個工人造反派叫出來的。「半周年事件」和後來的「《朝霞》事件」，他都是帶頭髮難者。而寫作組的人對工人造反派看不慣者，除了陳阿大、潘國平外，就是王秀珍和戴立清，認為他們派性嚴重。

不過，戴立清對張春橋始終服貼：

他對我們來說就是正確的化身。一方面是因為他支持了工總司；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和主席的關係，上海工人運動的消息，都是他帶給毛主席的，他對我們說的很多話，我們也認為是從毛主席那裏來的。¹¹⁰

這也是其他工人造反派對張春橋的印象。

110 這是筆者文革後，問起戴立清對王洪文的印象，他這樣回答的。

第三十六章

新幹部 轉換了身份的造反派們 (下)

擋不住的誘惑

工總司總部從成立後不多久，就不斷地進行整風，也即為純潔隊伍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也是毛澤東一再提倡的思想教育手段。整風的內容，主要是思想作風、工作作風以及生活作風。工人造反派希望能如毛澤東教導的那樣，「保持工人階級本色」，防止重蹈「走資派」的覆轍。

在這方面，張春橋對這些新幹部的告誡是最多的。他的許多講話，尤其是對工總司總部成員們的講話，都是不斷的提醒和批評。例如針對工人造反派認為自己造反早，對恢復秩序後機關幹部重回權力系統不服氣的情緒，張春橋一再對他們強調：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思想是錯誤的。針對有些新幹部利用職權撈好處，張春橋多次批評。輕工業局下的上海秒表廠，1970年設計製造了新產品鑽石牌手錶，首批2000只試用錶，價格與當時120元的上海牌手錶比較，只有50元，憑票供應。許多新幹部向掌管輕工業局的馬振龍索要票子。張春橋知道後，立即批示：趕快刹住這股風，否則害了一批人。除了已經買了表的，發出去的手錶票都被收回。¹對於新幹部的換房風，張春橋也有過抑制。

而當上了各級領導的新幹部們，也對權力的腐蝕有過真誠

1 這是王腓利文革後對筆者回憶的。

的警惕。他們經常說：毛主席為我們撐腰，我們要為毛主席爭氣！工總司早期總部的整風，尤其對用公款吃喝或少付錢吃喝以及坐小車，有着較多抨擊，包括對王洪文、戴立清、潘國平等的批評。而王洪文也是虛心接受。坐小汽車、上飯館吃喝，被造反派視為「養尊處優」，「走修正主義道路」。這在葉昌明的工作筆記以及工總司總部整風會議記錄中，多有反映。²

而王洪文對自己也曾經有着嚴格約束。例如他弟弟王洪雙，在陝西當工人，1972年受單位委託，想通過王洪文在上海批點鋼材。王洪文當時不在上海，掌管工交辦的陳阿大一口答應給40噸。王洪文得知後馬上制止，使得王洪雙空手而歸。王洪文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後，王洪雙想從西北調進上海工廠，上海市勞動局為他辦妥調令。但被王洪文知道，立即阻止，說「如果所有的幹部親屬都調到上海或北京，那不亂套了嗎？」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後，一直在原來的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領取工資，據說這是他自己要求的。³

但是，這種保持「工人本色」的努力並沒有堅持多久。沒有制度監督的權力，對任何人都是巨大的腐蝕，即使是當初批判幹部特權的造反派們。尤其來自社會底層，生活本來就不寬裕的工人造反派們，更是無法抗拒改善生活的誘惑。

新幹部們最先改變的是居住條件。他們大多住在上海楊浦

-
- 2 金光耀著《一個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記錄：葉昌明的〈工作筆記〉介紹》。以及葉昌明工作筆記，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 3 據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對王腓利回憶，王洪文被捕後，她去取回王洪文的東西：其中有一個信封，裏面是四百多元現鈔。後來她探監時問王洪文是怎麼回事。王洪文告訴他，那是他剛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第一個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給他的工資。王洪文說，當時周恩來曾經問過毛澤東王洪文的工資如何發放，毛澤東說：「和你一樣」。周恩來便讓辦公廳按自己的工資標準給王洪文發工資。但工資交王洪文時，他不肯要，說我拿那麼多，下面和我一起出來的人怎麼辦？這個錢他一直沒有收下，他以後的工資一直都按他的要求，由上海他原來的工廠發給。但是這個錢已經發出並做賬，辦公廳不能收回，所以崔根娣去時，就作為王洪文的物件交給了她。筆者是聽王腓利說的。

區和普陀區的工人新村，房子大多是1949年以後新建的簡易建築，造價低廉，設備簡陋。他們住得非常擁擠，常常兩代甚至祖孫三代同居一室，幾戶人家合用廁所與廚房，還有的人甚至住在棚戶區裏。上海人俗稱「下只角」。與此對照的是上海西面徐匯、盧灣等區的「上只角」，那兒有大片花園小洋房和公寓大樓，過去的資本家、高級職員、高級知識分子和現在的黨政幹部，大都住在這個地區。雖然房子是由政府分配的，個人只有使用權，但當年的中國沒有私有財產，城市居民物質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住房。只要不成為政治運動對象，住房幾乎是世襲的，上一代所租的房子可以傳給子孫。在這個意義上說，住房在當時是歸私人永遠使用的公共財產。

工人新幹部住房是從1967年年夏天開始搬遷的。當時工總司與上海柴油機廠聯司的矛盾激烈，為防止聯司的襲擊，工總司總部主要成員在同一天晚上，全部搬出原來的住房，搬入地處「上只角」的房子。這些房子都是被形形色色的司令部佔領的原工商資產者或文化人的房子，房主已被掃地出門或壓縮所住房間數。這次匆匆忙忙的集體行動，成為改換住宅條件的開始，他們以後再也沒有搬回原來的簡陋住宅。十年中，工總司總部的主要負責人幾乎都搬過幾次家，黃金海、葉昌明、王明龍、謝鵬飛、張寶林、黃金海、戴立清等，都從原來的住處搬入「上只角」，改善了住宅條件。不過，除了陳阿大等少數人，大多只是改善型的，即由一間房擴大到兩間。

王洪文搬家在此次集體搬遷之前。還在1967年2月，王洪文只是群眾組織負責人時，他就從楊浦區的「窮街」定海路，搬到西區餘慶路花園小洋房裏，住了一個套間。1968年1月，他當了市革會領導後第二次搬家，在康平路的一幢公寓大樓裏獨佔了一層。1969年9月，他當了中央委員之後，搬進市委康平路大院。隨着地位的上升，以後在康平路大院裏又搬了幾次家，一次比一次更大更好。按照王洪文的職務，他所住的房子，市裏

有補貼，他只需按他文革前的房租數目支付。

陳阿大換房次數也很多：文革十年，搬五次家。1967年8月，他搬進淮海路上方花園的花園洋房，隨後又遷到華山路一幢小樓裏。1968年底，他住進常熟路上的瑞華公寓，佔了兩大套。1976年，他又搬到更高級的淮海路上新康花園的公寓式花園洋房，上海最好的房子之一，佔了五大間共130多平方米。他搬進去之前，強令房管部門修繕一新，花費了2600元。這在當年相當於陳阿大4年的工資總收入。這筆錢自然不是由他自己出。

除了工總司總部的頭頭，其他工人造反派們也紛紛想方設法通過各種關係，擴大居住面積。1971年，工總司總部曾經統計過工人造反派的調房情況。統計對象是「十個區和各工業、交通局的革委會委員，工總司各區、局聯絡站委員一級的工人新幹部(包括現已下台的)」，「據不完全統計，這一級的工人新幹部有共763人」，其中有97人調換了住房(包括已遷回原處的)，約佔13%。」⁴而經過陳阿大之手解決的造反派新幹部住房，有230套。陳阿大自稱「房總統」，抓着全市住房分配權。⁵

搬入新居者，房子擴大，條件改善，但房租仍然照搬遷前所住的房子租金繳納。王洪文和黃金海原來住的是「私房」，也即產權屬於自己的房子，都是自行搭建條件很差的房子。黃金海搬進的是南京西路上的一套三室的公寓房，搬進新房後，他倆都沒有支付所應支付的房租，差價部分，由市革會有關部門支付。這也是老幹部一向享受的「待遇」。其他搬進新居的工人新幹部，也是只想住大房子好房子，卻不願繳納高檔房子昂貴的房租，許多人少繳甚至不繳。直到1968年，張春橋要求新幹部：你們要住好房子，就得自己掏錢付房租，他們才開始

4 工總司1971年1月11日《關於新幹部調房情況的調查和處理意見》。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5 《解放日報》1977年11月20日。

支付。但也是盡量以文革前所交數額，繳納新搬房子的租金。

有人對陳阿大住房大有意見，陳阿大非常惱火：「老幹部住房，你們看不見，為什麼要向我出難題？這是對新幹部看不慣，過不去，這是對新幹部的態度問題。」文革並沒從制度上衝擊幹部的等級和待遇特權，所以王洪文、陳阿大等新幹部，一旦當上領導，都將這些「待遇」看作理所當然。

上文提到的工總司總部調查報告說，

新幹部調房後，欠租情況比較普遍。在這97名調房的新幹部中，不同程度欠租的就有59名，約佔61%。欠租百元以上的有二十餘人，欠租最高的達500元左右。在群眾中造成很壞的影響。欠租的主要原因，是一些新幹部不顧自己的經濟條件，住進了好房子，而無力支付較高的房租。⁶

革命名份換來的不但是房子，還有工資補助。王洪文在國棉十七廠(文革中改名上棉十七廠)當保衛科幹事時，工資是64元。當上市革會領導後，工資還是原來的水平，人事關係也仍然在國棉十七廠，由廠裏給他發工資。不過，這點工資不夠開銷。馬天水回憶：

1968年，在十二中全會期間，要辦公室寄二百元給他，上海寄出了。……

後來，他要的補助越來越多，我們雖有抵制，但抵制很不力。開始沒有限制，後來限制七十、一百，後來一百五六，不斷增加。⁷

6 工總司1971年1月11日《關於新幹部調房情況的調查和處理意見》。

7 馬天水1976年11月5日《我的揭發交代》，上海市區、縣。局黨員負責幹部會議秘書組1976年11月18日印發。

以後，由市革會辦公室每季度給王洪文發放「生活補助」200至300元。這樣，加上上棉十七廠發的工資，每月共130至160多元，相當於上海十二至十四級幹部的工資。王洪文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沒有拿副主席的工資，還是在廠裡領取原來的工資；上海方面又將給王洪文的「生活補助」每季度增加到500元。據統計，從1971年到1976年8月的五年零八個月，共補助1.1萬多元；其中1974年到1976年8月的兩年八個月，共補助七千多元。除此而外，王洪文還向上海報銷許多開支，包括做衣服，配眼鏡。對其他調去中央的上海新幹部也是這樣。馬天水說：「他們在北京很辛苦，中央沒有人管」。他指示，給去中央工作的上海工人幹部尤其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如金祖敏等發補助。於是每人每年一般補助二百多元，多者每年近千元。⁸ 而據說，除了上海的補助，中央也給這些當了中央領導的工農幹部每月一百元津貼。

為了這些新幹部的職級與工資不匹配的問題，1975年1月王秀珍去北京參加四屆人大會議期間，曾特地向張春橋彙報關於上海對調去北京的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生活補貼問題，請示說，他們生活有困難，是否繼續發給補助，還是由中央直接管。張春橋表示，這些事情本來都應由中央組織部分管，但組織部的工作現在還未開展，以後再說。⁹

在上海工作的新幹部，也可以享有特殊補助，這是經張春橋同意的。上海也有給新幹部的特殊補助，是張春橋同意的。新幹部當了領導，卻還是工人編制，從原來工作的工廠領着原來的工人工資，一般每月只有五六十元，而擔任同樣職務的老幹部工資一般都在一二百元以上。張春橋1971年曾經說過：新幹部工

8 張敬標 1977年1月7日《我的揭發交代》，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室 1977年1月24日印發。

9 這是王秀珍告訴筆者的。她說是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對她說的。吳桂賢告訴王秀珍，中央給陳永貴、吳桂賢等擔任中央領導的工農幹部每月100元的津貼。王秀珍認為以王洪文的職務，也應該有這個津貼的。

資沒有調整過。所以他們生活有困難時可以補助，於是由王秀珍批准便可支付。陳阿大自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文革結束，每年兩次補助，每次八十至一百元。¹⁰ 而其他工人造反派的補助則大都是一次性的，主要是大病診療費一類的應急性臨時補助。

對於文革中被提拔的新幹部的工資標準，據說1973年或1974年左右，有關方面曾經請示過周恩來。周恩來指示：可以比他們原有的工資高一點，但比現在所擔任職務的工資低一點。¹¹ 如果周恩來確實有過這樣的指示，那他的意思顯然是：可以適當增加一些，但不要加到同級幹部的工資標準。

比起許多老幹部讓子女參軍，躲避上山下鄉；或者通過各種關係被「推薦」上大學，上海的新幹部在這方面「走後門」的情況不多。1975年黃金海的兒子中學畢業時，正逢北海艦隊招兵，部隊願意作為特例（也即開後門）將黃金海兒子招去。但黃金海不同意，要兒子按照正常途徑報名參軍。結果因為體檢沒有通過，兒子和同學們一起被分配去上海郊縣農場。戴立清的兒子也是這年中學畢業，也去了郊縣農場。¹² 這體現出新幹部們真心實意努力嚴格要求自己的一面。當然，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因為新幹部們的子女大都還在上中學，面臨畢業分配的很少。即使去了農村，一二年後文革就結束了，還來不及開後門離開農村。

186個老頭頭調查

工總司及後來的市總工會，曾經幾次調查造反派的情況。較大規模的有五次。第一次在1967年底，為即將召開的「造反派代表會議」作調查。根據工總司常委會決定，「對本司令部

10 張敬標 1977年1月7日《我的揭發交代》。

11 這是戴立清對筆者回憶的。他說是在一次幾個工人新幹部議論工資時，聽金祖敏說的，王秀珍也在場。筆者後來為此專門問過王秀珍，王秀珍說，那是對中央的工農新幹部的。而且高多少低多少，也沒有明確規定。

12 這是黃金海告訴筆者的。

所屬各區、各系統的領導核心人員的政治情況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從1967年12月31日始，到1968年1月20日止，共調查27個部門和系統共449人。調查結果：「有問題的260人」。¹³ 前面關於「清隊」的章節已經提及。

第二次是1969年4月至5月間，主要是調查造反派新幹部犯錯誤類型，以及其中一些人被審查、拘留、逮捕情況，為辦工人政校、對工人造反派進行政治教育和培訓提供參照。¹⁴ 經市革會同意，同年8月26日上海市工人政校開辦。1969年。毛澤東在審查主席團名單時，提出要將老幹部徐海東大將放進名單，這也是周恩來提議的。王洪文便提出也要對老造反落實政策，從北京打電話給馬天水。4月18日，市革會王承龍向工總司總部的葉昌明等傳達了王洪文的這一指示，說王洪文要求將當時拘留在公安局的幾個老造反釋放。王承龍並告訴葉昌明等說，市革會已經通知了市公安局，你們去將他們接出來。這些人包括工總司徐匯區聯絡站頭頭周妙興和謝訓林，工總司閔行地區聯絡站頭頭趙萬和，工總司南市區聯絡站頭頭袁根林，工總司手工業局聯絡站頭頭黃文海。這五人都與武鬥有關，同時又涉及其他問題¹⁵。但是，除了武鬥，其他問題後來都查無實據。他們因此都被釋放，拘留期間工資按王洪文批示，全部補發。據市總工會統計，這樣的案子，市總工會的專案組從1972年3月到1976年10月，共復查了86件。¹⁶

第三次調查從1969年12月至1970年1月，調查對象是造反派新幹部，統計有多少造反派被提拔當了各級黨政幹部，向當時的整黨建黨提供造反派新幹部基本情況。調查內容除了年齡、

13 工總司《專案調查情況報告》，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14 工總司情況組1969年4月19日《關於原各區、縣、局聯絡站常委以上被拘留、逮捕的情況報告》，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15 葉昌明1981年1月26日，引自葉昌明私人筆記。

16 《上海文革史話》(未刊稿)第588頁。

籍貫、工齡、受教育程度等常規內容外，還有「造反時間」、「文革前職務」以及「文革中擔任的職務」。這次調查規模較大，幾乎涉及工業、交通行業所有的主管局、所屬公司及工廠。¹⁷

第四次在1971年至1972年間。1971年林彪出逃事件之後，中央發出45號文件，要求落實對群眾組織的政策。王洪文指示，駐上海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是林彪的人，上海公檢法過去是空四軍軍管的，「鎮壓了不少造反派，我們要趁批林整風的機會，把這些案子搞清楚」。於是，總工會設立了「專案復查組」。葉昌明親自給專案組開列調查對象的名單，要求對於曾經或正被審查、拘留、關押、判刑的工總司各聯絡站的「老頭頭」，以及老造反中的知名人物都作調查。¹⁸ 還調查了知名老造反。這次調查後，正值1973年初籌備召開上海市第五次工代會，被調查老造反中的潘國平、張寶林、岑麒麟、徐美英、戴祖大、繆南生等，後來都當上五屆工代會委員。

第五次調查在1974年10月以後。1974年9月17日，毛澤東要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對陳丕顯的處理，一直壓着陳丕顯不放的張春橋，只得「解放」陳丕顯，前面關於幹部解放的章節已述。但是，在「解放」陳丕顯的同時，10月9日和10日，王洪文自北京分別打電話給徐景賢和王秀珍。王洪文說：「陳丕顯要解放了，你們趕快提一批一月革命風暴中的老頭頭名單出來，落實政策，這是給陳丕顯看，他的對手還在」。¹⁹ 王洪文的這個指示，實際來自張春橋。10月市革會工交組負責人黃濤赴北京參加全國計劃工作會議，會議結束後，張春橋、姚文元將他叫去，告訴他毛澤東對陳丕顯的批示。接着又說：

17 工總司1969年12月至1970年1月《新幹部統計表》，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18 葉昌明1981年1月26日，引自葉昌明私人筆記。

19 轉引自上海市總工會運動領導小組1978年1月25日《上海市總工會清查情況專題匯報之七——關於「四人幫」及其餘黨通過上海市總工會安插親信、包庇壞人的清查情況》。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還有一個問題，回去同馬、徐、王談一下，市委要把陳丕顯的那些老對手，如鐵路的謝鵬飛、港務局的梁飛，兩個「飛」，還有小潘——潘司令這些人這些老造反，陳丕顯的老對手，對這些人的工作要有個安排！不然，陳丕顯出來了，又神氣起來了，而他的那些老對手還一個個地在下面勞動！這件事，在陳丕顯放出來之前就要辦好，陳出來後，知道一月革命時他的老對手，不僅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在，而且「兩飛」、小潘也都還在！²⁰

張春橋要求，「凡是面對面與陳丕顯作過鬥爭的，如潘國平、謝鵬飛、梁飛²¹、林波²²、霍達²³等，立即安排」。²⁴馬天水接到王洪文電話，立即開會傳達，當場擬了個名單。但是由於會議是臨時召集的，手邊資料不多，最後決定由市委組織組負責人王日初和市總工會的葉昌明，分頭趕排名單。他們連夜突擊擬定了147人名單，交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審閱。馬、徐、王又修改補充，增加了一批紅衛兵名單。《181個文化大革命初期群眾組織老頭頭的名單》，名單編號時錯誤地將5個編號重複了，所以實際為186人。²⁵

這些人中，屬於工人造反派的有132人。其中有工總司的謝鵬飛、潘國平、范佐棟、丁德發、黃文海、蔣周法、張伯生、潘國平、耿金章、張寶林、王腓利、岑麒麟、徐美英、周國

20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話》(未刊稿)第379頁。

21 梁飛，原上海港務局第二裝卸區調度員，文革初期的「工總司海港指揮部」負責人；文革中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上海港務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文革結束後被判刑8年。

22 林波，原上海體育學員學生。

23 霍達，原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生。

24 《上海文革史話》(未刊稿)第590頁。

25 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辦公室」1981年2月《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王秀珍、徐景賢罪證材料》附件。

庭、傅世爾、梁飛等；也有一、二、三等兵團的耿金章、孫玉喜、戴祖祥、陳鴻康、陶國正等。還有工總司區、縣、局聯絡站的頭頭。此外，屬文教、衛生、科技系統及市委、市政府等機關的群眾組織21人。其中有：公革會的王維章，上體司的胡永年，上藝司的劉貴琴、劉軍一，上醫司的陳廣煊，小教司的楊軍，版司的朱伯生，科司的林光遠、農司籌的夏桂伯、機關聯絡站的程綺華，還有文匯報社的朱錫琪、邵傳烈和周國榮，等等。財革會及其所屬組織15人：其中有宋有福，王志品。紅衛兵18人。其中紅革會有勞元一、馬立新、李功佐，賀學軍、繆財生、霍達等，炮司有周谷聲，不過沒有胡守鈞；交大反到底有嚴步東、余小兵，還有紅西南、紅反會、紅東北、紅中技的頭頭。²⁶

根據表格顯示，這些人「下去」的原因中，最多的是：「生活腐化」、「男女關係」，文革中，這兩條實際是指婚外性行為或性關係隨便；加上「姦污婦女」，共24人。「分裂工人運動」13人，這主要是指文革初期參加過一、二、三兵團、工三司以及雙造司、聯司、支聯站等；有「攻擊性言論」者11人，所謂「攻擊性言論」，其實就是對時局或台上領導人如毛澤東、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等不滿的私下議論；參加過炮打11人，主要是紅衛兵及文匯報社的朱錫琪等；有「貪污」和「盜竊」行為的4人；「派性嚴重」者3人。此外，還有「表現很壞」、「個人品質差」等。²⁷

1974年10月11日上午，名單由康平路印刷廠印刷10份，其中3份立即由市委派兩名幹部第二天乘飛機，送去在北京的王洪文。然後，王日初即向市總工會要去了潘國平、謝鵬飛、傅世爾、梁飛4人的單項資料；不幾天，便以市委組織組名義，對

26 上海市總工會1974年10月11日《181個老頭頭調查》。此表格實為186人，因序號編錯，題目寫成181人。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27 筆者根據《181個老頭頭調查》表格統計，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這4個在基層勞動的「老頭頭」「落實政策」，安排去有關部門：潘國平提為市總工會常委，參加市總工會辦公室工作；謝鵬飛和傅世爾雙雙提為上海鐵路局、上海鐵路分局的革委會副主任；梁飛提到港務局基建組工作。1974年11月，市總工會佈置對27名「老頭頭」落實政策，其中包括耿金章、岑麒麟、王腓利、黃文海、宋有福、嚴步東。接着，市總工會又佈置對186人的現狀，每人都調查了解，以單項材料形式上報市委。內容除了簡歷、成份、家庭出身、社會關係等本人概況外，主要是文革中的政治表現，以及「下去」原因。到1975年2月，調查了141人。後因籌備全國工會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召開而暫停。²⁸

這次調查的結果，一方面給這些「下去」者明確結論；另一方面，建議和推動所在單位黨組織為其中一些人轉換身份，將他們提到各級領導或科層辦公室位置，不再在下面「勞動」。據市總工會1975年11月的一份報告：

我們從去年至今年年初，對在文化大革命中擔任過區、縣、局一級聯絡站領導工作，後因各種原因受過審查的105人的情況作了初步了解。除9名戴帽(即戴着「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的政治名份——筆者注)、一名判刑、2名在押待刑外，尚有93名經審查，絕大多數有了結論：

93名中，由各級黨組織根據其本人問題的性質和政治表現，已安排了一定工作的有40名，佔43%，其中安排工作與原職務相當的有22名。……

另有18名安排在基層單位擔任一定的領導工作。²⁹

28 以上資料主要引自上海市總工會運動領導小組1978年1月25日《上海市總工會清查情況專題匯報之七——關於「四人幫」及其餘黨通過上海市總工會安插親信、包庇壞人的清查情況》，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29 上海市總工會組織組1975年11月18日《關於新幹部落實政策的情況》，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報告中的「與原職務相當」，意為與下去勞動前的職務相當。又據文革後的資料顯示：這次以給陳丕顯製造對立面為理由，重新起用的老造反，共有70多人。³⁰

重新被起用的謝鵬飛

謝鵬飛是被重新起用者之一。謝鵬飛在工總司籌備會議上，因自覺「出身不好」，將主席團成員名額讓給了同廠的蔣周法。所以後來他連工總司和之後的總工會委員都始終不是，在工總司和總工會的重要性，不及黃金海和戴立清。他的新幹部之路，有一段曲折。1967年的「一月革命」中，謝鵬飛是「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負責人。在1967年初社會秩序和經濟生產一片混亂之際，代行了幾近癱瘓狀況的市委、市人委的部分職責，解決了許多突發事件，對扭轉當時的生產混亂局面起了很大作用。張春橋對火線指揮部很稱讚，說它是「經濟蘇維埃」，可以替代市政府。³¹有張春橋的讚許，謝鵬飛擴大火線指揮部建制，人員也擴展到一百多。但是，僅僅一個月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火線指揮部的職能被大大縮小，成為公社下面的一個臨時機構，只負責一些生產方面的突擊性工作。徐景賢讓交出火線指揮部圖章，謝鵬飛只好照辦。負責保管圖章的火線指揮部工作人員在交出圖章時，眼淚都落了下來。1967年4月5日，火線指揮部撤銷。

謝鵬飛沒有想到火線指揮部這樣快就被撤消，張春橋也沒有向他解釋為什麼要撤消。他回到自己原來工作的上海鐵路系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後，謝鵬飛是市革會委員，回鐵路

30 《上海文革史話》未刊稿第380頁。

31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1994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第246頁。本節內容，除注明的外，主要來自筆者2013年1月6日對謝鵬飛的訪談。

之後，市革會委員的職務保留。當時鐵路很亂，沒有成立革委會。謝鵬飛是工總司上海鐵路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簡稱「鐵聯」)的常委。鐵聯的負責人是萬金榮，和謝鵬飛都是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的工人，當初一起造反。有了曾經在市裏火線指揮部工作的經驗，3月29日，謝鵬飛在鐵路系統推動成立了「上海鐵路局生產第一線指揮部」，報中央鐵道部，4月13日，鐵道部予以批准；只是將名稱稍作改動「上海鐵路局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並任命謝鵬飛為主任。

但是鐵路系統反對造反派的勢力很強大，鐵路局本來就是上海工人赤衛隊的發源地，老保組織雖然被解散，但他們從來沒有服氣過。加上造反派方的鐵聯負責人萬金榮、周國庭等，一方面派性嚴重，壓制不同意見和派別；另一方面自身道德形象較差。反對他們的大標語貼到市革會：「鐵聯滾出上海鐵路分局」。謝鵬飛向張春橋反映，張春橋在一次公開講話中鮮明地支持謝鵬飛：

從革命群眾方面來說，我覺得也應該採取正確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因為我剛才說了，這些同志，他們原來也是一個普通的工人，一般的幹部、學生嘛，他們也沒有工作經驗嘛……對待王洪文，總不能像對待陳丕顯、曹荻秋一樣啊。徐景賢，我看總還是比陳丕顯、曹荻秋好吧，應該作一些這樣的比較嘛。就是像謝鵬飛，有時候他有一股闖勁，有時候也闖點禍，但比起來，我就覺得像謝鵬飛這樣的同志，比起原來的那些局長、黨委書記，要好多了。³²

那天謝鵬飛還沒回到鐵路局，已經有人將這段講話抄出，貼在鐵路局大門口，還刷出大標語：「堅決擁護張春橋同志講

32 《張春橋同志 1967 年 6 月 3 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報告會上的講話》，原件無發文單位，但從印刷排版來看應是上海市革會印發。

話」。後來，謝鵬飛他們乾脆將張春橋的這段講話的錄音在鐵路局門口播放了好幾天。就這樣，一有鐵道部任命，二有張春橋撐腰，謝鵬飛在上海鐵路系統掌握了權力。1967年上半年，全國各地兩派爭鬥不斷，鐵路運輸中斷。這期間，謝鵬飛三次受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之託，赴外地解決疏通鐵路運輸問題。第一次是在浙江金華，兩派鬥爭，鐵路中斷，謝鵬飛派傅世爾去，經勸說，終於通車。第二次是在江蘇南京，江蘇「好派」和「屁派」兩派武鬥，打得鐵路中斷，上萬乘客滯留南京火車站。謝鵬飛帶了八九百個人，開了專列去南京，帶去的人從扳道工、調度員、列車員、賣票員、服務員，到機務段、工務段工作人員，全套鐵路工作班子，一到南京馬上開展工作。十幾個小時後，第一列車發出，周恩來特地讓秘書打電話來上海表揚了謝鵬飛。³³第三次是在蚌埠，地方造反派衝擊鐵路造反派，將鐵路造反派打出鐵路。鐵路造反派將十七個火車頭頭尾連接，一路逃到南京。蚌埠車站沒了火車頭，交通於是中斷。謝鵬飛接到周恩來辦公室通知後馬上去蚌埠，和當地軍隊一起出面召集兩派負責人共同解決通車問題：誰恢復鐵路運輸，誰就是革命派，我們就支持誰。在軍隊調停下，雙方終於同意首先恢復通車。

周恩來對上海的鐵路工作相當滿意，在鐵道部的工作會議上多次表揚上海。1967年6月，贊比亞總統卡翁達來華訪問，6月25日到上海，周恩來陪同。安排妥當卡翁達總統的住宿後，特地將謝鵬飛叫去錦江飯店南樓13樓，單獨談了半小時。這是謝鵬飛第一次近距離見到周總理並和周總理面對面交談，他非常激動。周恩來問謝鵬飛是哪裏人，謝答說是浙江紹興人。周恩來說，我們都是魯迅同鄉。謝鵬飛向周恩來匯報「上海鐵路局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的工作情況，周恩來說，鐵路是國民經濟的重要命脈，一定要保證暢通；對上海的鐵路情況

33 這是蕭木對筆者回憶的。

我是比較放心的，上海鐵路的革命和生產搞得都很好。談話結束後周恩來離去，謝鵬飛送到樓下大門口，目送周總理的老式別爾克防彈車開遠了，他還站在原地不動，腦子裏都是剛才周總理對他說的話。以後，周恩來每次見到謝鵬飛，都馬上認出他，叫出他的名字。

周恩來對上海鐵路的好評，還可以從鐵路的軍管情況看出。1967年的上半年，自一月奪權之後，各派群眾組織紛爭，全國鐵路運輸更是無法正常運行。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文，對鐵道部實行軍管；6月12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決定，除中央特許者外，對全國鐵路實行全面軍管。這個「中央特許者」，就是上海。在全國鐵路所有的路段都被軍管的情況下，唯獨上海的鐵路沒有被軍管。³⁴ 7月17日，上海警備區派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路局，但不是軍管，只是軍宣隊。這是張春橋建議，周恩來特許的。³⁵ 這顯示了周恩來和張春橋對上海鐵路系統造反派的信任和期望。張春橋後來對此回憶說：「中央在討論鐵路軍管的時候，是決定了全國鐵路都實行軍管。但那個時候，我有一個想法，是不是可以創造這樣的經驗，有的路局、分局不軍管，也可以把事情做得好。中央採納了我的意見。那個時候，據我看，上海鐵路形勢不錯，有可能不通過軍管。」³⁶ 在全國鐵路一片混亂之際，謝鵬飛管理下的上海鐵路系統，給了張春橋為文革樹立正面秩序形象的希望。張春橋一直很欣賞謝鵬飛。1967年7月21日左右，毛澤東從武漢到上海，張春橋要謝鵬飛指揮調度。

34 上海鐵路是中央特許不實行軍管的解釋，引自張春橋 1968 年 1 月 8 日下午在：「熱烈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上海鐵路局、上海鐵路分局」大會上的講話。

35 周恩來在 1967 年 12 月 28 日接見鐵路運輸系統造反派和軍管會代表以及南京大學兩派代表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6 張春橋 1968 年 1 月 8 日下午在：「熱烈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上海鐵路局、上海鐵路分局」大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的專列停靠在天目西路、西藏路的老北站。毛澤東出了列車，謝鵬飛才知道他剛才的調度是為毛澤東的專列。如果不是身邊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對毛澤東的立正敬禮提醒了他，他差點激動地喊出「毛主席萬歲」。毛澤東在上海近兩個月，其間去了浙江又回滬，行程極其保密，只有極少數人知道；整個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中，更只有謝鵬飛參加了全程工作。顯示張春橋對他的信任，而謝鵬飛也確實不負信任，以後十年文革中，從沒有對任何人提起他與毛澤東的接觸，他守得住秘密。

1967年6月底，謝鵬飛召開上海鐵路分局幹部大會，從科級幹部到局級幹部都參加，請王少庸到會現身說法，講他是怎樣從不理解文革、看不慣造反派，到投入文革、支持造反派的。大會後，除了上海鐵路局長兼分局長邵光華堅持不肯表態；一大批幹部表態說要響應毛主席號召造反。有熟悉業務的幹部們支持，謝鵬飛的工作開展得順利多了。

但是上海鐵路系統的穩定只維持了半年多。以謝鵬飛為首的工人造反派掌管的上海鐵路系統，最終沒有跳出造反派的通病：派系對立，武鬥不斷。上海鐵路系統有兩派，謝鵬飛支持的是大派，另一派和工總司處理鐵路問題的王明龍關係較近，兩派誰也不服誰。1967年八·四砸聯司之後，鐵聯也以砸支聯站為名，衝砸反對派組織。8月7日，砸了閘北區的對立面組織，8月12日又砸楊浦區的對立面組織。8月20日，鐵聯的另一對立面組織盧聯南站大隊，將鐵聯打出了南站。8月24日晚，鐵聯開會，決定攻打南站「收復失地」。這次會議，謝鵬飛沒有參加，他當時正被市革會集中在市裏開會一周，不知道。他後來回憶說：「我要是在，肯定會制止。我們已經掌了權，再去打人家做啥，招安就行了；打只會激化矛盾。」況且他們自己當初造反時也被關押過，不能掌了權就隨便關押別人。但他的這些想法被一起造反出來的同事們視為「右傾」，「造反精神不如當年」。8月25日武鬥結果，重傷一百人左右，三人重傷搶救

無效，相繼死去；整個南站停產許多天。本書第26章已有詳述。

南站武鬥，是1967年間上海發生的大武鬥之一。死傷那麼多人，而且都是在對方投降後挨打的，對方要求追查責任。鐵聯內部也因此分為兩大派。兩派嚴重對立，影響生產，列車頻頻無法正點，裝卸站貨物經常積壓。1967年底，許多車輛被壓在上海無法通車。周恩來不得不提出，上海鐵路也要實行軍管。³⁷ 12月28日，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失望地對上海鐵路局的代表說：「現在全國鐵路就是上海沒實行軍管，你們上海應該為全國作出很好的榜樣嘛」，「你們自己也在鬧，上海也要軍管！」1968年1月8日，上海警備區對上海鐵路局和上海鐵路分局實行軍管。4月30日，上海鐵路局革命委員會成立；5月2日，上海鐵路分局革命委員會成立，路局和分局的局革會主任都是軍人。謝鵬飛被安排為路局和分局局革會的常委，傅世爾是路局和分局的局革會副主任。軍管會原來的安排，謝鵬飛是只是分局和路局局革會委員，名單送上海市革會審查時，市革會將謝鵬飛改任為常委。1968年清隊開始後，5月間，鐵路局軍管會決定謝鵬飛「回廠勞動」，分局和路局的局革會常委職務仍保留，局裏或市裏開會時仍參加；傅世爾也同時回廠。謝鵬飛回到原來工作的鍛工車間，重新當普通工人，做原來的鍛工工作，在廠革會他沒有職務。其間，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他差點被軍管會作為運動對象，後來還是市革會的王少庸、馬天水等保了他。就這樣，他在廠裏當了五年鍛工。

但張春橋沒有忘記他。1974年10月，張春橋要求安排陳丕顯的「老對手」時，特地關照，將謝鵬飛從上海鐵路局、上海鐵路分局的局革會常委，提拔為路局和分局的局革會副主任，而且名字放在同是副主任的傅世爾前面。³⁸ 傅世爾也是因安排

37 周恩來在1967年12月28日接見鐵路運輸系統造反派和軍管會代表以及南京大學兩派代表講話，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8 這是朱永嘉當時告訴謝鵬飛的；謝鵬飛在接受筆者採訪時，告訴筆者的。

「老對手」，和謝鵬飛同時回分局生產組的。不過，此時的上海鐵路系統已經有一批新人擔任了領導工作，都是軍管會這些年培養的，大都不是造反派。回到鐵路局的謝鵬飛他們，已經不能再像1967年時那樣起大的影響了。謝鵬飛負責分局的基建工作。1976年初，市革會組織組將謝鵬飛叫去，讓他填寫了一堆表格，說中央讓報送謝鵬飛的個人材料。而在此之前，張春橋1975年底，曾經在一次談話中說，有人給他寫信反映謝鵬飛父親曾經受聘國民政府專員的問題，「他們很會找時間，這個時候寫材料來。不過我就是要用他！」³⁹ 中央索要謝鵬飛的個人材料，顯然是為了提拔他。謝鵬飛將被擔任什麼工作？因文革結束，沒有結果。不過文革後有傳說，說可能是安排他去國務院鐵道部，擔任領導職務。⁴⁰

幾上幾下的潘國平

潘國平也是為給陳丕顯樹立對立面而被重新起用者。潘國平1968年因與多名女性發生關係之事被工總司總部審查，以後雖然還保留着工總司總部常委的職務，但回廠勞動。

1969年12月7日至1970年2月19日，工總司總部又對潘國平進行第二次審查。這次是「隔離審查」，潘國平被關在市總工會大樓的一間小房間裏。原因主要是「經濟問題」、「男女關係問題」、參與1968年的4.12炮打問題，「妄圖分裂上海工人隊伍」，等等。「經濟問題」，包括變賣抄家物資的手錶，多次虛報對方單位已經付了錢的出差機票，倒賣走私的進口照相機和手錶，利用軍車倒賣福建的木材，等等，共獲利近幾千元。⁴¹

39 這是蕭木文革後告訴筆者的。

40 這是朱永嘉文革後告訴筆者的，但他忘了是從哪裏聽來的。

41 上海市總工會 1975 年 10 月《關於潘國平問題的摘要材料》，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當時潘國平月工資45元，加5元附加工資，幾千元是個不小數目。審查結束後，兩條處理意見：一下放勞動，二經濟上退賠。還因為審查出這些問題，1973年4月，上海市第五次工代會上，原來是四屆工代會常委的潘國平，只是五屆工代會委員，沒有被列為常委。

不過，1971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報批的市革會委員名單中有潘國平，據說是張春橋提名的。⁴² 1972年11月2日下午，張春橋在接見上海工代會部分委員時，特地和潘國平打招呼：

小潘你可記得，主席還是記得你小潘的，我們總之對你還抱希望。⁴³

1974年10月，張春橋指示安排陳丕顯的「老對手」工作，潘國平是被特地點名者之一。市總工會隨即將潘國平調整為市總工會常委。11月17日，潘國平被通知回市總工會工作。其間，王秀珍打電話給王洪文，建議將潘提為市總工會副主任，說這樣更可以體現對立面，但王洪文說，潘國平擺個總工會常委就夠了。⁴⁴ 王洪文這樣表示，一方面也因為他實在太了解潘國平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潘國平有關係的女性，僅查實的和他自己承認的，發生性關係的13名，其中有些是他利用職權強迫的；猥褻15名。⁴⁵ 王洪文說：「就憑這些，放在別人身上，起碼判刑15年」。王洪文曾經是工廠的保衛幹部，他對刑律是了解的：當時的「流氓」罪，就是針對此類案件。

潘國平被提為市總工會常委後，葉昌明將他安排在總工

42 王秀珍 1980年12月29日。

43 上海市工代會 1972年11月2日會議記錄，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44 王秀珍 1977年2月19日。

45 上海市總工會 1975年10月《關於潘國平問題的摘要材料》，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會辦公室工作。但是，一年不到，1975年10月21日，潘國平又被第三次審查。這次審查，除了新的「經濟問題」、「男女關係問題」之外，又加上潘國平被人揭發的「攻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同志」。潘國平說王洪文膽小、馴服，沒有能力，當副主席只是過渡，將來接班的是江青和張春橋；說張春橋有野心，會耍政治手腕，把我潘國平當一張王牌，去和王洪文抗衡；說江青是武則天；說自己落得「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謀臣亡」的下場。⁴⁶ 說「只要王洪文在台上，我就不會翻身。他是我最大政敵」。⁴⁷ 潘國平還對時局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潘說「我們對美、蘇的譴責與批判完全是無中生有，是雞蛋裏挑石頭，是為了轉移人民的視線，緩和國內外階級矛盾和緊張局勢，採取嫁禍於人的方法」。……

潘污蔑「我國現在面臨經濟危機，全國動亂不定，上層內部分裂，爭權奪利，人民沒有政治權利和民主自由」。……

潘揚言他奪權以後，要「還政於民，縮小打擊面，減少政治犯，做到讓人民有言論、行動的自由，實行真正的民主」。潘還認為經濟繁榮必須「積極引進外國資本，不搞單方面援助」。還要「縮減軍隊，減少開支，增加工資，提高人民生活」。在對外關係上，潘說：「特別要和蘇聯緩和緊張局勢」。……

潘本人交待：在與顧金談話時講過：「要是叫我搞經濟建設，可以適當考慮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和投資，我們還可以吸收國外華僑的投資」。⁴⁸

46 《1970年對潘國平審查認定的主要問題》，原文為上海市總工會1975年10月《關於潘國平問題的摘要材料》中的第一段，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47 金秀水等1975年2月19日《向中央王洪文反映的潘國平的問題》。

48 上海市總工會1975年10月《關於潘國平問題的摘要材料》，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這些思想和議論，在當時非常大膽前衛，是對不斷階級鬥爭的否定。潘國平和一些部隊幹部以及高幹子女接觸較多，受他們影響較大。只是這些言論，全被他生活上的負面形象否決。

這次審查為時兩個月，仍是「隔離審查」。後王洪文說，讓小潘回家過年吧。1975年12月31日，審查結束。市總工會作出三條處理決定：一、撤消潘國平總工會常委之職，並將所犯錯誤在工會系統通報；二、經濟上退賠；三、下去勞動，但換一個工廠。換廠是因為潘國平工作的上海玻璃機械廠黨委反映，潘國平回廠勞動，工廠和車間都管不了他；陳阿大聽說後說那就去我們廠吧。1976年1月2日，潘國平去了良工閥門廠「勞動」。葉昌明特地將這三項處理意見，向市委書記們寫了小範圍的報告。但始終沒有回音。1976年2月，王秀珍告訴葉昌明，王洪文說對潘國平還是要團結教育，可以讓他參加總工會常委活動。但葉昌明表示這樣不大好辦。於是最終，潘國平的市總工會常委之職沒有撤去，但常委會議不再通知他參加。⁴⁹

張春橋曾經對潘國平有個評論：

這人很年輕造反有功，對上海工人運動是有功的，這一點我們不會忘記的。這人的家庭對他影響很大，從歷史的來看也是這樣，他當兵不長，做工也不長，工人階級的品質在他身上沒有體現。你們要研究一下，老造反不一定都不垮台……從工總司成立大會算起，已垮了一些人。⁵⁰

其他老造反的文革經歷

王明龍文革中的經歷，可以說是大起大落。他在1967年的一月革命中作為王洪文的代表，起了很大作用。他是黨員，辦

49 這是葉昌明告訴筆者的。

50 張春橋 1969年5月30日在關於區革委會領導班子狀況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

事穩重，王洪文始終很信任他。張春橋原來對王明龍的印象不錯，尤其他負責「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工作，向張春橋匯報時，思路清楚，重點突出。而作為王洪文的代表組建上海人民公社時，也顯示出較強的工作能力和協調能力。在工總司總部，王明龍和黃金海、戴立清、葉昌明四人的工作能力，被認為是比較突出的。

1967年初的「三軍座談會」事件，王明龍替王洪文攬下了責任。但這件事使張春橋改變對他的看法，說這樣的人不能在市革會工作。張春橋後來對王秀珍說，「王明龍這個人不可靠，野心很大，在人民公社時，就想搞宮廷政變，對他以後再也不能重用」。張春橋所謂的「宮廷政變」就是指那次三軍座談會。王明龍文革前在廠長辦公室當秘書，張春橋就說他沒有當過工人，要他回廠勞動。王明龍只能離開市革會，但他始終沒有說出「三軍座談會」事件中，是王洪文叫他去找李彬山開會的。⁵¹ 離開市革會後，王洪文沒讓他回廠，親自安排他擔任工總司總部交通組副組長。當時鐵路的兩派越來越對立，王洪文派王明龍去處理。王明龍與謝鵬飛意見不一，鐵路兩派對立沒有緩和。張春橋在一次大會上說「王明龍在鐵路犯下滔天大罪」，⁵² 王明龍只得離開交通組。王洪文後來又讓王明龍擔任工宣隊第五辦公室(即郊區組)領導核心，但是張春橋一再查問王明龍有沒有回廠。1970年6月8日，工總司向市革會和張春橋打報告，確定讓一批工總司總部委員「回原單位較長期地參加勞動」，有潘國平、王腓利、岑麒麟、張寶林等共十幾人；王明龍也在其中，是他自己報名的。1973年王明龍回原來工作的上海重型機床廠。直到文革後期，王明龍才重又出山，擔任第一機電工業局黨委常委。這也是王洪文費了心思的。本來要安

51 王秀珍 1978年3月27日。

52 張春橋的這句話是王明龍文革後告訴筆者的，但是他忘了張春橋是在什麼場合下說這話的。

排王明龍擔任局黨委副書記，但局一級幹部任命必須報張春橋批。王洪文擔心在張那裏通不過，只好讓王明龍當常委，這樣不必通過張春橋。⁵³

王腓利，原來和王洪文關係很好，為工總司出過大力。但是1968年的四·一二炮打張春橋時，他表示對張春橋政治上不太了解，「還是再看看」，被王洪文當場駁斥。散會後，他坐王洪文的車順道回家，路上王洪文說：「王腓利，沒想到這一次你會不支持我，和我不一致」，王洪文接着補充說「沒關係，以後吸取教訓」。但是以後，王腓利多次因四·一二炮打之事挨整。而且王腓利自認造反有功，掌權後不注意搞好周邊關係；加上廠裏的一些造反派在清隊時私設公堂，對清隊對象刑訊逼供。廠裏認為身為造反隊負責人的王腓利應承擔責任，要求審查王腓利。於是第三機床廠的上級主管部門第一機電管理局，派了調查組去他廠。1970年王腓利回上海第三機床廠勞動。雖然，原來的工總司委員等職務仍掛着，廠革會副主任之職沒有撤，但下去後主要在車間「勞動」。他以後回憶：

我在廠裏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犯個人錯誤，在私人生活上沒有把柄可以抓。因為張春橋曾經對我們說過，只要你們個人問題上不犯錯誤，工作上犯點小錯誤我還可以替你們說點好話。我記住了張春橋的這句話。但是由於年輕氣盛，工作上有時也確實會有些忘乎所以，也經常闖禍。所以這一次因工作問題被整回到廠後，我也有點失落，就專心在廠裏勞動。⁵⁴

王洪文沒有忘記王腓利。1974年，王秀珍通知王腓利參加市委第三期讀書班。工總司老頭頭中，除了陳阿大，王腓利

53 王秀珍 1978 年 3 月 27 日。

54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 年 3 月 21 日對王腓利的採訪。

是第一個參加市委讀書班的，之前參加者都是當了幹部的老造反。王腓利因為勞動認真，態度誠懇，被作為「老造反三個正確對待」典型：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以後他回到廠部工作。但是，再沒有讓他回市裏工作。據說這是王秀珍的態度：凡是反對過張春橋的，即使是老造反，一律都不重用。王日初和葉昌明在「186個老頭頭調查」時，提議安排王腓利為機床公司革委會副主任、公司工會副主任，黃金海曾幾次想調王腓利去市革會財辦工作，都被王秀珍否決。⁵⁵

徐美英一直是工總司委員，曾經先後擔任過工總司組織組、後勤組的負責人，也是市手工業局革委會委員。她是工總司委員中較早下去勞動的。下去原因，是因為1968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籌備召開時，她認為自己是老造反，應該有資格參加大會，發動廠裏的工人聯合簽名推舉她為九大代表，卻「沒有想一想不是黨員怎麼能當代表」。加上她能力不強，「盲目性較大，容易偏聽偏信」。1973年回廠勞動。⁵⁶

還有張寶林，原是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最初的領導成員，1970年後回廠勞動。據說原因是他脾氣急躁，不易和人處好關係，而且一次在文化廣場，兩派群眾衝突，他拔出槍向天開槍。張春橋說這樣的人不能在文攻武衛，槍在他手裏不放心，於是也回廠勞動。岑麒麟，1970年「用公車遊山玩水」，途中翻車死人，回廠勞動。直到1973年才又被重新起用，擔任市總工會宣教組副組長，還擔任過業餘工人大學領導小組成員。范佐棟1972年因「收聽敵台、攻擊毛主席」，6月28日，被宣佈「戴反革命帽子，交群眾監督勞動」。「186個老頭頭調查」他沒有受益，仍在廠裏「監督勞動」。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方獲平反。

55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09年3月21日對王腓利的採訪。

56 工總司1974年對181個老頭頭的調查，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還有許多曾經的造反司令們，在「正確對待老造反」的名義下得到照顧，有的被安排較舒適的工作，更多的是在工會或各級科層中謀得位置。例如耿金章，被安排進輕工業局基建組。

小結

上海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大學生大多分去外地，中學生大多上山下鄉，當年活躍分子留在上海的，只有陳敢峰等極少數幾個人。所以，上海的文革新幹部基本是工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當年的造反派，至少也是對文革的認同者。曾經與造反派作對的赤衛隊員，文革中被提拔的非常少，能夠被恢復文革前的職務，已屬寬大。⁵⁷

文革高舉批判的旗幟，但文革的批判沒有觸動政治等級身份制，包括幹部等級和幹部特權待遇，尤其沒有建立對幹部權力的監督制度。文革破除的只是被打倒幹部的特權。只要還在台上，或者只要恢復官職，「待遇」等級一如既往。這些「待遇」是那樣理直氣壯，為新幹部作出巨大榜樣。許多新幹部在最初掌權時，很注意防止特殊化，但是不受限制的權力很難抵制各種誘惑。當權力找到理由，便會很容易擊垮道德的防線。那些新幹部，過去身在底層時，並不了解幹部特權到何程度。而當他們也躋身上層，他們才窺到一豹之斑。這對他們的道德防線肯定是很大的衝擊。造反派無法要求與老幹部一樣的編制身份，但老幹部的「待遇」，例如補貼、房子，都是革命名份的待遇，政治身份的附加值，也是等級身份的外在顯示。尤其在居住條件方面，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幾乎全都住着最好的住宅；即使住在普通住宅的中層幹部，居住面積一般也比普通工人寬敞。大躍進以後，國民經濟衰退，執政黨無暇顧及民生，

57 到這本書出版為止，除了楊富珍、蔡祖泉等少數勞模先進人物，筆者沒有聽說原來的赤衛隊員被提拔為區、縣、局或市級幹部。

人口增加的同時卻沒有大力擴建住宅。比起幹部們，絕大多數工人的住宅都擁擠狹小，生活設施落後，這是要求改善居住條件的直接原因。在老幹部的榜樣帶頭下，新幹部必然視那些特權為與自己新獲得身份所應有的權利。陳阿大反問「老幹部住房，你們看不見，為什麼要向我出難題」，很確切地反映出這樣的心態。

文革初期造反派到處炮轟和批判，而他們對規則和秩序被破壞後的混亂卻不必擔當責任，一切後果都由原來的幹部承擔，並成為打倒他們的理由。不過，當文革開始恢復秩序，擔任了領導的造反派開始嘗到他們自己破壞秩序的後果，並感到了壓力。戴立清、黃金海、謝鵬飛都遇到這樣的情況，尤其戴立清所在的科技系統。他們面臨的是兩種角色身份的矛盾：一方面，他們已經擔任了各級領導，肩負着國計民生的一方責任，這使他們必須按照固有的規則和規律行事，不得不回歸曾經被他們批判過的秩序和規則，否則無法開展工作。另一方面他們靠造反有理起家，靠批判「十七年的修正主義」成為文革中的革命者，他們必須不斷顯現和強化自己造反者的身份，否則存在的合法性會遭到質疑。所以他們始終張大眼睛警惕種種「復辟」、「復舊」，不斷發起責難。這使他們的工作不斷受到來自他們自己的干擾。本來可以通過討論和協商解決的工作或政策分歧，成為不可調和非此即彼的「路線鬥爭」。

上海在世紀之初曾經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發源地。文革中「一月革命」發源地的上海，又被作為文革新生力量的根據地，「優秀工人造反派代表」的集中地。文革為一大批不安於被分配人生的底層民眾，提供了提高政治名份從而改換身份的機會，提供了上升的途徑和空間。人生的變化來得這樣快這樣大，甚至會讓當事人都措手不及，無法一下適應。更有一些人原本素質比較差，一旦名份身份有所改變，尤其有了一點權力，便忘乎所以。但文革雖然造反，基本的道德規範卻沒有被

變更，尤其男女關係和經濟問題，始終都被鄙視。造反派自己推舉領袖，也要沒有道德污跡的。於是，隨着秩序的恢復，許多道德和生活作風差、派性十足的造反派，被逐步淘汰出領導位置或各級科層。

比起工人造反派，寫作組成員除了政治原因，沒有一個人是因為「生活問題」下去的。「生活問題」是當時的話語，即「男女關係」、「貪污盜竊」等。工總司因為這些原因下去者很多，尤其「男女關係」。這或許可以顯示這兩類造反派的某種差別。

工人造反派是工人的組成部分，儘管他們具有很強的幫派意識，但他們也具有很強的階級認同感。在黨和政府同時又是企業所有者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文革中的社會衝突主要只能表現在政治層面而不在經濟層面，工人造反派的參政因此並沒有為工人帶來太多的實際利益。他們所起的作用更多是在民主權益的爭取上。工人造反派的存在，以及他們對「規章制度」、「管卡壓」、「走資派」等的不斷批判，使幹部對工人的管理比文革前鬆動許多。這種鬆動，有規章制度鬆懈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幹部權威的下降。工人在工作場所的自由度以及與管理他們幹部的關係是1949年後最高最鬆弛的，這種鬆弛直到文革結束以後，再沒能恢復到文革前的程度。文革時期是最讓工人具有「主人翁」感覺，也是工人整體階級意識最強的時期。但是，由於許多工人造反派文革前和初期形象不佳，加上他們一旦掌權，關心的只是自己一派的利益而不是整體工人的實際利益，使得普通工人對他們缺乏認同感，換句話說，廣大工人並不將他們作為代言人，他們也從未真正為工人代言，這是工人造反派的悲哀。

毛澤東真心將整個工人階級視作精英階級、將工人造反派看作工人階級的傑出代表，這從他的一系列講話中，以及提拔王洪文當接班人等做法中能夠看出。但是工人造反派自身的政

治素質使他們擔當不了重望，「直升飛機」式的被提拔，使得他們缺少從政經驗。他們在所受教育程度上比不過文革派中的文人班子，在政治經驗上比不過經驗豐富的老幹部。他們許多人身上所具有的江湖氣、草根氣和幫派氣，甚至使得文革派張春橋等也對他們存有戒心，這是工人造反派的又一悲哀。

文化革命中的工人造反派運動，是1949年後工人作為「領導階級」參政的最輝煌時期。大批普通工人成為政治或經濟執行機構甚至決策機構的中心人物。無論成功還是失敗，都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留下了引人深思的一頁。

第三十七章

朝霞事件 話語平台的紛爭

市總工會與寫作組互相看不起

文革初期，上海文革勢力由三方面組成：紅衛兵造反派、工人造反派、機關造反派。而機關造反派的核實就是寫作組。1968年底，上山下鄉結束紅衛兵運動，絕大多數紅衛兵以及紅衛兵各組織的領袖人物，離開上海去了農場或外地；即使進了工廠的紅衛兵，也成為必須由「工人階級進行再教育」的對象，沒有了話語權。上海的文革形勢從此由工人造反派和機關造反派左右。但這兩股文革勢力始終融不到一起，互不服氣，面和心不和。朱永嘉在寫作組稱市工人造反派為「工字頭」。陳冀德說他們「只知有群體，不知有階級」，認為他們仗着毛澤東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指示，將自己等同於工人階級。¹ 寫作組的人看不起工人造反派中一些人的個人品質以及生活作風，看不慣他們一觸即跳的派性以及草根氣。而工人造反派認為寫作組的人是「秀才」，知識分子。自己代表工人階級，寫作組成員都是應該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尤其機關幹部對秩序和等級的遵從，使工人造反派很看不慣。戴立清後來回憶他當時對寫作組的意見：

我們當時和寫作組和機關造反派的關係合不到一起去。他們憑着和張春橋的關係，對我們講話時，總讓我們感覺到

1 陳冀德 2008 年《生逢其時》。

有種以勢壓人的味道，讓我們覺得他們是張、姚的耳目。而且我們本來就對機關幹部有成見，覺得他們長期在機關，慣於看上級眼色辦事，見風使舵，奴氣十足，沒有自己的主見，所以和他們講不到一塊兒。用現在的話說，他們原來都是體制中人，造反後還是機關作派，所以我們看不慣。尤其王承龍，講話口氣大，盛氣凌人，喜歡訓人，動不動就責問。雖然在我們面前不敢，但我們對他的作風有意見。至於徐景賢，能寫能講，我們造反派也少不了他，因為他經常為我們起草東西，但覺得他右傾。我們對徐景賢政治右傾有意見。²

戴立清所謂的「右傾」，是認為徐景賢對造反派感情不深，處事情時，屁股經常坐在原來的機關幹部一邊。工人造反派覺得徐景賢們看不起工人。王洪文總是一再強調：「文化大革命以來每次運動都是工總司衝在前面起大作用。文化大革命還在延續，就要靠工、青、婦群眾組織，發揮他們的作用。」³ 王洪文去中央工作時，臨走前一再關照王秀珍：「你要注意徐景賢，他看不起我們的，他總是要排擠我們的，你不要怕他，要和他鬥」；「你要多用一些工總司的人，要有人支持你，你才能站住腳……你要注意徐景賢用人，他對我們有看法的，他別想指揮我，我不作向忠發，他也不要作李立三。」一次，市革會領導們去東海艦隊觀看海軍文工團演出。幕間休息時，徐景賢要王秀珍通知市革會「一辦」下面的文藝團體來向海軍學習，王秀珍照辦了。事後王洪文對王秀珍說：「你太老實，他叫你通知，你就通知？他是書記，你也是書記，他有什

2 筆者 2009 年 2 月 13 日對戴立清的訪談。

3 王秀珍 1978 年 3 月 29 日《補充揭發交代與王洪文的反革命罪行》。上海揭批「四人幫」辦公室編。

麼資格指揮你呢？你要注意，不要聽他的」。⁴ 王洪文去中共中央擔任副主席後，兩股文革勢力的矛盾，體現在徐景賢與王秀珍的關係上，他們是寫作組和工人造反派在市委和市革會內的代表人物，他們的矛盾體現了這兩股勢力各自對文革的認知和給對方的定位。王秀珍對葉昌明說：「徐景賢起先看不起王洪文，被春橋同志批評過，說他眼裏沒有工人階級。後來，王洪文到中央當副主席了，徐景賢才改變了看法，又看不起我了。後來我向春橋同志告狀，徐景賢現在比過去好多了。」⁵

朝霞事件

在徐景賢和王秀珍的矛盾中，馬天水傾向於王秀珍。據市婦聯主任汪湘君觀察：

馬天水對這幫小兄弟都很遷就，就是有錯誤也不批評，他認為這樣才是老幹部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所以馬天水對老幹部很嚴，對新幹部卻很寬，一邊倒。在常委會上，討論問題，如果王秀珍和徐景賢有不同意見，我覺得馬天水總是採納王秀珍的意見。⁶

徐景賢和王秀珍兩人矛盾不斷。1974年2月的那場對徐景賢關於「一月革命精神」解釋的爭吵風波，最後由張春橋裁決，以徐景賢作檢查結束。市革會開常委會，讓徐景賢作檢查，大家批評了徐景賢，說他好出風頭。王秀珍對人說徐景賢講話有

4 以上王洪文的話都轉引自王秀珍 1978 年 3 月 8 日《交代揭發與王洪文的反革命罪行》。

5 汪湘君 1977 年 8 月 29 日。

6 同上。

錯誤，不要認為市委領導的話都對。⁷

不久，有人向王秀珍匯報說，《朝霞》上刊登的三篇小說「有問題」。這三篇小說，一篇是1974年1月出版的創刊號也即第一期上，姚真的小說《紅衛兵戰旗》，還有一篇段瑞夏以筆名夏新的小說《初試鋒芒》，也在這期上；第三篇在2月出版的第二期上，是林正義的《閃光的軍號》。總工會的工人造反派看後，覺得《朝霞》果然有大問題：《紅衛兵戰旗》寫一派紅衛兵山頭主義，張羅成立半周年紀念活動，這是影射工總司當年的半周年紀念大會；《初試鋒芒》寫民兵訓練組負責人願多介入社會上的階級鬥爭，這是污蔑民兵；《閃光的軍號》作者林正義，曾經被林彪妻子葉群作為女婿候選人，又是從被認為與林彪有干係的空四軍調來，所以作品有為林彪翻案嫌疑。而且這三篇文章的作者都是《朝霞》的編輯，其中姚真還是編輯部領導之一。她那篇小說中的「半周年」，尤其令市總工會的人惱火。戴立清告訴黃金海，說《朝霞》重提半周年紀念之事。兩人打電話給馬天水，問為什麼隔了那麼多年還要重提這件事情，什麼意思？⁸

被市總工會認為有「嚴重錯誤」的這三篇小說，前兩篇：《紅衛兵戰旗》和《初試鋒芒》，卻被《朝霞》編輯部認為，是「反映文革征文選中最好的兩篇」，是《朝霞》月刊創刊號的「主打作品」。⁹《朝霞》編輯部還不知一場風波已起。他們正在忙着第四期《朝霞》的定稿。第四期的稿件中有一篇文藝短評，作者是市總工會所屬市工人文化宮文藝評論組成員，他在修改文章清樣時，加上了一段話，大意是說上海近來有些作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紅衛兵運動和工人運動，為林彪路線翻案。《朝霞》負責人陳冀德審讀清樣後，提出要刪掉這段

7 王日初 1977年3月21日。

8 引自黃金海 1977年8月15日。

9 這個評價是陳冀德在其回憶錄《生逢其時》中寫到的。

話，作者一反平時的謙和，堅持不肯刪去。陳冀德感到事情蹊蹺。這是寫作組得到的第一個信號。

首先對《朝霞》展開批判的，是戴立清掌管的上海在皖南的後方基地工廠，在批林批孔大會上點名批判《朝霞》；接着，與市總工會關係密切的市民兵指揮部、團市委、市婦聯，紛紛召開批判會。

市工人文化宮還寫材料，檢舉揭發《朝霞》「有嚴重問題」，批判《朝霞》反文革，反工人階級。市總工會加上批語，上報上海市委。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總是批判別人，給別人上綱上線的寫作組，這下也被上綱上線地批判。寫作組的壓力十分大。而朱永嘉，幾十年後回憶分析市總工會的不滿：

這件事我心裏有數，原來上海培養了一批工人作者，他們都在工總司的市工人文化宮系統，沒有發表陣地，看到《朝霞》辦得紅紅火火，想把這個陣地搶過去。然後找借口說小說裏攻擊了王洪文，因為當年工總司要搞半周年紀念，被張春橋批了一頓。¹⁰

市總工會所屬市工人文化宮，一批工人作者本來就對《朝霞》有意見，因為《朝霞》自己培養作者，這批工人作者要發表作品很難，而市工人文化宮沒有自己的刊物，無法為他們提供發表平台。這下他們有了表達不滿的機會。一批上海工人作家也幸災樂禍。他們是六十年代柯慶施時期培養的，本應是文革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文藝界骨幹，卻因為他們是文革前的「紅人」，被長期冷落在一邊。還有文革中崛起的一批工廠業餘作者，雖然曾經在《朝霞》上發表過文章，但一直進不

10 轉引自章劍鋒《文革上海寫作組的那些人和事兒》，載於《南風窗》2010年第8期。

了《朝霞》的圈子，所以對《朝霞》也有意見，他們也十分起勁。而在出版系統，許多人更是早就對寫作組不滿，因為活躍在出版編輯界的大都是寫作組的人，原來的出版社的編輯們靠邊。所以，《朝霞》一出事，大家都特別高興，覺得解氣。¹¹

對市工人文化宮的檢舉揭發，王秀珍以市委書記的身份首先批示：「朝霞問題很嚴重，要好好清查」。馬天水接着在上面批示：「同意」。兩個批語到了徐景賢那裏，徐景賢也批示：「同意秀珍意見」。寫作組和《朝霞》都是徐景賢分管的，這次批判矛頭就是對着徐景賢的；想不到徐景賢批示同意王秀珍意見，躲過市總工會的鋒芒。徐景賢沒有為與自己關係密切的《朝霞》擋一把，卻批示同意，這讓寫作組出乎意料。三位市委書記的批示讓寫作組和《朝霞》所有人員感到事態嚴重。王知常也頂不住了，將蕭木拋了出來，說這三篇小說從主體到構思都是蕭木的。

《朝霞》面臨停刊。《朝霞》編輯部所在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大院內，滿是大字報，連園內的葡萄藤架也從上到下被貼滿。這是王知常發動和佈置的，他要寫作組的青年們，貼出批判《朝霞》及陳冀德的大字報。面對工會系統的步步逼近，他希圖以這樣丟卒保車的辦法，拋出《朝霞》，保住寫作組的其他刊物。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更是壓力很大，尤其對徐景賢有意見，認為徐景賢關鍵時刻出賣寫作組。為此朱永嘉曾經幾次掉眼淚。¹²

陳冀德去找徐景賢。問他：三位書記都要《朝霞》停刊整頓，什麼意思？徐景賢沉默片刻回答說：「有些事情，我不便對你說，但有一點可以告訴你，不管我同意還是不同意，《朝霞》的停刊整頓，勢在必行。這件事恐怕還不僅僅是王秀珍的意思。她是從北京回來以後，才把批件傳到我這裏要我圈閱。

11 筆者 1989 年 8 月 30 日對原寫作組成員谷梁(化名)的訪談。

12 同上。

不過，這件事，對你是不會怎麼樣的。就算不搞刊物，總有吃飯的地方。我就難說了，弄不好，吃飯的傢伙都要保不住。」¹³ 很明顯，徐景賢是暗示，這場批判，來自已經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身為上海市委書記的他無法抵擋。

陳冀德被變相停止工作，不再去編輯部；寫作組派文藝組的余秋雨接替《朝霞》編輯部工作。¹⁴ 市面上《朝霞》月刊的創刊號被搶購一空，許多人幾十本一買，準備用來批判。而在寫作組內部甚至還傳出消息說，市總工會打算接管《朝霞》。雖然實際並無此事。¹⁵

朱永嘉向王秀珍打招呼，表示願意承擔責任，並願意責成編輯部作深刻檢查，但停刊之事是否緩一緩？王秀珍毫不客氣地回答說：「你不用檢查，我不要聽你檢查，你們知識分子寫份檢討還不容易嗎？」¹⁶

朱永嘉指定寫作組的小青年許國良，每天寫一份簡報，向張、姚報告事件進展情況。朱永嘉還要王知常出面，每天給姚文元寫信，反映寫作組成員的看法。但張、姚一直沒有回音。王知常給張春橋的信，只是說《朝霞》有嚴重政治錯誤；要停刊；卻沒有說明風波的關鍵在於「半周年」，這個曾經被張春橋批評過的事件。¹⁷

13 轉引自陳冀德 2008 年《生逢其時》。

14 王知常 1977 年 5 月 6 日。

15 陳冀德在其《生逢其時》中，回憶說市總工會有接管《朝霞》的意圖。筆者 1989 年 8 月 30 日對寫作組成員谷梁(化名)訪談時，他也提到接管一事。但筆者就此事詢問當時主持市總工會工作的葉昌明，葉昌明的回答是「絕無此事」。葉說那時已經不是文革初期，不能對誰不滿意就去奪權；而且如果市總工會要接管，他首先應該知道；更而且他們當時知道《朝霞》與張春橋的關係，不可能去接管他領地的刊物。

16 陳冀德 2008 年《生逢其時》。

17 陳冀德 2008 年《生逢其時》中認為，張春橋最初一直沒有表態，可能是王知常他們的匯報只說市委要《朝霞》停刊，卻沒有提到市總工會是因為「半周年」之事才發難的，因此張春橋不知道風波的來由。直到她給蕭木寫信，張才知道市總工會的心事。

陳冀德也想給張春橋寫信，但朱永嘉和王知常不同意。情急中。陳冀德想到了在王洪文身邊工作的蕭木，《朝霞》是蕭木一手創辦的，現在《朝霞》面臨停刊，他不會坐視不管。她一連給蕭木寫了幾封信，將幾天來的風波原本告知，通過上海市委的機要交通站發出，當天晚上，蕭木收到第一封信。¹⁸ 在北京的蕭木並不知道上海的情況。他是王洪文的政治輔導員，本來王洪文在北京的秘書沈少良，看到認為值得看的簡報，也都會送蕭木一看。但恰恰就是那幾天，蕭木沒有看到上海方面的市總工會簡報。王洪文平時對蕭木十分尊重，但這次事情關乎寫作組，蕭木是寫作組方面的人，不送簡報，顯然王洪文有所提防。

蕭木看了陳冀德的信後很謹慎，沒有先找張春橋，而是先去找王洪文匯報。蕭木說，《朝霞》這個事件，在上海鬧得很大，兩個作者都遭到批判，主編陳冀德已經靠邊。蕭木情緒激烈地表示：「如果《朝霞》有問題，我第一個應該被批判，要批就批我好了，因為《朝霞》是我建議創辦的，我在上海時也是《朝霞》的。為什麼要去搞小青年呢？」蕭木後來回憶說，王洪文聽他這番話後，一下跳起來：「哎喲，大水沖了龍王廟！」又說「你放心好了，他們怎麼敢批判你呢？」「我叫他們不要批了就是」。¹⁹

這場風波剛起時，王洪文對同是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的蕭木存有戒心，否則蕭木不會偏偏在這時，看不到來自上海市總工會方面批判《朝霞》的簡報。而且據沈少良事後告訴蕭木，確實是王洪文讓他不要送蕭木的，說「免得蕭木老師看了心煩」。²⁰ 王洪文不反對市總工會對《朝霞》展開批判，敲打敲打寫作組這幫秀才，王洪文也一向對徐景賢有看法；但沒想到上海

18 陳冀德 2008 年《生逢其時》。

19 蕭木著 2008 年《你走了，輕盈宛若白雲》。

20 這是筆者 2010 年 6 月 25 日與蕭木閒聊時，他對筆者回憶的。

三個市委書記的批示，使得《朝霞》停刊。王洪文在蕭木反映情況後，當即表態要蕭木放心，顯示王洪文不想將事態搞大。

蕭木又馬上去找張春橋。蕭木的感覺，張春橋似乎對事情經過不太了解，蕭木將事情的過程講了一遍，尤其是「半周年」這個起因。張春橋聽蕭木講後，沒有馬上表態，考慮了好一會兒，才說：「你回去吧，這事我來處理。」蕭木馬上領會，這是叫他不要再去找王洪文。張春橋又說：「我給馬老打電話。」²¹

張春橋和王洪文出面干預

4月9日，凌晨二點，朱永嘉接到蕭木自北京打來的電話。蕭木說：張春橋要他打電話告訴朱：「我是上海第一書記，青年作者犯錯誤由我負責，而且看來沒什麼錯誤。」還說，陳冀德不用檢討。²²朱永嘉接電話時，陳冀德也在場。以後陳冀德給張春橋寫信，曾描寫他們當時的心情：「我和朱永嘉一邊聽電話，一邊熱淚直流，我們又一次感到『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覺主席親』。」這是當初寫作班集體造反時引用過的一句話。陳冀德後來對《紅衛兵戰旗》作者姚真講得更直率：「沒有張春橋，你我都完了！」²³

第二天早上，朱永嘉立即召集寫作組所屬文藝組開會，傳達張春橋的電話。寫作組一片歡騰，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王知常高興地說：「這下，可要好好看看市總工會這幫人了！」他馬上指揮組裏的小青年，把院子裏的大字報全都撕下來。本來，貼這些大字報，就是做給市總工會方面看的，現在沒有必

21 這是筆者2010年6月25日與蕭木閒聊時，他對筆者回憶的。

22 蕭木打電話給朱永嘉一事，引自陳冀德1978年6月20日《交代我所知道的張春橋的黑話、批示》。而在陳冀德2008年由香港出版的回憶錄《生逢其時》中說，是張春橋直接打電話給朱永嘉的。筆者認為陳冀德離事發時間較近的1978年的回憶應該更準確。

23 轉引自陳冀德1979年2月27日《交代我給張春橋寫的幾封信的內容》。

要了。連日來，《朝霞》的編輯工作幾乎全部停頓，朱永嘉第二天就要《朝霞》繼續工作。

張春橋的話，寫作組沒有告訴市總工會，市總工會那邊不知形勢已變，他們還在為《朝霞》停刊興奮。文革以來，寫作組的人仗着知識和文化優勢，更仗着與張春橋的密切關係，對工人造反派始終有種優越感，讓工人造反派感到有形無形的壓力。當張春橋對寫作組明確表態時，市總工會還在讓市工人文化宮組織討論會。這個討論會的會議通知上，本來底稿寫的是「討論會」，不知怎麼打字打成了「批判會」。這個寫成批判會的通知，被寫作組的人拿到一張。

又過了兩天，張春橋給馬天水的條子到上海市委。張春橋原來對蕭木說要打電話給馬天水，現在寫條子，更顯慎重：

馬天水同志：

此件本來是想答覆朱永嘉同志，現在考慮還是寄給你，請你約秀珍、景賢、朱永嘉三同志一談，不要再擴大範圍了。

春橋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這張紙條簽字日期是4月9日，還有一張紙條是讓轉給王秀珍、徐景賢和朱永嘉三人看的，簽字日期是4月12日：

天水同志：

請市委考慮：

(1)朝霞、學習與批判、文匯、解放，都不要發表批評外地報刊的文章。

(2)如果要批，需請示市委。

(3)這期朝霞準備批判解放軍文藝，不要發表。

(4)這些報刊的領導責任在市委，市委應負責任，不要推給寫作組。

如同意，請告朱永嘉同志。

春橋

一九七四年四·一二²⁴

張春橋這封信中所說的批判《解放軍文藝》，指原來第四期《朝霞》準備發的一篇批判「無衝突論」文章，是針對《解放軍文藝》上的一篇文章的。還有一張紙條，也是給馬天水的：

馬天水同志：我是上海第一書記，《朝霞》是上海的刊物，《朝霞》有問題，我應該負主要責任，如你同意，請告朱永嘉同志。張春橋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²⁵

張春橋沒有找王秀珍，也沒找徐景賢，而是找了馬天水，顯然經過慎重考慮：王秀珍和徐景賢，一個是市總工會方面的，一個是寫作組方面的，找哪一個都有偏向嫌疑。接到張春橋的信，市委常委馬上開會，刹住了批《朝霞》風。

張春橋在給馬天水寫信的同時，還給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寫了一封信：

何秀文同志：

我感冒了一次，發低熱，拖延了幾天，現在(昨今)體溫已正常，如果家裏知道這個情況，請轉告，勿念。不知道的人就不告訴了。

材料收到。請你把工會的刊物從創刊號起給我找一

24 張春橋 1974 年 4 月 9 日和 4 月 12 日給馬天水的字條。

25 這張紙條是據原寫作組成員谷梁(化名)1989 年 8 月 3 日對筆者的回憶，筆者沒有見到書面的資料。

份，團市委的那個簡報也找一份。如果你能夠找到有關批《朝霞》的其他材料，我都要。事情來得突然，事先我一點也不知道。希望你能把來龍去脈打聽一下。老馬在電話裏吞吞吐吐，說不清。當然，你要謹慎，只聽不說。

另外，請轉告市委兩點，見另紙。

張春橋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又是這個日子。²⁶

張春橋信中提到的「工會的刊物」，就是後文將提及的市總工會的《情況交流》，是朱永嘉讓何秀文轉給他的。張春橋看樣子對這些工人造反派們不放心，他要了解市總工會到底在起勁些什麼事，但又不能通過職務已經比自己高的王洪文了解。張春橋在這方面是謹慎的。張春橋在這封信後寫上「四月十二日，又是這個日子」，這顯然是指1968年的4.12炮打事件。看似自我調侃，但給人的感覺，又像是對市總工會這幫工人造反派向寫作組下手不滿；當初「半周年」風波，就是源於他對工總司的批評，現在市總工會方面不許寫作組重提此事，此中是否包含對他張春橋本人的不滿？²⁷ 而就在此前不久，鄧穎超來上海，在「康辦」與大院裏的家屬們見面，但唯獨沒有通知張春橋的妻子文靜。鄧穎超還特地說「不叫有的人來參加」。²⁸ 這對張春橋肯定是個政治暗示。

張春橋給何秀文信中的「炮打」暗指，傳到市總工會，

26 張春橋 1974 年 4 月 12 日給何秀文的字條。

27 據黃金海 2014 年對本書這個章節草稿旁的批語說：「王洪文說搞清楚就算了，但張一直揪住『炮打』。張敬標訪問朝鮮回北京時拜見張春橋，匯報上海情況時，張春橋說，你這個秘書長怎麼當的，上海有人炮打也不匯報。張敬標根本不知道朝霞的事，被批懵了，第二天回上海就提出辭職，未準。」後筆者打電話問黃金海，他是如何知道張春橋與張敬標的這個談話的，黃金海說，是當年王秀珍告訴他的。

28 這是蕭木告訴筆者的。

工人造反派們一下懵了。現在是王秀珍向朱永嘉打招呼了。她說市總工會一幫人不是對寫作組有意見，而是對徐景賢不滿，想不到徐景賢耍滑頭，一個批示把矛頭轉向了寫作組，自己倒躲過了。總工會的老造反派們對張春橋忠心耿耿，言聽計從，甚至崇拜，從來都不敢有任何懷疑。現在卻因為對徐景賢有意見，被說成是「炮打」。1975年1月，四屆人大會議期間，一天晚上8點左右，去北京參加會議的王秀珍、黃金海、葉昌明、陳阿大等，去釣魚台看望王洪文和金祖敏，本來是想匯報上海的工會工作。但坐下來沒講幾句，王秀珍就講到朝霞事件，說張春橋批得很兇，王秀珍說：「我們怎麼會炮打春橋同志呢？」黃金海也說：「沒想到對《朝霞》提意見，就鬧得這麼大，成了炮打。」王秀珍說着說着就哭起來。²⁹朝霞事件剛開始時是朱永嘉流淚，現在是王秀珍哭了。

王洪文說：「現在講你們炮打，東西都被人家拿到手了。你們要寫個檢查報告，報告張春橋，把問題說清楚。」王洪文所說的「東西都被人家拿到手了」，就是指市工人文化宮那張「批判會」通知。王洪文又說：「文章我看還是有問題的嘛，不過現在這麼搞，影響批林批孔大方向。」³⁰王秀珍已經讓葉昌明寫材料，說明市總工會包括市工人文化宮沒有炮打之事，交張春橋。王秀珍再三向張春橋作檢討，張春橋表示：「我知道市總工會的頭頭是不會炮打我的。」³¹王秀珍後來一再說：「《朝霞》問題，要不是張春橋同志及時制止，那要闖大禍了。當時北方批《三上桃峰》，南方批《朝霞》，那亂了我們自己，國內外階級敵人就高興了。張春橋、姚文元最關心我們，使我們不犯大錯誤。」³²

29 黃金海 1976 年 10 月 28 日：《交代我與王洪文的關係》。

30 同上。

31 王秀珍 1977 年 3 月 27 日。

32 王秀珍 1977 年 4 月 4 日。

寫作組對市總工會從此也同樣小心。這場風波的結果，寫作組雖然佔了上風，但朱永嘉覺得這會在王洪文心裏留下心結，擔心「如果將來他真的上台了，張春橋在還好辦，張死了怎麼辦？我壓力很大。」他甚至向張春橋打了辭職報告。但張春橋反而將朱永嘉官升一級，提為市委列席常委。³³朱永嘉只能小心謹慎，叮囑寫作組成員千萬夾緊尾巴。一次，陳冀德在學習恩格斯著作《德國農民戰爭》序言時，看到一段話：「任何一個工人領袖，要利用這些流氓作為自己的近衛軍，或依靠他們，就足以表明他是運動的叛徒。」她拿去給朱永嘉看，朱永嘉馬上明白她要表達什麼意思。他立刻將門關上，斬釘截鐵地說：到此為止，以後不准將這段恩格斯的話拿出去給任何人看，也不許再提這樣的話。陳冀德後來回憶說，「能讓朱永嘉如此緊張的事情，還真不多哩。」³⁴

朝霞事件平息後，朱永嘉給張春橋寫了封信，檢討寫作組該負的責任：

最近幾天，市委的幾位領導同志分別找我們談了話。他們都作了一些自我批評，我也作了自我批評。我們的問題是有一些事情沒有能夠在事先及時請示匯報，有的文章發表太倉促，沒有能很好徵求各方面的意見，結果產生了一些原來可以避免或者說得清的問題。³⁵

在這封信中，朱永嘉還匯報了寫作組與市總工會緩和關係的打算：

在工作方面我們也想爭取多幹點事來緩和矛盾。蕭木那裏

33 轉引自章劍鋒 2010 年《文革上海寫作組的那些人和事兒》。

34 陳冀德 2008 年《生逢其時》。

35 朱永嘉 1974 年 10 月 25 日給張春橋的信。

前幾天打電話來，說洪文同志要我們像上次搞民兵調查那樣抓一下造船工業方面的調查。我們集中了20多人搞了十多個專題。³⁶

朱永嘉所說的「上海民兵調查」，就是1973年11月19日，以上海市革會名義所作的《上海城市民兵情況調查》，得到中央稱讚，被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轉發全國；造船工業調查，就是前面章節提及的王洪文根據國務院要求佈置的調查。寫作組採取主動姿態，這次再為王洪文做調查，以自己的強項化解積怨。而張春橋則要求朱永嘉：即日起，《學習與批判》、《朝霞》、《自然辯證法》，每期都送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他們審閱同意後再開印。以這樣的方式，平息市總工會方面的疑惑和猜測。³⁷對朱永嘉給自己的那封信，張春橋在「市委的幾位領導同志分別找我們談了話」下面劃了條線，在旁邊寫上：「我需要了解誰找你的，談了一些什麼，自我批評的內容」，要朱永嘉再向他詳細匯報談話內容。³⁸

張春橋本來在一個相當時期內，已經刻意和上海市總工會的工人造反派保持距離，不再經常主動與工人造反派直接接觸，即使在朝霞事件中，他的信也是寫給馬天水或讓馬天水轉交王秀珍。朝霞事件發生後，張春橋曾和蕭木談起王洪文。張春橋和人談話從來不是很直白，但這次談話，張春橋的話講得比較清楚，蕭木幾十年後還記得當時的原話。張春橋說：

我和洪文，現在關係與在上海時不一樣了，有些地方我也不便說話，你在那裏也要注意。³⁹

36 朱永嘉 1974 年 10 月 25 日給張春橋的信。

37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 1994 年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第 830 頁。

38 朱永嘉 1 月 15 日，原件無年代，但從行文看，當是文革後審查時寫的。

39 這是筆者 2010 年 6 月的一天與蕭木閒聊時，他對筆者回憶的。

張春橋的話則顯示，張對處理比自己職務高的王洪文關係的謹慎小心。據蕭木觀察，自1972年秋，張春橋再也沒有回過上海。⁴⁰張春橋顯然是為了避嫌，避與上海的關係，不使自己因與上海的較多往來，而被說為是地方主義或宗派主義；也盡量小心地處理與王洪文的關係，尤其與上海市總工會有關的事。

朝霞事件風波平息，寫作組一切恢復原樣，只是對《閃光的軍號》作者林正義，張春橋表態說：小說涉及部隊，部隊的事情比較複雜，要慎重，像這樣的人就不一定要保。林正義於是離開《朝霞》一個時期。其餘兩篇小說的作者總算沒事，陳冀德也回到原來的位罝。不過，因為她在朝霞事件中受了刺激，事件結束後，身體很不好，徐景賢批准她去浙江上虞老家養病。將近半年時間裏，由文藝組的余秋雨接替陳冀德的工作。

張春橋要陳冀德寫信

陳冀德養病後回《朝霞》不久，10月的一天，機要秘書交給她一封信，是張春橋給她的親筆信，而且指定由陳冀德「親收」。張春橋在信中說，他聽說陳冀德是個敢講話的人，因此問她願不願意給他寫信：

他從報紙上看到上海這一時期比較沉悶，又聽說寫作組把所屬的幾個外圍小組解散了(指朱永嘉解散了文藝組所屬的文學概論組)，他對上海的真實情況一點不了解，也沒有什麼人把真實情況告訴他，他希望我能告訴他一點情況，要說真話，不要外交辭令。還說一個共產黨員給一個市委書記寫信，大概不至於得罪哪一方的神聖吧，叫我不要有顧慮。信中最後說，在沒有得到他的回信之前，這件事不要

40 這是筆者2010年6月的一天與蕭木閒聊時，他對筆者回憶的。蕭木認為張春橋是為了避嫌。

告訴別人。又說，聽說還有個戴厚英，也是敢於講話的。如果戴厚英願意，也希望能給他寫信。⁴¹

陳冀德雖然與張春橋認識多年，但從未有過個人交往，這是張春橋寫給她的第一封信。朝霞事件中，張春橋讓馬天水轉給王秀珍的條子中，要求市委負責任，不要推給寫作組；還說我是上海的第一書記，我應負主要責任，《朝霞》沒有什麼錯誤。陳冀德後來回憶說，這些話講到她心裏去了，她覺得張春橋敢於承擔責任，很感激張春橋。她將信給朱永嘉和戴厚英看了，後來她先後給張春橋寫了四封信。第一封信，是從朝霞事件引出對工人造反派的看法，認為他們「事事處處把自己凌駕於黨委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打擊老幹部，排斥異己，扶植親信」，並舉了具體事例，說工交組有個老幹部，年紀大眼睛不好，每天上班走在路上時經常會撞上路邊的電線杆。有人建議，能否給這位老幹部上下班時派輛車，陳阿大聽說後，講：這種人，撞死算了。陳冀德在信中還寫了市總工會與寫作組的矛盾，具體說是王秀珍與徐景賢之間的爭名奪利。例如有一天，徐景賢的秘書到寫作組找某天的《人民日報》，因為上面刊登了他們和王秀珍兩人出國訪問時的新聞照片，但徐景賢的照片比王秀珍大了一圈，王秀珍很不高興，大發脾氣，雙方於是都去查報紙。這封給張春橋的回信，陳冀德也給朱永嘉看了，朱永嘉不加干涉。⁴²

不久，陳冀德便收到張春橋的回信，信中說他很感謝她信中反映的許多聞所未聞的事情。他要陳冀德談談對樣板戲和電影《創業》的看法。並再一次強調：不要外交辭令，要講真話。陳冀德於是在給張春橋的第二封信中，「反映了樣板戲演

41 陳冀德 1978 年 2 月 8 日《交代我給張春橋寫的幾封信的內容》。

42 陳冀德 1979 年 2 月 27 日《交代我給張春橋寫的幾封信的內容》、1979 年 2 月 21 日《全面交代》；以及陳冀德 2008 年由香港出版的回憶錄《生逢其時》。

出太少，戲太少，文藝工作者們對於樣板團大搞特殊化、吃樣板飯、穿樣板服意見很多；反映了電影創作的審查層次太多，審查級別太高，束縛了生產力；反映了群眾對《創業》這樣的電影也要批，想不通」，等等。⁴³這一次，張春橋沒有回信。

1975年初，朱永嘉去北京參加法家著作注釋會議，張春橋讓他帶口信給徐景賢：說真話比當官更重要。還引用列寧的一段話：「有人寧要當部長而不肯說真話。」收到信後的一天午休時，徐景賢特地將陳冀德叫去他家，向陳冀德訴了一大堆做官難的苦經，說朝霞事件他是被逼的，不得已才寫了那些批示。⁴⁴徐景賢還向陳冀德訴說自己和王秀珍之間的矛盾：徐景賢說他有很多苦處，王洪文、王秀珍天天通電話，中央精神，市委還不知道，王秀珍早就知道了。徐景賢舉了一個例子，說有一次去警備區開會，聽一個部隊領導同志作檢查，這個同志檢查完後，大家沉默。王秀珍突然獨自帶頭鼓起掌來，把在場的馬天水和 he 搞得很被動，只好也跟着鼓掌。徐景賢說類似這樣的事情很多，王秀珍手裏有精神，我們都沒有。⁴⁵

1966年底徐景賢和市委寫作組剛造反時，是眾多上海造反派組織事實上的核心，靠的就是與張春橋的直接聯繫，首先得知中央決策層的最新信息。那時，就連看不起寫作組的工總司的工人造反派們，也經常屈尊向徐景賢打聽消息。但「九大」以後，張春橋刻意與上海保持距離，不讓徐景賢等經常給他打電話，說有事書面請示匯報。於是，情況倒過來了。徐景賢上情下達的信息不通；王秀珍因和在中央工作的王洪文聯繫密切，首先知道許多中央決策層的信息，還不時存心在一些公開場合「抖漏一些出來，讓在一起的徐景賢難堪、被動、無所適

43 引自陳冀德 1979 年 2 月 21 日《全面交代》。

44 陳冀德 1979 年 2 月 27 日《交代我給張春橋寫的幾封信的內容》。

45 陳冀德 1979 年 2 月 27 日《交代我給張春橋寫的幾封信的內容》。王秀珍鼓掌的事情，就是前一章提及的王洪文要王秀珍在警備區副政委章塵檢討後鼓掌之事。

從」。⁴⁶ 連馬天水要了解中央的精神，也只能去找王秀珍。幾乎天天和王洪文通電話的王秀珍，往往是中央最新精神的最先知曉者和發佈者。⁴⁷

陳冀德不解，問徐景賢說1.28炮打時，紅革會不是還將你當作張春橋的「材料袋」抓去嗎？現在怎麼倒好像和張春橋顯得生分了？徐景賢說，他和張春橋聯繫不上。幾次打電話給張春橋，張春橋都不接。徐景賢還說，馬天水也怕和張春橋通電話。⁴⁸ 陳冀德說，你就不能寫信給張春橋嗎？徐景賢說，他是想寫的，最近準備寫。談話結束，徐景賢送陳冀德出門時說，他寧可不當部長，也要說真話了。1975年3月10日，徐景賢果然給張春橋寫了一封信，反映他對王洪文的看法。後來徐景賢告訴陳冀德，他已經給張春橋寫信反映王洪文的問題，張春橋看後向他表示，支持他的這些意見。⁴⁹ 徐景賢的這封信，反映了王洪文在北京請客吃喝的鋪張，文革後被作為批判王洪文的證據之一。

徐景賢將陳冀德找去，訴說自己與王秀珍之間的矛盾。陳冀德知道徐景賢是希望通過她向張春橋反映他的苦惱和無奈，於是給張春橋寫了第三封信。這封信中，陳冀德將徐景賢所說的苦衷以及王秀珍的一些事都寫上，還表示了自己對工人造反派的質疑。文革後陳冀德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她當時對工人造反派很有看法，認為他們已經從安亭事件中受迫害的群體，變成「一月革命」後既得利益的群體。「按理說，他們應

46 陳冀德 2008 年《生逢其時》。

47 徐景賢著《文革名人徐景賢回憶錄》。不過，也只是王秀珍和王洪文經常聯繫。葉昌明、黃金海等都不越級給王洪文打電話或寫匯報。他們得到的信息，都是王秀珍傳達的，他們有事，也是向分管他們的市委書記王秀珍請示匯報。

48 陳冀德 2008 年《生逢其時》。

49 以上內容引自陳冀德 1979 年 2 月 27 日《交代我給張春橋寫的幾封信的內容》，但張春橋看了徐景賢的信後，是電話致徐景賢，還是批示，陳冀德記不清了。

該是工人階級的代表、領袖人物，他們也已經爬到了這樣的位置上。然而，怎麼看怎麼不像。爭權奪利，胸襟狹窄，目光短淺。只知有群體，不知有階級」，她質疑「這樣的一群人，能不能代表工人階級？像不像領袖人物？」張春橋的回信，說斯大林在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有段話，大意是蘇聯的大劇院是向工農兵開門了，但佔領舞台的未必就是工農兵。張春橋要陳冀德去學一學斯大林的這段話。⁵⁰

第四封信，是蕭木轉告的，說張春橋要寫作組「對九、十兩次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提出看法」，並指定要陳冀德執筆。陳冀德回信中，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表達了她對文革的困惑：老百姓從這一場偉大勝利中，得到了什麼？她認為文革在一些方面，非但沒有給老百姓帶來實惠，反而在有些做法上例如「割資本主義尾巴」，直接傷害了他們的利益；她在信中還反映了一些新幹部上台後多吃多喝抽好煙住好房等現象。

張春橋稱讚陳冀德寫的信，說「你的信我總是不吃力地看完了，因為你能夠告訴我一些我不知道的東西」。⁵¹ 張春橋還對朱永嘉說，不要單純將陳冀德作為行政人員使用。不過朱永嘉沒有及時照辦。

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接見陳冀德

陳冀德的坦率，令張春橋另眼相看。1976年4月，國家出版局在濟南召開「魯迅著作座談會」，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讓陳冀德去，會後再順道去北京，張春橋要見她。4月底開完濟南的會後，陳冀德去了北京，住在《紅旗》雜誌招待所。那些天，

50 陳冀德在1978年6月20日《交代我所知道的張春橋的黑話、批示》中說，張春橋的這段話是在對她的第三封信的回信說的。不過，陳冀德在2008年的回憶錄《生逢其時》中卻說，對她的第三封信，張春橋沒有回信。

51 以上資料均引自陳冀德2008年《生逢其時》。

正是北京市民紀念周恩來故逝的天安門事件剛過不久。姚文元先與陳冀德見了面，姚文元說，天安門事件那幾天很緊張，他甚至讓《紅旗》雜誌社的人每人準備一根棍子，「暴徒衝進來也好與他們格鬥」。姚文元還說：以後你們《學習與批判》上不要再開烈士傳的專欄。你們刊登紀念康老的文章，南京就要登紀念周總理和惲代英的文章，你們怎麼辦？⁵²

5月3日晚上，蕭木來招待所接陳冀德去釣魚台張春橋的住處。張春橋在二樓過道廊兼作客廳處和她談話。張春橋問陳冀德寫作組關於「階級隊伍調查」之事進行得如何，陳冀德回答不出。雖然行前朱永嘉對她講起過，但她不感興趣沒有聽進去。因為講到階級關係，陳冀德就講了他們在寫作電影劇本《蒼山志》時碰到的問題：劇本以溫州的個體經營者發家致富為題材，寫到僱工和貧富差別兩極分化的社會現象，這些個體經營者決非那些賣幾隻雞、幾個雞蛋、幾根蔥薑的農民，產生他們的社會基礎是什麼？他們是新生的資產階級，還是小業主？張春橋聽得很專注，但沒有表態。⁵³ 講到天安門事件，張春橋說，他進釣魚台整整十年，京官當得很辛苦，沒有機會與普通群眾接觸。這十年裏，他親眼看見一批批大走資派倒下去：劉少奇、林彪，等等，文化大革命一來，可見識過大走資派了。話題談到市總工會的工人新幹部，陳冀德將社會上陳阿大接待外賓時出洋相的笑話傳說轉述了一遍。但張春橋卻沒有接這個話題，而是談到潘國平，說他看到一則反映潘國平偷木頭的簡報，張春橋說，有些人，根本用不着自己動手，自會有人送上門來。⁵⁴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陳冀德又去了一次釣魚台，這次是

52 轉引自王紹璽 1977 年 11 月 21 日。

53 陳冀德 2008 年《生逢其時》。

54 陳冀德《生逢其時》。但潘國平偷木頭之事，據筆者看到當時市總工會審查潘國平的材料，沒有說他「偷」，而是倒賣木頭。

王洪文的邀請。陳冀德過去從沒與王洪文直接接觸。她本不願見王洪文，但轉達王洪文邀請的蕭木覺得不見不太好，建議她還是去，於是陳冀德如期赴約。秘書將她和帶她去的蕭木，引進一間專門放電影的小放映室，王洪文已經等在那裏。王洪文對陳冀德說：「《朝霞》的事情誤會了，不要往心裏去啊」。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以這句話，表示對朝霞事件的了結。王洪文請陳冀德看電影，說是兩部新的參考片。電影結束，又請陳冀德吃飯。比起幾天前，在張春橋那裏，晚飯只是由蕭木帶她去食堂吃的伙食相比，王洪文的圓台面要豐盛多了。旁邊還有六七個不認識的人陪吃。席間王洪文讓秘書廖祖康拿出茅台酒，請陳冀德喝酒，陳冀德推辭了。她後來回憶說，她不是不會喝酒，而是不願意喝。飯局沒完，陳冀德就推說晚了怕《紅旗》雜誌招待所關門，提前離席。

整個朝霞事件中，首先被衝擊的是陳冀德，王洪文以請她吃飯，作為化解前嫌的表現，也是做給張春橋看的姿態。

市總工會辦刊物受阻

朝霞事件，體現了市總工會對寫作組獨霸上海話語平台的不滿。

工人造反派的話語平台是逐漸失去的。最初工總司手裏有《工人造反報》，但沒有期刊。工總司總部曾經嘗試過辦期刊，但最後都沒被允許。早在1967年的大聯合時期，工總司總部就曾想將兩份小報刊物歸於自己。這兩份小報刊物，一份是不定期綜合性刊物《一月風暴》，屬於掛在工總司下的版聯。1967年6月創刊，以工總司的名義編輯。到1968年3月為止，共出五期，每期發行約二萬份。另一份刊物是《戰鬥》，油印，不定期，屬於掛在「上海市宣傳系統大批判聯絡站」下的「上海革命工人業餘理論寫作組」。1967年7月創刊，主要刊登大批

判文章。到1968年3月共出8期，每期發行2000冊。所載二百餘篇文章中，有五十多篇分別被《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和《工人造反報》轉載。

版聯和版司於1967年9月13日大聯合。「上海市宣傳系統大批判聯絡站」也在1968年2月5日，經徐景賢建議，改名為「工總司政宣組工人業餘革命大批判組」，活動地點從原來的衡山路，遷往上海市工人文化宮。1968年12月，工總司總部精兵簡政，撤銷了這個大批判組。兩個組織所屬刊物《一月風暴》和《戰鬥》，在大聯合與改名期間，都曾要求轉由市革會或工總司領導。工總司總部政宣組也希望兩個刊物停刊後，將它們改辦成其他同類刊物。1968年3月4日，工總司總部打報告給張春橋，要求停刊後再創辦綜合性的《上海工人》，月刊，16開，32頁，每期約七八萬字，發行五萬份，政宣組甚至已經物色了編輯人員，初步搭就了編輯班子，還打算將編輯部放在市工人文化宮。但張春橋沒有同意，說工總司有《工人造反報》就夠了。⁵⁵

不被允許辦刊物，工人造反派手中還有《工人造反報》，這是一個重要的輿論平台，影響遍及全國，甚至可以說，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所有的主張和要求，都曾經在這份報紙上體現。有了這份報紙，工人造反派才得以躋身上海的主流話語圈。但是，工總司總部主管這張報紙的時間不長。從1967年12月開始，《工人造反報》的業務歸市革會主管。工人造反派們不能再隨時隨意地對這張報紙施加影響了。不過，由於王洪文和王秀珍是市革會副主任，對《工人造反報》還是能夠有所影響；而且由於市革會對《工人造反報》的讀者群定位

55 上海市總工會批判四人幫資料。對於這一歷史，筆者曾經問過當時「工總司」的負責人葉昌明，葉說不記得有此事，但可能是「工總司」政宣組所為；那時「工總司」還沒有正規化，一些組室負責人以總部名義各行其是，總部對許多事情並不知曉不知道。

是工廠工人，所以內容還是以面向工廠為主。但到1971年4月，《工人造反報》停刊，上海工人造反派終於完全失去話語平台。

本來，工人造反派的主張通過《工人造反報》，不但向社會輻射自己的主張和影響，也與基層造反隊進行信息溝通與互動。沒有了報紙，當時的市工代會失去對下面各級工代會的信息交流平台。市工代會和後來的市總工會只好通過辦「內部刊物」的方式加以彌補。在五次工代會之前，是辦《總工會簡報》。1973年五次工代會後，市總工會又在《總工會簡報》之外，再出一份鉛印的《簡報增刊》，發放範圍僅限市委常委，包括在京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以及市委列席常委，加上市總工會的幾個副主席和王日初，由市委辦公室轉發。這份刊物前後共出93期。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展後，王秀珍佈置葉昌明「多搞些書面材料」。市總工會於是又辦油印的《批林批孔動態》，由葉昌明直接送馬天水和王秀珍(第33期後又加發陳阿大)，共出41期。批林批孔運動「急剎車」後，1974年10月，徐景賢要求市總工會《簡報增刊》和《批林批孔動態》都停刊。市總工會接着改出沒有刊頭的《內參》，最初每期由葉昌明簽發後，送王秀珍，再由王秀珍視需要，轉送馬天水、徐景賢或王洪文；1976年2月改為油印，每期除馬天水、徐景賢、王洪文外，還送陳阿大和在京的金祖敏；共出78期。⁵⁶

以上這些總工會內刊都是對上的，唯一對下的內刊是《情況交流》。《工人造反報》被停刊之後的一段時間裏，當時的工代會覺得沒有一份自己的刊物實在不方便，於1972年辦了內刊。16開雜誌大小，二頁，有時四頁，鉛印，不定期，發至區、縣、局以及行業公司工代會，內容主要是交流工代會系統的情況和工作經驗。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市總工會將《情況交流》版面擴大至8開，像張小報；增加了欄目，尤其增加報

56 上海市總工會運動領導小組 1978 年 1 月 25 日《上海市總工會清查情況匯報之四：關於葉昌明利用工會內刊大搞特務情報的清查情況》。

刊所特有的評論欄目；擴大發行至基層的工廠工會，還和外地工會交換。這是市總工會想辦一份公開刊物的試探動作。葉昌明沒有向主管工會工作的市委書記王秀珍匯報，他想悄悄先幹起來。王洪文更不知道此事。

但是，只出了一期，這份變相報紙就被市委寫作組的人看到，馬上通過朱永嘉交給了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何轉給在北京的張春橋。張春橋當即要何設法弄到一套完整的交他。何秀文辦到後，寄給張春橋。張春橋馬上通過王洪文，要上海市總工會停止這種做法。葉昌明只好將《情況交流》又恢復到原來的16開版面。不過，增加了頁面，稿子多時有厚厚的好幾頁。⁵⁷

儘管屢遭挫折，市總工會辦刊物的願望還是沒有打消。1976年，葉昌明又想辦工人文藝不定刊。市總工會所屬市工人文化宮，辦有工人業餘藝術培訓班，其中有文藝創作小組、文藝評論小組。但市總工會沒有刊物，工人業餘作者的作品沒有發表平台，工人作者要求有個發表作品地方的呼聲很高。市工人文化宮有時只好通過市總工會，將一些比較短小的工人文藝作品，發在市總工會的《簡報》上。1975年王洪文在上海時，8月7日他與上海市總工會常委談話，談到市工人文化宮的工人文藝創作情況時說：「市工人文化宮可以發些材料作些交流。」⁵⁸王洪文的意思是說市工人文化宮可以設法印發些作品供交流用。市工人文化宮的領導們聽說王洪文的這句話後，認為是個機會：「現在王副主席說話了，那就可以向市總工會提提，搞一個工人刊物，作些交流了。」於是向市總工會打報告，要求允許出刊物。11月17日，市總工會常委會討論了市工人文化宮的幾個工作報告，對其中試辦刊物的要求予以同意。

57 關於市總工會變相辦報之事的全部資料均引自何秀文1977年4月21日。

58 王洪文的這句話轉引自文革中的市工人文化宮副主任吳林生1978年3月8日《關於上海工人文藝作品匯編出籠的經過》，原件在市總工會，複寫件由吳林生收藏。

刊物的風格，市工人文化宮領導提出，「文章不要像《朝霞》那樣，盡是些知識分子語言，搞得文縷縷的；要像《工人造反報》那樣，尖銳潑辣，有自己的戰鬥風格。」⁵⁹ 刊物叫什麼名字？市工人文化宮希望能像《朝霞》那樣，叫個響亮漂亮的字，諸如《春苗》之類，但葉昌明不同意，他建議叫《上海工人文藝作品匯編》。市工人文化宮方面覺得這個刊名不好聽，而且給人以包羅萬象之感。他們建議叫《工人文藝》。葉昌明還是不同意，他知道辦正式刊物的要求報到市裏將通不過，所以他一再不同意市工人文化宮起的那些雖然漂亮、但一看就是刊物的名字。他的原則就是盡量低調，而且要給人以作品匯編集的感覺；因為既然是作品集，就不能算是刊物。這樣就用不着匯報，也是試探，打擦邊球。

這次葉昌明還是沒有向王秀珍匯報，王洪文也不知道此事。4月，市工人文化宮將樣書送葉昌明。葉昌明又覺得名字中的「匯編」兩字有種延續感，仍會給人以「下期還會再出」的刊物的感覺，提出改為「選編」，盡量向書名靠。市工人文化宮的幾個編輯表示，書已制版成型，這期改不了，下期改。⁶⁰

1976年5月1日，第一期《上海工人文藝作品匯編》出版，16開雜誌大小。內容有反映「一月革命」的獨幕話劇《一月的汽笛》，還有詩歌、小說、小評論等。這份刊物甚至向全國征稿：歡迎全國各省市的工人業餘作者踴躍投稿；除文藝作品外，其他政論文、情況交流等也都歡迎。新刊除了發給區、縣、局工會，市工人文化宮還分送市委寫作組的《朝霞》與《學習與批判》編輯組、市革會文教辦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朱永嘉、徐景賢等人。市工人文化宮召開座談會，邀請上棉

59 王洪文的這句話轉引自文革中的市工人文化宮副主任吳林生 1978年3月8日《關於上海工人文藝作品匯編出籠的經過》，原件在市總工會，複寫件由吳林生收藏。

60 以上這些都是文革後葉昌明向筆者回憶的。

十七廠、上棉三十廠等工廠的工會，評論這本新出的雜誌。之後發簡報，說工人作者對這本作品集反映非常好。葉昌明的宗旨就是低調，沒想到市工人文化宮還是將事情辦得如此高調。簡報送到葉昌明處，葉昌明覺得不妥，太張揚。他要市工人文化宮下期不但改名字，而且開本要改小，32開，更不要再發簡報。⁶¹

在市工人文化宮編輯出版《上海工人文藝作品匯編》的同時，葉昌明正擬籌備辦另一份刊物《工人理論》，是給基層的工人理論小組發表文章的。由上海工人政治學校與市總工會宣教組合辦，以上海工人政治學校的名義出版。葉昌明對工人政校的負責人說：「要準備辦校刊，使理論隊伍有一個發言的陣地，有稿源的話，可出雙月刊。」為此，市總工會打算從市總工會的辦公室、宣教組、市工人政校等單位抽調人員，組成《工人理論》編輯部。⁶²

儘管葉昌明始終非常小心，謹慎低調，但是，還沒等到《上海工人文藝作品匯編》第二期出版，更沒等到《工人理論》第一期出版，張春橋的批評就到了。原來，《上海工人文藝作品匯編》第一期剛出來，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就從印刷公司看到了樣書，後來徐景賢又給他一本。何秀文隔手就都轉交給了張春橋，張春橋當即寫信給王秀珍，要王秀珍調查此事。⁶³ 王秀珍此時正回廠勞動，廖祖康從北京帶來張春橋給她的那封信以及王洪文的指示。張春橋信的內容如下：

61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09 年 7 月 19 日對葉昌明的訪談，以及葉昌明對筆者的回憶。

62 上海市總工會「清查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餘黨運動領導小組」：《關於王秀珍、葉昌明利用工人理論隊伍進行篡黨奪權罪惡活動的清查情況》，1978 年 1 月 25 日。

63 何秀文 1977 年 4 月 21 日。

秀珍同志：

收到一本市工人文化宮出版的《上海工人文藝作品匯編》。我了解一下，這個刊物是什麼時候籌備的？上海市總工會討論過沒有？報告過市委沒有？主要編輯人員是些什麼人？他們有些什麼打算？這個刊物出版會不會引起什麼問題？總之，我有些想法，等你調查清楚之後再說，免得犯杞人憂天的錯誤。

張春橋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九日⁶⁴

王洪文也讓廖祖康轉達指示，內容也是批評市總工會不向市委請示，而且「也不報告我這個主任」，這是指他的上海市總工會主任之職。王洪文並要市總工會常委整風。廖祖康向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傳達了張春橋和王洪文對市總工會那本刊物的批評後，馬天水批評市總工會不請示匯報自作主張。徐景賢說：「這個刊物，設計人員也很用心的，設計和編輯仿《朝霞》一樣，這個市工人文化宮的刊物，和《朝霞》爭稿子，爭業餘作者。這個刊物要和《朝霞》對着幹。」⁶⁵徐景賢還在5月底指示說：「關於印刷品的整頓問題，最近這個問題，市委作了討論。上海出書印資料存在着某種混亂情況。隨便啥人都能出，市委研究了要把出書權收回，各單位不可自行出書，出書要由出版社出，要出版新的報刊須經市委批准。」

王秀珍只得讓人幫自己寫了份檢討，還讓徐景賢和馬天水幫忙修改，向張春橋檢查自己對市總工會管理失職。馬天水則打電話給葉昌明，要他停止市工人文化宮的刊物。馬天水對王秀珍說：張春橋最不放心的就是市總工會，怕這幫造反

64 上海市總工會 1976 年王秀珍召集部分市總工會常委整風會議的會議記錄。原件為市總工會檔案。

65 轉引自王秀珍 1977 年 3 月 27 日。

派出事。⁶⁶ 6月21日，王秀珍給市總工會葉昌明批示：「關於《匯編》的問題，請市總工會常委認真討論一次，並正式報市委批准。」⁶⁷ 王洪文則給市總工會出了兩個題目：「為什麼要奪舊市總工會的權？為什麼要奪張祺的權？」要市總工會常委討論，對照檢查。王秀珍說：「洪文同志這次到上海來給我們出這兩個題目，意義非常深遠，我們要想得遠一點，議得深一點。洪文同志說，討論得好，接見大家，討論得不好，就不接見了。」

6月21日起，市總工會在延安路200號接連開了三天的常委整風會。但大家對王洪文這兩個題目和王秀珍鄭重其事的發揮都摸不着頭腦，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主持市總工會工作的葉昌明首先作檢討，然後常委們一個個跟着檢討。葉昌明說市總工會買了一輛大客車，沒有向市總工會主任王洪文匯報過，這是工團主義，是走張祺的老路。其他常委也都盡量翻出一些事情作自我檢查。⁶⁸ 誰都猜不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整風會整整開了三天。6月24日上午，在東湖路上的東湖賓館又開小會，參加對象是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戴立清、馬振龍等部分常委，實際就是市總工會的核心。王秀珍說：這是王洪文佈置的，三天會議內容她都向王洪文匯報了，現在再開個小會，只是部分市總工會常委參加：「大範圍搞了三天，請示了洪文同意，我們小範圍再開一開。」王秀珍向大家念了張春橋給她的那封信後，又傳達說，張春橋還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不能隨便出刊物。」⁶⁹ 張春

66 這是文革後王秀珍對筆者回憶的。

67 徐景賢的話和王秀珍的批示均引自文革中的市工人文化宮副主任吳林生1978年3月8日《關於上海上海工人文藝作品匯編》出籠的經過，原件在市總工會，複寫件由吳林生收藏。

68 汪湘君1977年8月29日。

69 以上關於市總工會整風會議情況以及張春橋的信，皆引自上海市總工會1976年常委整風會議記錄。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橋的這段話，是寫在王秀珍報給他的那份檢討上的批語，已經退批給王秀珍。大家這才明白開這樣的整風會，是因為張春橋對市總工會自辦刊物的批評。葉昌明為自己辯護說，是王洪文要活躍工人業餘文藝創作，豐富工人業餘生活，他是貫徹王洪文的指示。但王秀珍說葉昌明不請示市委就辦刊物，而且張春橋說社會主義國家不能自由辦刊物，一定要葉昌明檢討。葉昌明最後只得檢查自己「缺乏全局觀念和黨的觀念」，有「工團主義傾向」。⁷⁰

市總工會辦自己的刊物的嘗試，就這樣只出版了一期即嘎然而止，至於另一份《工人理論》，更是沒有出版就夭折。8月初，市總工會開會，決定將市工人文化宮的《情況簡報》也停止。這還不算，葉昌明因為不向市委匯報就試圖出版雜誌，被張春橋批評。王洪文於是讓廖祖康對王秀珍說，葉昌明在市總工會不行，找個人把他換下來。但王秀珍和馬天水商量後，覺得葉昌明在工會系統已有一定影響，而且一時也找不到可以替代他的人選，拖了下來。⁷¹

小結

寫作組成員與工人造反派互相看不起，反映他們各自對自己在文革中的政治定位。寫作組成員對工人造反派始終有着道德優越感。只是因為工人的名份從來就比知識分子高，他們在名義上必需維護工人造反派的老大名份。所以在這場糾紛中，寫作班雖然贏了，但卻贏得很低調。

朝霞事件是工人造反派與文人造反派對話語平台的爭奪。工人造反派不滿寫作組對文化的霸權主義，認為寫作組的刊物一沒有真實反映工人造反派的形象，相反還貶低歪曲；二沒有

70 上海市總工會 1976 年常委整風會議記錄。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71 王日初 1977 年 11 月 3 日。

為工人的作品提供更多的發表機會。當全國的工人理論小組滿足於為政治運動作詮釋時，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更進一步希望擠進主流話語圈，一再試圖自辦刊物報紙，以使自己的主張有發表的平台。但市總工會兩次試辦刊物都遭封殺。寫作組掌握着上海的輿論、思想和文化的話語權，上海所有的文化刊物都在他們手中。他們視此為自己的領地，不要說對文革有疑義的思想無立錐之地，就連同一陣營的工人造反派也休想染指。兩次向張春橋匯報的都是寫作組，寫作組不願意看到總工會辦刊物，既有政治優越感，也有文化優越感，更顯示他們的文化霸權思想。

從朝霞事件可以看出工人在文革中的真正地位。儘管工人作為一種象徵被抬得高高，儘管報紙上一再宣揚工人階級的崇高地位，但工人連辦個刊物都一再受到打壓。工人造反派對外不能建立表達自己意願的話語平台，對內不能建立自己勢力的信息聯繫通道。而且施加和參與打壓的，正是將他們抬得高高的張春橋和寫作組。他們骨子裏對工人造反派不放心，這顯示工人階級崇高名份的虛偽。

上海工人造反派希望能依托自己的刊物提高政策影響力，但根本不被允許。文革的話語權始終掌握在毛澤東手裏，在中央，輿論都由張春橋、姚文元等掌管，詮注和闡釋毛澤東的想法；上海的輿論則由徐景賢掌管。上海工人造反派就連詮注權都沒有，有的只是重複那些詮注，或闡釋那些闡釋。市總工會的工人理論隊伍雖然搞得聲勢很大，但始終沒能像寫作組那樣真正佔領或左右中國的思想界。王洪文雖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及上海市委副書記，但根本無法影響中央的報刊，連上海的報刊都影響不了，這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口號背後，工人崇高地位有名無實的實質。

第三十八章

另類思潮

來自邊緣的思索

「共向東」呼喚共產黨員的執政意識

1967年6月30日，中共建黨紀念日7月1日的前一天，上海主要街道出現一批傳單：《致共產黨員的一封公開信》，下面的署名是「共向東」。這個名字的含義一目了然：「共產黨員心向毛澤東」，作者肯定是共產黨員。自一月奪權以來，被「造反」壓抑了半年多的共產黨員的身份意識，在這份傳單中重新被提起。

傳單的撰寫者，是市革會宣傳組的四名共產黨員：胡志宏、閔孝思、朱根富、吳敦宏，文革前都是市委宣傳系統的幹部。文革開始後，從北京紅衛兵南下衝擊上海市委，到徐景賢率寫作班集體造反，他們對文革始終不理解。但毛澤東號召幹部投入和支持文革，大勢所趨，他們後來也加入了各自單位的機關幹部造反組織「機關聯絡站」。一月奪權後，市革會成立，他們作為機關聯絡站的原機關幹部，成為市革會政宣組工作人員。閔孝思是政宣組長，胡志宏是政宣組下的出版小組組長，朱根富在政宣組下的簡報小組，吳敦宏在政宣組下的文化組。但是，即使進入市革會工作，他們對文革的懷疑還是沒有消除。他們看不慣造反派，尤其一些進入市革會工作的造反派。他們覺得這些造反派隨心所欲，無視規則，拉山頭，搞派性，爭權力。閔孝思等經常在一起議論這些現象。他們雖不敢懷疑文革，但對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卻有懷疑，尤其對文革將

共產黨員邊緣化有懷疑：「除了我們還在考慮關心這些黨員之外，市革會中不知還有誰在考慮？他們上台以後怎麼還會考慮這些黨員呢？」¹

不過，他們認為當前的亂是暫時的，奪權後總會恢復秩序，局勢不會任造反派長久控制，以後終究還是會再依靠共產黨員的：

基層造反隊組織隊伍複雜，將來還是要共產黨員起來。……

造反派掌權支持不能久，總是要黨員真正起來，才能把工作搞好。

1967年6月3日，張春橋傳達毛澤東暫不恢復黨的活動的講話，提到黨員作用：「我這一次在中央，正式向主席請示過黨組織是不是恢復活動的問題。毛主席說：我們的黨，很多黨員，這些年來脫離群眾太厲害了。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們黨可以得到改造。在目前恢復活動，不好，因為群眾還沒有這個要求。恢復了，他們也不能起戰鬥的領導的作用。因此，毛主席說，這個問題半年以後再說。在這裏，我就向上海所有的共產黨員，正式傳達黨中央、毛主席的這個意見。在半年的過程裏邊，我們想，所有的共產黨員同志，應該像我們以前說過的，不要忘記了自己是共產黨員。」²張春橋的這個講話，讓一些共產黨員重又感到了自己的黨員身份。閔孝思他們覺得，是呼籲共產黨員挺身而出的時候了，組織生活不恢復，黨員串聯活動

1 轉引自《把共向東的黑話拿出來示眾》，文藝戰報 1967 年 12 月 16 日，上海《文藝戰報》編輯部編輯；以及金光耀、筆者 2012 年 12 月 21 日對閔孝思的訪談。本節內容，全部引自這個訪談；共向東的 9 篇文章，全部為閔孝思提供。

2 《張春橋同志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報告會上的講話》，1967 年 6 月 3 日，載於的《學習文件》。這份《學習文件》沒有署名編印單位和日期，但看編排和印刷，應該是市革會在 1967 年 6 月編印的。

應該是被允許的。他們決定，寫傳單向全市共產黨員呼籲：不要消沉，要站出來投入文革。6月底，閔孝思寫出了底稿，由胡志宏在此基礎上，重新起草；題目定為《致全市共產黨員的一封公開信》，署名「共向東」。朱根富拿到人民美術出版社打印了一千份。6月30日晚上下班後，大家和宣傳系統的其他黨員去淮海路、南京路、外灘等主要街道張貼。還刷了大標語。選6月30日這個日子，是因為第二天7月1日就是中共建黨紀念日，「黨的生日」，傳單的日期就是7月1日。

這份傳單的主要內容是呼籲共產黨員要「保持旺盛的革命鬥志」，「建立新的功勳」；不要因為別人不准自己造反就消沉，不要怕「不准革命，不准造反」的「假洋鬼子」；「革命，是共產黨員的天職，只要人活着，就要革命，這是用不到誰批准的」；不要因為「對造反派有的做法看不慣，不服氣，於是自己也就冷眼旁觀，甩手不幹」。傳單表達對造反派打、砸、搶、隨意抄家抓人以及山頭主義、風頭主義、無政府主義行為的不滿，呼籲黨員不要參與。傳單認為，黨的組織生活只是「目前暫時不恢復，是由於形勢的需要，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正是對每個共產黨員最嚴峻的黨性考驗」。³ 傳單強調共產黨員的身份意識，在號召共產黨員積極投入文革的同時，也使人在字裏行間感覺出對造反派的批評，尤其能夠感覺這些共產黨員隨時準備重回主流政治的執政意識。

以後，他們又繼續撰寫了15份傳單；連同第一份，共16份傳單。打印並張貼出來的有9份：

1. 《致全市共產黨員的一封公開信》，1967年7月1日。
2. 《共產黨員行動起來，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給全市共產黨員的第二封公開信》，1967年8月2日。

3 以上引文均引自共向東《致全市共產黨員的一封公開信》，1967年7月1日。

3. 《關於正確貫徹「文攻武衛」的緊急呼籲》，1967年8月19日。
4. 《革命群眾行動起來，堅決制止武鬥歪風》，1967年8月28日。
5. 《共產黨員要爭當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鋒——給全市共產黨員的第三封公開信》，1967年8月30日。
6. 《革命群眾行動起來，堅決取締宣傳品「自由市場」》1967年9月19日。
7. 《極「左」思潮剖析》，1967年9月25日。
8. 《共產黨員永遠要做革命人》，1967年10月17日。
9. 《共產黨員要做抓革命、促生產的模範》。⁴

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批示》。「共向東」覺得，是時候將黨員串聯起來，為恢復黨組織生活作準備了。1967年11月19日上午，「共向東」聯繫了宣傳系統400多個共產黨員，在襄陽南路上的襄陽小學召開大會。會議名稱是「共產黨員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大會」。所有活動都是公開的。

共向東的活動引起游雪濤關注，寫成情況報張春橋。11月24日，市革會政宣組和市委宣傳部的造反派，以開會為名，將共向東的4人以及一名原市委宣傳部幹部，由上藝司負責人劉軍一指揮，抓去紅旗電影製片廠(原海燕電影製片廠)關押。劉軍一指使手下毒打他們。胡志宏被打得口吐鮮血；閔孝思被打得胸部受傷，小便失禁，還曾被打得昏死過去；朱根富被打得鼻青臉腫。一個「共向東反革命集團」被揪出，全市五百多共產黨員、包括一些與共向東觀點相同的非黨員受到牽連。其中約一百多人被關押遭毒打。原人民美術出版社的趙福昌，曾經參

4 閔孝思向筆者提供了其中8份的復印件，缺第9份傳單及其撰寫日期。

加過共向東的活動。被抓後不但遭打，還被搞了一次假槍斃。一位懷孕婦女被打得流產。許多人因遭毒打，落下毛病，甚至被逼瘋。⁵朱根富等人被趕去幹校，一次又一次被審查。

張春橋始終懷疑共向東後面有人指使，一定要揪出「黑後台」。胡志宏是從上海警備區部隊轉業的，於是追查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與共向東的關係；吳敦宏文革前是市委宣傳部的機要秘書，於是又查原市委宣傳部長楊永直是否與共向東有聯繫。⁶共向東幾次被立案，1971年更被立為全市10個「反革命大案」之一。

文革前，作為執政黨成員的共產黨員，是個非常優越的政治身份。除了知名人士或代表性人物，以及技術、業務人員，不是黨員很難進入市、區、縣、局、公司等黨政科層。即使在基層工廠，絕大多數共產黨員都不會只是普通工人。他們通常起碼擔任生產組長、工會小組長等基層職務。而每周一次的「黨組織生活」，更是強調黨員身份的神聖儀式，將共產黨員和普通老百姓從心理和組織活動區分。加上每次政治運動，每個中央決策，都是首先向黨員傳達，然後再向群眾傳達，黨員比群眾有更早的信息權。這一系列刻意的政治待遇分級，使得即使是普通黨員，都有一種光榮感、優越感和執政意識。1967年一月奪權後，嚴密的基層黨組織癱瘓，黨的各級委員會被革委會替代，各級黨組織停止活動。運動初期黨員又大多參加保守派，「黨員」成為「老保」的代名詞。原來在各單位都是政治精英的共產黨員被普遍邊緣化，「革命造反派」成為更響亮的政治名份，政治地位超過了黨員。昔日因黨員身份而處處比別人優越的黨員，現在成為最普通的群眾；甚至因為曾經參加過老保組織，比普通群眾還不如。而定期的「組織生活」被取

5 1978年7月27日「貫徹中央23號文件，控訴「四人幫」罪行大會」閔孝思的發言稿，閔孝思提供。

6 同上。

消，更令許多黨員沒有了歸屬感。

共向東呼喚共產黨員的身份意識，呼籲黨員投入文革，參與文革。這是共產黨員和機關幹部執政意識的恢復。共向東不甘共產黨員被文革邊緣化，他們要喚起共產黨員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恢復文革前共產黨員在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和主導地位。這使造反派意識到自己非黨員身份掌權的合法性危機。而他們批判共向東的核心，也正是說共向東企圖奪文革的權。

「東方論壇」反對否定一切的批判

「何是」，原名何志強，當時是上海鍋爐廠設計科的技術員。畢業於中專的上海機械學校，共青團員，1956年被分配進上海鍋爐廠，擔任技術員；1963年被評為「上海市五好職工」。何是也可算是「老造反」，1966年安亭事件之前，便已參加廠裏的造反隊，不過只是普通的造反隊員。

何是對文革強勢話語式的蠻橫批判始終很有看法，反感姚文元對《海瑞罷官》的批判，覺得姚文元強詞奪理，以勢壓人。他尤其反感文章中的一段話：「我國是一個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如果說什麼『平冤獄』的話……那末請問：到底哪個階級有『冤』，他們的『冤』怎麼才能『平』呢？」他覺得，如果按這樣的推論，那麼，老百姓如果有冤，就不得申訴了，申訴就成了敵對階級了？1967年2月，他寫出針對姚文元的文章：《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看姚文元》，文章以文革批判「走資派」之矛，攻姚文元文章之盾，提出按姚文元這樣的說法，就沒有走資派壓制群眾之一說了；姚文元在文革前夕寫這樣不准群眾造反的文章，是為走資派說話。3月的一天，何是將文章抄出，署名「政治清道夫何是」，張貼到南京路上永安公司的走廊裏。取名「何是」，意為「實事求是」；取名「政治清道夫」，蘊含着將姚文元看作政治垃圾的

鄙視。文章貼出後，沒有招來麻煩，當時正是一月奪權混亂之際，大字報很快被其他大字報覆蓋。

1967年7月，何是成立了「東方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批判學會」，簡稱「東方學會」，引用毛澤東在《矛盾論》中的一句話作為《宣言書》內容：「共產黨人的任務就在於揭露反對派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思想，宣傳事物的本來的辯證法」。1966年10月，又出鋼板刻寫油印本的《東方論壇》，在上海鍋爐廠的廠區以及上海南京路等鬧市區散發；有的文章還抄成大字報，在南京路鬧市區張貼。說是「東方學會」，其實這個學會只有何是自己一人，寫文章，刻寫鋼板蠟紙，抄寫大字報，散發和張貼文章，都是他一個人幹。何是性格比較內向，平時有了想法也不多和周圍人商討，只是自己寫成文章。

何是的油印不定刊《東方論壇》，到1967年12月底，共出十二期。中心內容就是對否定一切的文革式批判的批判。尤其《論「吃小虧，佔大便宜」》、《造「忘我」的反》、《論「我」》等文章，更是對那種強權式批判的不屑，即使是對已經被毛澤東定位打倒對象的劉少奇的批判。劉少奇曾批評一些人愛佔小便宜怕吃虧，說不怕吃虧的人，最後是佔便宜的。1967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任立新的文章，將劉少奇的這些話總結為「吃小虧佔大便宜」說「『吃虧』，『佔便宜』等等，本來就是資產階級交易所裏的行話，只有從投機商的嘴裏才吐得出來的」。何是讀到這樣的論述，非常反感，認為太武斷。他寫出《論「吃小虧，佔大便宜」——兼與任立新同志商榷》，認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考慮到「吃虧」和「佔便宜」，是人之常情；何況毛主席的文章中也時有提到這兩個詞，毛主席而且說過「世界上沒有什麼超功利主義」。這篇文章何是寫得比較隱晦，是以批判劉少奇的話語，實際批判空洞的政治說教。而在他1966年11月24日寫的題為《造「忘我」的反》中，他的意思更清楚：

大「我」是由小「我」們構成的，大「我」不能丟，小「我」當然不可丟，要是都丟掉了小「我」，還有什麼大「我」呢？

他還指出，那些成天號召大家「忘我」的人，正是等着「你們都中了毒，便出來一口把你咬死」。⁷

在另一篇《也評「右派翻天」》中，何是的批判矛頭更是指向新的當權者：

有的人階級地位變了，由被統治階級變成了統治階級，但是剝削思想的影響沒有改變，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根據條件齊全，於是他的思想就必然打上新興資產階級烙印，自覺與不自覺地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俘虜，由以前的真正左派變成自以為是的「左派」，實際上的「左派」蘇聯的教訓告訴我們，這才是最危險的「右派翻天」，因此必須對這些人大喝一聲，是清醒的時候了！

何是還在另一篇題為《也評「壓迫」》的文章中批判了文革中因自身地位變化，重蹈以權力壓制不同聲音的現象：

誰要是不再感到資產階級壓迫，覺得自身已經完全解放，那就意味着他已經站到資產階級一邊開始壓迫無產階級了。這是昔日保守派的教訓，也是今日造反派的借鑑。

又是游雪濤，發現了何是的作為。他將何是的文章摘編進他的《掃雷演示文稿》，還派人去何是工作的上海鍋爐廠調查。當時上海鍋爐廠有兩大派。何是參加的一派簡稱「總

7 不過，何是後來回憶，雖然對姚文元有看法，但是對張春橋，他那時卻沒有懷疑。

部」，何是始終只是普通成員。游雪濤手下寫出關於「東方學會」的情況報張春橋。雖然「東方學會」實際只是何是一人的「學會」，而且游雪濤派去的人也沒有接觸過何是，但報告還是將「東方學會」說成是「總部」下面的一個組織。張春橋在游雪濤報的情況上批示：看來這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應該組織力量，發動群眾，展開批判。張春橋要王洪文關注此事。⁸

1968年2月18日，何是被關押；3月9日，王洪文和王承龍去上海鍋爐廠召開大型座談會，連續幾天發動全廠職工「揭蓋子」，批鬥何是。自3月11日第108期起，《工人造反報》連續四期整版刊登批判何是的文章，說何是「瘋狂地為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翻案，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取名「政治清道夫」，就是「要為復辟資本主義掃清道路」。還將上海鍋爐廠兩派長期對立歸咎於何是。儘管何是始終只是一人活動，但還是硬被說成是一個「反革命小集團」，以此為由，除何是外又抓了2人，其中一人是「總部」的頭頭；「隔離」9人，辦「學習班」27人；這些人全部被抄家。「總部」的對立派「聯縱」，也利用批判何是之際，清除觀點傾向「總部」的幹部。何是被關在楊浦區公安分局，直到1970年才釋放。以後還被關押過幾次，所有關押時間加起來共兩年。最後雖被放出，但定為反革命分子，回廠勞動，直至文革結束。⁹

文革號稱造反運動，號召「懷疑一切」精神。但實際上，所謂的造反，必需與決策層意向一致，只能定向造反。何是對抗文革話語，為劉少奇爭辯，違反了導向，遭到嚴酷批判。充分顯示文革的「四大自由」的實質。

8 徐景賢 2003 年《十年一夢》。

9 本節所引何是文章，均出於上海工人造反報 1968 年 3 月編印《「東方論壇」反革命言論集》，其他內容均為筆者 2013 年 2 月 19 日對何志強(何是)的訪談。

《一切為了九大》以「階級關係變動論」解讀文革

1968年2月，中申會遭到批判。起因是一篇文章：《一切為了九大》。

《紅衛戰報》1967年9月被市中學紅代會接管，傾心辦了近一年的報紙就這樣易主，紅上司的一些人很不甘心。換出入證後的一天晚上，原光明中學紅上司在《紅衛戰報》的編輯楊志東，潛入編輯部，拿走了公章和「紅衛戰報」字樣的報頭制版；然後與光明中學的原《紅衛戰報》編輯馮軍，以這個制版，於10月底辦了份油印版的《紅衛戰報》，11月21日出了第一期，刊號為「復刊號(總43期)」，以示對原紅上司所辦的《紅衛戰報》的延續；主辦單位也與原來一樣，仍是「《紅衛戰報》編輯部主辦」。¹⁰ 還特地刊登了《復刊詞》，以及告讀者書《我們為什麼要辦〈紅衛戰報〉油印版》。告讀者書聲明：自從被中學紅代會(籌)接管後，《紅衛戰報》「大權被竊，庸夫當道」，「毫無生氣，筆遲鋒鈍」；所以決定辦油印《紅衛戰報》，「給那些想在政治上、經濟上扼殺《紅衛戰報》的傢伙一記響亮耳光」。以後的幾期油印版上，也刊登多篇針對市中學紅代會的文章，例如復刊號總第3期上的《評〈關於中學運動申聯會問題的聯合聲明〉》，總第46期上的《反對口頭革命派》、《駁對〈前進〉的幾個謬論》，等等。共辦了四期，刊號到「總第46期」。

中申會本來就對《紅衛戰報》被市中學紅代會接管很不以為然，認為是抽去了《紅衛戰報》的造反精髓。而且《紅衛

10 筆者2011年4月19日對原《紅衛戰報》編輯、光明中學學生馮軍的訪談時，馮軍只記得他們肯定辦了油印版的《紅衛戰報》，但記不清他們到底辦了幾期。以後，筆者在上海史資料收集專家林鷗那裏，看到了他所收集到的油印版《紅衛戰報》，共有總第43期(復刊號)，總第46期，還有一期沒有寫明刊號，估計是總第44期或45期。以後「中申會」辦的影印版是總第47期。如此推算，油印版應該辦了4期。

戰報》本來是中申會的話語平台，被市中學紅代會接管，中申會失去了說話陣地。看到光明中學的油印版《紅衛戰報》，中申會聯絡會議認為：應該正式辦一份報紙，以發表中申會的聲音。於是派交大附中學生魏威，前往光明中學與楊志東等聯繫，組建編輯部。¹¹

中申會不承認市中學紅代會接管後的《紅衛戰報》，稱其為「偽《紅衛戰報》」；將自己這份報紙仍然稱為《紅衛戰報》，而且仍然沿襲原來的刊號，將光明中學編的那四期油印的也算進。首期刊號定為「總第47期」，以示與市中學紅代會接管之前的《紅衛戰報》的血脈與傳承。辦報的紙張由一些大學的紅衛兵組織支援，也有相當一部分是紅鷗去炮司要來。由於上海所有的報紙都由《文匯報》、《解放日報》和原《新民晚報》(後被《工人造反報》接收)三家報社承接印刷，這三家報社全部由市革會掌控，中申會的這份報紙沒有地方印刷。而他們又不願用滾筒油墨印小開的傳單式報紙，堅持開面一定要與原來的《紅衛戰報》一樣大，對開。有人想出用手抄後曬圖影印的方式，大家都覺得可以。於是由交大附中負責謄寫，紅鷗去印刷技校聯繫了印刷事宜。¹² 1968年1月20日，第一期(總第47期)影印版《紅衛戰報》出版。主辦者為「上海中等學校無產階級革命派」，這是中申會的對外名稱，大型歌舞劇《前進》的「主辦單位」用的就是這個名字。這份影印版《紅衛戰報》可以說是中申會的機關報。

就在中申會籌辦影印版《紅衛戰報》時，他們看到一篇署名「毛兵」的文章《論思潮鬥爭》。文章刊登在上海中學的一

11 參加辦報的主要有交大附中高三學生魏威、復旦附中高一學生張水榮、復旦中學高一學生管宇春、光明中學初二學生馮軍等。

12 以上資料為筆者2009年11月25日對當年的「中申會」成員：復旦中學高一學生管宇春、復旦附中高一學生張水榮、交大附中高三學生魏威的訪談，以及筆者2011年4月19日對原《紅衛戰報》編輯、光明中學學生馮軍的訪談。

份油印刊物《中學紅衛兵》上，是中串會觀點的上海中學學生宋永毅等辦的。文章引用了馬克思的一段話：「在第一次大成功之後，勝利的少數者，總是發生分裂；有一半，對於已經獲得的，覺得滿足；有一半，卻還要向前進，提出新的要求」。毛兵而且分析說這些「覺得滿足」者，都是當前的「溫和派」。這篇文章受到影印版《紅衛戰報》編輯們的注意，魏威於是向毛兵約稿。

毛兵是上海中學高三學生，原名戚偉堂。文革中曾取名毛卒，「毛主席的小兵」之意，但隨即被質問取這個名字居心何在？因為「卒」還有「死亡」之解。於是他又改為「毛兵」。他出生於「資產階級家庭」，喜歡研究理論。一個當時和他比較接近的學生，文革後回憶，說他「中等身材，長得相當漂亮」，「聚會中常以雄辯口才和獨到見解令人折服，特別是他對文章中每次用詞的細微差別，以及他對馬列著作的熟悉和引經據典的能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認為中國出現修正主義的危險在幹部身上，因此這次運動的對象是幹部」；「他立志成為一名最下層人民的代言人。他最為崇拜的對象是法國大革命中的羅伯斯比爾和馬拉。」¹³

第一期影印版《紅衛戰報》上，刊登了毛兵寫的《從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以及魏威寫的《給春橋同志的一封信》，但沒有引起反響。編輯部於是決定，第二期上要刊登有份量的重頭文章。毛兵在編輯部談了自己關於階級關係變動的觀點，大家覺得耳目一新。一致決定：「你寫！寫出來作為重點文章，作為『中串會』的旗幟！」¹⁴

但毛兵交出的初稿，內容冗長，語言生澀，而且不分段落，沒有小標題，讓大家讀不懂，看了半天不知所以然。於

13 管宇春 2014 年未刊回憶錄《〈一切為了九大〉寫作前後——我和毛兵》。

14 筆者 2009 年 11 月 25 日對魏威、管宇春、張水榮的採訪，這段話是張水榮回憶的。

是，由魏威做了大量刪節，並分段加小標題。除此而外，毛兵的初稿有好幾處很「出格」的觀點，大家看了後，覺得太激進，要毛兵刪去，毛兵開始不肯，後來作了妥協，同意刪改。文章原來的題目是《為黨的「九大」勝利召開而奮鬥》。編輯張水榮覺得太長，改為《一切為了九大》。¹⁵ 1968年2月15日，第二期(總第48期)影印版《紅衛戰報》出版，《一切為了九大》被放在第一版。

文章認為，文革是一場變動階級關係的大革命：

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最頑固的維護者和最集中的代表者走資派與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已經上升到主要地位了。這一基本史實，對於階級關係的變化起了決定性的影響。不斷鏟除這些渣滓，引起了階級關係的不斷變動，引起了革命隊伍中依靠對象，團結對象，爭取對象以及清洗對象的不斷變動，引起政權的相應變化，這就構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發展的階級鬥爭史的主要內容。……

從解放戰爭到文化大革命，黨內機會主義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為主要的矛盾，為革命的主要對象，並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陣線內部的依靠、團結、清洗對象的變動，這就構成了階級陣線的大變動。由此可見，階級陣線變化與否並不決定掌權階級變化與否。

文章對十七年的政治身份劃分標準提出異議：

15 同上。但是所謂的「激進觀點」具體是什麼，魏威說「我現在已經忘了，反正很厲害的」。筆者曾經問過他們，在撰寫《一切為了九大》時，是否受到湖南、湖北等地同時期的異端思潮的影響，他們說沒有，因為沒有看到那些文章，包括毛兵。湖南「省無聯」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他們是在出逃的路上才看到的。不過北京清華大學的《四·一四思潮必勝》，可能毛兵看到過。

被走資派所發現和組織的十七年來的「左派隊伍」，並非完全是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風暴雨中，已經暴露出其中有一些是右派，為數眾多的是中間派。……

非黨員要比黨員好，非幹部會比幹部好。走資派排斥了大量優秀的革命分子。越是基層，越是受到黑線影響小的同志，比較接近生活，比較尊重客觀，尊重真理，也就比較能接受毛澤東思想。¹⁶

第一期的出版日期標明是1968年2月15日，但這只是紙面上的日期；真正的出版日期在2月22日之後。據說，這是因為這一期上還刊登了一篇文章：《長寧區文化革命運動考察報告》，內容針對張春橋2月22日在各區縣經驗交流會上的講話；為了掩飾文章的指向，編輯部特地将出版日期標得比張春橋的講話提前。¹⁷

第一期影印版《紅衛戰報》出來後，立即受到注意。市革會寫作組密切注視並跟蹤着中串會的活動。寫作組的朱維鏗等，收集了大量中串會的資料，不但包括《一切為了九大》文章，還包括之前毛兵寫的《論思潮鬥爭》，以及中串會在華東局等處的活動情況，密報徐景賢。徐景賢說這是一股「反動的社會思潮」，說「一切為了九大，是一切為了反九大」。密切跟蹤着中串會活動的還有游雪濤，他讓人調查後，寫進《動態》報張春橋。

16 《一切為了九大》，載於照相影印版《紅衛戰報》1968年2月15日總第48期，上海中等學校無產階級革命派、《紅衛戰報》編輯部主辦。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17 這個分析是當時市革會寫作組朱維鏗1968年3月7日給市革會的一份報告中寫的，報告的題目《關於中串會〈紅衛戰報〉的一些問題》，而且報告還認為，為了將這個假的出版日期弄得像真的，第一期的第三版上還特地刊登了一個《會議通知》，時間是2月18日在光明中學，但他特地去該校了解：沒有開過這個會議。文革結束後，影印版《紅衛戰報》編輯魏威在看到朱維鏗的這份報告後對筆者承認說，他們當時確實是倒填第一期的出版日期。

在市革會的組織下，¹⁸ 市中學紅代會在《紅衛戰報》上，連續刊登幾組文章，批判《一切為了九大》。市中學紅代會自然不承認影印版《紅衛戰報》，也稱其為「偽《紅衛戰報》」，說這張報紙就是反對市革會的，而且還「誹謗始終走在中學運動前列的『市六』、『控江』」，「旁敲側擊、含沙射影，矛頭直指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和春橋、文元、徐景賢同志」。¹⁹

外灘、北站等市區主要馬路上，出現批判《一切為了九大》的大標語，一個牆面一個字，魏碑體：「徹底批判反革命大毒草《一切為了九大》」、「打倒毛兵」、「打倒魏威」。「毛兵」和「魏威」每個字上都被打上叉叉。2月8日，上海中學的中串會對立面「狂妄評論編輯部」，到毛兵的家裏抄家，將《一切為了九大》的底稿悉數抄去。越來越緊的風聲，令毛兵、魏威、管宇春和紅鷗等人很緊張，覺得外出躲避為妥。1968年2月底左右，他們分兩批逃離了上海。

對中串會的批判全面展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1968年3月28日擴大會議的決議中，特意寫上「徹底批判以右的和極『左』的面目出現的各種反動思潮」。並且一方面佈置上海的「四報一刊」²⁰ 全面圍剿「反動社會思潮」；另一方面又通過市中學紅代會，對中串會主要成員辦「學習班」。學習班設在淮海路、汾陽路口的上海教師進修學院，從1968年3月21日到4月10日，共二十多天，參加者不許回家。被參加學習班的有中串會聯絡員：向明中學高三學生王毅捷、交大附中高二學生金小蜂；有《關於中學運動的七點聲明》的起草者、徐匯中學高三學生文貫中；有歌舞劇《前進，毛主席的紅衛兵》的總指

18 筆者2009年11月25日對魏威、管宇春、張水榮的採訪。

19 《讓偽〈紅衛戰報〉見鬼去吧！》，載於1968年3月14日《紅衛戰報》、《上海紅衛兵》聯合專刊。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收藏。

20 即《文匯報》、《解放日報》、《工人造反報》、《上海紅衛戰報》、《支部生活》。

揮、交大附中高三學生彭正勇，編劇、復旦附中高一學生許錦根；編劇兼朗誦、徐匯中學高三學生顧維萍；還有影印版《紅衛戰報》的編輯或撰稿者張水榮、宋永毅等；共二三十人。出逃在外的魏威和紅鷗，學習班結束前被「揪」了回來。魏威因為是影印版《紅衛戰報》的主要負責人，作為「偽《紅衛戰報》主編」被批判。毛兵外逃沒有找到，但學習班結束後不久，也被抓獲。

整個學習班一方面批判這些中學生，另一方面要他們交代中申會背景，揪「黑手」。尤其文貫中，其父文強是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將、共產黨與國民黨交戰時淮海戰役中的戰俘，此時還關押在監。文貫中於是被作為「對共產黨刻骨仇恨的戰犯兒子」、「反動學生」、「黑手」，在學習班上多次批判，學習班快結束時，又當場被宣佈為「反動學生」。學習班上還批鬥了兩個成年人，一個是王維，文革中被「靠邊」的《解放日報》副總編，王毅捷的父親；另一個是胡道靜，著名學者，國民政府時期擔任過《中央日報》上海版的副總編，曾在一封私人信中稱讚過《前進》。學習班結束那天，市革會負責人徐景賢等到會。徐景賢發言說：你們看，一個是國民黨《中央日報》的上海版總編，一個是共產黨的《解放日報》總編，正像毛主席說的：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政治鬥爭的繼續。徐景賢指名要紅鷗發言，因為紅鷗一直不說話。徐景賢說：我今天還要聽一個同志發言。這個同志在文革初期緊跟春橋和文元同志，在反對陳、曹為首的上海市委的鬥爭和一月革命中都做出了貢獻。現在她犯了錯誤，春橋同志最近還向我談起她，希望她改正錯誤。今天我想聽聽她的發言。紅鷗一下哭了，只得講了幾句話。徐景賢說：我一定把你今天的講話向春橋、文元匯報。²¹

21 筆者 2011 年 4 月 26 日對侯美度(紅鷗)的訪談；此外，魏威、許錦根等人對筆者的回憶中，也都提到徐景賢的這段話。

徐景賢說這些話的時候是輕鬆的。繼紅革會、炮司及紅三司發起的1967年初1.28炮打，以及1967年5至8月的聯司和支聯站之後，中串會是上海造反派組織中的又一異類，他們老是和中學紅代會對着幹，讓人覺得他們實際矛頭是對着市革會甚至張、姚的，這是對以上海市革會為首的文革新秩序的再一次挑戰。現在以這樣的形式將他們打壓下去，平息了又一次潛在的危機。而幾天之後，1968年4月，上海殘存的反對派勢力，都將在4.12炮打中全軍覆沒。建立和鞏固文革新秩序的障礙，將被從組織層面掃清，上海的輿論重又歸於一律。

毛兵被投入監獄關了四年，而且很長一段時間被單獨監禁，手銬在手腕勒出的深深傷痕從此伴隨終身。²² 文貫中被作為反動學生送回徐匯中學，關在學校「牛棚」繼續批判，「勞動改造」整整一年，其間遭到一次又一次毒打，衣服被血黏在身上無法脫下，有一次被打得無法行走，只能爬回家去。其他許多有關人員，雖然不久都從學校畢業，或上山下鄉，或被分配工作；但到了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中串會又被列為十個「反革命大案」之一，一些人又一次被揪回關押或受到批判。

中串會除了王毅捷是幹部子女，其他主要骨幹大都是職員家庭的子女。他們是在反血統論中走到一起的，所以他們將批判矛頭指向政治等級身份。毛兵自己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他對唯出身的「階級路線」有着切膚感受。毛兵的「階級關係變動」論，不但將「走資派」作為文革的對象，而且認為「走資派」的依靠對象，那些十七年歷次政治運動培養的積極分子隊伍，也應該變更，提出「非黨員要比黨員好，非幹部會比幹部好」。這是對歷次政治運動結果的質疑，也是對政治名份等級的質疑。毛兵認為「出現修正主義的危險」，在幹部身上，這與毛澤東文革的方向是一致的。雖然囿於理論資源的不

22 43年後，2010年2月5日，筆者見到他，他手腕上當年被手銬勒出的痕跡還十分清晰。

足，毛兵只能以文革話語闡述自己的這個思想，但他的這個思想，已經超出文革的批判，是對權力異化的警惕與警告。

桑偉川挑戰「丁學雷」對文藝評論的話語壟斷

1969年7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丁學雷的一篇批判文章《為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的大毒草——評〈上海的早晨〉》。

《上海的早晨》是周而復寫的一部長篇小說。周而復是共產黨作家，1951年曾作為「五反」工作隊員，在上海一個棉紡廠和一家商店全程參加「五反」運動。後擔任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這本書就是他寫的共產黨執政初期對上海私營工商業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1958年在《收穫》雜誌發表，同年下半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丁學雷的文章正是批判這本書的。文章發表後，《人民日報》又在一個月中連發五個整版，都是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文章。丁學雷的文章不但對着劉少奇，而且對着陳毅等當年主持上海工作的幹部們。文章分析了工商業者被革命剝奪財產時的心態，以及執政黨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政策，得出結論：《上海的早晨》是美化資產階級、污蔑工人階級、鼓吹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

丁學雷的文章遭到上海煤氣公司管線所助理技術員桑偉川²³的質疑，他化了兩星期時間，寫了篇商榷文章：《評〈上海的早晨〉——與丁學雷同志商榷》。文章認為：「作為小說《上海的早晨》是如實地反映當時階級鬥爭，階級矛盾，並描述怎麼以無產階級的路線政策改造資產階級，解決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作者是站在保護工人階級的立場歌頌了對資產階級鬥

23 桑偉川，上海煤氣公司管線所的助理技術員，因撰寫與丁學雷商榷的文章，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判刑7年，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8月平反。

爭的勝利。這是作品的主流方面。由於小說在塑造英雄人物方面有錯誤，對資產階級形象刻劃上有所描寫，對中間人物工人湯阿英也着重刻劃，陷入了修正主義創作路線。即使如此，我認為不應該一棍子打死。」²⁴ 1969年9月初，桑偉川將自己的這篇文章寄給文匯報社，還具上自己的真名，要求發表：

編輯同志：

中央兩報一刊重要社論《抓緊革命大批判》一文的發表，又一次吹響了文化思想戰線上進擊的戰鬥號角。對於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革命者來說，必須立即拿起大批判的武器，繼續革命。毛主席說：「文藝界的主要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也說文藝批評與反批評是文化思想領域裏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毛主席又說：「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所以，我寫《評〈上海的早晨〉》一文，參與戰鬥，以引起爭論，為落實對資產階級的政策，與怎樣才算得是一個好的黨的領導者等方面，得出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統一認識來，並為繁榮無產階級的文藝，佔領上層建築作出努力。希考慮刊載。

致繼續革命的敬禮！

桑偉川²⁵

《文匯報》收到桑偉川的稿件後，以《一篇為〈上海的早晨〉翻案的毒草》為題，寫了一份內參上報。徐景賢看到後即轉張春橋，張春橋批示：桑文可以考慮發表，報社要寫編者按語。先把文章打印出來，討論一下，有準備地打好這一仗。幾天後，張春橋看了文匯報社報送給他的批判桑偉川計劃後，又指示：「把桑偉川的文章打印出來，多找一些人看一看，甚至

24 《文匯報》1969年11月20日。

25 同上。

可以考慮，找對立雙方開座談會，在上報以前演習演習看。」徐景賢也批示：「準備工作做得充分一些，找對立雙方開座談會，把有些論點『放』出來。」²⁶

10月13日晚，《文匯報》舉行「座談會」，桑偉川赴會。他在會上坦然道出自己的看法，包括對其他文革前文藝作品的讚揚。這個「討論會」馬上又被寫成內參報張春橋和徐景賢等。幾天後，文匯報社組織了幾個版面的文章，大樣送徐景賢。徐景賢非常仔細地審閱了每篇文章，精心修改每個版面，還具體指定哪篇先發，哪篇後發。²⁷ 11月20日，《文匯報》整版刊登桑偉川的文章和附信。在桑偉川文章的上方，是通欄的字號大得出奇的「編者按」。這個按語是由張春橋和徐景賢親自修改定稿的。按語將桑偉川的文章定為「毒草」，號召對它開展批判。接着，兩個月內，《文匯報》以「徹底批臭反動小說《上海的早晨》」為通欄標題，發表了整整十一個版面的文章；《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也相繼刊登有關批判文章。

之後，桑偉川便被「隔離」，失去人身自由，遭到一次又一次批鬥。桑偉川辯護說：「觀點不同是客觀存在」，「我寫的這篇文章，我認為觀點是對的。各種意見可以爭議嘛，要擺事實，講道理」。但他還是遭到拳打腳踢。桑偉川在批鬥會上大聲疾呼：「我寫了一篇文章就拿我當敵人看待，對嗎？要好好區別兩類矛盾。我是人民的一員，我的觀點應允許保留」。在「隔離室」中，他提出：一、批判會應採取和風細雨的方法，使人口服心服；二、不要人身攻擊，不要將對方推到對立的立場上去；三、暫時不能口服心服，應允許我保留觀點，不要亂上綱；四、對我的批判，只要不動手，我還是願意聽的。1970年1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丁學雷的又一篇文章：《階

26 張春橋的批示轉引自1978年9月12日《文匯報》載：《「四人幫」製造「桑偉川事件」的鬼域伎倆》。

27 同上。

級鬥爭在繼續——再評毒草小說〈上海的早晨〉，並駁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這篇文章是姚文元修改定稿的。桑偉川看後表示：「我要再寫一篇批判丁學雷的文章。你們不要高興得太早。有些東西，現在看是龐然大物，但終究是要完蛋的。我要再寫文章批判丁學雷，這次直截了當地就是批判。」

桑偉川爭取的是言論自由，是發表與主流政治不同看法的自由。但這樣的要求顯然是與虎謀皮。在接下來的16個月裏，這個僅僅因對一本小說的評價與主流政治有不同看法者，被遊鬥290餘次，參加的人數70萬，最多的一天遊鬥7次，其中規模最大的「批桑」拉線廣播大會，60萬人被組織參加。桑偉川被整得病倒在床，一些人便將桑偉川抬到會場繼續批鬥。桑偉川就這樣被逼瘋。但1975年，他還是被以「反革命」的罪名，判刑七年，押送外地勞改農場。桑偉川工作的煤氣公司以及管線所，因為同情和支持桑偉川的觀點，四十多人受到株連。²⁸

對於「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運動，幾十年後，學術界有不同的評價。桑偉川和丁學雷辯論的意義，不在於對周而復這篇小說的評價，也不在於對這場運動的評價。這場辯論的核心，是民間思維對主流政治文化霸權主義的挑戰。「丁學雷」當時是上海文學評論的權威，代表着主流話語，幾乎是真理的解釋者。桑偉川代表着民間思維。主流話語對任何不符合自己意識形態觀點，從來就是批判打壓，不允許存在。桑偉川卻敢於公開自己的不同意見，即使遭到高壓批判，他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將每次的批判會變成辯論會。看起來是對「丁學雷」文藝評論話語壟斷權的挑戰，但實際上已經是對執政黨話語壟斷權的挑戰。這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是少見的。桑偉川明知會遭鎮壓，卻仍堅持表達自己的思想。這樣的勇氣，在萬馬齊喑的時代，讓許多人佩服。

28 張春橋的批示轉引自1978年9月12日《文匯報》載：「[四人幫]製造「桑偉川事件」的鬼域伎倆」，以及《上海文革史話》第911頁。

許紹吉的《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質疑唯階級論

1972年5月12日，人民廣場出現一張大字報：《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這張大字報署名「不平」，作者真名是許紹吉。

文革剛開始時，許紹吉是上海同濟大學附屬中學高三學生。他出生工人家庭，但父親有「政歷問題」，入不了團；文革初期，也因此加入不了紅衛兵，讓他加入「紅外圍」，這是專為「出生不好」學生成立的組織。他沒有資格參加革命，但反正學校不上課，於是利用這段閒暇時間讀了許多書。有魯迅全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文章，還有1957年反右前夕報紙上刊登的那些「鳴放」文章。「鳴放」文章給他的震撼是巨大的，因為他實在看不出這些被定為「向黨進攻」的文章有什麼錯，相反他覺得很有道理。他文革後回憶說：

這些文章給了我大大的啟蒙和震撼。使我認識到57年的反右，根本就是一場冤案，使我認識到，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是30年代中國的翻版，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說起來，我對西方的人道主義方面的著作倒是看得不多。共產黨要批判我的話，當然可以給我加上種種罪名，但是若說我受西方思潮的影響，則是絕對不確的。我其實是土生土長的。²⁹

1967年3月以後，中央要求學生回學校「復課鬧革命」。許紹吉也參加了學校的「教學改革」，編寫學校教改刊物《教學革命》，但是不久就覺得是瞎起勁。於是，他開始寫文章。最先的一篇文章是向毛澤東學習的長文，寫好後，許紹吉自己刻

29 不平著《挑戰毛澤東》，美國成家出版社2003年印刷。本節內容，包括許紹吉的回憶，全部引自此書。許紹吉在人民廣場邊張貼《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一事，筆者當年就曾經聽說。

寫蠟紙，但終於沒有印發。後來又寫了許多隨想和札記，越寫越一發不可收拾，十多個月寫下來，到1968年畢業分配前夕，寫了54篇文章共近20萬字。許紹吉將這些文章歸結在一起，起了個名字《肥田集》。意思是文章供討論，即使是「毒草」，也可以通過批判肥田；典出毛澤東1957年「反右」時關於「香花」、「毒草」的一段話。

許紹吉的文章分三個方面：一是質疑執政黨凡事都以階級觀分析的思維方式；其中，《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直接針對《人民日報》1966年6月4日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這篇陳伯達簽發的社論，是根據毛澤東親自指定的《5.16通知》寫的。許紹吉的文章，一開始就直接引用這篇社論的段落：「你們果真是講真理嗎？不。你們是在打着『真理』的幌子搞陰謀。你們採取挖心戰術，從根本上抽掉了真理的階級性。難道你們不知道，在有階級的社會裏，只有階級的真理，絕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真理嗎？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真理和謬論，香花和毒草，不同的階級從來就有不同的看法。你們所吹捧的『香花』，正是我們所要鏟除的毒草。你們所堅持的『真理』，正是我們所要反對的資產階級謬論。真理是客觀的。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只有最先進、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才能認識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才能掌握真理。」許紹吉針對的就是這段話中的「在有階級的社會裏，只有階級的真理，絕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真理」，也即真理有階級性的斷言。他寫道：

真理的標準……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人們社會的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

應該說，只存在着不依賴於人，不依賴於階級、集團

和個人的客觀真理，從來不存在着依賴於人的、隨着階級、集團和個人的不同而不同的主觀真理。這又是一條沒有階級性的真理。

在當時，《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社論》是真理的解釋者，許紹吉卻反對它們對真理的壟斷。他還在文章中調侃這種唯階級論的思維方式：

假如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存在着無產階級真理和資產階級真理，那麼謬論也該有階級性了，還應該存在着無產階級謬論和資產階級謬論。

這樣有針對性的批判文章還有《評〈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是針對1966年6月8日的《人民日報》社論。

二是反對個人崇拜，例如《論個人崇拜》、《反對奴隸主義》、《再論反對奴隸主義》、《談毛澤東思想》、《論「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論「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揮手我前進」》、《論「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砸爛他的狗頭」》，等等。其中，《論個人崇拜》，是針對毛澤東1972年3月對斯諾的一次談話，毛澤東為自己辯護，說「總要有些個人崇拜」。許紹吉反對毛的這些話，認為個人崇拜不是毛所說的要「降溫」，而是必須停止：

我們不要個人崇拜，我們要的是崇拜言論，崇拜真理。崇拜個人就是崇拜某一個人，然而人總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神，即使是無產階級權威，他也不是沒有一點缺點，連錯誤的東西都崇拜起來，怎麼行呢？……

人與人之間用不着崇拜，既用不着崇拜別人，也用不着別人崇拜。人與人之間可以自由地進行爭論、辯論、討論，

誰也沒有權力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這就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關係，不是上帝與人或神與人的關係。

三是討論什麼是革命，例如《論革命——不滿與革命》、《再論革命——光明面與陰暗面》、《上綱上線》、《強權與真理》、《穩當的英雄》，等等。例如《從階級性談起》、《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打倒極左思潮》。

四是反對執政黨對言論、出版自由的禁錮，如《反對版權集中》、《自由競爭》、《馬克思論出版自由》，等等。其中有一篇《也論「吃小虧佔大便宜」》，是贊成「東方論壇」的何是的觀點的，還有一篇《放？》，反駁《工人造反報》對何是的批判。當時何是正遭受批判，許紹吉曾匿名給何是寫了封信，給他支招如何反批判。

不過，所有的文章，除了本節後面將提到的那篇，始終沒有公開發佈過。許紹吉一直想將自己的文章公佈於世。他後來回憶說，「中國的大事有千萬件，但是最根本的一件是：言論自由」。「對建國方略、經濟決策之類大問題，我提不出很高深的見解，但是，我願做一個馬前卒，為一個可以自由討論我國根本問題的環境而貢獻自己」。「當時的感覺，就彷彿自己是《西遊記》裏的孫猴子被關進了一個什麼玩意兒，四周一片漆黑，手裏拿着錐子，東敲敲，西碰碰，試圖找一個薄弱點，找一個突破口」。

1968年底中學生畢業分配，許紹吉進了上海郊縣崇明島上的東風農場。1971年林彪事件爆發，給許紹吉以極大的震撼。經過再三思考，他決心貼出自己的文章，公開沖決思想禁錮。這一階段，他又新寫了一些文章，加上原來的一些，精選了12篇，由淺而深，而最終以自由為訴求。他決定，先選擇1967年寫的那篇《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以討論哲學問題作為頭

炮，「可進可退，進可以要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退可以說這只是對一個哲學問題想不通」。1971年，上海郊縣農場開始將大批知識青年上調回市區，大都安排進全民所有制單位工作。但許紹吉沒有報名要求上調，因為此時他已經決定破釜沉舟。不去市區工作，可以減少可能的政治壓力。

1972年5月12日一早5點多鐘，許紹吉來到人民廣場，和平電影院對面的科普畫廊，將抄成大字報的文章貼在畫廊下面，並具上自己的真實姓名和工作單位。為了減少張貼大字報的時間，避免在未張貼完時就被抓捕，他事先將二十多頁大字報紙前後相黏，所以很快就貼完，也很順利，沒人阻攔。在貼大字報之前，許紹吉曾經不止一次地想像當場被抓的情景，這樣的事沒有發生。但是，之後他因為沒有趕上回農場的輪渡，在過夜的火車站被執勤人員認為是流竄的無業人員拘留。許紹吉承認自己貼大字報之事，於是被轉移至黃浦公安分局，「留置」四天後，16日中午被交給他所工作的東風農場。回農場後，負責人向他要大字報底稿，最初沒有下文，既沒有批鬥，也沒有懲罰性「勞動」，行動也沒有受到干涉。後來，連隊裏召開了一次辯論會，之後又召開一次批判會。都不激烈，沒有口號，還讓他坐着。事後據說，是上海市委對此事有三條指示，許紹吉記得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思想教育為主。

許紹吉還是很想按原先的計劃，將另外一些文章陸續再貼出去。《魯迅論創作》，已經抄成大字報。這份大字報雖然內容是魯迅語錄的匯編，但卻是以四十年前魯迅的話語，抨擊文革壓抑思想的現實。不過終於沒有貼出去；他後來回憶說，這是因為他覺得大字報這一方式不能奏效，而且此時母親得了癌症，他不忍讓母親再為他擔憂。

雖然沒有遭到連番批鬥，但許紹吉的人生軌跡還是受到影響。以後，農場又有幾次知青上調市區，他都沒有份。直到1974年，幾乎所有1968年被分配進上海郊縣國營農場的知青都

被上調，只有被作為農場幹部培養的對象留下。許紹吉總算趕上這次「末班車」，調回上海，分配在一家國營工廠，戶口也因此轉回上海市區。

許紹吉所有的文章，公佈於眾的只有《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嗎？》，而實際上，他思考的重點更在言論自由。這是1949年以來公民久違的權利。就連「自由」一詞也成為貶義詞，除了「自由戀愛」一詞，所有與「自由」組合的詞語都成貶義。尤其1957年「反右」之後，再沒有人敢於對言論封鎖提出公開反對。取締了言論自由，就是隔離了思想的交流。許紹吉的這些文章當時如果全都貼出，他所遭受的，將不只是幾場批判會。

王申酉全面否定文革，批判毛澤東

王申酉是1963年進校的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的學生。出身工人家庭，本是執政黨的依靠對象。但打了四次入團報告，都沒有回音。對這些政治上的壓抑感，以及對周圍政治輔導員、學生幹部、積極分子們的不滿，王申酉都寫入了自己的日記。寫進日記的還有他對當時正在實行的「教學改革」的不滿。王申酉在日記中認為，學校縮短專業教學時間，將大量時間安排在政治學習和下廠勞動，實在是浪費時間。

在那時，因雷鋒日記的出版，「要求進步」的同學幾乎人人寫雷鋒式日記；而且華師大甚至形成不成文規矩：要求進步的同學以口頭或書面，向班級裏的共青團員、團幹部「匯報思想」、「暴露思想」；書面匯報後來又演變成上繳日記本。把日記本作為書面思想匯報的方式。文革前夕的1965年11月，王申酉和同學們在上海郊縣崇明島參加四清，11月5日那天，他正在寫日記時，被叫去接電話，日記本就攤開在桌子上，坐在旁邊的一個班幹部偷看了他的日記，並上報系黨總支和校黨委。校黨委查閱了王申酉的家庭、親友以及和他接近的中學同

學的檔案材料，沒有發現多大的「反動」的證據。指導員要他交出所有日記，他拒絕了。沒等事態再深入，文革開始。王申酉參加了造反派，他貼過常溪萍大字報，也參加過對張春橋的炮打。但對立派揭發他「反動日記」的「老底」，還抄了他的家，日記全部被抄去。

1968年1月，上海開展清隊運動。1月11日市革會開會傳達中央關於清隊的文件，1月29日王申酉被抓。這天正是春節除夕。他被關進上海市第一看守所。關押了1年3個月後，被「教育釋放」；但又因為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寫了《我的自白》和《大學六年思想小結》兩張大字報，被定為「敵我矛盾」，「監督勞動。1970年華師大擬對王申酉畢業分配工作，但接收單位看了王申酉的檔案後，不願接受。同年11月王申酉被學校送往地處蘇北大豐農場的五七幹校「監督勞動」。1972年6月，他被從大豐調回，在學校物理系做清潔工作和在學校農場勞動，但不久又給他戴上「反革命」帽子，再次「監督勞動」。

置王申酉於死地的是駐學校的工宣隊。工宣隊幾次干涉和阻撓王申酉的戀愛，還向他的女朋友吳某施加壓力，不許她與王申酉談戀愛。王申酉於是決定將自己的思想系統地寫成文字，讓女朋友了解自己。1976年9月10日，毛澤東逝世的第二天一早，王申酉正在學校寫信，學校保衛科的人突然闖進，搶走了他寫的信。雖然信已經被王申酉撕碎，但還是被拼接起來，將信定為「反革命黑信」，王申酉當天下午就被關進長寧區公安分局。

1976年11月18日，審訊人員笑咪咪地要王申酉將那份被撕碎的信的內容重新寫出。此時文革已經結束，王申酉也從廣播中聽到這一消息。他在重寫那封信時，將原來的一萬字，擴充到六萬字，和盤倒出自己的全部思想。他以為文革結束了，他的苦難將終止。他甚至夢想自己出獄以後，能夠從事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的研究。

他的坦誠卻為自己引來殺身之禍。1977年2月，中共發了5

號和6號文件，指示全國鎮壓反革命分子。3月18日又批轉國務院30號文件，規定「對寫反革命大字報、大標語的人要堅決逮捕法辦」，「對極少數罪惡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要堅決殺掉」。文革結束後的新市委，決定在「五一」前，公審和槍斃一批「反革命分子」，王申酉被選作對象之一，依據就是他在監獄中根據要求寫出的那個六萬字的「供詞」。3月14日，普陀區法院黨組、區公安局分黨委聯席會議決定：對王申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但普陀區委書記董鎮不同意，認為王申酉只是言論，而且寫的信也沒有造成社會影響，甚至連收信者都沒有看到。他將死刑改成了死緩，批示：「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區法院黨組將「死刑」和「死緩」的兩個意見，一並上報市高級法院。3月25日，上海市高級法院黨組開會討論，一致意見：判處王申酉「死緩」。但是當時擔任上海高級法院院長的宋季文，卻一定要將「死緩」改為「立即執行」。宋季文後來承認，他當時害怕被視作「右傾」，將判決升級了。³⁰宋季文文革前是上海市副市長，文革中的1975年任上海市高級法院院長，文革結束後，中央派來的工作組保留了他的職務，但他卻生怕自己的表現不符合中央工作組和新政法書記的要求，於是用他人的生命為自己的烏紗帽買單。升級改判為死刑的，還有另外10名「死緩」。上海市革委會領導在一天內，聽起並同意了56個死刑判決案，平均每六分鐘通過一個死刑案。

1977年4月27日下午，在普陀區體育場三萬人參加的宣判大會上，區法院宣讀了「判決王申酉死刑立即執行」。王申酉這是第一次聽到對自己的判決，在這之前，他被提出監獄時，還以為是換監房。這樣草率的判決，甚至不給犯人應有的申訴權，「立即執行」。三十分鐘後，王申酉的生命被結束在31歲。死後第二天，家人才收到對他的判決書。

30 金鳳《十年生死祭》，收於《王申酉文集》；金鳳、丁東編注，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出版。

王申酉的思想基本都集中在他的六萬字「供詞」中。主要有七個方面：一、開場白，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我的世界觀。王申酉以馬列主義話語，提出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可違背，生產關係必須符合生產力，上層建築必須符合經濟基礎。

三、對蘇聯歷史的看法；指出：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核心規律，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起着最充分最完全的作用。蘇聯雖然實行社會主義，但商品經濟仍起着作用，並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經濟，因為嚴格地說，只有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徵。因此不應該迴避或否認商品經濟，而應該發揮它的歷史作用，引導它為新的生產方式創造堅固的物質條件。王申酉這是針對文革中到處「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反商品經濟的現象。

四、關於中國1949年以前歷史的看法。王申酉以中國近代史上的三個歷史人物為樣本：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分析中國革命的過程必須符合歷史規律，認為毛澤東的土地革命，順應了歷史的潮流，爭取了農民的擁護、支持。「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實質上是在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它成功了，這是毛主席不可抹殺的歷史功勳」。

五、關於中國1949年以後歷史的看法。王申酉認為1953年開始的互助組和1955年開始的合作化運動引起了黨內的爭論；而1957年的反右鬥爭，

基本上摧毀了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的力量，黨外資產階級從此基本上退出了中國的歷史舞台。黨內和黨外的關係也從此發生了變化。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為黨內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種子，甚至為八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黨內大分裂，埋下了禍根。因此，1958年是考察建國後我國歷史的極關鍵的一年。³¹

31 王申酉 1977 年《供詞》，收於《王申酉文集》。本節中所引王申酉的文字全部出自這份《供詞》。

王申酉讚揚上疏反對「大躍進」錯誤的彭德懷大無畏的勇氣，讚揚他「不僅頭腦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批評毛澤東「不願承擔三年經濟困難的絲毫責任」。而劉少奇勇敢承認了黨的「大躍進」錯誤，卻「結果犯了一項大罪」。

王申酉指出，毛澤東的經濟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給林彪後來被稱為「五七指示」的信：「這封信最好不過地集中反映了他的世界觀。在他的理想世界中，社會應分割為一個一個彼此獨立的經濟共同體——公社。在這個公社中，工人、農民、戰士、學生不應有嚴密的分工，都既要學工、又要學農、學軍，還要從事上層建築領域的活動——即批判資產階級。這個公社的生產方式是集體性質的，交換主要發生在內部，因為現實中的農村人民公社正是如此。因而這樣的公社顯然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的。當然它也與外界發生物質交換，但只是與國家交換，彼此之間是不發生交換的」。王申酉指出，按照毛澤東這個烏托邦的結果，

這樣的公社自然會盡一切力量防止商品交換、貨幣經濟的侵蝕作用，而每個公社社員又由法律規定是無法脫離公社的，世世代代要生活在祖傳土地上，從事各種勞動，並且永遠保持固有的生產方式沒有任何改變的希望。這樣的村社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很長一段時間，如西方的克蘭制、馬爾克公社，東方的印度和斯拉夫公社。不過，誠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這種公社只是東方專制主義制度的社會基礎，只會造成農民永久性的野蠻、落後狀態，絲毫沒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六、「我對毛主席的看法」。王申酉對毛澤東進行了直言不諱的批判。他在供詞中表示，他曾經好久不明白，「為什麼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那麼大力地與禁錮着他精神發展的種種社會桎梏作鬥爭，但當他走上統治舞台後卻為我們這一代青年戴

上更嚴厲的精神桎梏？」他具體分析了毛澤東的歷程，認為原因在於，毛澤東出身在農村，熟悉農業農民；但毛澤東對現代工業很不了解，對經濟更是所知不多：

總之，我還沒有看到過他對於中國經濟形態(無論是農村或城市工業)具體分析的文獻，甚至解放後他在領導中國實行重大的經濟變革時期，也沒有發表過這類著作。作為領導這樣大的國家的政治領袖，不對國家的經濟作歷史和現實的詳細考察，要領導好國家的建設是很難想像的。從他對社會改造所表述的理想藍圖及實施的方針來看，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作用、歷史必然性及其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歷史條件的認識是很不足的。很可惜，他沒有去過西方實地考察一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實狀況，解放前也大概沒有去過國內某個現代化工廠、大銀行考察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實狀況，這恐怕對他的世界觀的形成有不少影響。

對毛澤東的批判，還體現在其他章節。王申酉認為毛澤東有着濃厚的農民意識，反對現代社會所必須的社會分工；對經濟規律不甚了解，對工業生產管理更是外行。即使在毛澤東批示的工業生產《鞍鋼憲法》，也只提到二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工人、幹部、技術人員三結合；而「生產、交換和分配問題，鞍鋼憲法都沒有提及，只提倡取消分工」。

七、關於對目前現狀的看法。王申酉為文革造成的經濟生產混亂擔憂。在監獄沒有任何參考資料的情況下，他憑記憶列出了一系列數據，包括和國外同期對比的數據並指出，「當着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尤其是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其次是蘇聯集團國家的農業人口戰後以來急劇減少時，中國的農業人

口不但絕對增加，而且相對也在增加，這是世界上甚至最落後的農業國家也很少見的情況」，「究其原因公社制的生產關係是嚴重束縛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的。另外，國家又用行政權力把農產品收購價格壓在最低不變的水平上」。他呼籲：「中國農村的生產關係不發生根本的變化，中國農業經濟狀況永遠沒有改善的可能」。他為國民經濟的停滯和倒退憂心忡忡。他尤其反對批判「唯生產力論」，反對將崗位責任制和規章制度被批判為「管、卡、壓」。在分配制度上，他反對實行絕對平均主義，「甚至普通工比技術工的工資待遇高」，指出「這種所謂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措施，很難調動青年工人的積極性」。

他還分析了科技、文教、外交、外貿的現狀，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認為各個時代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藝術，都是人類永久的精神財富，不應該被認為是桎梏而隨意拋棄。

和其他異端者不同，王申酉不是試圖以另類思索解讀文革，他是站在對制度批判的高度，全面反思文革，追溯形成文革的深層原因，並對中國的未來提出灼見。當大部分思考者的思索範圍比較多集中在民主、自由、法制上時，王申酉已經將思考向經濟和政治結構伸展。雖然，由於長期理論的封鎖，他所能運用的話語和理論資源，基本還在馬列主義範疇，但他所思考的深度，已超出了時代的局限。

王申酉的這些觀點，在文革結束幾十年後再看，許多已經成為常識。但在1976年，在思想和文化被禁錮了整整十七年的年代提出，不能不說是深刻和超前的，尤其在不許對毛澤東有任何懷疑的年代，更是獨立和大膽的。為此，他付出了年輕的生命。

小結

和北京相比，上海這個商業化了的城市，自1949年後，就沒有出現過出格的抗爭和騷動。只有從1966年的11月9日開始，

上海才引人注目地發生了一系列大事，全都走在全國前列。然仔細看來，卻又都是些既走在時政之前，又符合決策層心意的行動。或者可以說，是決策層想說想做而又不便於明確表露的心意。上海人特有的乖巧，在文革政治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是上海的文化政治特點，既有商業文化的實際和功利，也有法制觀念的相對普及。從文革開始直到文革結束，上海始終以這樣的特點演繹着文革。

但是，上海的另類思索，卻為上海張揚了熱血和勇氣。桑偉川，明知會遭到風險，仍勇敢大聲地亮出自己的挑戰；尤其王申酉，在那個禁錮思想的年代，敢於懷疑至高無上的神聖。這是被毛澤東的文革「大民主」激活民主意識的青年一代，沿着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試圖對執政黨執政基礎的階級身份政策進行清算，更試圖對中國政治和政體作進一步探索。當時在全國，這樣的探索很多。比較有影響的有：1967年年底的湖南「省無聯」（「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楊曦光執筆的《中國向何處去？》、武漢「北決揚」（「北斗星協會」、「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揚子江評論》）魯禮安、馮天艾等編輯的小報《揚子江評論》上刊登的《怎樣認識無產階級政治革命》，還有山東「渤海戰團」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軍權！》，廣西柳州鐵路《紅衛兵戰報》上的《今日的「哥達綱領」——評倒旗協議》，等等。發表觀點的時間與中串會平行，幾乎都在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³² 這是以文革話語作為武器，挑戰整個共產黨專政的一股全國性思潮。雖然思潮的外殼仍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

32 毛兵寫《一切為了九大》時，是否受到這些文章的影響？據以上所引的那篇管宇春的回憶：「很多人都問我：你們在寫《一切》以前是否看到過楊曦光的文章？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沒有。我看到《中國向何處去》是我和毛兵在逃亡途中。但是毛兵與清華團派的一些智庫人物關係相當好，這中間有否交流我不清楚」。

論，但核心卻是探討民主、自由和社會公正這些被禁忌已久的論題。這是文革的異化，發動群眾的臨時手段「大民主」，被作為終極永久目標追求。這樣的追求自然不會被允許。³³

33 據筆者對魏威、管宇春、張水榮的採訪，管宇春回憶，他們那時對《一切為了九大》被說成是「大毒草」很不理解，「為什麼是大毒草？我們完全是在解釋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觀點」。管宇春文革中曾問市委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你們現在文章中的理論就是在用我們的理論，我們有什麼錯」？朱永嘉回答說：「你們走向了反面」。

第三十九章

上海市民兵指揮部 工人武裝的嘗試

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的建立

「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是1967年砸聯司行動之後建立的。全國各地因奪權引發的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一再升級，加上部隊支左介入，更加激化矛盾。從青海的2.23開槍事件，發展到1967年7月20日的武漢事件，毛澤東自從1949年後不願意坐飛機，這次卻不得不乘飛機離開武漢去上海。據說，這個匆忙的逃離使毛澤東有「受制於人的感覺」。毛認為軍區和武裝部支持右派。毛澤東早就對軍隊介入文革後鎮壓造反派不滿，提出要「武裝左派」。¹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見河南赴京代表時，借河南一個群眾組織提出的口號，將毛澤東的想法公佈於眾。江青說：「我記得好像就是河南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做『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江青公開提出「文攻武衛」口號後的不幾天，7月31日，張春橋給毛澤東寫信，要求上海成立文攻武衛組織。

主席：

文攻武衛的口號提出來之後，上海的工人要求成立武衛組織。據了解，目前上海武鬥雖然不多，但是，小規模的武鬥經常不斷。出現武鬥，一般是由市革命委員會派

1 王年一 2005年11月5日給閻長貴的信，以及王年一 2004年5月12日給何蜀的信，載於網上刊物《記憶》2008年第1期。

出少量徒手解放軍去制止。他們人數少，到得慢，而且往往挨打，效果也並不都好。如果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負責，成立工人武衛指揮部，在市區每個區搞一萬人左右的隊伍，十個區(不含郊縣)搞十萬人左右，從一百幾十萬產業工人中選拔並不困難。這十萬人，當然不需要天天出動，每天有十分之一的人值班，就足夠了，也不會妨礙生產。這支由工人造反派組成的隊伍，在目前可以制止武鬥，更重要的是可能從中找出一條改造民兵的辦法。上海原有的民兵，偏保的不少，槍支彈藥已經由警備區收起來了，組織癱瘓在那裏。如果目前提出整頓民兵，條件不成熟，麻煩也不少。不如成立工人武裝組織，從小到大，從徒手到發槍，逐步建立起一支以造反派為基礎的人民武裝。因為幾次聽到主席提出民兵的改造問題，造反派奪去的槍不要急於收回的問題，聯繫到上海工人造反派提出的這個要求，形成了以上的想法，不知是否妥當。如果大方向不錯，可否在上海試驗一下，請批示。

敬 禮！

張春橋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毛澤東在張春橋的這封信上批示：「林、周、文革各同志閱示」。這顯示，毛澤東對張春橋的提議沒有異議；或者可以說，毛澤東同意張春橋的提議。² 從張春橋給毛澤東的信可以看出，他建立文攻武衛組織的最初目的，是為了制止日益升溫的武鬥。而在1967年的上海，維持社會治安的公安機構被「砸爛」，警察們又都成立了各自的造反組織忙着打派仗，社會秩序和治安沒有一個權威機構維持。張春橋曾經讓上體司治

2 張春橋的信和毛澤東的批示，引自《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年12月第16期，上海警備區民兵鬥爭史資料組編。

安組代行治安職責，然上體司只是一派群眾組織，讓其出面制止其他組織的兩派武鬥缺乏權威；且沒有法制觀念，打死逼死多人，激起民怨。像其他省市那樣讓軍隊出面，張春橋不會願意，他對與軍隊的關係一向小心翼翼。由民兵出面，張春橋也不願意，正如他信中所說，上海民兵中老保不少，而且毛澤東一再說要改造民兵，³ 怎樣改造？還待研究。張春橋可能有一個沒有說出來的理由：民兵在軍事業務上是受上海警備區領導的，這又涉及與軍隊的關係。所以，建立文攻武衛組織，便是最佳選擇。而且可以造反派為主體，符合文革政治的需要。

文攻武衛口號提出後，上海的許多造反派組織以文攻武衛為名互相衝砸。從1967年7月下旬到整個8月，上海的武鬥達到高峰，文攻武衛口號使得武鬥師出有名，這一時期的絕大多數武鬥都以「文攻武衛」名義進行。其中最大的武鬥是8月4日的砸聯司武鬥，可以說是上海文攻武衛組織行動的預演，得到觀看了武鬥全程錄像的毛澤東讚許。而據王力回憶，武鬥的當天，毛澤東寫信給江青說：現在有75%以上軍分區以上的幹部支持右派，因此當前主要任務，第一是武裝左派的問題，決定發槍。王力認為：

毛主席那時已經明確地有建立第二武裝的思想，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本來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武裝，現在好像不大夠了，要很好改造，要搞第二武裝，直接把所謂革命工人、革命學生武裝起來。⁴

3 見上文所引張春橋1967年7月31日給毛澤東的信。文革後1976年11月27日《解放軍報》曾刊登評論員文章《四人幫搞「第二武裝」陰謀的徹底破產》，說是偽造：「經過反復查證，可以肯定：毛主席從來沒有作過『民兵改造』的指示」。但筆者認為，這封信是直接寫給毛的，張春橋應該不會也不敢對毛澤東本人偽造毛澤東的話。

4 王力著《王力反思錄》第853，1012頁。

毛澤東對軍隊普遍抵制文革有着某種擔憂，他要再造另一支制約軍隊的武裝力量。這應該是各地文攻武衛興起的直接原因。張春橋也將砸聯司行動，看作工人武裝行動的預演。他在一次工總司總部負責人對砸聯司行動的匯報會上說：「聽了8.4的情況，給我一個新的啟發，就是革命不能沒有武器，8.4是這樣組織武裝的一次演習。」張春橋還說這是「關係到鞏固和發展新政權的大事」。砸聯司行動後的第三天，8月7日，姚文元打電話給王洪文說：「春橋和我兩人共同表示一個明確的態度。支持成立『文攻武衛』統一指揮部。」⁵

市革會立即組織人撰寫《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打算》，8月26日送張春橋閱，張在上面批了七條意見：「把造反派武裝起來，按班、排、連、營、團、師組織好」，「武裝五萬、十萬、十五萬人」，等等。⁶ 8月26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成立了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籌備小組，確定以國棉十七廠、上海港務局、上海第二機電工業局、江南造船廠、先鋒電機廠、上海第三鋼鐵廠、上海冶煉廠、中華造船廠、滬東造船廠、上海工具廠、上海矽鋼片廠、先鋒電機廠，共12個單位，作為籌建文攻武衛組織的試點。這些單位都是「造反派在政治上、組織上佔優勢」、「已經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在這個會上，還討論通過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打算》。文件對上海文攻武衛部指揮部的領導以及性質、作用闡述說：

文攻武衛指揮部，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直接領導下，以宣傳毛澤東思想為主要任務的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武裝自衛組織。它是組織左派、武裝左派，也是保衛廣大革命群眾的一支隊伍；它是生產隊，宣傳隊，也是戰鬥隊。

5 張春橋、姚文元的話轉引自《上海文革史話》第538頁。

6 張春橋的批示轉引自《上海文革史話》第538頁。

文攻武衛是革命的群眾武裝，是協助人民解放軍保衛國家財產，維護革命秩序、制止壞人殺害革命群眾，打擊一小撮壞人的強大力量。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有利於維護和鞏固上海無產階級革命的新秩序，有利於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有利於保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同時，上海處在東海前沿，是水陸交通的要道，搞好文攻武衛，對於加強敵情觀念，提高戰備思想，防止帝國主義侵略和美蔣特務的竄犯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⁷

最初包圍上柴廠的造反派組織，因為都是自發而去，行動倉促，裝備不全。但之後由工總司調動而去的隊伍，大多得到叮囑，戴上了安全帽。那個時候的安全帽都是柳條枝或藤條枝編的。於是，藍色工作背帶褲，或藍色斜紋布或白色帆布工作服，柳編藤編安全帽，成為不久後成立的上海文攻武衛隊員的典型形象。1967年10月1日，上海舉行國慶節遊行。隊伍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由12個試點單位的5100多產業工人組成的文攻武衛隊伍。他們頭戴安全帽，身穿背帶褲或工作服、胸佩文攻武衛標志，手握步槍、衝鋒槍、機槍，還拉着高射炮等裝備，以「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大旗開道，通過人民廣場檢閱台。這個以國慶遊行方式讓文攻武衛組織首次亮相上海的行動，是市革會決定的，為此還特地將這些人脫產集中操練。張春橋、王洪文等都在檢閱台上。張春橋對身邊的王承龍說：「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隊伍」。⁸

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籌備組的工作人員最初都是原機關幹部。市革會組織組從市革會各組、辦，各局機關，調集了三十餘名幹部，作為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籌備組第一批工作人

7 《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年12月第16期，上海警備區民兵鬥爭史資料組編。

8 張春橋的話轉引自《上海文革史話》第539頁

員，於1967年9月1日，到淮海中路1469號原上海市婦聯的辦公處報到。王承龍代表市革會宣佈，由翁默清主要負責，鍾定棟、鄭惠儀兩人協助。翁原是部隊某軍的政治部副主任，此時剛從部隊轉業；鍾和鄭文革前都是市、局機關的普通幹部。1967年11月17日，市革會召開常委會，討論有關文攻武衛組織的一些問題，對文攻武衛組織的性質、體制、經費以及與民兵的關係等，作了規定。其中，關於市指揮部的幹部構成決定：「實行三三制，軍隊可吸收一部分，原市革會派的幹部不宜過多，還要從基層調一些工人造反派來充實指揮部。」翁默清不久被調往市革會專案組，王洪文派了工總司委員張寶林和康正勤⁹作為增補人員，與鍾、鄭，以及閻波，¹⁰組成核心小組。初期三軍都派代表參加，陸軍：李彬山，柴玉儉，閻波。海軍：江德基，李惠秀。空軍：邢殿英。除李彬山和閻波參與市級領導外，其他人都參與指揮部各組的領導。¹¹1970年7月15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首次成立領導小組，由上海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以及張寶林、陸耀華、邢殿英、鍾定棟、閻波、鄭惠儀七人組成。李彬山為組長，在警備區領導幹部中，他與上海造反派關係始終比較好。張寶林是副組長。張寶林後來被下放工廠勞動。據說是因性格原因，脾氣比較暴躁，不易和周圍人處好關係。1972年，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與警備區所屬野營拉練指揮部合併，組成新的七人小組：李彬山仍為組長，警備區副司令員胡守富，以及原楊浦區人民武裝部長吳立義為副組長，組員為鍾定棟、閻波、鄭惠儀，加上警備區政治部副主任夏琳。軍隊幹部比初期有了增加。到1974年至1976年間，市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的成員為：組長李彬山，副組長胡守富、吳立義，都

9 康正勤，男，文革前是上海中華造船廠工人。文革初期造反；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核心組成員，文革結束後被判刑7年。

10 閻波當時是上海警備區後勤部副部長。

11 這個三軍代表名單是張寶林2014年1月15日對筆者回憶的。

是軍人；周宏寶、施尚英，兩人都是工人。組員鍾定棟、鄭惠儀、印玉泉。¹² 施尚英後來實際主持工作，他是江南造船廠的工人。江南造船廠在文革中幾派紛爭不斷，是有名的老大難單位，王洪文曾親任工宣隊長赴江南廠處理問題，施尚英是大派的負責人，辦事穩重，1972年底擔任主持工作的廠黨委常務副書記，得到王洪文信任。印玉泉文革前是南市發電廠工人，周宏寶文革前是上鋼一廠工人，都是工人造反派。施尚英和周宏寶、印玉泉都是第五屆上海市總工會的常委。

在市指揮部存在的九年中，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始終是指揮部領導小組的組長。1975年2月以後，周宏寶調任國務院教育部負責人，市委要求李彬山工作重點放在警備區。自1975年9月以後，施尚英主持市民兵指揮部的日常工作；但所有的工作必須向李彬山匯報，重大事情必須徵得李彬山的同意。李彬山與上海市革會關係一向比較好，一般民兵指揮部提出的工作設想，他基本都同意，包括王洪文改造民兵的許多設想，有些軍隊幹部很抵觸，而李彬山基本都是積極貫徹的。

市指揮部辦公處最初在原市婦聯，九天後搬往外灘中山東一路原英國領事館。1968年12月20日搬往普陀區長壽路582號的上海第一棉紡織廠，就近處理與平息普陀區連續不斷的兩派武鬥事件。1969年9月15日又遷往近外灘的黃浦路20號原蘇聯領事館內。1972年9月因與野營拉練指揮部合併，曾一度遷往南京西路1418號，1976年5月又遷回黃浦路20號。

從文攻武衛指揮部到民兵指揮部

文攻武衛組織被定位為「革命的群眾武裝」。¹³ 但是，這個「革命群眾的武裝組織」，與文革前的民兵究竟是什麼關

12 以上資料全部引自《「四人幫」在上海經營「第二武裝」的始末》。

13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打算》，1967年8月。

係？1967年文攻武衛指揮部成立之初，市革會便收到不少詢問。文革前，民兵歸軍隊管：軍委——大軍區——省軍區(或警備區)——縣(或區)人民武裝部(當時簡稱「武裝部」或「人武部」)，民兵工作都是通過這一條線佈置下來的。¹⁴ 1967年3月，上海一月奪權後建立三結合的革委會階段，上海警備區曾經根據中央軍委有關指示，要求在三結合權力機構中，要有「專職人民武裝幹部或優秀民兵擔任的民兵代表」。¹⁵ 上海警備區試圖以這樣的方式，保留奪權企業中警備區軍隊對民兵工作的領導權。但是事實上，除了恢復由警備區領導的工廠專職武裝幹部外，工廠的民兵建制實際癱瘓，沒有恢復活動。1967年的亂局中，工廠首要的是恢復生產秩序，無暇顧及民兵。

1967年8月底，第一批文攻武衛組織成立後，工廠基層的反映很大，問成立了文攻武衛組織後，還要不要民兵？工廠的文攻武衛組織是否仍歸廠武裝部門管轄？文攻武衛組織和民兵是什麼關係？9月26日，市革會在內刊《接待通訊》上，刊登了回答口徑，其中，在《接待須知》欄目，關於文攻武衛組織與民兵關係的回答口徑是：

文攻武衛組織同民兵組織是兩個不相同的組織，兩者沒有領導與被領導關係。因為，民兵是由原民兵系統領導的，其工作和各項活動是按民兵系統領導所佈置的要求進行；文攻武衛組織是按文攻武衛組織的系統垂直領導的，其工作和各項活動是按文攻武衛組織系統領導所佈置的要求進行。

文攻武衛隊員是按照文攻武衛隊員條件接收的，凡符合文攻武衛隊員條件的革命造反隊員，不論是否民兵或是否武

14 各級武裝部是1951年建立的，軍隊編制，工作人員都是現役軍人，負責民兵訓練。武裝部曾經一度被取消，1958年恢復。

15 上海警備區政治部1967年3月4日《關於工廠企業革命的「三結合」臨時權力機構中產生民兵代表的初步意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1967年3月24日轉批。

裝民兵，均可參加文攻武衛組織。反之，即使是武裝民兵，但不符合文攻武衛隊員條件，也不能成為文攻武衛隊員。

文攻武衛組織同各革命群眾組織，也不是領導與被領導關係。各革命群眾組織應積極配合。¹⁶

這個回答，只說了文攻武衛組織和民兵的關係。給人的感覺，文攻武衛組織與民兵是並行存在的。但沒多久，11月17日，市革會常委會開會討論文攻武衛組織的有關問題，決定以文攻武衛「改造基層的民兵組織」，「凡已建立文攻武衛隊伍的單位，文攻武衛組織就代替原民兵的一切活動和工作」。¹⁷至此，文攻武衛組織取代民兵，上海工廠的民兵活動全都停止。

從民兵到文攻武衛組織，看上去只是名稱的改變。事實上，改變的不只是名稱，更重要的是領導關係和指揮權。文革前的民兵工作，由警備區通過各區縣的武裝部領導，地方政府或黨組織對民兵的領導，只是政治意義上的而不是軍事業務上的。區縣武裝部的軍人領導都是所在區縣的黨委成員。從市到區縣都不設專門的民兵機構，地方黨委和政府無權指揮民兵的軍事訓練等軍事業務工作。軍隊是民兵工作領導的主體。民兵之間沒有橫向聯繫，聯絡樞紐是區武裝部。尤其在軍事活動的安排上(主要內容都是軍事訓練和沿海地區的軍民聯防)，全由警備區制定，通過區縣武裝部佈置到工廠。地方政府佈置的民兵工作不多，基本是與軍事無關的節日遊行之類禮儀活動，以及抗災救險行動。

而文革中的上海文攻武衛組織，從市到區縣，另設市、區兩級指揮部。在市裏，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自1967年8月

16 《有關「文攻武衛」問題的幾個意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接待組編《接待通訊》第65期，1967年9月26日。

17 《關於發展、壯大革命工武裝裝隊伍的請示報告》，轉引自《「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載於上海警備區民兵鬥爭史資料組編《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1年1月第22期。

成立，一直是上海黨政合一的市革會領導下的一個部門，一切聽命於市革會，市革會佈置任務，由分管群眾工作的王洪文負責。而各區的文攻武衛指揮部也聽命於市指揮部，形成可以垂直指揮、橫向聯繫的網絡。1967年建立的文攻武衛組織，增加了許多行動內容：衝砸滬辦、制止武鬥、颳紅色颱風，等等。這些行動都與軍事訓練無關，只需報市革會即可。但軍事訓練、軍民聯防等行動，仍需由警備區佈置。於是原來由警備區一家指揮的民兵工作，變成民兵指揮部與警備區共同領導；原來的主體，變成了一方；原來的被領導者，變成了主體的另一方。就這樣，對民兵的控制權，實際從軍隊轉入上海地方政府。這是一個重要的轉變。

文攻武衛組織成立後的第一個任務，是為來上海訪問的外國首腦作迎送的外圍保衛工作。這種以群眾組織作保衛的做法，文革中曾經有過先例。1967年6月26日，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偕夫人，在周恩來的陪同下到上海訪問，外圍的警戒就是由工總司負責的。外圍警戒包括機場、沿途街道，需要的人數多，當時沒有武警，只靠公安警察人手不夠，上海市革會想到調用工總司。文攻武衛組織成立後，就由文攻武衛負責來訪外賓的外圍警戒。僅1967年的10月9日至16日，就先後有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剛果(布)代表團來上海訪問。文攻武衛指揮部在十二個試點單位共抽調2.07萬多人次，進行迎送、保衛。¹⁸ 此外，批鬥陳丕顯、曹荻秋等市委領導幹部的電視批判大會的會場、公判大會的會場和刑場，還有集會、慶祝大會等，也都由文攻武衛負責警衛和秩序維護。例如1968年10月1日的慶祝國慶遊行，人民廣場主席台以及整個廣場的警衛，就是由十萬文攻武衛隊員擔任的。

文攻武衛組織成立的最初兩年，對建立文攻武衛組織單位的資格要求比較嚴格，規定一定要是已經大聯合，而且大聯合

18 同上，《關於發展、壯大革命工武裝隊伍的請示報告》。

比較鞏固的老造反掌權的單位。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強調：「為了確保槍杆子真正掌握在工人革命造反派手裏，必須保持隊伍的純潔可靠。」¹⁹ 首批共12個文攻武衛組織的試點單位國棉十七廠等，都是「造反派在政治上、組織上佔優勢」、「已經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單位。當時在許多工廠，赤衛隊雖然被強行解散，但老保們對造反派的反感和抵制始終存在，造反派們擔心他們如果成為擁有武器的文攻武衛隊員，會對自己形成威脅。此外，文攻武衛組織成立之初，正是上海武鬥高峰時期，許多工廠兩派對立，衝突不斷。市革會擔心，如果在那些派性嚴重的工廠建立文攻武衛組織，武器發下去，加劇兩派對立，有可能釀出嚴重事端。於是，凡有派性鬥爭的工廠，一律不建立文攻武衛組織。所以，1967年和1968年文攻武衛發展速度比較緩慢。

以後，隨着文革的發展以及大批1968年中學畢業的學生被分配進工廠，對文攻武衛成員資格不再限定非老造反不可。但是，對營以上幹部的要求始終堅持必須是老造反，尤其區和市一級的領導成員，更是嚴格。據1969年的一個統計：「從3484名連以上幹部的情況來看，大部分是起來造走資派反較早的同志，路線鬥爭覺悟較高，70%是共產黨員，28%是復員轉業軍人。」²⁰ 以後上海的文攻武衛組織改名為「上海民兵」，但工廠派出的重要負責人必須是「老造反」。這一原則一直堅持實行到文革結束。

張春橋最初對文攻武衛這個名稱不是很滿意，認為不是很確切。他在1967年10月6日市革會的講話中說：

19 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關於發展、壯大工武裝隊伍的請示報告》，轉引自《「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

20 《關於上海文攻武衛隊伍成長、建設情況的報告》(草稿)，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1969年9月，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年12月第17期。

文攻武衛四個字包含內容太多了，那等於文化革命的兩個方面你們都包了，那恐怕包不了。因為它基本上是個武裝，武裝組織你可以搞文的，也可以搞武的。²¹

於是，11月25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向市革會打報告建議改名：

「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這個名稱包涵的面過於廣泛，沒有體現出工人武裝的性質，建議改稱為「上海市革命工人武裝指揮部」。²²

雖然這個建議後來沒有被採納，但是，從這個名稱建議可以看出，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給自己的定位是上海工人武裝。這個「上海工人武裝」的概念，和文革前的「民兵」有着不同。後者是出於藏兵於民和全民武裝的理念，而前者，則更有着階級武裝和地區自衛隊的意味。

1967年9月，上海港務局建立第一個文攻武衛師，而且被編制為上海市文攻武衛第一師，直屬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領導。接着，在港務局、第二機電工業局、鐵路分局、城市建設局以及建築工程局，成立了以系統為建制的文攻武衛師。但其他行業的文攻武衛組織，基本不按系統建制，而是歸屬到工廠所在區的文攻武衛指揮部。楊浦區是第一個建立區級文攻武衛指揮部的，以後各區都建立了指揮部。最初區級組織稱「區分部」，但王少庸覺得和國民黨的「區分部」重名，遂改為「區指揮部」。

文革前夕1966年的上海民兵，全市共建有21個武裝基幹團、近百個武裝基幹營；還有高炮(機)、地炮、偵察、通信、防

21 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關於發展、壯大工武裝裝隊伍的請示報告》，轉引自《「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

22 同上。

化、運輸、醫護等多種類型的民兵專業技術隊伍。²³ 文革中，到1969年中共「九大」前後，隨着秩序的鞏固，上海文攻武衛組織的發展速度加快。據統計，僅1969年，就發展了4.1萬多名文攻武衛隊員，是1967年和1968年發展總數的兩倍；而到1970年3月已建立了7個師，72個團，151個營，623個連，共21萬人。²⁴

文攻武衛口號於1967年7月被提出後，全國其他地區也有成立文攻武衛組織的，但後來全部都被解散。中共「九大」以後，民兵活動恢復，統一都稱為民兵，唯獨上海還保留文攻武衛的名稱。此時的工總司也仍然保持着名稱，沒有像全國各地那樣稱為「工會」。不改名的理由一樣：「大家對這個名字有感情」。1969年刊登在《工人造反報》上的一篇文章說：「廣大文攻武衛指戰員的意見，『文攻武衛』叫起來親切，聽起來熱乎，聽到這四個字，就能聯想到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最好能繼續保持這個具有文化大革命特點的名稱。」²⁵ 但全國都稱「民兵」，上海不能特立獨行。終於，1970年5月31日下午，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在虹口體育場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上海民兵工人基幹隊伍成立大會」，參加大會的民兵有4.62萬多人。上海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主持大會，王洪文宣佈：「為了適應全國人民武裝力量名稱的統一，市革命委員會討論決定將『文攻武衛』改稱為『上海民兵』。」

但是這次改變名稱，只是改了文攻武衛成員的名稱，也即將文攻武衛隊員改稱為民兵。而市、區兩級指揮機構仍然稱「文攻武衛指揮部」，仍然掛着原來的牌子。直到1972年9月10日，市、區兩級的文攻武衛指揮部才全部改名為「民兵指揮

23 《上海軍事志》。《上海軍事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年出版。

24 《「四人幫」在上海經營「第二武裝」的始末》，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年12月第16期。

25 《武裝工人階級，改造城市民兵》，載於1969年3月23日《工人造反報》。

部」。就像工總司更名「工會」一樣，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又一次成功地保留了自己在文攻武衛系統的骨幹隊伍。

最初負責文攻武衛指揮部以及後來的民兵指揮部工作的，是市革會的王承龍和王洪文。王承龍後來下台，王洪文去中央，這個工作就由分管群眾工作的市委書記王秀珍負責。雖然，文攻武衛指揮部以及後來的民兵指揮部，都是市革會下面的一個工作部門，由市革會領導，不屬工總司以及後來的總工會領導。但在市革會中，具體分管民兵工作的是王秀珍，王秀珍是工人造反派。而且，在任命民兵各級領導的標準中，明確規定營以上幹部必須是造反派，幹部隊伍必須以工人造反派為骨幹。所以，上海民兵實際始終在工人造反派的掌控中。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民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武裝，是非常確切的。文攻武衛組織和工會系統一樣，都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領地，而且是兩個最重要的並行領地。

改造民兵之一：「參加社會階級鬥爭」

1967年7月31日，張春橋在給毛澤東要求成立上海工人文攻武衛組織的信中說，毛澤東曾經多次提及民兵的改造。毛澤東的想法究竟是哪些內容，尚未查到原話或張春橋的解釋。從可以查到的王洪文對民兵改造的要求，主要是三個方面。

首先是「參加社會階級鬥爭」。這是王洪文反復強調的。王洪文提出：文革前，民兵脫離階級鬥爭，不少民兵組織有名無實，是「牆頭上的官，抽屜裏的兵」。²⁶意思是民兵幹部只是名單貼在牆上公佈一下，以後就沒事幹了；民兵的名單只是寫入花名冊，然後就放進抽屜裏了。王洪文說：「文攻武衛指

26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1973年7月上報中央的報告《武裝工人階級，建設城市民兵——上海城市民兵的調查》，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年第16期。

揮部的工作很多，我覺得還是抓階級鬥爭，如果離開了這一條，這個隊伍的生命就不會很長了。」²⁷ 他在「上海民兵第二次四好連隊、五好戰士代表會議」上的講話，集中表達了這個思想：

民兵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是有很大教訓的，一下子給衝垮了。如果民兵不這樣參加階級鬥爭，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會沖垮。過去民兵組織是比較健全的，但為什麼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下子沖垮了呢？過去民兵有很大弱點，不參加或很少參加當時的階級鬥爭，脫離現實的階級鬥爭。大家想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當時(民兵)保上海市委的多，還是打上海市委的多？我的看法，我也是民兵，是連長，從全市來看，是保市委的多，有的變成鎮壓群眾的工具，有的出動民兵搞武裝遊行，這是很大的教訓。²⁸

文革前的民兵，只是在軍事訓練時才有活動，於是在大多數時間裏不像實體組織。王洪文希望通過「民兵介入社會階級鬥爭」，給民兵以常規性的工作內容，使民兵成為常規性的實體組織。1967年12月7日的查抄國務院各部、各省市駐滬辦事處的行動，就是文攻武衛組織首次「介入社會階級鬥爭」的行動。這個行動是張春橋提議的。張春橋為什麼提議組織這樣的行動？據他當時說是由於北京已有行動，上海要跟上。12月初，他將當時市革會負責人之一王承龍以及市革會辦公室負責人朱玉佩叫去，說：「北京專門查抄各省市駐京辦事處，收穫很大，上海也要這樣搞。要文攻武衛指揮部制定計劃，抓緊準備，每個省市駐滬辦事處的地形圖要畫詳細，有幾道門，電源在那裏，行動時紅衛兵一起參加，讓他們神氣一番。」²⁹

27 《「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

28 王洪文的這個講話轉引自《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年第17期。

29 張春橋的話引自王承龍1978年4月11日供詞，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

王承龍即回康平路向王少庸匯報，隨後又找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傳達佈置。經過偵察、繪製地圖、調集車輛等一番準備，並成立了由王洪文、王承龍、張寶林、鍾定棟組成的臨時指揮部；市革會還為這次行動印製了「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查詢證」。12月7日，五千餘名文攻武衛隊員和一千餘名大專院校紅衛兵集結在人民廣場，分幾路行動。行動人員手持「查詢證」，衝進各駐滬辦，宣佈該駐滬辦馬上停止辦公，所有物質一律封存。這次行動，共查封國務院各部委和各省市的駐滬辦事處307處。並將所有的工作人員集中「學習」，之後要他們限期離開上海，回所屬各省、市。這個行動，隨即由市革會決定，在《工人造反報》上詳細刊登，《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也同時報道。報道稱這次行動摧毀了走資派和牛鬼蛇神在上海的「避風港」和「安樂窩」；還查抄出許多武器、電台和變天賬。而事實上，後來據張寶林回憶，那只是早已被封存作廢的股票、保險單據、地契，以及警衛武器和報廢槍支，還有工作電台。³⁰ 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將上海市革命委員會1月4日關於查封、清理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駐滬辦事機構的請示報告批轉全國，稱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革命行動，中央各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應給予積極的支持和配合」，並對被查封單位的財產歸屬和人員去向，以及以後的業務關係作了一些規定。這表明，中央支持上海的這個行動。

1967年12月7日的查封只是開始。12月27日，市指揮部調動人員對上海的十大飯店和一批市級醫院進行突擊檢查，以查「躲藏在上海旅館和醫院的走資派」為名，抓了住在飯店或醫

「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年2月《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

30 張寶林 1978年3月12日，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 1981年2月《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五》。

院的外省市幹部幾十人，關在交通大學。12月29日，市指揮部又調動近萬名文攻武衛隊員，對全市近三百家大小旅社進行突擊檢查。這樣的查封和突擊檢查一直持續到1968年3月，共衝擊各種機構631處。其間的1968年4、5月間，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協助市革會工交組，對全市57處宗教廟宇房屋進行查封和接管，查封面積8.1萬平方米，查封後由工交組派人管理。

這樣的行動，還針對上海外來人口和外地來上海躲藏的「走資派」和「壞分子」。1968年9月20日，市指揮部調動2萬名隊員，加上3萬名財貿職工和大學生紅衛兵，對全市車站、碼頭、大飯店、醫院，以及水陸和公路等重要場所近三百處，實行突擊檢查，抓了1982人。這個行動一直持續到10月的國慶節。1969年2月，在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與市公檢法軍管會聯合成立的「上海市清查辦公室」領導下，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又與市公檢法和里弄幹部，在2月4日聯合出動7萬多人，抓了1395人，其中「嫌疑分子」149名；2月6日又出動近7萬人，清查江、河船隻7500多條，抓了68人。整個行動延續到2月25日，共出動28萬人，抓了2516人，其中外地來滬的有1155人。1968年6月6日，市指揮部與市公檢法軍管會、市勞動局革委會一起聯合行動，於凌晨2時對支疆回滬人員中的「犯罪分子」採取強制集中統一行動。市指揮部調動4000多名文攻武衛隊員，強制集中了205人，加上從山東、杭州等地抓回的支疆回滬造反組織負責人14人，共強制集中219人。除拘留的外，都強制將他們遣返所工作的邊疆地區原單位。

這些行動的主要目的，一是清理上海外來人口和外地來上海躲藏的「壞分子」，二是「打擊投機倒把」。計劃經濟時期，上海的商品供應一向遠比外地豐富充足，許多人便從上海的市場買了商品去外地銷售，在當時的語境及政策下，屬「投機倒把」及「擾亂上海市場供應」行為。於是由文攻武衛組織出面，「對那些利用旅館、飯店、招待所、浴室、船隻為據

點，進行非法套購、搶購、販運的投機倒把分子，狠狠給予了打擊」，「穩定了市場，改變了某些商品供應緊張的狀況。」這樣的行動，每年都要進行幾次。這樣一類的行動，還有1969年3月24日至27日的「打擊破壞上山下鄉現行活動」，抓了376人；1968年7月19日抓外灘海員俱樂部門前「圍觀外賓」者的行動，抓99人；1971年3月27日的「打擊現行犯罪分子，整頓車站、碼頭」行動，出動近1.33萬人，「衝擊對象」733人，等等。³¹所謂「衝擊對象」，實際就是被抓對象，被關押時間從幾小時到幾天不等，也有時間更長的。從1967年12月始，這樣的大規模行動又發展成「颶紅色颱風」，到1973年7月，「全市先後組織了三十多次。每次參加的民兵少則幾千，多則幾萬、十幾萬，對全市各個角落，特別是「壞人容易躲藏和避風的地方，依靠群眾大檢查，大清理。」³²這在前面的第22章已有敘述，這裏不再贅述。文革中，上海每年逢重要節日，都要大規模地颶幾次這樣的紅色颱風。這些任務行動，最初都是王承龍或王洪文向文攻武衛佈置的，每次都由市指揮部制定出行動方案，報市革會批准。

1967年至1970年間，公安機構癱瘓半癱瘓，社會秩序混亂，聚眾毆鬥、攔路搶劫、侮辱婦女等刑事犯罪案時有發生。有些地區婦女不敢走夜路，女工下夜班不敢單獨回家。文攻武衛在維持社會治安方面，在一個時期行使着公安機構的部分職能；以後又遊走於政策邊緣，執行政府機構不便出面的行動，例如抓那些沒有明顯觸犯刑律的「流氓阿飛」，例如各種查封行動，例如強制遣送行動。當時沒有武警，警察人數不多；而對於一些團伙性的犯罪，民兵人數多，每次出動能迅速拉出幾

31 《「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

32 國務院和中央軍委1973年11月19日轉發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城市民兵情況調查》，載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引自宋永毅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2006年版。

十甚至幾百人的隊伍，在應付突發性事件上有着優勢。例如1975年夏，南京路上的王家沙對面，一個女孩去新華電影院退票，旁邊的幾個男青年上前硬要搭訕，還將她的衣服扯去。女孩逃到附近的交通警察崗亭躲避，他們追到警察崗亭，交通警攔也攔不住，女孩的衣服全被撕扯光。南京路被看熱鬧的人擠得水洩不通。市民兵指揮部接到報告後，立即從靜安區指揮部調集了幾十個民兵，很快平息事態。

制止武鬥也是「介入社會階級鬥爭」的一個內容。1968年7月，為制止日益嚴重的全國各地武鬥，毛澤東簽署批發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七、三佈告》和《七、二四佈告》。7月26日北京派出工宣隊進駐大學制止武鬥，上海工總司的「老大難辦公室」，也向長期派性爭鬥不止的單位派出工宣隊。市文攻武衛指揮部配合宣傳中央的兩個佈告，出動一千多車次的宣傳車，以及文攻武衛隊員1.06萬多人次，上街和下廠宣傳制止武鬥。接着，又先後派出上百個文攻武衛小分隊下廠，協助市老大難辦公室共同制止武鬥。雙方各有側重：市老大難辦公室派出的工宣隊，較長時間駐扎在廠，不解決矛盾不撤出；文攻武衛組織則是發生武鬥時，臨時調去人員，分隔對峙的兩派，勸阻雙方，武鬥平息後便撤人。1969年8月2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又配合中央關於制止武鬥的《七·二三佈告》，出動3萬多人，近百輛車遊行，並向102個「老大難」單位派駐文攻武衛小分隊。而且大多數情況下，都以人海戰術大規模出動，首先從人數上壓倒對方。小分隊隊員們手拿棍棒，對方若有不從，先抓起來關上一陣再說。比起必須恪守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原則的軍隊，文攻武衛隊員的這種半強制方式倒是更容易見效。上海科技大學兩大派武鬥不斷，市革會和軍宣隊勸阻不成。文攻武衛以人數的絕對優勢進駐學校，強制兩派頭頭交出武器。上海閔行地區三所學校：上海電機製造學校、上海航空工業學校、勞動局第一技工學校，被稱

為「三隻鼎」，自行製造武鬥兇器，衝突不斷。文攻武衛進駐後，也是先對頭頭「採取措施」，即關上幾天，迫使兩派交出兇器。徐景賢所以說：「有個地方搞武鬥，上海警備區去講沒用，我講幾小時也沒有用，結果武裝工人拿着棍子去，問題解決了。」³³張春橋對此曾總結說：

工人武裝制止武鬥比解放軍好，解放軍有「四個不」，講話也受到限制。一武鬥，他們(工人武裝)戴上一頂柳條帽就去了。你是造反派嗎？我也是；你是群眾嗎？我也是；你辯論，我就同你辯；你打我，我也能打。看樣子，我們這個隊伍比民兵好，因為是造反派，是在階級鬥爭中建立的，原來的民兵是在和平環境中建立的。³⁴

文攻武衛和後來改名的上海民兵，原來只是不定期地颳紅色颱風，或組織一些大規模的臨時行動。1970年，市民兵指揮部在《文攻武衛簡報》上，刊登了一篇情況介紹，是關於上海焦化廠向附近街道里弄派出民兵小分隊維持社會治安的。王洪文看了這份「民兵抓社會階級鬥爭」的簡報後，立即批示說是新鮮經驗，要求總結經驗。1971年4月16日，閘北區指揮部從13個工廠組成13支民兵小分隊，首次進駐13個里委會，作為先行試點。7月6日，《解放日報》的《增刊簡報》，又刊登上海電梯廠組織民兵小分隊進駐楊浦區眉州路街道里弄的經驗，王洪文又馬上批轉，要市革會將這個「民兵改造中的新鮮經驗」，在全市企事業單位推廣。於是，各區的指揮部都派出區屬民兵小分隊，在各街道建立民兵小分隊辦公室，工作人員五至八人不等，負責人稱「聯絡員」，均由區民兵指揮部指派；街道下

33 張春橋 1967年2月20日在接見江西省革命委員會赴滬學習團時的講話。轉引自《「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

34 同上。

面的各里委，每個里弄進駐二至三名小分隊隊員。為了使派出的聯絡員與所在街道的工作協調，市民兵指揮部特地與分管街道里弄的市革會地區組商定，民兵小分隊辦公室的聯絡員，由區指揮部派駐，但必須「結合」進街道黨委，負責該街道所屬範圍的治安保衛工作。民兵小分隊辦公室的治安業務，接受街道黨委和區指揮部的雙重領導。³⁵

文攻武衛初建時的颶紅色颶風只是臨時性行動，行動完後便回廠。派民兵小分隊介入社會治安，使社會治安成為民兵的長期日常工作。小分隊的人員全部脫產，但那麼多非生產人員由工廠提供，人員編制和工資都仍然由工廠承擔，加重了工廠負擔。1972年3月，馬天水提出民兵不應脫產，於是民兵小分隊改為業餘活動。到1976年，全市一百十一個街道都設立了民兵小分隊辦公室；全市1100多個里弄，都進駐了民兵小分隊。³⁶ 據1973年7月的統計，全市派出1170多個小分隊。³⁷ 市民兵指揮部為此還起草了《民兵小分隊條例》。

民兵小分隊進駐街道里弄，主要職能是巡邏執勤，打擊犯罪，起着社區保安的作用。據統計，從1971年至1973年，「兩年多來，全市民兵小分隊共破獲各種案件2.2萬餘起」。³⁸ 自從民兵小分隊巡邏執勤，一些喜歡聚眾街頭鬧事起哄的小青年收斂多了。他們稱小分隊為「阿文攻」，一聲「阿文攻來了」，那些站立街頭的小混混馬上作鳥獸散。侮辱強姦婦女的案發率也下降多了。1973年上海市委以《關於上海民兵參加社會階級鬥爭的情況報告》上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35 以上資料引自原市民兵指揮部負責人施尚英1977年12月4日，載於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1981年2月《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材料之四》。

36 《文革史話》第551頁。

37 國務院和中央軍委1973年11月19日轉發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城市民兵情況調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8 同上。

當時在中國，公民人身權利不可侵犯的觀念，本來就很淡薄，文革中更是任意抓人任意揪鬥成風。雖然比起當初的上體司治安組，以工人為主體的民兵，在執行政策方面要好得多，但民兵小分隊還是多少沿襲了那樣的習氣。在民兵小分隊之前，文攻武衛抓人要經市革會批准。1969年下半年，指揮部以每次抓人都由市委領導直接批示不方便為由，要求能有自己的「查詢證」，即抓人時出示的證件。王洪文批准。³⁹有了查詢證，民兵抓人比過去不受限制多了，只要認為誰是流氓阿飛，先抓起來，扭送去區民兵指揮部關押再說。市指揮部和各區指揮部都有自設的「隔離室」，全市共11處，抓來的人，關在隔離室自行審訊。比起訓練有素的專職警察，民兵都是普通工人，素質參差不齊，打人之事時有發生。市指揮部不贊成，但也管不住，只能發現一個處理一個。1975年，市指揮部到徐匯區調查時，甚至發現徐匯區指揮部一個進駐在鬧市區的小分隊，私做鐵籠子，用來關押被他們抓的人，還說是向公安局學的。市指揮部馬上對徐匯區指揮部的領導成員進行撤換，不許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但這只是治末不治本，只要抓人權限不受制約，這樣的現象很難根治。

作為參加社會階級鬥爭行動，上海民兵還管理過犯罪青少年。1966—1970年，全國各省、市、區陸續宣佈撤消勞教、少年管教和強制勞動。作為替代，上海民兵「對一些違法嚴重民憤較大的但還不能判刑的犯罪青少年，採取辦勞動教育學習班的形式，把他們放到工廠去，夾在工人和民兵中間，邊參加生產勞動，邊進行教育改造。」據文革中的一份材料顯示，1973年，「這種集中管教的學習班有9個，一年來有1359名對象進學

39 「查詢證」由王洪文批准一事，是施尚英在1977年12月4日的交代中寫的，他說當時是聽鍾定棟說的：「民兵指揮部在70年左右就打了報告給市委，要取用查詢證。鍾定棟說，民兵指揮部現在用的查詢證是王洪文批准的」。載於《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行之四》，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1981年2月編。

習班，經勞動教育後返回學習和工作崗位的有1106名。」⁴⁰而據文革結束後的一份材料顯示，當時上海全市各區辦了40多個「邊勞動、邊改造、邊審查」的「三邊」學習班，既關人，又審訊；既立案，又辦案。市指揮部還聯繫10個區和6個國營農場，建立了50多個「勞動教育學習班」的點，將過去歷屆遺留下來的因打架、「流飛」（流氓阿飛的簡稱）等問題而未分配工作的一萬多名青年，放在那些指定的工廠或農場「考察」，由民兵看管。⁴¹

最初，颶紅色颶風等雖然都有里委會和公安機構派出所參與，但由於公安系統處於半癱瘓狀況，所以文攻武衛實際起着主要作用。1968年1月，上海市公、檢、法系統被軍管，之後公安局的職能逐漸恢復，在社會治安方面的工作內容與文攻武衛的維持社會治安重合；加上公安系統的警察和軍代表，很多都與造反派不合，產生諸多矛盾。他們認為民兵管社會治安，是「國際飯店門口擺粥攤」，沒有必要。他們尤其反對颶紅色颶風行動，認為抓人應該是公檢法的事情，民兵不應隨便抓人。對於紅色颶風，公安局或者「一直不表態，表示難辦」，或者反對。以至於1970年7月下旬，一次市文攻武衛原定的紅色颶風，沒有颶起來。對民兵小分隊，也是「去派出所不給介紹信」。⁴²1968年下半年，一次在市革會的匯報會議上，當談到文攻武衛和公安局因為各自都管社會治安而產生矛盾時，張春橋說：「可以聯合起來嘛！兩家共同維護社會秩序」。於是，由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派出空四軍軍代表王思賢和一些公安人員，進駐市攻武衛指揮部。1969年7月15日，以市文攻武衛指

40 國務院和中央軍委1973年11月19日轉發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城市民兵情況調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1 《「四人幫」在上海經營「第二武裝」的始末》。

42 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1971年1月8日給市革會的《關於落實颶「紅色颶風」的準備工作和碰到的問題》，轉引自《「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

揮部為主，與市公檢法軍管會、市革會有關組辦，組成「市維持革命新秩序辦公室」，簡稱「維辦」，在黃浦路20號辦公，主要負責人王維國、李彬山、張寶林、鍾定棟、劉志明等。之後，文攻武衛在社會治安方面的一些大的行動，包括颶紅色颱風(後來稱為「革命行動」)、重大節日或外賓來訪安全保衛等，一般都經市革會批准，由「維辦」協調兩方，市公檢法和市民兵指揮部共同行動。1970年3月27日，市指揮部根據王洪文、王少庸、徐景賢、王維國的批示「抓人的事，應由公檢法軍管會辦理」，向市革會送交《關於對在押人員、未了專案的處理和今後有關社會治安問題的請示報告》，提出：(1)衝擊對象。其中案情重大者交公檢法懲處，一般的交工廠、單位處理；(2)專案，交公檢法；(3)除交辦任務外，一般不再受理群眾扭送人員、調解民事糾紛、維護劇場、車站、碼頭秩序等任務。4月1日市革會批示同意。⁴³

1971年初，第十五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重新確定公安、司法等機關的作用，並明確規定：除了專政機關也即公安、司法等機構，其他組織不准抓人關人。王洪文對此很不滿意，評論說：「第十五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文件是背着中央搞的，針對上海文攻武衛的，中央也不了解，就批發了」，「說什麼民兵不能搞無產階級專政，如不能搞，要民兵幹什麼，否則就不叫無產階級專政工具了」。王少庸則對市民兵指揮部說：「上海文攻武衛搞群眾組織是市革會批准的，我們這樣做不叫抓人，叫衝擊審查，你們不要怕，要繼續搞」。⁴⁴自此以後，民兵抓人不稱「抓」，改稱為「衝擊」，說民兵抓人絕大部分都只是教育一下就放了，所以不能稱是抓人。以後，各級民兵的報告，都將「抓人」改稱為「衝擊」。

43 轉引自《「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

44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話》第545頁。

主管上海公檢法的空四軍政委王維國，對民兵小分隊不支持，認為和公安部門的工作重複。1971年9月林彪事件後，王維國被牽連，之前他對文攻武衛的態度，被看作是反對民兵介入社會階級鬥爭。1974年，市公檢法軍管會撤銷，市公安局、市檢察院和市法院恢復。年底，上海市高級法院召開審判工作會議。會上，市民兵指揮部負責人周宏寶提出三種方式：第一種：需要逮捕判刑者，轉公安機關審理並向法院起訴；第二種：民兵自己審理，不轉公安機關，直接向法院起訴；第三種：由民兵提出判刑意見，黨委批准，法院辦手續。周宏寶說：「目前三種方式都可以試行」。王少庸表态：「周宏寶是市革會分管公安、法院、民兵方面的領導，他的話代表市委，你們要認真執行。」⁴⁵ 以後，也實際是這樣執行的。抓人權是社會治安的核心權力，周宏寶不肯放棄這個權力。

197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部憲法頒布，其中對抓人權限有明確的表述：「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公安機關批准，不受逮捕。」許多人包括民兵指揮部市和區指揮部的一些負責人，對民兵的抓人權限提出質疑。為此，王秀珍特地作解釋：「最近，對民兵抓人有不同看法，你們不要自己懷疑自己，自己否定自己」，「憲法只規定逮捕、拘留要有專政機關執行，沒有講衝擊，衝擊不等於逮捕、拘留。」⁴⁶ 徐景賢對此定性說：「什麼叫專政機關？文攻武衛指揮部就是專政機關之一！」⁴⁷ 就這樣，憑着將「抓人」改稱「衝擊」，直到文革結束，上海民兵始終有着抓人權。

45 《上海文革史話》第 543 頁。

46 轉引自《「四人幫」及其抓牙要民兵「立法、管法、執法」是個大陰謀》，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1年1月第21期。

47 轉引自《「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

改造民兵之二：「三位一體」

「改造民兵」的又一項內容，是改造民兵的機構建制，擴大民兵的功能，增強民兵組織的獨立性。內容之一是「三位一體」，即將基層單位原有的武裝、消防、保衛，三個部門合為一個部門。這是王洪文在1970年提出的。他在自己原來工作過的工廠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與廠黨委成員談話時提出，將民兵、治安保衛、消防三項工作，由一個部門管，三位一體。他要求在廠裏先行試驗。1973年9月28日，王洪文在毛澤東「大辦民兵師」講話十二周年紀念大會上提出：

公、檢、法抓治保、消防，民兵指揮部抓民兵，這怎麼行呢？造成民兵不管治保，治保不抓民兵，這不好，民兵要把治保、消防負擔起來，不要再另外組織了。⁴⁸

1971年3月29日，王洪文在上海民兵第二次「四好連隊、五好戰士」代表會議上又說：

在單位裏要充分發揮民兵的作用，如消防，如對四類分子的監管、平時保衛安全工作等，民兵都應該負責起來起作用。⁴⁹

武裝部、保衛科和消防科，都是工廠科層的職能部門。⁵⁰

48 轉引自《上海文革史話》第544頁。

49 同上。

50 文革前一般二千人以上的大、中型工廠，都會設武裝部和保衛科；不足兩千人的工廠設武裝和保衛人員。幾個部門中，保衛科的工作最忙，不但要管工廠的保衛，防止破壞和偷盜，還要管工廠發生的刑事或非刑事案件，諸如打架、「流飛」甚至「不正當男女關係」。還協助公安部門破案；有些小偷小摸的盜竊案子，保衛部門自己破。保衛科還負責分管工廠的安全保

武裝部比較空閒，因為民兵訓練只是集中在一些特定的日子，而不是常規工作。文革前，民兵除了業餘軍事訓練，一般沒有其他活動。在許多工廠，武裝部的幹部平時也協助保衛科做些工作。所以王洪文認為，保衛、消防和民兵，三個工作可以合併。他這幾個工作都做過，他文革前就是工廠保衛科的幹事，還是民兵連長。他說：「三位一體，我為什麼要提這個問題，因為我當過治保主任，也搞過消防，搞過民兵，當過保衛幹部，我知道嘛。」⁵¹ 王洪文提出三位一體，就是不但要工廠的民兵組織取代廠武裝部，而且要民兵將工廠的保衛和消防工作也接過去。這一方面是為了擴大民兵的影響，另一方面與「民兵要介入社會階級鬥爭」用意一樣，顯然也是為了讓民兵有名正言順的日常工作，從而成為工廠的正式職能部門。

三位一體首先在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以及另外七個工廠試點。此外，還在郊縣的嘉定、金山的一些農村生產大隊也進行了試點。以後推廣到全市。

對科室的精兵簡政是文革的共識，1968年3月30日的兩報一刊社論曾刊登毛澤東所提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之一，就是要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因此。王洪文的這個提議，沒有遇到大的反對。最初以王洪文自己工作過的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為試點，之後推廣到全市，全市

衛以及對「四類分子」地、富、反、壞等專政對象的監管。保衛科下面設治保委員會，在每個車間部門都設不脫產的兼職治保委員。工廠的消防也是保衛科負責，保衛科一般都設人專職或兼職管理。有些情況特殊的大廠例如造船廠、煉油廠、化工廠等，廠裏專門設消防科，還有專職的消防隊，日夜值班。此外，黃浦江沿岸的工廠，每年汛季的防汛工作也歸保衛科負責。武裝部是管民兵的。工廠按人數多少設班、排、連、營等民兵建制，都是業餘的，日常工作由廠武裝部專職人員負責。經費從國防經費開支，所以都由警備區發放，不過廠武裝部幹部不是現役軍人，任命權在工廠。

51 轉引自《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1年1月第21期，第30頁。

98%的工廠、企事業單位都實行了「三位一體」。⁵²

關於「三位一體」辦事機構的組織設置，黨委、總支廠，一般設立武保組。武保組既是革委會的辦事機構，又是民兵的辦事機構。為了順利開展武保工作，武保組的主要領導由民兵團、營幹部擔任為宜，獨立支部廠原則上不設武保組，民兵、治保、消防三項工作在黨支部領導下，由民兵連統一負責，分工專人抓。⁵³

1974年12月25日，公安部印發上棉十七廠黨委關於實行民兵、治保、消防三位一體的兩個材料的通知，要求全國學習。⁵⁴合併後的部門稱為「武裝保衛組」，簡稱「武保組」（文革中砸爛科室，工廠所有的科改稱「組」），民兵負責人是武保組的當然負責人。武保組負責人的任免，必須通過區或市民兵指揮部的批准；而過去，廠武裝部和消防科的負責人都是由工廠黨委任命的。就這樣，上海的民兵，在工廠外的社會上，以介入社會階級鬥爭的形式，代行公檢法職權；在工廠內合併武裝、保衛和消防科室，名正言順地擴大工作職能。一個原來只是為備戰而建立的、在和平時期沒有日常工作的組織，就這樣成為一個重要的職能科室。工作在接受所在單位黨委、革委會領導的同時，也接受區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業務領導。

但王洪文還是不太放心，他希望通過中央，將三位一體鞏固下來。1971年12月13日，在去北京工作前，王洪文到市指揮部做工作安排，並提出：「三位一體的試點經驗還是要很好抓

52 這個數字引自《「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但是在《文革史話》的第544頁上說，由於基層的抵制到1973年，在全市有民兵建制的工廠中，「三位一體」不到10%。筆者就此問過「文攻武衛」的負責人施尚英，施答，當時大多數工廠都實行了「三位一體」。

53 上海市民兵指揮部1974年11月19日《關於1975年度民兵組織的整頓意見的通知》，載於《「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

54 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1月27日，公安部又發文撤銷這個通知。

一下。要在原來的基礎上，再找幾個單位繼續試點……這不光是上海的問題，要報中央才能解決。」1973年7月，上海市革會將上海民兵介入社會階級鬥爭，以及三位一體的經驗，寫成報告《上海城市民兵的情況調查》和8個附件，報送中央。報告是由市委寫作組修改定稿的，王洪文對報告很滿意。報告中特地将三位一體作為搞好基層民兵工作的重要經驗列上，理由是：

有利於加強黨對武裝保衛工作的一元化領導，便於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有利於精兵簡政，減少層次，提高效率；有利於平戰結合，促進戰備工作的落實，同時，也充分體現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真正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每一個基層。⁵⁵

11月19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以1973年162號的文件號，將這個報告轉發全國。轉發通知對上海民兵參加社會階級鬥爭高度評價，要求各地向上海學習。⁵⁶據說，周恩來在年底的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的會議上，也要求各軍區去上海學習上海的民兵工作經驗。⁵⁷

中央轉發上海的這篇報告，王洪文立即打電話給馬天水，要上海抓住時機大力宣傳，「擴大上海民兵在全國的影響」。⁵⁸上海方面立刻於當年12月24日組織召開全市民兵工作大會；1974年1月14日，又在雜技場進行歌唱民兵專場演出；還組織舉辦展覽會、拍電影紀錄片、寫小說、出版書籍。⁵⁹上海《文

55 國務院和中央軍委1973年11月19日轉發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城市民兵情況調查》，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6 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2月，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又下發《關於撤銷兩個民兵工作文件的通知》取消了162號文件。

57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2011年1月16日對施尚英的訪談。

58 《上海文革史話》第556頁。

59 《上海民兵鬥爭故事》和軍事理論叢書《大辦民兵》。

匯報》和《解放日報》更是集中刊登了一大批關於上海民兵的文章。1975年，馬天水又提出：「下面三位一體了，上面怎麼辦？」建議創造條件，將部分公安工作與民兵工作逐步合署。市民兵指揮部遂打算，將屬於區公安分局的治保科和經文保科⁶⁰的大部分職能，以及公安局消防隊的全部工作，全都並到民兵指揮部的作戰組。市指揮部打算先在一個區進行試點。⁶¹ 試點之前，施尚英先開了幾個座談會徵求意見，下面意見很大，質疑民兵權限與公安局職責關係，因為這些公安局的日常工作合併給民兵後，將完全架空警察職責，於是連試點都沒有進行就停止了。

改造民兵之三：「二部合一」

「二部合一」，就是警備區系統的區縣武裝部的某些職能，與民兵指揮部合併。文攻武衛組織取代民兵後，各區文攻武衛都歸市文攻武衛指揮部領導。而文革前，區縣武裝部的最主要日常工作，就是民兵管理和訓練，還有徵兵工作以及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復員、退伍、轉業軍人的安置工作。徵兵工作和安置復退軍人的工作，每年都是季節性的，集中在一兩個月。而由於民兵工作被市和區文攻武衛指揮部攬去，區武裝部主要的日常工作沒有了。雖然各區文攻武衛指揮部裏都派有武裝部的幹部，但這不是以區縣武裝部為主開展工作，而只是協助工作。武裝部的民兵工作部門實際成為多餘。此外，市內各區都設文攻武衛指揮部領導；但郊縣不設文攻武衛指揮部，民兵仍歸各縣武裝部管。於是上海的民兵存在着兩套體制。

60 公安局的治保科全稱治安保衛科，管社會治安；經文保科全稱經濟文化保衛科，負責工廠、學校、醫院等單位的內部保衛工作。一些大廠的保衛科與公安分局的經文保科，都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工作聯繫。

61 《「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

王洪文提出精兵簡政，將兩套體系歸於一統，警備區的「野營訓練指揮部」與「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合併。⁶²這是王洪文一直希望的。1971年12月13日，他去市文攻武衛指揮部佈置工作時，說自己已經和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商量過，將這兩個部門合併起來再說，「首先是上面要合起來，上面合了，下面就好辦了，合了有利條件多！」⁶³首先合併的是楊浦區的文攻武衛指揮部與野營訓練指揮部，名稱仍為「上海市楊浦區文攻武衛指揮部」，但不再有「野營訓練」的名稱，接着，其他區也紛紛合併。

但是，上海警備區及其上級領導南京軍區，始終不贊成保留文攻武衛指揮部。他們提出，市區的十個區已經有武裝部，現在又有文攻武衛指揮部，形成兩套系統。這樣，光是在十個區便實際存在20個對民兵的指揮機構。

軍隊真正的意思是反對地方黨政插手民兵指揮，核心就是要求解除上海地方黨政對民兵的指揮權。1970年8月，解放軍總參在北京召開全國民兵工作座談會。會上，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廖容標提出恢復武裝部對民兵的領導，要求撤銷文攻武衛指揮部。還說，這件事，南京軍區難講話，上海警備區也很為難，希望中央表個態。對民兵指揮部的幹部安排，廖容標提出三條建議：1. 原來武裝部來的，還回武裝部；2. 原來是專職武裝幹部，回廠仍當專職武裝幹部；3. 不是專職武裝幹部的工人，回廠抓革命促生產。廖的話說出軍隊幹部想說的話，參加會議的上海警備區胡守富副司令員「沒有表示反對意見」，實際是非常贊成；主持會議的軍委副總參謀長閻仲川對廖副司令的講話

62 「野營訓練指揮部」是在1970年底成立的，當時毛澤東在對一份關於部隊軍事野營拉練的總結報告上批示，要求野營拉練活動也要在工人、學生中開展，全國於是開展群眾運動般的野營拉練。上海成立了以警備區為主的野營訓練指揮部，市內各區也成立以武裝部為主的野營訓練機構，市區兩級的文攻武衛指揮部也都參加日常工作。

63 《「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

非常欣賞，會後專門寫成簡報，發至各大軍區和省軍區。⁶⁴

會後，廖容標來到上海，召開十區文攻武衛指揮部負責人會議，提出全國都是武裝部，只有上海是民兵，不合形勢。他提出，可以「兩塊牌子，一套班子」。⁶⁵ 廖容標的「兩塊牌子」只是讓掛民兵指揮部的牌子而已，是名義上的讓步；實際就是只要武裝部一套班子，恢復武裝部抓民兵工作，撤銷民兵指揮部。參加會議的文攻武衛指揮部的工人全都反對，撤銷文攻武衛之事無法推行下去。

此外，各區野營訓練指揮部與文攻武衛指揮部合併了，而市裏這兩個機構始終沒有合併。直到1972年，在王洪文的一再要求下，野營訓練指揮部與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才開始籌備合併。但由於警備區和南京軍區的反對，合併報告1972年2月打給南京軍區，遲遲批不下來，拖了七個月。⁶⁶ 1972年9月10日，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與野營訓練指揮部終於合併，名稱為「上海市民兵指揮部」，區級文攻武衛指揮部也都相應更名為某某區民兵指揮部。

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與野營訓練指揮部合併後，警備區不放棄對民兵領導的努力，仍然要求：「合併後，在市委一元化領導下，日常工作由警備區負責」。⁶⁷ 為便於警備區對市指揮部的領導，警備區要求合併後的市民兵指揮部，按照警備區的建制，設置辦事、政工、指揮、後勤共四個大組，直接與警備區相應的業務部門對口。市革會給市民兵指揮部的編制是110人，警備區派去50人。據合併後統計：上海警備區派的幹部在市指揮部約佔一半以上。在指揮部大組一級的11個正副組長中，除

64 鍾定棟、鄭惠儀 1974年2月19日給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信，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年12月第18期。

65 《「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

66 同上。

67 《上海警備區機關與「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鬥爭的幾個片段》，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1年1月第20期。

辦事組組長和指揮組組長外，其餘均由部隊幹部擔任。在大組下屬的11個小組中，組長也均由部隊幹部擔任，各區民兵指揮部的負責人，相當一部分也是軍隊幹部。警備區認為：「這樣，就從組織上較好地保證了軍事系統對民兵工作的領導。」⁶⁸ 合併後的上海市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成員由李彬山、胡守富、吳立義、夏琳、鍾定棟、鄭惠儀、閻波共7人組成，李彬山任組長，胡守富和吳立義任副組長。3個正副組長都是軍人。所以，市指揮部的工人們馬上感覺出，這是警備區對他們的奪權。他們反映說調整後「原來的地方幹部一律降為副職」。所謂的「地方幹部」，就是非軍人的幹部或工人。⁶⁹

事實上，警備區確實有趁合併，對領導成員進行調整的意圖。警備區群工處副處長王國興佈置：「要把權抓過來，權要我們軍隊掌握」，「今後工作還是武裝部抓的，現在就應該打好基礎。」⁷⁰ 靜安、虹口、長寧、徐匯、閘北五個區文攻武衛指揮部的主要負責人原來都是「地方幹部」，合併後，這些「地方幹部」都被調整降級為「三、四、五把手」。合併後的十個區民兵指揮部的負責人共56人，警備區派去的軍人35人，工人21人。但不管警備區怎樣調整，對民兵指揮部而言，保持自己這個機構存在，不被解散，就是達到了目的。

1974年9月2日，解放軍總參謀部在北京召開組織訓練工作會議，研究民兵的組織建設、軍事訓練和民兵戰鬥骨幹隊伍的建設問題。會議快結束時，張春橋和王洪文要求學習上海的民兵經驗，於是又延期三天，至25日結束。這個會議的《總參組訓會議紀要》，國務院和軍委10月30日以1974年104號文件轉發全國，要求全國各地也建立民兵指揮部。⁷¹ 全國各省市都來

68 《上海警備區機關與「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鬥爭的幾個片段》。

69 鍾定棟、鄭惠儀 1974年2月19日給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信。

70 同上。

71 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2月，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又下發《關於撤銷兩個民兵工作文件的通知》取消了104號文件。

上海參觀取經學習，包括八大軍區也都派人來上海考察民兵工作。民兵指揮部在各省市紛紛建立。

但是，所有的民兵指揮部，都遇到那個繞不過去的問題：成立後的民兵指揮部，與武裝部是什麼關係？本來由武裝部管民兵，現在民兵自己成立指揮部，是否多此一舉，是個多出來的機構？民兵指揮部與武裝部究竟是平行關係，還是被領導與領導關係？還有，每年民兵訓練所需的武器、彈藥配備計劃，過去都是軍隊編的，通過武裝部下發，也由武裝部管理；成立了民兵指揮部，這些事情由誰管理？等等。這是全國各地來上海取經學習時都必定提出的問題。中央軍委總參謀部也專門到上海來調查。

王洪文於是又提出「四部合一」，即將武裝部、民兵指揮部、人民防空辦公室、復員退伍軍人安置辦公室，四個部門合併為一個部門，稱為「四部合一」。這是繼野營指揮部與文攻武衛指揮部合併後，民兵體系與部隊有關部門的又一個合併，而且是最終落實民兵武裝歸誰領導的體制性合併。部隊反映很大，反對者眾多。後來馬天水提出，「四部合一」涉及面多，精簡不是主要目的，要從本質上考慮問題。還是先將區武裝部和民兵指揮部合併，關鍵是武裝部，把武裝部並過來了，其他的好解決。馬天水抓住了合併的本質：將武裝部並到地方，民兵的指揮權也就能剝離出軍隊，轉移到地方。這是核心，是民兵轉為由地方領導的武裝力量的關鍵。

1975年7月，王洪文回上海。9月18日，王洪文在錦江小禮堂接見市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全體成員。在這個會上，王洪文提出武裝部和民兵指揮部合併的「二部合一」設想：

現在是否將武裝部和指揮部合起來，抓一二個區，一個縣試點一下，上面軍事訓練由警備區抓。不管怎麼樣，警備區也是市委一個軍事部門，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進行工

作。民兵工作過去有缺點，軍隊管民兵，沒有地方的同志參加，許多地方統不起來。搞一個區，一個縣把武裝部和指揮部統起來，試點把武裝部做的一些工作都並過來，試點一下。把武裝部做的一些工作都並過來，復員、徵兵都可並過來，對外牌子不一定叫武裝部，可以叫指揮部。也可以搞兩塊牌子一個班子，這樣有利於統一領導，有利於精兵簡政，統一指揮。可以先並起來，然後再精簡，地方和軍隊搭配起來，軍隊多一些也可以，地方多一些也可以，但是有一點：班子不能大。……⁷²

王洪文要求「四個月內拿出材料來，這個問題老不解決，就危險。」王洪文明白，軍隊中的許多人不同意另設民兵指揮部，所以他在會上又透露：「現在有人罵我們是第二武裝」，⁷³ 還說：

對民兵的組織形式爭論是很大的，過去爭論的是民兵要不要參加社會階級鬥爭，將來爭論的是組織編制問題。如果否定了組織形式，也就否定了民兵的任務。去年的文件有人還在反，組織形式推翻了，任務也推翻了。⁷⁴

王洪文要求馬上就抓緊試點，「現在就試」，先在兩個區、一個縣試點一下，能夠兩個月到三個月搞出來就更好，然後給他送報告。王洪文說：「趕快試點搞出材料，總結經驗，報告主席，什麼人也不好說了。」⁷⁵ 「我報主席，主席批了，誰也不敢反。」王洪文希望借毛澤東的威望推行自己的這個設

72 王洪文 1975 年 9 月 18 日與市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成員的談話，載於上海警備區「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組編《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 年第 17 期。

73 同上。

74 王洪文 1975 年 9 月 18 日與市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成員的談話。

75 馬天水 1976 年 11 月 21 日《我的補充揭發交代》，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

想。毛澤東的意志就是法律，只要毛澤東批示，上海的民兵指揮部就有了堅實的合法存在依據，不必再擔心與武裝部的關係問題，然後從上海推向全國。王洪文的這個信心來自毛澤東對上海民兵的關心：

反正我知道主席對上海文攻武衛是肯定的。主席多次問「你們文攻武衛還在嗎？」要主席在上海多住幾天，主席講「好啊，上海有文攻武衛嘛！」主席講不在名稱在內容實質名稱叫什麼都可以，叫武裝小組，武裝部，指揮部都可以。⁷⁶

市民兵指揮部即於10月9日給上海市委打報告，要求在楊浦區、盧灣區和上海縣試行武裝部和民兵指揮部合併的「二部合一」。市委同意。10月13日上午，李彬山和施尚英到楊浦區和盧灣區，鍾定棟去上海縣，傳達王洪文的指示，並說：

這是王副主席考慮了很久的一個方向性問題，帶有巴黎公社的意義。⁷⁷

這確實是個方向性問題，因為涉及民兵究竟由地方管還是由軍隊管。如果武裝部合併到地方，那麼軍隊對民兵的指揮權和約束力將大大縮小，民兵將成為地方武裝。這是個涉及軍隊對民間武裝力量管理體制的重大變動。王洪文深知軍隊不會同意，他知道有人說他搞第二武裝。所以在進行合併試點時，他沒有報中央，也不讓報南京軍區，想悄悄先在上海試點，做成一二個試點後，讓毛澤東圈閱後推向全國。「毛主席圈閱了，別人就不會反對了」。

76 王洪文 1975 年 9 月 18 日在接見上海民兵指揮部成員時的講話。

77 轉引自《「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

但是，從開座談會調查研究開始，合併就非常不順利，軍隊方面一片反對聲。首先涉及的是體制問題。武裝部是軍隊在地方的派出機構，取消武裝部，首先必須得到軍方同意。其次，取消武裝部，涉及全國各地武裝部的去向，上海取消，全國怎麼辦？再次，涉及工作職責問題，民兵工作從武裝部劃給民兵指揮部，為了什麼？精簡？指揮權？第三，涉及幹部編制問題，合併後的原武裝部幹部，仍然保持現役軍人身份，還是轉成地方幹部？如果轉成地方幹部，那麼就與軍隊沒有關係了；可是這樣一來，軍隊對民兵的領導又怎樣體現？這些問題的背後，實際還是民兵歸誰領導。第四，王洪文還想將公安部門的社會治安也劃過來，民兵集治安、徵兵、復員退伍軍人安置等工作於一身，這不只涉及軍隊的建制，還涉及公安部門的建制，不是王洪文一人有權解決的，更不是上海警備區或上海市委有權決定的。⁷⁸ 警備區反對合併最有利的依據，是6月24日至7月16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會議提出武裝部要做好民兵工作。這實際體現軍委的態度：由軍隊武裝部負責管理民兵。

即使作為試點的楊浦區、盧灣區和上海縣，也遭到這些地方的軍隊武裝部人員抵制。1975年10月13日，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和市民兵指揮部負責人施尚英，帶着試點調查組，去楊浦和盧灣兩個區辦學習班，10月15日市民兵指揮部負責人鍾定棟帶人去上海縣。但他們都遭到抵制。武裝部的軍人提出：武裝部編制是中央軍委定的，地方無權取消；這麼大的事情，上級軍事單位為什麼不派人來？既然沒有派人，那麼有沒有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文件？⁷⁹ 就這樣，「二部合一」困難重重，許多矛盾無法解決，進行不下去。⁸⁰

78 筆者、金大陸、金光耀 2011 年 1 月 16 日對施尚英的訪談。

79 《楊浦區盧灣區上海縣武裝部同「四人幫」一伙推行「兩部合併」的鬥爭》，載於上海警備區「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組」編《上海民兵鬥爭史》1981 年第 20 期。

80 在《楊浦區盧灣區上海縣武裝部同「四人幫」一伙推行「兩部合併」的鬥爭》

警備區與民兵指揮部的關係

從最初的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成立開始，南京軍區與上海警備區就始終不贊成不支持。據鍾定棟給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一封信中說：

對於這一新生事物，當時警備區的廖政國是不支持這支隊伍的。

在文攻武衛建立時，這支隊伍很需要部隊支持和幫助，市革會明確指出要警備區抓，但警備區態度曖昧，遲遲不抓。後來雖派了一些軍隊同志來，他們總是說：「我們是宣傳隊」，當當參謀，是來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因此，他們是不受市革會統一領導和安排的，說走就走，調動頻繁。不管工作怎樣緊張、重要，警備區一個命令，經常全部撤走回去學習一、二個星期，對工作影響很大。警備區有些同志對毛主席關於改造民兵這一指示，情緒很抵觸。⁸¹

警備區對參與文攻武衛的工作很冷淡，保持距離，顯示了他們對這個機構的不認同和不贊成。1967年9月，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籌備成立階段，市革會要求市區基層工廠的武裝部停止民兵工作，取消了657個工廠的武裝部，涉及822名專職武裝幹部。⁸² 這些基層的武裝幹部，雖然人事編制都在工廠，但業務

一文中說，1976年3月30日和31日，楊浦、盧灣兩個區的武裝部，在「四人幫」的高壓下，分別與所在區的民兵指揮部正式宣佈合併。合併後，武裝部的牌子被摘掉了房子被收掉了，支部被撤銷了，軍隊幹部的政治待遇被剝奪了」。但筆者2012年曾就此事問過施尚英，施尚英說，沒有此事，因為這兩個區的武裝部反對聲音太大，最終實際沒有被合併。

81 《鍾定棟、鄭惠儀送給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誣陷南京軍區、上海警備區的材料》，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年第18期。

82 《「四人幫」在上海經營「第二武裝」的始末》。

工作都是由警備區領導的，而且工資也是由警備區從國防經費開支支付。為了穩定這些原武裝幹部的思想，警備區為他們辦學習班；而且到1969年2月，在向現役軍人的區縣武裝幹部發放《毛主席語錄》、毛主席像章的同時，也仍然向他們發放，連沒有被三結合進基層廠革委會的原武裝幹部也照樣發放，但是不發放給文攻武衛指揮部的人。這實際是繼續承認原有的民兵體系，不承認市革會關於停止上海民兵活動的決定。這讓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的人很惱火。

警備區不止在幹部的安排上制約民兵指揮部，而且對民兵指揮部的存在始終不贊成。張春橋要求對郊區民兵體制在一個公社作試點，當時的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拖着不辦，沒有下文，王洪文對此很不滿。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組織人向警備區和南京軍區送大字報，其中由市、區兩級民兵指揮部寫的大字報，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關於民兵問題，指責上海警備區和南京軍區對民兵工作不支持。

而幾乎在給警備區送大字報的同時，上海市委還針對上海警備區，佈置市民兵指揮部進行了一次秘密備戰。那是在1974年3月，王秀珍秘密去北京——

王、張、姚接見我時，張春橋說：你們要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注意階級鬥爭動向，王少庸與許(指許世友)的關係很深，王會給許通情況的，你們要注意，不要被人家把你們抓起來，要加強保衛工作。姚文元說：你們要注意階級鬥爭動向，要加強要害部門的保衛，報社、電台、自來水、煤氣、機場、大飯店等，林彪、王維國搞政變時，就抓這些要害部門。(二月份，王洪文打電話給我，他說：要在批林批孔中，民兵要加強對批林批孔運動的保衛，要加強戰備等)⁸³

83 王秀珍 1978年4月3日，載於《「四人幫」在上海經營「第二武裝」的始末》。

王秀珍回上海後，向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傳達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這些話。3月20日左右，市民兵指揮部負責人周宏寶向市委電話報告說，警備區最近有許多輛摩托車在淮海路、常熟路一帶巡邏，是新動向，情況反常，從來沒有過。馬天水和王秀珍看到電話記錄後，將周宏寶和民兵指揮部的另一個負責人鍾定棟，叫去康辦學習室。王秀珍在詢問民兵指揮部值夜班情況後，要求：只是指揮部機關的工作人員值夜班不行，要有民兵值班，加強戰備。民兵指揮部的另一個負責人鍾定棟後來回憶，周宏寶回指揮部，即傳達了王秀珍的指示。

要指揮部搞一個加強對康平路、機場、電台等重要目標的保衛方案，範圍越小越好。當時，我也沒有告訴作戰組的同志。周要求選擇一些在九、十兩次路線鬥爭中有戰鬥力的單位。我是積極緊跟的，根據這些意圖親自做了方案，並佈置了長寧、楊浦、徐匯、靜安等區指揮部選擇了十多個單位，但他們並不知道我們的意圖。周宏寶和我還撇開了區，直接到了一些廠去檢查，搞得非常神秘，非常緊張，有的廠結果子彈都放在彈夾裏，區裏對此也很有意見。我們對(警備區)胡副司令、夏副主任根本不信任，他們是領導成員，但這個方案根本沒有送他們看，周就直接帶到了市委。王秀珍在這個方案上還做了批示：「擬同意，要抓緊落實」。⁸⁴

王秀珍所批的方案，就是《關於加強戰備的幾點意見》。在這個方案中，市民兵指揮部組織了上面所提及的四個區指揮部下的民兵團、港務局和上鋼三廠兩個民兵直屬師，共十多個單位1萬民兵的戰備隊伍，配備四管機槍10挺，重機槍79挺，步槍、衝鋒槍等6000餘枝。還組織由120個民兵、配備54輛摩托車的戰備機動小分隊，晝夜值班待命。為了「保護市委領導」，

84 鍾定棟 1976年12月10日，載於《「四人幫」在上海經營「第二武裝」的始末》。

市指揮部還趕緊將正在野營拉練的約200名民兵調回市區，同時又抽調楊浦區4805廠的一個連約200名民兵，組成兩支持槍荷彈的機動隊伍，分別駐扎在外灘市革會辦公大樓以及康平路辦公大院附近，每夜在周邊馬路上巡邏。⁸⁵ 這次戰備持續三個多月。王秀珍和鍾定棟後來都承認：「矛頭對準警備區和南京軍區」，「完全是提防警備區，把矛頭指向了解放軍。」⁸⁶

不過，警備區和南京軍區雖然對另立民兵指揮系統不贊成，但對於上海的民兵訓練還是指導與配合的。加上警備區具體負責民兵工作的是副政委李彬山，李彬山與上海市革會的關係一向比較密切，他與民兵指揮部的關係也就比較融洽，民兵指揮部與在指揮部工作的軍人們的關係也比較融洽。市民兵指揮部曾經組織過幾次大型的軍事實戰訓練或演習，都是和軍隊一起舉行的。這些軍事演習有：1974年的抗登陸演習，以蘇聯為假想敵。在南匯縣海岸，選擇了一處當年日本侵略者的登陸地點，以一個民兵營，一個警備區的連隊組織演習。1975年秋，以部隊為主，南京軍區出動了裝甲兵的輕型坦克和空軍的轟炸機，民兵出動了上海港務局的一個連；上面飛機扔炸彈，民兵在黃浦江上架橋，坦克過江，民兵高炮掩護。這樣的部隊與民兵合作的軍事演習，據說是1949年以來的第一次。當時還拍了紀錄片。王洪文1975年回上海時告訴說；毛主席看了上海這個軍隊和民兵聯合演習的紀錄片很高興。⁸⁷ 還有每年都組織的高炮實彈射擊，也都是在南京軍區的批准下進行的。有一年，上海所有的民兵高炮共一千多門，全部拉去訓練場地，經過打浦橋隧道時，道路全部封鎖。以至上海一些老百姓傳說要打仗了。

85 《上海文革史話》第 557 頁。

86 王秀珍 1978 年 4 月 3 日，鍾定棟 1976 年 12 月 10 日，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 年 12 月第 16 期。

87 這是王洪文告訴施尚英的。筆者是聽施尚英說的。

上海民兵的軍事訓練，所有武器彈藥，都是部隊提供下發的。每年訓練，都是由中央軍委總參，制定全國民兵訓練計劃，下達到各大軍區，再由各大軍區下達省軍區，上海是下達到警備區，由警備區佈置給民兵指揮部。這是軍隊最後的防線。上海民兵受到的最大制約，是武器的發放，始終掌握在軍隊手裏。

到1976年，上海市民兵指揮部共轄有9個師，602個團，1287個營，1.87萬個連，約300萬人。不僅有步兵，而且還有摩托、高炮、水上及防化、通訊、工程等專業兵種；擁有各種槍械20.6萬件，火炮1900餘門，火箭筒2600枚，各種車輛500百餘輛，以及耗資一百多萬元建造起來的「上海民兵101艦」。⁸⁸ 形成一支舉足輕重的地方武裝力量。

王洪文的「改造民兵」思想

文革前，當王洪文還是國棉十七廠的保衛科幹事時，就曾經是廠民兵連的連長。所以可以說，王洪文對文革前的民兵工作是非常熟悉的。縱觀王洪文的「改造民兵」思想，核心就是盡量減少軍隊對民兵的控制權，把民兵改造成工人的武裝隊伍，地方的武裝力量。1975年9月18日上海民兵工作座談會上，王洪文說：「現在軍委要把民兵置於武裝部管理之下，我是不同意的」，「誰要一個巴掌把民兵打下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後我還要把這個隊伍拉出來！」⁸⁹ 9月18日，王洪文在錦江小禮堂接見市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全體成員。王洪文在聽取匯報後說：

88 《上海文革史話》第 542 頁。

89 王洪文 1975 年 9 月 18 日在接見上海民兵指揮部成員時的講話。載於上海警備區民兵鬥爭史資料組編《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 年 12 月第 17 期。

有一點同志們要清楚，關於上海民兵是經過鬥爭的，今後還是有鬥爭的。我們要謙虛謹慎，不要翹尾巴，特別是以後是不是站得住，同志們要注意，你們做點思想準備人家一巴掌打過來，看我們是否站得住。這就要看我們是否能做好工作，要創造些好的經驗，從理論上、實踐上都能站得住腳，將來就駁不倒。⁹⁰

從一開始成立文攻武衛，王洪文就始終想在上海做出點成績，作為自己的特長和特色。更重要的是，軍隊和幹部階層對文革的抵制，讓他一直存在着危機感。所以他抓民兵，也是希望自己手裏有支能夠抗衡軍隊的武裝力量。他一再強調，上海民兵對外要反對侵略，對內要反復辟。他還說：要抓好民兵兩條路線鬥爭，還要對民兵進行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民兵要與修正主義對着幹。⁹¹這是王洪文的「實踐上能站得住腳」。

王洪文的「理論上站得住腳」，顯然來自馬列著作。1970年的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提倡讀馬列的書，其中有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以及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前本書中，馬克思將「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來代替」，總結為巴黎公社的重要經驗之一；後本書則專門論述革命不能只限於奪取政權，還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這兩本書，在蕭木等市委寫作組成員的輔導下，王洪文都認真讀過。王洪文去中央後，又要蕭木輔導，特地學習了列寧的《軍隊和革命》，⁹²這是篇專門論述軍隊與國家關係的文章。文中指出：「在各個地方以及一切國家裏，常備軍與其說是用來對付外部敵人，不如說是用來對付內部敵人的。常備軍到處都成了反動勢力的工具。」王洪

90 王洪文 1975 年 9 月 18 日在接見上海民兵指揮部成員時的講話。載於上海警備區民兵鬥爭史資料組編《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 年 12 月第 17 期。

91 王秀珍 1977 年 3 月 14 日交待，上轉引自《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 年 12 月第 17 期。

92 這是蕭木告訴筆者的。

文認真學習這些文章，顯然是希望在馬克思和列寧那裏，尋找他民兵思想的理論資源和政策依據。1975年10月13日，李彬山等傳達王洪文關於「二部合一」指示時，也強調，這是王洪文考慮的方向性問題，「帶有巴黎公社的意義」。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武裝，顯然是王洪文心底的情結。

王洪文對軍隊始終不放心。1975年9月18日，上海召開民兵工作座談會，會散後，王洪文問馬天水，倉庫裏還有多少武器沒有下發？馬天水回答後，王洪文又問，武器在哪個倉庫放着？馬天水說：在警備區倉庫，王洪文說，不要放在軍隊倉庫裏，放在軍隊倉庫裏不放心，要下發到民兵手裏，打起仗來民兵手裏有武器。他多次對上海市革會的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交代，要盡快武裝上海民兵，抓緊製造民兵武器，「自己武裝自己」。於是，上海方面自1974年以後，

在國家撥給的民兵武裝計劃經費外，又私自動用大量地方經費造槍、買槍。據統計，1974年擅自增加了718萬元；1975年又擅自增加了515萬元；今年(1976年—筆者注)他們更是變本加厲，竟高達2050萬元。……

他們私設生產武器的工廠和車間。1974年前，王洪文等就在一個工廠搞了一個專門車間，試驗生產半自動步槍。以後王洪文親自竄到這個工廠視察，指使馬天水等人決定正式投產，每年生產5000枝。1974年以來共生產了15000枝步槍。王洪文、馬天水還瞞着中央有關部門，又私自安排另一個廠每年生產全自動步槍一萬枝，1974年以來共私製了3萬枝。……

他們私購軍事生產超產的槍支。1974年底有5個工廠超產了步槍1462枝，槍彈392萬發。馬天水等人不向軍委有關部門報告，就從地方經費中拿出183萬元，私自買了下來。⁹³

93 《揭發「四人幫」為武裝叛亂大搞物資準備的反革命罪行》，上海市財政局黨委書記陳捷，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1年第21期。

這樣準備武器，顯然是為了打仗。王洪文學着毛澤東的話說：要準備上山打游擊。他也多次對市革會的馬天水、王秀珍等以及民兵指揮部負責人，談打巷戰的問題。四次人大期間，王洪文把馬天水和王秀珍、金祖敏等人專門叫去，特地要他們看一部關於打巷戰的美國電影。王洪文對馬天水他們說，給你們看看，今後上海如打仗，就這樣打，上海樓房多，在裏面都可以打。⁹⁴ 打巷戰，顯然不是對付外敵。

王洪文的擔憂，是文革派共同的擔憂。1976年4月的天安門廣場事件中，最高潮的那一天，張春橋始終在人民大會堂裏面往外看。事後張春橋對人說，當時他想：「假如軍隊把槍口都調過來那怎麼辦？」⁹⁵

王洪文曾有成立全國民兵指揮部的打算，並打算自己擔任總指揮。1973年8月下旬，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後，9月即對王秀珍說：「上海民兵這支隊伍是有戰鬥力的，我是信得過的，光有下面指揮部不行，上面有人抓才行。我要建立全國民兵總指揮部，我任總指揮。」1974年5月底，王洪文又打電話給馬天水說：「全國準備建立民兵總指揮部。如果這個組織正式成立，準備調周宏寶到全國民兵總指揮部工作，你們可做好思想準備。」⁹⁶ 但是此事後來再不見下文。這應該是軍隊反對和抵制的結果。

小結

民兵，是上海文革與外地文革的又一顯著差別。由於王洪文對上海民兵的掌控，這一差別顯得更為突出。

94 王秀珍 1977 年 3 月 14 日交待，上轉引自《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 年 12 月第 17 期。

95 徐景賢 1976.11.21 的《我補充揭發交待》，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 2006 年版。

96 《上海文革史話》第 564 頁。

文革高舉巴黎公社的大旗。巴黎公社是毛澤東的情結，他在文革中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經驗之一，就是砸碎國家機器包括常備軍，以工人武裝取代常備軍。1971年3月18日的兩報一刊社論《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紀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強調：「巴黎公社廢除了資產階級反動政府的軍隊和警察，用武裝的人民來代替它，把槍杆子掌握在工人階級的手裏。」王洪文要求民兵在理論和實踐上都「站得住腳」。他的理論就是來自馬克思、列寧對巴黎公社的論述。這是他在上海擴張工人武裝的依據。

但是王洪文顯然沒有很好地考慮過，巴黎公社工人自衛武裝與中國民兵傳統，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民兵在中國的文化和政治中，始終是軍隊的輔助和延伸，在政府的控制下，作為國家軍隊對外抵禦侵略、對內鎮壓動亂的補充和後備力量，是藏兵於民。離開了國家控制的民間武裝，是土匪、謀反和叛亂。文革中全國民兵擴張的大背景，是毛澤東提出的「要準備打仗」，也即準備可能與蘇聯的戰爭。這個協助國家正規軍的任務，是中國民兵的傳統。

而巴黎公社的工人武裝「國民自衛隊」，在理念上與中國民兵完全不同。它從西方市民自治的政治和文化傳統發展而來，本質上是與國家軍隊對立的。國民自衛隊不僅是巴黎公社的產物，更是西方市民自治的政治文化產物，是西方古代城邦和公社的公民兵精神和公民兵制度的再現。西方民兵作為公民防止國家濫用權力和捍衛自治共同體的武裝組織，本質上是與西方文化限制國家權力的理念相一致的。而在中國，國家從來是高於一切的。當別的領域和語境都是國家至上，民兵卻要制約國家擴張權力，顯得非常不協調，也根本不現實。加上中國民兵輔助國家的傳統，上海民兵自然會被看作有可能反叛國家的武裝力量。而從王洪文一系列講話來看，將民兵作為抵抗反文革勢力的地方武裝，應該是他內心的真正想法。事實上，文

革結束時，上海市委寫作組和總工會也確實曾經希望以民兵反抗中央政府。

即使王洪文大力發展上海民兵，他也無法對抗國家。所以他十分矛盾，既要利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政治資源，使這支武裝名正言順；但在實踐中，又還是只能將民兵建設成政府的輔佐力量。他給民兵找各種任務，甚至從公安那裏挖來一些日常工作。王洪文看到和平時期民兵組織的空洞化，這是由於民兵任務的空洞化造成。因為沒有戰爭，民兵最本質的軍事行動便沒有了用武之地。王洪文提倡民兵介入社會階級鬥爭，他要讓民兵有事可幹，凸現民兵存在的必要性，讓和平時期沒事可做的民兵有擴張和強化的合法依據。

但是，合併後的民兵指揮部歸誰領導始終是要害問題。全國各省市的民兵都歸軍隊管，落實到地方，就是軍隊的派出機構區縣武裝部管。唯獨上海，區縣武裝部管不了民兵；市一級又多出個市民兵指揮部，上海警備區對民兵的領導必須通過市民兵指揮部。雖然警備區也派軍人參加市、區兩級民兵指揮部，但那只是「參加」，而不是如文革前那樣的單獨指揮權。文革前的上海工廠民兵只是分散的存在，沒有縱橫向聯繫，聯繫各廠民兵的樞紐是武裝部。文革中市、區兩級民兵指揮部的建立，使得全市各工廠的民兵，有了獨立於軍隊之外的縱橫指揮網絡。雖然警備區平時都派人參與工作，而且民兵指揮部與參加工作的軍人關係也很融洽；但民兵指揮部一旦舉事，完全可以拋開軍隊的領導。這個隨時可以脫離軍隊的獨立指揮系統，是文革中的上海民兵不同於文革前民兵的最本質特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革中的上海民兵，被認為是一支「第二武裝」。這樣的軍隊無法完全掌控的地方武裝，有悖於中國民兵是軍隊輔助力量的一貫傳統，自然引起軍隊的警惕和反對。

民兵的社會治安功能，在文革中被特別強調，到達頂點，包括在天安門事件中的作用。這也是因為當時警察的不發達。

軍隊對外，警察對內。文革前社會群體性突發事件很少發生，所以那時中國的警察建制，始終只停留在維持交通秩序和一般社會治安的水平上。到文革時期，各種武鬥和騷亂多了，但可以動用軍隊處理對付。1972年8月，中央決定撤銷解放軍支左，軍隊逐步撤出地方，地方於是沒有了可以隨機調動的治安隊伍。由於沒有武裝警察，發生突發事件時，普通警察的人手和裝備遠遠不夠，所以客觀上也需要一支機動隊伍。民兵是較好的替代：人數眾多，一旦有情況可以及時拉出隊伍；業餘行動，所需經費由出人的工廠承擔。上海文革時期的治安，民兵起了很大作用。但是這樣的做法，增加了企業的負擔。而且，讓那些沒有經過嚴格訓練的普通工人，承擔常規的社會治安，必然會產生執法過度、暴力執法等現象。

第四十章

毛澤東逝世 最後的捍衛

周恩來逝世，鄧小平再次被打倒

1976年1月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1月15日，首都舉行周恩來追悼大會，王洪文主持，鄧小平致悼詞，毛澤東送了花圈，但未出席。

3月下旬，離中國傳統紀念逝者的清明節還有半個多月，北京民眾往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周恩來生前的務實，使他成為一種象徵，成為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偏激政策的旗幟。4月4日，清明節又逢星期天，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次超過二百萬。廣場上人山人海，激動的朗誦、慷慨的演說，鋒芒直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毛澤東命名的「四人幫」。這就是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4月7日，根據毛澤東建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兩個決議：一是由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以及國務院代總理，另一是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旋即以電台廣播向全國公佈，並宣佈鄧小平是「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總代表和黑後台」。

與北京燕地壯士對照，上海相對平靜多了。雖然民眾私下議論不少，但群體性的行動不多。馬天水兩次打電話詢問王洪文，說群眾要求設靈堂、送花圈、鳴汽笛。王洪文第一次說按治喪委員會規定辦，第二次回答說：你不要再問了，毛主席已經圈閱，一定要嚴格遵守。市委於是要求不要用黨委會或革委

會的名義送花圈和寫輓聯，而且不要把花圈送到市委機關。¹ 1月15日上午9點15分，黃浦江上一艘或幾艘船隻拉響了汽笛，接着上百艘船跟着拉響汽笛。整個外灘被汽笛聲籠罩，整整37分鐘，都是既無事先佈置也無串聯的同步行動。當天下午3時，周恩來追悼大會在北京舉行，上海黃浦江上再次響起汽笛聲。人群從外灘沿江各個大樓湧出，匯集成浩蕩的哀悼隊伍，十幾個人一列縱隊，抬着花圈和周恩來遺像，從海關大樓直排到南京東路，轉彎到江西中路，新的隊伍不斷加入，串流不息，直到深夜，但所有的隊伍都沉默而肅靜無聲。面對人山人海的悼念隊伍，市委允許將花圈送進外灘的市革會辦公大樓大廳。比起北京人的激烈，上海人表現的是沉默。

另一件引發效應的事件是個體行動，4月5日，北京市民在天安門廣場追悼周恩來的行為遭到鎮壓，大批人員被抓；4月7日，北京的天安門事件被中共中央宣佈為「反革命暴亂事件」。而就在第二天8日的清晨，上海市中心人民廣場的上空升起了一面白色的旗幟，上面寫着「沉痛悼念恩來總理」八個大字，還縫着周恩來遺像。升旗者是徐匯區服務公司建新機修廠工人黃水生，這是對當局鎮壓北京天安門廣場悼念行為的無聲抗議。黃水生知道自己會被抓，將旗子在廣場中心的一個旗杆升上去後，他就站在原地，等着人來抓他。聞訊趕去的民兵將他拷上手銬。以後他被投入監獄，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2月16日，方被釋放。

雖然，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等，都說自己愛戴周恩來，甚至說自己很想去北京向周恩來遺體告別，王秀珍還曾特地打電話向王洪文要求過。² 但上海市民借悼念周恩來，表達對

1 馬天水 1976年11月5日。又據葉昌明對筆者回憶，當時中央有明確電報，規定各地不設靈堂。但在上海，不設靈堂又違背民意，葉昌明認為：「這就把上海市委放在火上烤了。」儘管如此，市委和市總工會等還是設立了不對外的靈堂。

2 徐景賢 1976年11月21日《徐景賢的補充揭發交待》，上海市區、縣、局

文革的反感，他們也是心知肚明。3月5日，正是紀念毛澤東為學雷鋒題詞的日子，《文匯報》在發表新華總社電訊稿時，刪掉了周恩來為雷鋒同志的題詞，激起上海市民的質問。接着，3月25日，《文匯報》發表的一篇新聞報道《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鬥》，文章中有「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句，引起軒然大波，無數電話打進《文匯報》社，質問是否影射周恩來。這兩個事件都發生在周恩來剛逝世的敏感時期，報紙上的每一個細節都會引起猜測。文革後曾對這兩件事追查，沒有結果；《文匯報》的行為可能是無意的差錯，但當時被解讀為有意的影射。這反映了上海市民對以馬、徐、王為首的上海市委的憎惡。

天安門事件是以北京為中心的全國民眾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的公開表達，更是共產黨執政以來，第一次公開的大規模的民眾反政府運動，震撼了全國和全世界，令毛澤東和文革派擔憂。北京出動民兵鎮壓天安門事件剛結束，王洪文就打電話要求上海加強戰備，指示佈置公安和民兵，聯合制定「防止反革命暴亂實施方案」。王洪文對王秀珍說，上海民兵有戰鬥力，北京的民兵是豆腐，一點用也沒有，到了現場都拉不上去。王洪文總結說：北京的工廠大多數在郊區，許多工廠雖然有民兵，但車輛不夠，隊伍不能及時拉出來。王洪文因此要王秀珍與市民兵指揮部的人結合上海情況，總結當年砸聯司的經驗，要做到人、車、長矛配套，一有情況，隊伍要及時拉得出來。王秀珍在傳達時，強調要及時發現情況，將事態消滅在萌芽狀態，說北京就是事發的最初幾天沒下決心，搞得問題越來越大。

市民兵指揮部即與市公安局一起，制定了代號為「反擊」的三個預案。內容主要是：如果發生類似北京天安門事件，立即對上海的重要目標電台、電視台、電廠、自來水廠、機場、碼頭、火車站、政府機關大樓等施行保護；公安和民兵迅速集

黨員負責幹部會議秘書組 1976 年 11 月 25 日印發。

中人員撲滅事端。為此還準備公安和民兵聯合預演。但後來因為上海形勢穩定，所以預案沒有實施。³

毛澤東逝世引發上海對局勢的擔憂

天安門事件是一個十分沉重的警示，讓文革派深感孤立和危機。王秀珍不由得感嘆：文化革命搞到現在，怎麼還是這幾個人。

8月8日晚上8點左右，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一起去看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丁盛原來是廣州軍區司令員，1973年12月，毛澤東對八大軍區司令員實行對調，原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被調廣州軍區，原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被調南京軍區。丁盛這次是去視察舟山群島以及大、小洋山島的。大、小洋山島在長江口外，離上海不遠，島上的軍事由南京軍區所屬上海警備區管轄。視察後，丁盛一行從吳淞口登岸，下榻在軍隊所屬的延安飯店。馬天水等知道丁盛在上海，相約去看他。據王秀珍後來回憶：丁盛當時對他們說：

許世友在廣州說我在南京搞他，我和他前世無冤後世無仇，是他搞我。我到南京後，是他搞我的家屬、孩子，是江青保了我的家屬和孩子。他們在廣州拉一批人請客吃飯，我在南京很孤立。我從廣州來南京沒帶人來，我是襟懷坦白的，搞我是很容易的，我是不怕殺頭的。⁴

丁盛說，這次軍區開會，通知60軍，但軍長、政委都不來開會。60軍政委是許世友的前任秘書，軍長張明也是緊跟許司

3 鍾定棟 1977年11月16日。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年12月第18期。

4 王秀珍 1981年1月16日。

令的。他們聽許司令的，不聽我的。丁還解釋說，60軍駐防地就是從南京到蘇州。⁵ 丁盛這些話，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聽來，是對他們的提醒：離上海最近的駐軍聽許世友不聽他丁盛的。王秀珍後來回憶，她聽了這席話後的感覺，是心裏很緊張，汗毛凜凜：

我想一個南京軍區的司令員指揮不動一個軍，他很孤立，搞他是很容易的。我又聽了丁盛說他不怕殺頭，我想一個司令員都要殺頭，那我們也要殺頭了。所以聽了丁盛的話，我感到汗毛豎豎，心裏很緊張。以後，我將此事告訴了施尚英，要他心中有數。⁶

在王秀珍他們探望丁盛之前，6月28日，上海民兵指揮部上報市委《關於武器分發的請示報告》。這是一個例行報告。⁷ 但是，1976年上海民兵的武器發放，晚了許多時候。本來，在1976年一季度，總後勤部的預算總量武器已經陸續到警備區武器庫。市民兵指揮部負責人施尚英按常規向上海市委分管民兵工作的王秀珍請示，要求下發。但王秀珍說：現在主要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武器發放慢一慢。拖到六月下旬，施尚英又一次向王秀珍提出武器下發之事，王秀珍要求他們按慣常

5 在丁盛自己的回憶錄裏，說這些話是徐景賢文革結束後捏造的，自己根本沒有說過這些話，為此他文革後特地去找過徐景賢要求對質，但徐景賢家人說徐景賢不在，他認為徐景賢這事躲避他的對質。引自丁盛口述的《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

6 王秀珍1981年1月16日。

7 每年，解放軍總後勤部都會對全國民兵的武器裝備制定計劃，下發到各大軍區。對上海的民兵武器裝備計劃是發到南京軍區的，由南京軍區同時發給上海警備區和上海市民兵指揮部。這些計劃發放武器下發入庫後，由警備區管理，市民兵指揮部根據總後勤部制定的年總量，相應制定分發預算，細化到每個師。預算報告主報上海市委，抄送警備區，抄報南京軍區和總後勤部。市委批覆後方可下發武器。

手續，先向市委打個報告。6月28日，市民兵指揮部即向市委打了報告。7月3日，馬天水打電話問施尚英，為什麼報告上全自動武器不下發？施答這是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批的意見。事實上，這是市民兵指揮部的意見。因為全自動步槍發一次是一百發子彈，半自動是五十發子彈，市民兵指揮部討論時，覺得用全自動步槍訓練太浪費子彈，提出暫不下發。參加討論的李彬山同意。馬天水意見，全自動武器還是全部發下去。但是，一個月過去，發放武器的報告沒有批下來。8月10日，施尚英去康辦開會，詢問報告為何沒批？馬天水說：我早就批了，並將辦文的幹部找來。一問，才知道是因為對上海在蘇北的大豐農場是否也要發槍有異議，所以沒有將馬天水的批文轉民兵指揮部。馬天水大發雷霆，指示說大豐農場單獨處理。他隨即在原來批過的報告上，又寫上「立即發」，對施尚英說：你們明天就發。於是，市民兵指揮部於8月11日，開會佈置發武器，到8月底，七萬多件武器全部從倉庫領出，到9月10日，大部發到基層。⁸

馬天水為什麼那麼急地要發槍？文革後他自己在交代中說，是怕毛澤東逝世後打內戰：「為什麼這麼急，主要是今年以來特別是主席病重後，我們受四人幫的毒很深，我和徐景賢、王秀珍同志也曾議論過主席百年之後的形勢萬一發生內戰和鬧亂子，手裏有點力量。」⁹ 而丁盛後來在回憶錄裏說，文革

8 以上關於發槍的內容引自施尚英 1976 年 12 月 11 日，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 年 12 月第 19 期。

9 馬天水 1976 年 12 月 15 日，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 年 12 月第 19 期。而在中共中央 1977 年 9 月 23 日下發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團材料之三》中所引王秀珍 1976 年 12 月 6 日的交代中，說「在毛主席病重期間，馬天水告訴我，王洪文打電話給他，急催發槍。後來，市民兵指揮部寫了發槍的報告給市委，馬天水批的，我也同意的。」王秀珍這個交代將馬天水急着發槍的原因，說成是因為王洪文的電話。但是，筆者尚未看到馬天水本人的交代。按常理，如果有馬天水關於王洪文打電話催他發槍的交代這樣重要的直接證詞，專案組應該不會再轉變引用王秀珍的交代。

結束後，對他審查的辦案人員要他承認：因為他8月8日那天晚上，在延安飯店對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他們講了那番話，馬天水他們才去檢查槍發下去沒有，急着要發槍。¹⁰ 丁盛不承認自己曾經講過那番話。但不管發放武器是否與丁盛的話有無關係，對毛澤東病重病危的擔憂，尤其對毛澤東逝世後可能的形勢變化的擔憂，不能不說是馬天水急着發槍的原因之一。本來，上海的發槍是個每年例行的民兵行動，但因故拖延了，從年初拖到到8月才實施。這時毛澤東已經病危，又加上馬天水批示「立即發」。於是上海的發槍，與毛澤東逝世，在時間上幾乎重合。這不能不引起軍隊的警覺。

而在此之前的1976年3月8日，一顆巨大的隕星以每秒十幾公里的速度，帶着火球穿過地球的大氣層，飛至吉林地區上空爆炸，大量碎隕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區一帶，其中最大的三塊隕石，沿原來的飛行方向繼續向西偏南方向飛去，先後落在吉林市郊區的三個地方。民間傳說：這樣大的隕石跌落在中國，是預兆着中國最重要的三個人物的離世。當時，周恩來已經於二個月前的1月8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接着，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連北京都能感覺到嚴重震感。終於，彷彿是應驗着天人感應的隕石傳說，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

毛澤東逝世，市民兵指揮部繼續根據原來的工作預算，又下發了六萬餘發子彈和一萬五千萬發炮彈。到9月中旬，毛澤東逝世前便定下的武器發放，基本完成。

9月21日，在北京參加衛生部會議的徐景賢，去釣魚台張春橋住所看望張春橋。談話中，張春橋悲觀地表示自己「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早就準備殺頭了」。¹¹ 徐景賢後來回憶：

10 《丁盛回憶錄》。

11 《上海文革史話》第 936 頁。

那天，在談到上海的工作時，我說在主席逝世以後，聽說市委機關裏對誰誰今後可能擔任什麼職務有些議論，王秀珍已要機關黨委轉告各方面不要議論了。這時，張春橋說：「要謹慎小心，特別是你們幾個人講話要注意」。他特別關照說：「你回去再跟老馬說一說，南京路上出現過的大字報(指要張當總理的大字報)再也不能貼了，這是毛主席單獨向我作過指示的。今年年初我已經給老馬打過電話了，你再說一下」。

張春橋說到謹慎小心以後，把話題一轉，他說：「人家已經講我們是『上海幫』了」！他很惱火地緊接着說：「有一次北京的什麼外事招待會，偏偏把我們幾個(指『四人幫』)排在一起，那個時候我就給總理提了意見」。

張春橋還當我的面對上海工作發指示，說什麼要引導群眾，要有信心，要振奮精神，團結的面要廣一些，等等。

張春橋當時還對我說：「要經常分析階級鬥爭的形勢」。¹²

我向他當面匯報了我所知道的軍隊的一些重要情況，我們「有所準備」，「馬老和我們已經給民兵增發了原定入庫的槍支」。張春橋很注意地聽，完全是默許和支持的。¹³

上海還沒有經歷過如林彪上台那樣的考驗，如果我有什麼事情總是要連累你們的。¹⁴

對毛澤東逝世，張春橋心中是哀痛的，這種哀痛，是對

12 徐景賢 1976 年 11 月 5 日《徐景賢的初步揭發交代》，上海市區、縣、局黨員負責幹部會議秘書組 1976 年 11 月 18 日印發。

13 徐景賢 1976 年 12 月 12 日，轉引自《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 年 12 月第 19 期。

14 中共中央 1977 年 9 月 23 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團材料之三》，張春橋這句話是朱永嘉交代中轉述徐景賢的回憶。不過朱永嘉的這個交代沒有被標明日期。

毛澤東的感情，也是對自己命運的預感。這種心情和預感，張春橋曾經對蕭木也有所表露。在徐景賢去看張春橋前幾天的9月18日，毛澤東逝世追悼大會那天，蕭木也參加了大會。他從釣魚台步行去追悼大會現場的天安門廣場，足足走了三、四個小時。蕭木步行，是為了收集民眾對毛澤東逝世的反應，為自己寫小說積累資料。追悼大會結束後，回到住處，蕭木便接到張春橋的電話，要蕭木去他的住處。張春橋平時與別人很少私人交往，能說話的人不多。他將蕭木叫去，看來有很多話想找人聊聊。蕭木講起自己步行一路的見聞，說毛主席逝世，大家都很哀痛並擔憂中國的未來。蕭木講述時，張春橋不時地插些話。張春橋並沒有要求蕭木向上海傳達他的這些談話，但事後，蕭木將這次談話回憶整理，寄給了朱永嘉：

朱、王、王、陳、顧、章：

九月十八日晚，春橋同志找我談了一次話，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我對春橋同志說：毛主席逝世後，處處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種失落感。春橋同志說：毛主席處處不在又處處在。毛主席雖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線、制度、政策都留下來了。春橋同志又說。毛主席的身體是被鄧小平搞垮的。鄧小平欺騙主席，大搞翻案，被毛主席察覺，只好帶病領導和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硬是把身體累垮了。光憑這一點，鄧小平的罪也就夠重的了。

二、我勸春橋同志要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體。春橋同志說：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難受得受不了，胸中時常感到氣悶，守靈時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誰知被電視台的記者拍攝進鏡頭裏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見春橋同志在院子裏散步了。

三、我對春橋同志表示擔心目前的形勢，特別是軍

隊不在我們這邊。春橋同志說：現在的形勢不能同馬克思逝世時比，也比列寧逝世時的形勢好得多，當年托洛茨基是紅軍總司令，威信比斯大林要高得多。鄧小平雖被打倒了，但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在於誰掛帥，目前資產階級的力量還沒有集結起來，缺少掛帥的人物。

四、我問春橋同志中央今後會出現怎樣的局面？春橋同志說：主席不在了，看來今後中央只可能是靠集體領導了。如果今後要出修正主義，還是在上層，在中央，在黨內的資產階級，要吸取蘇聯的教訓，警惕修正主義上台。蘇聯現在變修了，將來還是會出列寧的。中國即便修正主義上台，將來也還會出列寧。

五、我講到主席逝世後，外地有些壞人關門飲酒，引起群眾氣憤、上門懲罰。春橋同志說：我倒擔心這方面搞得太過分了，當然群眾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這樣好的八億人民，一定會湧現他自己的領袖。目前最困難的就是現在這一段時期，只要把這一段時期渡過去就好了。現在要出鄧小平這樣一個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會起來反對的。

六、我對春橋同志說：廣大群眾普遍希望能盡快出版《毛澤東選集》五、六卷。春橋同志說：毛選五卷的書稿已被胡喬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難。還是考慮出單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國慶前爭取選出毛主席論接班人五條標準的。

七、春橋同志對我說：主席逝世時，蘇修也發來唁電。這樣大的事外交部也不請示報告，竟然收下了，最後是我從外電消息中發現了這一情況，才讓他們把蘇修的唁電退了回去。

八、我談到現在人們普遍對形勢感到擔心。春橋同志說：要樹立信心，今後還是要強調批鄧，要講團結，這是

大方向。你轉告上海的同志們，要振奮精神，努力工作，準備鬥爭。

此信閱後即毀，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蕭木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夜¹⁵

蕭木後來解釋他最後的那兩句話「小人苦哉」，是因為張春橋並沒有讓他轉達這些話，他怕張春橋知道後責怪，所以他要求朱永嘉看後即銷毀；「大人苦哉」，是擔心如果自己對張春橋的這些話回憶或理解有誤，會給張春橋帶來不必要的麻煩。¹⁶

9月27日，蕭木準備回上海探望病重的妻子，臨行前向張春橋告別。張春橋和他談了三個小時。這三個小時的談話內容很零散，許多是關於寫作方面的。因為蕭木回上海的另一個目的，或者說真正的目的，是想完成自己正在寫的小說。張春橋自己過去也曾寫過文藝作品，兩人在這方面很有共同語言，聊了很長時間。當然，也議論局勢。¹⁷張春橋說：

以前看文件，主席在，就看一遍，比較馬虎。現在主席不在，不得不多看幾遍。

我講到生產問題時，張說：1967年工廠停產，經濟是個問題，明年春天要有反映，上海工作要做得好一點。上海還沒有經過大的考驗，林彪要搞上海沒有搞成，鄧小平也沒有搞成。上海要經得起考驗，要多做工作，不要出頭。¹⁸

張春橋與蕭木的兩次談話，全是兩個人之間的非正式談話，張春橋都沒有要求蕭木向徐景賢等人傳達。但是前一個談

15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2006版。

16 這是蕭木對筆者解釋的。

17 這是蕭木告訴筆者的。

18 蕭木1980年7月8日《談話記錄》。

話，蕭木整理後寄給了朱永嘉；這個談話，蕭木回上海後，應徐景賢要求「吹吹中央小道消息」，也向徐景賢轉述了。文革結束後，尤其是「上海沒有接受大的考驗」，被解讀為張春橋佈置上海準備對抗。¹⁹不過，張春橋的這個預感確實是先驗的。這個預感，將在不幾天後被印證。

馬天水被叫去北京

毛澤東的逝世為中國提供了轉軌的契機。在憂慮和期待背後，一場決定中國命運的行動正在緊張秘密地進行。終於，被毛澤東欽定為接班人的華國鋒，與黨內元老葉劍英等共同聯手政變，10月6日，抓捕了被毛澤東稱為「四人幫」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

毛澤東逝世的日子，正是上海民兵下發武器的最後幾天。文革勢力最強大的上海，在這個敏感時期發放武器，消息傳到北京，立即引起警覺。上海成為必須首先應對的城市。

四人幫被抓後的第二天，10月7日至10月14日，華國鋒、葉劍英等便以中央政治局名義，分期分批召開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市自治區，以及各大軍區負責人的打招呼會議，通報對四人幫的隔離審查。上海、江蘇、山東、湖北四個省市，以及南京、武漢、濟南三個軍區的負責人，第一批被通知去北京，參加10月7日的打招呼會議。10月7日凌晨3點，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馬天水去北京開會，馬天水感到突然，問開什麼會，對方回答說你來了就知道了。中央辦公廳還直接通知了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這是以往從未有過的，過去中央開會，張春橋

19 徐景賢的交代中說是張春橋讓蕭木帶話，但蕭木對筆者說，張春橋當時只是和他信口聊天，也沒有託他傳話。這些話，是他回上海時，經過康平路會議室，正在學習的徐景賢等市委幹部看到他，讓他談談中央情況。他於是向他們回憶了張春橋的這段話。徐景賢馬上就記錄下來。

或王洪文或姚文元都會事先打個招呼，這次卻沒有任何電話打來。而且9月21日，徐景賢在北京見到張春橋和王洪文兩人時，都說近期中央沒有什麼會議安排；9月28日蕭木回上海時，也說沒有會議安排。馬天水當即打電話去北京，想找張春橋、王洪文或姚文元問詢，但電話始終打不通。王秀珍又打電話找王洪文在北京的秘書，也打不通。徐景賢、王秀珍等心生疑竇。馬天水上飛機前，他們要隨行的馬天水秘書房佐庭，到了北京「向三位首長問好」，並按慣例打個報平安的電話回來。

但是，馬天水走後就沒了音信，一直到晚上9點，房佐庭的報平安電話始終沒來。不祥的陰雲越來越濃厚。王秀珍打電話去公安部祝家耀處。祝家耀是上海的工人造反派，1973年成為公安部領導核心小組成員。王秀珍問他是否看到張、王、姚，祝答說前幾天還看到，可能因地震搬家了。王秀珍又將金祖敏在上海的秘書繆文金找來，讓他打電話找馬天水。繆通過北京熟人，在京西賓館找到房佐庭。房說，馬老正感冒，在洗澡。王秀珍又去張春橋妻子文靜家。文靜告訴她說：張春橋的兒子原定今天去北京，但給張春橋的秘書打電話，從7日晚上到8日上午，始終打不通。王秀珍告訴她，他們向北京打電話也不通。²⁰ 與此同時，徐景賢也在到處打電話，晚上11點，終於找到文化部負責人于會詠。于文革前是上海音樂學院的教師，也是上海出去的。于會詠告訴徐景賢，他忽然接到通知，原定10月8日由他帶隊出國的中國文化代表團暫不出國了。徐景賢心中更緊張了，覺得一定出了大事，因為毛澤東逝世時，有些代表團還是按原計劃出國的。半夜以後，徐景賢找到了衛生部部長劉湘屏，劉回答說好像沒有什麼事情；不過她又說，《人民日報》社的魯瑛昨晚也打電話問她發生了什麼事情。²¹

20 王秀珍 1976 年 11 月 6 日《我的揭發交代》，上海市區、縣。局黨員負責幹部會議秘書組 1976 年 11 月 25 日印發》。

21 徐景賢 1976 年 11 月 5 日《徐景賢的初步揭發交代》。

找不到張、王、姚，又聽文靜也說找不到張春橋，王秀珍和徐景賢心裏更着急。於是將市委常委、市革會副主任王少庸和馮國柱，市委常委張敬標，找到康平路小禮堂商量，還將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修文、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以及蕭木也都叫來，廖祖康是回上海結婚的，剛舉行婚禮，還在蜜月中。王秀珍和徐景賢讓他們分頭通過各種渠道，用各種號碼向北京打電話：8341部隊值班室、姚文元的妻子、秘書，甚至王洪文的警衛員、司機、服務員，等等。但是都打不通。廖祖康當即判斷：「情況反常」。徐景賢給在北京的《人民日報》負責人魯瑛打電話，總算打通。但魯瑛沒講二、三句話就急忙掛斷電話。最後，還是張敬標通過上海警備區的軍用電話與房佐庭通上了話。房佐庭說會議不准往外打電話。廖祖康搶過電話問是誰去接他們的飛機？房答穿軍裝的人接的，電話掛斷。徐景賢再打電話過去，說有重要事情匯報，一定要馬老親自接電話，但馬天水還是不接。馬天水此時參加政治局召開的第一次會議剛回來，情緒十分低落，不願接電話。十年文革陰霾終於驅散，所有到會者都非常興奮，表態擁護對四人幫的拘留。只有馬天水「思想不通」，「像被打了一悶棍」。回到住處一夜沒睡，第二天上書中央說「感到材料不足，為什麼這樣突然襲擊？也懷疑過是不是宮廷政變」。²²

徐景賢問馬天水究竟在不在，房佐庭說馬老身體不好，在洗澡，又說了句「我的老胃病犯了」。放下電話，徐景賢趕緊向旁邊人核實，都說房沒有胃病史。²³正在此時，上海市委又收到中央軍委給上海警備區作戰處的電話記錄的抄報：

軍委首長指示，部隊戰備工作轉入正常後，發現有的單位

22 馬天水 1976年11月21日《我的補充揭發交代》，上海市區、縣。局黨員負責幹部會議秘書組 1976年11月25日印發。

23 同上。

有點鬆懈，請檢查一下。戰備工作不能放鬆，仍應提高警惕，注意敵情，邊防(沿海)防止內遣外逃。

大家讀了軍委的電話記錄後議論紛紛。毛主席逝世時中央軍委曾經佈置進入一級戰備。這個一級戰備前幾天剛取消，怎麼又要加強戰備了，而且還特別提出要防止「內遣外逃」，看來有什麼人出了事情。而且警備區又來通知，說總政原定在上海召開的全軍圖書閱讀現場會議不開了。大家猜測說，「老胃病復發」，是不是指老帥或某些軍區的負責人動手了。肯定出事了。已經是10月8日，與北京的聯繫渠道全部切斷，沒有任何消息，上海市委這邊一片焦急。王秀珍將金祖敏秘書繆文金叫來，要他馬上隨下午宋慶齡副委員長的專機到北京去摸清情況，約定最嚴重情況的暗號為「心肌梗死」。

10月8日整整一天，康平路大院氣氛緊張。下午2時，警備區的李彬山和張宜愛被叫到康平路開緊急會議。徐景賢、王秀珍向他們打聽和馬天水一起去北京開會的周純麟是否有消息來，他們表示不知道。對軍委的備戰通知，他們也沒有說出什麼看法。王少庸問警備區能調動多少人，張宜愛答，警備區只有調動一個連的權限，一個營以上都要經過上級批准。²⁴

8日下午3時，徐景賢、王少庸、王秀珍、馮國柱，召集市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和鍾定棟，以及公安局的薛干青和徐成虎，在市委小禮堂開會。徐景賢告訴大家：情況很不正常，看來出事了，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右派政變了。馬天水去北京後也被軟禁了。施尚英匯報了自9月23日以來備戰的民兵數字：第一批2500人和100輛摩托車，第二批約一萬餘人。王少庸詳細詢問了民兵是否按120人一個連建制編，武器彈藥下發和倉庫在哪裏，是否能領取出來，施尚英一一作了匯報。王秀珍要公安和民兵抓緊落實戰備，施尚英問以什麼理由向下佈置戰備。王秀

24 王秀珍 1976年11月6日《我的揭發交代》。

珍便將軍委的戰備通知覆述了一遍。施尚英又問此次戰備由誰負責，王少庸說，馬老不在，就由徐景賢負責，還有王秀珍。臨走，王秀珍要施尚英和鍾定棟立即找警備區的李彬山商量研究。²⁵ 兩人即按王秀珍要求，去警備區的浦東大樓找李彬山商量。李彬山正忙着，讓他們晚上9點後去。施尚英和鍾定棟回到市民兵指揮部，通知指揮部的作戰組長章金根、後勤組長張福男馬上下基層檢查戰備值班以及槍彈是否落實。²⁶ 事實上，市民兵指揮部的人，此時根本不知中央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部署戰備，還以為就是執行軍委給上海警備區作戰處的那個戰備電話通知。

8日下午4時，徐景賢召開新聞媒體的報社、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單位的負責人會議。徐景賢向大家通報了他們所感覺到的反常現象，說中央可能發生了軍事政變。他又特地講述了1968年蘇聯佔領捷克時，捷克的一個電台台長拒絕廣播蘇聯的文稿，堅持廣播了一天的抗議書。徐景賢要求，媒體發表東西，都要告訴市委。8日下午5點，市委在康平路小禮堂，召開市革會常委包括列席常委在內的常委擴大會議，進一步打招呼。會議沒有通知同是市委常委的楊富珍，她不在上海；沒有通知的還有空四軍政委武佔魁和東海艦隊副政委康莊。

8日晚上7時半左右，徐景賢在劇場接到文化部負責人劉慶棠來電，說他們給釣魚台江青那個樓打通了電話，是一個服務員接的，「說首長身體好，現在不在家」。徐景賢馬上趕回康平路學習室，告訴大家。但廖祖康不相信，並馬上打電話到釣魚台核實，接電話的說那個服務員今天根本沒有來過。廖祖康判斷，剛才文化部打通的電話是假的。他將張春橋、王洪文、

25 施尚英 1978 年 12 月 12 日交待，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組 1980 年 12 月編《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第 19 期。

26 鍾定棟 1978 年 8 月 30 日交待，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組 1980 年 12 月編《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第 19 期。

姚文元的電話號碼告訴劉慶棠，讓他再打。果然不久劉慶棠回電話全都打不通。²⁷

差不多同一時間，已經到達北京的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打來電話給上海市委警衛處的康寧一，說「我娘心肌梗死」，說完就掛斷電話。「我娘心肌梗死」是繆文金臨走時，王秀珍和他定的最嚴重情況的暗號。眾人都驚呆了。再繼續向北京各方打電話，終於康寧一在晚上9點左右，接通公安部的祝家耀。祝說繆文金7點鐘的那個電話，就是在他那裏打的，繆文金到京西賓館去過，看樣子是「人員集中了，門上加鎖了，不好動了」。康寧一又打電話，總算找到繆文金，繆說「現在情況不明，還在診斷中，待診斷明確之後再告訴你們」。²⁸終於，到晚上10點，文化部劉慶棠又來電話：「馬老不接電話，我們都病了，有病情」。

整整兩天的忐忑恐慌、猜測打探，現在都證實了。這時，在場有徐景賢、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朱永嘉、蕭木、廖祖康等人，眾人不得不接受這個嚴峻的事實：他們過去經常議論的情況終於發生。徐景賢後來說自己當時馬上想起幾天前，蕭木說的張春橋的那段話「上海要有大考驗，要打仗」。²⁹「我還想起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過去說過的關於軍隊的一些話：張春橋說軍隊靠不住，姚文元說軍隊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說軍隊裏沒有我們的人……我想現在軍隊也許已經把槍口對準了張春橋他們了。」³⁰

「中央出了修正主義」

平時話不多的朱永嘉，這時直截了當地說：「我看這次

27 徐景賢 1976年11月5日《徐景賢的初步揭發交代》。

28 《上海文革史話》第948頁。

29 徐景賢 1976年11月5日《徐景賢的初步揭發交代》。

30 同上。

是華國鋒和汪東興兩個結合，其他人是搞不起來的。」「他們先抓人，然後宣佈一個決定，說這幾個人反黨。我們要幹，要拉出民兵來，打一個禮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讓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那樣。」³¹ 朱永嘉出語驚人，沒人敢回應，一片沉默。之前徐景賢、王秀珍檢查民兵的戰備部署，還是以落實中央軍委的電話戰備通知為理由；而朱永嘉的這個建議，則是直截了當明確提出：拉出民兵，舉行起義，對抗中央發生的政變。朱永嘉過去除了組織寫作組，為市民兵指揮部寫過那篇《上海城市民兵的情況調查》，與民兵並無往來，此時卻是他第一個想到民兵的作用。

幾個市委書記紛紛準備行動：王秀珍提出她要 and 市民兵指揮部打招呼，民兵工作是她分管的。王少庸提出要和公安局打招呼，政法系統是他分管的。分管宣傳系統的徐景賢，提出去和廣播電台及報社負責新聞的人打招呼。大家又議論說應該撤出康平路大院，將人員分散在兩個地方，以免被一網打盡。廖祖康則建議，將上海警備區的張宜愛、李彬山和警備師師長李仁齋等，也叫來一起準備，緊急時他們可以調動隊伍。馮國柱建議再加一個警備區副司令員楊新亞，因為楊熟悉作戰。廖祖康又建議將總工會的老造反也叫來。朱永嘉贊成：「這樣好，可以發動工人，到時候組織群眾上街遊行」。³² 於是，決定將人員分作兩處，由徐景賢開列名單：

由我執筆開了兩個名單，分兩個點：

一號點，設在一個招待所，有徐景賢、王少庸、張敬標、朱永嘉、部隊的兩個領導以及我的秘書等人。這是文的一路。二號點去民兵指揮部，有王秀珍、馮國柱、廖祖康以及部隊的兩個領導等。這是武的一路。在徵求意見

31 徐景賢 1976 年 11 月 5 日《徐景賢的初步揭發交代》。

32 同上。

時，張敬標提出他留守康平路機關，朱永嘉也提出他去陝西北路寫作組經濟組找幾個人，準備輿論，我同意了。這時廖祖康又提出要把工總司的老造反頭頭集中起來，朱永嘉表示支持，說這樣可以發動工人，我也同意了。廖祖康提出黃金海、葉昌明、陳阿大、馬振龍、王明龍等人的名單(後來他們又加了汪湘君)，我一一記下交給了王秀珍。³³

王秀珍補充說：民兵先動員2500人巡邏，31000人待命，槍支彈藥發下去，輿論工作朱永嘉去準備。張敬標在康平路市委機關留守。³⁴於是，徐景賢寫了一張紙條交王秀珍：

請民兵加強戰備，二千五百人集中，三萬一千人待命，加強值班，請民兵指揮部立即派人加強對電台、報社的保衛。³⁵

這張紙條，後來被認為是徐景賢組織「武裝叛亂」的第一個手令。

眾人分頭行動。一路由徐景賢帶領，與王少庸、朱永嘉、張宜愛等去丁香花園，作為一號點；另一路由王秀珍帶領，與馮國柱、李彬山、楊新亞、廖祖康等一起去市民兵指揮部，與指揮部負責人以及總工會的工人造反派會面。留下張敬標留守康平路機關，負責兩個點的聯絡。臨分手時說定，大家作好準備，最後聽徐景賢和王秀珍指揮。馬天水不在，他們兩人就是上海市委的主要負責人了。

33 同上。黃金海等在看了筆者的書稿後，提出他們不認為會在這個名單上。

34 《上海文革史話》第950頁。

35 徐景賢1976年10月8日，原件的影印件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年第19期。

民兵指揮部、總工會和寫作組分頭行動

8日晚上10點，李彬山才忙完正在召開的警備區黨委擴大會議的簡報審稿，回宿舍，施尚英和鍾定棟已經等候多時。於是商量如何貫徹中央軍委那個電話記錄所要求的加強戰備佈置。經研究，

動用兵力按9月23日市委批准同意(按防震和9.9備戰期間減少三分之二)的方案，第一批25000人，每區動用10輛摩托車；第二批11000人左右。指揮點準備放到基層單位去，準備搞兩個指揮點，江南造船廠作為一個點，已經確定下來了；東面準備搞個點，是否放到國棉十七廠，還要研究一下。點上設電台。³⁶

兩個點，一個定在江南造船廠。另一個是選擇上棉十七廠還是選擇上棉三十一廠未定。這兩個廠，前者是王洪文工作過的工廠，後者是黃金海工作過的工廠。施尚英以後回憶，毛澤東逝世時，軍委佈置一級戰備；9月18日毛澤東追悼大會後，一級戰備撤銷，改為「加強戰備」，一直沒有接到撤銷的指示。現在市委又佈置備戰，就將4月實行的那個方案稍作修改，實際就是4月天安門事件時上海的備戰方案的延伸和補充，是準備應對上海也可能發生類似的天安門事件。³⁷

施尚英打電話向王秀珍匯報，王秀珍要他們馬上回指揮部。於是，施尚英、鍾定棟、李彬山等都去了市民兵指揮部。不一會，王秀珍、馮國柱、廖祖康、汪湘君等都來了。王秀珍告訴大家，看來中央可能發生了右派政變，可能馬天水以及上

36 李彬山 1977 年 1 月 14 日交待，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組 1980 年 12 月編《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第 19 期。

37 筆者、金光耀、金大陸 2011 年 1 月 16 日對施尚英的訪談。

海去中央工作的幾個領導同志都被抓起來了。我們要同他們幹。這幾天康平路不能待了，否則一網打盡。³⁸ 王秀珍又說：「上海是一月革命的發源地，我們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血肉相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我們要對着幹，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後代，讓全國知道」。³⁹

民兵指揮部的人本來根本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聽王秀珍這一番話，才知道中央發生了大事。王秀珍又按照上海警備區抄報上海市委的那個電話記錄的口徑佈署了戰備。直到此時，這個戰備部署才真正具有了反抗的意義。王秀珍口述，薛干青記錄：

8號

市委檢查了發現有的單位戰備有些鬆，戰備工作不能放鬆，應提高警惕，注意敵情，注意空投、空飄、海漂，防止國內外階級敵人突然襲擊，檢查我們戰備工作有無鬆。⁴⁰

施尚英向王秀珍和馮國柱匯報剛才和李彬山討論的方案。王秀珍聽後基本同意。只是對選擇上棉十七廠、上棉三十一廠作指揮點，她認為這兩個廠太遠，而且目標太大，要施尚英等從楊浦區另找一個工廠。⁴¹ 王秀珍將徐景賢寫的那張紙條，交施尚英和鍾定棟等人看，要求民兵指揮部夜裏集中值班，加強對報社、電台的保衛。廖祖康特地提到福州路和汾陽路兩處的電話分局起着樞紐作用，特別重要。馮國柱隨即問在一旁的警備區副司令員楊新亞，市內電話局有沒有警衛部隊，楊答沒

38 李彬山 1977 年 1 月 14 日交待，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組 1980 年 12 月編《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第 19 期。

39 王秀珍 1976 年 11 月 6 日《我的揭發交代》。

40 王秀珍口述，薛干青記錄的影印件，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話》1980 年 12 月第 19 期。

41 施尚英 1978 年 12 月 12 日交待，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組 1980 年 12 月編《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第 19 期。

有。王秀珍即要求派民兵去警衛。李彬山提出要加強對電台的保衛，「防止有人到電台亂說一通」。於是決定由劉象賢負責指揮警衛電台的部隊。劉是上海警備區的警備師政治部副主任，又是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的負責人。馮國柱問外區部隊到上海需要什麼手續，楊新亞答，外區部隊要越過防區，不經軍委批准不行。⁴²馮國柱又問警備區有沒有機動分隊？楊新亞回答說市區只有一個連和摩托營。王秀珍要求盡快作準備。馮國柱和王秀珍問江蘇和浙江的部隊有什麼消息？楊新亞答說沒什麼消息：這次在杭州開會時，聽說駐杭州的部隊要到乍浦地區野營，駐蘇州的部隊要到昆山、太倉地區野營。⁴³中央是否會派軍隊來上海，始終是上海擔心的。廖祖康要施尚英拿出上海地圖，他邊看邊數落：「上次就告訴你們了，一張像樣的地圖也沒有，這種地圖怎麼好打仗？」並要施尚英他們馬上研究，提出具體作戰方案。施尚英答說這是按國慶保衛工作具體方案準備的。

王秀珍讓廖祖康打電話通知陳阿大、葉昌明、馬振龍、沈涵去民兵指揮部。這些人都是市總工會常委，除了文革前任市總工會副主任的沈涵是老幹部，都是工人造反派的骨幹。⁴⁴王秀珍告訴他們：中央出現右派宮廷政變，修正主義上台了，毛主席身邊的幾個領導統統被抓起來了。現在已經對文化部開刀，接下來就肯定對上海下手抓人了。⁴⁵馬振龍後來回憶說：「王秀珍介紹情況時，大家都嚇呆了，話都講不出來。」黃金海和葉昌明說：真沒想到，主席逝世才二十多天，他們就這樣幹起來了，真是比赫魯曉夫還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反斯大林也沒有這麼快。黃金海說：很清楚，這是對着文革來的。主

42 李彬山 1977 年 1 月 14 日交待，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組 1980 年 12 月編《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第 19 期。

43 《上海文革史話》第 959 頁。

44 黃金海 1977 年 7 月 9 日。

45 《上海文革史話》第 959 頁。

席在，他們不敢反文革，主席一死，機會到了，他們就迫不及待。我們要對着幹，喚起工農千百萬！黃金海對市民兵指揮部的人要求：「發槍吧，我們和你們一起幹！」⁴⁶ 王秀珍要求：「給總工會的頭頭打個招呼，要總工會貼大標語，組織工人罷工，發動群眾！」葉昌明說：「當然可以，憲法上有明文規定的嘛，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就可以造反、罷工、組織工人上街遊行」。⁴⁷ 王秀珍擔心上班時間快到，市民兵指揮部目標太大。廖祖康建議去淮海路東湖路上的東湖招待所，那裏離康平路和丁香花園也近。於是總工會一幹人都去了那裏。這時，已經是9日凌晨。

市民兵指揮部的人沒有去東湖，10月9日凌晨2點，他們召集指揮部的作戰組、特兵組、後勤組的負責人會議。決定十個區和兩個指揮點開設電台，另外再設一個電台在上海第三鋼鐵廠；並要求到下午6點鐘之前溝通電台的聯繫。還根據王秀珍等的要求，定下了兩個指揮點的所在工廠：一個是江南造船廠，為第一指揮點，稱「基指」，由施尚英和鍾定棟負責；另一個是中國紡織機械廠，為預備指揮點，稱「預指」，由吳立義和印玉泉負責。⁴⁸ 9日早上9點左右，市民兵指揮部又先後召開十個區民兵指揮部和五個直屬師負責人會議。以王秀珍傳達的軍委緊急備戰要求為口徑作佈置，下達了與李彬山討論的方案以及聯絡暗語，分配了各區、師兵力數字，要交運局組織一百輛汽車值班待命，還要求區和師負責人全部晝夜值班在位。之後，施尚英和鍾定棟便去江南造船廠和中國紡織機械廠兩個指揮點現場佈置指揮。⁴⁹

46 黃金海 1977 年 7 月 9 日。

47 黃金海 1977 年 3 月 5 日。

48 《「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記事》，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1 年 1 月第 22 期，上海警備區民兵鬥爭史資料組編。

49 施尚英 1978 年 12 月 12 日交待，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組 1980 年 12 月編《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第 19 期。

在市總工會和市民兵指揮部行動的同時，市委寫作組也在行動。朱永嘉在參加10月8日下午的市委常委會後，又去《文匯報》社彎了一下，告訴說中央可能出事了，可以在個別骨幹中打個招呼。然後回寫作組。朱永嘉還馬上召集王知常等核心人物，告訴他們中央那幾位看樣出事了，說：「民兵已作了佈置，工字頭已進行動員」，「張、姚培養了我們十年，總得報答他們。我是準備殺頭坐牢也要下決心幹」。「他們倒了，我們也完了」。朱永嘉說，要立即行動，發表宣言，「明天就在報紙上拉橫幅標語，『堅決捍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王知常立即表態：「市委決定幹，我立即起草」。他馬上擬出四個口號：「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還我江青！」朱永嘉又佈置：找出一批毛主席語錄，要有針對性；搞一個赫魯曉夫上台的資料，明天見報。於是王知常當即擬出幾條毛主席語錄：「三要三不要」⁵⁰，「右派上台都是短命的」，「按既定方針辦」，等等；又從《國際問題資料》中找出《赫魯曉夫上台前前後後》一文，準備摘引。⁵¹接着，朱永嘉驅車趕到兩家報社和電台，要求負責人「堅守陣地」，如果中央發佈揪出反黨集團的消息，新華社發佈整我們的消息，你們不要登。而是刊登我們的《告全國人民書》。

徐景賢和王少庸那裏，也是一片不安。8日深夜，徐景賢和王少庸回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學習室，等待警備區的人來。張宜愛和警備師師長李仁齋來時正是零點。中央人民電台廣播新聞：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兩個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紀念堂。徐景賢覺得與張春橋9月21日對自己的談話不符，因為張春橋曾對他說：「考慮不準備分別出五卷、六卷，準備先把有主席手稿的、經主席審定過的文章先合成一冊出版，免得五、六卷如何分期引

50 即「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51 《上海文革史話》第968頁。

起爭論，同時，其他文章一時也審定不了。」徐景賢據此覺得，這個決定是在沒有張春橋參加的情況下作出的。王少庸問李仁齋：「究竟有多少部隊？」李仁齋答：「警備師大都是分散值班的，多的一個連，少的一個班」。王少庸又問：「能拉出多少人？」李仁齋回答：「最多是一個營，另外就是康平路附近的一、二個連」。王少庸問「能調得動部隊嗎？」李仁齋答調不動。⁵²

朱永嘉深夜回到康平路時，也聽到了中央兩個決定的新聞廣播。他對張敬標說，中央兩個文件說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建毛主席紀念堂，是抓旗幟。看來中央確實出事了。我們要趕緊行動，要不然就晚了。要馬上控制新聞、廣播和交通、碼頭、車站，並發佈告人民書，說這樣「行動起來後，對我們有利，逼得他們不得不放人」，而且「對他們在中央的鬥爭也是個支持」。朱永嘉並打電話去丁香花園徐景賢處，要徐景賢佈置9日的上海報紙不要轉載中央的兩個決定，張敬標也打去電話表示贊成朱永嘉的建議。但兩個電話都被徐景賢的秘書張家龍擋掉了，說徐已經睡覺，且現在情況不明，明天再說。⁵³不過，第三個電話秘書沒有擋得住，凌晨2點廖祖康打來的。匯報剛才王秀珍和馮國柱等在市民兵指揮部開會的意見，希望加強對電台和市委機關的保衛，建議請警備師通知電台的警衛連，由電台負責人劉象賢指揮；守衛康平路機關的警衛連由市委辦公室指揮。徐景賢於是又寫了張條子，讓秘書送去也睡在一號點的李仁齋：

電台由李仁齋同志告電台的連，注意警衛，聽從劉象賢同志的指揮。

52 徐景賢 1976 年 11 月 5 日《徐景賢的初步揭發交代》。

53 《上海文革史話》第 969 頁。

三連由李仁齋同志告知一下，要聽從市委的指揮。⁵⁴

這張紙條後來被認為是徐景賢組織「武裝叛亂」的第二張手令。

與市民兵指揮部佈置備戰的同時，上海市公安局也接連開會佈置備戰。

徐景賢和王秀珍被召去北京

10月9日清晨，馮國柱首先來到丁香花園，接着，王少庸、張敬標、張宜愛等市委常委也都到了。大家商量，對中央的兩個決定如何表態。馮國柱建議，要表態擁護，但不要提「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徐景賢已經從秘書口中得知朱永嘉反對刊登。他雖然心裏同意朱，但又覺得「中央這兩個決定本身是廣大群眾擁護的，報紙不發的話會失去群眾」，還是佈置報紙刊登。⁵⁵

王秀珍早晨從東湖招待所出來，又去張春橋家和王洪文家彎了一下，說要把王洪文、張春橋的妻子文靜和崔根娣以及王秀珍自己的家屬安排轉移。把大孩子安排到工廠去，小孩子安排到工人家裏去，「要把革命後代，好好保存好」。王秀珍到了丁香花園後，說起安排家屬孩子轉移之事，徐景賢說王秀珍光抓小事不抓大事。家屬不用轉移。

這一天上海仍然在不安中度過。下午召開市委常委會，討論、修改給中央的電報。晚上7時，徐景賢又打電話給在北京的馬天水。第一次打去馬天水還是不肯接。再打，大家一定要馬天水接。磨了好久，馬天水終於接了，王秀珍問他看到張、王、姚沒有，馬天水應付說：「他們身體還好，工作比較忙，

54 徐景賢手令影印件，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話》1980年12月第19期。

55 徐景賢1976年11月5日《徐景賢的初步揭發交代》。

沒有時間和我個別談了。」大家如釋重負，說是一場虛驚。於是趕快準備起草兩個電報，一個是堅決擁護中共中央的兩項英明決定，一個是熱烈歡呼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晚飯以後，徐景賢和王秀珍商量，既然張、王、姚沒有事情，那就立即撤銷民兵的戰備集中和待命決定，馬上恢復正常，不然將引起誤會。王秀珍當即向民兵指揮部施尚英打了電話，告訴他：「撤銷五位數(即31000人，實際上只有11000人)，保持四位數(即2500人)恢復正常」。接着，又將廖祖康找來，要他將聚在東湖路招待所總工會的那些人分散。廖祖康答應了。但事後才知，總工會的人一直聚在東湖始終沒散。

一切剛稍有平靜，10點左右馬天水往上海打來電話。通知徐景賢和王秀珍第二天去北京開會。這是馬天水提出的。他向中央表示，自己無法說服上海的那些人，說還是將他們叫來北京，中央自己說服。周純麟也建議中央將徐景賢和王秀珍叫來北京。⁵⁶ 馬天水的電話又引起猜測：「為什麼馬天水不回上海？」「為什麼又要上海去人？」「為什麼會議不是中央通知？」馮國柱、廖祖康等主張別去，去一個抓一個。後來商量還是去：「這是馬天水通知的，不去不好。」大家要求他倆一定要打電話回來，如果不打就真的是出事情了。

上海的三個市委書記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都被叫去北京。於是留在上海的市委常委將只四個老幹部：馮國柱、王少庸、張敬標、黃濤。王秀珍擔心總工會的人莽撞行事，臨行前打電話給葉昌明，要他們不要動，有事請示這幾個老幹部。10日下午兩點半，空軍派專機來接徐景賢和王秀珍離滬。到了北京，

聽了馬天水、周司令講了中央會議的精神，聽到有毛主席關於解決「四人幫」的多次指示，我們的思想雖一時還不

56 馬天水 1976 年 11 月 21 日《我的補充揭發交代》。

通，但我們商量後覺得應該立即電告上海穩住。打電話的內容經過書面請示中央辦公廳同意後，我當晚即打了電話，告知馮國柱：「我們已經平安到達，一切等我們回來以後再定」。⁵⁷

就在徐景賢和王秀珍被叫去北京的同時，10日上午，上海警備區也接到南京軍區的通知，要警備區的領導章塵、李寶奇、李彬山、張宜愛、楊新亞，馬上去南京軍區開會。臨行前，李彬山與施尚英約好，說如果有事他將告之。中午，一行人乘火車離滬。

10月10日晚上，徐景賢、王秀珍給馮國柱打來電話；之後11日和12日，也每晚都給上海打一個電話，表明他們在北京很好；要求上海的宣傳口徑要按照《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精神。但他們始終沒說北京發生了什麼事，只說一切等他們回上海再說。

徐景賢和王秀珍10日離滬之前，要求撤銷丁香花園和東湖招待所兩個點。但在情況不明的狀況中，每個人都惶惶不安。寫作組和總工會的人各自天天碰頭，互通信息，分析形勢。11日晚，市總工會及市民兵指揮部的人又在東湖招待所碰頭，北京市革會的一個工作人員打電話來告訴說：北京街頭已經出現大標語，內容都是針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的。這下局勢完全明了，被證實的正是眾人原來所猜測設想的「最壞」結果。他們馬上去康平路打聽消息，馮國柱、張敬標、王少庸等都在。張敬標告訴他們，王秀珍和徐景賢昨天已經被中央叫去北京，剛才來了電話，說他們參加的會議已經結束，現在正在等待中央領導接見。至於開的是什麼會，王秀珍他們不肯講，說等明天回來就一切都知道了。說起北京的情況以及南京軍區的會議，張敬標和馮國柱說，去南京開會的五個人都回

57 徐景賢 1976年11月5日《徐景賢的初步揭發交代》。

來了，原來李彬山和張宜愛都說好回來就告訴他們開會內容，但到現在也沒有來電話。事實上，李彬山和張宜愛10日去南京軍區開會，得知了中央發生的情況後，深知事關重大，也對上海民兵備戰發槍之事感到嚴重，從此一直待在警備區，不敢再和上海地方黨政尤其市民兵指揮部有任何接觸，更不要說通消息了。為了擺脫警備區在這個敏感時期與市民兵指揮部的干係，李彬山又將守在中國紡織機械廠指揮點的警備區軍人吳立義召回警備區。

從10月11日開始，局勢越來越明朗。市公安局的監聽台不斷聽到國外電台報道「四人幫」被抓消息，連南京駛入上海的火車，車身上都被刷上打倒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大標語。10月12日下午，總工會的一幫人又在市文化宮5樓會客室碰頭。葉昌明說：馬、徐、王老是不回來，今天推明天的，情況緊急。於是決定在黃金海工作的上棉三十一廠設秘密聯絡點，組織幾個人24小時值班。葉昌明要黃金海馬上去三十一棉落實。下午4點半左右，黃金海和當夜趕回上海的戴立清，去上棉三十一廠找人佈置值班事宜。

而市委寫作組的朱永嘉、王知常、蕭木等，也始終在辦公室。朱永嘉和王知常強烈主張要有行動。11日這天他們在一起議論。朱永嘉說：「可能馬天水被人家做工作做過去了，又怕擔不了全部責任，今天把徐景賢、王秀珍也叫去北京。徐和王回來，肯定是當錢謙益(明朝禮部侍郎，率先降迎清兵)」。不過朱永嘉又認為，留下的張敬標、馮國柱、王少庸三個市委常委態度還是很堅決的，「民兵、總工會幾個人堅決要幹，我們應當幹」。朱永嘉說：「這一亂可好了，肯定會出現辛亥革命後的局面，軍閥割據，誰也不聽中央的」。⁵⁸

58 朱永嘉的話轉引自《上海文革史話》第970頁。

總工會和寫作組主張起義

其實，對於北京發生的事情，張敬標此時已經有所聞。「四人幫」被抓的第二天，10月7日晚上，中央即派人到上海，找到市革會副主任王一平。王一平文革前是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據王一平的兒子王時駒後來回憶：

一是向父親通報粉碎「四人幫」的情況，二是要求父親盡快了解「四人幫」餘黨的動態，及時匯報中央。因為父親當時只是一名沒有實權的市革會副主任，根本無法接觸「四人幫」的核心機密。這時，父親想到了一個人，即時任市委常委、市委辦公室主任的張敬標。張敬標也是一個老幹部，「文革」前曾任楊浦區委書記，是父親的老部下，「文革」中他投靠造反派，成了「上海幫」的核心成員和骨幹。父親向張敬標曉以大義，陳明利害。結果，張終於將「四人幫」餘黨內部開會的內容，包括文件的副本交給了父親，父親通過專人及時地向中央作了報告。⁵⁹

不過，從張敬標以後的表現看，似乎王一平沒有將北京的全部情況告訴他。因為張敬標後來說，他直到13日凌晨3點，才從李彬山處得知中央打招呼會議的精神。⁶⁰不過，至少，在從李彬山處得知消息之前，王一平肯定已經要求張敬標隨時匯報上海各方的動向。

總工會和寫作組卻都不知張敬標會匯報他們的行動。葉昌明還將總工會骨幹們的想法和行動，都電話匯報張敬標。12

59 王時駒《父親王一平：一生正直護公平》，載於2010年第2期《上海灘》，上海地方志辦公室編輯，據說，馮國柱也被打過招呼。

60 張敬標1977年1月7日《交代我參與陰謀策劃反革命武裝暴亂對抗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反革命罪行》，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年10月第19期》。

日，葉昌明又打電話給張敬標，要求晚上到市委了解和討論形勢。張敬標隨即將總工會的動向，打電話報告上海警備區政委李寶奇：「現在我們這裏情況很緊張，工會和民兵指揮部的一些人情緒很激動，我們已經很難控制。」李寶奇要他盡量穩住他們。張敬標和馮國柱決定晚上在康平路碰頭交換情況，通知王少庸和黃濤也到。說是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實際就是總工會和寫作組核心人員。本來張敬標打算四個常委先碰頭商量一下，統一認識。但黃濤一直在忙工交組的日常工作，到遲了，常委未能先商量研究。⁶¹

10月12日晚上八點半，陳阿大、葉昌明、施尚英、朱永嘉、蕭木、馬振龍、廖祖康、何修文，都來到康平路小禮堂。朱永嘉本來不想去，但張敬標在電話裏要他一定去。加上四個市委常委馮國柱、張敬標、王少庸、黃濤。⁶²大家互通消息，都是四面八方傳來的關於四人幫被抓消息。廖祖康拿出一份電話記錄，是上海去北京開會的人打來的，記錄上說不但中央四個人，還有毛遠新、遲群、謝靜宜，也都被抓了。施尚英說他下午被李彬山叫去，他曾問李彬山南京軍區開會的情況，是否三位領導出事了，李彬山支支吾吾不肯回答，說等周純麟司令和馬天水回來傳達。李彬山只告訴施尚英說，有人篡改毛主席指示，將毛主席的「照過去方針辦」篡改成「按既定方針辦」。大家聽了施尚英的轉達後，都說：這兩句話有什麼兩樣？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憑這一條就成了反黨分子嗎？大家都感到不明白為什麼中央要把這幾個人抓起來。

朱永嘉極力主張「馬上幹！立即幹！」馬上貼出大標語；民兵立即佔領電台、報社、機場、鐵路；天亮馬上廣播，向全世界宣佈「中國右派政變」的消息，《文匯》、《解放》兩報同時發宣言。朱永嘉還在一張紙條上寫下「民氣可用」四個

61 《上海文革史話》第 970 頁。

62 同上。

字，讓大家傳着看。施尚英不同意朱永嘉提出的民兵佔領電台的提議，說電台是軍隊警衛的，民兵和軍隊有分工的。朱永嘉說：「不要緊的，我叫電台的劉象賢將你們民兵領進去。」施尚英還是不同意。施尚英說：調動民兵要市委下命令的。王少庸問施尚英你們民兵一下子能拉得出多少？一個團行不行？施尚英說：民兵不如部隊集中，都比較分散。王少庸說：這樣分散怎麼打仗，等你們拉出來，部隊早就將你們包圍了。⁶³

因為王少庸問起上海民兵的情況，施尚英就在會議室給在市民兵指揮部的鍾定棟打了兩個電話。第一個電話要鍾定棟檢查各單位值班和戰備人數；第二個電話，要鍾定棟做一個重點目標的保護方案。鍾定棟接到電話後即掛起了上海交通地圖，從12日晚上一直做到13日凌晨2時，制定了兩個方案。鍾定棟給這兩個方案取了兩個名字：「捍一」、「方二」。「捍一」是對市委、市革會辦公處，以及重要目標的保衛方案。⁶⁴「方

63 黃金海 1977 年 3 月 5 日交待。

64 據《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 年 10 月第 19 期載，「捍一」方案的具體內容是：

一、首腦機關的保衛：

一旦發生情況，市革會擬由黃浦出兵 200 人擔任警衛。港務、建工民兵師各派 360 人待命；港務負責福州路口至金陵東路外灘，縱深至四川路；建工負責白渡橋南側至九江路口，並配合黃浦區指揮部加強電台、文匯報的警戒。

康平路辦公室擬由徐匯區加強警衛。

市民兵指揮部擬由虹口區出兵 100 人擔任警衛。

二、報社、電台：

解放日報、文匯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外圍由黃浦各派 100 人警衛，電台的第二機房請長寧區派 100 名加強警衛。內部擬由本單位加強值班。

新華社上海分社擬由靜安出兵 20 人加強警衛。

三、橋樑：

貫通南北的十道橋樑：由虹口 200 人，閘北 300 人擔任守衛，重點保證白渡橋、河南路橋、西藏路橋、恆豐路橋；長壽路橋、江寧路橋、武寧路橋由普陀負責；吳淞大橋、定海橋由楊浦區負責；白蓮河大橋由南市區負責。每橋各組織 30 民加強警戒。

四、車站：

二」是對上海外圍進口的控制。⁶⁵ 從兩個方案的內容看，重點在防止和應對突發事件和突然襲擊，更像備戰方案。而施尚英

上海站內部保衛工作由鐵路分局民兵師負責，外圍由閘北區抽調 150 人支援，範圍東起河南路、寶山路，西到共和新路，北起虯江路，南到天目路。

五、各區的重點目標，務請各區加強警衛，重點是水、電、煤氣和油庫。

六、重點支援地區為：

楊浦、閘北、長寧各 500 人分別支援江灣、大場、虹橋機場；徐匯 200 人支援龍華機場。

普陀要密切注意嘉定方向的空投地域。

南市、楊浦部分兵力要密切注意奉賢、川沙、南匯一帶的地域。

七、基指(1)(2)

市指揮所擬由江南廠、中紡機廠加強警衛。

各區指揮所擬由本區抽調兵力加強內外警衛。

65 據《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 年 10 月第 19 期》載，「方二」方案的具體內容是：

上海外圍控制：

設二至 3 個控制圈。第一在上海與江蘇、浙江交界的上海境內瀏河、葛隆、安亭、金澤、楓涇、金絲娘橋設六個控制點，形成外圍控制圈。上述任務，瀏河由寶山縣指揮部負責；葛隆、安亭由嘉定縣指揮部負責；楓涇、金絲娘橋由金山縣民兵指揮部負責。每點兵力 200 人，24 小時控制。在特定條件下，就地取材，設置路障。並組織 500 人的預備隊，處理可能發生的情況。黃浦江大橋由松江縣指揮部組織 300 人警衛，實施控制。

沿海各縣加強哨所執勤，沿海巡邏，並組織 1000 人的預備隊，處置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

沿龍江路(港口開始)，中山南路、中山西路、中山北路邯鄲路、軍工路、黃浦江形成第二控制圈。按行政區分段包乾。封鎖通往市區的各道路路口，在特定情況下設路障。

黃浦江上各渡口由交運局民兵師責成內航公司民兵團控制輪渡，加強警衛，特定情況下，輪渡停止駛船，渡船一律在浦西停靠。

黃浦江沿岸，請楊浦、虹口、黃浦、南市、徐匯加強警戒。隧道與過江污水管道，請南市、盧灣分別加強警戒。如有情況，實施封閉，憑特定通行證通行。

吳淞口請漁業公司民兵團派出 2-3 對武裝漁輪加強巡邏，發現情況可用電台與市基本指揮所聯絡。同時按照現有武器裝備組織漁輪機動待命。

沿陸家浜路、徐家匯路、肇家浜路、烏魯木齊路、新開路、石門路、蘇州河十道橋形成第三控制圈。按行政區分段包乾、封鎖路口、橋樑。在特定條件下，設路障。

的回憶也說，這兩個方案也是對1976年4月為應對類似天安門事件的防範方案補充和擴展，是個備用方案，沒有實施。這與朱永嘉所提出的對抗中央，進行「巴黎公社式的起義」，似乎很不相符。施尚英後來回憶說，他當時覺得會議氣氛不正常。他前兩天是作為備戰去佈置民兵的。雖然覺得中央發生了什麼，但沒有想到用掌握的民兵武裝力量去對抗中央。看到會上一片要幹的聲音，他心裏感到事態嚴重，心裏很矛盾，一方面擔心中央是否真發生政變了；另一方面又深知拉民兵武裝反抗中央政府責任重大：

我意識到如果像朱永嘉和王知常那樣提出的方案，性質就是武裝叛亂。我感到問題的嚴重性……我非常清楚地感到馬、徐、王回來是不會幹的。我的想法就是拖，拖到馬、徐、王回來……整個會上，只有我和張敬標的態度和別人不一樣。⁶⁶

施尚英表示，民兵的調動權在市委，要調動民兵必須由市委召開區、縣、局會議佈置。他強調，沒有市委的明確指示，他無權調動民兵。他還強調，若要調動全市民兵行動，需要一天的時間。施尚英實際上就是「拖」，因為一天以後，去北京的三個書記就該回來了。他後來回憶自己當時的感覺：「一是肯定失敗，二是肯定流血，三是不可能拉得出人。」以民兵對抗正規軍，除了流血，根本不可能取勝，施尚英不願意用民兵的生命去做這樣無謂的壯舉；他明白以武力對抗中央是大罪，他不希望自己下面的民兵幹部陷入這樣的罪名。他清楚地知道，民兵只是個鬆散的結構，配合軍隊作戰還可以，真要獨立打仗，根本不可能拉得出人；而且目標不明：對誰？對軍隊，但這又如何向民兵解釋？所以會後施尚英作出了一個重要

66 施尚英 1983 年 1 月 1 日的上訴書。

佈置：回到江南造船廠的指揮點，馬上打電報給各區民兵指揮部，包括民兵直屬師，要大家一定聽從市指揮部命令，千萬不要擅自行動，這時已經是13日凌晨。⁶⁷ 施尚英以這樣的佈置，穩住了整個上海民兵。

馬振龍也參加了會議。馬振龍到總工會後聽說康辦正在開會決策，於是打電話去要求參加。還有王知常和王日初，也是聽到消息之後自己要求參加的。馬振龍到晚了。見大家在議論，馬振龍流着眼淚說：「我知道你們開會不讓我參加，我是自己來的。問題很清楚，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三位領導被抓，我們要為毛主席路線而幹。我是提着腦袋幹文化大革命，現在我們也是非幹不可」，「我四歲死了父親，是黨培養了我，我這人從不流淚的，毛主席逝世，我也沒有流眼淚，今天我流着眼淚說這些話，我們只有幹，才能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⁶⁸ 馬振龍一番話講得慷慨激昂，朱永嘉馬上過去拉着他的手，說：「過去我們有點矛盾，現在要團結起來一起幹」；「你們幹，我們也幹，工會帶個頭，民兵一動就可以幹。你們幹我們支持」；「工廠生產可以停下來，我們負責起草《告人民書》」。⁶⁹

上海的總工會和寫作組，過去互相看不起，直到文革的最後關頭，共同的危機使他們前嫌盡棄，攜起手來。但此時大勢已去，一切為時已晚。

王知常說：「他們三位去開會的，可能投降了。馬天水是老幹部，徐景賢是軟骨頭，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我們不能再等！」張敬標問：「怎樣幹？」陳阿大說：「我們工交組下面工廠有的是船，在黃浦江上弄條萬噸輪一沉，就把江封鎖了，

67 這些都是施尚英 2014 年 9 月，在看了這個章節的底稿後對筆者說的。

68 馮國柱 1977 年 1 月 8 日《揭發和交待陰謀發動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嚴重罪行》，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 年 10 月第 19 期。

69 《上海文革史話》第 977 頁。

外面進下來。在機場跑道上開幾輛卡車，飛機就不能停了，就把機場封死了。再把電網拉下來，一斷電，上海馬上癱瘓」。陳阿大解開外衣鈕扣，在屋子裏走來走去，越說越激動。後來乾脆坐在會議室門口的地上，堵住門，不准人進出，要大家表態是幹還是不幹。廖祖康更是激動，說自己整個文革十年都跟着王洪文，對王洪文的絕大多數行動都知道，不相信王洪文會反對毛主席。

正在這時，一個服務員敲門，說有電話來。陳阿大頂着門不讓進：「去去去，不聽電話」。馮國柱去接電話。電話是馬天水從北京打來的。馮國柱問馬天水究竟何時回上海，馬天水一會兒說明天上午，一會兒說明天下午。馮國柱說：「我們在這裏都十分着急。現在人心浮動，流言很多，局勢無法控制，有些同志現在很激動。」馬天水說：「你要他們不要激動，不要浮動嘛」。馮國柱說：「你叫我一個人不要激動、不要浮動可以，其他人我們穩不住。」⁷⁰ 電話那邊換了王秀珍。葉昌明要向她匯報情況，她說，不要講了，情況我們都知道。我們明天回來，你們要聽指揮，一切等我們回來再說。馮國柱回到小禮堂傳達了剛才的電話，大家都不明白「一切等我們回來再說」是什麼意思。有的說：大概他們要回來和我們一起幹，但電話那頭有人，不好說。有人說：他們的態度肯定變了，回來是說服我們的，不會幹的。更多的人罵去北京的三個人是軟骨頭，投降派。⁷¹

眾人要四個市委常委表態，到底是幹還是不幹。張敬標建議開常委會討論，他讓其他人都退出去。會議室只剩四個市委常委。馮國柱說，他們商量，我們四個市委常委也要商量一

70 馮國柱 1977 年 1 月 8 日《揭發和交待陰謀發動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嚴重罪行》，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 年 10 月第 19 期》。

71 葉昌明獄中筆記本黑皮硬面抄第 78 頁，1980 年 9 月 1 日，原件藏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下。馮國柱、張敬標、王少庸意見一致，一定要穩住。黃濤既不說幹，也不說不幹，踱過來踱過去，只說要準備，要準備。⁷²張敬標既然已經事先被打過招呼，當然不敢再任寫作組和總工會行動。四個留守常委畢竟都是老幹部，知道事情輕重。他們的對策就是拖，拖到馬、徐、王回來再說。

葉昌明、陳阿大和馬振龍叫到另一間房間商量。有人要開燈，馬振龍不讓開，說「乾脆黑會開到底」。朱永嘉說：看來他們(指馮國柱、張敬標、王少庸)是不行的，有點靠不住。寫作組和總工會的人又回到會議室。馮國柱後來回憶：

這時，葉昌明、陳阿大等人倒不吵了。朱永嘉變成了主角，王知常、蕭木、廖祖康在一邊幫腔。朱永嘉十分激動，先煽動性地講了一大通話，大意是我沒有想到張、姚、王會有如此下場。王我不太了解，張、姚我完全了解，我那裏有他們全部批件，可以公佈於全世界。我認為要起義。他們害怕群眾，怕上海癱瘓，只要守五天，港口碼頭癱瘓，在全世界就造成影響。要發表告人民書動員群眾。口號是「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洪文、還我文元」。即使像巴黎公社一樣的失敗，同樣也可以用鮮血教育後一代，等等。接着朱永嘉又面對我們說，8號就應該幹，已經錯過，今夜再不幹，到了明天，一切時機就都喪失，要幹就下決心今夜幹，而且要大幹，要以市委名義幹，你們四人和我們一起幹。朱永嘉又接着說：今夜要不幹，到了明天，他們三人一到，要幹也幹不起來了！那時我看你們只有唱兩隻歌的份了，要就只唱革命歌，我就算佩服你們；否則就唱投降歌，但是當你們回憶這段歷史時，將會感到懺悔。⁷³

72 馮國柱 1977 年 1 月 8 日。

73 同上。

朱永嘉表示：「我是姚文元寫《評海瑞罷官》時把我拉上來的。我這樣做也對得起他們了」。⁷⁴

大家要四個常委表態。四個常委都表示，贊成大家的看法，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的話，應該對抗。但現在情況不明，還是要等馬老他們回來再說。張敬標以後回憶說：

會上主持會議的馮國柱逐個問了大家的態度，都表示要幹，會議室內已是極度緊張。我內心很亂，感到事關重大。此時我說：「現在不好動，一動，周圍和外面的部隊就要進來，不能貿然行動。我已快六十了，怎麼樣都沒關係，你們還年輕，幹革命還要靠你們年輕人，不能作無謂犧牲」。⁷⁵

整個會上，態度最激烈的是總工會和寫作組。而四個老幹部，尤其張敬標和馮國柱，也沒有制止越來越激烈的情緒，跟着大家說要「幹」。馮國柱後來對李彬山解釋說：

在那樣的情況下，講不幹，又怕他們受不了。我們說幹。但我們主張一定要等三位書記回來，他們沒有回來前不能動。⁷⁶

四個常委都不制止眾人的激烈情緒。都說要幹，不過要等三個書記回來一起幹。這些老幹部都知道真要反抗中央，罪名將非常嚴重。他們既怕開罪寫作組和總工會的人，又怕承擔行動的後果。他們當時如果正面勸導，潑一下涼水，雖不一定有

74 《上海文革史話》第 979。

75 張敬標 1977 年 1 月 7 日《交代我參與陰謀策劃反革命武裝暴亂對抗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反革命罪行》，載於《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1980 年 10 月第 19 期。

76 《上海文革史話》第 981 頁。

效果，但至少可能會使眾人的頭腦稍微現實和冷靜一些。⁷⁷

時間已經是10月13日凌晨。王知常認為這四個老幹部膽小，不會有什麼結果，沒啥好再討論的。他拍着桌子斥責：「你們這樣拖下去，把時機都拖光了！大家都沒有好下場！」他憤然離去。其他人見沒有結果，也都走了。臨走，葉昌明對馮國柱和張敬標說，他要將中央發生的情況對下面的工會幹部「吹吹風」，讓大家有個思想準備。馮國柱和張敬標沒有表示反對，只說：吹風可以，但不要行動啊。

眾人離開後，李彬山來馮國柱家，告訴張敬標和馮國柱他在南京開會時聽到的消息。送走李彬山，市委辦公廳來電話：馬天水等三人13日上午9時，由北京起飛回上海。

工會系統層層吹風

葉昌明、陳阿大、馬振龍等回到總工會，已經是13日凌晨。黃金海、戴立清、汪湘君等都等在那裏。戴立清是12日晚晚上連夜從安徽小三線趕回上海的。在總工會四樓會議室，葉昌明向大家傳達剛才會議的情況，說剛才市委常委會上，幾個市委常委都態度曖昧，老傢伙們都在耍滑頭，一定要等馬老他們回來。黃金海和戴立清聽了都說，等什麼，再不幹，等警備區將軍隊都佈置好，我們就只能束手待擒了。這些老傢伙，等馬老是假的，其實就是拖延時間。葉昌明認為，這樣大的事情，沒有市委出面，單靠工會和民兵指揮部是沒有足夠號召力的。所以他提出，向工會系統「吹風」，將中央可能發生了政變的情況告訴工會幹部，

現在知道情況的人太少，應該把情況告訴下面的幹部。這樣，即使我們被抓起來下面也會有人和他們鬥爭的。毛主

77 這是葉昌明看了筆者這本書的底稿，寫在旁邊的批注。

席講過，右派上台都是短命的，不得安寧的，我們要叫他們不得安寧。⁷⁸

大家都同意。於是立即分頭通知開會。10月13日凌晨1點半，在市總工會五樓會議室，召開了有三十九人參加的「吹風」會議。都是總工會機關各組室和總工會所屬市工人文化宮等事業單位的負責人，葉昌明派車分頭將他們馬上接來。會議開得很短，只有半個小時。葉昌明說：

據可靠消息，中央出大事情了，王、張、江、姚、遲群、謝靜宜都被抓，金祖敏也找不到了。這些人大家都知道的，在文革中一直緊跟毛主席的，把他們抓起來說明了什麼？我們都是黨員、新幹部，應該怎麼辦？每個人都要獨立思考這個問題。我佈置要學習毛主席給江青的一封信中關於右派政變的一段話，結合聯繫這情況討論。⁷⁹

葉昌明還說，每個共產黨員都要獨立思考，經受考驗，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最後一定勝利，相信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絕不會輕易喪失。⁸⁰ 會議結束後，汪湘君趕回市婦聯機關。汪湘君是市總工會常委，也是市婦聯主任。她回婦聯後，即分批向婦聯幹部「吹風」。

葉昌明在散會時對黃金海和戴立清說，今天的會議工會和婦聯都來了，工、青、婦，還缺一個青，你們是否馬上找團市委書記陳新發，把我們的行動告訴他們，讓他們也行動。然後，葉昌明又佈置總工會機關值班室的人員擬一些口號。葉昌明還將在市革會文教組擔任第二把手的總工會常委王成龍叫來，要他也向

78 葉昌明獄中筆記本黑皮硬面抄第79頁，1980年9月1日。

79 同上。

80 《上海文革史話》第984頁。

宣傳系統吹吹風。王成龍答應了，但實際沒有去做。⁸¹

13日上午，市總工會緊急通知區、縣、局和市直屬大廠工會負責人共四十九人到總工會開會。會上眾人議論紛紛。有人說王洪文是我們工人領袖，不可能是反革命；有人說這是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鄧小平路線的繼續。還有人要求總工會帶領各級工會鬥爭，頭可斷、血可流，堅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保衛文化大革命成果。⁸² 會議結束後，一些局工會又召集下面的工會再吹風，直到基層工廠的工會。本來，隨着中央打招呼會議，「四人幫」被抓消息已經通過各種途徑傳到上海。許多工會幹部已經有所耳聞。但因為不是正式渠道的傳達或報紙刊登，他們不敢也不願意相信。總工會的「吹風」證實了傳說，讓這些與文革共命運的工人造反派心慌和不知所措，都說要和修正主義幹。

王明龍將打印出來的口號送到葉昌明的辦公室，葉昌明不滿意，認為「太中性」。於是葉昌明與在場的黃金海、戴立清、馬振龍、共同修改，將措辭改得更嚴厲堅決，並且又增加了4條，共21條：

1. 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2. 誓把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3. 徹底批判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4. 深批鄧小平，痛擊右傾翻案風！
5. 要搞馬克思主義，不搞修正主義！
6. 要團結，不要分裂
7.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81 葉昌明後來回憶，王明龍當時對他要向下「吹風」的行動表示異議，說要慎重些。葉昌明回憶說：「我沒有聽他的忠告，害了下面一大批工會幹部」。因為那些參加「吹風」者，文革結束時都被審查。

82 《上海文革史話》第984頁。

8. 誰搞陰謀詭計，誰搞分裂，就堅決打倒誰！
9. 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絕沒有好下場！
10. 誰反對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就和他鬥到底！
11. 堅持前進，反對倒退，堅持革命，反對復辟！
12. 翻案不得人心！
13. 用鮮血和生命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成果！
14. 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
15. 「一月革命風暴」精神萬歲！
16. 發揚上海工人階級的光榮傳統！
17. 決不容許蘇聯復辟的教訓在中國重演！

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

絕不允許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

上海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團結起來，同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鬥爭到底！

全國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團結起來，同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鬥爭到底！⁸³

這些口號，顯示出上海工人造反派們對文革的深切關注。他們深知自己的命運和文革緊密相連，中央如果「出修正主義」，首先下台的就是他們。他們要保衛文革成果。但另一方面，總工會的一幫人，對於如何將口號轉變為行動，心中無數；加上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等自12日康平路小禮堂會議後，有意躲避着總工會，存心拖延；因此總工會在行動上顯得很猶豫。

倒是寫作組的朱永嘉和王知常，態度非常堅決。就在市總工會佈置「吹風」的同時，朱永嘉和王知常聽說馬天水和徐景賢、王秀珍三人已經回滬，就立即打電話給黃金海，說不能再遲疑了，要工人造反派立即動手。黃金海回答說葉昌明他們正在開會，要和他們商量後才能決定。王知常限他們在下午2點半答覆：

83 原件為上海市總工會 1976 年檔案。

到了下午2點半，我們正在猶豫，王知常又打電話來催問：「你們到底幹不幹？決定幹，我就帶幾個人一起來幹！」我說施尚英不在，再商量一下。王知常很激動地說：「你們這些人這樣動搖。動搖怎麼行？算了算了，我們辛辛苦苦培養幾年的力量，也不要拿出來了。好吧，等你們到4點，再不打來就算了！」⁸⁴

希望有所行動的，還有張春橋的妻子文靜。中午，她讓女兒打電話給朱永嘉和蕭木，要他們去她家談談。文靜對他們說：「難道就這樣完了嗎？你們有沒有什麼辦法？」朱永嘉答：「常委說要等去北京開會的幾個書記回來後再定，沒有辦法。」文靜不甘心地說：「他們不搞你們可以搞嘛。可以組織寫作組的一些人到下面去，搞串聯、發動。我不相信群眾起不來。」蕭木表示，要等北京開會的馬天水等人回來後再說。⁸⁵

下午4點，總工會的葉昌明、陳阿大，被回上海的王秀珍叫去開會，總工會那裏只剩黃金海、戴立清等人，他們沒有給王知常打電話，王知常又打電話給葉昌明，正準備出門去康辦開會的葉昌明，在市總工會大廳接到了王知常的電話。王知常再一次問葉昌明：「你們幹不幹？」葉昌明說：不是市委通知開會嗎？朱永嘉也要去的，聽回來的馬天水、王秀珍他們怎麼講後，再說吧。王知常很不滿地說：「現在要幹就大幹，再等就幹不起來了。」「我是流氓無產階級，不怕的。」⁸⁶ 葉昌明說自己馬上要去康辦，讓王知常打電話給黃金海。但王知常電話打過去，黃金海等回答說：人都不齊了，定不下來。總工會方面的頭是葉昌明，葉昌明不在，他拿不了主意。王知常連聲長

84 黃金海 10月24日(原件沒有寫清年代)。

85 蕭木 1977年1月26日，載於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中發中發〔1977〕10號。

86 葉昌明寫在本書底稿邊的批注。

嘆：「好了好了，算了算了，束手待斃吧！」⁸⁷

不過，還有一個人，直到13日晚上還不甘心，他就是謝鵬飛。13日晚上，他悄悄一個人去到馬天水家裏，對馬天水說，這是政變，我們應該利用掌握的上海民兵武裝，像巴黎公社那樣，舉行反抗，馬老你帶頭，我們跟着你！馬天水回答：軍隊不在我們手裏，民兵根本對抗不了軍隊。兩人抱頭痛哭，知道大勢已去，無可挽回。⁸⁸

上海慶祝文革結束

10月13日上午，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上海。下午市委在錦江飯店南樓會議室，市委召開常委會，傳達中央打招呼會議精神。晚上，馬天水又特地將工、青、婦和民兵、公安局的核心人物都叫到錦江南樓小禮堂，再一次傳達中央精神。

馬天水所傳達的內容，無法說服眾人。這場實際上的政變，卻用原有的文革話語和毛澤東權威解釋合法性，很難自圓其說。傳達的是毛澤東三句話：「你辦事、我放心」，「慢慢來，別招急」，「按過去方針辦」。黃金海對此表示不解：「毛主席寫的三張紙、三句話，其中一句是『你辦事、我放心』，但這同四人幫無關，傳達下來，有什麼意思，無非是叫大家不要講話」。尤其對將「按既定方針辦」，說成是「四人幫」篡改毛主席指示，大家更是想不通：「這和『按過去方針辦』沒有實質上的差別」。⁸⁹ 唯一稍有說服力的內容，是說毛澤東講過：「四人幫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葉昌明後來回憶說，自己就是聽了這個內容才轉態度的：原來要解決

87 黃金海 10月24日(原件沒有寫清年代)。

88 這是謝鵬飛文革後告訴筆者的。

89 《上海文革史話》第993頁。

「四人幫」問題是毛主席提出的，既然是毛主席提出的，就不應該再反對了。⁹⁰ 其他人也都勉強接受了中央的解釋。會後，各自按所負責的系統，傳達了中央的精神。華國鋒新政權最擔心的上海的反抗，終於沒有實施。

相比惶惶不安的文革人物，上海廣大民眾對文革的結束由衷欣喜。在上海這個文革最重要的基地，人們對文革早已由厭倦反感發展到深惡痛疾。還在10月11日、12日，上海民眾從北京來電、海外廣播等各種渠道，知道了中央發生的事情。10月13日深夜，就已經有人在馬路上刷出打倒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大標語。從10月15日開始，上海市民自發地連日遊行集會慶祝，數以萬計的人湧進上海市委，質問為什麼不傳達抓捕四人幫的消息。到10月22日，《人民日報》公開報道粉碎四人幫消息，上海全城沸騰，鑼鼓此起彼伏，主要的大馬路被燃放後的鞭炮紙屑鋪成了紅色，商店裏各種品牌的酒全部售罄。

10月26日下午，以華國鋒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派出中央工作組到達上海。這個工作組以蘇振華、倪志福和彭沖為首，下榻在錦江飯店。開始對上海文革時期的人和事進行全面清查。11月1日，上海民兵舉行遊行，擁護中央抓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十萬戴着柳條工作帽、穿着工作服的民兵，扛着輕、重武器，高舉毛澤東和華國鋒的畫像，聲勢浩大。這是上海民兵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遊行。

在文革中被邊緣化的一些造反派，聽到消息後也十分興奮，認為自己出頭之日到了。原工總司的「副司令」潘國平，原交大反到底的負責人余小兵等，打算召開慶祝大會，但最終未成。

一個持續了整整十年的造反年代終於結束。以上海批判《海瑞罷官》為開端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終於又在上海打上句號。

90 這是葉昌明 2012 年 2 月，在筆者詢問他為什麼會轉彎時，他的回答。

尾聲

1976年11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成立清查四人幫專案辦公室，「揭發、批判、清查四人幫在上海餘黨」；全市各單位也相應成立清查機構。1977年1月10日，經中央批准，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三人停職審查，6月被逮捕。至1980年底，全市經審查、批准列為清查對象者5385人，清查後定為「敵我矛盾」性質者52人，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骨幹」者9人⁹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葉昌明、戴立清、黃金海、陳阿大、馬振龍和朱永嘉。1982年6月26日、7月2日，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和檢察分院分別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對九人中除馬天水之外的8人提起公訴。

上海因文革或黨紀處理的主要人物情況如下：

張春橋，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83年減為無期徒刑，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1998年1月保外就醫，2005年4月21日因患癌症病逝，享年88歲。

王洪文，被判處無期徒刑，1992年8月3日因肝病逝於北京獄中，享年58歲。

胡永年，被判無期徒刑，後保釋，2014年病逝於上海。

姚文元，被判刑20年，1996年1月刑滿釋放。2005年12月23日因患糖尿病在家中逝世。享年74歲。

徐景賢，被判刑18年。2007年10月31日夜因心肌梗死在上海家中去世，享年74歲。

王秀珍，被判刑17年。

陳阿大，被判刑16年。2004年病逝於上海，享年62歲。

馬振龍，被判刑16年。

戴立清，被判刑15年。

黃金海，被判刑15年。

91 《上海通志》。

葉昌明，被判刑15年。

游雪濤，被判刑14年。

王維國，1971年9月被「隔離審查」，1982年被宣佈判刑14年，刑期自1971年算起。1985年出獄，1993年因病逝世。⁹²

朱永嘉，被判刑14年。

施尚英，被判刑13年。

王知常，被判刑12年。2014年病逝於上海，享年82歲。

王明龍，被判刑12年。

王承龍，被判刑10年。

王腓利，被判刑10年。

廖祖康，被判刑10年。

蕭木，被判刑9年。

劉浩德，被判刑9年。

潘國平，被判刑8年，1983年出獄；1987年又被以「投機倒把」和「非法越境」罪判刑六年；1996年赴美國探親；2013年因肝病在上海新華醫院去世，享年67歲。

王日初，被判刑8年，2011年病逝於上海。

謝鵬飛，被判刑8年，

陳敢峰，被判刑8年。

余小兵，被判刑8年。

耿金章，被判刑7年，1997年(?)病逝於上海，享年71歲。

張寶林，被判刑7年。

嚴步東，被判刑7年。

汪湘君，被判刑6年。

岑麒麟，被判刑5年。

王少庸，被判刑二年，緩期二年。

92 以上被判刑者，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不是上海判的，而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別特別法庭判的，金祖敏也不是上海處理的，是在北京被處理的。所有被起訴或判刑者，都被開除共產黨黨籍。

文靜，被開除共產黨黨籍，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陳冀德，被開除共產黨黨籍，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何秀文，被開除共產黨黨籍。

王紹璽，被開除共產黨黨籍。

吳瑞武，被開除共產黨黨籍。

王成龍，1977年自殺，享年37歲。

馬天水被開除共產黨黨籍，因在關押期間患反應性精神病沒有被起訴。1988年11月15日在上海精神病醫院去世，享年77歲。

金祖敏被開除共產黨黨籍，免予起訴，1997年病逝於上海，享年63歲。

黃濤，被開除黨籍，免予起訴。2011年病逝於上海。

李彬山，被開除共產黨黨籍，剝奪軍籍，1995年逝世。

小結

總工會和寫作組，是上海造反派的核心和骨幹。這兩個造反派體系，一個在參政方面為文革提供樣板，一個在理論方面為文革提供依據。一個在前台，一個在後台。但是，這兩支力量在文革中始終格格不入，互相看不起。直到毛澤東逝世，他們才感到了危機，才真正走到一起，但這個結盟來得太晚。

整個過程中，態度最激烈的是寫作組和總工會。這是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在上海的基本力量，也是文革發動者的社會基礎。文革十年來，文革的每一場風波，都由上海這兩股力量積極響應並推波助瀾。他們深知中央四個人的被抓，實際都是對着文革，和文革命運緊密相連的他們，如今面臨唇亡齒寒，尤其文革的發動和推動者毛澤東離去，沒有人再能像毛澤東那樣庇護他們，這是最後一搏。

主張起義的是朱永嘉，最堅決者是他和王知常，甚至當徐景賢等回上海，王知常還催促總工會行動。相比之下，總工會

則顯得口號堅決卻行動滯後；當被告知是毛主席要瓦解「四人幫」，總工會就接受了這個解釋，不再對抗。而本應是事件中心的民兵指揮部，更是猶豫，深感責任重大，不敢輕舉妄動，以「拖」的策略，始終按兵不動。至於王少庸等老幹部，從一開始就知道以上海民兵的力量對抗北京，無疑以卵擊石。尤其在情況尚未明了的狀況下，他們根本沒有打算過對抗，他們所有的言行，都只是對寫作組和總工會激烈情緒的敷衍和應付。這是十分耐人尋味的現象。

自從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後，巴黎公社的夢想被悄悄擱置，巴黎公社式的全民選舉，再也不被提及。相反，1967年「一月革命」之後，「選舉」，這個巴黎公社工人自治的核心，一再遭到批判，說「迷信選舉是錯誤的」。文革從發動階段的《十六條》，以巴黎公社為動員資源，到奪權後再也不提巴黎公社的核心實質，表現出整個政權對巴黎公社的真正態度。而那些批判文章，正是寫作組撰寫。現在寫作組又想起了被他們摒棄了將近十年的巴黎公社。悲壯口號的後面，是對歷史的功利心態。

即使上海真的舉行起義，這樣的反抗也注定不會成功。且不說以民兵對抗正規軍，力量對比懸殊；就是民兵真的舉事，也不會有多少人會跟着賣命。因為基幹民兵的年齡構成，大多數是1968年後進廠的青年，他們早就對文革厭倦，對看不到前途的人生悲觀。年初北京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時，他們曾興高采烈地奔走相告，傳抄着那些義憤填膺的詩詞。他們早就盼望發生變革。四人幫被抓後，上海大規模的自發遊行慶祝，正是上海民意的真正體現。寫作組和總工會卻以為他們一旦起義，雖然注定失敗，但至少會轟轟烈烈一陣，根本不了解文革早已天怨人怒，這是他們的悲哀。

更令人感慨的是，文革初期，他們中的許多人，因為響應毛澤東號召投入文革，被單位黨組織打成反革命。為了改變這

個反革命名份，他們忠心耿耿地跟着毛澤東造反。他們也因此獲得了應有的一切革命名份：革命造反派、革命知識分子，而且幾乎完成了身份的改變，成為黨和政府的領導人。當他們得到這一切革命的名份後，卻發現自己似乎走了一個圓圈，又站在當初的起點，再次成為反革命分子。這場毛澤東發動的為時十年的革命，就這樣舉輕若重地找到了歷史責任的承擔者。

附錄一

本書提及的部分幹部文革前夕的任職情況

- 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上海市長
常溪萍，中共上海市委教衛部長
陳丕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陳琳瑚，上海市人民委員會文教辦公室主任
杜淑貞，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
高志榮，東海艦隊副司令員，少將
韓哲一，中共華東局書記處書記
柯慶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中共上海市第一書記
蔣文煥，中國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李彬山，上海警備區副政委，少將
李家齊，中共上海市委秘書長
李干成，上海市副市長
梁國斌，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公安監察)、上海市副市長
廖政國，上海警備區司令員
馬達，《解放日報》總編輯
馬天水，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工業生產)
石英，上海市副市長
宋日昌，上海市副市長
宋季文，上海市副市長
陶勇，東海艦隊司令員，中將
汪力田，上海市勞動局副局長
王克，上海市勞動局局長
王少庸，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分管市委工業政治部)
王維國，空四軍第一政委，大校
王一平，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地區)
魏文伯，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
夏明芳，中共上海市委工業政治部副主任
楊慧潔，市委工業政治部副主任
楊愷，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
楊士法，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長
楊西光，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分管教育)
楊永直，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
于永實，上海市勞動局副局長
張承宗，上海市副市長

張春橋，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宣傳)

張 祺，上海市總工會主任

張文豹，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

張宜愛，上海警備區副司令員，少將

周 璧，少將，市委工業生產委員會主任

夏征農，中共華東局宣傳部部長

姬應伍，空四軍的副政委

石西民，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市委書記處書記。1964年5月調往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長

附錄二

本書提及的部分文革人物的情況簡介

- 安文江，男，1941–2013年，浙江定海人。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復旦大學中文系四年級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市紅衛兵組織「紅三司」負責人，1967年初參與「1.28炮打張春橋事件」。1968年畢業分配至江西省瑞昌縣武山銅礦工作。2013年在廣東佛山去世。
- 包 炮，男，1940年生，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五年級學生。文革初期發起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
- 岑麒麟，男，1932年生，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822廠技術員，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委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和第五屆委員會委員、上海第二機電工業局革委會副主任、機電二局工會副主任、上海業餘工人大學領導小組成員、上海822廠革委會主任。文革結束後被判刑5年。
- 陳阿大，男，1942–2004年，受教育程度小學。文革前是上海良工閥門廠鍛工，共青團員。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常委；文革中加入共產黨，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常委、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市革會工交組負責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6年，2004年病逝於上海。
- 陳卜昌，男，1944年生，文革前是上海汽車配件廠鉗工。文革中曾任虹口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廠革命委員會主任；文革中因支持「支聯站」，被判刑20年，文革結束後獲平反。
- 陳敢峰，男，1943年生，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同濟大學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上海同濟大學紅衛兵組織「同濟東方紅」負責人；歷任上海市大學紅衛兵代表大會（市大學紅代會）負責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員，1972年因林彪事件被關押4年。文革結束後被判刑8年。
- 陳鴻康，男，上海第十五無線電廠工人，文革中又名紅夫。文革初期造反，是「工三司」負責人。
- 陳冀德，女，1936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文革前是上海市作家協會文學研究所研究人員、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文藝組成員，中共黨員。文革中

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題寫作組成員，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文藝組組長、《朝霞》雜誌負責人、寫作組核心成員。文革結束後被開除中共黨籍，分配去基層勞動。

戴立清，男，1937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大專。文革前是江南金屬製品廠(後改名為上海標準件材料一廠)電工臨時工。文革初期造反，是「工總司」委員；文革中加入共產黨，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中共上海後方基地委員會副書記。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5年。

戴祖祥，男，1936年生，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上海第三鋼鐵廠工人、廠工會工作人員。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一兵團」負責人。1967年因「另立山頭」曾被楊浦區公安分局關押一年。

范佐棟，男，文革中又名范左東，1932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高中。文革前是上海保溫瓶二廠油漆噴花工人。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常委；1967年曾因「分裂工總司」被關押，後淡出「工總司」。

馮國柱，男，文革前是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外事辦公室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員，中共黨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市革會外事組負責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文革結束後被開除中共黨籍。現已去世。

高靜慧，女，1948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第六女子中學高中學生，共青團員，班級團支部委員。文革中任上海市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市中學紅代會)首屆負責人。1968年畢業上山下鄉去內蒙牧區，在內蒙加入共產黨。文革結束後被取消中共黨籍。

耿金章，男，1926-1997(?)年，半文盲。文革前是上海中華紙漿廠工人，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二兵團」負責人、「工總司」委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和第五屆委員會委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文革結束後被判刑7年，現已去世。

顧澄海，男，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工業政治部幹部，中共黨員。文革中任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經濟組組長、寫作組核心成員。文革結束後被開除中共黨籍，分配去基層勞動。

郭仁傑，男，受教育程度「革命大學」。文革前是華東政法學院哲學系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哲學組組長、寫作班黨支部副書記，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市機關幹部造反組織「機關聯絡站」負責人之一。1968年1月6日因受「紅三司」及王承龍迫害而自殺。

- 紅 鷗，真名侯美度，女，1948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市東中學高二學生，共青團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市紅衛兵組織「炮司」中學部負責人；文革中畢業上山下鄉去河南省蘭考縣農村，1970年因「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案，被揪回上海關押近3年。文革結束後獲平反。
- 胡守鈞，男，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復旦大學哲學系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復旦大學紅衛兵組織「孫悟空」負責人，1967年初參與「1.28炮打張春橋事件」；1970年因「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案，被判刑10年。文革結束後獲平反。
- 胡永年，男，文革前是足球運動員。文革初期造反，是造反派組織「上體司」負責人；文革中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上海市體育運動委員會革委會主任。文革結束後被判無期徒刑，後被保釋。2014年病逝於上海。
- 黃金海，男，1935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中專。文革前是上海國棉三十一廠車床工人、工會小組長。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委員；文革中加入共產黨，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市革會財貿組負責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5年。
- 黃 濤，男，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市政交通政治部副主任，中共黨員。文革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市革會工業交通組負責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辦公室主任。文革結束後被開除中共黨籍，2011年病逝於上海。
- 黃文海，男，1938年生，文革前是上海滬光燈具廠工人。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1967年初發起成立「雙造司」，1969年被回廠勞動。1973年後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手工業管理局工會委員。文革結束後被回廠勞動。
- 蔣周發，男，1938年生，文革前是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工人。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常委；文革中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常委，1968年後回廠勞動。
- 金祖敏，男，1934–1997年，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上海電機廠車床工人、第十車間團支部書記、副工段長，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工總司」委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和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組織部負責人，中華全國總工會籌備組負責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中

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文革結束後被開除中共黨籍，分配至上海探礦機械廠當工人，1997年病逝於上海。

- 勞元一，男，1946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復旦大學外文系三年級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復旦大學紅衛兵組織「紅革會」及市「紅革會」負責人之一，1967年初參與「1.28炮打張春橋事件」。1968年畢業分配至安徽農場。
- 李彬山，男，1912年-1995年。文革前是上海警備區副政委、少將，中共黨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市革會政法指揮部負責人、上海市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組長、中共上海市委委員、中共上海警備區常委、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文革結束後被開除中共黨籍，剝奪軍銜和勳章。
- 李功佐，女，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上海師範學院紅衛兵組織「紅革會」主要負責人、市「紅革會」負責人之一，1967年初參與「1.28炮打張春橋事件」；1968年畢業分配至廣西柳州鐵路中學工作。
- 廖祖康，男，1948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職業學校)。文革前是國棉十七廠職業學校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文革中加入共產黨；從王洪文造反直至去中央工作，他一直擔任王洪文的秘書。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0年。
- 劉浩德，男，1941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華東師範大學學生，中共預備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華東師範大學紅衛兵組織「紅革會」主要負責人，1968年畢業分配至上海黃山茶林場；文革中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上海黃山茶林場黨委副書記。文革結束後被判刑9年。
- 馬立新，男，1941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復旦大學哲學系學生，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復旦大學紅衛兵組織「紅革會」和市「紅革會」負責人之一。1968年畢業分配至南京734廠工作。
- 馬天水，男，1910年-1988年，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中共黨員。文革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主管上海工作。文革結束後被開除中共黨籍，1988年去逝。
- 馬振龍，男，1940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文革前是上海搪瓷機修廠車床工人。文革初期造反，是工總司委員；文革中加入共產黨，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中共上海市輕工業局委員會副書記、輕工業局工會主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6年。
- 潘國平，男，1946-2013年，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上海玻璃機械廠木模工人。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常委；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

- 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常委、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委會委員。文革結束後被判刑8年；1987年又因「投機倒把」被判刑6年，2013年病逝於上海。
- 邱麗歐，女，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復旦大學物理系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紅衛兵組織「炮司」在復旦大學的組織「東方紅公社」的核心人物；1970年因「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案」被關押。文革結束後獲平反。
- 全向東，真名湯福坤，男，受教育程度大學，文革前是上海交通大學教師。文革中因支持「支聯站」被關押，判處兩年徒刑緩期兩年執行。文革結束後獲平反，2007年病逝於美國。
- 施尚英，男，1942年生，受教育程度中等技術學校，文革前是江南造船廠工人，共青團員。文革初期造反；文革中加入共產黨，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上海市民兵指揮部後期的主要負責人。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3年。
- 譚啟泰，男，1946—1996年，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復旦大學新聞系二年級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復旦大學紅衛兵組織「紅三司」負責人之一。現已去世。
- 汪湘君，女，1938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文革前夕是上海紡織機械配件廠工人(文革初期被調往上海停經片廠)，工會女工委員，曾被評為三八紅旗手。文革初期造反，1968年被作為「工代表」派駐「工總司」；文革中加入共產黨，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上海市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上海市婦聯主任、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文革結束後被判刑6年。
- 王成龍，男，1940—1977年，受教育程度大學。文革前是上海搪瓷五廠廠長室文書，共青團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工總司」委員；文革中加入共產黨，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工人造反報》負責人，《文匯報》社黨委副書記。文革結束後自殺。
- 王承龍，男，1931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肄業。文革前是上海市委《支部生活》編輯部工作人員、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市機關幹部造反組織「機關聯絡站」負責人之一；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市革會辦公室負責人。1970年被下廠勞動。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0年。現已去世。
- 王腓利，男，1942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文革前是上海第三機床廠的車間統計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工總司」委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和第五屆委員會委員、上海第一機電工業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0年被回廠勞動。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0年。

- 王洪文，男，1934–1992年，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文革前是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事，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上海最大工人造反派組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發起人之一，並擔任主要負責人。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常委、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警備區政治委員，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常委。文革結束後被判無期徒刑，1992年病逝於獄中。
- 王明龍，男，1935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文革前是上海重型機床廠廠部秘書，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工總司」委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中共上海第一機電工業局委員會常委、機電一局工會主席。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2年。
- 王日初，男，原是上海警備區司令部機關幹部，中共黨員。文革初期「支左」到「工總司」總部，後被提拔為警備區群工處副處長，作為軍代表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組織組第二負責人；金祖敏調北京後，接任市委組織組負責人。文革結束後被判刑8年，2011年病逝於上海。
- 王少庸，男，1908–1985年，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黨員。文革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分管政法、農業，主持全市「專案」工作。文革結束後被開除中共黨籍。
- 王紹靈，男，1931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文革前是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中文系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文藝組成員，中共黨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題寫作組黨小組長，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自然辯證法》雜誌負責人、寫作組核心成員。文革結束後被開除中共黨籍，分配去基層工作。
- 王秀珍，女，1934年生，受教育程度中等專科學校。文革前是上海國棉三十廠技術員，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工總司」委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中共第九和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7年。
- 王知常，男，1932–2014年，受教育程度大學。文革前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師、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歷史組成員，中共黨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題寫作組成員，《紅旗》雜誌上海組稿小組負責人之一，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學習與批判》雜誌主要負責人、寫作組核心成員。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2年。

- 吳瑞武，男，1928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文革前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師、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歷史組成員，中共黨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題寫作組組長、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歷史組組長、《文匯報》社黨委書記。文革結束後被開除中共黨籍，分配去基層工作。
- 蕭木，男，1933年生，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黨刊編輯室編委，中共黨員。文革中是《紅旗》雜誌上海組稿小組負責人之一、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核心成員，1973年調北京作為王洪文的學馬列輔導員，並任《人民日報》核心領導成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文革結束後被判刑9年。
- 謝鵬飛，男，1944年生，受教育程度初中(技術學校)。文革前是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鍛工、熱處理車間生產組長。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負責人；文革中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上海鐵路局和上海鐵路分局革命委員會常委及副主任、上海鐵路局和上海鐵路分局工會副主任。文革結束後被判刑8年。
- 徐景賢，男，1933—2007年，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大專。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幹部、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寫作班文藝組組長，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市機關幹部造反組織「機關聯絡站」主要負責人；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中共中央第九屆和第十屆委員會委員。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5年，2007年病逝於上海。
- 徐美英，女，1938—2012年，受教育程度小學。文革前是147服裝廠工人，生產組長，廠工會女工委員。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委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和第五屆委員會委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手工業管理局革命委員會委員、手工業局工會副主任。文革結束後被解除所有職務，2012年病逝於上海。
- 嚴步東，真名嚴惠林，男，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交通大學七系冶金68屆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交大紅衛兵組織「交大反到底」負責人；文革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1968年畢業分配至上海江南造船廠工作。文革結束後被判刑7年。現已去世。
- 楊小兵，真名楊安禮，男，1945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交通大學68屆一系120專業學生，共青團員，班級團支部委員。文革初期造反，是交大紅衛兵組織「交大反到底」成員，參加1967年初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起草；文革中加入共產黨，畢業分配至上海江南造船廠工作，歷任共青團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文革結束後被取消中共黨籍。

- 葉昌明，男，1944年生，受教育程度中等專科學校(成人夜校)。文革前是上海合成纖維研究所化驗工學徒，共青團員。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常委；文革中加入共產黨，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常委、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及副主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5年。
- 游雪濤，男，1935年生，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團市委《青年報》記者，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掃雷縱隊」負責人；文革中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群運組副組長。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4年。
- 余小兵，真名余身偉，男，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交通大學一系67屆學生，中共黨員。文革初期造反，是上海交通大學紅衛兵組織「交大反到底」負責人之一；1968年畢業分配至上海5703廠工作，曾在市革命委員會專案組工作。文革結束後被判刑8年。
- 張寶林，男，1940年生，受教育程度高中(職業學校)。文革前是上海基礎公司電焊工。文革初期造反，是「工總司」委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上海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第一任負責人。文革結束後被判刑7年。
- 張伯生，男，1936年生。文革前是人民電機廠工人、工會小組長。文革初期造反，參加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籌建，是「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工總司」成立宣言起草者、「工總司」委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和第五屆委員會委員、上海第一機電工業局革委會委員、靜安區革委會委員、人民電機廠革委會副主任和廠工會副主任。文革結束後被解除所有職務。
- 張敬標，文革前是中共楊浦區委書記，中共黨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市革會地區組負責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文革結束後受留黨察看處分。現已去世。
- 章樹琨，男，受教育程度初中。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工業政治部幹部，中共黨員。文革中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哲學組組長、寫作組核心成員。文革結束後被取消中共黨籍。
- 張宜愛，男，1913-2002年，文革前是上海警備區副司令員、少將，中共黨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市革會郊區組負責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中共上海警備區常委。文革結束後被開除中共黨籍，剝奪軍銜和勳章。
- 趙全國，男，1940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市紅衛兵組織「紅上司」負責人；1967年因一月奪權被關押，後雖放出，但畢業後沒有被分配工作。

周谷聲，受教育程度大學。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是復旦大學物理二系學生。文革初期造反，是市紅衛兵組織「炮司」負責人，1967年初參與「1.28炮打張春橋事件」。1970年因「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案被關押。文革結束後獲平反。

朱錫琪，男1933年生，受教育程度成人夜校初中，文革前是《文匯報》社文藝部體育記者，中共黨員。文革初期發起《文匯報》奪權；文革中歷任上海人民公社核心成員、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長。1968年因參與「4.12炮打張春橋事件」被關押3年。文革結束後1977年獲平反，1984年又被重作結論，開除中共黨籍。

朱永嘉，男，1931年生，受教育程度大學，文革前是復旦大學歷史系講師、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歷史組組長，中共黨員。文革中歷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題寫作組成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大批判寫作組組長、《紅旗》雜誌上海組稿小組主要負責人、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主要負責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中共上海市委委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文革結束後被判刑14年。

注：所有文革結束後被判刑者，如是中共黨員，都被開除中共黨籍，若是軍人，還被剝奪軍銜和勳章。

附錄三

本書中提及的文革中上海全市性群眾組織的情況

學生紅衛兵組織

- | | |
|-------|--|
| 簡稱 | 上紅總部 |
| 全稱 | 上海市紅衛兵總部 |
| 成立時間 | 1966年9月12日下午3時在人民廣場成立，是上海最早的紅衛兵組織。 |
| 參加對象 | 以幹部子女較多的上海南洋模範中學、上海市第51中學、上海市第54中學、上海第二女子中學等學校的保守派紅衛兵組織為骨幹成員，在各區和各縣設分部。 |
| 主要活動 | 反對衝擊上海市委和各級黨委；籌備時期的1966年8月底至9月初，曾組織過全市性大抄家；1966年11月的《解放日報》事件中，下面的成員組織曾去報社門口抗議紅革會佔領解放日報社。 |
| 辦公地點 | 最初在人民廣場未及啟用的市人委大樓，1966年10月4日搬入徐家匯天主教堂。 |
| 主要負責人 | 上海南洋模範中學高中學生韓烽火、李愛民。 |
| 所辦刊物 | 《紅衛兵》報，鉛印4開，1966年9月16日創刊；自第4號始，與上紅大專總部合辦，1966年12月17日停刊，共出16號。 |
| 備注 | 1967年月初「康平路事件」後無形解散。 |
| 簡稱 | 上紅大專總部 |
| 全稱 | 上海市紅衛兵大專院校總部 |
| 成立時間 | 1966年9月26日成立。 |
| 參加對象 | 以華東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外語學院、上海戲劇學院等大學的保守派紅衛兵組織為骨幹成員，全市其他高校保守派紅衛兵組織都有參加。 |
| 主要活動 | 反對衝擊上海市委和各級黨委；是各大學批判「牛鬼蛇神」的積極組織或參與者。 |
| 辦公地點 | 陝西北路500號團校。 |
| 主要負責人 | 華東師範大學學生、原上海市學生聯合會副主席李本榮。 |
| 所辦刊物 | 與「上紅總部」合辦《紅衛兵》報(自第4期起)。 |
| 備注 | 1966年12月20日被復旦大學和上海第一醫學院的造反派紅衛兵查封。 |

- 簡稱 紅西南
- 全稱 紅衛兵上海西南地區指揮部
- 成立時間 1966年9月29日在陝西南路上的上海體育館成立。
- 參加對象 徐匯、盧灣、長寧、上海縣等上海西區的部分中學造反派紅衛兵組織，以上海中學、上海市第51中學以及上海市第64中學為骨幹成員。
- 主要活動 發動1967年1月27日至2月初的上海晚報事件；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 辦公地點 最初在烏魯木齊南路154號、漕溪北路徐匯區教育工廠，後來搬到汾陽路汾陽中學。
- 主要負責人 上海中學高中學生李曉明。
- 所辦刊物
1. 《中學運動》報，鉛印4開，1967年3月15日創刊(與紅東北、紅中技合辦)，至1967年6月5日共出9期。
 2. 《紅衛兵戰地》(紅西南大批判小組辦)，鉛印16開，1967年8月6日創刊。
- 備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
- 簡稱 紅東北
- 全稱 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上海東北地區指揮部
- 成立時間 1966年11月13日。
- 參加對象 閘北、虹口、楊浦、寶山、川沙等上海東北地區和縣中學的部分造反派紅衛兵組織。
- 主要活動 是1966年11月和12月造反派三次衝擊上海市委的主力軍。參與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康平路事件，以及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 辦公地點 東體育會路119號
- 主要負責人 復旦附中高中學生夏寧。
- 所辦刊物
1. 《毛澤東主義戰報》，鉛印4開，1966年12月13日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1月30日第2期。
 2. 《中學運動》，與紅西南、紅中技合辦。(見「紅西南」條目)
- 備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
- 簡稱 紅反會
- 全稱 紅衛兵上海市革命造反委員會
- 成立時間 1966年10月6日。
- 參加對象 部分中學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
-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 辦公地點 烏魯木齊中路166弄10號
- 主要負責人 上海輕工業學校學生高健武。

- 所辦刊物
1. 《造反有理》，鉛印4開，1966年10月29日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1月17日出版第7期。
 2. 《文革通訊》，鉛印16開，1966年底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9月20日第92期。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紅上司

全 稱 紅衛兵上海司令部

成立時間 1966年10月11日。

參加對象 骨幹成員為光明中學、交大附中、向明中學、徐匯中學、市西中學、復旦附中等中學的部分造反派紅衛兵組織。

主要活動 參與解放日報事件，以及1967年一月奪權。

辦公地點 威海路、黃陂路口。

主要負責人 交大附中高中學生邵企敏。

- 所辦刊物
1. 《紅衛戰報》，鉛印，初期多為4開，《解放日報》事件後改為對開；第1期由紅革會單獨主編；第2期起，改由紅革會和紅上司合辦；第21期起，由紅上司單獨主辦。作為紅上司的小報共出41期（第1期由紅革會單獨出版）。自1967年7月第42期始，被上海市革會改作上海市中等學校紅代會(籌)的機關報。
 2. 《紅大刀》，1967年3月創刊(與工總司物質戰線聯絡組合辦)。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紅中技

全 稱 紅衛兵上海中專技校革命造反委員會

參加對象 上海中等技術學校的部分造反派紅衛兵組織。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辦公地點 永嘉路166弄5號。

主要負責人 某中專學校學生顧瑞康。

所辦刊物 《中學運動》，與紅東北、紅西南合辦(見「紅西南」條目)。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中申會

全 稱 上海中學運動申聯會

成立時間 1967年7月左右。

參加對象 與正在籌備的市中學紅代會觀點不同的學校紅衛兵組織。

主要活動	1967年下半年組織演出多場大型原創歌舞劇《前進，毛主席的紅衛兵》，編輯影印版《紅衛戰報》並刊登文章《一切為了九大》。
辦公地點	沒有固定辦公地點。
主要負責人	只設聯絡員，不設主要負責人。
所辦刊物	1. 《紅衛戰報》，對開手寫影印版，1968年1月20日和2月15日，共出2期。（《紅衛戰報》被市紅代會接收後，原《紅衛戰報》的紅上司編輯因為不甘心報紙被市紅代會接收，另外以「紅衛戰報編輯部」的名義，印發了4期手刻油印版的《紅衛戰報》，刊號從「總第43期」到「總第46期」。中串會的影印版《紅衛戰報》沿用紅上司的油印版的這個刊號，為「總第48期」、「總第49期」。） 2. 《中學交流》，鉛印16開，1967年9月3日創刊。
備 注	1968年4月，因文章《一切為了九大》被批判，無形解散。
簡 稱	紅革會
全 稱	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
成立時間	1966年10月12日在陝西南路上的上海體育館成立。
參加對象	骨幹成員為復旦大學、上海師範學院、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上海水產學院、上海機械學院、上海交通大學等15所高等院校的部分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及教職員工組織，後來也吸收中學紅衛兵組織。成員最多時號稱十幾萬。
主要活動	發起1966年11月的解放日報事件，發起1967年1月24日的奪市、區黨政機構以及華東局權的行動，發起1967年1.28炮打張春橋事件。
辦公地點	最初在南京西路靠青海路一個弄堂中的一幢資本家房子中，1967年1月搬往復興中路靠近汾陽路的1367號。
主要負責人	復旦大學學生勞元一和馬立新，上海師範學院學生學生李功佐和繆財生，上海交通大學學生鄭駿，華東師範大學學生劉浩德，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生戴定憲。
所辦刊物	1. 《紅衛戰報》，第1期由紅革會單獨主辦，第2期始與紅上司合辦，第21期始不再有紅革會參加。 2. 《上海紅革會》，鉛印4開，1967年9月18日創刊；目前所見另有1967年8月26日上海紅革會戰士赴漢聯絡站和武漢鋼二司、1967年9月7日與武漢鋼二司武漢水運工程學院合辦專刊共2期。 3. 《紅革會通訊》，鉛印16開，1967年9月16日第1輯，紅革會大批判聯絡站動態組編。 4. 《紅衛兵快訊》，鉛印16開，由紅革會《紅衛兵快訊》、《中學文革通訊》編輯部聯合主辦，1967年9月10日創刊。

簡 稱 上三司
全 稱 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成立時間 1966年11月22日在文化廣場成立。
參加對象 除上海戲劇學院和部分大學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外，較為中學造反派紅衛兵組織。
主要活動 1967年1月15日和1月22日兩次接管上海市委。
辦公地點 上海戲劇學院內。
主要負責人 上海戲劇學院學生趙全國。
所辦刊物 《革命造反報》，鉛印4開。1966年11月24日先出特刊，12月15日創刊，至1966年12月30日出版第2期(從第3期開始，由紅三司主辦。)
備 注 1966年12月22日分裂為上三司和紅三司兩個組織。1967年2月因主要負責人趙全國被抓，組織無形解散。

簡 稱 紅三司
全 稱 紅衛兵上海第三司令部(又稱「紅衛兵上海市革命造反司令部」)
成立時間 1966年12月22日從紅上司分裂成出來，在文化廣場成立。
參加對象 骨幹成員為復旦大學、上海科技大學、上海第一醫學院、上海第二醫學院、華東政法學院、上海財經學院等大學的部分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及教職員工組織，後來也吸收中學紅衛兵組織。成員約二、三萬。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發動1967年1月接管上海市公安局，參與1967年1.28炮打張春橋事件。
辦公地點 復旦大學內。
主要負責人 復旦大學學生安文江。
所辦刊物 1. 《革命造反報》，最初的特刊、創刊號和第2期都由紅上司主辦，1967年1月30日，紅三司重新出版《革命造反報》第2期，鉛印8開，由紅三司主辦，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7月15日第12期。
2. 《反逆流戰報》，鉛印，4開，1967年8月7日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9月第8期。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炮司
全 稱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
成立時間 1966年11月3日。
參加對象 主要為上海復旦大學、華東紡織工學院、第二醫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科技大學的部分造反派紅衛兵組織，也有部分中學造反派紅衛兵組織。

主要活動 1966年11月幫助籌建工總司，參與安亭事件，發動1967年1.28炮打張春橋事件。

辦公地點 巨鹿路691號。

主要負責人 復旦大學學生周谷聲。中學部負責人為上海市東中學高二學生紅鷗(真名侯美度)。

所辦刊物 1. 《工學運動》，鉛印16開，1966年9月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3月第7期。
2. 《炮聯快報》，鉛印16開。

簡 稱 同濟東方紅

全 稱 上海同濟大學東方紅公社

成立時間 1966年10月15日。

參加對象 同濟大學大部分造反派學生及教職員工，後來也吸收上海的中學生。

主要活動 參加1967年初的排除碼頭40萬噸積壓物資的行動，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辦公地點 同濟大學校園內南樓311室。

主要負責人 1966年底以後為同濟大學學生陳敢峰(原名陳錦霖)。

所辦刊物 1. 《東方紅》報，鉛印4開，1966年12月26日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8年8月第144期。
2. 《教育革命通訊》。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交大反到底

全 稱 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

成立時間 1966年10月18日。

參加對象 上海交通大學部分造反派學生及教職員工。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辦公地點 交通大學校園內體身館。

主要負責人 交大學生嚴步東(真名嚴惠林)。

所辦刊物 1. 《反到底》報，鉛印4開，1967年1月8日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9月第23期(含一期聯合版)。
2. 《反到底通訊》，鉛印十六開，1967年4月創刊，至1967年9月終刊，共出55期。
3. 《反到底朝陽通訊》，鉛印16開。1967年8月19日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9月20日第5期。
4. 《反到底東風通訊》，鉛印16開。
5. 《反到底、井岡山快訊》，鉛印16開，1967年9月15日創刊。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復旦紅革會

全 稱 紅衛兵復旦大學革命委員會

成立時間 1966年10月5日在復旦大學登輝堂成立。

參加對象 復旦大學部分造反派紅衛兵以及師生員工。

主要活動 發起1966年11月的解放日報事件，發起1967年1.28炮打張春橋事件，綁架市委機關聯絡站負責人徐景賢。

辦公地點 復旦大學校園內紅旗樓。

主要負責人 復旦大學學生勞元一、馬立新。

所辦刊物 《紅衛兵》，手刻油印16開，1966年11月創刊，1967年元旦停刊，共出52期。最初由新聞系「中南海警衛兵團」主辦，後由校紅革會調派人員接辦，成為復旦紅革會機關報。

簡 稱 新師大公社

全 稱 華東師範大學新師大公社

成立時間 1967年1月23日。

參加對象 華師大部分造反派學生及教職員工。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辦公地點 華東師範大學校園內。

主要負責人 華師大學生劉浩德。

所辦刊物

1. 《新師大》，鉛印4開，1967年1月10日創刊。
2. 《新師大通訊》，最初為油印，後改為鉛印，16開，1967年7月2日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9月19日第88期。
3. 《新師大戰報》，鉛印，4開，1967年9月15日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8年10月14日第94期。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二軍大紅縱

全 稱 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

成立時間 1966年8月左右。

參加對象 第二軍醫大學部分造反派學生及教職員工。

主要活動 向毛澤東要求軍隊院校參加文革，造解放軍總後勤部反，揪鬥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辦公地點 第二軍醫大學校園內。

主要負責人 1966年底以後為二軍大學生錢興莎。

所辦刊物 《紅色造反報》，鉛印4開，1966年10月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第53期。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二軍大紅旗

全 稱 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紅旗戰鬥團

成立時間 1966年8月左右。

參加對象 第二軍醫大學部分保守派學生及教職員工。

主要活動 發起1968年4.12炮打張春橋事件。

辦公地點 第二軍醫大學校園內。

主要負責人 第二軍醫大學學生龍書雅。

所辦刊物 《紅旗戰報》，鉛印4開，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9月12日第71期。

簡 稱 赤革會

全 稱 赤衛軍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

主要負責人 常軍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所辦刊物 1.《赤衛軍》，鉛印4開，1967年2月6日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6月共出14期。

2.《赤衛軍簡訊》，打字油印16開，目前所見出版至第73期。

3.《赤衛軍戰報》，打字油印16開。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

全 稱 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

成立時間 1966年10月底。

參加對象 北京南下串聯學生。

主要活動 1966年10月以後的衝擊中共上海市委，1966年11月幫助籌建工總司，參與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康平路事件，以及1967年上海的一月奪權。

辦公地點 愚園路311號。

主要負責人 北京地質學院學生姜濤。

所辦刊物 《首都紅衛兵》(上海版)，鉛印4開，1967年1月1日創刊，1967年3月6日第5停刊；目前所見出版至第8期。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1967年初撤銷組織回北京。

- 簡 稱 清華井冈山
全 稱 清華大學井冈山兵團駐滬聯絡站
成立時間 1966年12月中旬。
辦公地點 南昌路69弄5號。
所辦刊物 《清華通訊》，鉛印4開，1967年2月22日創刊。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1967年初撤銷組織回北京。
- 簡 稱 新北大
全 稱 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
成立時間 1966年12月中旬。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辦公地點 肇家浜路687弄7號。
所辦刊物 《新北大評論》(上海)，鉛印4開，1967年1月11日創刊；目前所見至1967年1月20日第2期。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1967年初撤銷組織回北京。
- 簡 稱 北航紅旗
全 稱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駐滬聯絡站
成立時間 1966年10月25日。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辦公地點 餘慶路161號。
所辦刊物 《紅旗》(上海版)，鉛印4開，1967年1月1日創刊，1967年2月7日停刊，共出7期。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1967年初撤銷組織回北京。
- 簡 稱 西軍電
全 稱 西安軍事電訊軍事工程學院文化革命臨時委員會駐滬聯絡站
成立時間 1967年1月初。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所辦刊物 《新軍電》，鉛印4開，1967年2月1日創刊。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1967年初撤銷組織回西安。
- 簡 稱 哈軍工紅色聯絡站
全 稱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駐滬聯絡站
成立時間 1966年11月初。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辦公地點	巨鹿路687弄8號。
所辦刊物	《紅色造反報》，鉛印4開，1967年1月6日創刊，1967年2月28日停刊，共出9期。 1967年9月1日，又曾出復刊第1期。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1967年初撤銷組織回哈爾濱。

職工群眾組織

簡 稱	赤衛隊
全 稱	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
成立時間	1966年11月23日，在楊浦區平涼路526號中共楊浦區委會議室成立「赤衛隊」總部(籌)；1966年12月6日，「赤衛隊」總部(籌)在人民廣場舉行正式成立大會。
參加對象	各工廠反對衝擊市委和各級黨委的保守派工人組織。最多時人數號稱80萬。
主要活動	反對衝擊上海市委，反對紅革會佔領解放日報社、發動衝突工總司的色織24廠事件，參與1966年底的康平路事件。
辦公地點	最初在外灘中山東一路市總工會辦公大樓103室，不久搬往地處開北區的番瓜弄47號，後來又搬往皋蘭路接待站。
主要負責人	上海鐵路分局調度室副主任王玉璽。
所辦刊物	《革命戰鬥快報》，鉛印對開，1966年12月6日創刊，目前所見至1966年12月9日共出2期。計發行24萬份。
備 注	1966年12月底康平路事件後被強行解散。
簡 稱	工總司
全 稱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成立時間	1966年11月9日。
參加對象	各工廠的工人造反派組織，後來也在文教科研等單位發展組織。
主要活動	發動1966年安亭事件，參與解放日報、發動康平路事件，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發動1967年砸聯司武鬥。
辦公地點	剛成立時暫借在巨鹿路691號「炮司」的辦公處；不久搬到復興中路1350弄6號，1966年12月搬遷至杭州路690號的一所小學以及南京西路上海市政協辦公樓內；1967年1月搬往中山東一路14號原上海市總工會辦公大樓。
主要負責人	國營第17棉紡織廠保衛科幹事王洪文。

- 所辦刊物 1. 《工人造反報》，鉛印對開，1966年12月28日創刊，1971年4月9日，至第445期時停刊。
2. 《一月風暴》雜誌(與版聯合辦)，鉛印16開，1967年6月創刊，1968年2月停刊，共出6期。
3. 《一月風暴叢書》(與版聯合辦)，鉛印32開，共出2本。
4. 《工人造反報通訊》，鉛印16開，1967年9月21日創刊。
5. 《工總司簡報》，鉛印16開，目前所見出版至第126期。
6. 《造反文選》，鉛印16開，1967年創刊。
-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1972年，工總司自上而下改名為上海市工會，1973年又改名為上海市總工會。
- 簡 稱 一兵團
- 全 稱 工總司北上返滬第一兵團
- 成立時間 1966年安亭事件後不久。
- 參加對象 初期以安亭事件中，從北站乘火車到達南京的一批工人造反派為主。
- 主要活動 1967年1月參加了與籌備中的上海人民公社對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2月參與三兵團、工三司、戰到底等組織反對工總司的大遊行。
- 辦公地點 瑞金二路24號。
- 主要負責人 上海第三鋼鐵廠車間工會工作人員戴祖祥。
- 備 注 1967年2月被解散。
- 簡 稱 二兵團
- 全 稱 工總司北上返滬第二兵團
- 成立時間 1966年安亭事件後不久。
- 參加對象 初期以安亭事件中而步行至蘇州的一批工人造反派為主，後來發展人員，號稱50萬。
- 主要活動 發動起康平路事件，參與1967年1月15日接管上海市委行動；1967年拉起36個組織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與即將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對着幹。1967年2月組織一兵團、三兵團、工三司、戰到底等，聯手反對工總司。
- 辦公地點 最初在徐匯區五原路，後搬往永福路。
- 主要負責人 上海紙漿廠工人耿金章。
- 所辦刊物 《兵團戰報》，4開影印，1967年1月23日創刊。
- 備 注 1967年2月被解散。
- 簡 稱 三兵團

- 全 稱 工總司北上返滬第三兵團
 成立時間 1966年安亭事件後不久。
 參加對象 初期以安亭事件中到達南京的一批工人造反派為主。
 主要活動 1967年1月參加了與籌備中的上海人民公社對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2月參與一兵團、工三司、戰到底等組織反對工總司的大遊行。
 主要負責人 楊光恆。
 所辦刊物 《狂瀾》，鉛印4開，1967年2月2日創刊。
 備 注 1967年2月被解散。
- 簡 稱 工三司(前身稱「鋼鐵兵團」)
 全 稱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
 成立時間 1967年1月7日，沒有開成立大會，只在全市貼成立海報。
 主要活動 1967年1月參加了與籌備中的上海人民公社對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2月參與一兵團、三兵團、戰到底等組織反對工總司的大遊行。
 辦公地點 建國西路9號(但沒有對外掛牌)。
 主要負責人 上海第15無線電廠工人紅夫(真名陳鴻康)。
 備 注 1967年2月被解散。
- 簡 稱 野戰兵團
 全 稱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野戰兵團
 成立時間 1966年12月8日。
 參加對象 主要為臨時工。
 主要活動 1967年1月參加了與籌備中的上海人民公社對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
 辦公地點 沒有固定辦公地點。
 主要負責人 上海絲綢絹紡廠臨時工姜延良。
 所辦刊物 《野戰報》，鉛印4開，1967年2月6日創刊，至1967年3月9日，共出3期。
 備 注 1967年2月15日宣佈與工總司合併(合併後的編輯部署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野戰報》編輯部」)。
- 簡 稱 戰到底
 全 稱 戰到底
 成立時間 1966年12月初解放日報事件中。

主要活動 參加1966年11月的解放日報事件；1967年1月參加了與籌備中的上海人民公社對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2月參與一兵團、三兵團、工三司等組織反對工總司的大遊行。

辦公地點 高安路69弄16號。

主要負責人 上海自行車廠工人孫福祥。

備 注 1967年2月被解散。

簡 稱 鐵聯

全 稱 工總司鐵路聯合指揮部

成立時間 1966年11月16日。

參加對象 上海鐵路系統的部分造反派職工。

主要活動 1967年1月初接管上海鐵路系統；參加1967年初的「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

辦公地點 初期在虹口區山陰路，後來搬往上海鐵路分局辦公大樓。

主要負責人 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工人萬金榮。

所辦刊物 《鐵路工人造反報》，鉛印4開，1967年1月18日創刊，1968年1月停刊，共出74期。

簡 稱 六局聯合指揮部

全 稱 工總司交通六局聯合指揮部

成立時間 1966年12月30日

參加對象 上海鐵路分局、長江航運公司、上海港務局、上海海運局、上海市交通運輸局、上海市郵電局，6個交通運輸系統的局的部分造反派組織。

主要活動 參加1967年初的「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

辦公地點 虹口區多倫路。

主要負責人 萬金榮(代表上海鐵路分局造反派組織)，劉志超(代表上海市郵電局造反派組織)，龔土根(代表上海海運局造反派組織)，龔炳榮(代表上海交通運輸局造反派組織)，錢永明(代表長江航運局造反派組織)，梁飛(代表上海港務局造反派組織)。

簡 稱 火線指揮部(或稱「火線」)

全 稱 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

成立時間 1967年1月7日。

參加對象 由工總司、紅革會、炮司、上三司、同濟東方紅、上體司等造反派組織共40多人組成。

主要活動 疏通上海的交通運輸尤其是鐵路運輸、疏散上海港口積壓物資、組織1967年春節的市場供應物質，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 辦公地點 最初設在上海海運局辦公大樓2樓202室，兩天後搬往福州路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三樓。
- 主要負責人 上海重型機床廠廠部秘書王明龍、上海鐵路裝卸機械修理廠工人謝鵬飛。
- 所辦刊物 1. 《簡報》，16開手刻油印，不定期共出二個多星期。
2. 《情況》，16開手刻油印，不定期共出二個多星期。
-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1967年3月市革會成立後解散。
- 簡 稱 反經總部
- 全 稱 上海市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
- 成立時間 1967年1月10日。
- 參加對象 由紅衛兵、銀行工作人員、機關幹部等70多人組成。
- 主要活動 制止1966年底和1967年初的經濟主義風潮：動員返滬人員回鄉或回原地、說服退款還錢、組織人員疏散碼頭積壓物資和幫助郊縣農場搶收農作物。
- 辦公地點 市工人文化宮5樓。
- 備 注 1967年3月市革會成立後解散。
- 簡 稱 上柴東方紅
- 全 稱 工總司上海柴油機廠東方紅總部
- 成立時間 1966年10月31日。
- 參加對象 上海柴油機廠部分造反派職工。
- 主要活動 與上柴廠另一群眾組織聯司對立和衝突，以及1967年8月4日的砸聯司武鬥。
- 辦公地點 上海柴油機廠內。
- 主要負責人 上海柴油機廠技術員張羽。
- 所辦刊物 《東方紅報》，鉛印對開，1967年7月20日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第2期。
- 簡 稱 聯司
- 全 稱 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司司令部
- 成立時間 1967年1月10日。
- 參加對象 上海柴油機廠部分造反派職工。
- 主要活動 與上柴廠另一群眾組織東方紅對立和衝突。
- 辦公地點 上海柴油機廠內。
- 主要負責人 上柴油廠技術員楊仲池。

- 所辦刊物 《聯司戰報》，鉛印16開，1967年6月底創刊，共出6期。
- 備 注 1967年8月4日因被以工總司為首的上海造反派組織衝砸而不復存在。
- 簡 稱 支聯站
- 全 稱 上海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聯司革命行動聯絡站
- 成立時間 1967年6月14日於人民廣場。
- 參加對象 沒有形成統一組織，都是各自為戰的對上柴「聯司」持同情和支持觀點者和群眾組織。
- 主要活動 支持上柴聯司，反對市革會和工總司。
- 辦公地點 沒有辦公地點。
- 主要負責人 沒有負責人。但上海汽車配件廠工人陳卜昌、上海交通大學助教全向東對全市的支聯站較有影響。
- 備 注 原打算在1967年7月成立全市性統一組織，但在7月31日開會討論時，與會人員全部被工總司抓捕，無形解散。
- 簡 稱 紅工司(又稱「紅工」)
- 全 稱 上海市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 成立時間 1966年11月15日在華山中學召開成立大會，當時名稱為上海市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不久改名為紅工司。
- 參加對象 上海的部分臨時工、外包工、合同工。
- 主要活動 要求享有與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工廠工人同等的政治待遇，要求不因參加文革而被解僱的工作保障。
- 辦公地點 對外辦公地點在烏魯木齊中路11弄11號，對內辦公地點在愚園路987號。
- 主要負責人 外包工費敏章。
- 所辦刊物 《紅工戰報》，鉛印4開，1967年2月6日創刊，共出2期。
- 備 注 1967年初被作為經濟主義組織解散。
- 簡 稱 紅衛軍
- 全 稱 上海市革命轉業、復員、殘疾軍人紅衛軍司令部
(1966年12月3日中央軍委發文不准復員退伍軍人單獨成立組織，紅衛軍遂於12月24日改名「上海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紅衛軍指揮部」，但簡稱不變。)
- 成立時間 1966年10月底。
- 參加對象 部分復原、退伍及轉業軍人。
- 辦公地點 華山路江蘇路口。
- 主要負責人 上海醫藥公司幹部俞名權。

- 所辦刊物 《紅衛軍》，鉛印4開，1967年1月26日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2月3日第2期。
- 備 注 1967年3月，被工總司等35個組織宣佈為「非法組織」而解散。
- 簡 稱 電業戰士
- 全 稱 電業戰士
- 成立時間 1967年初。
- 參加對象 主要為電業系統的局、公司機關和研究所的部分造反派組織。
- 主要活動 1967年8月8日與電業總部的武鬥。
- 辦公地點 華東電管局大樓內。
- 主要負責人 技術員劉漢民。
- 所辦刊物 《井岡山》，鉛印16開，1967年9月15日創刊。
- 簡 稱 電業總部
- 全 稱 工總司上海電業系統聯絡總部
- 成立時間 1967年6月。
- 參加對象 主要為楊樹浦發電廠、吳涇熱電廠等發電廠的部分造反派組織。
- 主要活動 1967年8月8日與電業戰士的武鬥。
- 辦公地點 華東電管局大樓內。
- 主要負責人 楊樹浦發電廠某部門黨支部書記張國富。
- 簡 稱 機關聯絡站
- 全 稱 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
- 成立時間 1866年12月18日在人民廣場召開成立大會。
- 參加對象 由海市委、市人委、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及其所屬部門的部分造反組織聯合組成。
-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作為張春橋、姚文元的工作班子直到市革會成立。
- 辦公地點 地處的淮海中路上海市委黨校。
- 主要負責人 上海市委宣傳部幹部、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
-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 簡 稱 新革會
- 全 稱 上海新聞界革命造反委員會
- 成立時間 1966年12月21日在市體育館召開成立大會。

參加對象 由解放日報、文匯報、支部生活、新華社上海分社和復旦大學新聞系的部分造反組織聯合組成。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辦公地點 文匯報社內。

主要負責人 文匯報記者朱錫琪。

所辦刊物 1. 《新聞戰士》，鉛印4開，1966年12月26日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1月5日出第2期。
2. 《新聞戰報》。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廣革會

全 稱 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廣播戰士革命造反委員會

主要負責人 王兆洪

簡 稱 上藝司

全 稱 上海藝術院校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成立時間 1966年10月19日。

參加對象 主要由上海青年話劇團、上海人藝、上海越劇院、上海雜技團、上海市舞蹈學校、上海紅霞歌舞團及三個電影廠的部分造反組織聯合組成。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辦公地點 海燕電影製片廠內。

主要負責人 海燕電影製片廠燈光工人劉軍一。

所辦刊物 1. 《風雷激》，鉛印4開，1966年12月28日創刊；自第2期始更名《文藝戰報》；目前所見出版至1969年4月102期。
2. 《文藝戰士》，鉛印，4開，1966年12月17日創刊。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工司藝

全 稱 工總司直屬文藝指揮部

主要負責人 上海歌劇院作曲指揮蕭白

簡 稱 上醫司

全 稱 上海醫務界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成立時間 1966年12月。

參加對象 醫務界部分造反派組織。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主要負責人 腫瘤醫院幹部陳廣煊。
所辦刊物 《紅醫戰報》，鉛印4開，1966年2月28日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6月23日第10期。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工司衛
全 稱 工總司衛生系統聯絡站

簡 稱 版司
全 稱 上海出版系統革命造反司令部
成立時間 1966年12月11日。
參加對象 上海出版系統部分造反派組織。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參與1967年5月至8月與版聯的多次武鬥。
辦公地點 紹興路7號上海市出版局內。
主要負責人 印刷研究所技術員朱伯生。
所辦刊物 《造反》，鉛印4開，1966年12月14日創刊，至1968年9月停刊，共出60期(另有專刊3期)。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版聯
全 稱 工總司上海出版系統總聯絡站
成立時間 1967年3月7日。
參加對象 以上海出版系統的印刷廠以及工業系統印刷廠的部分工人造反派組織為主體。
主要活動 1967年5月至8月與版司的多次武鬥。
主要負責人 夏東勝。
所辦刊物 1. 《萬山紅》畫刊，鉛印4開，1967年3月7日創刊。
2. 《動態》，鉛印，16開，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9月9日第104期。

簡 稱 科司
全 稱 上海市科技單位造反總司令部
成立時間 1966年12月19日。
參加對象 主要為上海管轄的60至80個研究所的部分造反派組織。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辦公地點 科學會堂。
主要負責人 上海無線電6廠技術員林光遠。

所辦刊物 《簡報》，鉛印16開；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9月12日第72期。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科總

全 稱 上海市科技戰線聯絡總部

成立時間 1967年2月24日。

辦公地點 岳陽路319號中國科學院大院內7號樓。

所辦刊物 《上海科技戰報》，鉛印16開；1967年6月25日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9月6日第7期。

簡 稱 工司科

全 稱 工總司科技系統聯絡站

簡 稱 教革會

全 稱 上海中等學校教工革命造反委員會

成立時間 1966年12月31日上午在勞動劇場(天蟾舞台)成立。

參加對象 上海部分中學教師和員工的造反派組織。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主要負責人 比樂中學教師葉木。

所辦刊物 《教育革命》，1967年創刊。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中教司

全 稱 上海中教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參加對象 上海中學教師和員工的部分造反派組織。

所辦刊物 1. 《動態》，1967年3月左右創刊，手刻油印，16開。

2. 《中教造反報》，鉛印4開，1967年3月1日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11月22日，共出16期。

簡 稱 小教司

全 稱 上海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

成立時間 1966年12月12日。

參加對象 以上海民辦小學教師員工中的造反派組織為主體。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要求轉為全民所有制。

主要負責人 長寧區左家宅民辦小學教師楊軍。

所辦刊物 1. 《小教造反報》，鉛印4開，1967年1月20日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5月23日第10期。

2. 《紅小兵》，1967年7月20日創刊。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工司教

全 稱 工總司教工聯絡站

所辦刊物 1. 《教工造反報》，鉛印4開(第1-30期是手刻油印)，1967年2月28日創刊；目前所見出版至1967年3月24日第2期。

2. 《看今朝》(與工總司版聯合辦)，鉛印16開，1967年4月26日創刊，自第7期分為「通訊」和「報刊」兩種；目前所見出版至第100期。

3. 《紅畫兵》，1967年2月左右創刊。目前只見到1期。

簡 稱 上體司

全 稱 上海體育戰線革命造反司令部

成立時間 1966年11月27日在盧灣體育館召開成立大會。

參加對象 職業運動員的部分造反組織。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參與1967年5月30日與工體司的武鬥，參與1967年7月9日與工總司交通運輸局聯絡站的武鬥；組織「上體司治安組」。

辦公地點 南京西路市委大樓。

主要負責人 足球運動員胡永年。

所辦刊物 《體育戰報》，鉛印4開，1967年1月13日創刊，至1969年5月停刊，共出107期。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工體司

全 稱 工總司體育系統聯絡總站

成立時間 1967年初。

參加對象 已經被分配進工廠的部分退役運動員。

主要活動 1967年5月30日與上體司的武鬥。

主要負責人 上海縫紉機廠工人葛海珊。

簡 稱 公革會

全 稱 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

成立時間 1967年1月5日。

- 參加對象 以上海市公安局中的機關幹部造反派為主要成員，後來也在各區縣分局發展成員，以交通警察為多。
- 主要活動 1967年1月11日與紅三司接管上海市公安局；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參與1967年7月26日27日與消革會和義革會的武鬥。
- 辦公地點 建國西路75號市公安局辦公大樓內。
- 主要負責人 上海市公安局經保二科幹部王維章。
- 所辦刊物 《公安戰報》，鉛印4開。1967年2月6日創刊，1967年9月25日停刊，共出25期。
-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
- 簡 稱 人革會
- 全 稱 上海人民警察革命造反委員會
- 成立時間 1967年1月15日。
- 參加對象 最初主要為市局機關幹部的部分造反派組織，後來也發展了許多交通警察。
- 主要負責人 虹口公安分局幹部李忠傑。
-
- 簡 稱 聯合兵團
- 全 稱 最開始時名為「上海市各區(縣)公安局警革命造反聯合兵團」，不久改名為「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聯合兵團」
- 成立時間 1967年1月
- 參加對象 以各區、縣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民警、戶籍警造反派的部分造反派組織為主體。
-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1.28炮打張春橋事件。
- 辦公地點 長寧區公安分局
- 主要負責人 長寧區公安分局幹警宋春生。
-
- 簡 稱 消革會
- 全 稱 上海市消防民警革命造反委員會
- 成立時間 1967年1月27日。
- 參加對象 部分消防民警的造反派組織。
- 主要活動 1967年7月26日27日與公革會的武鬥。
- 主要負責人 大連路消防隊消防車駕駛員吳步林。
-
- 簡 稱 義革會
- 全 稱 上海市消防義務兵革命造反委員會

- 成立時間 1967年。
 參加對象 消部分消防民警的造反派組織。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7月26日27日與公革會的武鬥。
- 簡 稱 司革隊
 全 稱 上海市司法戰線捍衛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派
 成立時間 1966年12月26日。
 參加對象 市中、高級人民法院造反派。
 主要活動 1967年1月11日對上海市中、高級的接管。
 辦公地點 福州路市法院大樓。
- 簡 稱 財聯
 全 稱 上海市財貿系統革命造反派聯絡委員會
 成立時間 1967年1月初。
 參加對象 財貿系統造反派。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主要負責人 南市區土產公司大眾竹器店經理宋有福。
 所辦刊物 《財貿戰士》，鉛印4開，1967年2月18日創刊；自第6期始，更名為《財貿戰報》(與財革會合編)，1968年8月停刊；共出57期(另有專刊3期)。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 簡 稱 財革會
 全 稱 上海財貿系統革命造反派委員會
 成立時間 1967年3月24日。
 參加對象 是「財聯」與工總司在在各區的財貿造反組織大聯合後，建立的組織。
 主要負責人 南市區土產公司大眾竹器店經理宋有福，黃浦區某商店的職工王志品。
 所辦刊物 《財貿戰報》(由財聯的《財貿戰士》更名而來，見「財聯」條目)。
 備 注
- 簡 稱 農司(籌)
 全 稱 上海農民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籌備委員會。
 主要活動 參與1967年1月24日紅革會奪市、區黨政機構以及華東局權的行動；參與1967年上海一月奪權。
 主要負責人 夏桂柏，浦東農村某生產隊的大隊長。

所辦刊物 《滬農造反》，1967年1月26日創刊，鉛印4開，由上海市農業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主辦。至第14期起，更名為《農業戰報》，由上海農口革命造反總部主辦，目前所見出版至1969年3月8日第117期。

備 注 上海人民公社發起單位之一。

簡 稱 支農司

全 稱 上海工人支農回滬革命造反司令部

成立時間 1966年底。

參加對象 主要為1959年至1962年經濟困難時期被動員回鄉的原上海工廠工人。

主要活動 要求戶口遷回上海並安排工作，1967年初曾佔領上海大廈。

備 注 1967年2月底被解散，人員被遣送回原地。

注：

1. 所有的造反派組織的主要活動，都至少參加了本單位或本系統的奪權。為節約篇幅而略。
2. 除了工總司以及「備注」中寫明解散原因者，其他所有組織1968年各級革委會建立後不再存在。
3. 被本表格選入者主要為當時的全市性組織。但同濟東方紅、交大反到底、新師大公社、戲劇學院革命樓、復旦紅革會，以及一些外地大學的駐滬聯絡站，雖然只是大學的組織，但參與了市裏的許多行動，其中許多還是上海人民公社的發起單位，所以選入。
4. 此表格在群眾小報方面的資料收集，得到徐建剛、樊建政和陳國康的大力幫助。

附錄四

文革時期上海市革委會、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總工會、共青團上海市委、上海市婦聯名錄¹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名單²

主任：張春橋^a

第一副主任：姚文元^e

副主任

王洪文^d、徐景賢^b、王秀珍(女)^d、楊富珍(女)^d、馬天水^a、王維國(1971年9月免職)^c、陳啟峰^f、王少庸^a、劉耀宗^c、高志榮^c、周麗琴(女)^g、趙林根(1972年12月免職)^g、周純麟(1970年12月增補)^c、武占魁(1972年11月增補)^c、王一平(1972年11月增補)^a、金祖敏(1972年11月增補)^d、馮國柱(1972年11月增補)^a、陳丕顯(1975年9月增補)^a、楊西光(1975年11月增補)^a。

1 本附錄中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名單，引自《上海市政權系統、地方軍事系統、統一戰線系統、群眾團體系統組織史資料(1949.5-1987.10)》，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中共上海市委名單引自《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組織史資料(1920.8-1987.10)》，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為了弄清楚市革會成員和市委成員的代表性，筆者曾就名單詢問過許多當事人，並查閱了當時的《文匯報》。下面的名單中，每個名字後面的編號是筆者加上的，代表文革前夕的職業身份：^a 老幹部；^b 原機關幹部或基層幹部；^c 軍人；^d 工人；^e 包括教師、醫生、新聞、出版、科研、文化體育等行業的從業者；^f 原紅衛兵；^g 郊縣農村人民公社的幹部或農民；^h 財貿金融行業；未加編號者暫不明。名單中的黃鈺祥是農村人民公社衛生院的醫生，名單排列與郊縣農民一起，但筆者將他歸入第五類；王舉才是青浦酒廠的工人，名單排列與財貿職工一起，但筆者將其歸為第 4 類。

2 1967 年 2 月 5 日至 24 日的「上海人民公社時期」，「公社」委員的名單未上報中央，1967 年 2 月 24 日改名後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員名單幾經調整，直到 1970 年 1 月 23 日才上報中央，3 月 28 日被中央批准。整個文革期間，上海沒有召開過市人民代表大會，市革會領導成員全部由中央直接任免。資料來源《上海市政權系統、地方軍事系統、統一戰線系統、群眾團體系統組織史資料(1949.5-1987.10)》。

常委

馮國柱a、黃濤a、張敬標a、龐夫力a、李元c、李彬山c、張宜愛c、徐耀洲c、鄭長華c、姬應伍c、劉忠朴c、金祖敏d、陳阿大d、葉昌明d、張寶林d、金阿娥(女)d、張梅華d、金傳德d、呂美英(女)g、陸阿其g、陳秀英(女)g、石聖美(女)h、朱錦德d、王承龍b、朱永嘉e、艾玲(女)a、于會泳e、陸榮林e、劉浩德f、嚴步東f、郭忠業(1972年11月增補)a、陳新發(1972年11月增補)d、黃金海(1972年11月增補)d、王成龍(1972年11月增補)d、汪湘君(女, 1972年11月增補)d、張美娟(女, 1972年11月增補)e、楊小兵(1972年11月增補)f、羅毅(1972年11月增補)a、江嵐(1972年11月增補)a、關建(女, 1972年11月增補)a、張振亞(1972年11月增補)a、楊序昭(1972年11月增補)a、王景(1972年11月增補)a。

市革委會委員

續中一a、王樂三a、郭忠業a、白游標a、彭璞a、曲力(女)a、余厚方b、王慰農b、于興洲b、王德佐b、陳耀光b、鞠鴻業b、尹順生b、徐海濤c、申乃清c、韓增春c、吳立義c、王立和c、王傳友c、沈玉英(女)c、張傳富c、王柱書c、林平漢c、王穎暹c、周正美c、方耀華c、韓玉芬(女)c、黃金海d、耿金章d、王成龍d、繆南生d、馬振龍d、戚榮繁d、徐美英(女)d、汪湘君(女)d、謝鵬飛d、傅世而d、梁飛d、劉志超d、包興祥d、黃中林d、郭三珍(女)d、陳新發d、唐文蘭(女)d、張文連d、陳筱根d、宋文傑d、吳懷忠d、李文蘭(女)d、張勤d、張生堂d、楊懷遠d、徐殿宏d、李連智d、李國華d、宋世萍(女)d、莊士福d、張志然d、朱大先d、潘國平d、陸順龍g、金佩華g、鮑洪英(女)g、王章龍g、黃鈺祥e、韓妙根g、王安石g、方水仙(女)、楊道雲g、莊品華(女)g、陸明寶(女)g、沈品章g、呂燕華(女)g、龔麗琰(女)g、倪伯森g、朱菊英(女)g、孟慶傑f、楊小兵f、繆財生f、葉定海f、宋愛武(女)f、盧大保h、陶柳雲h、衛克珍(女)h、王舉才d、周軻英(女)h、劉翼瓏h、錢祥甫h、馬士龍h、方靜(女)h、戴金榮h、宋有福h、賀月仙(女)b、張美娟(女)e、李麗芳(女)e、李國良e、劉貴琴(女)e、胡永年e、陳廣煊e、葉柏順e、陳中偉e、俞茂華(女)e、李國群e、胡世全e、陳強e、張冬娣(女)、羅毅(1972年11月增補)a、江嵐(1972年11月增補)a、關建(女, 1972年11月增補)a、張振亞(1972年11月增補)a、楊序昭(1972年11月增補)a、王景(1972年11月增補)a。

中共上海市委員會名單³

市委第一書記：張春橋a

市委第二書記：姚文元e

3 由1971年1月4日至10日召開的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會大會產生。

市委書記(5名)

王洪文d、馬天水a、周純麟c、徐景賢b、王秀珍d

市委常委(16名)

張春橋a、姚文元e、王洪文d、馬天水a、周純麟c、徐景賢b、王秀珍(女)d、王少庸a、王維國c、馮國柱a、張宜愛c、張敬標a、楊富珍(女)d、金祖敏d、高志榮c、黃濤a。

市委委員(59名)

馬天水a、馬秀英(女)d、于會泳e、王少庸a、王秀珍(女)d、王洪文d、王維國c、王德佐d、方耀華c、石聖美(女)h、馮國柱a、曲力(女)a、江嵐a、劉傑a、劉忠樸c、劉耀宗c、朱永嘉e、朱錦德d、呂美英(女)g、李元、李鈞、李彬山c、杜彪c、張勤b、張宜愛c、張春橋a、張梅華d、張敬標a、張輯五a、陳阿大d、陳秀英(女)g、陳敢峰f、陳新發d、汪明章d、楊富珍(女)d、金英(女)b、金仲元d、金傳德d、金阿娥(女)d、金祖敏d、周麗琴(女)g、周連喜d、周純麟c、龐夫力a、鄭長華a、孟增林d、姚文元e、胡世全e、施國華d、趙林根g、高志榮c、郭忠業c、徐海濤c、徐景賢b、徐耀洲c、康莊c、黃濤a、姬應伍c、韓增春c。

市委候補委員(17名)

馬玉霖b、王振華c、王穎暹c、朱大先d、李文蘭(女)d、李阿桂(女)、吳立義c、張文連d、張華明c、張震春、沈品章g、俞連珠(女)d、黃根海、彭璞a、鮑復、蘭文臣a、蔡寶賢。

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核心成員名單⁴

負責人：朱永嘉。

核心成員：朱永嘉、王知常、蕭木(1973年調北京)、王紹璽(1973年增補)、陳冀德(1976年6月增補)、章樹焜(1976年6月增補)、顧澄海(1976年6月增補)。

4 這個名單引自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1981年《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罪證材料附件》，並經朱永嘉、蕭木核實。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委員會名單⁵

常委(5名)

王洪文、潘國平、陳阿大、葉昌明、蔣周法。

委員(39名)

王秀珍(女)、金祖敏、張寶林、黃金海、戴立清、王明龍、王勝利、王成龍、徐美英(女)、耿金章、馬振龍、岑麒麟、繆南生、倪叔英、邵智慧、徐文豹、曹禮堂k、邵濟宏、施善林、沈於和k、王惠祿k、徐妙林、張惠財k、左秋根、蔣才喜、袁松柏、蔡康裕、曲世和、蔣善根、劉廣德k、康正勤、卞強明、蔡雲龍、徐學德、戚榮繁j、楊富珍(女)j、周林妹(女)j、孟招弟(女)、張伯生。

上海市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名單⁶

主任：王洪文。

副主任(6名)：王秀珍(女)、金祖敏、楊富珍(女)、陳阿大、葉昌明、沈涵。

常委(20名)

黃金海、戴立清、王明龍、王成龍、汪湘君(女)、馬振龍、張寶林、周宏寶、施尚英、印玉泉、劉金堂、干玉娥(女)、金傳德、曹征鳳(女)、董海棠、史桂昌、孫玉鳳(女)、何士雅(女)、董光正、潘國平。

5 由1967年12月3日至5日召開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會議」產生。1972年工總司改名為上海市工代會，1973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追認這個1967年12月的工總司委員會為上海市總工會第四屆委員會。資料來源上海市總工會檔案，以及葉昌明提供。

名字後面的字母是筆者加上的，j是勞模或先進人物代表；k是先進工廠的代表，或有影響的工廠代表，例如劉廣德，是安亭的上海無線電專用機械廠代表，這個廠是安亭事件時張春橋與工總司談判所在地。未加標注者，都是工人造反派，有較早造反的，也有後來造反的。

6 由1973年2月12日至17日召開的共青團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會產生。資料來源《上海市政權系統、地方軍事系統、統一戰線系統、群眾團體系統組織史資料(1949.5-1987.10)》。

委員(131名)

馬文根、馬先如、王月珍(女)、王建華(女)、王腓利、王惠祿、左秋根、劉招弟(女)、孫順業、陳忠海、張生堂、張禮銘、張秀清(女)、張國權、楊寶才、唐文蘭(女)、倪淑英、康正勤、黃文海、曹禮堂、崔世金、蔣才喜、蔣颯、繆南生、王林鶴、方靜(女)、葉麗雲(女)、湯長林、楊匯芬(女)、祁和坤、周林妹(女)、施善林、費海榮、柴雄昌、顧和林、倪海寶(女)、戚榮繁、程德旺、王迎春、宋有福、岑麒麟、蘇桂珍(女)、余立新、周妙興、胡要芬(女)、耿金章、徐美英(女)、陳杏興、陳鴻仙、陳鴻寶、陳福弟、李愛寶(女)、吳連科、呂洪達、嚴正、張永泉、邱才裕、張麗香(女)、張國鈞、張雪妹(女)、張惠財、沈玉妹(女)、沈關松、沈伯基、沈鴻順、周麗麗(女)、鄭月琴(女)、鄭金英(女)、金生根、金森林、范雲虎、俞秀珍(女)、胡集溶、洪興良、洪鳳年、姚松桃、鍾木庚、凌厚根、徐正芬(女)、徐玉珍(女)、徐阿五(女)、徐妙林、徐麗娟(女)、徐秋棟、唐登蘭(女)、唐惠芬(女)、錢永和、錢家根、郭立虎、袁祖根、黃肇祥、邱仁千、楊車高、楊佩蓮(女)、楊惠忠、鄒金鳳(女)、陸虹(女)、周寶良、顏錦春、戚崇義、章錢康、彭立長、韓琴素(女)、蔣惠娟(女)、蔣德偉、謝穎琦(女)、虞文玉、樓愛琴(女)、王金蘇、王林茂、王美玉(女)、王根生、王鋒俊(女)、王瑞菊(女)、方人儀(女)、方士榮、毛康娣、葉紀林、白瑞忠、帥恒友、劉開宇、江廣征、朱長雲、朱剛、朱荷娣(女)、莊虔鈺(女)、湯蘭珍(女)、湯桂銀(女)、孔祥金、吳紹富、蔣善根。

共青團上海市委第六屆委員會書記、副書記名單⁷

書記(4名)：陳新發、汪明章、鄭均培、萬桂紅(女)。

副書記(3名)：楊小兵、楊佩蓮(女)、沈芬娣(女)。

上海市婦女聯合會主任主任、副主任名單⁸

主任：汪湘君。

副主任(7名)：強玲英、翁品芳、李俊卿、沈粹鎮、陳佩珍、呂美英、楊巧娣。

7 由 1973 年 4 月 16 日至 21 日召開的上海市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產生。名單引自上海市總工會檔案。

8 由 1973 年 9 月 17 日至 22 日召開的上海市第六次婦女代表大會產生。資料來源同上。

後 記

本書與《大崩潰》的關係

20年前，我曾與蕭關鴻合作，撰寫了一本關於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書：《大崩潰》(台灣時報出版社1996年出版。當時書上署名的只是我一人，另一作者蕭關鴻沒有署名)。書還沒出版，我便作為訪問學者去了美國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不久，書出版了，我對那本書很不滿意。因為看了國外學者對文革的研究後，我感覺到自己過去的研究，完全是以文革思維批判文革，將這場由體制和更深層文化等原因造成的社會災難簡單化，甚至敘述語言都是文革式的。換句話說，我在那本書裏，沒能掙脫半輩子被牢籠禁錮的思想。再者，由於資料的缺乏，在《大崩潰》中我只着重寫了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而撰寫整個十年的上海文革歷史，始終是我的心願。

在作為訪問學者期間，我與伯克利大學的伊麗莎白·裴宜理教授合作，撰寫了《無產階級的力量》(*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美國Westview Press出版社1997年出版)。但不久我女兒高中畢業，到美國求學。我必須承擔作為一個母親的責任。於是，好幾年內，我離開了研究，一直打工供女兒讀書。但心底的願望揮之不去。終於，女兒讀研究生時能夠借錢讀書，我決心回國繼續文革研究，重寫上海的文革。

此時，國內政治雖然依舊，甚至倒退，但資料比過去豐富得多了。一是被判刑的當事人基本都已出獄，許多我一直糾結的歷史細節，總算有詢問對象了。二是市場開放程度更大，許多當年傳單的保存者，將傳單和資料放在網上拍賣；另一些收集者則集中收購這些傳單，許多人的資料非常豐富。三是由

於市場經濟的擴大，一些當年的工廠、行政機構例如主管局、行業公司被紛紛撤銷，大量文書檔案被當作廢紙流向廢品回收站，廢品回收站轉手賣給了一些資料收藏者。這些差點被作為廢紙的檔案，蘊藏着大量歷史密碼。四是新的有關文革的回憶錄不斷發表出版，提供了大量資料；國內不能出的，就在香港和台灣出。這一切，使我下決心，重新寫一本關於上海十年文革的書，重點放在運動史。對於上海十年經濟和生產方面的內容，由於又是一個大題目，加上我在這方面知識不足，所以基本沒有涉及。

如果本書的內容與《大崩潰》有出入，以本書為準。此外，這本書中的好幾個章節，都曾在《記憶》、《華夏文摘》等網上刊物發表。但發表後，我又做過一些修改。如果本書內容與發表過的章節有不同之處，也以本書內容為準。

資料來源

本書資料主要有以下幾類來源：

第一類來源，是文革時期的文字資料。

首先是文革中的報刊和出版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解放日報》、《文匯報》、《支部生活》；《學習與批判》、《朝霞》、《摘譯》等，以及文革中出版的書籍。

其次，是上海地區的群眾組織的小報、刊物、傳單，包括《工人造反報》、《紅衛戰報》，以及形形色色的傳單小報。數量非常大。這裏就不一一羅列出來了。

其三是文革中的文書檔案，主要是會議記錄、各種簡報、情況摘編等等，包括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發文和有關簡報，以及工總司和以後的工代會和上海市總工會的檔案，例如工總司傳單集，工總司所作的大量統計調查資料，還有徐景賢、王成龍、葉

昌明等人的工作筆記，等等。還有近幾年因行業關併撤轉，流向廢品回收站的大量當年檔案，包括行業簡報、情況交流、會議記錄、工作筆記、個人日記、個人檔案、交代揭發、財務報表、調查統計，等等，大都是原始的第一手資料，非常珍貴。

其四是文革中群眾組織編寫的各種大事記，例如：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1967年11月編寫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1967年3月編寫的《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上海柴油機廠「大事記編輯組」1967年4月編寫的《上海柴油機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工總司1967年5月編寫的《安亭風暴——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鬥爭史》、上海大批判寫作組1969年編寫的《一月革命大事記》、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1975年編寫的《上棉十七廠文化革命事記》，等等，還有復旦大學、上海師範學院、華東師範大學、同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大學的紅衛兵組織在文革中編寫的各種大事記。這些大事記由於距離所記載的事件時間較近，所以至少在時間和事件過程記載方面，離史實較近，在時間和人物參與的資料提供上比較準確。缺點是真正的動機往往被掩蓋在套話大話之後。

其五是文革中的首長講話、揭發交代和檢查，例如文革初期曹荻秋、陳丕顯等的講話，文革中毛澤東、周恩來、江青等，以及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王洪文等的講話，例如耿金章、戴祖祥、孫福祥等1967年被王洪文關在看守所時的交代。又例如曹荻秋、陳丕顯的檢查，馬天水、王少庸、梁國斌等市委幹部在批判陳丕顯、曹荻秋大會上的揭發。這些揭發交代，有的刊登在《大會專刊》上，有的被編成小冊子。例如赤衛隊主要領導成員1967年初的交代，被工總司編纂成小冊子《臭名昭著的赤衛隊》。還有文革後筆者得到的一些當年的交代，包括關於赤衛隊的交代、關於中申會的交代等。由於都是當時的文字，所以史實比較準確。

第二類來源，是文革後的清查資料及判決書。這方面的資料，一是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辦公室印發的宣傳資料，其中包括《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證》之一到之五，上海警備區編寫的《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張敬標、王少庸、馮國柱等文革中上海市委主要領導的交代，等等。還有許多當事人在文革結束後，被審查期間的交代材料，以及揭發材料，也都屬於清查資料。由於審查時都是針對每個具體事件，所以這類資料的內容比較系統集中。缺點是當事人為減輕牢刑，不乏迎合審訊人員引導方向的不實之詞。此外，由於只追查「篡黨奪權」，所以內容比較狹隘，不足以涵蓋整個文革時期的社會狀況。

第三類來源，是文革後當事人的回憶錄。其中比較重要的有王力、陳伯達、吳法憲、邱會作、聶元梓、閻長貴、吳德、汪東興等的回憶錄，關於上海的有陳丕顯、徐景賢、朱永嘉、陳冀德、沈福祥、吳中傑、馬達、周純麟、紅鷗等的回憶錄。還有許多回憶文章。此外，許多紅衛兵和當年造反派領袖的回憶錄也都是重要的資料。因為數目太多，不一一列出。我自己，也搜集了一些上海文革當事人的未刊回憶錄。

第四類來源，是文革結束後筆者對文革當事人的口述訪談。這些當事人是：安文江、包炮、卞全、陳阿春、陳卜昌、陳憲珍、陳渝、戴立清、戴祖祥、丁德發、范佐棟、馮軍、高建國、高靜慧、顧達、管宇春、何是、何秀文、紅鷗、侯邦琪、黃浩清、黃金海、黃樹森、黃濤、黃星生、霍達、吉傳仁、江必雄、姜桂鴻、金小蜂、金祖敏、勞元一、李東生、李功佐、李家齊、李劍鈺、李小明、連世玉、廖穎、劉浩德、劉政明、盧沂生、馬驥、馬立新、苗生元、閔孝思、繆財生、潘國平、秦根富、邱勵歐、施國鈞、施惠珍、施尚英、石鼎、石文德、史麗楓、宋有福、宋永毅、唐文蘭、田書堯、屠伯

森、汪湘君、王曾元、王腓利、王明龍、王紹璽、王秀珍、王玉璽、王知常、王珠山、魏威、文貫中、吳林深、吳文虎、吳中傑、蕭白、蕭木、謝鵬飛、欣鼎亮、邢文舉、徐景賢、徐美英、徐敏、徐泮清、許國良、許錦根、許小昆、薛海翔、嚴寧、楊小兵、葉昌明、游雪濤、余子道、俞膠東、郁鴻卿、袁堯舜、袁義永、張寶林、張伯生、張扣發、張水榮、張小坊、張永前、張振學、趙全國、周鐵榮、朱錫琪、朱永嘉，等等。(其中有些口述回憶，是筆者與復旦大學教授金光耀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金大陸教授一起採訪的)。

第三、第四類資料來源，提供了大量鮮活的細節，以及當事人當時的思想動機，對許多史實，也有令人信服的解釋。但因為年代久遠，許多情節成了羅生門。而且由於當事人思想的變化，回憶和敘述中的動機，與當初的動機可能會有很大差距。所以，在使用這些資料時，必須與其他資料尤其是文革時期的資料互相比照。

第五類來源，是文革後有關單位編寫的資料，包括系統和單位的文革大事記、地方志、組織史。都是上級有關單位統一佈置的，調用了大量的文革文書檔案，以及文革後的清查資料。不過，文革大事記一般不對外開放，很難看到。而地方志，由於遵從當局的「文革從簡」原則，除了金大陸撰寫的《上海青年志》文革部分，絕大多數地方志的文革部分，都過於簡單。而且因為是官方修史，必須遵從主流價值，迴避了許多重要史實。

第六類來源是文革後的資料匯編。其中最重要的，首推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此外，周良霄、顧菊英編著的《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也搜集了非常多的資料，還有逢先知、馮蕙主編的《毛澤東年譜》，等等。一些網上發表的資料匯集，例如水陸洲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論》，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參考資料。

第七類來源是歷史著作。其中對我的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至少到我這本書完成之時，國內還沒有一本文革著作能超過它。還有逢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麥克法誇爾著《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卜偉華著《砸爛舊世界》、王海光著《新秩序和新衝突》、史雲和李丹慧著《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印紅標著《失蹤者的蹤跡》，金大陸著《正常與非常》、熊月之主編的《上海通史》，等等。此外，海內外學人研究文革的著作也十分重要，加上許多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學科的論著。因為數量龐大，開列書單太長，這裏就不一一舉例。

從匱乏的資料中發現歷史，是件非常吃力的事情。不過，歷史本來就是各種真實、半真實或不真實的碎片。歷史研究者的責任和樂趣，就在於從各種碎片中接近真相。

感謝

本書在撰寫過程中，得到許多朋友熱情無私的幫助。在此我向所有對我提供幫助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謝。

首先我要感謝那些文革的當事者，他們接受了我的訪談。他們的回憶，補充了文字資料的不足，使得歷史鮮明生動，更使我弄清了许多長期不明白的關節點。我尤其要感謝當事人對我的信任及包容。書成之後，我盡可能地找到書中所提及的主要人物，請他們核對歷史事實。許多當事人知道我對文革的否定態度，他們不很同意我的許多觀點，但表示：他們要求的，是理清史實，至於怎樣評價這段歷史，是作者的權利。也有些被採訪者不願留下名字，筆者只能作技術處理，望讀者諒解。

我也感謝向我提供資料的許多熱心人，尤其是陳國康、林鷗、樊建政、徐建剛、李曉航，他們花了大價錢搜集文革傳單小報，卻無償提供我使用。我書中的許多重要史實來自他們提

供的資料。許多時候，這些文革中的文字資料，比照與當事人的回憶，對接近真相，起着關鍵作用。

我還要感謝其他對我提供過幫助的人：吳由之、李東生、周麗娟、陳君慧、袁福佐、石鼎、楊滙生、杜曉政，等等。他們或為我打字，或為我修改和校對文字，或為我查找資料，或為我尋找當事人，給了我非常大的幫助。還有朱學勤、吳一慶，對我的書，從結構到理論到敘述方式，提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議。還有嚴搏非，熱心地為我聯繫出版社。

同代寫史，最難的是與自己親身經歷的歷史保持距離。這一方面是因為個人經歷和情感，會對認識歷史產生干擾，尤其自小所受教育的干擾，會不可避免地頑強顯現；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史料的不足。當事人的回憶、檔案的挖掘和整理，都需要時間。尤其現在的中國，許多檔案不開放，長期保密；加上當局對研究的禁止和干擾，更增強了難度。

所以，我的研究只能是初步的。如果我的這本書能夠為後人的研究鋪路，我所付出的艱辛就是有了回報。

附：關於本書引用較多的部分重要歷史文獻或資料的說明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文革中由上海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在1967年11月編印，從內容上看，所引資料似乎有許多來自上海市委當時的辦公文書檔案，例如市委或市人委的簡報，也有群眾組織的傳單小報。據說當時負責審批群眾小報印刷的市委辦公廳秘書長李家齊，曾看過底稿，說雖不贊成其觀點，但事情都屬實，簽字同意排印。大事記起訖時間從1965年11月至1966年2月23日，原件約10萬字左右，16開鉛字排印本。現已經由宋永毅編入文革資料庫。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

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在1967年3月編寫。反經總部成立於1967年1月10日，於3月17日撤銷。撤銷前，整理出

這份記載總部活動的大事記。大事記詳細記錄了經濟主義風潮時上海工業、交通運輸和農業的經濟困境，所引資料大部為反經總部當時的會議記錄、內參等辦公文書檔案。原件為16開鉛字排印本，約2萬多字。原存於上海市總工會，後移交上海市檔案館。現已由宋永毅編入文革資料庫。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文獻匯集》：

這本文獻匯集，是工總司辦公室資料組1967年7月開始徵集資料，最後彙編成冊，起訖時間1966年11月至1967年底。收集了工總司自成立到成書時的所有傳單，包括：佈告、通告、通令、通知，等等，按傳單的出版時間編排。是研究工總司的重要資料。原存於上海市總工會，後移交上海市檔案館。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陳丕顯、曹荻秋反革命罪行鬥爭會揭發材料匯編》，《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丕顯、曹荻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滔天罪行》，《我的檢查》（陳丕顯），《我的檢查》（曹荻秋）：

這些資料是1967年召開的一系列對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以及上海市長曹荻秋批判大會上的發言，發言者都是上海部局長以上幹部，也有市委副書記們；還加上陳丕顯、曹荻秋當時寫的檢查。原件為16開鉛字排印本，沒有注明編印者。筆者估計是王承龍負責的上海市革委會辦公室編印的。

《臭名昭著的赤衛隊(暫名)》：

工總司1968年10月編寫，原件約6萬字。1966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後，工總司關押和審訊了許多赤衛隊負責人。這份資料是當時被關押的赤衛隊總部和區、局分部的一些負責人，被審訊時寫的交代材料的摘錄匯編。此外還有一些上海市委負責人如曹荻秋以及市總工會主任張祺等幹部的揭發和交代的摘錄。此資料沒有正式印發，原件為24開鉛字排印的校樣，似乎沒有校對過，因為文中錯字錯排頗多。原存於上海市總工會，後移交上海市檔案館。

《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1965年11月-1967年2月24日)》(草稿)：

這本大事記是1969年初，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徐景賢組織人編寫，徐景賢親自三次修改。引用資料多來自當時市革委會的有關簡報及其他文書檔案，此外還參考了大量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群眾組織的傳單小報；同時，編寫組還多次召開座談會，搜集資料及當事人回憶，並對文字資料進行核實。因此大事記在史料方面較為詳實。大事記詳細記錄了上海一月革命時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上海的活動，以及上海造反派組織的奪權經過，是研究上海一月革命的重要資料。大事記的起訖時間從1965年11月至1967年2月。大事記共6.2萬多字，原件為8開鉛印清樣。大

事記寫成後，徐景賢將清樣送張春橋、姚文元各一份，張春橋看後在樣稿中作了多處記號和修改，但又要求徐景賢不要再付排；而且要求將已經印出的也全部銷毀。之後，徐景賢讓將全部底稿、記錄、資料及印刷版子等一並銷毀，只留下三本清樣。文革結束後，從張春橋、徐景賢的辦公室中查出兩本。現分別保存於上海市檔案館以及中央檔案館。

《上棉十七廠文化革命事記》：

這本大事記是王洪文文革前工作的工廠上海國棉17廠(後改名上海第17棉紡織廠)1975年編寫，原件約5萬字。大事記詳細記錄了文革初期還是一名普通保衛科幹事的王洪文的活動，是研究王洪文以及上海文革時期群眾運動的重要資料。大事記的實際撰寫者是新華社上海記者站的工作人員，1974年至1975年奉命往上棉17廠為王洪文寫傳。引用資料為該廠1966年的會議記錄等辦公文書檔案、文革初期的大字報抄件，以及座談會記錄和採訪。原件為16開打字油印本，文革結束時大都被銷毀，只剩幾份，分別存於上海第17棉紡織廠、上海紡織局、上海市檔案館以及中央檔案館。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之一到之三)：

這份資料是文革結束時，中共中央「王、張、江、姚專案組」1976年12月到1977年9月編纂。大都是當事人的揭發和交代材料，也有文革中的檔案資料。共約17萬字，內容主要是揭發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及王洪文。曾下發到基層並向群眾宣讀。

《關於「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重要骨幹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罪行》(之一至之五)：

這份資料是文革結束後，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1981年2月編纂，大都是當事人的揭發和交代材料，也有文革中的檔案資料。共約40萬字，內容主要是文革中發生在上海的各類事件。曾下發到基層並向群眾宣讀。

《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

1976年10月文革結束後，南京軍區於1979年3月召開專門會議，佈置上海警備區撰寫《上海民兵鬥爭史資料》，上海警備區於1979年3月組織人員成立了編寫組。全部資料共三冊，第三冊的內容是文革中的上海第二武裝，約38萬字。其中包括文革中的文書檔案、照片，文革後的揭發批判材料。還有兩份大事記：《「四人幫」在上海經營「第二武裝」始末》，《「四人幫」經營「第二武裝」的紀事》。原本為十六開印刷合訂本。整本資料線條清晰，內容翔實，是研究文革時期上海民兵的重要資料。

《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供討論修改用第二稿)：

上海市總工會「赤衛隊史編寫組」於文革後的1983年9月編寫。原稿為3萬多字，16開打字油印本。此資料編寫前，正值上海市委為文革中上海保守派群眾組織「赤衛隊」平反不久，上海市總工會組織編寫了這本資料。執筆者王一魯、陳其賢都是當年的赤衛隊員：陳其賢是赤衛隊總部文字秘書，王一魯是《解放日報》社的赤衛隊負責人。他們多次召開原赤衛隊總部及各區負責人座談會，採訪了許多當事人，編寫成這本資料。雖然最終沒有按原定提綱寫完，只寫到昆山事件，但赤衛隊最重要的活動諸如成立經過、與中共上海市委的關係、康平路事件等，都已包括。原件存於上海市總工會，後移交上海市檔案館。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

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1992年編。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清查上海的文革派，留下大量當事者交代、揭發和證詞。清查結束後，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長周克，覺得讓資料沉睡可惜，組織部分曾參加清查的工作人員，利用清查檔案編寫了這本史話。雖有一些差錯，但資料極其豐富，缺憾是資料來源全部沒有注明出處。原稿約60萬字，16開鉛字排印本。本打算公開出版，但寫成時正值1989年以後的政治收緊時期，沒被允許，以後一直沒有出版。

這本書是關於上海十年文革的歷史。由於官方不開放史料，無法了解上層政治，本史稿更多地側重於底層的群眾運動。上海文革是中國十年文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文革除了上層的政治鬥爭，群眾運動是其最大特點。文革群眾運動由兩大部分組成：紅衛兵運動，以北京為典型；工人造反派運動，以上海為典型。紅衛兵運動，到1968年上山下鄉基本結束。工人造反派運動，到1968年「大聯合」也基本結束。只有上海以王洪文為首的工人造反派，通過組織的體制化，基本保留了骨幹隊伍，在文革政壇整整活躍十年。除了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上海還有一支其他省份城市都不擁有的文革力量：以張春橋和姚文元為首的上海市委寫作組。這股勢力左右着上海的輿論，對全國的輿論也起着重大影響。上海的文革就這樣與中央文革派緊密相連，從1965年的批判《海瑞罷官》，到1966年的安亭事件，到1967年的一月奪權，到1976年的未遂武裝反抗，始終為毛澤東的文革尋找突破口，忠實地實現毛澤東的心願。

隱藏在本書整個敘事背後的是一個又一個的為什麼，本書追溯的是歷史的初始動機和邏輯。許多事情或事件，最初究竟因何而起，希望通過細節，尋找歷史的來龍去脈。

李遜，女，1948年生，畢業於上海成人業餘大學中文系。1979-1992年，先後在上海市總工會、上海市總工會工運研究所工作。與美國學者裴宜理合著《無產階級的力量》（*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美國 Westview Press 1997年出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

www.oupchina.com.hk 大眾圖書館 <http://dztsq.info>

ISBN 978-0-19-944168-6



9 780199 441686